

目 录

- 辛亥上海光复前后(座谈会记录).....(1)
- 辛亥沪宁光复的片断回忆.....黄一欧(20)
- 攻占上海制造局亲历记.....王子骞(26)
- 光复軍攻克上海江南制造局及陈其美篡取
 沪軍都督之真相.....楊鎮毅遺稿(31)
- 李燮和沪宁革命之经过.....余焕东(35)
- 略談上海光复之役.....郭汉章(38)
- 上海光复时的巡防营和吳淞炮台.....周南陔(42)
- 上海光复前夕的一次重要会议.....沈焕唐(48)
- 接洽上海海軍反正和组织海軍陆战队会攻南京
 回忆.....王时澤遺稿(49)
- 辛亥革命时期的苏浙学生軍团.....田頌尧(56)
- 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杜 伟(59)
- 南洋公学的一九〇二年罢課风潮和爱国学社
 (座谈会记录).....(63)
-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新聞界动态.....严独鶴(78)
- 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新聞界.....包天笑(86)

辛亥革命在浙江	葛敬恩(91)
光复会前期的活动片断	陈 魏(127)
記光复会二三事	沈懋民(131)
大通师范学堂	朱贊卿(143)
西湖白云庵与辛亥革命之关系	黃元秀(150)
浙軍光复杭州和馳援南京亲历記	来伟良(152)
記攻焚浙江撫署之役	赵得三(161)
杭州光复之夜的一次官紳緊急會議	許炳堃(165)
湖州光复回忆	邱寿銘(167)
辛亥革命时期的硖石商团和工兵铁道大队	吳欣木(170)
宁波光复亲历記	林端輔(174)
温州响应武昌起义的亲身经历	陈守庸(183)
乐清辛亥革命史料	周起渭(188)
回忆辛亥革命时期的几件事和处州光复经过	呂月屏(196)
辛亥革命在丽水	毛虎侯(200)
辛亥革命后松阳的一次剪辮斗争	江天蔚(203)
記秋瑾	徐双韵(205)
回忆秋瑾	王时澤遺稿(223)

第九鎮秣陵起义和江浙联軍

光复南京亲历記	徐 森 謚秉直(233)
鎮江新軍起义和鎮軍会攻南京紀实	許崇灝遺稿(247)
南京光复見聞瑣忆	馬涯民(256)
鎮江光复回忆	吳次藩(263)
光复浦口之战	陆小波(269)

- 溧阳光复記姜丹书遺稿(272)
- 吳江光复前后回忆費璞安(276)
- 淮安光复和周实阮式两烈士被害经过蔣象怡(282)
- 光复徐州的点滴回忆徐 森(285)
- 徐州光复前后韓席筹 韓范山(287)
- 赵声革命事迹赵启驂(297)
-
- 江西光复和光复后的政局彭程万(304)
- 江西光复和二次革命的亲身经历欧阳武(310)
- 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龔师曾(328)
- 江西易知社与共进会簡介蔡 惠(345)
- 湖口起义的回忆伍毓瑞(350)
- 辛亥革命的几个片断回忆卓仁机(357)
- 辛亥南昌起义之夕周兆麟(372)
- 辛亥贛南光复始末紀略陈 銳 欧阳助(374)
-
- 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
-政协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資料工作組(377)
- 辛亥革命在安徽李公棠(387)
- 徐錫麟安庆起义紀实凌孔彰(392)
- 熊成基安庆起义的回忆楊士道(399)
- 安徽光复经过与都督的爭夺王一民(404)
- 辛亥前后合肥的革命活动与軍政分府的成立龔嘯云(412)
- 淮上軍革命实录政协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資料工作組(417)
- 辛亥宿州光复杂忆张从五 丁洁尘(427)

- 辛亥革命前后安徽青年学生思想转变的概况高一涵(431)
- 記安庆岳王会常恒芳(438)
- 安徽辛亥革命鱗爪記郑青士(442)
- 記韓衍政协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資料工作組(446)
-
- 辛亥福建光复回忆刘 通(453)
- 廈門的辛亥革命丘廬竟(469)
- 泉州光复史事拾零泉州市文史資料整理小組(475)
- 辛亥革命上杭民軍被陷記吳梅林(481)
-
- 辛亥革命后罗福星领导的
 台湾人民抗日斗争苏子衡 苏 新(493)
- 記台湾余清芳的反日武装起义陈文彬(501)
- 辛亥革命前后台湾的一鱗半爪王文德(508)

辛亥上海光复前后

一座談会記錄一

据《上海史料选輯》編者按：今年是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我們于六月中、下旬两次約請上海市文史館館員傅墨正（傅孟，沪軍都督府成立后任沪軍第二团第一营营长，后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二十三师第九十团团长）、李健青（李定夷，当时在上海交通大学讀書）、李淨通（李健生，当时任上海《时事新报》編輯）、余芷江（余沅，沪軍都督府成立后在該府总务处工作，南北議和时任南方代表团秘书）、张志鶴（张伯初，当时在川沙办自治）、林道源（林孟鳴，当时为商团团员）、賈粟香（賈丰芸，当时在敬业学堂任教）、张斯鑾（张仲书，江浙联軍攻甬京时任該軍參謀处长）、周斌（周克新，当时在上海湖州旅沪公学讀書）、唐执夫（唐在礼，当时在袁世凱处負責招待各省代表的工作）等老先生座談辛亥上海光复前后情况。座談会由上海市文史館严諤声副館长主持，并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协作下进行。館員所提供的情况間或互有出入，也有与报章文献記載互有参差之处，均輯录如下，供同志們分析考证时参考。

光复前的活动

傅墨正：武昌起义后，形势一度危急。如果上海不赶快响应，各省起义就要推迟，辛亥革命恐不能迅速成功。上海光复后，浙江、

苏州、鎮江、南京在政治、经济和軍械上得都會到上海很大的支援。上海为中外矚目之地，一旦起义，影响很大。所以，上海的独立是辛亥革命的轉折点。

李健青：我很同意傅老的看法。上海未独立之前，只有湖南、陝西、九江、南昌、山西、云南等六处响应武昌起义。上海独立，东南响应，关系全局很大。

李淨邇：辛亥上海光复的准备工作，如运动軍警以及联系青洪帮，都是陈其美去进行的。光复时，我在《时事新报》任編輯。光复前一天的上午，我亲見陈其美来报館說，“明天上海就要光复了。”果然，到了当天深夜，就有訪員来报告，陈其美已率領部队进攻制造局。到了天明，全市即悬白旗。稍迟，訪員又来报告，陈其美已做了沪軍都督。

严鐸声：上海光复时，陶成章在不在上海？青洪帮是誰去联系的？

傅曼正：陶成章当时在上海。当时，同盟会和青洪帮的联系是很秘密的，只有橫的联系，沒有纵的联系，所以沒有参加联系工作的人不知道。

余芷江：各省的革命党人到上海后，或到哈同花园，或到“铁笔报”（即在大陆报館楼上另辟一室；“铁笔报”只是一个机关，沒有出版过）。起义前，陈其美、宋教仁、蔡元培等在“铁笔报”研究，究竟是先以全力支援湖北还是先在上海起义。后来因为湖北形势不好，乃决定先在上海起义，以为声援。进攻制造局以前，已与各方有接洽；让进攻的部队在沪軍营集合，也是因为事先有过接洽的原故。陈其美和各方面的联系工作是做得很好的。“铁笔报”本来只有吳稚暉、柳亚子、戴天仇、叶楚伧这些人，后来陈其美也参加了。

賈果香：我晓得李平书常在小花园一个館子里請客，請的都是地方自治机关里的人。

林遵源：那个館子叫“都益处”。

余芷江：当时，时报館楼上有一个“息楼”，对外称“俱乐部”，吃吃喝喝的地方，其实，里面都在搞政治活动。赵凤昌、沈恩孚、李平书、狄平子、袁希涛、陈冷、雷奋、史良才（即史量才）、龔子英等，都是息楼里面的人物。姚文枬、袁希涛、陆文龍沒有参加辛亥上海光复。雷奋和陈冷是郎舅。赵凤昌是湖北候补知府，张之洞手下的一个紅人。他住在上海，与同盟会南北方的人都有接触，是一个跑腿朋友。

严调声：是不是可以說，息楼是以张謇为首呢？

余芷江：可以这样說，但他不常到。狄平子也是一个重要人物。

张志鶴：张謇是江苏独立的首脑。由程德全領銜的江苏独立的电稿，据說是张謇在苏州铁路旅館拟就后交程拍发的。

余芷江：我記得有一份电报是沈恩孚起草的，张謇看过。电报底稿一直在我家里，抗战时被日軍搜去了。这份电稿内容是江浙士紳要求清帝退位的。本来要张謇起稿，张說，清廷对他还有点恩，他起不下手，所以改推沈恩孚起草，由张謇、湯寿潜两人領銜发出。以后又有軍政界程德全領銜的电报，也是要求清帝退位的。

傅墨正：听說苏州程德全独立，是上海独立之后同盟会派章梓去活动的結果。

张志鶴：江苏都督府民政司以李平书为司长，沈恩孚为副司长。民政司下分总务、教育、实业、交通、警务各科。李平书因在上海沪軍都督府任民政总长，并不到司办事。史量才在民政司任实

业科长,但也不去办事,因其时张謇为盐政督办,史正受张命筹办松江盐务。

进攻制造局

余芷江:进攻制造局的日期,是在信成銀行(南市毛家弄碼頭)协商,最后在嫫嫫里“尚义队”里商定的。

林道源:进攻制造局前,商团休息的地方就在汉口路云南路口嫫嫫里,名为“尚义队”,凡商团团员住居在租界者在此集合。

賈栗香:进攻制造局的时候,只有商团,沒有军队。商团去了多少人我不知道。商团开到制造局,起先并没有进攻。当时也没有人说起有陈其美参加。陈其美忽然站出来說,他来说服守卫制造局的军队,可以不流血。这时,李平书才晓得陈其美也在場。陈其美对张楚宝的军队作了一番演说。军队方面认为他既不是沈恩孚,又不是李平书,不理睬他,并出其不意,把他拖了进去。外面要里面释放,里面不放;外面就要进攻,里面說,“不睬!”正在相持不决的时候,忽然有人說:“张楚宝溜掉了。”有人說:“张楚宝既然溜了,上吧!”于是才开枪进攻。里面也还枪。伤人不多。有人就去制造局后門放火。道台衙門和右营衙門都烧起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天夜里要攻制造局,所以清朝的那些官吏都早已溜走。老百姓皆安然无恙。放火以后,制造局算是攻下来了。大家进去以后,陈其美还綁在那里,故陈后来有“一榜(綁)都督”之称。

林道源:攻制造局,除商团外,刘福标(即刘福彪)的敢死队大有力量。

余芷江:刘福标原来是在邑庙卖拳头的。攻打制造局的时候,他本来是打前队的,即敢死队。打不进去,他退下来,退到老西門

外万生桥。制造局后由伶界潘月樵等和商团部分团员攻入。刘后为福字营营长，我未见过这人。

傅墨正：刘福标后来做福字营营长，驻在斜桥附近。

严阔声：刘福标的福字营是临时搞起来的吧？

傅墨正：只有几十人，临时组织的。那时，有几十几百人就号称营，号称军。也没有什么武器，有几个炸弹就行了。

余芷江：关于进攻制造局的情形，据亲身参加攻打制造局的许奇松先生告诉我：进攻时，有商团、民军（包括敢死队福字营）和伶界人士，先在沪军营集合。陈其美拿来了两只箱子，里面全是手枪、步枪和炸弹，发给大家并叫大家臂缠白布。陈其美自己拿了一面白旗，大叫“冲呀！”大家从沪军营一冲冲到制造局。到了那里，陈其美先进去说服总办张楚宝，没有结果，反而被张扣留，绑在会客室。大家把陈被扣的事去报告留守救火联合会的商团等，于是决定进攻。这时，张楚宝已经逃走，李平书也已从制造局出来了。大家推李平书做进攻制造局的总司令。李平书乃委托李英石。李英石是骑马的，看见过的人说，他骑在马上，一点也不神气。

闾北方面的革命党人，知道南市方面制造局打不下来，就派人去支援。一直打到天亮，制造局的前门打不进去，改打后门，还是打不进去。那时，制造局附近有一个小店，店老板看见这个情况，就说：“打不进就烧吧！”他还捐了十几听火油。一烧，制造局前门的守卫就乱了。制造局就是这样攻进去的。

傅墨正：攻制造局时，我不在上海。我听曾经参加攻制造局的俞凤韶说，攻的时候，商团是进去的，还有伶界的许多人。和陈其美同时进去的还有高尔登，都被绑起来。他们被绑起来以后，外面急了，由杨谱笙和俞凤韶到闾北，向闾北警察署长陈汉钦恳求共同

攻制造局，这才把陈其美救了出来。楊譜笙和俞凤韶是夜里一两点钟到閘北的。第二天清晨，制造局就攻下了。

俞芷江：攻制造局时，商团只有团员张沛如中流弹伤重而死。

傅墨正：光复会也有人参加攻制造局。还有几个女子如尹銳志、尹維俊等。陶成章恐怕也参加的。

李健青：我听說，上海光复，閘北先于南市。公历十一月二日那天，地方上謠言很多。閘北巡警总局巡防队因請領枪弹未发，鼓噪起来，往外散。不知怎么一来，有民房失火。大家以为革命党来了。閘北巡警总局长姚捷助派巡警去镇压。各区巡警聞警毕集，但巡警回来时已臂纏白布。姚就逃入租界了。上海道刘燕翼也逃入租界。上海县田宝荣晚上继之出走。巡防队推陈汉卿为司令，閘北即告光复。制造局总办見此情形，就加强防范，因而进攻时比較困难。最后是由局后踰牆而入，举火焚局才攻下的。不知是否如此？

俞芷江：是的。閘北在农历九月十三日上午就光复了。本来是約好南北同时动手的。

林道源：攻进制造局以后，里面混乱得很。

俞芷江：是的。当天下午，我进去看看里面的情形，沒有人理会。滿地是枪。大家都在搶枪。也有許多子弹，但和枪的口径不合。正在那个时候，外面传来謠言說，北方派了两艘兵舰来攻制造局了。于是有人說，里面的人一概不許出去，准备抵抗。前后門都关起来了。到了四点钟，有人請求看守門的楊譜笙開門，楊譜笙不答应。快五点钟的时候，李平书派人到局說，現在要清理制造局內部，把門开了。于是大家一哄而出，枪和臂上所纏的白布也丟掉了。我就到海防厅，遇到朱少屏。他要我帮他搞都督府总务处的

工作，我答应了。又遇到陈其美。陈要我和伍廷芳联系，我即又到伍廷芳寓所。大约在六点钟的时候，领袖领事问伍廷芳：听说北方有军舰攻制造局，他们没有得到情报，问南市的情况怎样？伍廷芳转问我，我就把我被关在制造局三小时中所见告诉了伍廷芳，但伍廷芳没有把这种情况告诉领袖领事。

李健青：听说进攻道衙时，有小队民军手缠白布，由小东门入城，一路并未遇抵抗。道衙的卫队反正后，还参加进攻制造局。道台刘燕翼则已先遁入租界。

推举沪军都督

贾粟香：不知为什么，制造局攻下以后，倒有人恐慌起来，搬到租界去。李平书一看情形不对，第二天（农历九月十四日）召集地方自治机关商会、商团、救火会在海防厅署开会。那时，我在敬业学堂教书。制造局攻下以后，大家都无心读书了，停了三天课（农历九月十四、十五、十六）。我晓得那天要选出重要人物，就去看看情形。到了海防厅，看见李平书、顾馨一、姚文枬、李英石、穆恕斋都在场。我是一个不速之客，李平书见了我，点点头。穆恕斋就对在座的说：“今天的会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的。”我也不理他。开会了，先举出李平书为民政总长，举穆恕斋管警察，王一亭管财政，葛尚聪做审判厅长，吴怀玖做民政长。接着就选军事方面的人。有人提出要成立军政府，大家赞成。于是举陈其美为军政长（这两个意见是谁提的，我记不起了）。快要散会时，忽然又出来一个不速之客。他站在会议室当中，摸出手枪在桌上一拍，说：“上海与中国全局有关，武昌起义，选出鄂军都督，声望不小。陈其美昨天吃过大苦头，现在给他一个军政长，太不公平，不足以响应起义。”大

家听了都不响。这人又说，他看应该组织都督府，要陈其美做都督。没有人反对。大家一拍手，事情就停当了。这个不速之客姓刘，不知是陈其美的什么人。

余芷江：这个姓刘的就是刘福标。

严调声：选举都督时，有没有人提李燮和？

林道源：不敢提。

余芷江：李燮和没有势力。

严调声：陈其美方面的湖州帮势力大。

贾栗香：选举军政长的时候，曾有人提钮永建，但是另外有些人说：“我们不认得他。”这些人当然也是陈其美的人。

张斯馨：李燮和也想当沪军都督。陈其美当了沪军都督，李燮和就去吴淞当都督了。那时，吴淞要塞司令姜国梁是被周南陔说服反正的。

余芷江：李燮和虽然在光复时没有参加打仗，但他在光复前参加过策划，所以也有资格做都督。当时，李平书曾要钮永建做都督，因为钮是上海人，但钮不愿。有人想提李英石做都督，因为认为陈其美没有军事知识。但当时湖州人的势力大，拥陈的人多。李平书虽然参加了光复，但他和革命党人还有些距离，认为大家既然推陈其美做都督，这样也好。

傅墨正：当时上海一般人士对上海光复是满意的。把清朝统治者赶下台，是大快人心的。后来对于沪军都督府不满，也有一部分乡土观念问题在内：“湖州人怎么能够来管上海？”

余芷江：上海士绅本无革命思想，他们的看法是：“你要革命，你就去革命吧！”有些老士绅甚至连昆庙里桂花厅前那块“皇帝万万岁”的牌子都不肯拿掉呢！

傅墨正：陈其美是在日本学警察的。辛亥革命时，回国的士官学生倾向于陈其美，所以陈有军事方面的支持。同时，陈其美在进攻制造局这件事上也有功，所以许多人推他做都督了。当时，新闻界也有许多人捧陈其美的。同盟会上海分部由陈其美主持，所以，以陈为都督比较相宜。陈其美和各省的联系工作做得很多。浙江光复前，他也曾到杭州去联络过。

那时，甯北方面以陈汉卿的势力最大，成立了游击队，号称两团，后来被陈其美解散。当时部队的名目繁多，女子队也有好几个。还有湖南、广西、广东方面来的部队。后来都逐渐改编，编成两个师。一个师以吴兆麟为师长（第一师），一个师以黄郛为师长（第二十三师）。另外还有李征五的光复军，下分两个团。张宗昌当时在李征五手下当营长。李英石亦带一部军队。我当时在第二十三师任第九十团团团长。黄郛的参谋长是何澄（亚农），副官长是吴荣鬯（震修）。黄郛的部队里，留学日本士官的很多。旅长许厚德就是士官一期的（以后缩编为第六十一团）。还有刘建绪、金骥平、蒋介石、杜炳章、陈韬、陈其蔚。陈其美的哥哥陈其采也是士官第一期的。所以士官生与陈其美的关系很密。蒋介石在光复时回国，他和何应钦、张群、王柏龄等都接近黄郛。他们都捧陈其美，所以陈其美的势力较大。

李泽通：听说陈其美在日本时，陶成章曾当着孙中山先生面前劝陈戒嫖戒赌。陈认为陶有意侮辱他，恨之甚深。又听说，陶与徐锡麟均为光复会的发起人，光复会是苏浙皖三省的革命团体。自徐在安徽被难后，陶成章即成为光复会的唯一主要人物。上海光复后，沪军都督一席应由陶成章担任，三省革命同志才能信服。陈其美探知这个情况，遂下毒手，阴谋将陶暗杀，以绝后患。

傅墨正：我曾在浙江参加光复会。秋瑾是光复会在浙江方面的主持人。秋瑾、徐錫麟遇难后，光复会的名义在表面上沒有了，但它的精神和实质还是存在的。至于光复会和同盟会的关系，光复会实际上是同盟会的一部分。同盟会当时与很多组织有关系，光复会就是其中之一。同盟会在浙江的活动，以光复会为主干。秋瑾失败后，光复会的一切活动都以同盟会的名义进行。起义以前，同盟会和光复会的成员都在一道做地下工作，并没有什么争执。上海光复后，上海的同盟会由陈其美、宋教仁主持。陶成章、李燮和是光复会的。为了争夺上海都督这个位置，光复会和同盟会发生了磨擦，陈其美和陶成章暗斗很烈。一般人都說，陶成章是陈其美派人去暗杀的。陶成章死在广慈医院。在斜桥安徽会馆开追悼会时，陈其美曾去主祭，当时防范甚严。陶成章曾想做浙江都督，但他資望不够，他在浙江也沒有什么活动。

周 斌：一九〇九年，我在上海湖州旅沪公学讀書。那年秋冬之交的某一天，我在学校看到一个陌生人，年紀三十岁左右，穿小袖长袍、西装褲，着皮鞋，发辮已剪去，梳成在左边分开的西洋式，戴眼鏡。他这种打扮在当时是比較少見的。后来得知此人姓楊，曾在日本留学，回国后，在湖州旅沪公学任代課教員。上海光复后，有一天我在路上遇到曾在湖州旅沪公学教体操的金铁軍。我問他在哪个学校教体操。他說，他在沪軍都督府里做事。我問他：“你怎样进都督府的？”他說：“都督陈其美就是当年湖州旅沪公学的那个代課教員。”他又說：“从前在湖州旅沪公学当教員的，現在都在都督府里做事。”我这才明白彼时的楊某就是陈其美。

上海解放前三年，我在上海組織“辛亥革命同志会”，经常和曾任湖州旅沪公学唱歌算术教員的王汉强見面。据他說，陈其美留

学日本以及他回国后进行革命活动，都得到湖州旅沪公学创办人之一的楊信之的帮助。王一亭、张静江也介绍陈与各方面联系，陈本人也很积极，因此当选为沪军都督。陈后来委楊信之的兄弟楊譜笙为軍需科长，委王汉强为总务科长。楊譜笙又是王寵惠的叔丈人。

林道源：王汉强是人事科长。

余芷江：沪军都督府成立时，财务先推王一亭。王一亭没有钱，要他搞财政，是“摆摆炮”。后来改推沈縵云，因为沈有信成銀行可資活动。府里的秘书多半是学校教員，如楊济滄、楊保恒等。我当时和朱少屏在政务处下面的总务处里工作。

光复后第一张安民布告是軍政府发的，由陈其美出面，用的是黃帝紀元多少年。軍政府存在的時間很短，連徽章都沒有发过。

张志鶴：軍政府的存在还不滿一天。

李健青：沪军都督府成立后，有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陈其美联络程德全、湯寿潜等召开十三省区代表會議，在爱儷园开会，倡議組織临时政府，推黃兴为大元帅，黎元洪副之。鄂軍反对这个决定，黎元洪也不願。后来重行选举，改以黎为正，黃为副，但要黎到南京就职，黎不能来，黃也不願。虽无成就，但已是組織临时政府的先声。第二件事是孙中山先生回到上海，直到赴宁就临时总统为止，一切招待皆由沪军都督府負責。

傅墨正：沪军都督府成立后，内部組織分六处，参謀处（黃郛任参謀长）、軍需处（楊譜笙）、軍务处（許伯銘）、軍械处（大概是张祥）、传令处（姚舜）、諜报处（应桂馨）。此外还有何应欽、朱紹良、沈鼎吾、沈鵬、王子良等人分散在各处。都督府外面有政务处（李平书）、财务处（沈縵云、周佩箴）。沪军都督府諜报处是做特务工

作的。

李健青：沪軍都督府的諜报处組織最乱，投效的人都安插在此，阿猫阿狗都可以参加。

余芷江：沪軍都督府成立以后混乱得很。经济帳目，包括許多人的捐獻賬目在內，始終沒有弄清楚。我曾看見过一篇帳：买两把藤椅竟要二十八元之多。

严錫声：应桂馨組織的共进会的情况怎样？

傅墨正：沪軍都督府成立后，应桂馨做諜报处处长，陈其美有許多事是要他去做的。蔣介石当时不在都督府，他在軍队里当团长（后改隶黄郛部下）。另外还有一个团，团长是刘基炎。这一团后来派到山东烟台去北伐了。

余芷江：我与应桂馨同过三天事。他是紹兴人。听说共进会成立后，应桂馨极力避免出面。共进会的成員主要是販运私盐的“盐梟”。他們原来与政治沒有关系，只是为了生活。当时的盐警加入共进会的不少。应桂馨手下的人到长江两岸，可以不帶錢，有吃有住。我和应桂馨在一道的时候，起先并不知道他是共进会的。有一次，我和应桂馨同到四馬路大西洋西菜館去吃飯。第二天，我又去吃飯时，那里的一位茶房問我为什么和应桂馨在一道。他說，应桂馨了不起，是共进会的头脑。我这才知道应桂馨是共进会的首領。

我在沪軍都督府代朱少屏做了三天总务处长，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我当时是管錢的。当时領款的手续是付款单子上由陈其美盖私章后，交财务处沈縵云付錢。陈其美把他的私章放在我那里。我到都督府的第二天，有一个叫王钟声的到都督府找到了我，問我要三千块錢，說是要去解散他的弟兄。我說，我沒有陈其美的

图章。王钟声气势汹汹，拔出手枪，一定要钱。这时，陈其美的卫队在隔壁房间听见了，跑过来对他說：“要钱！要到都督那里去要，不許在这里吵”，并把王钟声拉了出去。他走了，我也就从后門溜走了。第三天，我才知道王钟声在馬霍路(今黃陂路)找到了陈其美，逼着陈其美給了他三千块钱。王钟声拿到钱，买了船票，連夜逃去天津。誰知应桂馨已经有电报到北京，說是上海有革命党到北方来。他的电报里也沒有指名是誰。王钟声坐的船一到天津就被搜查，王钟声被搜到了。三千多块钱，还剩二千多。王钟声馬上被枪毙了。

賈霖香：李平书因为是制造局的提調，所以在財政方面比較有办法，上海独立后，他搞到三十万两銀子。

傅墨正：张靜江对于上海同盟会也有经济上的补助。

余芷江：陈其美想从大清銀行来解决一部分经济問題。那时，宋汉章任大清銀行行长。陈和宋談，要接收大清銀行。宋汉章不答应，陈其美就要捉宋汉章。但是大清銀行开在租界上，陈其美不能去捉。有一天，宋汉章在廉惠卿和吳芝瑛家小万柳堂吃飯，被陈其美偵知，用小火輪由黃浦入苏州河到廉家，就从水閣上去，把宋拖上小輪，关在曹家渡都督府。各国在上海的領事认为陈其美是在租界上捉人，不答应，并找伍廷芳交涉。伍廷芳(这时伍已任南方外交代表，是黎元洪聘任的，他素来崇美)认为陈其美胡鬧，不應該在租界上乱捉人，就派人和陈其美商量：銀行事由伍廷芳負責要宋停止将款項解往清廷，但要將宋释放。双方談妥后，伍廷芳要我和陈其美接头，并且搞了一辆汽車把宋汉章接出来。宋汉章一見汽車，吓得发昏，以为要枪毙他了。我对他說：“出了小东門就是租界，你放心好了。”宋汉章为了对商界标榜自己吃过这回苦头，后

来編了一本《伍公平法記》，要我到著易堂书店去印，印刷費用由宋汉章自己出。宋后来到北京去开会，把这本书帶去送人。据說，这本书对他后来出任中国銀行行长有关系。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上海广肇公所两天內支借了八十二万两或八十三万两。温宗尧当时是广肇公所董事，这笔錢是温宗尧向广肇公所說項，由旅沪广帮商家借給南京的。

南北議和

余芷江：南北議和前，袁世凱当时已经认为清帝退位是不成問題的了，而南方不知道。南北双方决定議和后，汪精卫从北京牢監里出来，还以为沒有恢复自由。他到了旅館里，押送他的軍警走开，他还莫明其妙。直到旅館的人送报給他看，他才知道武昌起义了。

議和本是要在湖北举行的。北方总代表唐紹仪已经准备帶一班人去了。南方的伍廷芳不敢去，他不敢出上海租界。黎元洪派雷奋到上海来接伍廷芳，伍廷芳仍不肯去，反而要唐紹仪到上海来。经过湖北方面与唐接洽，唐也同意到上海开会。南方代表团有參贊温宗尧、王正廷、王寵惠。温是总參贊。正在組織議和工作时，汪精卫忽然到了上海，也是參贊之一。南方所有有关議和的文件都由他执笔起草。南北議和时，我和汪精卫同了几十天事，常听他談天。他說，他在牢監里很受优待，善書还送許多书給他看。伍廷芳手下人才很多，但是写文章写得又快又好的人沒有。汪来，正好。他一天到晚在伍廷芳家里。汪精卫、伍廷芳、王寵惠、唐紹仪等交談时，說广东話，我听不懂。

陈其美主张在南市开会，唐紹仪和伍廷芳不同意，要外国人保

护，于是就借南京路上的工部局市政厅开会，对面就是巡捕房。

會議时，各省派来的人都不参加，只由伍、唐两人談。王正廷等虽也出席，不过听听而已。汪精卫起先也不参加，后来因为要他写写东西，也就参加了。唐紹仪带来的人，我知道有許鼎霖和赵椿年等是参加的。

这次議和是一个大烟幕。有关會議情况的电报，白天打出去的和晚上打出去的完全不同，是两回事。我当时管會議的电报，明碼、密碼都管。白天开会是在做文章，談停战問題，規定你让出多少里，我让出多少里。白天打出去的电报是互斥对方违反协定，等等。重要問題在夜里談：清帝退位問題、退位后的优待問題、退位后誰来的問題、要外国承认問題，等等。所以夜里打出去的电报才是會議真正的內容，而这些內容在會議进行时并不公开。會議开了几天以后，袁世凯将唐紹仪的职务撤銷，改由袁与伍廷芳直接电商。这时就完全通过电报来开会了。南方的电报全由汪精卫执笔。議和结束后，汪精卫带了一班人到北京去了。

陈其美这班人沒有参加議和。张謇、赵凤昌参加过會議以外的会，商量对策。唐紹仪被撤去北方总代表的职务后，虽不出面，但参加了南方的會議以外的会。

李健青：我听说，当时一班名流常借赵凤昌宅开会，伍廷芳、张謇等均在其列。清廷逊位詔书是送经南方修改过的。詔书末段“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寬閑，优游岁月，长受民国之优礼，亲見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歎！”是幕后人刘厚生的手笔。

唐执夫：南北議和告成后，袁世凯不肯到南京，并且指使曹錕在北京发动兵变。南方迎袁代表蔡元培、汪精卫就打电报給孙中山先生說，只求赶快統一，实现共和，小問題不要計較了，而且听说

日本已要派兵干涉，其他国家也要效法日本。南京就回电說，北方总要派代表到南京来談談北京情况，南方才会諒解。那时，王揖唐很想当代表，他自荐，南京不同意。后来袁世凱就派范源濂和我为代表到南京（这大概是梁士詒和唐紹仪商量决定的），叫我們第二天就动身南下。要在南京讲的話，范源濂早已和袁世凱商量拟好。我們到南京，見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陪我們到参議院。范源濂叫我把他拟的几句话念一遍，我就照念一遍。几句话的内容，无非是說袁世凱来不了，我們算是代表袁世凱来说明情况。一篇謊話。我念过以后，全場鼓掌，算是同意了。其实，孙中山先生早就知道袁世凱想做总统。从清帝退位的詔书里也看得出来。这篇詔书据說是赵秉鈞的秘书洪述祖起草的。詔书由世续呈进隆裕，隆裕率宣統退位时就照发了。当时，我也在場。进宫时，有胡維德、赵秉鈞等十来个大臣。袁世凱沒敢去，叫胡維德代。他們进宫时，心里也发慌。袁世凱叫四个軍官姚宝来、刘恩源和我（另一人回忆不起）穿軍装同去接受詔书。

余芷江：蔡元培他們在北京住的招待所，隔壁是一个教堂，就是准备讓他們在“兵变”后逃到那里去的。兵变后，袁世凱要大家开損失帳。大家都不开，只有同去的一个姓曾的开了，說他在兵变中失去一只表，价八百元。袁世凱就給了他八百元。

領事团的态度

余芷江：上海光复前伍廷芳在上海作寓公，武昌起义后，黎元洪聘他为外交总代表。当时他的外交工作很少。沪軍都督府成立后，領事团不承认，也不否认。都督府成立后送照会去，領事团只是收下而已。各国領事接洽公事，都找伍廷芳。都督府后来就聘

伍为外交代表。起先，伍也没有什么工作，后来，革命軍队伍要通过租界，要伍和領事团接洽，伍和領事团接洽后通知陈其美說，軍队只能由南到北或由北到南，橫越南京路，不能由东到西或由西到东，经过南京路。領事团始終沒有和都督府直接办过公事，他們只和伍接头。陈其美总想使軍队能到租界，領事团始終不答应。伍廷芳起先和陈其美处得很好，后来认为陈不懂外交而与陈疏远了。其实，伍廷芳崇洋崇得利害。

傅墨正：第二十三师成立时，司令部在開北南海会館。我的部队先負責守卫制造局，我常要到南海会館司令部去。我每次去都要路过租界。我武装騎馬过租界时，領事团从未干涉，这說明他們当时是很重視革命軍队的。我騎馬经过的地方，外国人的馬車总是让我先走。这虽是小事，但证明領事团的看法与过去不同。我经过南京路时，也从未遭拒絕。

严詞声：这是民元时的情况。

傅墨正：后来完全是袁世凱搞坏的。

余芷江：我认为外国人并不重視当时的革命軍，实在是因为帶枪的人在租界进进出出的很多，都督府的人連去买一把椅子也随身帶枪。外国人防不胜防，怕弄出事来，革命党要到租界上去“搗乱”。而且，华商商团是准許帶枪的。外国人也搞不清誰是商团，誰不是商团。他們始終只重視北方政府。領事的公事上对沪軍都督府的称呼起先总是用“乱党”，后来经伍廷芳交涉，才改用“革命党”，还是不称“沪軍都督府”。南北議和时，沪軍都督府要派軍队保护双方代表，領事团不答应。伍廷芳坐的汽車和办公地点都由英国巡捕保护。开会时，从浙江路到西藏路一帶的南京路断絕交通，由外籍巡捕戒严。

傅墨正：革命初期，人民民气旺盛，国际方面对我们的看法就两样了。

林道源：上海光复后，我每天早上到小东门海防厅去，要经过租界。我穿军装带枪，租界上的巡捕眼开眼闭。只有一次，有一个巡捕对我说：“你把枪放在下面好哦？不要露出来。”尹村夫续弦，迎亲队伍经过租界，队伍里有洋枪队，租界当局也没有干涉。

袁世凯扩充势力

傅墨正：陈其美在被发表为工商部长后，就辞沪军都督之职。南北议和以后，他就辞过好几次。当时，江苏人认为江苏省内不能有两个都督，上海士绅也有这个意见。

俞芷江：陈其美辞职，是因为江苏各地的都督都取消了。

李健青：事实上是袁世凯的意思。

傅墨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地域观念。他是湖州人，不是上海人。

傅墨正：沪军都督府撤销后，上海的民政军政由江苏都督府管。我由第九十团调到江苏都督府做上校参谋，与黄某负责编遣无锡至上海一带的部队，对于那些编余的军官，给以“参谋”、“諮议”、“差遣”等名义，并给以相当的薪给。

袁世凯在上海扩充势力，主要是用钱收买。上海制造局局长陈槐被收买了。驻制造局的第六十一团团长陈其蔚（和陈槐同乡）等也被收买了。应桂馨也是被收买的。其他各方面的人被袁收买的也很多。暗杀宋教仁、陈其美，就是收买了人去干的。

贾粟香：癸丑之役，陈其美第二次攻制造局，商团、商会和地方上的人都不参加。第一次攻制造局，大家不逃难；第二次攻制造

局，大家知道要失敗，紛紛逃難。陳其美一打就失敗。陳其美走了之後，上海還有自治，但一切請示上海鎮守使鄭汝成。

林道源：商團就是鄭汝成奉袁世凱的命令解散的。

傅彙正：癸丑革命失敗，原因很多，當時袁世凱雖派了鄭汝成和臧致平率兵一團及海軍一部到上海監視，但主要原因是南方沒有統一的組織和計劃——你失敗了，我才來，致被袁世凱各個擊破。有些省份和隊伍還被袁世凱收買了。此外國際方面的關係也很大。我帶六十一團攻製造局失敗後，就是被租界當局繳械的。那是癸丑年公曆七月中旬的事。

癸丑革命以前，我因南北業已統一，有志深造，到北京入陸軍大學旁聽，所以对北京方面的情况比較有点了解。我們暑期回南，适遇南京开会討論獨立問題。我认为按照当时我們的力量看来，是毫无希望的。回到上海，孙中山先生召我去談話，我們明知要失敗，但仍決定干。中山先生和上海同志們決定要干，我不能例外，就担任前敵司令。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太沒有計劃了。

辛亥沪宁光复的片断回忆

黄 一 欧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不久，我在东京接到先君克强先生来电，叫我赶来香港。不料到香港时，先君已经乘輪去上海了。我本想即时赶往上海和先君见面的，但因胡汉民坚留暂勿离港，等待广东方面发难，以致未能成行。这时，香港统筹部迭接陈其美自上海来电，請速輸送同志前往协助，于是，指派我和另外七个同志到上海去。記得同去的有洪承点、赵光、赵彥先和一个姓巴的江苏人（此人后在沪軍司令部任軍需处长），其余三人的姓名已記不起来了。

我們坐海船由香港动身，于重阳前后到达上海，在跑馬厅后面馬里士（小弄堂名）机关部見了陈其美。他說先君已经往武汉去了，并告事机迫切，有一触即发之势，叫我們就住在机关部待命。

十一月二日（旧历九月十二），陈其美、李燮和等秘密集議，认为高昌庙江南制造局儲存的械弹很多，且吳淞口外泊有清海軍五艘，将运制造局械弹上济清軍，急攻汉阳，急須夺取制造局，光复上海，并可防止上海武器运往汉口。于是，决定三日午后举事，警察、商团同时发难。这天午后三时，陈其美、李燮和等率領同志分途出发，进攻江南制造局。从馬里士出发时，陈其美叫我和他同坐一辆馬車，随身帶了炸弹、短枪，还帶了一捆旗帜。我們在南市附近下

了馬車，趕到高昌廟製造局。當時製造局四角圍牆上設有炮樓，大門前是一條長巷，門口安置了重機槍。黨人奮勇進攻，守兵用機槍猛烈掃射，不易接近。從午後四點鐘開始，相持約有兩個鐘頭。這時，自治公所總董李平書坐汽車趕來調處。他說英國領事出面擔保，願陪同陳其美到製造局內談判。陳其美答應下來，和李平書一道坐汽車進去了。我們在原地及四周田野嚴陣以待。天黑以後，李平書獨自出來了，說談判破裂，陳其美被扣在局里。我們為了營救陳其美，奪取製造局，決定繼續攻擊。我向附近的巡防營（士兵多湘鄉籍，平日已通聲氣）借到土炮一尊，還來了兩個炮手（一個是湘鄉人，名叫王得勝）。此外，住在法租界黃浦灘附近名利棧的南京陸軍小學下來的兩百多名廣東籍學生，也趕來加入了戰鬥。雖然增加了新的力量，終因守軍火力過強，迄無進展。後來，一部分同志在製造局西邊圍牆下挖開一個洞子，塞滿炸藥。霎時轟然一聲，炸開了一個大缺口。大家奮不顧身地沖進去，分途搜索，徹夜槍聲不息。守軍遭到內外夾攻，無法支持。大約在四日午前四點鐘的光景，全部占領了製造局。

上海光復後，原來由南京陸小來的廣東籍學生無人統率，機關部因我與趙光懂得廣東話，便指定我們率領，開往龍華擔任警戒（槍械彈藥是取自製造局的）。我們這支沒有名義的部隊到達龍華後（駐於龍華寺），立即偵察地形，挖築壕溝，以防敵人偷襲。第二天，忽然得到消息，說由嘉興方面竄來一部分“旗兵”，我們立即作好戰鬥準備。只見遠處黃塵滾滾，一隊騎兵來了。我方首先開槍，對方並不還擊，有人高聲喊叫：“同志們！不要開槍，我們是巡邏隊（屬閩北警察總局，十一月三日下午起義的）。”巡邏隊隊官陳漢欽隨即過來了。原來是誤騎兵為“旗兵”，惹出一場虛驚。記得駐軍於龍

华寺时，陈嘉祐、陈嘉任、陈家立、刘况、刘大辉都先后来会过面，他们是路过上海往武汉去的。

十一月六日，我由龙华进城，先到海防厅都督府看看，不料里面空空如也，象座冷庙。惊诧之余，问明情况，才知道前两天推举出来的都督李燮和，因为人地生疏，一筹莫展，早已躲到租界上去了，而陈其美也没有过问。一个新成立起来的都督府，竟陷于瘫痪状态。当天晚上，一部分同志在一品香开会，改推陈其美为都督。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洪承点、赵光、赵彦先以及京剧演员潘月樵等都在场。陈其美本人却不在场。

陈其美出任都督后，洪承点即着手组织沪军。这支部队是以南京陆小来沪的粤籍学生、原第九镇一部分官兵、参加起义的警察、商团和巡防营士兵组成的。都督府委派洪承点和我担任沪军正、副司令。沪军成立时有两千余人，装备齐全，不久就开往苏州阊门外驻扎，加紧训练。当部队由北火车站乘车出发时，上海各机关、团体、学校及工商界代表齐集车站欢送，群众狂热欢呼，鞭炮声震耳欲聋。许多人争着把一串串的鞭炮吊在竹竿上，再把竹竿绑到火车头上。各界送的罐头、食品、香烟、毛巾等慰劳品，堆积如山，应有尽有。车到苏州时，程德全都督率领各界代表在车站迎接，并有苏军列队欢迎。

沪军开往苏州，正是汉阳战局紧张的时候，先君多次电促陈其美速即进取南京，策应汉阳。陈其美叫我和刘步青（湘阴人，日本士官毕业生，一九一二年继洪承点任第七师师长）先到第九镇徐绍楨处了解情况。我们由上海坐一个火车头（只挂一个车厢）开往南京，在尧化门第九镇司令部见了徐绍楨。他介绍了敌情，并谈到部队打了很久，弹药缺乏，亟待补充，希望上海方面予以接济。和

徐紹楨見面之后，我們馬上趕回上海，報告陳其美。他認為南京城內清軍實力雄厚，單靠滬軍和徐部難以攻下，必須聯合江浙各地民軍一致行動。於是，又叫我們先往杭州和朱瑞聯繫。我們仍是坐火車頭出發的。在杭州見到朱瑞，面達先君和陳其美問候之意（杭州光復前，陳其美曾親往策劃，並接濟械彈及經費），力陳組織聯軍會攻南京的重要意義。朱瑞表示贊同，並即作好行軍準備。我們馬上通過火車站上的電話報告陳其美。隨後，又到蘇州見了程德全、劉之濬，到鎮江見了林述慶，最後見了徐紹楨。他們都贊成組織聯軍，並認為越快越好。不久，朱瑞統率的浙軍首先開到鎮江，其他各軍也陸續到達。在陳其美的提議下，公推徐紹楨為江浙聯軍總司令，指揮各路民軍。並在上海成立總兵站，擔任聯軍的後勤工作。總兵站設在閘北巡警總局內，總監為李厚祐，副監陶遜。

十一月二十二日（十月初二）起，聯軍開始向南京進攻，二十三日逼近南京近郊。兵力部署如下：戰鬥力較強的浙軍^①進攻太平門至南門之綫；第九鎮擔任南門至通濟門之綫；滬軍擔任神策門至天保城之綫；鎮軍在滬軍右翼至江邊；吳淞軍在鎮軍右側沿江一帶；蘇軍為總預備隊。當時滬軍司令部有兩個日本顧問：一個是本庄繁少佐（就是“九一八”事變後侵略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大將），另一個是上野炮兵大尉。他們是由日本駐上海領事館介紹來的，因為我懂日語，大部分時間都和我在一起，有關作戰的意見也是向我提出的。此外，還有一個日本記者隨軍採訪。

二十四日晨，聯軍進薄烏龍山，很快地占領了烏龍山炮台，清

① 有常備新軍兩標，馬隊一隊，炮隊一營，以及工程營、輜重營、敢死隊等，人數在五千人左右。

軍退守幕府山。当夜乘胜进逼，第二天拂晓占领了幕府山炮台。我軍占领幕府山炮台以后，馬上調轉炮位，朝下关城内獅子山打。打了几炮之后，獅子山炮台的清軍炮兵用旗語要求停止炮战，于是，双方都停止了。就在这时候，吳淞炮台的一尊要塞炮也由沪宁铁路运到南京，架在尧化門附近。我去看过，这尊巨炮还是乾隆年間向外国定制的，带来的炮弹只有十余发，真是慰情聊胜于无。

我在日本大森体育学校学过击劍，回国之前，一位日本朋友（宮崎寅藏的妻舅前田九二四郎）送給我一把古刀，这次进攻南京，将它帶在身边，很想及鋒而試。有一天，我在联軍总部，看到押着四个敌探将要处决。我拖出一个敌探举刀一砍，立即身首异处。刚刚用綢巾揩干刀上的血迹，潘月樵接过刀去砍另一个。他双手握刀，用力猛砍，敌探砍死了，自己也跌倒在地上了。潘由上海随軍出发，記得是担任参謀之类的职务。

南京太平門外紫金山西峰的天保城，是太平天国保卫南京时的重要堡垒，居高临下，形势险要。张勋派精兵凭险坚守，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浙、沪两軍。十一月二十九日，联軍第一次总攻，沒有进展。三十日至十二月一日，发动第二次攻击，激战一昼夜，完全占领了天保城炮台。八尊过山炮（六尊对准朝阳門浙軍障地，两尊对准神策門沪軍障地）只有两尊被清軍卸下了炮門，其余六尊都沒有来得及卸下。不仅如此，連帳篷也未收起，里面丢下許多行李以及大堆的中文和日文的軍事书籍。这是我亲眼看到的，由此可以想見清軍仓皇潰退的程度。由于天保城的夺得，整个战局发生了急轉直下的变化，南京郊外很快就沒有清軍的踪迹了。

我軍自十二月一日拂晓占领天保城起集中轰击城内的重要軍事目标，掩护地面部队进攻。十二月二日（十月十二）晨，南京城内

清軍見大勢已去，懸白旗投降。鎮軍林述庆部由儀鳳門首先入城。沪軍由神策門入城時，我和洪承點騎馬領先，清軍降將巡防統領趙會鵬、米振標率領所屬官兵在城門外列隊相迎，執禮甚恭。事後，這兩個人把他們的四匹坐馬也送給我了。

南京光復後，本庄繁愆懇我單另成立一個師，並說日本方面可以接濟軍需物資和經費。我沒有理會他這個不懷好意的建議。臨時政府成立之後，徐紹楨自動地撤銷江浙聯軍總部，所部交由陸軍部直接管轄。中山先生曾任命他為南京衛戍總督。以後，臨時政府北遷，衛戍部併入南京留守府。援寧沪軍改編為陸軍第七師，由洪承點任師長。我因行軍日久，染上寒熱病，戰事結束不久，就離開部隊到上海就醫，不再過問軍隊的事了。

攻占上海制造局亲历記

王子騫

辛亥广州之役失敗，我仍回到日本东京，因情緒激动异常，讀書深造之念全消。这时党内为广州发难所购物品，尚有部分未运的手枪、磺药、雷管、电线等物，分藏在各党员手中，党命我收集密运上海，并預約陈其美按指定的船只日期到碼頭接取。八月（指阴历，下同）下旬动身，余健（四川荣昌县人）、胡光蜀（四川西昌县人）两党员同行。行前往会日本民党宫崎寅藏和萱野长知，探武昌起义情形（武昌已于八月十九日发动）。他們說，正有日本大佐級軍人两位前往武汉观战，为我作了介紹，并以途間安全相托。当船进入上海黃浦江，我怦然心动，暗忖万一其美不来接，我当如何逃避海关的检查。及船抵岸，見其美立岸上，心頓坦然。但又想，素以机智灵敏、神通广大著称的陈其美，他将如何逃避检查呢，倒要留心留心，长长经验。其美上船，与我略一招呼，即指揮来人把大小行李从船尾吊下，又引着我和余、胡两人到船底火艙，開門下舢板。他对船上人說些什么我一点听不懂，只見他指揮舢板，未經過海关检查处，徑向华界方面开，抵一小汊港，有馬車一辆停在岸側。他又指揮把行李取放車上，平安无事地到了跑馬厅側馬霍路一所住宅，把我一人留下住了。这是其美私宅，樓下一排房作了招待来往党人之用，洪承点、巴澤宪、陈方度（湖南宝庆人）、李燮和（湖南安化

人，后来变节为筹安会发起人之一）已住在內。这时袁世凱已被清廷起用，派段祺瑞率兵南下，夺回了汉口，党軍岌岌可危。聚集上海的各省党人，在其美的团結下，都在日夕筹画策应武昌办法，认为非赶快占取上海制造局，以其軍械資助党軍，不能挽救頹势，于是决定九月十三日在上海发难。某日，其美向我說：“晚上要和滿清官員开談判，敢不敢去？”我答云：“老兄敢去的地方我总敢去。”黄昏时，其美归，約承点和我到了南市，下車一看，是上海警察厅，这是党人向有戒心的所在。入內，在一大房間坐下，已有七八人先坐在內与其美打招呼。移时，厅长出来，身体魁梧，操北方口音（是否姓徐，現在記不清楚），說話頗爽快。他說：“武昌已起义，我是汉人，革滿洲的命，我有什么不贊成。但是，上海是华洋杂处的地方，动輒惹起外交，你們革命党我相信得过，只是发动时，帮会匪类难免不乘机搶劫，杀人放火，維持治安一事，又是我的职责所在。”他的話是一放一收，神态是又贊成又为难。登时其美站起，以手按桌上，望着那个厅长說：“我們就是为着华洋杂处，动惹外交，希望彼此少流点血，才来和你开談判。你纵有为难处，我們要干的总是要干。”他現出一种勇敢坚决气概，威胁着对方。其美話刚完，对面有一个紳士状的人在发言，我暗問承点是誰，承点答是李平书。这人說：“厅长知道嗎，已有好几千革命党到上海，他們的炸弹那样厉害，上海真会糜烂，还是和平想办法的好。”那厅长听完話，即說：“就这样子吧，你們事前活动，我可装着不管；发动时，我的警察决不参加战斗，只負維持治安責任。”所謂双方談判，就此結束。这一談判当然是我方胜利，警察的力量，讲打是无力的，但在党人未集合前，还是有力可以阻碍党人的活动，甚至逮捕党人；有了这次談判，党人就可毫无顾虑地携带手枪，在华洋交界地大胆进出了，对进行革命，

便利不小。

我帶回的東西有限，此外究有好多人和槍支，我們外來的人不明了，也沒作過地形偵察，全局的部署都在其美心中。他整天忙，對我們也只說個大概。到了九月十三日上午九時左右，有人引着我們到斜橋上海總商會，廣場旗杆上升起的清朝龍旗當空飄揚；一隊一隊商團開來，洋裝革履，械彈精良，步伐整齊。隊伍排列好後，即有人登台演說，宣布獨立，扯下了清朝龍旗，升起了同盟會制定的青天白日旗（民國成立後的海軍旗樣式）。一時歡聲雷動，經久不息。商團分道出發，負責維持街市治安。革命黨人三三五五地奔向西園集合，發長槍、手槍、炸彈等物，臨時司令是高知白（浙江人）。黨人身先群眾，隊伍整頓畢，即向上海製造局前進。路上崗警看熱鬧似地望着我們跑過。四川同志余健、胡光蜀、尹赤俠亦繼至。製造局前門一帶，手拿着明火槍、四瓣火槍、獵槍、羊角叉、大關刀、長矛等各色各樣的武器，成千上萬的人，從各條道路、各條小巷蜂擁而來，對製造局形成了一個包圍形勢。當時製造局的大門站着幾個衛兵，看不出有什麼驚慌樣子。站在前面的黨人中有人說，我們先禮後兵，向衛兵交涉。衛兵表示：“我們倒下照，當心裏面的軍隊。”大家聽到這一句話，便如潮水一般，衝進了大門，經過約二丈余的通道，見一長方形大壩，其後列一洋式樓房。我們在壩內散開，即發槍並拋出炸彈向洋樓攻擊。洋樓發出一排一排的槍向下打來，我們伏在地下，每向前衝一次，樓上的回擊也緊一次。炸彈（香煙筒作外殼的）的力量有限，我們衝不進去，但敵方雖是俯瞰射擊，也竟沒有打死我方的人，這是因為裏面的軍隊有同情革命的，因而向空發射之故。這樣相待了許久，僅有高知白司令腰受微傷，離隊而去，便由其美擔任臨時司令。在衝擊時，圍着製造局的廣大群眾，挺着

各色軍器，發喊助威，震天動地，聲勢實足懾伏敵人。相持至五時左右，我們退回大門外時，局內出來一洋員招手說：“派代表入局交涉。”眾推其美往，其美進去後鐵門隨着关了。薄暮，李平書（他是製造局會辦）乘馬車自內出，眾人把他擋住問消息，他說其美已被捆綁，蘇州有無軍隊開來不可知，勸我們快散，說完就催促馬車飛馳而去。這時，我們外來的人真想不到辦法，只得陸陸續續回到其美家中。大家正在冥思苦索想辦法之際，突然聽到一聲槍響，大家吃了一驚，立刻掏出手槍應變。隨即聽外面有人說着：“是我走了火”，出去一看是李燮和。大家狠狠地責備他一頓，並問他說：“護廠營的湖南軍隊，你夸口已運動好，何以今天還未開來？”他着了急，說：“我馬上就去效申包胥秦庭之哭”，並約好次早在製造局晤面。翌日，不待天亮，我們奔向製造局，持械圍局的民眾似較昨日更多，火把還未盡熄。不一會，有人跑來說，炮兵營運動好了，跟着燮和也跑來了。他說炮隊就要開來，這話登時傳開，大家沸騰起來了。炮隊炮車果然開到，一面忙着架炮實彈，一面就有人越牆進去，把局側的職工學校放起火來。僅僅向洋樓打了几炮，里面毫無聲息，霎時一支白旗出現，鐵門敞開，內有工人大聲喊：“總辦從後面（黃浦江）逃走了，趕快進來。”大家洶涌沖了進去，一面尋出被綁的其美，護送回家，一面推燮和充臨時司令，主持一切。這時情形混亂，軍械庫已被群眾打開，自由携取槍支。我和承點異常着急，認為如此舉動，于革命無益，容易召亂，請燮和下令禁止。但他不知命令如何下法，承點即在他的大紅名片上為他寫了命令，偕同志數人到庫前對正在取槍的群眾傳達命令，宣傳革命意義，並告以馬上成立軍隊，已經取槍的人早來登記，沒有槍的投效後一律按照才能授職。群眾真是擁護革命，馬上停止取槍，讓我們把庫門鎖了。當

天約散失二三千支槍，其他庫房仍是儲滿武器，真令人高興。

這時蘇州尚未獨立，我們為了保卫新占領下的製造局，由黨人編組巡察隊，日夜巡察，以防意外。像這樣的工作整整搞了三天三夜，到九月十五日江蘇巡撫程德全宣布獨立，我們才鬆了一口氣。十六日（陰曆十一月六日），上海軍政府成立，舉其美為都督。承點、澤亮、趙某（趙聲之弟）和我皆認為如不盡快編組軍隊，打下鎮江、南京，還是不能解武漢之急。往商其美，得其同意，別組滬軍先鋒軍，任承點為總司令。變和原屬光復會，自以是役功多，不得選都督，遂自成一系，率軍占取吳淞，任吳淞都督。越數日，軍政府派第三科長張群來局接收武器。我們護廠之責已完成，就移住西園，成立總司令部，開始募兵。承點舊隸熊成基部，一同起義，軍界源源來助者日眾，第八鎮新軍退伍不久，以傾向革命，紛紛投效，兵源得以無缺；至於武器配備和一切軍用品的購置，有軍政府的大力支持，亦易辦到。為日不久，就組成了一支強有力的軍隊，鎮江、南京之攻取，出力甚多。

事隔五十年，所能回憶的僅此，不夠詳細，當年參加此役的同志認為有錯誤時，切盼予以糾正。

光复軍攻克上海江南制造局 及陈其美篡取沪軍都督之真相

楊鎮毅遺稿

辛亥秋，光复会上海总干事李燮和(号柱中，湖南人)与中部同盟会主持人陈其美协商，定于九月初二分路进攻江南制造局。又因上海新軍都是湖南人，两会为了便于策反新軍，推定李燮和主持起义，并約定起义成功后，由李出任沪軍都督。自辛亥四月到八月，起义准备工作一切都已做好，駐沪新軍亦已运动成熟，起义日期亦已决定。我接連接到上海同志們六七封电报及快信，于八月二十七日离开临海，自椒江趁輪船赴上海。到达上海是九月初一拂晓，距离預定的起义日期还有一天，可是輪船刚到十六鋪碼頭，就看見許多伤兵，有的坐在黃包車上，有的躺在担架上，不断地运送过去。我很奇怪，起义日期还没有到，为什么就有战事呢？上岸一問，說是陈其美的敗兵，我更觉奇怪，新軍都已联络好，难道又发生变卦？立即赶到銳进学社，其他同志都不在，尹銳志、尹維俊姊妹神色很紧张。她們告訴我說：“陈其美敗下来了。我們(指光复軍)刚刚接上去。”

我刚到上海，情况还不了解，就暫在銳进学社等待消息。大約到了上午十二时光景，捷报就传来了。我急忙到制造局，制造局已經豎起光复軍的旗帜，同志們臂纏白布，起义的新軍亦都臂纏白

布，来来往往，制造局已经被我們拿下来了。我和同志們互相执手道賀，同志們也告訴我关于这次战斗的情况。据李燮和告訴我，经过是这样的：我們以为陈其美是自己人，就将联系新軍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訴他。誰知他別有心腸，滿以为时机已经成熟，制造局可以不攻自下，所以他事先不和我們联系，就在八月三十的深夜，即九月初一的一二点钟时候，冒冒失失带了几十个人，除少数是同盟會員之外，大多数是上海流氓，还有几个是“小連生”（潘月樵）戏班的演員，闖进制造局，企图搶夺头功。可是他們不懂得我們和新軍联络好的口号，一闖进去，就被打垮，陈其美被擒。李燮和聞訊之下，觉得不能坐視不救，就急速动員全体同志和一部分起义的新軍，組成光复軍全力赴援。光复軍一到，一部分新軍即起而內应。经过数小时的激烈搏斗，制造局官兵全部投降，清朝的苏松太兵备道也已经逃跑。光复軍就这样光复了上海。同志們进攻制造局，是为了光复上海，同时也是为了救出陈其美，可是攻下制造局之后，到处都找不到他。后来据起义人員报告，才在厕所旁边的一个儲藏钢铁的小房間里发现，只見他手足带着镣铐，坐在一张条凳上，头紧紧靠着板壁，默然不动。一看，原来他的髮辮从新窗的壁孔拉出房外，房外梁上挂着一个铁钩，髮辮就紧紧縛在上面，所以他一动也不能动。同志們給他打开镣铐，放下髮辮，他已经手足麻木，不能走路。李燮和传令扶着他走几步舒舒筋骨，然后叫他回去休息。

这时制造局的办公室挤滿了人，有領枪支彈药的，有領粮餉的，有刻字的。起义前沒有准备关防，这时临时雇刻字鋪的人来赶制“光复軍北伐总司令”的关防。

李燮和因为筹备起义，寢食俱废者旬余，又加仓卒动員，进行

激烈战斗之后，体力不能支持，就将新刻“光复軍北伐总司令关防”連他自己的私章統統交代，要我便宜行事，他就回到銳进学社休息去了。

此刻我以参謀长身份代行总司令职权，一切外行，一切生疏，驟然当此繁剧，实有不胜应付之感。因为李燮和不是軍人出身，我也是个书生，本来不懂得軍事，在起义前，策划部署，还觉得头头是道，可是起义成功之后，反而忙忙乱乱，不知所措了。在忙乱之中，我們在制造局內所設的临时办公地点，門禁是松弛的，同志們和起义新軍各不相识，也沒有規定的符号可資识别，只凭臂纏白布，就可自由进出。記得当天傍晚，闖进来一个臂纏白布的日本浪人（名字記不起）。我們盘問他要做什么，他說：“向总司令献宝剑，表示对貴国革命成功的祝賀。”我們回說总司令不在，他就揚长而去，以后再也沒有来过。这个日本浪人可能是来探探虚实，看看情况的。

攻下制造局，上海就告光复了，当天夜里，我想起要用“沪軍都督”名义布告安民的时候，可是心思不定，怎么也写不出来，換了三次稿，看看措辞总不大妥当。当夜我就沒有睡，躺在床上海想着想着，打算天一明，再动手拟稿。可是第二天一早，同志們报告說，陈其美已经自称“沪軍都督”，到处张贴布告了。

这时李燮和已经回到制造局。有人主张由李燮和出面，变更布告。有人主张逮捕陈其美，治以违令起事篡窃名义之罪，一时引起軒然大波。李燮和考虑再三，以为武昌起义不久，上海刚刚光复，全国形势还没有稳定，如果兄弟鬩墙，不但引人耻笑，而且要貽誤革命全局，因而坚决主张退让。但是光复軍所部多不願隶属“冒牌都督”陈其美之下，吳淞炮台官兵（原系新軍）主张尤其激烈。李燮和乃于九月中旬（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初）率領所部到吳淞去，在

中国公学內設立“光复軍总司令部”，改用“中华民国光复軍总司令”关防，李燮和任总司令，我任总司令部參謀长兼顧問长，黃汉湘、陈强、邹序彬、周德厚等，都是总司令部主要職員。总司令部官兵刻苦自勵，每月一律領津貼六元，虽然生活艰苦，革命意志仍然极其昂揚。不过同志們出生入死，光复上海，而“沪軍都督”名义被人篡窃，大家心里总觉得快快不平。光复会所以不与之較者，不忍因小忿而乱大謀故也。有人謂李燮和与陈其美爭功者，烏知当时之真相，爭字根本安不上。陈其美冒功可以惑当时，不能惑后世也。此段史实在国民党統治之下，是非顛倒，真相湮沒了几十年，特表而出之，以存史实。

(楊叔威整理)

李燮和沪宁革命之經過

余 煥 东

一九一一年春間，予由辽宁本溪湖煤矿公司辞职到北京。不久，武昌起义。予乘輪赶至上海，甫抵岸，見上海市面均懸白旗，宣布独立，时在阴历九月十三日。嗣至上海城內都督府，見布告上署名都督李燮和。予因与李燮和俱系湖南安化人，會同在长沙求实书院求学，乃前往会晤，被門卫阻擋不得見。三日后，聞李已往吳淞，予赶至吳淞复旦大学，乃得相見。李遂留予在該处共策进行。

李燮和初系光复会會員，后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归国后，在长江及南洋一带奔走革命，不遺余力。一九一一年来上海，在某学校借教学为名，阴与各革命志士及其学生筹划革命事业。原与宋教仁所办之民立报館訪事員陈其美(同盟会會員，亦是上海会党头目)相結合，計劃在某日发动革命，不意陈其美先期率领多人，攻打江南制造局，被該局卫队拿获，捆绑于局內。李燮和聞訊，一面督率各革命青年攻占上海县署，建立上海都督府，李被推为上海都督；一面率各革命青年围攻制造局，不得手，乃踰牆而入，救出陈其美。是晚，上海会党多人，邀集群众，在某大戏院开会。当有某伶人携手枪登台演說，称：“現在上海光复，都督一席非陈英士(陈其美之別号)先生担任不可，請列位举手推戴，如有反对者，請尝吾彈。”說毕，将手枪在桌上一拍。与会群众皆举手，陈其美遂取得上

海都督地位。群众遂拥陈其美至都督府，李燮和当然让位。当时有議推李燮和为副都督或为沪軍总指揮者，皆无多人贊同。于是有一部分青年拥李燮和至吳淞，設立軍政分府。該处原有黃汉湘(湖南湘乡人)在吳淞当警察局长，与李燮和有旧，亦表示支持，并帮同李燮和招收黎天才所带之清軍約三千人(前清政府由广东調来駐防者)，改編为光复軍，命其率队进攻南京。

当李燮和初至吳淞設立軍政分府时，陈其美及其党羽甚为嫉忌。某日，予与李在吳淞車站乘車往上海，忽有人从車窗外放枪，射李未中，其随身卫兵中弹死。随后，陈其美又派会党头目某，携带手枪至軍政分府与李燮和談判，勒令李取消軍政分府。李只得服从，改为光复軍司令部，但要求陈分拨原占领制造局之枪械子弹，另练新軍，以便进攻南京。陈允之。旋由上海制造局領来步枪二千支及子弹若干，由李燮和交其浙江友人张鵬，招集士兵千余人(多系上海无业游民)，另由江劍女士招集女子軍約三四百人，均临时訓練成軍。是时有予之旧友陈强、邹天山等数人来吳淞参观，予因他們均系軍官学校毕业，熟习軍事，遂向李燮和推荐，任陈强为參謀长，邹天山及同盟会同志周来苏、张斗樞等与予均为參謀。并由黃汉湘在淞沪募集餉糈，共謀进攻南京策略。后陈强离吳淞，改任邹天山为參謀长。布置妥当，即行运兵起程。甫至鎮江，聞铁良、张勋已由南京逃往江北。于是李燮和率領軍队赶入南京城內，其本部及女子队駐在四象桥刘忠壮祠(即往日之湘軍公所)，參謀部駐在鼓楼北前博覽会会场，其余軍队則由张鵬率領散居附近。

当张勋逃往江北时，所部湖南籍兵士不願随往，遂留在南京城內。予与李燮和商酌，发出布告，称湘軍公所招集湘軍，并派李炯(宝庆人)負責其事。于是张勋遺留在南京之湖南兵士以及苏浙革

命軍中之湖南兵士皆携枪前来投到，不到一星期，投到者已达二千人，遂派李炯帶領。是时，李燮和之兄弟李云龙、李海等由湖南赶来南京。李燮和想将此项軍隊轉交其弟李云龙帶領，李炯未允。某日，张鵬帶領之軍隊有少数人在下关搶劫，參謀張贊前往劝阻，不听，反而回头攻击參謀部。張贊被击毙，參謀长邹天山臀部受伤，张鵬亦不能制止。黎天才聞訊，派兵鎮压，枪杀兵士一名，其风乃息。此时，予見其队伍太无紀律，乃迁居于宋教仁之寓所，李燮和軍隊之事不复过問矣。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黃兴任陸軍部长，李燮和向其索軍餉。黃兴給与三十万元之軍用票，因无現金可兌，乃将李炯帶領之軍隊二千名交由胡瑛率領，往青島去做山东都督（系孙大总统所任命者），张鵬帶領之軍隊約二千名則交与黎天才訓練統率；女子軍任其自行解散。事后，李退居上海，嗣由袁世凱任为长江水师总司令。长江水师將領不甚服从命令，不久李即辞职赴北京。

李燮和至北京后，在京的一班湖南投机政客如楊樹谷、方表等多人，企图利用李燮和带来之三十万元軍用票，乃帮同李向財政部长熊希齡交涉，索兌現金。于是湖南各投机政客遂以此为本錢，大肆活动。后来李燮和与楊度、胡瑛等共六人（称为六君子），发起筹安会，謀改國体，拥袁称帝，与此不为无关也。

略談上海光復之役

郭 漢 章

辛亥革命以前，愛國志士凡在內地不能立足者，多逃亡上海。我等潛伏在上海關北巡警局中者，即有十三人之多，皆改變本名，一律以“漢”字排行，稱為十三太保。陳漢欽，湖南人，足智多謀，我們公推他為十三人的代表。其餘十二人，連我在內，都是安徽人，其中姚漢福、姚漢民、姚漢成是我的表弟，楊漢山、楊漢杰、楊漢霖是我的師弟，馬漢云、樂漢亭、張漢富、衛漢雄、吳漢玉是我的朋友，都是由我因親及親、因友及友，從鄉間帶出來的。前此，我在江西常備中軍王芝祥部任職，原名步青，以後輾轉到了蘇州，加入新軍充任步兵一標三營後隊三排排長，因參加同盟會被上級發現，逃往上海，改名“漢章”，投入關北巡警總局，任騎巡隊隊官。時陳漢欽任巡警總局警備隊長。我們十三太保中，有二人編入陳漢欽的警備隊，有九人編入我的騎巡隊。每屆夜晚，我們即往局後田野間開會，密議革命活動。巡警局總辦姚捷，因過去曾在廣西兩廣提督汪瑞闡部下同事甚久，以為我和陳漢欽都是他的親信，絲毫不懷疑我們暗中有何革命活動。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失敗消息傳來後，滬地黨人陳其美、李平書等在永安公司大東旅館召集緊急會議，群情憤激，咸欲舉義。部分同志則持慎重態度，認為條件尚未

成熟，不宜轻易发难，主张暂时忍耐，庶免影响全局。此議获一致通过，遂继续从事准备工作，加强与各方之联系，如积极联系爱国志士較多之南市商团和閘北巡警，以及帮会乃至艺人夏月潤、刘福彪等，促其参加革命。当时計議，靜待时机到来，以獅子搏兔之力，冀求一举而成。

二

八月十九日(阴历)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后，我們上海全体同志极为振奋，认为机不可失，皆跃跃欲試。同时閘北巡警局总办姚捷聞訊，甚为震惊，亦加强防范。他对于本局警士亦很注意，平日发出的子弹，除每枪限留五粒外，多者悉令上繳，运存緝私营所属海豹兵舰，以防不测。但姚仍視我等为其亲信，并扩充陈汉欽警备队为营，升陈为警备营管带，特为护卫。此举无异是为革命增强了实力。于是党人秘密集会，公推陈其美主持起义，并以閘北巡警为主力。派陈汉欽为总指揮，編組全体警备軍为四队，我首先自請为敢死队队长，馬汉云为先鋒队队长，楊汉霖为偵察队队长，楊汉山为預备队队长。密定阴历九月十三日下午二时在閘北起义，宣布独立，并定于是日晚六时由苏州河航行至沪南，进攻江南制造局和西炮台。陈汉欽率領警备营进攻制造局正面，商团围攻制造局后面，艺人夏月潤、王钟声和刘福彪随同参加，担任越墙纵火的任务。我和楊汉霖率队进攻西炮台。起义計划决定后，各人即分头准备次日的行动。

三

九月十三日下午二时，我們即照預定計划开始行动。总指揮

陈汉欽率領警备队鳴枪为号，发起攻击。我和馬汉云、楊汉霖、楊汉山四个队长即各領所属部队，聞声鼓噪而出，一面抛擲土法自制的炸弹，一面放火焚毀姚捷住宅。姚捷全家出走。陈汉欽即宣布閘北独立。当时有主张杀掉姚捷全家者，我以姚待我不薄，建議放他一条生路。商团总司令朱少沂、总教练沈鵬同时在南市发动，会师进攻，很快地就把全市机关占領，时为下午六时。我和总指揮陈汉欽及所有部队即在太阳庙集合，地方商民已組成慰劳队，携带面包、馒头、茶水、水果等赶到犒劳。各队飽餐后，齐向江南制造局和西炮台两軍事重要目标出发。

四

夜八时，陈汉欽率領所部，配合商团，向制造局发起围攻。我和楊汉霖率領所部，配合商团，围攻西炮台。战至夜十一时，忽聞同往进攻制造局的陈其美被俘，但士气并未受挫，而是更加同仇敌愾，奋勇百倍。战至夜十二时，西炮台已被我方完全占領，旋即合力围攻制造局。时艺人夏月潤、王钟声、刘福彪等已越墙进入制造局，四处纵火。制造局总办张士珩、管带苏文斌見四面火光燭天，无法可守，始各逃去。天未拂晓，已完成攻占任务。寻至馬号，迎出陈其美。十四日天明，浙沪要塞司令姜国梁、游击龔光輝、参将許宏一齐投降。至此，上海全境光复。

五

上海全市光复的当天，各界人士公推陈其美为沪軍都督。十五日正式組成沪軍都督府，并公推伍廷芳长外交，黃郛为参謀长，姚际为副官长，李平书为民政厅长，沈鵬为财政厅长，王一亭为財

政厅副厅长，蔡寅为执法处长，高一謀为人事科长，应夔丞为牒报科长，黄岳淵为調查科长，陈汉欽为独立旅旅长，我为卫士队兼偵緝队队长。都督府設在小东門海防厅。卫士队駐扎上海道署，担任保护都督府之責。南京光复后，陈都督两度赴南京开会，我均率領卫士随往。

六

約在阴历冬月某日上午，江浙联軍总司令徐紹楨和代理十七协协統沈同午同来拜会都督陈其美，密談甚久。是日下午三时許，又有鎮軍林述庆部參謀长陶駿葆穿着新狐坎皮袍，乘坐馬車来拜会陈都督，副官請他在客厅坐候。这时执法处奉陈都督命，草拟陶的罪状，宣布陶在九鎮进攻雨花台时，中途截留由沪运往械弹，以致九鎮遭受极大牺牲，应处以死刑，并当场在沪軍都督府大堂执行枪决，由我負責执行，連打了十三枪，陶才毕命。同时我又奉命率領便衣卫士前往跑馬厅三泰旅館二十一号房間，捉拿林述庆。迨我到达，林已远颺。我一面遵照命令指派卫士前往沪宁車站和各輪船碼頭分头緝捕，一面回府报告。事后聞知，系由于陶駿葆的馬車伙看到陶被枪决，奔回旅社报告，林即他遁。

上海光复时的巡防营和吳淞炮台

周南陔

一九一一年，我年十九岁，以二品廕生，又经屡次保举，得以道府分省，在上宝会文洋商租地局任委员，管理财务。由于职务关系，与各国领事馆、工部局、公董局、会审公廨的一些高级职员都有交际往来。我当时已参加了同盟会，组织上交给我的秘密任务是在外交方面进行工作。

那时，英租界望平街口、九江路与汉口路之间有一“公余总会”，它是“高等华人”所办的最老总会之一。会员不满百人，一般都是官僚、买办。美其名曰“接洽要公”，实际是大家聚在一起赌博叫局，大吃大喝，甚至贪赃纳贿，借此运动门路。我看中这个总会，做了该会会员，以便从中展开联络活动。

上海华洋杂处，地当冲要，清朝政府在这里驻了五个巡防营，以三个营驻在高昌庙、南市、闸北和浦东，两个营驻在吳淞和狮子林。巡防营是由绿营改编的，每营有二百余人，五个营合计约一千二百余人。所用的武器是后膛枪，子弹配备相当充足。在当时看来，这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反动武装。

巡防营统领兼吳淞炮台总台官姜国梁（号文舟，贵州人，湖北武备学堂出身）与我是同乡，其父曾任福建鎮台，与我祖父（福建藩台）同寅，论起来，我们又是世交。同时，江南第九鎮統制徐紹楨曾

以候补道在福建办过督练公所，与我祖父頗有交情，姜是由徐提拔才做巡防营統領的，常在姜的面前夸奖我。因此姜对我另眼看待。姜秉性懦弱，优柔寡断，我不大瞧得起他，而組織上又没有要我联络軍人，我也不便有所活动。

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上海。望平街报館林立，率先报道起义新聞的是《民立报》(同盟会的机关报)，继之而起的是《申报》、《新聞报》和《时报》。公余总会原是官僚、买办聚集之所，在那里有官場的消息，私人的电訊，以及武汉来往旅客的种种見聞，不但消息灵通，而且比較真实。我经常出入于公余总会，探听消息，向組織上反映，成为我的首要任务。

有一天中午，忽然接到組織上的电话，要我立刻就去，有要事相商。我匆匆赶到馬霍路(即今黃陂路)进益里某号楼上(同盟会的秘密接头处)，有陈其美、姚勇忱和其他两人在座。陈其美郑重其事地对我說，大意是：姜統領已与光复会秘密接头，准备首先反正，响应武汉；这事当然很好，不过光复会的联络是靠不住的，他知道我与姜統領是世交，要我設法把姜拉到同盟会这边来。他又說，姜已得了光复会一笔錢，这不要紧，同盟会还可出更多的运动費。我回答說，我从未过問运动軍队的事，既然如此，让我相机进行。陈說，事机紧迫，必須在两三天內有切实回信，并要我注意三点：(一)事关秘密，不可稍露风声，使姜知道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关系；(二)要姜完全接受同盟会的調度指揮；(三)姜仍与光复会保持联络。接着陈又告訴我，有巡防营會計官王幼垣^①，湖北人，系同盟会會員，已由其負責运动巡防营的下級官兵，要我与王随时接头。姚勇

^① 王幼垣已年逾八十，过去在正泰橡胶厂工作，現已退休居住上海。

忱从中插話說，运动新軍是从下而上，巡防营是老軍隊，服从性极大，因此要自上而下。我答应在一两天內回信，即告辞而出。行至房門口，陈其美附耳对我說，你不要胆小，如果姜不听话，到了紧急关头，我們可以“做了他”。我想这是可能的，因为当时革命党很着重暗杀。

当晚，我即与姜密談。姜表示对革命毫无成見，不过要看南京的情形怎样，他不能先动。我便单刀直入地說：“听说老伯（我平日称姜为老伯）已与革命党秘密联络，准备首先反正，响应武汉。”姜聞言一怔，默不作声。我接着說：“請老伯放心，我同革命党也有往来，如实言相告，我还可以帮忙。”姜臉露微笑，拍拍我的肩膀說：“我早就疑心你是有把戏的。”他說他曾由一姓譚的广东人介紹，和黃汉湘接过头，黃是湖南人，据說是黃兴的亲信，而且是同宗，上海的革命由黃汉湘和李燮和負責，接头的地点在白克路（即今凤阳路）永年里。他又說，至于首先反正之說，决无其事，还是要看看南京和苏州如何，再作决定。

王幼垣是姜的連襟，在巡防营任軍需官，兼吳淞炮台軍需官，我因为姜的关系早与其相识，但不知道他是同盟会會員。我訪王密談，王表示很好，他把巡防营和吳淞炮台的实力向我作了詳細介紹，彼此相約分工合作，一致进行。王說，姜胆小多疑，因此一直没有向姜暴露他是同盟会會員。据王估計，如对姜以威力相要挟，使其帖然就范是不成問題的。

第二天晚上，我将接洽经过回报进益里。陈其美不在那里，姚勇忱对我說，上海要首先发动，不能等候南京；巡防营固然重要，可是海軍的情形很不好，要用吳淞炮台的力量来对付海軍；在上海发难的軍隊已有充分准备，我們要求巡防营中立，吳淞炮台首先响

应。他又說，黃汉湘不是軍人，好說大話，其人原系同盟会，也可能与光复会有关系；李燮和等不是我們的人，不可信任，姜尽可与其“虛与委蛇”。姚还說，光复会专门同我們搗乱，破坏我們联络軍隊的工作。我問姚：“光复会是浙江的革命团体，你們都是浙江人，为什么要生意見？”姚說：“光复会以紹兴人为中坚，杭州人不多，浙江势力全在宁波与嘉湖人手里，只要他們不搗乱，我們也决不与其分家。”我們还談到外交情形、北方局势以及上海道刘燕翼的为人，直到深夜始散。

经过几天的往返接洽，最后商定了这样几条：（一）巡防营不发难，任革命党人进攻制造局；（二）巡防营不攻城，不作战，純守中立；（三）吳淞炮台宣布独立，由各台官合詞請求总台官更換旗帜；（四）海軍出入不阻拦，不开炮，如无敌对行动即听其自由；（五）如海軍侵犯炮台，即由各台采取自卫办法。由楊某（商人，已忘其名，此人后来在国民党政府做过淞沪警察厅长）出面請客，被邀的有姜國梁、陈其美、李平书、朱葆三、王一亭、吳怀玖和我十余人。大家并未提及約定内容，而在言詞之間却一致贊成革命。经此一番宴会，使姜坚定了倒向同盟会的决心。

王幼垣又对我說，制造局有卫队一大队，枪械齐全，实力不可輕視，队官卢家有系一不识字的老粗，曾在巡防营当过哨官，他可以負責去运动。我把此事告訴了陈其美，陈說，不錯，已另外有人接洽了。我回报了王，并囑其不必进行，以免分歧。

这时，革命形势已达到高潮，南京方面对姜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我很担心会起变化，特商之王幼垣。王說，巡防营与吳淞炮台都有了切实布置，尽可放心，姜以地位关系，对他的部下自然不便有所表示，一俟时机成熟，即可按約行事，决无問題。他又說，姜的

公私銀錢以及巡防營和吳淞炮台的全部款項都在他的手里，更不怕它“走樣”。我認為王的看法很對。

有一天，姜對我說，上海道約他去過幾次，諄諄告誡他要“盡忠報國”，嚴防革命黨，並在必要時調他鎮壓上海城廂地方。姜回答說，他的部隊極為穩定，足以維持地面而有余，如另調外處軍隊到上海駐防，反而不妙。姜又秘密告訴我，聽說南京徐統制（指徐紹楨）並不反對革命，大概也同革命黨有了聯絡。我聽見這個消息，當然順着他的話應聲說：“有的。”

在陳、姚等人的談話中，我得知吳淞炮台比巡防營更其重要，很想知道那里的情形究竟怎樣。王幼垣約我到炮台一行，我們到总台部見着了南台台官施澤（號冠西，南通人）、北台台官潘碧澄（湖北人）、獅子林台官于連會（天津人，光復後改名春會，升任总台官），還有四五位副台官，開了一次秘密會議。我在談話中提到姜統領已贊成革命，吳淞炮台的獨立方式是由各台官合詞請求总台官更換旗幟，希望大家建功立業，共襄盛舉。各台官的革命情緒非常高漲，發言慷慨激昂，使我很受感動。他們還自動表示，如海軍侵犯炮台，即起而與之作戰。

當晚，我將此行經過報告了陳其美。陳很欣慰，但是他說，不怕他們不聽話，我們有足够的力量打進炮台。我覺得陳對於炮台的情形不大明了，未免有些誇張，只好“姑妄聽之”，隨說隨了，我沒有把陳的話語告訴姜、王，以免引起誤會。

上海光復，首先是革命黨人進攻製造局。所用兵力，以商團為主，配合了一部分警察、市民和青年學生。所用武器，只有長槍和手槍，實力也并不充足。其所以敢於進攻製造局，一則由於革命軍的聲勢奪人，二則由於製造局的衛隊已說妥內應。誰知衛隊方面

并未接洽妥当(听说接洽的人系借此骗钱),竟起而抵抗,革命军一触即溃。陈其美亲自前往劝说,被其扣留,次日即行释放。

在革命军进攻制造局的同时,巡防营不但如约严守中立,还派出军队放哨维持地方秩序。高昌庙如此,南市、闸北以及浦东那些地区也是这样,做到了地方安谧,七窍不惊,并掩护革命军如商团等之撤退。

吴淞炮台方面,南台、北台和狮子林炮台当日即扯上白旗,宣布独立。所有官兵都上了炮台,卸下炮衣,准备作战。驻在吴淞和宝山的巡防营同时放出步哨,与炮台密取联络。驻在浦东和吴淞的緝私营也派人和巡防营接洽,相安无事。

上海光复后,开会选举沪军都督,大家推举姜国梁,姜不愿就;举陈其美以自代。后来姜对我说,这次选举都督,秩序不佳,喧扰四五小时之久,才最后推定陈其美。

李燮和在吴淞成立一军政分府,实权由黄汉湘掌握,与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分庭抗礼,各不相下。陈屡次约我和姜密商,拟以武力解决吴淞军政分府,姜不愿做恶人,无结果而罢。吴淞军政分府以经费无着,不久也就结束了。

上海光复前夕的一次重要會議

沈 煥 唐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辛亥年九月初三日），余随先君縉云公至民立報館。步入一密室，則見三、四人已先在。先君与之作耳語，未几即于袖底出一密柬，命余乘馬車送至鄰壤里某号（其后始知为中国国民总会秘密地址）楼上，面交陈英士先生。陈得柬后，即匆促同車返民立報館出席會議。与会者有宋教仁、范鴻仙、叶惠鈞、叶楚伦等若干人，即席決議以聯絡商团，溝通士紳为上海起义工作之重心，并利用《民立报》宣传革命胜利消息，以激励民气。报纸一出，购者紛至，竟至有出銀元一元而不能购得一份者。时为上海光复之前数天，紧张情形于此可見。至商討上海起义之通常會議，則在南市信成銀行會議室举行。秘密活动經費悉由信成銀行垫付，合上海軍政府成立后之餉糈，計有数字可稽者达三十余万元，故信成銀行实为上海光复一役經費之泉源。

自十月二十四日會議决定大纲后，直至上海光复之前夕，陈英士、李平书、叶惠均与先君縉云公等日必举行會議，废寝忘食，恒至通宵不寐。余以有送书信之責，有时亦参加旁听。其初本拟待南京先发难，嗣后汉口失守，汉阳危急，非上海响应，无以解武汉之危，遂决計先从上海入手。至送书信之責，不命成人，而由童子任之者，岂以年龄較小，不易受人注目乎？

接洽上海海軍反正和組織海軍 陸戰隊會攻南京回憶

王時澤遺稿

(一)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的消息傳至日本時，我正在橫須賀海軍炮術學校畢業試驗完畢，等候發表成績，舉行畢業典禮後分派上軍艦實習。在此期間，我與同學均留校補習，除星期日外，不能外出。我在報上看到此項消息，熱血沸騰，見報載有法國商船於某日由神戶開往上海，乃決定於星期日搭乘火車到東京潛往神戶，乘該商船回國。屆時同學中不約而同前往東京者計有李靜（原名毓麟，湖南桂陽人）、叶匡（原名啟芬，廣東惠州人）、余際唐、張沖、朱華經、吳景英、陳雲（以上五人均四川人）和我共八人。我們共同商定，一面往同盟會聯繫，一面致電炮術學校，偽稱我們八人在隅田川划船落水，衣履盡濕，當日不能返校，以免學校方面發電尋找。於是同往神戶乘法國商船離日，於十一月二日抵上海。

我們到上海的第二天，清晨起床，即欣聞上海縣城及高昌廟江南製造局已於前一日晚間由革命軍占領，舊軍警均響應革命，上海已全部光復。我們即趕往製造局，至則見同志聚集者甚多，已公推李燮和（湖南安化人）為司令。李等見我們至，極表歡迎，公推我辦

理海軍事務。我乃馳往海軍辦公處，至則空無一人。其時，停泊在上海的軍艦計有建威、楚有兩炮艦，湖鵬、宿字兩魚雷艇，其他三艦忘其名，均尚懸挂龍旗，無所表示。我往建威軍艦兩次（當時在上海各艦以該艦為首），勸其贊助革命，撤換龍旗。艦長姚懷文不在艦上，副艦長某對於革命，口頭極表示贊成，但認為換旗事須俟上級決定。我又往見海軍辦事處負責人吳應科（廣東人），吳謂他僅管軍餉，俟新政府成立，即遵令移交，無權指揮各艦。蓋因當時的海軍主力如海容、海琛、海籌等大艦，由清水師提督薩鎮冰率領在長江中游，尚未反正，以此，在上海的海軍舊人仍不免心存觀望。我因口頭接洽無效，主張派軍隊同往各艦，迫其即時作最後答復。乃由李司令撥派巡防營一隊，交由我臨時指揮。我又與張沖商定：在製造局庫房取出待修舊炮數門，移置江邊，虛張聲勢，由張沖指揮。我乃率巡防隊乘舢板先至離岸最近的湖鵬魚雷艇，該艇即揚白手巾表示歡迎。我乃令同去的員兵均留在舢板上，獨自登艇接洽。詢知該艇艇長等均不在船，歡迎我們的為總炮弁（即軍士長）周某（湖南湘鄉人，忘其名）。周謂全體員兵均極贊成革命，請我派艇長上船指揮。我當即答稱：“君既首先贊助革命，我當即回報李司令，提升君為艇長，其餘員兵依次遞升，請即以旗語通知各艦速作最後答復，凡不願參加革命的均可自由離艦，遺缺仍由本艦員兵依次升補，我們決不另派人，並請準備發射魚雷，以防萬一。”周某及全體員兵均欣然允諾。靠近海鵬的宿字號魚雷艇首先表示與海鵬取一致行動，其餘各艦于旗語發出後，經過一番接洽，均派代表携名冊前來，表示贊助革命，即時卸下龍旗。

由日本回國的同學七人中，李靜、叶匡決計赴武漢，不願留滬，吳景英由江蘇都督府派為海軍處處長，四川各同學均加入該處。

最初數日，上海海軍事務僅我一人獨力支持，除接洽關於在滬海軍的各項問題外，並收容了各艦來滬銷假及個人志願投效的炮弁林學珊等三人和士兵約五十人。

滬軍都督府成立後，李燮和司令移駐吳淞，由陳其美接任都督，派毛仲芳（福建閩侯人）為海軍課課長，我為副課長。我以本願奔赴前方作戰，不欲久留在後方，辭之。當時有廣東國民軍百餘人（隊長杜某）、潮州敢死隊五十餘人（隊長林某），均係由熱心革命的学生、工人、小商販等自行組織，曾參加進攻上海縣和製造局之役。他們極願得一有軍事知識、能與滬軍都督府接洽之人為其領導。經留日舊友潮州杜天一從中介紹，由他們推代表前來接洽。我以正合我願，允之。於是將這兩部分隊伍，加上我所收容的海軍炮弁等，編為海軍陸戰隊，並得滬軍都督府同意，派我為指揮官，發給餉械。其後，又加入華僑五十餘人，合計二百餘人，在吳淞勤加訓練。

是時，徐紹楨被推為江浙聯軍總司令，統率各路民軍會攻南京。舊友史久光（江蘇溧陽人，畢業日本陸軍士官及炮兵學校）、劉國祥（湖南湘陰人，畢業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革命後改名劉毅）均在其幕中，史任參謀長，劉任參謀，約我開往前線助戰，並由徐紹楨派劉國祥來催促。我乃於十一月某日率海軍陸戰隊由上海乘火車出發，至鎮江下車，改為徒步前進。抵馬群時，徐總司令親出歡迎。

(二)

南京城外各據點此時已被聯軍占領，張勳閉城堅守。我軍無攻城炮，相持不下，眾議募敢死隊援城進攻。我首告奮勇，陸戰隊

全体員兵无不欣然乐从，爭当先鋒。正在准备之时，适遇到日前至前线视察、被敌俘去的联軍参謀长史久光偕张勋所派的代表胡令宣前来議和。其所提的条件为：1. 张勋退出南京，率所部軍隊渡江北上；2. 对于南京城內的駐防旗人应妥为保护。正在商議之时，张勋即于是晚乘我方不备，率兵经下关退往江北。次日拂晓，联軍陆续入城，人民焚香夹道欢迎。南京即于十二月二日光复。

南京光复后，江浙联軍总司令部重新发表編制，加委人員，現在所能記忆的，有参謀长史久光、副参謀长翁之麟（江苏人），参謀沈同午（江苏人），副官长譚道南（湖南长沙人），参謀刘国祥、鍾駿德（湖南人）、龔維疆（江苏人）、陈复（海軍，广州人）、王統（浙江温州人）、王时澤，大队长楊言昌（广州人）等；海軍陆战队人員为：指揮官王时澤，秘书楊端六，軍需长廖燮勋，督战員李克明（以上均湖南长沙人），大队长尹祚乾（湖南芷江人），副官李北海（广州人），教练官林学珊，队长杜某、林某等。

参加进攻南京的軍隊計有：苏軍（司令朱熙，湖南人）、浙軍（司令朱瑞，浙江人）、鎮軍（鎮江都督林述庆）、光复軍（司令李燮和、旅长李刚）、广东軍黎天才軍、沪軍（司令洪承点）、海軍陆战队和第九鎮余部等。

鎮江都督林述庆率队最先入城，滿张“江宁都督林”的安民告示，不受联軍总司令部指揮。徐总司令迭派鍾駿德等疏通及各方面調停均无效，直至临时政府成立后，徐、林糾紛始告解决。

关于徐、林冲突的問題，茲就当时各方面的評論略記于次：1. 据鍾駿德云：他与林同是徐任福建武备学堂监督时的学生。徐任第九鎮統制时，派林为管帶（即营长），現在林反以怨报德，确是負义。2. 又据徐的旧部某某等云：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南京时，总督张

人駿曾問徐云：第八鎮已叛變，第九鎮是否靠得住？徐答以靠得住。當時徐無參加革命之意，對於林頗為懷疑，曾派員接替林的職務。林拒不移交，即在鎮江宣布獨立，與徐脫離關係。其後，徐在南京反正失敗，退至鎮江，林拒不見面。徐被推為江浙聯軍總司令後，林始終不與合作。3.黃克強先生任大元帥時，曾問我徐、林孰優？我答以林未見過，不知其詳，只覺得他的舉動有礙聯軍的團結，與徐共處多日，見其每餐飲酒時，必舉杯呼“大總統、大元帥萬歲”，其尊敬領袖之忱勝於我輩。克強先生當時對我說：徐的這種舉動是官僚作風，他的參加革命是被迫的，林雖性躁，欠含蓄，但是忠實的同志，等語。其後，林於民國元年在北京被袁世凱毒死，可見袁忌林之甚及克強先生知人之明。

某日，徐紹楨至陸軍部，副官長某與之談及辦公室不敷，如能將鄰右史參謀長的親戚毛姓房屋租入，甚為合用。徐當即允為歸告史久光轉知其戚遷移。徐返部後，以此事告知史，並謂毛姓另租房屋的租金及遷移費等均由徐負責，在總司令部經費項下支付。史拒之，答以毛姓房屋能遷讓與否，當由毛姓自己決定，別人不能為之代謀；且替大元帥府辦差非總司令的職責，本部經費亦只能限於撥發所屬各軍軍費，更不應移作別用。史並因此決然辭職，徐屬我挽留不果。黃克強先生聞之，甚贊許史的剛直，特擢為參謀本部第一局局長（克強先生以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並飭副官處取消租用民房之議。

臨時政府成立後，改派徐紹楨為南京衛戍總督，海軍陸戰隊仍歸徐節制。我以赴前敵之願不能實現，心頗悒悒，適海軍部次長湯壽潛被派兼北伐艦隊司令，擬邀我同行，我當即表示同意。乃由湯向徐商調，徐允暫時借調，仍保留原職，陸戰隊指揮職務派大隊長

尹祚乾代理。

(三)

一九一二年一月某日，我与湯鄰銘等率海容等舰由南京出发，经上海向烟台航行。参加北伐的军舰为巡洋舰海容（舰长杜錫珪）、海琛（舰长林建章）、海筹（舰长林頌庄）、练习舰通济（舰长葛宝炎）；以海容为旗舰。司令之下設參謀四人，即：李靜、凌霄、姚葵常、王时澤。

北伐舰队到烟台时，烟台业已宣布光复，临时推海軍舞凤軍舰舰长王传炯为都督。舞凤系海軍交通舰，无战斗力。当时，在烟台較有实力的为海軍禁卫队一营，管带原为滿族，于光复时离职，由队长虞克昌继任。王传炯任都督不久，即辞职，让位于虞克昌。此外，刘艺舟称登黃司令，連成基称民政长，彼此均不相联系。蓝天蔚的关东都督办事处也設在烟台，蓝本人則住在海容軍舰，均无前进的实力。我見此情形，并探知胶东一带空虚，乃向南京方面請調海軍陆战队来烟台，拟会同友軍进攻济南。徐紹楨同意，轉請黃克强先生核准，除留一中队在南京作卫戍司令部卫队外，全队经过补充約四百人，均願随新任烟台都督胡瑛一同北上，并由南京增派沪軍刘基炎（河南人）部开到，进驻龙口。

陆战队开到烟台后，适值南北議和告成，清室宣布退位，北来的本意已失，而胡瑛正苦无兵，我乃将该队交胡瑛节制，决計辞去本兼各职，回长沙葬母。

到南京时，黃克强先生已改任留守，南京卫戍总司令部正在結束。徐紹楨留我負責解散留在南京的海軍陆战队。本队员兵对于

南北統一后裁減軍隊的辦法極為擁護，惟堅不接受三個月的遣散費，謂“我們是為革命而來，非為金錢而來。現在清室已退位，革命之目的已達，只要有薪餉一個月，即足敷回家旅費之用”等語，經再三勸說，始勉強接受。以後，我遇見他們之中有在上海馬路捶石子的，生活甚苦。回想他們當初辭不肯接受遣散費之高風，以與借革命爭權奪利之徒相比，實有天壤之別。

辛亥革命时期的苏浙学生軍团

田 頌 尧

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各地革命运动日渐高涨。夏秋之間，四川保路同志会发难于前，接着武汉新軍举义，全国相继响应。在这期間，我正在保定陸軍軍官学堂受入伍教育。我們这批学生系在光緒末年各省陸軍小学三年毕业，送入陸軍中学(北京、西安、武昌、南京四处)两年毕业，再送入保定軍官学堂深造的，共有一千二百多人，編成步兵四队、騎兵二队、炮兵二队、工兵和輜重兵各一队。总队长为蕭翼如(字展舒)，以下設大队长、队长、助教等。武器装备都很完全，并在附近設有較大規模的射击場，各兵种輪番施行实弹射击。是年秋間，清軍蔭昌率軍兩鎮由京汉路陆续南下，经过保定，风声甚紧。学校当局为了防止意外，停課数日。这时，同学们都乘机分头酝酿。最后，学校当局以陸軍部堂一紙命令下达，宣布提前結束，发給路資，分遣学生各回原籍候命。在停課期間，川籍同学密商，推我和刘高槐、周世英到北京与在京四川同乡联系。待我們轉回到保定时，全队同学已先两日离开，情势日紧。我們就赶到天津，改乘海船馳赴上海。到达上海的川籍同学，呂超、向传义、王維綱、彭远耀等参加了以熊克武为首筹組的蜀軍回川，田頌尧、鄢淮洲、罗鷗、陈朝俊、龙淵等則参加了以沈劍侯为首就地筹組的苏浙学生軍团。不旬日間，自願參加者千余人，多系江苏、浙江

两省中学以上学生。军团本部設上海斜桥永錫堂，暫假江苏教育会、潮州会馆等处作募集訓練地点。后为訓練便利計，迁到浙江杭州城，暫假高等审判厅房舍和庙会空地作营舍，积极从事訓練，为江浙联軍进攻南京做准备。

苏浙学生军团共有一千三百多人，多数自願出資制备軍服。武器方面，初經军团部請求沪軍都督陈其美、浙江都督湯寿潛借到步枪数百支，作輪番操練之用，一面籌資购备充实。学生军团組成时，曾发表宣言闡明宗旨，其中有曰：“今者組織汉族学生軍于沪滨，誓必渡黄河、揭幽燕、灭滿奴、兴汉族而后已。”又在北伐文中有曰：“三戶亡秦，廿年兴越，我江东八千子弟，詎不足以灭彼賤奴乎？同人当厉吾兵，秣吾馬，以与我各界青年相見于五色国旗下。”在暫定章程中，更明白宣布：“以扫除专制，創造共和，并除去凡为共和之障碍，而以保持世界和平为宗旨。”当时沪上还有国内外高等或专门各学堂之人士，同情革命，要求参加，因之，学生军团极短時間即完成預期編制。

当籌組苏浙学生军团时，沈劍侯被推任军团总长，有关軍务部門推我和鄧淮洲負責筹备。不久，鄧淮洲与陈戎生同受江西李烈鈞之約，前去协助軍事，推我兼負軍务部长和教練員之責。編营后，所有队长、分队长等职务，多由保定同学和南京陆軍中学二期同学之分散来沪者相互邀約，分任其事，担負訓練之責，計有徐自强（江苏）、叶煥舟（浙江）、史俊生（安徽）、罗天骨（四川）、袁海秋（四川）、高澤生（四川）等人。在上海时，我曾与沪軍营长张为珊（我在四川陆軍小学时的同学）取得联系，因而受到沪軍方面的协助。到杭州后，由于沈劍侯团长、陈鵬軍需部长均系浙人，經他們分头接洽，又得到浙軍方面的协助。是时浙軍总司令朱瑞正与沪軍黎天

才、苏军总司令徐紹楨謀組成联軍，分路进取南京，我們加紧訓練，还可作浙江部队的兵員补充。我們在訓練中，完全采激进办法，专重軍事术科和野外演习(在西湖地区进行野营操练时，上海商务印书館曾摄制照片，作明信片画面之用)。軍需方面除由軍团部专員負責筹备外，所有职员虽系义务性质，但都能热心职务，認真尽責。川籍同志有缺資者，由于陈朝俊同志的介紹，得到了四川裨农絲厂駐沪经理陈原玉的接济。

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黃兴任陸軍部长，曾派专員檢閱学生軍，評定成績优良；后又集合在小营操場訓話，鼓舞士气。随即合并广东、江西等省一部学生軍，照我們建議編成入伍生队，先期完成軍士教育，继续訓練，准备北伐。我們苏浙学生軍交由路孝忱接收，重新編制，原軍团部于二月底便告結束。

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

杜 伟

辛亥年十一月，我从武汉到达上海，在海軍陆战队担任教练员。工作之余，遇到一位有世誼的青年同乡郑璧女士（原是天津女子师范的学生）。她告訴我，上海的妇女界有許多革命組織，如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上海女子国民軍、中华女子竞进会、医务界女子后援会、女子经武练习队，等等。其中以女子北伐敢死队活动最为积极，受到沪軍都督陈其美及參謀长黃郛的重視和支持，派了沈警音担任队长。

女子北伐敢死队的成員，共有七十多人，平均年齡在三十岁左右，以天津女子师范的学生居多数。她們因为受到革命先烈秋瑾精神感召，奋起从戎，结伴而来，参加了革命斗争。郑璧女士就是該队成員之一。

該队軍事教练员祁性初，原系体育教员，不懂軍事，因此，郑璧女士就向队长建議，邀我去兼任这项工作。我每日抽出半天時間，給她們教练初步軍事知识和作战技术，并指导她們实弹射击等等。她們个个都认真学习，不怕艰苦。

队长沈警音，嘉兴人，很活跃而有才干，工作十分积极，为全体队员所爱戴。队员郑璧、葛敬音、葛敬华、黃紹兰、丁志謙、汪緯霞、孙俠、范模瑛、张卓群、梅琼英等都是队里的骨干。葛敬音为队附，

管理内部事务，郑璧负责对外联系。

女子北伐敢死队除了学习军事外，还和其他妇女团体有密切联系。他们和妇女界的代表人物吴芝瑛、吴木兰、林宗素、林宗雪等都有经常联系。吴芝瑛是秋瑾的老朋友，和上海地区的各个女子组织多有联系，参与政治活动的范围很广，是当时鼓动妇女参加革命运动的重要人物。吴木兰是江西人，短小精干，长于演讲，屡次在集会场合发表演说，号召妇女同胞奋起参加军事、政治活动。林宗素是福建人，社会党党员，曾经筹办社会党的报纸，鼓吹女子参政。林宗雪原姓张，因婚后丈夫姓林，即以林为姓，是浙江平湖人，对女子的军事组织工作特别热心。她自己经常身穿军服，腰佩战刀，姿态英武，不亚于男子。她的妹妹张馥真，也很有活动能力，乃姊林宗雪的政治活动，常依她作“参谋”。起初，她曾在陈其美的支持下，创办过“尚侠女校”及“女子进行社”（主要活动是销售《民声报》及《民主报》等），颇具苦干精神；后来又从事实业活动，在上海福州路开办女子植权物产公司。此外，还有唐群英、沈佩贞、尹维俊、尹锐志等，除了积极参加进行社的革命活动外，常以女军人的姿态活跃在大庭广众之间，积极争取妇女参军参政。又有医务界的张竹君，是以女医师的身份参加政治活动的，终年不辞辛劳，各处奔波，在各战区创设救护队，尤其和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联系得更为密切。

上海的军政界首领陈其美、李燮和、黄郛等，为了壮大革命声势和激励士气，并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对这些妇女团体曾从各方面给予支持。当女子敢死队队长沈警音向上海都督府提出组织计划时，立即得到批准，并领到所需的武器、弹药和服装配备（这是其他男子部队所不能轻易取得的），受到多方鼓励。

另有黃興的女秘書徐宗漢(老同盟會會員)對這支敢死隊也十分重視和關懷。她經常來到隊部對隊員們講話，策勵隊員們加強戰鬥的決心和信心。由於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鼓勵，這支新型的女子隊伍，對於辛亥革命事業和以後的婦女運動，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和影響的。

後來，我隨吳淞海軍陸戰隊參加了南京戰役，有關該隊的軍訓工作仍由祁性初兼任。南京光復時，這支女子北伐敢死隊與張馥貞、林宗雪所率領的上海女子國民軍一起開到南京，要求北上參加戰鬥。

不久，南北議和告成，革命軍北伐之舉因而停止。這兩支女子隊伍的活動也就告一結束。軍政當局動員她們復員，她們大多數表示不願離開組織。經過反復勸導之後，有的回到原校繼續讀書，有的分頭組成女子代表團，準備參政活動。有的則追求享樂和虛榮。敢死隊隊長沈警音就和黃鄂結為夫婦；其他陸續婚嫁，放棄革命鬥爭，做上了官太太的也不少。有的則變為投機政客，例如沈佩貞就是其中之一；她去北京大搞政治投機，和同輩爭權奪利，結果被袁世凱收買利用，成為袁的爪牙，袁氏垮台之後，也就隨之沒落。唐群英、林宗素等，也是熱心於追求個人政治地位的，然而沒有得到什麼結果。此外，有些較有正義感的人，因眼見當時的軍政要人們都在為個人的名譽地位而鉤心斗角，深為悲憤，而在個人生活方面，又因舊禮教的束縛，不得自由舒展，精神苦痛，情緒消極。例如林宗雪於復員後不久，由於感時憂世，抑鬱成疾，以致一病不起。又如女子國民軍北伐隊的張馥貞和女子北伐敢死隊的丁志謙，竟因此而遁入空門。

張馥貞、丁志謙二人，自從昔年出家以來，黃卷青燈，几將四十

年矣，現今均已年逾古稀，却还健在。张在杭州紫阳山祇园庵，法号耀真；丁亦在杭，现住龙驹坞广德庵，法号达道。作者曾经数度前往分别访问，以上资料，除作者本身的回忆追记之外，也取材于张馥真的口述。

南洋公学的一九〇二年 罢课风潮和爱国学社

——座談記錄——

編者按：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上海南洋公学爆发了反抗学校迫害的罢课大风潮，全体学生二百余人毅然退学，在中国教育会帮助下成立了爱国学社，进而展开反清的宣传活动。这是清末废科举办学校以后的第一次学潮，是中国近代学生运动史上有意义的一次斗争。一九六〇年六月七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邀集当时参加了这一斗争的平海澜、伍特公、张季源、张大椿和参加过爱国学社的任味知诸位老先生，座谈往事，本文就是这次座谈的纪录。

(一) 南洋公学

平海澜：南洋公学初开，总办是何梅笙。总办就是校长。他是常州人，盛宣怀的表兄弟。他是一个没有功名的人，但文章很好，字也写得很好，是一笔苏字。他常在午饭以后坐着马车来校，在房间里一坐，写写苏字，替人们写写对联。（舒新城：南洋公学是盛宣怀办起来的，所以有那么一个何梅笙。）盛宣怀奏明光緒皇帝，办两个学堂：一个北洋，一个南洋。后来何梅笙故世了，接手的就是张元

济(菊生)先生。张先生励精图治,真好。他是非常爱研究学问,勉励学生读新书的。譬如本来我们是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御批通鉴辑览》等旧书的,他改掉了,教我们读严复的《原富》。我们弄得走投无路,头昏脑脹,并且讲的先生也是外行,讲国学是好的,讲《原富》就不行了,《原富》是经济学。后来他自己教我们,他的教法,读一遍,一遍读了好几页,马上就问答,那么我们小孩子怎么答得上呢——十三、四岁读《原富》!我记得那时候看张之洞的《劝学篇》,还有《盛世危言》。张菊生先生那时候就有个新作风,就是找一个一个学生去见他,去谈。有一回他找到我们班里头了,我也在内。他问我:“近来看什么新书没有?”我瞎说一套,我说《盛世危言》,实际我借是借来了,还没有看。他就问我:“《盛世危言》讲些什么?”我就脸脹通红,一语不发。足见他是很讲维新的。他晚上时常拿了一盏油灯,四处去看看。

福开森那时候是监院,同张先生不大对头。福开森初来,我看见他是很穷的,一部东洋车,一个车夫替他拉。监院其实不是校长,而他却在自己的信纸上就写 PRESIDENT, PRESIDENT 就是校长了。就从这一种神气也可以看到他的野心了。总之他处处都要管,学生替张先生抱不平,反抗外国人,所以就有一个学生被外国人开除。外国人开除了他,张先生就暗地把他送到东洋去。

那时南洋公学初开,房子还没有造好。后来造了一个中院,一个上院。造好以后,我们这班中学生搬到中院。记得我第一年进南洋,还住在外头,在一家丝厂里租屋居住,呆了三四个月丝厂关掉了,就搬到中院去了。为什么叫中院、上院呢?我们一班到六班叫中院。还有一班叫特班,为什么叫特班呢?那时总办是何梅笙还是张菊生,我忘记了。他以为你们小孩子太幸福了,来到学校

里念书，什么都念到，但是已经进了学的秀才、中了举人的这些人却吃苦了。因为讲新学，讲维新，所以这般旧日读八股文的就没有用了，秀才、举人有什么用处呢？他于是乎招了个特班，特班里的学生是秀才、举人居多。我记得他那天戴了大帽子，戴了顶子，自己点名，一个一个特班生都上去了。考完了，组织起来，就叫特班，住在上院——经济特科，经济特班。我们中学班里头顶高的还有一班，升上去也住在上院。上院后来就是经济班、铁路班。当时黄炎培、邵力子，还有以后曾经做过北大校长的胡仁源，都在特班里。当时我的脑筋以为学生都是秀才、举人，那怎么搞呢？秀才、举人是不是还学“国学”呢？请谁来教呢？后来就请了个蔡元培，他是翰林。还有一个学监先生呢，我记得请到一个江西人，叫赵从蕃，是个进士。那么举人也不要紧了，压倒。所以翰林当国文先生，进士当学监先生。学生有会英语的就插到我们班里头；有的插在别的班里；不会英语的，读日文，预备到东洋去。他那时候是想把这般老学究救出来，给他们一个进步的机会，这个意思是很好的。

何梅笙故世，张菊生就来了。后来张先生受了福开森的欺侮，退出了。来了个沈子培，叫沈曾植，当时也是一个文学很好的名人，他做得也不久，换了一个汪子芳，叫汪凤藻，那时候墨水瓶风潮就发生了。

我们这般小孩子们没进去以前，他先招了一班师范生，王培孙就是师范生。这班师范生读了几个月，就教我们这班学生。我们进学校只十三、四岁。王培孙后来从南洋公学出来，就办南洋中学。沈叔逸办那个模范中学。（伍：他是教音乐的。当时南洋中学还有个小学。）小学是林康侯当校长。

这几个总办中，何梅笙是通州张謇的好朋友。张謇给他的信，还有别的文学好的给他的信，他统统刻出来给我们念，这是一种老的尺牍。何梅笙他常自称布衣（舒：因为他没有功名）。福开森，他在里头抓权，看着他慢慢地慢慢地阔气起来了。所有公学旁边的几幢小洋房，统统是造给外国人住的。福开森自己住一幢。还有请来的外国教师，两个人一宅，三个人一宅，住在里头。后来黄包车不坐了坐马车（伍：后来外国人每人都有马车），最后恐怕是坐汽车了。他有一股飞扬跋扈之气。我倒不懂，我们自己有校长，为什么还要一个提调？当时公学里还有两个很好的人，一个是伍光建，一个是李一琴。（伍：就是那个做和尚后来成了高僧的。舒：李是常州人。这个人不错，是丰子恺的老师——李叔同，弘一法师。这个人到过德国，当时是有一些影响的，在西洋美术、西洋音乐方面有些影响的。他同苏曼殊往来比较多。伍：他那时候很风流。舒：他做和尚是因风流而来的。）

舒新城：当时有这么一个情况。南洋公学对社会上旧的东西是主张尽量抛弃的。现在是不是谈谈这个问题？

张季源：当时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

舒新城：这是受了张之洞《劝学篇》的影响。

张季源：起初我们还希望清廷可以做到富国强兵，后来经过戊戌政变，屡次在外交上失败，觉得这个政府不行，非搞垮它自己来干不可。但是究竟怎么样做法，也都心中无数。总之推翻清朝，自己来干，这个风气是有的，我那时候很小，就晓得了。而在学术方面总是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出那么一种不三不四的谬论出来。在戊戌政变以后，学生们一步一步的觉得必须推翻清朝，建立自己的政权，所以认为凡是孙中山说的就可以推行起来，我个人当

时就是这样子看法。

舒新城：当时各位老先生看中国的皇帝是怎么一件事情？

张季源：当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先生就教我们《明季稗史》、《痛史》，总是讲到《扬州十日记》一类的事情。因此脑子里充满了这些印象，所以后来爱国学社成立之后，我也从南洋公学出来了。

伍特公：我觉得在南洋公学的时候排满情绪很高，到爱国学社成立，才有个革命的萌芽。

平海澄：在南洋公学时，我们一般小学生，大概对戊戌政变，对光绪是比较同情的，当时《新民丛报》登出来的内容总是说得痛哭流涕的，赞扬光绪皇帝是好的，西太后岂有此理。因此觉得光绪很苦恼，都表同情，觉得光绪是个好皇帝，政变成功后，我们中国要强了。所以拿到那张报，看得津津有味的。实际那张报是保皇党的宣传报。所以我看当时排满的思想还没有。到光绪故世以后，我们墨水风潮也出来了，那时候开始有排满思想。

伍特公：那张报是保皇党的。我们五班那个学生会，每星期六开会，就是讨论这些事情，还贴标语反对呢。

舒新城：你们所提的学生会是不是南洋公学的学生会，还是出来到爱国学社的学生会？

平海澄：是自己的班会。

舒新城：到爱国学社是不是会还存在？

伍特公：到爱国学社又换了一个。

舒新城：开会比较自由了。

伍特公：每星期到张园去开会参加听的人很多。

舒新城：外面人也有听的吗？

伍特公：有，那是个高级的游憩的所在，星期日大家都去吃茶

吃点心。每次开会都有人演讲，讲的人总是爱国学社几个人，如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有的学生也上去讲。讲的人不少，听的人也不少。

舒新城：后来《民报》出来之后，发行流传到内地的不多吧？

伍特公：不多。《民报》是章太炎到了东京之后才办的，那时候爱国学社就散了。

舒新城：那时候对国家的想法，一般还是不错的。那是在庚子以后了。庚子以后的想法——中国走什么路？“中国要改”，这是大家都没有意见了。怎么改法？各位老先生那时候怎样想法？

伍特公：思想也是没有系统的。就这么样听听章太炎那些人讲讲，自己没有什么主观的意见。听了以后跟着到处谈谈这些东西。那时候都是十几岁、二十岁左右。好比我那时候才十七岁，思想还不算强烈。

张季源：对三民主义是很赞成的，那时有追求真理的愿望。

伍特公：的确。

张季源：那时候法国革命所提出的平等、博爱、自由，我们很被这些新名词所陶醉。

（二）墨水瓶风潮

伍特公：我那年考进南洋公学，是张菊生做总办。到第二年从六班升到五班，那时一班最高。记得《新民丛报》刚刚出刊，看的人很多，我们那班差不多个人看。但是各中文教员却禁止我们看。而我们那时候并不十分清楚，只是要求了解些新东西、新思想。如对意大利三杰、对卢梭等新人物、新事物都看得起劲。而中文教员

就是不許我們看。

我們那班有兩門功課，大家都感頭痛，一門是《大清會典》，一門是《聖武記》。既不許我們看新書、新報，又要我們讀這種舊的東西，同學們都很不滿意。這是學生們反對國文先生的一個原因。

墨水瓶事件是這樣發生的：當時公學里裝着鈴，鈴一響就上課了。下午頭一堂是中文課，中文先生是郭鎮瀛。（張大椿：他是舉人出身，是當地的土豪劣紳，他有一個弟弟叫郭鎮清，兄弟兩個都很厲害。）有一次他走進課室，一看，椅子上有個墨水瓶，瓶子洗得干干淨淨的，里面裝着清水。我們那時候寫毛筆字，許多同學都用墨水瓶做水盂用，也許是有人忘記拿掉了。他看見了，就大發雷霆：“這個不敬師長，太豈有此理！”把墨水瓶往案子上一擺：我坐得離他最近——他是如皋人，我是南京人，他有一個侄兒跟我學英文的——他就問我：“伍某人，你看見哪個擺的？”我說：“我不知道，因為我也是和您同時進來的。”他說：“你替我查！”我說：“這怎麼查得出來？”他說：“無頭案都要查出來的，何況一件小事情，限你三天！”他一定要我查出來。三天以後，他又追問這件事情。我說：“確實查不出了。”他又說：“反正這是你們這一羣學生擺的，你代替他們記大過一次！”我也很清楚，那時幾個小過拼成一個大過，三個大過就要開除，既然大家沒受處分，我個人記大過一次也就算了。又過了幾天，他說：“欸！有人告訴我了！”他說是我擺的。我旁邊坐着的兩個同學，一個姓貝，一個姓陳。他說：“他們也曉得，兩個人知情隱瞞，我一定請總辦辦你們，請總辦開除你們。”我一聽“開除”，傻了，下了班出來一看，條子已經貼出來了，“三個人不敬師長，開除！”（張季源：姓貝的是誰？）貝季眉的侄兒，貝均，另一個福建人叫陳承

修。三个人都开除了。

我們这一段时间，见了《新民丛报》以后，有个“宿舍会”，每星期六开会，搞“团结”，大家演讲。那时候大家崇拜梁任公，所以写了許多字圖，各人抓一个，抓出一个什么字，就叫什么公。我抓了一个特别的“特”字，所以直到今天还叫特公。我学名本来叫伍正鈞，过去登了許多稿子，都是署名伍正鈞的。

开除三个人，大家都觉得不平。以前也开除过几个人。那时候吃饭每个桌子上有个教員一起吃，有个同学吃饭的时候稍微有点不礼貌，同桌的先生就把他开除了，这个人的名字我忘記了。那时候压迫得很厉害，黑袜子也不許穿，說是“流氓”；白鞋子又說走起路来沒声音，“好象是扒儿手”。总之先生对学生常用种种的压迫手段。

学生当晚就开会，大家认为不該如此，要同总办去办交涉。会还没开完，总办的条子又出来了：“五班学生聚众开会，倡行革命，着全体一律开除！”我們五十几个人，那时总算团结的，大家說：“开除，走吧！”就到臥室（一班一齐住在一个大臥室里），大家把行李整理停当以后，预备要走了。别一班的同学跑到臥室里來說：“你們慢一步，不要走，讓我們同总办去办交涉去。”第二天早晨大家就罢課了。（张季源：有一个人頂起劲，他叫錢伯圭。）

第二天早晨我們派了几个代表，总办坐在签押房里，談了好久，总办不答应，說：“教員叫我开除，我只好开除。”那时总办是汪凤藻，副校长（当时称提調）是伍昭辰，就是伍光建，是現在复旦大学伍龔甫先生的父亲。交涉沒有結果，就到大礼堂召集全体学生开会，决定全体学生在当天下午一班一班地排队到督办家里去請願（督办是当时高級学校的行政首腦，总办是只管日常行政的，要

受督办指揮。——編者注)。到了之后，大家派代表进去，督办推說丁忧不見客，就派了一个人出来，安慰一下，說：“你們好好回去，明天总有办法。”代表說：“明天十点钟等你們的代表来，十点钟过后就不等了。”到明天十点钟，督办的代表也沒来，十一点钟也沒来。下午大家就开始一齐走了。路上和督办的代表张让三(美翊)碰着了。(舒新城：就是第五班你們这一班决定走了?)全体决定走了，小班先走，大班后走。我們已经发动了，他派人来也来不及了。

六个班一齐出来。当然，有些人中途不走了，回去了。蔡元培先生在旁边也鼓励我們。同时他自己也带着特班生出来了。特班里有邵力子、黃炎培这許多人。后来不到几天，中国教育会找我們去組織爱国学社。爱国学社也上課，但是課上得很少，活动比較多，还办了个儿童报，总是談时事、讲革命。大概是这个样子。

舒新城：当初还有这么一个问题：我想这个墨水瓶风潮，没有什么最后的宗旨，可能是个自发的运动；后来到了开除学生的时候，才有蔡元培出来的。

伍特公：蔡元培也是自发的。后来已经成功了，火是已经着了，那时他走上来了。送火不是他送的，是自发的。

张季源：我来讲讲墨水瓶事件。照我个人的意見，伍老說“无意”的，我看当时是有人有意同郭鎮瀛寻事。郭经常坐那个位子，并且他上課的时候一定要把位子摆在正中，稍微歪一点就要罵：“又歪了，誰摆的，不行！”这样子不止一次了。誰知以后这个凳子歪得更厉害了。这样几次下来，郭倒反而不响了。所以，我总想是有人有意那样做。伍老說：郭先生当时疑心他，我也不晓得究竟是誰？但照这情况来讲可能是有意的。

平海兰：恐怕这位郭先生还有一个原因。我們从前睡觉，在一

个大房间里，中间一个空着的地方，放一只床铺，准备先生来睡的。先生他们轮流来睡，叫“监卧室”。有一天晚上，我们学生睡了，电灯也息了。只听一位先生也来睡觉了。那位先生恐怕就是郭吧？（伍：不是郭。是胡文甫，胡詒谷，后来做高等法院的秘书长，再后做院长的。）被窝里不知道谁在他的浇了一壶水；（伍：不是一壶水，一个痰盂。）一个痰盂，冷天呀，他一睡进去，呀！哇噻一声！学生都惊起了。现在照这一桩事情看，恐怕墨水瓶也是有意的。主要是因为当时学校当局和先生压迫学生太厉害引起了反感。

张季源：不能说是个个都压迫；不过象郭老先生是有这种情况的。

平海兰：我当时是受过些的。

伍特公：那个郭先生是不好的，讲书讲到“里”字，他讲：“‘里’么，譬如说那个南方里。”上海打狗桥有个南方里，是花烟间的弄堂，他会把“里名圣德”的里，说是“南方里”的“里”，上海里多得很，他却偏要提出那么一个里出来，所以我们都看不起他。

张季源：他讲《纲鉴易知录》，考起书来出的题目，往往是某一战事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人发动的？这种问题很生疏，一般同学都很不容易回答出来。

（三）爱国学社

张大椿：当时南洋公学闹风潮退学的约有二百多人，其中也有少数回家的，活动分子都留在上海。退学的时候，大家排着队出校，到张园拍了一个照，领头的是贝季眉（寿同）。退学之后，由中国教育会的蔡元培、章炳麟等把退学的学生组织了起来，办了一个学

校。蔡元培是同南洋公学有关系的。当时他说：“不要散，我們組織一个学校。”过了沒有几天就成立起来了。記得那是阳历十一月，快冬天了，就在福源里开办，正式挂起牌子，起名“爱国学社”。开始时租两幢房子，福源里就在泥城桥，当时隔壁有个耀华照相館，对过就是老跑馬厅。这个里弄至今还在，房子尚未拆掉，就在新世界北面，房子是三层楼，底层是中国教育会，我們上課在二楼，三楼作宿舍。楼上住宿，楼下办公，沒有家眷的学生就可以搬进去。我就沒有家眷，当时有了房子就搬了进去。只是暂时搬进去，后来开学以后又搬出来了。冬天未正式開課，下一年才開課的。

过了年，各处听見南洋公学鬧了风潮，其他地方随着也有鬧学潮的了。凡是鬧学的地方，我們爱国学社的人都打电报去鼓舞他們，吸收他們来参加爱国学社。因此以后各方面来的人很多。南洋公学退学的人，中間有的经过盛宣怀派人來說服回去了，但回去的人是少数，照我估計大概只百分之三十，一半以上都沒回去。我們那一班的三十个人中，回去的頂少了，只有七个。所以說参加爱国学社的人不仅是南洋公学退学的，后来各方面来的也很多，是逐漸扩充起来的。譬如南京陆师学堂鬧学了，吳稚暉跑去运动，就来了几个人，現在著名的如章行严(士釗)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学陆軍的，所以到了爱国学社，先請他做体操教員，教兵操。当时我們宣传革命、軍国主义，大家要当兵，每天要体操。爱国学社就是着重这些活动，正式上課是很少的，每月都要到张园去演說一次，开演說会。演說的内容都是爱国主义、排滿、革命等等，这样子人数就越来越多了。各方面的人，大部分是有革命思想的，有的是《革命軍》的讀者。有的是从日本回来的，各省来的人也很多。就这样一直到夏天，有半年的时光。

后来，爱国学社所有的言論都由《苏报》发表。《苏报》原来是个小报，那时刚刚改組，由一个常州人叫陈梦坡的接办。陈有革命思想，所以当时他所作的社論都很激烈。他自己表示願意将《苏报》作爱国学社发表言論的机关，鼓吹革命。因此，那时候鬧得清朝大为震惊，但又沒有办法，因为当时上海的爱国运动一般都在公共租界里活动。但清廷总想打通关节，“处置”一下。我記得是那年夏天阳历七月初，端午节的时候，他們就发动了。北京有正式命令給南洋大臣，叫他轉飭上海道同公共租界巡捕房交涉，把《苏报》封掉，爱国学社有連帶关系，也要查封。大概命令是通过巡捕房执行的。沒有几天他們就把爱国学社、苏报館一齐封掉了，同时把章炳麟和邹容两个人都逮捕了。

当时，章炳麟就是在福源里爱国学社那个房子里被捉去的，巡捕房捉他的时候問他：“你是不是章炳麟？”，他說：“我就是章炳麟”，就被捉了去。邹容那时避在一个朋友家里，后来不清楚，可能是他自首的，也就把他扣起来了。这个案子里，大概就是他两个人被捕了，其他同学因为正值暑假散学了，所以沒被捉去。同时也因为他們两人最著名，一个是《革命軍》的著者，当时这本书发行了不少，印了总有上万份，卖一毛錢一本，到处发行。章炳麟是个著名的学者，所以他們就着重捉这两个人。他两人被捕之后，蔡元培先生就离开上海了，吳稚暉后来不知怎么也离开上海到英国去了。其他支持爱国学社的，如中国教育会那时还存在着，大概就是蔣竹庄（維乔）还没有走。其他同学也都各人走各人的路了。爱国学社就这样結束了。

平海澄：墨水瓶风潮起来以后，我就接到南洋公学一位教师的信，說：“你沒有参加鬧风潮，你就不要同那些狂徒混在一起，快

点到我們这里来。到这里来有出洋的希望，我們这班人都是出洋的。”后来我想，几个好朋友统统都到爱国学社去了，回到南洋去的都是一班功課不好的人，我那时对功課不好的人有点看不起，所以我就决定到爱国学社去了。未去之前，我原是在家里請假养病的，病好了，我就带着行李到了爱国学社，一看，就是刚才张老所讲的許許多多好朋友都在那里。

当时我們的組織，与別的学校不同，所以我还記得。好象最高的行政人員叫議長，議長下面有个評議會。一切学校行政都要由評議會討論。我后来就在事务方面担任管理学生行动的职务。我們的办法在当时來說是很特別的，不許罵人，不許对学生疾言厉色，只可以用一种劝告的方式。譬如有个学生在課堂里抽烟，就要好好地走过去同他讲：“你不要抽烟。照章程第几条，是不得在教室里吸烟的，你要記住。”讲过这几句話就算了。又譬如在飯厅吃飯，有学生迟到了，就同他讲：“你要准时到，迟到犯第几条規則。”这样就行了。我們有好几个人管一桩事，对学生的行动，你也报告，我也报告，学生今天犯个規，明天犯个規，犯規就报告評議會，評議會就評議。評議出来，轻的訓育一番，重的就由評議會交給議長开大会。議長在大会上表决下来，記大过一次或者記大过两次，或者馬上开除。不仅大事情是要经过評議，許多小事情也是这样。

我到爱国学社是日本和俄国打仗的前一年。我記得一九〇三年的清明节我就离开了学社。因为我有個先生，从前教我国文的，从日本到了上海，劝我到日本去。他說：“你在爱国学社不是事，你同样要革命嗎，还是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还可以学，你在爱国学社里没有学的机会。一个人总要学了，然后才好做这种工作。”我听他的話不錯，就离开上海到日本去了。

我到了日本，因为那边有許多中国留学生不懂英文，要进日本学院也要懂些英文，或者是法文、德文。我就在那里教教书，自己也念书，是自費的。

有一天，同学打电话來說：“現在又到了許多爱国学社的同学，你要去見見嗎？就在某某客棧。”我去一看，許多同学都在那里席地而坐。我問他們怎么回事，他們說：“上海出了事了。上海道要封爱国学社，捉拿爱国学社的学生、教师！”

爱国学社起初是由中国教育会主办的，开办經費是由烏目山僧向罗迦陵捐来的。罗迦陵是福建人，哈同夫人，她相信佛教，拜烏目山僧为老师，她有爱国的心願，所以捐了一万元給爱国学社作經費。中国教育会也出了些錢，但为数很少。当时一万元維持了不少时候，是主要的經費。

在爱国学社的几个月中，据我所知，支持我們的有蔡元培、章炳麟、蔣竹庄、吳稚暉等。我們南洋退学出来的学生，又当教师，又当学生。一边招学生进来，我們就教点英文，教点算术，就这样子。一边我們是自学，章炳麟就上国学課，蔣竹庄就上教育、哲学这一类的課。吳稚暉呢，他在那里做一种研究工作，起头編写学习日文簡便方法。他作了两个表，說“倘若能够把它念熟了，就可以看书。”倒是有些效驗的。还有，他在那里造字，造注音字母，我們叫他“头脑清”。帮助我們的有这几位。

还有一位就是烏目山僧，黃宗仰是他的俗名。他對我們帮助很多，就是他向罗迦陵筹款的。中国教育会当初是蔣观云、蔡元培两位先生办的，章炳麟、吳稚暉都在里头，他們也有些款子補助我們。所以我們款子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就是罗迦陵，一个来源就是中国教育会，还有別处来的零星捐助。学生学費好象收得很少，

我們南洋的人不收學費，外面來的是收費的，所收也是有限的。還有一位幫我們的叫徐敬吾，不論對我們南洋退出來的，或者學生，或者新生方面，都幫得很多。章炳麟著了一本《燬書》，這書印行以後就是交給徐敬吾出去賣的，但很少有人要，因為中間有許多字不識，人家不大懂。

陳夢坡有的時候對愛國學社也有幫助，例如鄒容的《革命軍》，聽說他就很支持。他在報上大登而特登，給這本書作宣傳。當時好象到學社里來的還有他的女兒陳攏芬。後來這位陳夢坡先生因為他的《蘇報》登鄒容的文章，前清的官僚要辦他。章炳麟當時是很隨便的，經常穿着一件長衫，外頭結一根草繩，他就是這種落拓不羈的樣子。蔡元培、蔣竹庄兩先生都是很嚴整的。吳稚暉是以滑稽的態度幫助愛國學社的。他常說：“你們做這種革命工作，我在旁邊打打邊鼓，唱唱小丑。”

伍特公：愛國學社後來同中國教育會鬧翻了，因此，經費就很缺乏，所以後來就和《蘇報》聯繫起來了。由愛國學社的學生每月提供幾篇社論，章行嚴也是寫社論的學生之一。《蘇報》每月津貼愛國學社多少錢，這樣，愛國學社就同中國教育會分離了。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新聞界动态

严 独 鶴

要讲到辛亥革命前后上海新聞界的面貌和活动，不能不回溯清末时期在上海发行而致力于宣传革命的报纸。在这些宣传革命的报纸中，自然首先要提到《苏报》。誰都知道，《苏报》案是中国新聞史上一件大事。此案的发生，标志着当时革命的火焰，已凭着輿論的力量，向腐朽的清政府作强烈的喷射，也暴露了清廷以毒辣又很卑劣的手段，多方乞助于帝国主义者，对当时鼓吹革命的知识分子，对上海新聞事业，加以严重的迫害。关于《苏报》案，在戈公振所著《中国报学史》和其它叙述上海新聞史料的刊物中，都有比較具体的記載，本文就不重行細述了。

《苏报》案虽然使上海新聞界在当时环境下受到了一个打击，但并没有能摧毁革命者的意志。紧接着《苏报》案而重整旗鼓的，有《国民日报》，其后又相继出现了《民呼报》、《民吁报》和《民立报》。这些都是主张革命斗争的报纸，也可說是同《苏报》走一条道路的报纸。

《国民日报》是在苏报館被封閉的同一年（一九〇三年）創刊的，創辦人是章行严、何麻施和陈去病。报纸出版后，恐再遭清廷封禁，曾向英国領事館注册。但清政府还是要想尽办法来扼杀这张报纸，既通令沿江各省，严禁商民售閱，又由外务部行文总稅

务司,要求停止邮寄,事实上却都没有能完全达到目的。后来因为馆中人内部发生意见分歧,以致停刊。

《民呼》、《民吁》两报历时都很短促。《民呼报》创刊于一九〇九年春季,只刊行了九十三天就停刊了。《民吁报》创刊于同年秋季,只刊行了四十二天,也就停刊。这两张报纸都是于右任主办的。于右任在一九一〇年又创办了《民立报》,执笔者是宋教仁(笔名渔父)、吕志伊、章行严等。当时宋教仁所写的文章很受到读者的欢迎,《民立报》销数很广,在辛亥革命前夕,对革命事业的宣传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辛亥以前,被称为革命报纸的,除上述各报外,还有《神州日报》。《神州日报》创刊于一九〇七年,创办人是于右任、杨笃生(名毓麟)和汪彭年。历时未久,于右任因事离去,杨笃生也出国留学,《神州日报》就归汪彭年一人主持。杨笃生是一个革命志士,后来因各地的革命起义屡次失败,民党同志惨遭杀害者甚多,国事也愈见败坏,就怀着满腔忧愤,在英国利物浦蹈海自杀。汪彭年独自接办《神州日报》时,由汪允中任主笔。汪允中是俞樾的門生,在政治主张上也赞助革命,和当时《神州日报》的宗旨甚相合,所写的文章也都以鼓吹革命为中心。武昌起义的电报到达上海的当夜,汪允中写了一篇社论,词气颇为激昂,开头两句就说是“天佑我汉,胡运告终”。这篇社论商得汪彭年同意后,在次日报上发表。《神州日报》的历史,是延续得相当长的。到了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汪彭年在北京突遭拘捕。袁政府派人威胁他,要他脱离《神州日报》,并将这张报让给袁党,才准具保开释。汪为保全自身、避免迫害计,接受了这个条件。于是《神州日报》就归孙震东接办。孙是袁乃宽手下的人物。自此以后,这张报纸随着政局的推移、政潮的起伏,屡

易新主，屢起变化，和辛亥前后那一个阶段相比，簡直是名称依旧，面目全非了。

上文所叙，是辛亥前具有革命性的报纸。进入民国初期，上海又出现了不少新型的、以宣传革命为目标的报纸，其中声势较壮的，是周浩、戴天仇创办的《民权报》、吕志伊创办的《国民新闻》和邓家彦创办的《中华民报》。以“民”字标名的报纸，在新闻界中有“竖三民”、“横三民”之称。“竖三民”是说“一脉相承”，指《民呼》、《民吁》、《民立》三报；“横三民”是说“齐头并起”，指《民权》、《国民新闻》、《中华民报》三报。“横三民”持论较激烈，那时“竖三民”已只存《民立》，与“横三民”的《民权》常展开论战。《民立》的政治论调趋于温和，为不少中、上层知识分子所爱阅。但一般革命热情较高的读者和向往革命的青年学生都欢迎《民权报》。《民权报》的执笔人是戴天仇、牛匹逊（名裡）、蒋箸超。报上不另辟文艺副刊，但逐日刊有小说或其它文艺作品。徐枕亚所著《玉梨魂》小说，最先就连载于《民权报》。徐是被目为鸳鸯蝴蝶派小说主流的，因此，《民权报》的文艺园地也可以说是鸳鸯蝴蝶派的发源地。《民权报》停刊后，报馆中一部分人组织了一个“民权素出版社”，出版了一种期刊，就标名为《民权素》，同时又把以前刊在《民权报》上的小说如《玉梨魂》等，刊印单行本。《玉梨魂》刊出在《民权报》时，因徐枕亚是报馆内部编辑人员，所写小说就不另取报酬。民权素出版社印行《玉梨魂》，对徐枕亚仍没有补付稿费，又没有商得他的同意，徐于是大为不满，引起争执。结果是经人调解，《玉梨魂》版权归之于徐，任其自行出版。

《中华民报》的创办人邓家彦是坚持反对袁世凯的。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邓是代表广西省的议员。当投票选总统时，其他议员

所投的票都选袁世凱，邓独选孙中山先生，以此大招袁党之忌。据说在暗杀宋教仁案內，曾发现袁方密电，有“毀宋灭邓”四字。結果邓虽未被暗害，但在癸丑討袁战役后，袁党仍假借了一个比較严重的罪名，向上海会审公廨指控邓，終于使邓遭到了监禁一年多的处刑。《中华民报》自邓家彥离去后，归汪洋主办，因经济异常竭蹶，勉强支持了不多时就停刊了。

当然，癸丑討袁失败以后，报纸被迫停刊的，不止《中华民报》一家，几乎所有反袁的报纸，都在威懾与高压之下，无法存在，連那些报人也都风流云散，剩下来的只有几家老牌报纸了。因此，在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新聞界确曾一度呈现蓬勃的气势，而当革命进入低潮以后，却又随之显出异常萧索的景象。

这里，我想再談一下辛亥革命时期老牌报纸所持的态度。当时所謂老牌报纸，如果以出版先后來說，最老的要数《申报》，其次是《新聞报》，再次是《时报》。論报纸內容，却是《时报》較有革新气象，为当时多数青年所喜閱。老牌报纸为了要爭取各方面的讀者，在辛亥以前，对各省不断发生的起义事件，都目为大事，詳細报道，对清廷用暴力鎮压革命和残杀革命志士的行为，也都或轻或重地发表了一些譴責的評論。例如秋瑾案发生后，各报一致指責浙省官府，不但形諸文字，还附加图画。我至今仍記得《时报》曾刊載一幅插画，上面繪着一只小帆船，在风雨如晦、大潮涵涌中顛蕩不定，旁边題着两句詩：“风雨昏昏天欲黑，张帆暗送浙江潮”，从詩意中說明画意，可使人一望而知是諷刺当时浙江巡撫张曾敫的（张号筱帆）。但老牌报纸的表现，也只是如此而已；如果和倾向于革命的报纸作一对比，那就显分为两派。虽然两派之間并没有形成对立，也沒有引起論爭，实际上却是处于两种境界，隔着一道鴻沟。

《申报》在北軍南下、战局告紧那一段时期里，曾因张贴号外，引起一場风波。当时《申报》还是一张洋商报纸，主持全館的席子佩又是一个买办型的人物。他在这风云变色的时候，依然守着一套从新聞上搶先出风头的老手法，并不考虑到人心所向。《申报》一得到馮国璋部队攻陷汉阳的电訊，立即在門口貼出号外来，并加上很大的标题，画上鮮紅的圓圈。望平街头的行人看到这张号外，顿时引起憤慨，紛紛拥进大門，向館中人提出責問。館中人見来势汹涌，赶快取出电稿，給大家传观，证明号外消息并非虛构。但群众仍未能平息怒火，认为即使消息确实，报館也不应当为敌軍宣传胜利，动摇人心。群众在轰鬧之下，就将报館門口的大玻璃窗打碎，借以泄忿。这件事以《申报》而論，可算是受了一次来自讀者方面的打击。

《新聞报》和《申报》同样是洋商报纸，在业务上是彼此竞争的；在办报方針上，却真是“鲁卫之政”，是基本一致的。《新聞报》处于福开森控制之下。福开森在辛亥以前，早已从各方面参加政治活动，并和清廷大員相勾結，对于革命事业，可說是格格不入，甚至处于敌对地位的。这从中国史学会主編的《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冊所載“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就可得到证明。在这些档案內，有不少福开森致当时湖广总督端方的密电，报告上海方面特别是領事館和“工部局”办理《苏报》案的经过情形，也随时提出他本人所拟陈的意見。另外在两江总督魏光燾、上海道袁树勛等致端方的电文中，又屢次提到福开森，并有“切囑福开森設法”的詞句。张之洞致端方电，更着重指明“此事樞紐全賴福开森”。由此足見福开森在《苏报》案中，竟是以一个“洋員”的身份而接受着一种特殊的使命，担負着一种秘密的任务。福开森购得《新

聞報》，事在《蘇報》案以前（《蘇報》案發生于一九〇三年，福開森接辦《新聞報》在一八九九年）。福開森既是一個傾向於清廷的人物，他所主辦的報紙，從政治角度上看，就不可能不受到他的很大影響。福開森雖然為了報紙要爭取讀者，推廣銷路，也有所顧忌，未敢在革命高潮中公開地唱反調，搞垮他的企業，卻只能掩飾內心，虛裝幌子，念動他那“無黨無偏”的口訣，使報紙表現出不痛不痒的態度，以此敷衍場面，就算盡其能事了。

在辛亥以至癸丑那一個階段里擔任《新聞報》總主筆的金煦生（別號“柳蓀”，筆名單用一“柳”字），是福開森的門生。他每天寫一則時事短評，所持的論調是兩面罵，有時罵袁政府，有時也罵民黨中心人物。我於一九一五年初進新聞報館時，館中有一位姓呂的老年排字工人曾對我述說了一樁關於金煦生的故事：金煦生有一次寫了一篇指責民黨的時評，其中有這樣兩句：“空手而來，滿志而去”。第二句中被呂老師傅排錯了一個字，將“滿志”誤排作“滿載”。金煦生看了，就笑着對他說：“你有這個膽量，排出‘滿載’，我卻沒有你這個膽量，只好仍改作‘滿志’。”從他所寫的時評和對老工人所講的這番話中，可以想見他作為當時一張大報的總主筆，卻是對時局的變革別具一種觀點，也別有一種心情。金煦生在《蘇報》案中與福開森有聯繫，並曾寫過一篇論文《論革命黨》刊在《新聞報》上。這篇論文是反駁革命的。福開森致端方電和端方復電中所提到的“金世和”，就談的是他（金名世和，煦生是他的號）。

一九一二年，《申報》有了個大變遷，那就是由席子佩將該報轉售與史量才（史於次年正式接辦）。這件事固然和辛亥革命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卻也不能不說是辛亥以後時局的變遷間接影響到《申報》的變遷。在《申報》讓渡時，史量才方面投資的三大股東

张謇(号季直)、应德闳(号季中)和赵凤昌(号竹君),都是当时在政治活动中和辛亥革命有相当关系的人物。再讲到史量才本人,他在辛亥以前已入《时报》。狄楚青在时报館楼上另辟有精室,題名“息楼”,作为朋儕憩坐清談之所。当革命风云勃起的时候,狄楚青和一些对政治有兴趣或有关系的友人,常在息楼上聚談或对政治問題有所議論。于是息楼人物无形中也成为一个自然集合而又含有政治性的小集团。史量才和雷奋(号继兴,是史的同乡)都是息楼座上客。此外,在武汉义旗高举以后,各省从政治上进行活动的代表人物,会集于上海,开会地点就在《申报》初期三大股东之一的赵竹君家中。赵的南阳路住宅內,有一“惜阴堂”,比較寬广,成为当时討論国事的会场。會議內容都是有关全局的大事件,如国体問題等。参加會議的人,从那时的到会签名录来看(“惜阴堂”的會議紀錄和其它有关資料,現藏北京图书馆),其中有赵竹君、张季直、湯寿潜、张元济、黃任之(签名用“韞之”两字)、温欽甫等,史量才也是经常出席的一人。以息楼的集合和惜阴堂的會議而論,足見史量才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生活中,已和各方面有頻繁而密切的接触。史氏遇害后的訃告內,刊有黃任之所撰《史量才先生之生平》一文,說到:“武汉革命軍起,各省响应,主江苏者实为程雪楼、张季直、应季中諸公,先生盖无事不参与商洽也”;又說:“先生独着眼社会事业,……遂以民国二年接办《申报》”,这說明了史量才寄热情于新聞事业,早有了政治上的基础。由此推論,他的发願接办《申报》,就很有可能是受着辛亥革命的影响,或者是辛亥革命后的时局对他起了一种推动的作用,給予他一个积极发展的机会。

《申报》在辛亥革命以后有了变迁,《新聞报》也几乎同时有变

迂。这一点我在新聞報館工作数十年之久，毫无所聞，是直到如今才知道的。最近我遇到前文所述及的在辛亥前就主持《神州日报》的汪彭年，在談話中提起福开森。汪彭年对我說，他在民元期間到北京，福开森曾对他訴說心事，想把自己所握的《新聞報》股票全盘出讓，理由是大局已起了这样的变化，感到对办报已深为厌倦，大有从早打算，待价而沽之意，并問汪是否有兴趣接办。汪聞言也頗为心动，但因福开森开价五万元，在当时确是巨数，汪自度无此資力，未敢承攬。汪言之凿凿，使我想到福开森当时如果能找到对象，得到善价，那么，他的出售股权就不会迟至十余年以后，而是和《申报》同样，《新聞報》会随着革命后时局的轉变，也即时实现一个新旧交替的局面了。再說福开森因革命后一切形势起了变化，就对办报感觉厌倦，更可說明辛亥革命在他內心中是大有反感，极不愉快的。福开森这时的意願，虽沒有成为事实，却也足供研究上海新聞史料者的参考，值得作为遺聞，附帶一記。

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新聞界

包天笑

(一)

談上海報界与辛亥革命最有关系者，当自《苏报》始。《苏报》創辦于前清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始創者为胡铁梅，后归陈梦坡主持。仅在河南路（前称棋盘街）楼下一室，所謂主笔房、排字房、机器房，均在其內。报館中经济既窘，人材亦少，陈氏常拉人写論說。其时适上海南洋公学风潮迭起，师生們出而組織爱国学社，章炳麟（太炎）常以排滿的文章在《苏报》上发表，清朝政府控諸上海租界当局，于是章炳麟被囚，苏报館被封。但经此一役，而种族革命，深中人心。此事虽距辛亥革命有八年之久，然而来龙去脉，固自有其淵源也。

越一年（光緒二十四年），乃有《中外日报》的創刊。这是汪康年之弟汪詒年（号頌闈）所经营，可称是上海維新党的主流。《中外日报》的創設，在上海报纸的型式上有两个革新。其一是，上海的报（如申、新两报）向来用薄的有光紙一面印的，它开始了用較厚的白报纸两面印。其二是，上海的报一向是直行的，它开始了分几行几格。《中外日报》对于那一时代的革新工作頗有足迹，但到了辛亥革命时期，它早已停刊了。

(二)

《中外日报》以后，继之而兴的是《时报》。

《时报》是一九〇四年(即清光緒三十年)狄楚青等所创办。楚青名葆賢，又号平子，江苏溧阳人，是前清的举人。他的父亲是进士，曾为江西省知府。楚青当时在北京，亦为一位新学家、名公子，奉康有为为师，与梁启超为友。唐才常之役，他曾負粮台之任，事败后，即逃避至日本。

其时上海新聞界，仅有《申报》、《新聞报》，皆暮气沉沉，而且都是外国人資本(前者为英国人資本，后者为美国人資本)。汪詒年所办的《中外日报》亦不振。于是楚青即思在上海开报館。他是康門弟子，康、梁虽潜身异域，亦有志于此，而梁又在日本办杂志。当时筹集資本时，大概康、梁方面占十之三，狄氏占十之七(狄氏兄弟二人，兄曰楚青，弟曰南士)。此其大略如此，那时报館資本，向来秘不告人。

楚青在东京时，即识得雷继兴(奋)、陈冷血(景韓)，他們都是留学日本的高材生(同是江苏松江县人)，回国后，便組織报館，名曰《时报》。以罗孝高为总主笔，馮挺之副之(罗亦康門弟子，馮不詳，两人均为广东人)，但此两人，只撰論說，不編輯新聞。編輯各版新聞，只归雷、陈二人(雷为陈之姊丈)，后又加入包天笑，則在《时报》創刊一年以后的事了。

康、梁对于《时报》虽有一部分資本，但从未对于事务上及編輯上有所干涉，即罗、馮两君所写的論說，亦就事論事，未尝为保皇党有所张目。不过最初的《时报》曾持君主立宪之說，这非仅《时报》

为然，当时上海的所谓一班维新派人士均持此议，无庸諱言。

《时报》初創，虽然在上海报界一新耳目，如提倡教育，注重文艺等等，然当时上海市民还是守旧的多。上海是中国一大商埠，尤其是商人，囿于故习，向奉申、新两报为准繩，因是《时报》銷数，未能发展。适其时美国华工事件发生，吾国上海工商界群起反对，抵制美貨，《时报》首为之倡，于是銷数大增。（当时商民憤怒，甚至有提議不看《新聞报》者，以《新聞报》有美資也。）《时报》本埠銷数，向来远不及申、新两报，然而外埠銷数往往超过之，即如苏州一处，曾日銷三千份，以苏沪火車既通，上午即可看当日报也。

辛亥以后，康、梁方面在《时报》一部分的資本，便即拆出，《时报》即归狄楚青独資经营。其时康、梁亦无意于此，罗、馮两主笔早已离去。自从清朝政府被推翻以来，“皇”之不存，“保”于何有？保皇党早成为不名誉的名詞，仅足供人笑罵之資了。

至于《时报》的经济，可云一直在紧张阶段中。幸而狄楚青同时经营一书店，曰“有正书局”，每年頗有羨余。于是以有正书局的盈余，补助《时报》之不足，然亦煞費苦心了。最后，《时报》经济益复支絀，而狄楚青篤信佛教，更厌倦于此新聞事业，便让渡于黃伯惠办理了。

辛亥以后，狄楚青又創辦一《民报》，延楊蔭杭（老圃）为主笔，則純粹为民主作风。卒以经济不继，支持至两年停刊。

(三)

辛亥革命的前夕，有《民呼》、《民吁》、《民立》三种报纸出版。《民呼报》創辦于清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民吁报》继之，但皆寿

命不长。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秋,《民立报》成立,那时执笔者为于右任、宋教仁、范鴻仙、吕志伊、王印川、章行严諸人,那是提倡革命的先行队。

《神州日报》則別树一帜,为皖人的机关,曾忆名画家黄宾虹一度亦曾为其主笔,余已不甚记忆。《时事报》、《輿論报》又合并而为《时事輿論报》,最后遂为《时事新报》,主其事者有不少名人。

辛亥革命以后,有一个最熱鬧的,却是《太平洋报》,其間大半为南社人物。这个陣容中,社长是姚雨平,他是广东人,虽然他不是南社社員,而編輯部里如柳亚子、叶楚伦、苏曼殊、李息霜(两个后来都是和尚)、余天遂、林一厂、胡朴安、姚鵷雛等,全是南社中人。还有陈陶遺是顧問,朱少屏是干事。可惜好景不长,这个报亦仅如曇花一現而已。

当时,南社中人散布于上海各报者甚多,如《民立报》之宋教仁、范鴻仙,《民权报》之戴季陶、汪子实,《神州日报》之黄宾虹、王无生,《天鐸报》之李怀霜、汪亚云,《大共和报》之汪旭初,《民声日报》之黄季刚,《时报》之包天笑等等,也都是南社中人。

其次,再說到外国資本所经营的《申报》、《新聞报》了。他們对于辛亥革命,有如隔岸观火。他們还怀疑于辛亥革命的未能成功。他們所揭示的目标是商业性质。他們如上海各洋行一般,呼华经理曰买办。所以革命之成功与否,和它們实无多大的关系,但求銷数不减,广告日增,于願便足了。

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新聞社,真似雨后春笋,爭长怒茁,屈指計之,当不下百余家。但有的二三年而逝,有的二三月而夭,前仆后继,此长彼消。及以后帝制忽兴,軍閥群起,随政治而变迁,則又另換一局面了。

我以衰朽余年，記憶力恍如隔世，偶然就所想到的，追述一二，却是語焉不詳，且疏漏甚多。同志諸公，当时頗多身臨其冲者，必能詳記其情况也。

辛亥革命在浙江

葛敬恩

在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省的革命中心力量在新軍，这是人人皆知的。但这中心力量是如何形成的，多数人却未必皆知，各方面的看法也很不相同。孙中山先生对于浙江革命力量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这是肯定无疑的。还有像徐錫麟、秋瑾、章炳麟、蔡元培等党人，或挺身赴难，或振臂疾呼，激发了其时的知识青年，同样对人们思想上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也都是事实。不过除此以外，还有若干人，他们所作所为也曾起着更直接的影响和作用，而其事迹在当时却似东鳞西爪，后人記載亦仅若隐若現，使我这个身与其事的人自觉不能已于言。謹记录当年有关数人的若干事情以及浙軍的杭州起义、南京赴援等等重要经过如次，亦仅勉記所及而已，至于傳聞臆断之說則宁付缺如。

(一)伍元芝、蔣尊簋、黃郛有关辛亥革命的若干事迹

关于伍元芝

伍元芝号兰蓀，江苏省江宁府上元县人，前清进士，改官浙江，任浙江武备学堂总办(即校长)。他可以說是浙江新軍中革命思想的播种者，就我而言，更应当說是我的恩师。他表面上沉默寡言，

暗中却支持革命不遗余力。他在武备学堂经手招收的学生，有第三、第四、第五期正則科和两班速成科。这三期正則科的学生是全校最优秀的，也是后来在革命事业中最为积极、最为得力的。

当时因需要人才，而正則科年限既长，人数又少，所以另创办速成科，挑全省机关、部队和旗营中已任軍职而未受过新軍教育的人保送来校，考选录取。这些人年龄比较大些，文字和学识也比较差些。因为要进武备的人实在太多，正則科、速成科都来不及容纳，所以又添加了速成附科。这是专凭文字、学识和思想挑选的，其中着实有些优秀的人。伍兰蓀为了勉励他们，特亲撰一付对联，贴在速成科教室的門上，“所謂速化者耶，及其成功一也”。

武备学堂全体数百名学生毕业之后，先后調进了新軍部队，充当各級軍官，有的人还去担任文学堂的教师，从省垣的高等学堂（即浙大前身）、中学堂以至外府县的中学都有，人数很不少，像秋瑾等主办的绍兴大通学堂、绍兴府学堂等就有好些同学去参加，都直接間接灌輸了革命思想。

我在光緒二十九年春考入了武备学堂第四期。章程規定年齡为十八岁至二十五岁，我当时才十五岁，年岁和体格都够不上，就虛报十八岁报考。由于体态与所报年齡不符，引起了伍兰蓀的注意。他在考試过程中曾两次亲自問我年岁，虽然有所发觉，但他感到我意志坚决，因而有心提携，并未揭穿，准予录取。在开学那天，全校新旧学生在总办和教職員率領下齐集在大厅礼堂行礼之后，总办好像也沒有怎么多說話。我抬起头来看見大柱上貼着一付很大的对联，是：“十年教訓，君子成軍，溯數千載祖兩宗風，再造英雄于越地；九世復仇，春秋之義，願尔多士修鱗養爪，毋忘寇盜滿中原。”我当时似懂非懂，大家說这是伍总办亲笔写的，好得很，我也

就以为是好得很，直到后来我渐渐长成，才一天天地懂得了它的好，对于伍当时那种大胆革命精神也就更加佩服了。

那时学堂除了中国教习之外还有好几个日本教习，他们专教军事和外场功课，而外场课程是十分重视的。我因年幼体弱，内堂功课虽很能应付，而外场功课很落后，每年冬夏二次大考，总是靠内堂分数来平均，以补外场分数的不足。日人总教习一再提出，我不能当军官，应予以及早开除。伍每次都婉言解释，力予迴护。伍当然不是仅对我一个人，凡是同学中思想前进、好学奋发的人，他都是十分奖掖鼓励，多方照顾。有些同学因为功课好、思想好，他就不等他们毕业，提前保送出洋留学。下文所说的黄鄂亦其一例。所以伍在武备虽前后不过四五年，而其爱国思想、革命精神却不仅贯彻到全校学生，而且影响到后来浙江新军整个部队。

关于蒋尊簋

光緒三十一年秋，浙江办了一个体育会，在杭州金衙庄地方建了一个体育场，开了运动大会。其时蒋尊簋已毕业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他的体育运动很有名，时适回家路过杭州，就公请他做了运动会总裁判。有一次蒋自己表演体操，观众大为称赞。光緒三十二年，蒋应浙江巡撫张增敦之聘，担任了浙江新军第二标标统，在杭州望江门外海潮寺择定地址，开办一个弁目学堂，以训练部队的初级干部。这年夏季开始筹备，入秋即招生入堂。其时全省闻风而至的人着实不少，但有限额，仅录取了一百八十人。蒋还请调了本省武备出身的许多同学组织了开办第二标的主要干部。他先组织了第二标标本部和第一营又一队的干部，再把这些人分成两个学生中队，每中队分四区队。我在上年已毕业于武备学堂后，同

周凤岐、夏超、斯良等都在本堂任教官，至此被蔣調来二标任第二中队第四区队队长。蔣因我年紀尚轻，只十八岁，特在录取新生中挑选二十几名年紀同我相仿的組成这区队，命我負責訓練。我这区队后来经蔣評为成績很好。蔣对我特別关怀，也特別严格。我在担任一般教练之外，蔣还叫我在課堂上任教野外要务一科，其实我們都是才出学堂的人，对于野外勤务毫无经验，根本外行，教課不过是紙上談兵。我因蔣的多方勉勵，教課格外認真，学生們也特別乐听这一課。其后辛亥革命浙軍援攻南京，我們才初次对野外勤务得到一些实战的经验，也可以想見我們那时的幼稚。

蔣办理弁目学堂十分認真，全标全堂，人人衷心拥戴。在次年春季弁目学生毕业之前，举行了一次野外演习，以测验学生所受的教练程度和野外勤务的能力。一路演习，从杭州一直行軍到紹兴，来回都是徒步的。在紹兴，大家会見了秋瑾等，其时干部和学生中已有若干人加入了光复会的。

在学生毕业之前，已着手准备征兵工作，我們許多人被派为征兵官。征兵在浙江还是初次，仅有其名，实际还是募兵。不过全省因为听说武备、第二标弁目学堂和蔣伯器的关系，应征的人蜂拥而至，不多几时即征足逾額，分配在原定的一营一队。另外还成立了一个学兵队，駐在凤山門外万松岭的敷文书院，为再扩充部队时培訓干部，我又被調在这学兵队任区队长。成立的这些部队中，文理暢通、思想进步的人很多，后来浙江成立第二十一鎮(师)时，就隱隱成了全鎮的骨干。第一标起初好像落后些，后来亦受到影响，同样进步。新旧之間无甚区别，因本来都是出于武备学堂一体的。当时第二标中也有少数非武备出身的人，但相处毫无派別成見，只有团结互助，这正是蔣伯器以身作則之功。

蔣除創辦了弁目學堂和第三標之外，還幫助成立了陸軍小學和炮工學堂，並介紹了金騏（號季翹）為陸軍小學和炮工學堂總辦。這兩所學堂對於後來浙江陸軍特種兵的發展和辛亥革命都起着直接的重大作用。蔣挑了好些武備和弁目出身的優秀分子去充當兩校幹部，所以兩校都辦得很好。蔣還挑選了好些弁目畢業生保送投考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炮工學員畢業之後，這學堂就停辦了。陸軍小學因總辦金騏他調，換了張復泰繼任。

光緒三十三年秋，蔣去直隸省河間府參觀大操時，得知江蘇省第九鎮的編練已正式完成，是年亦在舉行大操，就特電浙督練公所推派我和朱瑞、陸殿魁、柯勳等前去參觀，這在無意之中對於後來辛亥年浙軍援攻南京之戰有很大作用，因當時第九鎮的大操正是在麒麟門、孝陵衛一帶舉行的，我們因此多少認識了那一帶的地形，辛亥年就真的在那裡激戰了一場。

經過數次征兵，兩標部隊已接近完成建制。接下去該是成協（旅）了，協統一席很显然应当是屬於蔣尊簋了，豈知北京突然派楊善德來浙充任協統。楊以剪辮子是革命黨象徵，應當嚴行查辦為借口，想對蔣來個下馬威。第二標自標統蔣尊簋以下全部是光頭，這自然使蔣覺得很下不去。楊還要部下見上司須請安打千，犯了錯處要跪下來打軍棍等，有意同新軍為難。同時，浙江遵照北京的規定，成立了督練公所，以袁思永為總參議，丁劍秋為總辦，重重上司，使蔣做事十分為難。尤其是自徐錫麟、秋瑾等案先後發生之後，外邊很多知道蔣同他們是熟人，就影響到省當局對蔣的信任。蔣感覺到再搞下去是會發生問題的，就此辭職而去。是時第二標第一營管帶（營長）蕭星垣（號紫庭，湖南人）原是老營務出生，挑入浙江武備第一期畢業，又被遣送留日，在士官第一期畢業，而且也是

参与了第二标的創建，为人又善于敷衍逢迎，经楊順水推舟地加以提拔，就升任了标統。时值清慈禧和光緒之喪，軍隊中都須持服举哀，行礼时还要三跪九叩，我們滿肚子革命思想的青年軍官真是忍无可忍。而蕭最善做官，遇此机会带头做得格外起劲，以邀信任。我实在看不过去，也只好辞职回家。次年浙江陸軍小学发生風潮，有督練公所王燮阳、虞廷等从中鼓动，風潮鬧得很大。总办張复泰本来作风恶劣，被查办撤职。我在那时調进了陸軍小学任兵学教官兼学生队长，以資整頓風气。其实这些学生都是本质很好的。

蕭星垣真会做官，官运也好，会浙江扩建新軍为陸軍第二十一鎮，除原有的协作为四十一协外，又成立第四十二协。蕭因緣机会升任了协統，居然与楊善德并肩了。二十一鎮統制(师长)一席按理应属于楊，岂知那时北京中央軍事机关如軍諮府、陸軍部、練兵处等重要人員是留日士官回来的居其多数，蕭本是士官前輩，托其中熟人暗中活动，竟被任第二十一鎮統制。楊大吃一惊，知道上了大当，只好乖乖的滾蛋，新軍中人心却为之大快。

关于黃鄂

黃鄂号膺白，浙江杭州人，光緒三十年春考入浙江武备学堂，我們开始认识。我为二年級，他虽长我九岁，却是一年級新生。我因見他为人慷爽，学识优良，对他很是欽佩亲热。他在諸同学中不久便成为突出人物，并且为学校当局所賞识。他在校二年，未及毕业，即破例膺选提前派遣留日，先进振武学校。因他长于算术、地理，振武毕业后，被选入參謀本部的陆地參測量部(即陸軍測繪学校)学习。

黃在留日时期参加了同盟会的組織和活动。他每年回来时常

和大家集会几次，讲讲日本的国情、远东和国际形势等。他把在日时自己所編譯的书刊送給大家看，还記得他翻譯过《旅順实战記》一书(原名《肉彈》，是日本軍官櫻井忠温所著)。尤为重要的是他暗中收集了好几种有关战时勤务的秘刊，給我們中間若干人慎重保管閱看，这对我們在辛亥年初出茅庐的作战起着极大的作用。他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光緒三十三年那年暑假，他与吳思豫同时回国，吳回故乡嘉兴結婚，邀黃替他证婚，他們二人乘便来到我家，介紹我参加了同盟会(我未先参加光复会)。由黃引进加入同盟会的人很不少。这时黃还和十多个同学組織了一个名叫“丈夫团”的一小組織，是黃自己和我說的，閻錫山和若干北方人都在內，张群好像亦在內的。黃和陈其美、蔣介石是換帖弟兄，陈排行居长，膺白次之，蔣第三。后来他与张群也換过帖。黃如期毕业后，到了北京，被派在軍諮府第四厅供职，这时已是光緒末年。黃暗中与党人联系，浙江方面的朋友和同學們当然很是密切，像江苏的赵声、冷遯和伍崇仁(浙江武备毕业，是伍兰蓀的侄儿)等也不断联系。到了辛亥那年，黃的官阶虽然还不过是一个少校，但在軍諮府內却受到同僚們的重視。清室亲貴們企图了解党人的內情，以便破坏革命，想选择一个合适的人南下活动，不知为什么竟糊里糊塗挑上了黃郛。黃与陈其美原是同盟会的密友，因此他一到上海便立即同陈其美合作起来。所以以后其美做了沪軍都督，黃就当了都督府的參謀长。他們以浙江新軍为后盾。当上海光复的前夕，黃郛凭借他和浙省新軍中人过去的关系，他自己并派人去杭州再三敦促杭州方面軍人同时行动，在鼓动和組織方面都尽了很大的力量。

(二) 杭州光复

光复前夕的一些重要酝酿

杭州光复前夕，关于究竟何日独立，何人做都督，如何发动，还应有什么准备等问题，大家的意见还没有统一起来。而上海来的人又接二连三地催促赶快行动。有一次在大狮子巷宪兵队的童保暄那里集会，提出了这些问题，但因会上人数不多，仅能解决独立要越快越好这一点，关于人选等问题还要等到下次在顾乃斌家集会时让大家来决定。我同陆军小学的另一队长周亚卫（浙江嵊县人，弁目学堂毕业，以后还毕业北京和日本陆大，学术优长，忠诚革命，和我最为密切，他最热心于光复会的事情，在海潮寺当学生时，曾偷换了和尚衣服潜赴绍兴企图营救秋瑾）觉得一向比较负众望的像顾乃斌、朱瑞等，在此紧急关头不够积极，鼓不起劲来，深恐耽误，甚为焦急。二人乃暗商写了一封匿名信给顾乃斌，威胁他，要他即日起事。在顾家开会这一天，顾自己是亲自到的，还有代表朱瑞和八十一标的俞焯，代表八十二标的傅孟和吴思豫，宪兵队的童保暄，炮标徐士鏞，工兵来伟良，我和周亚卫等代表，还有褚辅成和上海来的一二人，此外还有同顾乃斌同住邻居许行彬，是浙江諮議局議員（他同顾都是青帮中同帮弟兄）。开始讨论几时起事，决定不下来。随后又提到举何人做都督，顾乃斌涨红了脸：“有人吓我，要告我的密，由他们去，我不管。”大家就相对默然。我同周亚卫自知闯了祸，不敢响。接下去问到俞焯：“介人（朱瑞号）怎样？他应当义不容辞了！”俞说，朱近来身体很不好，而且代了标统更忙得转不过身来。顾、朱二人向来热心革命，是众望所归的，现在都推得精

光，大家呆了。再問褚：“慧僧（褚輔成号）怎样？”褚也是个十分热心的人，他說：“最好推一位有实力的人，或者請湯贊老（湯寿潛号贊仙）来做也好。”有人說：“湯好是好的，不过現在立刻要做事情的。”大家又說不下去了。这时童保暄呆了一陣，他臉紅紅的說了一番义正詞严、慷慨激昂的話，說得大家无話可說，只說：“伯吹（童別号）的話很有道理。”顾乃斌說：“伯吹的話很好，我們不妨就請伯吹临时担任一下都督如何（童那时革命历史和軍隊資历都还很淺）。”大家說：“好的！好的！好的！”童只好默然接受。接着又提到起义日期問題。我向来喜欢多說話，这日自知闖禍，一直默不作声，至此我又說起話来。我說：“这一行动进行复杂，一要准备得好，二要夜間举事，計算九月十四日月光正好，行动方便，而時間上也够来得及。”大家贊成了，再談如何准备行动。童保暄提議推我做临时參謀，計劃一切，草拟命令，大家都很贊成。我想这件事情虽然繁重，但形势上也义不容辞，就只好承担下来。这半天的會議算是决定了浙江当时的命运。上海的代表立即回去复命，做他們那边的准备工作，我們希望两边能同时起事。我得到周亚卫的許多帮助，同童保暄商定了起义的命令，在极其机密之中向最負責的人員暗中一一传达妥当。

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浙軍部队向来只有正规的枪炮，大家鉴于武昌的起义深得力于炸弹手枪，觉得我們行动之际也非有此不可。炸弹自己不会做，而且不会放，手枪极少，都是老式不堪用的，因此要求沪上党方帮助，这个要求同时也微含一些要挟的意思在内。数经磋商，陈英士和上海革命团体方面竟完全慷慨答应，并允許等到我們起事前一二日，准定派敢死队来一同参加起义，后来果然派了敢死队数十人陆续混进了杭州，手枪炸弹亦运来不少。

当时人们何以要有那许多推托迟疑，难道这些年来所培养的革命精神都是假的么？与前面所说的浙军士气如何旺盛，精神如何团结，不是完全矛盾的么？但细细辨味这种情形，也不能厚非。徐锡麟、秋瑾的先后蒙难，浙江人心所受影响是很深刻的。在专制时代，造反是要杀头的，二三十岁的小伙子虽然满腔热血，究竟还没有真的干过革命这件事，如今真要举事了，临事而惧，自不无可原。好在大家还固守岗位，少有规避。仅督练公所科员吕公望借题回籍永康县原籍，说是去同他在处州缙云县的朋友吕凤樵商借革命队伍应援杭州（路途遥远，那时只有步行）。其实当时在杭州不但整个新军已运动成熟，连巡防队、警察多数也已联系好了，此举即使出于必要，也难免远水不救近火。吕原是负责联系抚台衙门卫队的（二年多以前吕是由抚台卫队考送保定陆军速成的），此时忽然走开，叫人很不放心。所幸别的同志都能迅速布置妥当，届时尚能达成任务。吕这一走，还闹了两个小小纠纷。一是吕所借的数十人，号称革命队伍，在来杭途中被已经起义了的巡防队拦截，发生战斗，互有死伤，后急电杭州都督府才予制止；二是童保暄被举为临时都督，吕觉得自己临走时托过童，并将图章托童保管，何以童竟自居都督，不免稍起误会。但人们认为童的态度是对的。

在九月十四日那一天

短短的几天好像过得特别慢，我们负责的人一方面要布置妥善，万无漏失，一方面又心事重重，只怕走漏风声，酿成大祸。结果还好，总算悄悄地把事情都布置妥了。十四日到了，这天天气特别好，我未明就起床，心想如今就有三长二短也不怕了。这时上海敢死队已陆续到杭，分住各处。我们这天的目标是：一、攻取抚台衙

門；二、攻進旗營，迫令繳械；三、占領報國寺軍械局；四、占領羊市街城站火車站，設立總司令部；五、管好銀行、電報局及外人住戶等；六、維持全城治安。但我們部隊的主力駐在南星橋和寬橋，城內部隊也分駐上下城各處，首先要開放各主要城門，讓城外部隊進來。各城門的守門警察大致都已聯繫過。我們對城內部隊還分別規定：上城部隊負責開放望江、候潮、鳳山等門，下城的負責開放艮山、清泰等門。到了夜半，行動開始了，上城部隊同南星橋進城的部隊會合，向撫台衙門進攻，由八十二標一營督隊官傅孟和同標二營管帶徐卓等各率所部潛進包圍。還有上海派來的敢死隊也會合跟同進攻。撫台衙門因有內應，僅開了數槍，投擲幾個炸彈，就攻了進去。衙門起火，撫台被捕，順利地達成任務。下城的和寬橋進城的部隊會合王金發敢死隊進攻旗營，攻到天明未能得手。此時炮兵已在城隍山放列，準備候命襲擊旗營。報國寺軍械局亦有內應，很快占領。帶隊的連長陳國杰十分勇猛，進去太快，被守兵打中了一槍，彈傷額角，幸未致命。城站是陸軍小學學生隊負責占領的，我同周亞衛任指揮。這天傍晚，我們讓王金發的敢死隊陸陸續續混進陸軍小學來分配手槍炸彈，這些東西是連日由上海運來暗藏在我和周亞衛等房內的。我們把敢死隊數十人打發完了（他們是去會攻旗營的），我們就集合自己的學生隊了。學生隊是陸小第二、三期學生組成的（第一期生在上年冬畢業，已去南京、武漢等處進陸軍中學），總人數不足二百，都是十六七歲到二十來歲的青年，是我同周亞衛和學長等六七人帶領的，這天出隊的人特別踊躍，連在病房里勉強能起床的人都歸了隊，他們都爭先恐後地要求出發，足見青年們是如何熱情。我們留下很少的人守住學校，學校里是瞞上不瞞下的，只有總辦王燮陽、監督劉春台被蒙在鼓里。我們隊的

任务是占领城站火车站，帮助建立总司令部；遇有必要，并须支援攻取报国寺军械局，预定在占领火车站之后，立即开放两处铁路城門，放正规部队进城。当时我们以战备行军部署出了校門，从蒲場巷（现在大学路，是求是书院和武备学堂的原址所在）向南往城站前进。经过报国寺口，遇到了进攻报国寺的部队，知道他们除上来时稍有误会外，看样子已可顺利地打进军械局了。于是我们就继续前进，进入羊市街。时在半夜，月明如水，除自己部队轻微的前进声外，真是万籁皆寂。我想这时撫署、旗营那两路不知怎样了，就加速前进。到了城站，遥望西南方向，天际一片红光，知撫署方面已在进攻了。城站站长王涛等事先已联系过，我们一到，就出来热情招呼。我们立即派出警戒，在車站附近布崗，并派分队去开放铁路城門。笕桥的騎兵队首先进城，到車站来向我报到。我一看这队长正是鍾玉成，他先是弁目学堂我的区队的学生，后又保送考进保定陆军速成学堂騎兵科毕业，回来派在笕桥騎兵营当排长，別了三年又見面了。他的数十騎铁蹄扫轉城站一圈之后，全部下馬听我指揮。我就叫他加派人去守住清泰、候潮两处正式城門，并向各路巡邏联络，后来知撫署、军械局都已得手，童保暄和预定应当在此会合的人也陆续来了，紛紛提出汇报。未几，天已渐明。这时敢死队也到城站来汇报，来的有若干敢死队员，其中有女队员二人，就是尹銳志、尹維俊姊妹，是秋瑾生前最亲信的学生。

各起汇报的结果，只有攻旗营的未能达成任务，其余全部順利成功，街上已多处飄揚白旗，許多人左臂上已经纏上白布，这是事先所規定的。同时就有人报告說，看見貼出告示，是由临时都督童保暄署名的，还說，有些人怀疑童是何許人，說大約一定是革命党了。上午，在城站附近的人越集越多。我们为了便利总司令部的工

作和不妨害車站铁路的业务(当天拱宸桥、閘口綫照常通車, 沪杭綫直通嘉兴), 就商定搬到梅花碑织造衙門去办公(后来的省长公署)。

杭州光复后的一些問題

杭州光复之后, 各种問題不断压到我們头上来。当时最急需解决的重大問題如次:

1. 童保暄临时都督声望还不够; 2. 旗营如何攻取; 3. 軍事全体指揮需要資历高些的人負責; 4. 軍政重要問題如何協商討論; 5. 各府县倡义独立如何处置; 6. 省財政如何維持; 7. 如何支援武汉、沪宁。

关于第一个問題, 童本人很客气, 极希望速得替人。大家主张請湯寿潜来做都督, 一面派人, 一面电沪敦請。关于第二个問題, 旗营毘連市区, 居戶稠密, 不可正式作战, 决定劝降与压迫并用, 经过数日的往返磋商, 終于就范。关于第三个問題, 請周承蔭担任浙軍总司令。周系八十二标标統, 留日士官毕业, 人很正直, 資历比較还好, 但过去未正式参加过革命工作, 曾由吳思豫多次联系, 他不反对革命, 亦不决然贊成, 至此大势既定, 他就接受了, 即日起执行职务。关于四、五、六各項, 均陆续由有关主管方面共同作了决定。关于最后一个問題, 据聞武汉方面被北軍攻击, 陷于苦战状态, 情形很严重, 必須迅集各方面的力量支援, 我們虽才宣布独立, 亦应尽可能設法給以援助。南京第九鎮起义不成, 处于困境, 我們当联合上海力予支持。

类似以上的种种問題每日有新的发生, 也每日有变化。重要的問題接二連三地加上来。在这些日子里, 我們差不多有点精疲

力尽，但还是鼓足精神来处理。

(三) 馳援南京

緊急赴援，道經上海

上海是各种革命势力汇集的地方，在沪軍都督府未成立之前，各党派早已十分活跃。都督府成立之后，在千头万绪之中，总算有了浙江的独立，使他們内部和一般人心得到了很大的稳定，而且陈其美、黃郛他們一向同浙江有深切关系，浙沪之間就更形密切。当时上海的严重課題就是支援武汉和南京的問題，尤其攻取南京更是刻不容緩的事情，但自己还派不出兵去，这自然要向浙江請援了。其实沪、杭两处独立，前后相差二日，杭州也还是在紛乱之中，說是要調很有力的兵力开往南京，这在平时开拔已非簡單，何况二十一鎮成立不久，其中未曾充实的一协分駐浙东，正待訓練补充，在省垣的也是装备缺乏。但上海既一再催促我們赴援南京，经过商討，也就毫不迟疑，决定举浙省全部可調之兵立即悉数出动，而且人人踊跃，与前节所述杭州举义前夕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这是由于大家认识到南京得失关系革命形势极大，决不容許从容补充然后开拔，所以只好一面登程，一面沿途张罗补給。

浙江究竟可以出多少兵呢？整个省垣附近也不过只能凑合約近一个混成协，而且还要对付旗营，自己不能一兵不留。再四筹划，将朱瑞的一标(八十一标)全部应調，八十二标标統周承蒞既留省当总司令，决定就将他标內的一营亦拨归朱指揮，这算是正式的新軍步兵，外加巡防营二营，每营人亦不过二百多人。騎兵不足一排，加上少数乘馬宪兵，也算騎兵一队。炮兵一营实只二連，有六

門德國克魯伯廠制老山炮，恐怕還是普法戰爭時代的舊炮，被清朝買來的。工兵還好，有一連多些（炮、工兵技術訓練都比較好，是前炮工學堂打好基礎的），輜重兵則僅有其名，除各部隊自帶一些行李由輜重兵數名押運外，並無正式輜重。這個組織自行定名為浙江攻寧支隊，而不稱為混成協，因為那時這一革命發動也是瞞上不瞞下的。上級軍官如督練公所袁思永、丁劍秋、鎮統制蕭星垣、協統蔡成勛等，還有中級較高的許多人都不使他們知道，更不使他們預聞。主持這次革命的多數是少校和上中尉級的，僅標統周承蔭事前曾由吳思豫聯系過，亦是後請出來的。所以朱瑞以一管帶代理標統，率領此較大組織的部隊，只好稱為支隊長，後來也有稱他為朱司令的。至於司令部的組織，因人員都是各單位隨時抽調的，人事更是簡單，連參謀長也是到了鎮江才臨時推舉出來的，計參謀呂公望、葛敬恩、徐樂堯、吳元鈞等四五人，副官傅其永、裘韶二人，參軍周元善一人，和勤務護兵等六七人，另附傳令用騎兵憲兵等約二十餘人。所謂什麼處、什麼處長等等並無其事，那是攻城得勝，到了南京之後才擺出場面來的。

九月十四、十五這兩天，因為連日連夜辛苦忙碌，各人弄得肝火大旺。十六日下午在總司令部開軍事會議，這時周承蔭才被請出來，童保暄已不管事，湯壽潛還未曾到，集會時紛紛攘攘，有些人自認為立了大功，就要求升官發財，丑態畢露，甚至捶台拍桌，動刀弄槍。幸而形勢逼得很緊，一面我們比較負責的人已先有成議，同時湯都督已定次日由滬來到，這才大家齊心赴援，這是十七日傍晚決定的。十九日傍晚出征，第一列車就由城站登程了。我被朱瑞面邀同行，傍晚同支隊司令部出發，過上海已近半夜了。

我們先派呂公望帶二三人去上海打前站，呂同光復會的人比

較还熟，但此时光复会方面李燮和仅能在吳淞分树一帜，别的党人亦不很得势，无能为力。陈其美其时并无成見，他本人亦和光复会有关，和呂亦相识，对于浙江的事尚肯支援商榷。我們有了上海这样的供应基地，这次进军順利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們来到上海南站后，因沪杭、沪宁二线尚未接軌，官兵皆空身通过租界前往北站，武器和重要軍用品則用船运到北站麦根路碼頭上岸轉車。上海的工商各界盛情欢迎，都督府更派員并令許多商团团員和警察沿途引路，悉心照料，連許多外国妇女們也拿食物用品到站相贈。官兵們欢欣鼓舞，順利到了鎮江。从杭州出发，部队是分在城站、南星、艮山和拱宸等站乘車的。我們对于火車輸送和兵站勤务等等向无经验，也未学过，加以列車缺少，仅此少数部队前后运了約三天，許多零星部队和軍用品还是后来补充上去的。但毕竟由于以前看过一些黃鄂带回来的軍事书籍，多了一些书本知识，我們总算依样葫芦完成了部队的初次輸送任务。

集中鎮江，孤军前进

朱瑞派屈映光(前朱在安徽測繪学堂当总办时屈是地理教員，也与光复会有关，浙江临海县人)为兵站司令，同周六介(与屈同乡，和光复会有关)等在上海办兵站。他們当然都是外行，幸有沪軍都督府帮助一切，并得着工商界和党人們的尽力相助。呂公望在上海联系数日之后，也轉到鎮江，我們參謀人員要有一个帶头的，就公推呂为參謀长(朱瑞也叫我推呂，我同朱是从小亲密的同学，无話不談)。朱瑞叫我負責起草有关作战和其他各項重要命令等。我因六七年来担任着队长和教官，又看过黃鄂所带回的重要书刊，对于这些事情多少有些研究和把握，朱向来是知道的。此时上海

新聞界像《民立報》于右任等，朱也介紹我與他們會面，約定由我隨時供給軍事新聞，尤其是重要戰報必須隨時發給他們。

我們部隊在杭州出發時，受湯都督的命令，歸聯軍總司令徐紹楨指揮進攻南京，所以我們到了鎮江就一切向徐請示報告，徐亦很客氣對待。但這時他的第九鎮經過秣陵關、雨花台的挫折，手頭已無多少兵力，而且有些部下妙手空空的，還要自封為軍長師長，需索餉項，要求補充裝備，弄得他很為難。他看我們來勢不小，却一點都不向他要求什麼，他反覺不好意思，自動問我們有何需要。我們說，初到人地不熟，希望給若干帶路作嚮導的人，還想招雇若干伙子，幫助搬運物品。他說，這些都容易辦，就把他自己身邊僅存的衛隊騎兵一排（排長謝祖康，號振英，江蘇鎮江人，陸師畢業，朱瑞後期同學）撥給浙軍使調。我們表示很感激，還希望領到些南京地圖。這却難了，徐自己也沒有幾張，就叫參謀拿一份給朱瑞使用，別的再想法。前面曾說到，光緒三十三年蔣尊簋曾派我同朱瑞等去南京看秋操，當時我曾領到過一份南京朝陽門外孝陵衛、麒麟門一帶演習地點的地圖共四張，回杭後一直放在圖囊內。我此次出發，帶了圖囊，恰巧這幾張圖也被我帶了出來。我當時想朱瑞和徐樂堯是南京陸師出身，可能有地圖，但到了鎮江，我向大家一問，除我之外竟無人能拿出一張地圖來，這就很窘了。幸而朱瑞、徐樂堯和上面所提到的謝祖康，還有八十二標一營管帶徐則恂，都是南京出身。我於光緒三十三年來寧參觀秋操之後，又於宣統二年帶領浙江陸軍小學全體學生隊到寧參觀南洋勸業會，還帶隊到明孝陵調陵並巡繞一周，對附近地形還多少記得些。別的人多數都未來過南京，此次作戰只好說是暗中摸索了。我們此次出兵的匆促無備，從此更可想見。說來好笑，总算靠了我的四張圖和徐給朱的幾張圖，

就完成此次作战任务。我們也想尽方法，請徐总司令設法再要了几张此次所最最必要的图赶送上海兵站設法翻印，但等印到好送来，我們已进了南京城了。

沪軍都督府和浙江的上海兵站对我們的供应实在好，軍用品、食品都源源得到补充。我們的炮是老式的，所备炮弹极少，作战起来是很困难的。黃鄂得知此事，立刻叫高昌庙制造局查明还存有 哪些炮弹堪以拨用。据报合于我軍这种炮的炮弹已沒有了，倒有新式的管退山炮十二門，还是根据买来的外国样品仿造的，业经試放，成績很好，炮弹亦不少。我們立派炮兵营管带张国威（湖北人，浙江武备第三期毕业，留日士官炮科以优秀生毕业）去检查，复称“炮弹充足，炮极好”。黃立即将十二門新炮全部拨給浙軍，发交兵站运鎮（我們的旧炮十二門就留在鎮江，后来运还制造局作为抵換，大批炮弹就作为奉送了）。我們得到这些炮，如获至宝，但是炮队的馬匹出发时帶得本来不多，炮队編組既有改变，馬更不够，于是又由沪都督府設法买进跑馬厅淘汰下来不适合竞赛的馬，向各馬車行商量貼給費用，掉給已经教好的馬。所以我們的炮很快就活动自如了。此外还选了若干匹馬补充了支队司令部官长乘騎。官兵們对于新炮的操作是在鎮江停留的十天以內訓練成的，这些事都是张国威奔波設法搞成的，連我們急用的望远鏡也是由他向兵站办来的。他的确是个炮兵好手，他部下的姚永安、林显揚也都不弱，很配得上。

在鎮江集中准备的浙軍当时所遇到的极为严重的問題，就是我們同联軍总司令部经过多日联系，看出了他們对于克复南京沒有把握，也沒有很多打算。我們是奉命归徐总司令指揮，听徐总司令命令，我們是坚决服从这个命令的，徐亦靠了我們撑摆門面。可

是他們的所謂什麼軍什麼軍，看來都是有軍無隊、有官少兵似的。我們看到鎮江街上到處正在招兵。據探報，張勳的兵號稱四十營，就人數概算，兵力比我們至少大三倍，他們日日在南京城外各要道活動布防，好象還沒有舉兵來攻的跡象，他們的隊伍是每天回進城去的。我們証實了這些情形，覺得既然眾寡懸殊，與其坐待來攻，不如來一個迅雷不及掩耳，給敵人以各個擊破，倒是上策。我們懇商了徐紹楨。在當時形勢下，他也不好叫我們不要進攻，只好說：“你們好好前進，我這裡立催各軍趕快前進會攻。”我們估計，他的蘇軍、鎮軍等若干部隊還是比較有些把握的，同時另接滬電，桂軍黎天才部就要從上海開到，粵軍不久也就可到達，我們也多少放心了一些。于是就商定了於九月三十日（日期可能稍有出入）由鎮江向南京挺進。計自杭州光復以來，到此才只半個月，中間經過複雜的鐵路輸送，而一切作戰準備、添換武器、改編隊伍，都是在鎮江的十天內急就而成的。

當時形勢，不但敵眾我寡，而且南京又是所謂龍蟠虎踞的石頭城，要是進行真面目的攻守戰，不要說浙軍的四千多人，就是舉江南和浙江所有各色部隊會攻，亦非短時期所能攻破。但武昌既那樣緊急，而山東方面又頻傳張懷芝兵即將南下援寧，形勢是愈遲愈于我不利，目前之計只有速戰速決，說得不好聽些，就是孤注一擲。徐紹楨新敗無力，未能看到此點，陷于消極。我們浙軍乳犢不怕虎，既得徐同意，就貿然而進。考慮到地勢，我們希望吸引敵人主力于孝陵衛以東，一舉擊破之，而且覺得這是很可能的。因南京北西二面有揚子江環抱，玄武湖附近地形低濕，布滿湖沼，都不宜大軍運動，越過紫金山，從它的南麓直到雨花台一帶是很開敞的小丘陵地帶，地勢緩緩向東南傾斜，形成一大戰場，但比較易守難攻。按照

我們的兵力，只好右翼依托紫金山，左翼保留有力兵力以備必要時使用，而在麒麟門、馬群之間求得良好的炮兵障地，敵人主力從朝陽門向我出擊時，我們可以導致有利的作戰。根據這些研究考慮，我們開始行動了。

這時黎天才軍適到鎮江，他因在上海早聞浙軍聲望，向我們暗中表示願聽指揮。我們認為他是聯軍的一部友軍，雖兵力不過數百，也應一切服從徐總司令，我們願儘可能從旁幫助。黎也以情形和地勢不熟為慮，我們就撥謝祖康騎兵排的大半由謝指揮，去幫助黎軍攻取幕府山、烏龍山。謝很熟悉情形，帶黎部由捷徑進襲幕府等山，一舉成功（浙軍記謝大功，並報告了總部，後來謝跟浙軍班師杭州，一直在杭州服務，漸漸升至騎兵團長），謝仍舊還浙軍本隊。黎因此對浙軍更有好感。其時外傳浙軍分兵同黎部攻占了幕府山，即是此事。其實是徐紹楨的兵借給了浙軍，而浙軍又借給廣西軍的，僅此二三十名騎兵，却因此使南京守軍震懾於浙軍的威力，這對於我們以後的勝利實產生了很大作用。

馬群、孝陵衛的激戰

自鎮江出發後，途經高資鎮、下蜀街、橋頭鎮、龍潭等地，中間僅稍作休息，於十月初三日行近南京近郊，地名好象叫岔路口。當晚在東陽鎮附近宿營，夜間戰備警戒。次日一面休息一面準備，朱支隊長並集合各軍官講話加以訓勉，傍晚下達命令。全軍於初五日拂曉前以戰鬥行軍前進，經麒麟門、孝陵衛向朝陽門一帶敵人進攻。先派司令部副官傅其永為將校斥候，帶騎兵七八人未明出發，經麒麟門、馬群向朝陽門方向前進搜索。上午九時行經麒麟門稍息，我和支隊長等行在前衛本隊先頭。那時已是初冬，早晨西風甚

寒。接騎兵斥候報告，他們在孝陵衛附近小山上望見有不少敵人在大路上行走，從西向東而來。接着傅其永自己也趕回報告：“看見大隊敵人前進，並有一騎白馬穿袍褂的將官帶頭，據居民說，這人大約是王有宏統領，他每日出來的，今天帶的兵格外多得多。”我們一面命傅再探，一面我就同朱支隊長說，今天情形好極了，正如我們所料想的，如此可以形成遭遇戰，我們須急進占領馬群一帶高地，妥選炮兵陣地以迎敵。我就據鞍下了展開命令。我身體發抖，幾乎寫不成字，說不清話，可並不是怕，而是冷和緊張。十時過半，已展開完畢，炮兵占領了馬群東南端“五棵松”的小崗，形勢極好，完全可以掃射大道兩側，並完全控制了大道以南廣大的開闊起伏地區。接着炮兵開火，頃刻間命中率很高，這是我們新炮的第一功，這種炮在我國戰史上我想也許是第一次出現，恐怕那時袁世凱北洋各鎮還未採用過。遙見密集的敵人紛紛逃避，那位騎白馬的將軍也倒下馬來。後來據很多傳說，王有宏就在那時戰死的，但亦未經證實。我們望見敵人在紛亂之中兵力亦愈擁愈多。時近正午，我軍人人奮勇，連續躍過幾個山崗，在孝陵衛、馬群之間形成了一場大激戰。我同朱支隊長等都在五棵松附近觀戰指揮。下午繼續奮戰，進展很多，前綫已十分逼近孝陵衛，少數已進入了村落。傍晚天氣轉冷，槍炮聲也漸漸稀疏了。我已草好命令，同支隊長商定立即下傳，布置“戰鬥前哨全綫陣地徹夜”，急速補充彈藥，搬運飯食，更不斷查護傷兵。是日我軍死傷不多，而照我們判斷，敵人死傷則相當重大。

我同朱支隊長匆匆吃了飯，趕快趁新月初落的微光，帶了電筒親自巡視了全部陣綫。可敬可愛的戰友們還是頑強地固守在自己的陣地上，有的已經疲乏得昏昏睡去，有的已是一日沒有吃飯，此

刻还未得到給养，有的冷得发抖（从杭州出发时天还很暖，未能多带衣服），有的手拿食物，吃不进口，在发呆。受伤的人总算经卫生人员处理得快，多数已撤到后方救护。朱瑞同我一一慰问他们，叮嘱他们还要防备敌人的夜袭和准备明天的作战。日没前的“战斗前哨阵地彻夜”的命令有的已经接到，有的还未传遍。我同朱巡视全线一遍之后，回到临时向农民借宿的草舍，已经无力支持，倒在铺开的稻草上，看看好几人已呼呼睡去。副官裘绍还坐在我身旁，我已自己拿不起笔了，就口讲明日拂晓攻击的命令，由裘写好，请得朱同意，就叫周元善找人下达。此时速传令的人都不易叫到，还由周等自己分别送了下去。我叮嘱裘、周等半夜后还要出去巡视一遍，实际上此时已是夜半了。照理，“阵地彻夜”须要调入比较还有力量的部队，撤下过于疲惫的部队，以资接力和休息。“拂晓攻击”更是要增加得力部队以发挥进攻威力。当时我们的形势是极需要如此部署的，但连日连夜的急进，接着又忍饥耐寒，整日激战，况且敌人的兵力足，比我十分优势，我们一再的跃进已将预备力量用得差不多了，支队长手里还有什么本钱好拿出来呢。我心里在盘算，“拂晓攻击”是怕不大做得好的，但怎可不攻击，放弃这许多苦功的成果不采收它回来呢？矇矓中忽听见有人大喊“敌人攻击来了”。我急忙跳起，走出草舍，看到天色灰白，东方已现微红，远处有火光和枪声。我陪支队长急急跑到五棵松炮兵阵地，随处看到我们的部队和炮兵们正在零乱地向前奔向阵地，看来敌人也是拂晓攻击，却比我们占先着了。原来我们的官兵因疲倦和寒冷，夜里不知不觉地渐渐躲入山沟和坟圈中睡着了，“彻夜”未曾做好，晓攻准备还待进行，而敌人却从城内调出了优势兵力部队猛烈进攻了。但是我们部队的战斗精神大非敌人所能比拟，步兵部队坚强抵抗，

炮兵又急速开炮猛射，其中有几門炮的炮手夜間离了崗位，敌襲时竟无人在側，幸賴步兵急进将陣地护住，才免炮落敌手。经过一場激烈混战，双方多有死伤，忠勇的管帶赵膺在此时战死。但終究将敌人攻势大部遏制住。我們陣地第一線仍旧參差地固定在馬群以西，炮兵陣地始終在五棵松山崗上，不断发炮，不稍动搖。后来有人記載这日浙軍吃了大敗仗，一直急退到麒麟門附近，根本不是事实。而且这时虽然吃了些眼前亏，形势却更于我們有利了，因我們本希望把敌人主力吸引出来击潰它，現在是算送上門来的。可是严重困难却还在后面。上午总算竭力苦战，支持下来，下午形势更险恶了，支队长手里已是两手空空，求援报告却雪片飞来，而且陣綫左斜方受到了射击。我們疑是友軍誤射，一再向总部联系交涉，但左方“誤射”更甚。最后总部派了联络參謀史久光（江苏常州人，日本士官炮科优秀毕业）前来慰問，視察情况。我們指給史看了实际情形，史也觉得不对，自告奋勇願去我陣地左方联系，消除誤会。我們借給騎兵二名随史前去。史去不久，忽見有二匹空馬逃了回来，更过一会，一名騎兵也跑回来了。原来史离我陣綫不久，就受枪伤墜馬，被敌擒去，一騎兵想上去救，亦被枪伤，这个騎兵不得已才冒险逃了回来。这才知道在我們左翼射击的，原来竟是敌人，正在包围我們。这险象幸而只有我們司令部知道。左翼被包围愈紧，多少有些向后短距离撤移陣綫。我同支队长等始終立在五棵松不动，看炮兵发炮更猛。时近傍晚，忽然望見孝陵卫村落起了火焰，就有人传说：“我軍有一部已进入孝陵卫，放火进攻，我們要赶快前进。”接着孝陵卫果然火勢大增，看到烈炎騰空，原来是我們的炮兵击中了敌人后方孝陵卫的村舍起火，接連几炮，火勢就扩大了。正在猛攻的敌人此时也显觉惊慌，枪火就零乱起来。在我們这边忽传有上

海敢死队二队(就是前去杭州帮助起义的队伍,在沪休息多日,后因我曾急电請援,又赶快派来的)和一部分巡防队(是前一同出发的二队中未曾赶上之一部)开到,带队的人急来向司令部作报告。我看机会到了,我轻轻地向朱瑞說明我意,朱点点头。我就叫站在身边的号兵吹起冲锋号来,他这一吹,在近旁的号兵也吹了起来,初到的敢死队和巡防队也跟着吹起来了。他們队伍虽很混乱,人数也少,但在这要紧关头,总算是一支生力的预备队。顿时全綫吹起了冲锋号,冲呀冲的喊声响彻四周。敌人紛紛向后乱跑。天色愈近昏暗,孝陵卫的一片熊熊火光愈是熾烈。那时我自己也已胡塗了,竟忘了自己的职份,也不顾着支队长,竟自拔出了开口軍刀,乱喊乱跑,跟着全綫一直前去。穿过了孝陵卫正在延烧的街道,同走的人好象少了些。我恨自己跑不快,更加紧了步度,同跑的人就愈少了。我想跑得快的人可能已进城,只有努力追上去。三三两两的人还在同着我跑,渐渐接近朝阳門吊桥。这地方上年我是来过的,虽已天暗,我多少还认得清。到了桥上,我轻轻着地爬过去,先到的若干士兵对我招呼說:“城門已经关闭,城上还有敌人,要当心。”我心里一急,自忖是不是我們冲进城去部队被敌人关在城内,看看近边大約有四五十人伏在地下。这时四周寂靜,城上的傍兵还在边装枪炮边罵人,新月一鈎渐落到城墙角上,回望东面天际大片紅光,这大概是孝陵卫的火区。有几个认得出我的士兵提議,請参謀官赶快轉去下命令,調大炮上来攻城。我先不响,只在呆想着支队长們和整个部队,后来說話的人多了,我怕在城楼下吵起来,更急于知道自己部队的情形,就答应了他們,爬过吊桥才敢立起身来。这条路我上年来过的,不知怎的却錯走向明孝陵去了。等到自己发觉,轉向东奔,不觉誤墜入盈丈深沟(这些沟是太平天国的战

迹，遍布附近)，四肢擦伤，两腕作痛。立了起来，右手的宝刀、左手的手枪都不见了，大窘。幸而跟在我身边的一只黑白花狗帮了忙。它原是部队厨房所养，无意中跟上火车，带到了南京战场的。这天晚上它也随部队到了城下，见我转回，它也跟了回来，见我摔下沟去，又在找东西，它也帮着找。数步之外草里有些微光，军刀寻着了，手枪却找了好久才被花狗嗅到，我拾了起来，十分高兴。如今只好靠花狗带路了，它很聪明，丝毫不误地把我引到孝陵卫大路上。这时火势已稍减弱，冲呀冲的喊声还在继续。我细看那些喊冲的人已是疲乏极点，都只是在一一条条的沟内有气无力地喊着而不能动。我靠火光观望路上，忽闻有人说：“我们早好进城了，都是支队长慢吞吞地还在这里走。”我听是熟人声音，一瞧原来是炮兵连长林显扬，大约他也和我一样，擅离了自己炮兵岗位向前冲锋的。再一看，朱支队长也在跟着走。我心里一定，急急拉住二人到一座塌倒的墙边，轻轻将我经过情形略为说明，并且认为今夜只好仍布置战斗前哨过夜。朱点了头，林亦不敢响了。于是，我又下了命令，照旧同支队长巡了一遍阵地。这晚比前夜更乱得多了，但也无法。我们实在疲乏无力了，最后还是回到那草舍睡了几个钟头，可是不敢怠慢，微明即起。走出门来，觉得好象已下过雨。我同支队长走到孝陵卫，火势大部已息，还在冒白烟，地上乱躺着战死的辮子兵和不少打死、打伤和烧焦了的战马。孝陵卫的居民带着愁苦的脸色不忍离开他们的焦土故居。对这些居民，我们予以安慰，向他们认过，并答应将来一定负责好好赔偿他们的损失，才稍见他们宽慰。居民们说：“这两日出城来的兵实在真多，昨天下午死伤的也不少，傍晚此地中炮起火，来不及救，烧了起来，后来听见四面号声，他们就慌慌乱乱向各城门逃去了。”我们听了这些话，决定这

天一面休息，一面清理戰場，整理隊伍，並派出斥候和步哨嚴密搜索警戒，同時還向杭州、上海和聯軍總部作了報告，又連續發出許多作戰實情報道給上海《民立報》等報。

攻取天保城

在我此次到這南京戰場之前，我還不知道“天保城”三字。初五、初六兩日的激戰中，我詳細注意了一般形勢，才感覺紫金山的西北角上稍形凸起的那個小小山頭，實控制着南京東部的全局。我們初來時，望見這小山前面建有稀疏的帳棚，但並未十分注意，後來發覺那裏有少數部隊活動。問問嚮導，說這是有名的天保城，是很重要的地方。它俯瞰全戰場，我們的右翼頗受它威脅，並且初六日午後戰況最激烈時，它那裏也曾發射過炮彈，幸距離較遠，未被命中。據說那裏是太平天國時代數數肉搏的據點，也有人說它從明朝以來就早已有名了。初七日我們整理隊伍之際，那裏打來的炮彈雖不能命中，却仍向我發炮。我軍欲攻進城去，非先占有此山不可。因此，當夜就先派小部試探登山的路。在紫金山南麓有數條羊腸樵徑，白天已很難上，何況夜裏；北麓路更險，只有一條路，上山去比較適合，但有敵人把守，我們無法通過。探索的人天明都回來了，這算是第一次進攻。初八日，我們找着了幾名湘籍居民，他們從前也是營伍出身，對這山地形比較熟悉，就以重賞借重了他們。是日上午我們因急需解決這座山，開了會議，我提的意見得到多數同意，立付實施。我的意見是：1. 此山必須在最短數日內奪得，不可稍有放鬆；2. 攻山不須許多部隊，但任務十分艱苦危險，所以全部採用志願募集，亦取名敢死隊；3. 人數只須數百人，分為數隊，各隊不必同時分路攀登，可以擇定數路作為重點，也不妨前後重疊

而上，互相应援，互为呼应；4. 应募者都定有重赏，官长亦加重给赏。

征募通知发下部队，士兵们已经休息一天，精神恢复，志愿报名的非常踊跃，就由各部队自行选定，编成数队。初六傍晚由沪开到，适时救了我們危急的部队，其中人员报名的亦很多，有叶仰高、张兆辰二人都是浙江省青田县人，他们的出身我不很知道，好象也在南京当过军官，同朱瑞和另外几个官长认识。他们愿意应征，并带队攻山，我們准许了，并派他们各带一队。这天薄暮上山，闹了一夜，次晨都陆续回来，这是第二次进攻未成。初九日，决定当夜再调动生力，增添向导，多作准备，要一鼓夺得天保城，但初十晨仍旧回来了，这是第三次未能成功。我們不免有些焦急，因山上密林小径，有些地方更是岩石挡路，即在白昼行动亦非容易。我們决定不必单靠黑夜行动，下午以后就利用密林，疏散潜登到适当地点埋伏，夜间利用月色，规定时间暗号，正式行动；但连日天气还暖，向晚微雨，增加了困难。叶、张二人这天又告奋勇，愿仍带队前去。经我們批准，并为雇到更好的领路向导，一切规划更为周密，使依计分头前去。夜间时雨时霁，登山更是难上加难。下半夜在约三四点钟，了望哨报告天保城起火，不久又有靠西的一处起火，火势更大，且遙聞冲锋号音，知此举大概成功了。我們都站在帳外遙望，天明从望远镜中窺見山上已飘白旗，不久报告送到，我軍已完全占领天保城，敌人多数逃往山后，颇有死伤。我軍伤多死少，最可惜的是忠勇的叶仰高队长战死山巅，同此山共千古矣。我們赶快派队登山增援，替换休息，清理战场，并多派偵探分头搜索，也照例报告了各上级和上海各方面。现在朝阳門、太平門、玄武湖以东已无敌踪，紫金山的前前后后我們可以自由活动了。

这里要叙述一下沪軍都督府給我們的支援。當我們在初五、初六两天忍飢熬寒苦战之时，沪都督府參謀长黃郛想到天气驟冷，恐怕出征战友带的衣服不够，已叫他們的軍需处向商家购集了卫生衣四千多套，准备送前方，恰巧得着了胜利消息，他立将寒衣交給了浙軍兵站。次日他自己带了少数卫兵，押运着都督府所备的犒軍款几万元和許多罐頭食物赶到南京犒賞，因此我們在入城时分外感到温暖。沪軍都督府同时还送来了地雷，不过后来我們沒用到。从这些事例也可以想到当时匆忙出兵中的左支右絀。

南 京 城

果然，我們从天保城向南京城内开了炮，城里的人大起恐慌，他們就請美国領事通过美孚油公司大班安德逊向我們讲和。我們只許他們投降，不許讲和，后来我們索兴不去理他。铁良又請出前因受伤被擒的史久光，好好招待他，叫他來請和（这是史后来在北京和我見面时告訴我的）。但事情发展很快，张人駿、铁良等逃得更快，这些事也都沒有下文了。

我們为了来一次較大規模搜索，派謝祖康率領所部于十二日未明出发，担当搜索任务。謝行至太平門外蔣王庙附近，遇見了徐紹楨、林述庆等正在打算进城（徐等已知张、铁北逃太平門，或已可能进去），謝只好下馬行礼。徐要謝护卫他进城，謝对自己老上司只好听从，領徐从太平門进城。途中林又照样分了謝的一部兵去。但因謝来不及向馬群来报告，我們等謝久久不見回来，疑有变故，甚为焦急，就派人四出探查。因謝部全是熟悉本地情形的人，想不到他們为何沒有回报，除非出了大岔子。

支队司令部中午前才得知张、铁已逃。朝阳門因我攻打太急，

被张勋派兵用土石全部堵塞，徐总司令只能由太平門进去。我們吃完中飯立即开会商量如何进去，走何进路，何时进城，大家各有意見。我主张明晨整好队伍，定好城內目标，先派卫兵保好进路，略修朝阳門、太平門間道路(此路有些部分单騎已很难行，車輛更不易通过)，然后堂堂进城。心急的人嫌这样太呆板太緩慢，主张当天立即堂堂进城，持此主张最力的是吕公望，好象有什么要急于去爭取似的。朱支队长平常听我的話居多，而今天也很动搖。徐乐尧平日善說空話，今天更是跃跃欲試。这时時間很快，人人都在帳外听消息，我看主张当日进城的既是比較多数，也就不便过分坚持己見，耽誤行动，只好依他們意見，提笔下了全队前进入城命令。本想行李輜重暫留城外候令，但有人以为不便，就也命其随进。命令既下，各部踊跃整备，下午四时居然排成了战备纵队，大有堂堂奏凱入城的姿态。支队司令部行在前卫本队前头，各人跨上战馬，意气揚揚。那知行不多远，頃刻之間却出了大事。前卫先头路边，忽然一声爆炸巨响，浓烟直起，紧接着有少数枪声。行进的人，頓時掉头拼命奔跑，馬亦似通人性，轉头跑得更快，勒也勒不住。紛乱之中，許多人被碰撞跌倒，很有受伤的。徐乐尧的坐馬撞着一个兵士，那兵恨极，一枪腿将徐拦腰打下馬來，还破口大罵。吕公望也被顛墜馬，而且馬也跑掉了。朱支队长由卫兵扶下了馬。我看到如此紛乱，急忙勒住了馬，喊着：“大家不要惊慌，步兵部队赶快轉过臉来散开，对敌布陣，只要穩慎对付，不会有大事的。”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自己却真莫名其妙。前头部队勉强止住，后续部队却被前面往回奔逃的人馬闖撞得人仰馬翻，孝陵卫大道上一片零乱，滿路是倒翻了的行軍鍋灶、大米、食物、輜重、弹药。受惊和跌伤的人都坐路旁，十分泄气。我来回走动，告訴大家要安靜下来。在一

坎堆树下看見尹銳志、尹維俊姐妹也坐着，还有王任化、王文庆等，他們都是初六日傍晚赶来救急的敢死队员。我安慰他們說是不要紧的，不会有大事的，但自己却滿腹狐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朱支队长歇了一陣，喊我說：“湛侯，現在我們又怎么办呢！”我說：“看样子我們进城命令已下，反复更改也不宜，現在看情形留在城外也不頂妥，好在徐总司令已进城，倘大家要进去，也只好进城了。”朱等贊成，即就前卫中酌留一部严密警戒現場，我們稍加整頓，继续进城。这时残阳已落在城角，走过明孝陵边已近昏暗，急急沿城墙根摸索前进。中途遇見謝祖康倒回来了，我們不放心孝陵卫的情形，反叫謝带队回孝陵卫帮同警戒，查明真相。后来謝祖康报告：他会同上海来的敢死队员查明，那声爆炸巨响原来是那天夜攻天保城退回时他們队员遗落在路上的一颗炸弹，被我軍馬蹄踢着，碰到路旁石上而爆发的。这种炸弹其时我們自己沒有，敵軍更沒有，只有上海敢死队才有。至于那少数枪声，是前卫应急的警报。真相这才大白。

我們在黑暗之中摸索进了太平門，司令部行在前面，有少数騎兵引路，很快接近北极閣。忽然上边发出一陣枪声，接着不断的机关枪声，我們策馬加鞭，冲过了北极閣下面。点一下，只有朱支队长和我、吳元鈞、徐乐尧、周元善等六七人，还有宪兵、騎兵、馬弁等約二十余騎，馬蹄打在路面石子上，迸起了点点火星。我們到了丁家桥劝业場路凤台旅館歇了下来，就同朱等决定宿在这里。各部队原也已指給了宿营地点，但经过城外那陣混乱，行列次序都已变动，而且来过南京的人不多，就只有靠他們自己应付了。到了半夜，呂公望等多人仍未到来，遙远各处尚有断续枪声。翌日，我們吃过早飯，仍不見呂等来到，很不放心，只好派人四处去把他們找了来。

原来吕等骑马较慢，遇到北极阁枪声，马又受惊掉了头，后来他们就跟着别部队转到小营附近宿夜。次晨，吕因找不着我们大家，同林述庆、徐绍楨等大办交涉，限他们交出人来，否则就要用武。如果我们不及时去把他找到，就要闹出大笑话来了。

(四) 进入南京以后的一些问题

十三日，我们好好整理了各部队的宿营地点警戒区域，规定了些部队应行遵守的禁令等，出了布告，同时派些偵探北去严密搜索。支队司令部选定了丁家桥江苏省諮議局的一部房屋，次日就搬了进去，徐紹楨那边也重新去招呼了一番。可是徐因此次战事仅浙軍和黎天才軍有了明白的战績，别的那些什么什么軍的当时都说不出打了些什么仗，而且他自己过去的部下闹分裂，所以人们对他就日渐冷淡下去了。

入城部队的纪律

当时会集南京的部队，就人数說，并非太多，可是各种部队的名称却不少，并且还在到处招兵。因为統帥的威信不高，起不了核心作用，也就談不到号令森严了。我们自己的部队事先虽是特别严申过纪律的，但是由于取得了一些小小战績，被捧得太过，吹得太大，自己也冲昏了头脑，就不免滋长了驕气。外間有人冒名浙軍在做坏事，而浙軍中也有若干不良分子真在做坏事的。我们派宪兵严密偵查，还添了便衣，终究查了一件事出来：有几个兵在三元巷袁海观（卸任的上海道，已去上海）家搶劫，拿了搶来的衣物去当鋪当錢。被捉住的几名，经細細审問，有属于浙軍的，还有黎天才軍

的，当将其中主犯依軍法处置，并布告全市。于是我們对士兵严申紀律，多次集合官长訓話，还請馬相伯来讲話。馬以善于演讲聞名，大家听得很动容，有些人哭了。我們对于南京地方的行政和財政、公用事业以及軍用物資的处理等一律不許任意与聞。但遇到一事却不能不問：我們炮兵营同一部敢死队十二日那晚在昏暗中进入了原来小营的炮标宿营，次晨在炮房发现有完整的日本三一式野炮十八門，竟有人进去偷取零件。经报告上来，我們即通知徐紹楨。他們得知了，就有好些軍要去搶这些炮，却没有正式的炮兵去接管。徐氏順水人情，就把炮交給了浙軍。我們赶快去浙江調了些初受訓練的新兵，由管帶张国威加紧訓練为炮兵。张原是炮兵好手，訓練的这队新炮兵正好預备作北伐追击张勋之用。

南京浙军起了个小小兵变

杭州、上海方面的派系紛爭，影响到南京的浙軍。前面讲过，在浙江的同盟会、光复会党人以及軍官們过去是能够和衷共济的，向不因学校出身和地区的不同而互分彼此，如今却因上海方面革命党人鬧分裂，浙江也本有一些野心家也就暗中活动起来。都督易寿潜本是清朝官吏，思想不够进步，但很重視留学生，又为了旗人賣翰香之处死，事先未得他同意，心有不懌，对于环境自觉难以掌握，力求辞职，并推蔣尊簋继任都督。会浙軍总司令周承蒞将到南京慰劳檢閱部队，那些鬧分裂的人們看到省内形势渐渐于日本士官出身的有利，深为不滿。他們称留日出身的人为“舶来品”（我那时还非舶来品，徐乐尧、吕公望等同我談天时，常常这样称呼留学生），保定速成和南京陆师出身的少数人互相勾結（但正派的保定陆师的人很少与聞的），要打倒“舶来品”，拥朱瑞出来。朱瑞自己

还蒙在鼓里，他們因我同朱比較好，不便拉我，也不敢过分瞞我，有些事情也終究被我知道。有一日早晨，我同朱瑞等四五人还在早飯，传达忽然急急报告說，有許多士兵要求上楼見支队长，劝也劝不住。吳元鈞立刻放下筷子，下楼去查問。忽然听得一陣激烈的枪声，朱瑞的臉色頓時变了。我叫馬弁招呼好朱瑞，自己跑下楼去，才知道那些士兵要求发双餉，經吳元鈞一番开导，已被劝住。据事后了解，原来是連日从杭州来了人在部队活动，要給周承蒞一个打击，让周下不来台，借以削弱留学生的威信。这天正是周将要到部队去訓話，遇此事变，后来也只好馬虎应付过去，因为正值南京那样部队杂处的时候，不便多事。到了明年，湯寿潜終于离去，蔣尊簋也做不到几个月，周承蒞差不多站不住脚，連陈仪、高尔登等都被挤了出去。及至浙軍班师杭州，朱瑞終被頂上了都督的位置。这些都是这半年以內的事情。后来速成借倒袁为名，又挤倒陆师，連下去速成还要压迫浙江武备的人。浙武向来对各派都是一样看待的，至此受逼太甚，其中如夏超、周凤岐等也是不肯让人的，于是双方展开暗斗，奉段祺瑞为老师的一班人(速成)终于受了段系的愚弄，被硬派进一个楊善德到浙江来，这是以后四五年明爭暗斗的結果。

推举大元帅和军队扩編

革命軍既下南京，革命党人內部問題不断暴露，爭执磨擦，日益剧烈。如推举大元帅一事，一部分人主张推黃兴担任，一部分人則主推黎元洪，我們浙軍中的將領主推黎的居多。其时人們党派分野并未划得十分清楚，我們起初对这件事情的想法，以为黎毕竟是武昌首义的人物，黃虽属同盟会領袖之一，但为汉阳作战敗将，浙

軍司令朱瑞主張就很明朗。我們的司令部因設在省諮議局，來訪的人更是絡繹不絕，都想說服浙軍表示堅強主張，借以增加自己勢力。祖黃（亦即祖孫）祖黎一時鬧得不可開交。光復會分子反對同盟會日益露骨，陶煥卿、李燮和一派鼓吹與同盟會分家，我們就成了此等人的對象。滬軍參謀長黃郛也曾來過南京，他也多少有些活動。他先向我說服，我本來是最恨派系分裂的，黃對我講明當時必須推舉黃興的理由，他還希望我勸告朱瑞，要求朱勿在軍中續唱高調。朱本富理智，經過這番疏通，浙軍方面才沒很堅持下去。

黃興就任大元帥，組織了大本營，各方就紛紛要求擴充隊伍，說要準備北伐，一時新的師號紛紛出現，南京街上到處是部隊招牌。原浙江第二十一鎮也被擴改番號為第六師和混成一旅，這算是最保守的。呂公望最熱中於擴軍，朱瑞却很穩健，他深深領會到第二十一鎮當年創建的艱難，呂卻不懂。滬軍都督府所屬部隊本早已成師，被編為第二十三師，黃郛兼任師長。黃有浙江為後盾，事事好辦，軍官是浙江的老朋友們或是他們的部下，盡好的調來，士兵是浙江幫忙招的，而且武器裝備上海可以就地取材，所以他的一師成立較早，規模也很象樣。其他臨時湊成的卻不能有這樣好的條件。

當總統府成立之後，大本營隸屬於總統府，要求調黃郛到大本營供職，但實際上滬軍都督府事多，陳其美不放，結果他掛上了兼大本營兵站局長的名義。因為北伐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兵站，黃郛每星期往來滬寧之間數次，臨時政府成立之後許多政治問題也集到他的身上。我從浙軍被調兼兵站局的交通部長，副部長是黃慕松，我們也算忙了一陣。

民國元年元旦，孫中山先生到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浙軍被派

充仪仗队去下关欢迎，以后又全部調至朝阳門外（朝阳門已被开通）明孝陵，整队拱卫临时大总统，随同謁陵。孝陵道上人山人海，欢声雷动，文武百官恭敬肃穆，跟随謁陵。

南北議和告成，孙中山让去临时大总统，不久大本营解散，南京改組了留守府，以黄兴任留守，那时一般就称他为黄留守，处理已经参加革命的各省各地的軍事。那时最困难的就是部队餉項問題。毕竟参加过革命的人，体念到祖国来日艰难，自願裁汰所部的很不少，也有因兵餉两缺而自然消灭的。沪軍第二十三师本已編組成完整的一师，为提倡自願裁軍做个榜样，在許多部队还不肯决然裁兵的时候，就首先取消了这师，师长黄郛辞职离开了军队，仅留一营守卫制造局。次年二次革命后，郑汝成到了上海高昌庙登岸，这一营被郑所吸收。

我于民元春同屈映光、张栩被浙江派赴北京参加軍界統一会。这个軍界統一会是袁世凱叫段祺瑞主办的，专为牢籠羈縻当时各省的若干革命头目和軍界有力人物而設的，工作人員还是原軍諮府的一班人，会址設在煤渣胡同前清的貴胄学堂，招待之优誠所罕見。此会結束，代表回去时，都得了高官厚祿，屈映光被任为浙江民政长，张栩为浙江盐运使，朱瑞封了兴武將軍，呂公望由革命前的上尉三等科員連升四級，当了旅长。我那时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什么世务也不懂，只希望进陸軍大学讀書。这年夏天，我就同周亚卫、裘紹三人辞去各种职务，进了北京陸軍大学。三个年轻光棍租住在西直門內柳巷的一所民房，自榜其門曰“三光学舍”，光复会的尹銳志、尹維俊二位敢死队员常到我們那里去，后来周娶了銳志，裘娶了維俊，亦是革命佳話。

民元夏浙軍班师杭州后，朱瑞因我在攻宁战役中既負責作战，

且保管陣中日記，曾叫我将经过詳細事实写为記事，作为战史資料，我就老老实实在地將詳細经过都写了出來。朱看了，希望我修改一番，因为里边有些地方于他自己和部队不好看，但我也沒法修改得更好看。于是朱更請文笔好的人修改之后叫我再为訂正。但我看了却觉得去原文事实更远，可說有些脫皮換骨，我不好意思再多說。后来修改本曾刊印了少数出来，但我的原本却沒有还我，如今修改本或者可能在浙江方面找到一二，如能与我五十年后的今日所追忆的此記互为參证，誠属幸事。

(一九六一年九月)

光复会前期的活动片断

陈 魏

成立经过和入会仪式

光复会的前身是軍国民教育会，而軍国民教育会的前身則是支那亡国紀念会，这个会是在日本的章太炎、馮自由等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而組織的。后因日本政府不許其他国家的人民在它的国土上进行政治活动，軍国民教育会就迁来上海。适值蔡元培先生来沪，聞有这个組織，即来参加入会。后经商討，改名为光复会，蔡被选为光复会会长。

光复会最初选择会友极严格，会內制度亦极严。会友彼此都不相识，只有在共同参加多次會議和秘密工作之后，才互相知道是会友。會員入会时，須选一极秘密的地方举行入会仪式，要刺血和对天发誓，表示革命的决心。記得我入会时，曾对天发誓說过这样四句話：“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許国，功成身退”。

蔡元培任光复会会长后，諸会友虽敬重其为人，但因他对联系內地各党会非其所长，发展会务成績欠佳，因而会友对他微有不滿。而徐烈士錫麟为人目光远大，热心公益，克己从人，对待会友亲如家人手足，为众望所归。会友們都叫他“伯蓀哥”（徐烈士号伯蓀），以表示敬重和亲暱。徐烈士是紹兴府学堂的副监督兼算学教

員。他当时奔走于紹兴府属和邻近的其他府属各县，积极进行联系党会的工作，很少离紹他往。因此上海和其他各处的革命党人，都来紹兴同他联系。于是紹兴便成为会友集中之地了。

大通学堂

在紹兴协助徐烈士工作的有陶烈士成章、龔宝銓、呂熊祥、赵卓等人。陶长于謀略，处事周密謹慎。他对史学很有研究，但他度量欠广，对待会友不能象徐烈士那样亲如手足，因而威望亦不及徐烈士。当时集中在紹兴的会友在徐烈士领导之下拟訂計劃，进行軍事訓練，筹集經費，购买武器和团结其他党会的工作。适是时清政府废止科举、办学堂，除各省置有提学使外，省有高等学堂，县有县学堂。因此，光复会总部就利用办学为名来掩护革命活动。紹兴城西有一大通寺，交通便利，房屋寬敞，并有空地堪充訓練場所。徐烈士商得該寺方丈同意，借用空屋办学。正在筹备期中，不料事为徐烈士之父徐鳴凤先生所知，出而阻挠。鳴凤先生是商界人士，性情頑固，过去在东浦开办热誠学堂，他就曾竭力反对，但因为那是县学堂的预备学堂，他亦无法阻止。此时他又聞有此事，自然更加反对，他不許大通寺方丈把房屋借给他的儿子。总部原想尽快把学堂筹設起来，不料受此拦阻，一时計无所出。事为城内豫仓董事候补知县徐貽孙所知。他想从中得到提倡学务的好评，即与徐烈士說：“你要办学，我可以将豫仓空屋借你办学。”徐烈士为了早日实现原定計劃，所以就騎馬寻馬，先行假豫仓把学堂开办起来。学堂仍照原拟名称，冠以“大通”二字；又因实施軍事訓練易启人疑，故又加上“体操”二字，称为“大通体操学堂”。这样，大通学堂就在豫仓仓库誕生了；豫仓仓库也因大通学堂而留迹于历史，現在已作

为紀念場所了。

筹集会款和购买武器

会款的筹集是一个困难的問題，最初由陈志軍出款維持（如热誠学堂經費）。后有許仲卿自願出款，如购买步槍費用、大通学堂用款、捐官費用、出洋留學費用，都是他負擔的。由于籌款困难，上海会友蔡元康（蔡元培的胞弟）來紹時，曾主張搶錢莊的運款。陶烈士竭力反对这样做，认为不能因籌款而損害全局。以后陶烈士在日本，将去南洋籌款時，还提及此事。他說，如果照蔡元康的办法做，恐怕光復会現在难以存在了。武器的購買，除零星的无法估計外，有一批九彈步槍共五十支，是徐烈士用团練的名义，領得紹興府的護照，親自在上海購買的。这批槍支經過杭州運來紹興，先存放在府學堂，后于大通學堂開辦時交到大通學堂。

捐官去日本留學

當時各省新兵日見增多，裝備極精，又是新法訓練，我們人員雖多，但實力遠不能同他們相比。因此陶烈士說，我們這樣的訓練教育是不夠的了，必須改訂計劃。他認為最好的辦法是捐官去日本學陸軍，以便回國後可以做官掌握兵權，實行革命。大家都贊成他的主張。於是，在原有計劃中，增加了“捐官去日本學陸軍”一項。捐官去日本學陸軍的共五人，其姓名和兵科如下：徐烈士錫麟捐的是道台，填的是步兵科；陶烈士成章捐的是知府，填的是步兵科；陈志軍捐的是知府，填的是炮兵科；陳魏捐的是同知，填的是騎兵科；龔寶銓捐的是同知，填的是工兵科。以上五人在辦妥捐官和留學手續後，即于同年（大概是一九〇四年）冬季，由徐烈士率領去

日本。

当时清政府的駐日本公使是汪大燮，陆軍留学生监督是王克敏；日本政府为中国人学陆軍所設的預备学校名为振武学校。当我们报到时，王克敏对我们就有怀疑，因为我们一举一动都象学生；使他看不入眼。他对我们說：“根据規定，不是官費生是不能进振武学校的。你們是自費生，可以进其他学校。如要进其他学校，我可以立即送你們入学。”我們回到寓所后，就拍电报給浙省。不久即由浙省巡撫致电駐日本公使，說明我們五人是浙江官費生，要他照例送学。但王克敏說，五个人不能开一班，要等奉天学生到后一起送学。后来与奉天学生同去检查身体，又說我們身体都不及格，不能入学。经向振武学校校长福島联系，他說：“这是你們监督处的意見。”我們大失所望，惟有另想別的办法。这时我們五个人除徐烈士外，其余四个人都剪去了辮髮。当时議定，一部分人仍留在日本学习，陈志軍学法政，陈魏进警监学校警务科学警政，这方面由陶烈士主持。徐烈士以所捐道台回国去謀分发安徽，因为安徽省份小，又是南京的門戶，在軍事上很重要。至于大通学堂方面，則由徐烈士另选他人主持。

記光復會二三事

沈 颺 民

一九〇一(辛丑)至一九〇五(乙巳)年之間，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趨向革命，並紛紛組織革命團體，積極進行革命活動，一九〇四(甲辰)年成立的光復會，就是其中之一。

光復會的醞釀、密商、策劃、組織，實肇始於日本東京。當時(一九〇三年癸卯前後)革命的與反革命的兩大陣營，旗幟鮮明地對立着鬥爭着。革命派章炳麟(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發表後，給改良主義反動思想以致命的打擊；鄒容(蔚丹)的《革命軍》也“大聲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於天下”，留日學生創辦了《浙江潮》等雜誌，宣傳革命的不可避免，鼓吹作革命之驍將，用革命暴力，推翻清朝統治，於是一部分知識分子堅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九〇三(癸卯)年十月，日俄戰爭即將爆發，我們認為戰爭勢必延長，這是中國革命的好機會。在東京的浙學會的會員，聚集在王嘉禕的寓所密商。第一次參加的有王嘉禕(字偉人，求是書院同學，求是書院即是浙江大學堂前身)、蔣尊簋(字百器，求是書院同學)、許壽裳(字季勳，求是書院同學)和我(沈祖緜字迪民，求是書院教習)等十餘人。這時王嘉禕在早稻田大學讀書，擔任《浙江潮》的編輯。《浙江潮》的編輯所表面上設立在東京神田區留學生會館，實則設立在東京牛込區早稻田大學附近的榎木町王嘉禕的寓所，作為

秘密集会的場所。浙学会原設在浙江杭州，鼓吹革命，旋被清朝政府下令通緝，于是一部分會員恐惧万分，登报声明退会，有一部分會員继续斗争，由陈汉第（字仲恕，求是书院监院）改名浙学会，以为掩护，仍进行工作。浙学会留日會員，在那天討論的結果，决定另行組織秘密的革命团体，目的不仅要加强革命宣传工作，首要在于力行，要用暴力发动武装起义。我們认为应该先选择湖南、安徽或浙江一省，实行武装占领，作为根据地，再逐渐扩大。最后认为要另組一革命团体，应邀請浙江志士参加。当时陶成章（焕卿）正在东京，軍国民教育会魏兰（石山）、龔宝銓（味蓀）不久将回国，周树人（豫才）在弘文书院讀書，都是坚决走革命道路的人士，分別联络。同年十一月，又在王嘉棹寓所举行第二次密商，陶成章等均参加。为了取得革命武装根据地，决定陶成章、魏兰分往浙江、安徽二地，龔宝銓往上海，张雄夫（开会时张在上海）和我往湖南长沙，与华兴会首領黄兴联系，因黄兴已在长沙暗策革命，武装起义，庶可首尾相应也。两次會議，虽以浙学会名义召开，还没有正式命名为光复会，实则光复会肇始于东京。今之史料，缺此实录，首补叙于斯。^①

陶成章、魏兰归国后，奔走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策划革命。陶成章是革命实践者，毅力惊人，对革命事业始终不渝。成章之叔陶大森，系清朝政府官吏所謂“时务人員”。当时清朝官吏中，分“洋务人員”，如黃遵宪、唐紹仪；“时务人員”，如湯寿潜、张謇等。陶

^① 記載光复会的起源，始見陶成章《浙案紀略》。因“恐致机密漏也，于吾党进取前途，甚有妨碍”，故隱晦不詳。如光复会肇始于东京，陶书未叙述。一九一一年陶成章来上海，会于人和煤号，这时陶已患病，还談起这件事，囑为增补。不幸十一月陶被杀，此事就擱下来了。

大森被清朝政府派遣到日本“考察”，实則阴谋瓦解革命力量。大森到日本后，与留日学生监督汪大燮勾結，认为陶成章系革命派主要人物之一，阴施釜底抽薪之計，誘陶成章往北京。成章至北京，始知受騙，立即出奔，竟五天未进食，然革命之志未尝稍懈，于是光复会咸推为党的首脑。一九〇四年八月，陶成章联络各地会党参加革命的工作，略有头緒，就到上海和黄兴、蔡元培密謀，决定十月十四日“万寿节”实行武装革命。所謂“万寿节”，就是那拉氏七十岁的生日。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在湖南、湖北两省同时革命，用武力占领长沙等地；陶成章、敖嘉熊领导浙、皖諸省会党，也于“万寿节”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举义，以为响应。为了便于与华兴会方面联系，依照东京浙学会的決議，张雄夫和我往长沙去活动。于是我从日本归国，即往长沙，任长沙明德学堂教习。明德学堂是胡元倓创办，为湖南革命运动的大本营，教习有黄兴、苏子谷、謝晓石、金封三、李連舫、秦毓蓀、张继等。黄兴全力策划武装革命，当时預計，“万寿节”之日，义旗一举，长沙可唾手而得，全国震动，浙皖可一举而下。张雄夫稍后也到长沙，在革命派翁浩做监督的长沙实业学堂担任美术教习。雄夫为人热心，坚持革命工作，未尝稍懈。那时枪弹物資，已陆续运至长沙。我和雄夫按日用各种方法，把黄兴动态通知陶成章和敖嘉熊；浙皖动态也随时通知黄兴，以为策应。

一九〇四年(甲辰)，龔宝銓也在上海組織暗杀团，与陶成章、敖嘉熊、黄兴暗中配合。暗杀团成立后，人数极少，力量单薄。龔宝銓想扩大組織，是时陶成章来上海，龔、陶在东京时，已成刎頸之交，两人密商后，根据东京浙学会的原議，組織一革命团体。因章炳麟在獄中，惟蔡元培系清朝翰林院編修，声望素高，欲推为首領，

以資号召。陶素知蔡书生气重，恐不能相容，反使工作造成不利，于是由龔宝銓先与蔡元培商討，决定扩大暗杀团組織，并由蔡元培自动提出邀陶成章参加，于是光复会遂在上海正式成立。陶成章《浙案紀略》所記光复会成立事，稍有出入者，雅不願自居首功而已。魏兰《陶煥卿行述》說：“是（指一九〇四年）冬，成章又与皖、宁各志士在上海結社，曰光复，以蔡元培为会长。”这記載是确实的。而章炳麟的《光复軍志》却說：“光复会初立，实余与蔡元培为之尸，陶成章、李燮和继之。总之，不离呂、全、王、曾之旧域也。”（見《檢論》卷九）这因章氏身系上海獄中，不詳原委也。光复会于一九〇四年十月在上海成立后，陶成章认为首先必須与日本东京原发起人商議，遂于是年十二月偕魏兰赴东京，与王嘉棹等筹商。光复会东京分部也正式成立，推王嘉棹負責，入会者有蔣尊簋、孙翼中、黃鴻焯、許寿裳、周树人等人。（原发起人中，有的已赴南洋，但也在东京入会。）上海与东京互相呼应，光复会声气大壮。当时，革命派民主革命团体，光复会、华兴会和兴中会鼎足而三，革命遂趋向高潮了。

光复会成立后，首要是扩大組織，大家注意力集中到运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会党方面，动員参加，以达到武装革命的目的。由于資产階級民主革命的局限性，当时目光只集中于联系会党，根本不知发动群众，組織群众，这是主要的失敗原因。光复会內，虽有龔宝銓所組織的暗杀团成员参加，但力量不足，并且大部分是小資产階級知识分子，顾虑动摇，行动不坚决。会长蔡元培資望有余，而魄力不够，面临实际行动，畏縮犹豫。陶成章就把联络五省会党工作的重任担当起来。初，蔡元培以会党首領敖嘉熊素負重望，亲至嘉兴，邀他入会。但是敖嘉熊允許相助，拒不

入会。这是开始的情形，以后发展，起了变化，这就缺少記載了。^①

当时浙江会党，有沈荣卿、张恭、周昌华为首的龙华会（龙华会与陶成章所组织的光复会外围组织的龙华会，系两个团体，不能混淆），王金宝为首的双龙会，竺紹康为首的平阳党，敖嘉熊为首的祖宗教等，会党势力，日益扩大。一九〇一年以后，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影响，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如祖宗教的敖嘉熊编写的《新山歌》，就是以白话文宣传革命的书籍。但会党中人还是以“仇洋为主义”，而不谈“排满”。会党的宗旨是“仇洋”，各地不是徒托空言，而是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光复会“灭洋”之外，先以“逐满”，这种思想开始时，会党是不十分理解的。于是光复会向会党进行宣传工作，目的要“易其排外之心，尽化为排满”，反复解释；会党逐渐与光复会目标一致了，这是第一步。其次，会党不愿参加光复会最主要的原因，是会党各有“山堂”，口号暗号不一，“洪门”、“潘家”，家规堂章各殊，骤然要会党首领一起入会，自有难色。于是光复会由陶成章主持，反复商讨了几次，规定会党成员入光复会者，所有会党口号、暗号，各家各教一切仍其旧，一切照“洪家”、“潘家”的旧规。这样，会党顾虑消失，毅然参加。几次商讨，会长蔡元培已不闻不问了。会党成员，与暗杀团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同，一经入会，赴汤蹈火，义无反顾。于是光复会大盛，浙江、安徽倡言革命，屡次起义，前仆后继，可泣可歌，都是光复会所领导的。

光复会在浙江的联络点是嘉兴温台处会馆，由敖嘉熊和魏兰

① 馮自由《革命逸史》也略有叙述，因未亲历其事，传闻失实之处很多。一九三六年，辛亥革命老友刘成禺、馮自由、曹亚伯等二十余人，聚于苏州章炳麟寓次，一致指出馮书失实之处，不独记载光复会而已。馮允订正，未克如愿。

主持。温台处会馆解散后，移至绍兴大通师范学堂，由陶成章和徐錫麟主持。光复会上海的联络点，设于新闻路仁和里口人和煤号内。人和煤号系王廉（清夫）所办，王系光复会会员。该号内辟有密室三间，作为机关。但是煤号对外联系频繁，易引起注目，极不方便。陶成章、敖嘉熊和魏兰联名写信给我，谋设一学会，作为联络点，遂筹设浙江旅沪学会。先是，黄兴在长沙革命失败后奔上海，不久赴日本，我在长沙工作中断，一九〇五年（乙巳）再一次赴日本东京，和黄兴、王嘉祿等商谈。黄兴赴南洋，我即归国，担任上海南洋公学教习。同时上海浙江旅沪学会也正式成立，先设于四马路益智社楼上，继迁三马路保安里。我被推为主办，人和煤号的王廉为干部，绍兴大通学堂总理姚虞（定僧）辞职来沪，担任文牍，姚也是光复会中人也。光复会上海联络工作，遂由浙江旅沪学会负责。

凡光复会函札往还，均由浙江旅沪学会收转；会员来沪，也先至学会找我们三人。犹忆龙华会沈荣卿来沪，持密条云：

干，来书。家瑛来沪配备书籍仪器，请招待，陶起。

“干，来书”是光复会暗号。所谓“家”指光复会的同志，是自己人的意思。“陶起”系陶成章的化名。沈荣卿就住在人和煤号内。又平阳党竺绍康来上海，也是如是。惟竺绍康被清朝政府通缉，不敢径往学会而已。又如求是书院同学石承宣（子夫）为光复会联系扬州统领徐怀礼（宝山）起义，徐石系亲戚，故通过石的关系，与徐暗中接洽。一九一一年徐怀礼到上海，石承宣就有函给我^①：

前所约事外，另有要事相商。见字乞速来第一楼（四马路）上层一叙。并会宝山办事人，速速弗延。此上
迪民硯兄好； 石子夫上

^① 这短札我尚保存至今。

宝山指徐怀礼已来上海，徐系“盐梟”出身。我們在上海二洋涇桥法商密采礼旅館第五号房間商討揚州起义事，約定武昌起义，揚州即举义旗，并商定由光复会通知，电文內容：

沪友新甫到，請接洽。

徐回揚州，見电报后，立即起义了。揚州起义，使江北提督王士珍軍隊无法与张勋聯絡，有利于江苏革命工作。浙江旅沪学会所联系的，大半是浙江志士，其它諸地聯絡，則不詳。至辛亥另設銳志学社，作为交通点，这是較晚的事情了。

一九〇五年(乙巳)，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光复会陶成章、章炳麟、蔡元培等参加了同盟会。有人认为光复会已并入同盟会，这样說法是不符合史实的。如秋瑾先参加同盟会，后又入光复会，可证国内仍照光复会宗旨，进行革命活动，也极少参加同盟会者。因为当时資產階級知识分子組織的革命团体，組織不严密，并非领导人参加后全体會員均要参加，何况同盟会仅是各革命团体的联合性质而已。因此，国内革命起义，仍以光复会名义办事。一九〇九年(己酉)，光复会总部移設东京，推章炳麟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魏兰《陶煥卿行述》：

庚戌岁，复兴光复会于东京。公举章太炎为正会长，成章为副会长。

庚戌是一九一〇年，記載有誤。而謂“复兴”，也不符史实。章炳麟《太炎自定年譜》^①：

①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先由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排印。一九五七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第三所《近代史資料》輯入，內容相同。太炎在世，曾把手稿給我看，其中有抨击国民党的文字（字数不多），因解放前文网森严，校刊时刪去，現在应该补入，此事頗关重要。

宣統元年，四十二歲。煥卿自南洋歸，余方講學。煥卿亦言：“逸仙難與圖事，吾輩主張光復，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會先，曷分設光復會？”余諾之，同盟會人亦有附者。

光復會總部設於東京，當在一九〇九年，《太炎自訂年譜》所記是確實的。同盟、光復兩會離合不一，但兩會“宗旨固無大異，皆以種族革命為務，特民生之說殊耳。”（《光復軍志》）孫文也以“兩黨宗旨，初無大異，特民主之說殊耳。”（《致陳炯明及同盟會電文》）究竟分歧點在哪裡呢？回憶當時實情，以民主之說為例，不但光復、同盟兩會有分歧，而且光復會內部，彼此之間，意見也是有出入的。主要分歧，反映在光復會方面的是，光復會主張宣傳革命之外，主要在於革命的力行和實踐；認為用暴力取得政權後，才能實行民主政治。因此，光復會自始至終，從領導人陶成章起，深入各地，打進基層，實行武裝革命，從不少懈。而同盟會雖也重視武裝革命，但領導人居國外時間多，宣傳也就多於力行。光復會對這點意見較深，兩者分歧點在此。徐錫麟就義時尚言：“我與孫文宗旨不同”，就是指此而言。但是辛亥革命時期，兩黨廣大成員在國內進行革命，攜手共進，固無分彼此。且大敵當前，也不可能有涇渭之分。如進攻南京之役，上海製造局之役，都是兩黨並肩作戰。又如浙江光復軍的朱瑞，是同盟會會員，而後人記載，說他是光復會會員；一同革命，外界自難分清耳。此種事例，不勝枚舉。

光復會堅持由“鼓吹”而趨向“力行”，就是重視武裝革命，自癸卯至辛亥之間，沒有一年，沒有一月，不在進行武裝革命。清朝反動統治集團殘酷鎮壓，同志被殺的，被“密拿”、“通緝”的，起義就難的，前後不下五千人。時隔五十載，姓名湮沒無聞，比比皆是。茲就曾一同參加革命，或集會商議，或先後聯繫過的，確知為光復會

成員，回忆所得，录而存之，以求信实。

一、會員

- | | | | |
|-----|------|---------|------------------------|
| 陶成章 | (煥卿) | 会稽人(紹兴) | 光复会領袖，辛亥十一月被蔣介石刺死于上海。 |
| 蔡元培 | (鶴廬) | 会稽人(山阴) | 会长，开始尚顧問会务，半載以后，即不問不聞。 |
| 章炳麟 | (太炎) | 余杭人 | 会长，一九〇九年在东京被陶成章推为会长。 |
| 錢 恂 | (念劬) | 归安人 | |
| 蔣尊簋 | (百器) | 諸暨人 | 蔣智由之长子。 |
| 蔣方震 | (百里) | 海宁人 | |
| 孙翼中 | (耦耕) | 錢塘人(杭州) | |
| 許寿裳 | (季黻) | 山阴人(紹兴) | |
| 周树人 | (豫才) | 会稽人 | |
| 龔宝銓 | (味蓀) | 秀水人(嘉兴) | |
| 张 恭 | (伯謙) | 金华人 | 龙华会首領。 |
| 魏 兰 | (石山) | 处州人 | |
| 敖嘉熊 | (梦姜) | 嘉兴人 | 祖宗教首領。 |
| 王金宝 | | 青田人 | 双龙会首領，就义。 |
| 秋 瑾 | (璿卿) | 紹兴人 | 就义(女)。 |
| 徐錫麟 | (伯蓀) | 紹兴人 | 就义。 |
| 許仲卿 | | 紹兴人 | 商人。 |
| 蔡元康 | (国卿) | 会稽人(山阴) | |
| 竺紹康 | (酌仙) | 嵯县人 | 平阳党首領。 |
| 曹欽熙 | (荔泉) | 紹兴人 | |

沈荣卿 (瑛一) 永康人
 周华昌 (安浦) 縉云人
 褚輔成 (慧僧) 嘉兴人
 王文卿 临海人
 屈映光 (文六) 临海人
 方于笱 (青箱) 嘉兴人
 姚 慶 (定僧) 嵯县人
 王 廉 (清夫) 定海人
 呂逢樵 处州人
 宋×× 江山人

龙华会首領。

龙华会首領。

憤国事,在嘉兴自杀。

商人。

龙华会处州首領。

庚子衢州起义,事敗逃亡江苏
 崇明,后常到上海联系,惜忘其
 名。

董鴻煒 (恂士) 德清人
 馬宗汉 (子貽) 余姚人
 陈伯平 (名淵) 余姚人
 俞 煒 (丹屏) 嵯县人
 徐自华 石門人
 謝斐麟 嵯县人
 魏毓祥 (子文) 处州人
 王金发 (季高) 嵯县人
 姚勇忱 归安人
 卢钟嶽 諸暨人
 計宗型 (仰山) 嘉兴人
 孙乃泰 象山人
 王嘉禔 (伟人) 嘉兴人

就义。

就义。

詩人(女),与秋瑾友善。

就义。

被蒋介石杀死。

叶景莱 (仲瑜) 仁和人(杭州)

张雄夫 萧山人

二、脱会

蒋智由 (观云) 诸暨人

蒋智由于一九〇三年东京发起光复会已参加，光复会正式成立，亦欣然参加。但后来走向改良主义的道路，参加政闻社，反对革命，脱会。脱会前曾在张智敏饒别陶成章回国的叙会上即席赋诗给陶，作为暗示，诗云：

亭皋飞落叶，鹰隼出风尘。

慷慨酬长剑，艰难付别樽。

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

万古英雄事，冰霜不足论。

脱会后，投到保皇党那里去了。但他的长子尊簋始终站在革命方面。又有些记载，说秋瑾被捕杀，系蒋智由所告密，这是不确实的。

三、叛徒

刘光汉 (师培) 江苏仪征人

刘光汉在浙江方面工作，因此实光复会浙江方面成员。刘系蔡元培介绍入会，在敖嘉熊主持的温台处会馆工作，因此洞悉浙西光复会活动情况，叛党投敌后，出卖同志张恭等。

以上除脱会和叛徒各一人外，均系浙江省人士，可见联系范围殊狭也。如丹徒赵声(伯先)和我素相知，但赵系江苏一方块，另有人联系。李燮和也和我一同参加攻上海制造局之役，又是由另一方块联系(李后来变节，与叛徒刘光汉同为袁世凯筹安会中的人物)。因为避免清朝统治政权的残酷镇压，光复会严守秘密，虽父子兄弟也

閉口不談，又系用一小塊的方式聯系。一九一二年十一月，陶成章被陳其美、蔣介石刺死于上海廣慈醫院以後，領導乏人，光復會就星散了。

光復會在辛亥革命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但是光復會是資產階級革命團體，只着重聯系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從事聯絡會黨的工作，又不深入，更沒有把廣大群眾組織起來，因此力量渺小，這是失敗的因素。茲值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回憶往事，拉雜記之。年已八十有四，記憶維艱，挂一漏萬，希有以教之。

大通师范学堂

朱 贊 卿

我年青时，常与表兄王秉彝通讯，或者到他家住几天，看看民族英雄葛云飞坟墓，谈谈求学志愿。他是已解散的绍兴府中学堂第九期学生。从他的谈话中，知道徐锡麟之为人。据秉彝说：锡麟鉴于甲午以后国势日蹙，赴日求入联队，不许，投考振武学校，又因目短视，未录取。归国后蓄意仿照“振武”办一个学堂，定名为大通师范学堂。他邀集同志，筹集经费，订定章程，呈请立案，并拨到山会豫仓为校舍。到了房屋修竣，校具齐备，教师聘定，登报招生，开学典礼告成的那一天，他想洗足了，不料皮鞋已不能脱下，因为他一意办学，各处奔走，两个月中没有很好地睡觉，两足肿溃流脓也不知道。又说：锡麟刻苦勤学，自制浑天仪，又绘制绍兴地势图，他还画了一个侵略我国的外国人形象，作为练习射击的枪靶。他对待学生像亲生子女一样，往往在夜阑人静时，轻轻地走到学生宿舍，见有手脚外露的，为之盖好被褥；蚊子相扰，为之掩好床帐。又说：锡麟常于假期中率领同志旅行奉、曠、新、台、金、衢、严、处等地方，结识了不少拳师和有影响的人物，并将不见记载的深山峻岭中的捷径要道一一记录下来。他曾出山海关至奉天、吉林，再经西北诸省边疆而归，与杀人不眨眼的馮麟閣一见如旧相识。我听了有关徐锡麟的这些故事，对他非常景仰和羡慕。

我在幼小时，听老年人讲过清军强迫汉人剃头和民族英雄张苍水被清军杀死等故事。后来又读了《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和《革命軍》等书籍，反满思想愈益浓厚。一九〇七年农历正月二十八日，接到王秉彝来信，知道大通招考新生的日期，乃于二月初五日前往应试。录取后，初九日迁入大通学堂。初十日上午行开学典礼，所行的是军礼，所奏的是军乐，来宾为绍兴府知府貴福、山阴县知县和府教育会长王佐。十三日起上课，课程分国文、英文、日文、舆地、历史、教育、伦理、理化、算术、博物、兵式体操、器械体操、琴歌、图画等十四门。校长为黄怡（字介卿），教职员有姚勇忱（教国文）、賈夙斋（教英文）、陈培之（教日文）、朱襄（教舆地及历史）、姚定生（嘉兴人，教教育及伦理）、蔡祿浓（教伦理）、范震亚（教理化、算术及博物）、单鹿恩（字伯武，永嘉草乡人，教兵式体操）、董建侯（教兵式体操）、徐世佐（山阴人，字弼廷，教器械体操，兼庶务）、許之华（教琴歌）、张光耀（教琴歌）、顾廷坤（教琴歌）、孙××（教图画）、陈超蓀（监学）、唐生（字东生，杭人，鼓号）、秋誉章（秋瑾之兄，所授课程大约是史地）等。上面这些姓名和职务，是从我保存下来的当年日记簿上录下来的。其中思想前进、积极反清的当推姚勇忱、单鹿恩、姚定生三位老师。

我入校时，徐錫麟已赴安徽，对于大通师范学堂势不能事事遥制。校中有一个董事会，其中有名誉董事、常务董事及董事等名目。在董事会里最重要的人物是秋瑾，她是同盟会会员，在反清活动及学校的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孙俭卿，绍兴孙端镇人，是个当商，据说他是一个捐班官，学堂经费由他负责。姚定生、黄怡、竺紹康、王金发等，都曾为徐錫麟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出过大力。姚勇忱大概也是其中的一员。

同学中水乡人少，山乡人多。奉、諸、新、曠的同学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大有“瘠土之民好义”的风气。起床、息灯、上課、下課都用步号，清越可听。催起号角一鳴，立即把被褥捆好。鞋子一律放在門外，不得在室穿脫。除星期日外，每天第一課起，三課兵式体操，要跑到几里路外的大校場去操练。有时朝露未干，青草沒脛，教师喊五百、六百米达臥倒、豫备放，学生们不問馬屎牛羹，毫不犹豫地臥倒下去，并假想敌人在前，眼亮手准地动作起来。遇到大雨就在飯厅上操击枪柔軟或在走廊四周做跑步。我們所用的枪，是从俄国买来的老毛瑟后膛枪，分量是很重的，所以操击枪柔軟最累人，左手把枪托在手上，伸直作瞄准状，教师不喊放，当然不許縮轉来，手臂痠得不得了。还有跑步，开步大不行，小也不行；慢不行，快也不行。教师說一分钟走多少步等于几里，要这样作战时才有用，这两項課程最吃不消。此外，还有星期一、三、五的一小时器械体操，有很高的天桥，极长的溜木和平台、铁杠、木馬、秋千、铁环、跳远等种种設備，应有尽有。我从小多病，这样一二个月以后，身体反而炼得强壮起来了。教师很认真严厉，譬如开步走走得不好，他就用指揮刀（未开刃的）敲你的腿。夜間打行軍，你爬不上山，他就把你一推；泗河，你不敢下水，他也把你一推。由此可見，大通在那时已经軍事化了。

上課后不多几天，問題来了。街头巷尾发现了几张揭貼，意思是：大通学堂是个“匪窠”。同学们一听到这消息，就发狠耐心地調查，都怀疑是著名劣紳宗阿八所为。自农历二月二十四日起，通过学堂当局，第一步，全体同学上門去質問他，他避不見面。第二步，报告府教育会，要求彻底查究，主持公道。不料会长王佐是善于吃紳士飯的，一味敷衍拖宕。第三步，就是二十八那天，我們举了代

表，迫使府教育会勒令宗阿八出席，同他談判，午后开始，迟至黄昏时分他还是一味狡賴。我們挾着他的左右臂，送他到山阴县，交与知县发押严办，但是沒有下文。于是全体同学又开紧急會議。有一个同学說，我們告到知府那里去。也有同学說，官和紳士一鼻孔出气，告也沒用。另外一位同学說，大通既然是“匪窠”，为什么开学的时候知府也来参加典礼，知府岂不是与匪同类嗎？最后多数决定用全体学生名义向紹兴府知府貴福递了一个黑壳稟（这个稟是我和同学俞奋写的）。以后每天去看批示，老是看不到，等得不耐煩了，到了二月晦日，由我起稿写了一个函件給貴福，其内容是：“……生等二十七日奉上稟帖一件，至今未蒙鈞示，事关全体学界，岂可置之不問，大公祖振兴学界不遗余力，必能深維始終。生等佇聞明教，延跋为劳。伏乞大公祖即時裁复，不胜禱盼恳切之至。……大通学堂学生代表俞奋、朱家駿（朱贊卿原名）等叩稟”

过了一二天，仍然杳无消息。我們一面上課，一面交涉，把匿名揭帖三紙交与校方請予协助，集合全体同学去見知府。我們在門房里靜悄悄地等了許多时候，忽然听到里面叫嚷起来，屏門豁然大开，貴福跑到門口說：“你們不配来見我，你們不安心讀書，管什么揭帖？可見你們不安分，快回去，快回去，可恶！”这时，許多同学都呆若木鸡，只有甲級級长俞奋侃侃与之分辯，大意是名誉为人生第二生命，是可忍孰不可忍；假使有人对大公祖貼揭帖說是貪官污吏，大公祖能无动于中么？后面許多同学說：“对啦，对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啦。”但是他不答复，只說：“不安分，快走！”砰的一声，屏門依旧关起来了。

夏季大考的前夕，传说校方派人在諸、新、嵒、金、衢、严、处等地方招收新生，要办一个大通师范学堂附設体育专修科。不多几

天，果然到了八九十人，住在諸暨冊局里，由校方指定同学四人教授体育課的初步动作。到我們大考完毕出校，他們都携带被鋪书籍用具迁进校里来了。他們之中确有善于拳术的，能以极粗大的門門开四門而呼呼有声。

我們平时总是以反清为中心活动，尤其是痛罵曾、左、彭、李。我們都是要革命的，但是校方少有表示。只有放假的前夕校长和姚先生對我們个别談話时，要我們在必要时，必須依照通知上的地点集合勿誤。当时同学中多以意气相投的五人合摄一影，背面书写姓名、籍貫、三代履歷，并有“但願同日死”的誓言。我和俞奋、张佐、俞梦春、王如綸就做过这样的事。

秋瑾是每天来校的，朝来晚归。她坐一只中号花浪船，两名船夫把她接来送去。她一上岸，一直躡进校长室或者教員室。她并不兼課。她的身材不高大，高鼻梁，时常梳一条辮子，着一件魚肚白竹布长衫。脚虽纏过，但着一双黑色皮鞋。所以有人說她是男装到底的，但是头是不剃的。她自己起了个别号叫竞雄，因为她愤激于当时男女不平权，她的装束也含有这种意义。

有一天，张佐邀俞奋和我到姚勇忱先生家里去談。姚先生說：“广东人孙文是救中国的一个大伟人。”我們說：“是不是孙汶？”他說：“就是他。他的主张就是驅除韃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团体的名称叫革命同盟。”并且說：“秋先生也很崇拜他。”过了几天，我們向姚先生要求加入，姚先生說：“这不是儿戏，加入时要宣誓的。”他并严肃地說：“如果加入了，以后不信不忠，有始无終，要受大众处罰。”我們說：“这是当然的。”后来我們照式各写了一张誓約交与他。他說：“紹兴方面是黃校长主盟，浙江方面是秋董事主盟。”我們才知道同盟会是这样一回事。

徐錫麟在安庆刺恩銘事发后，浙江巡撫張曾勳密令二標標統李益智率領弁目士兵三四百人星夜渡江前來圍剿大通。先是浙江招練新軍兩標，先招弁目生二班，一班是蔣尊簋主持的。是年三四月間，蔣率領弁目生至紹台一帶招募新兵。他在紹興城中住了一個時期，他的弁目生多半是大通的老學生，和我們的二年級生是老同學，所以彼此往來，交誼頗深。另一班是李益智主持的，與大通無聯繫。後來以這兩班弁目生為基礎，擴充為八十一標、八十二標，蔣、李二人皆任標統。張曾勳所以不派蔣尊簋而派遣李益智帶兵圍攻大通，可見是有原因的。

這天，住在大通學堂里的人們，早飯剛剛吃過，那砰砰的步槍聲從東面鯉魚橋傳過來了，一陣緊一陣，有的人以為躲在屋子裡是不行的，還是跑出去的好。可是大通那麼大的一片房子，只有一個大門，沒有邊門後門，大家只好都從這一個大門往外跑，一剎那間兩個專修科學生中彈了，其中一個是腹部中了彈，跳到河裡就死了。不多時，李益智的部隊把大通圍得鐵桶一般，闔城大小文武官員都到了。什麼名冊呀，文件呀，書籍呀，老毛瑟槍呀，夾壁裡的一箱一箱子彈呀，凡是可疑的東西和人們，都捆載的捆載，逮捕的逮捕了。最後，貴福和山會兩縣知縣坐堂會審秋瑾。他們用推測式的話來問秋瑾，都被秋瑾予以反駁。後來貴福把供招擲下來逼她畫供，秋瑾提筆寫了“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個字。貴福想以秋瑾的血來染紅他的頂子，毫不猶疑地命令山陰知縣把秋瑾綁到軒亭口斬決了。從此，徐錫麟艱難締造的紹興大通師範學堂也就隨著夭折了。同學們聽到消息都咬牙切齒，想替秋瑾報仇。縣裡的捕快常來學堂查問。嵒縣同學張佐，日間躲在荒山，黑夜歸家，一聽到剝啄之聲，便從後窗跳出，後來逃到蕭山安昌鎮小學教體操去了。

传说当时张曾敷幕府中有一个幕僚姜梅蓂竭力主张就地斩决秋瑾，杀一警百，以保东南大局。后来姜梅蓂年老家居，偶然有人提起秋瑾的案子，他就竭力掩饰，不肯认账了。

后来袁世凯曾对其亲信云：“我不怕南军反攻，就怕南军暗杀。”有人曾以文赞美徐锡麟等烈士，其文曰：“一人一事，清吏芒刺；岂徒心悸，抑亦内愧！武昌一簧，遂除异类；封建扫地，如禾初穗。”

最后，把我从前所记录的大通同学姓名、籍贯和住址列举于下：周鹏，字百川，住绍兴府横街。萧钺，字舜臣，住湖州长兴县大西门内。许之贞，字崔田，上虞东乡新堰镇。馮翊，字量鸿，诸暨枫桥施家坞。蔡祖新，字维松，又字涛轩，诸暨石壁脚。吴剑，字介卿，诸暨茅岭。金鏞，字藕堂，会稽横溪。余燦，字少怡。秦吉人。徐友林，即凌霄，字劲松，诸暨溪北。周兆南，字逊宾，嵊县西门内。李祖风，字永茂，诸暨竹里。李煦春，字衡右。张传冕，字献亭，山阴漓渚上市石道地一元堂张台门。屠越亭，绍兴南门外破塘村。罗瑛，字福熙，绍兴岭下。史佩铭，字金枝，嵊西湖前庄。张佐，字奕惠，嵊西上路西庄。王显临，字艷孙，山阴新河弄双文魁第。潘藩，字根照，余姚游山益心药材店。吴均一，字谷宾，嵊县城中。夏治，字熙春，嵊县城中。郭启唐，字曾希，嵊县西乡前王庄。詹祖翼，字燕堂，诸暨詹家蛟。吴咏古，字永虎，嵊县南乡五里铺。馮瑞，字祥源，嵊县叠石头。樊鹏冲，字一蜚，绍兴南门外曜灵弄。张庆鑫，字幼山，山阴漓渚。楼子祥，字麟瑞，诸暨上蔡。俞奋，字渭源，号负雄，诸暨九都。王如纶，字贤盛，新昌西乡澄潭镇。蔡愷，字子祥。俞梦春，字梅煥，嵊县。朱家骏字赞卿，萧山朱家坛。

西湖白云庵与辛亥革命之关系

黄元秀

白云庵位于杭州西湖南屏山雷峰塔夕照寺旁，虽名为庵，极少拜懺等佛事。其地有山水兼全之胜，庵内供有月下老人，南宋时称猗园，内庭宫人游息处也。

晚清光緒二十年間，有老僧带徒游方到此，爱其清幽而隐居焉。老僧名智亮，俗家紹籍呂姓，雍正时戮尸詩人呂留良之族。徒名意周，俗家淮北李姓，或云系太平天国李秀成之后。师徒皆好侠尚义，曾往嵩山少林寺习武多年。尝閱《大义觉迷录》，扼腕浩叹。师徒聞海內外志士倡导革命，极表同情。徐烈士伯蓀、秋烈士竞雄、陶煥卿等来杭开会，师徒竭誠招待。陈英士、章太炎、蔡鶴卿曾多次在庵集議。蔡松坡由桂省游杭亦在此庵与顾子才、呂戴之、黄元秀共談数日，借商策略。

本省同盟会同志在白云庵招待外省同志来杭集議，約計三次，皆在清光宣之际。第一次在白云庵集議，由武备学堂留学日本暑假返国之傅典范传达东京总会通知，严格規定各地同志对于同盟会工作，不能在家庭透露，虽父子夫妻，亦不能談。若遇初見同志，严守会中見面之暗号，如送茶用右手屈第二指，以其余四指执茶杯送之，表示彼此团結。如握手时，用三右手指握之，表示三民主义，同时用左手捏上衣第一紐，表示五权宪法。对于集議工作，不可笔

記。最后报告各地从前失败情形，以資警策。

第二次白云庵集議，系武备同学黃郛暑假由日本来杭，传达东京总会通知。大意为：希望国内同志竭力向清朝新軍之初級軍官运动，如到成熟，应写入会願书，盖手指印。其次学界与防营、綠营、交通界、地方士紳等方面亦須留意物色會員。杭州同盟分会，設參謀組、执行組、交际組，与他省不同。

第三次系陈英士由东京来杭，在白云庵集議。东京总会托陈通知，要求各同志抱定牺牲决心，千万不可为利祿权位所惑。

其余在吳山或城内开会，不在本題內，不贅及。迨辛亥浙省光复，每次軍政党集会与庆祝，师徒皆未参加，饑險亦不受，尝曰名聞利养，非出家人所受也。未几云游他山，不知所終。

民国初年，市政府曾建辛亥紀念館于大殿側。时人題額制联，以表紀念。解放后，一九五九年十月十日公祭先烈时，在此庵辛亥紀念館內开会，有老年同志报告各先烈殉义成仁事，并照相留念。

浙軍光復杭州和馳援南京親歷記

來 偉 良

浙江光復時，我和朱鍊同在杭州梅東高橋陸軍第二十一鎮工程營供職，我任左隊隊官，朱鍊任左隊第三排排長，都參加了光復杭州之役。浙軍馳援南京，我二人亦皆參與。本文大部分是我和朱鍊先生合寫的，寫成後朱先生病逝，故由我一人具名，附此說明。

（一）光復杭州

武昌起義之後，浙江同盟會及光復會會員密謀響應。適上海同盟會支部派姚勇忱、陳其美先後來杭，與在杭軍警界中會員秘密會議，討論浙江起義辦法，決定派朱瑞等聯絡軍警，約期發動。其時，杭州地方風聲鶴唳，又值搶米風潮此伏彼起，社會狀況極不安定。我營駐紮城中，負責維持秩序。管帶田繼成早經辭職北去，職務由偉良兼代。偉良為清吏所注目，暗中防范特嚴，故所有秘密會議情形，悉由督練公所科員黃鳳之（即黃元秀）前來通知。因此，我們在行動之前，都有充分準備。

九月初旬，八十一標代統帶朱瑞密派炮隊隊官徐士鑣來晤偉良，詢問對杭州起義意見如何。偉良答以杭州城牆完固，城內防營

众多，若发动之前对方闭城固守，而新军都在城外，障碍必多，我願意在城中首先发难，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劈开几处城門，将城外新军放进城来，较为妥当云云。过了几天之后，徐又来通知：（一）上次的建議，经朱統帶提出會議，大家贊成；（二）規定发动时一般兵力的分配与工程营应負的任务；（三）規定臂纏白布为誌与電話密語；（四）发动时日，临时再行通知，等等。

九月十四日（公历十一月四日）傍晚，朱瑞急急忙忙地来到我营，当面通知伟良，决定今夜发动，并云：“你們所負任务特別重要，必須迅速确实完成任务，使城外军队按时进城。”說完，即匆匆赶回笕桥。

黄昏，伟良召集本营官长談話并分配任务，大家兴高采烈，一致表示服从命令。只有前队队官阮钟良日間出外未归，推測他必存心規避，即指派前队第一排排长赵立主持前队事务。正在这时，八十一标二营管帶韓紹基用電話告知，定于三点半钟进城；后来又來電話，改为一点半钟进城。

将到十点钟，我們关上营門，断絕交通，准备发动时应行携带各物。这时，統制蕭星垣电召伟良速往司令部談話，我們大家推測，想必泄漏风声了。伟良当即囑咐在营各长官說：“我此去，如一时不能回来，你們必須仍照原訂計劃办事，如上面用電話或字条等來阻止进行，不可理睬。”說毕，即步行出营，徑往司令部。伟良甫出門，蕭又來電話說：“我們浙江已經宣告独立了，你們速即集合队伍，当众宣告独立。”这时已快到十一点钟，距离发动時刻已近，乃决定置之不理。到了十二点钟，伟良召集前左两队全体員兵，宣布光复杭州的宗旨及当夜的任务。每人发給枪弹十五粒及干粮袋一个，左臂纏上白布，各按任务整队出发。前队第一排排长赵立和第

二排排长奚骏声，带领所属开往电话局，执行占领电话总机、切断线路的任务；第三排排长陈滌带领所属及左队护兵庄国梁执行劈开铁路城门的任务。左队由队官来伟良带领，开往艮山门，并分派第一排排长徐康圣带领所属劈开艮山门；第二排排长薛志超监视守城敌兵，第三排排长朱鍊带领所属守住宝善桥，监视附近要路，防止敌人袭击。

艮山门劈开了，守城清军警六十余名未及抵抗，悉数缴械投诚。驻笕桥的步兵八十一标及马炮各部队，悉数整队入城，驻守宝善桥的工兵即撤收警戒，随同八十一标往攻军装局。其余部队守住城门，并派出巡查到城内城外巡逻。

驻南星桥的步兵八十二标从铁道城门进城，其第三营会同王金发的敢死队攻取抚署，放火将抚署焚毁。巡抚增韞当场被执，移时，总参议袁思永也被逮捕分别禁闭。

天明，工程营派出的队伍均以任务完毕收队回营，因电话总机及各路电话破坏较重，仍由前队一、二两排负责修复。伟良外出了解情况，得知民军总司令为八十二标统带周承炎，并闻统制萧星垣、协统蔡成勋均于夜间脱逃。但见城内平静如常，家家户户，偏悬白旗，大街小巷，张贴浙江临时都督童保暄的安民告示。

各部队虽已进入杭城，分头占领机关，而旗营尚紧闭营门，负隅未下。于是，除已派八十二标一、二营围攻外，又加派该标第三营围攻，并派炮队在城隍山脚之环翠楼架炮，对着将军署射击。炮队队官徐士麟为免危及人民安全起见，发炮时不使炮弹开花。旗兵受到炮击，惊慌万分，下午即在迎紫门上插出白旗，打开营门，晚上开始缴出军械，表示归顺。这一段投诚的事情，是旗营中参领贵林所主持，将军德寿附和之。过了几天，德寿密告贵林及其子量海

私藏軍火，陰謀反叛，經總司令部搜捕問罪屬實，遂將賈林父子判處死刑。另有一個參領哈楚顯，在十五日早晨帶領叛軍陰伏車駕橋云貴會館對面的某客棧，伺八十二標軍隊經過該處時開槍射擊，被民軍當場擊斃，與賈林等一同處死。

九月十八日（十一月八日），浙江正式都督湯壽潛就職，在梅花碑舊勸業道署設立都督府，總司令部也設在府內。總司令周承燾是日召開軍事會議，即席提出組織支隊往攻南京事，派朱瑞為支隊長，呂公望為參謀長，以步兵八十一標、八十二標第一營、炮工輜各一隊、巡防營三營，編成支隊。其時，偉良新任工程營管帶，即帶領左隊隊官徐康聖、排長鄭戡、薛志超、朱鍊、司務長陳云飞，及目兵一百二十餘名，編入支隊，參加攻寧之役。

（二）攻克南京

九月二十二日（十一月十二日），攻寧支隊從杭州搭乘火車出發，當日到達上海，在斜橋紹興會館一帶駐紮兩日。由於武裝軍隊不能通過租界，遂將武裝一律卸下，用船駁運至閘北，軍隊徒手通過租界，抵北站改乘滬寧火車。二十五日（十五日）由滬開行，經蘇州到鎮江，後由鎮江再到高資，就地設營，向西嚴密警戒，並由新編馬隊向東陽鎮一帶搜索前進。其時黎天才帶領淞軍一營來歸我支隊指揮，我支隊配給游擊隊一營及我隊工兵半排，以黎天才為司令，夜襲烏龍山與幕府山，於十月初五日（十一月二十五日）占領該兩山炮台，開炮轟擊城內各要點，我軍士氣大振。

初五日晨，我支隊從東陽鎮向南京進發，以步兵八十二標第一營及炮、工兵各一隊為前衛。我工程隊隊官徐康聖在前衛本隊，派

出第三排排长朱鍊帶領所属配属于前卫前队。前卫队将到馬群时，孝陵卫附近发现敌人，当即在馬群东端展开，对敌作战。我工程队除掩护炮兵进入陣地外，并帮同炮兵作成掩体，事毕加入散兵线，与步兵一同对敌射击。敌我双方火力不相上下。旋我軍本队增援上来，伟良随同支队长上火线督战。我方兵力雄厚，士气旺盛，战至下午四时许，敌人逐渐退却。我軍乘胜冲锋，占领了孝陵卫、馬群、紫金山的一部，各部队均在附近自择宿营地。我工程队占领了孝陵卫东边之小山头，这时天色将晚，为了防备敌人夜襲，将队伍从山头移至山脚宿营。詎知到了深夜，邻近部队均向后撤，我队遂成孤軍独守，只得严加警戒，不断巡邏。幸是夜敌人悉数退入城内，我軍得以安全无事。

初六日（十一月二十六日）黎明，我队仍上山头占领陣地，同时，步兵队伍亦上山占领陣地并构筑工事。须臾，我队望見有优势敌人从朝阳門出来向我前进，距离約在一千五、六百米，步枪射击尚难命中；且山头对敌俯射，死角頗大，枪弹不能发挥威力，支队长即命我队向馬群轉移陣地。刚到新陣地，敌正向我正面攻击，火力甚猛，我軍奋勇应战，战至下午二时许，敌火力仍占优势，我軍左翼亦受敌人攻击。敌用集中火力向我猛攻，我方人馬伤亡甚多，步兵队官赵膺陣亡，我队号兵张宝荣、輸送兵沈树堂亦在五棵松相继陣亡。到了下午四时，我軍陣后有淞軍一营增援上来；我軍馬队又由左侧方冲上来，士气为之一振。加以炮兵队队官周承稷、排长王維、王伟、陈挺立等，对准敌方独立房子連开数炮，房子着火焚烧，敌人全线动摇，我軍乘胜冲锋追击，敌向朝阳門潰退。我軍一直冲到城边，以敌人据城拒守，遂仍退回孝陵卫。是晚，我队奉令在馬群宿营。

敌人連日閉城固守，我軍屢攻不得破。初八日（二十八日），我支队組織攻城隊，命我工程隊於是夜十二點半出發，準備用地雷轟炸朝陽門南邊的城牆，並發下重型地雷四個，炸藥八箱。因這種地雷體積龐大，重量達四百多磅，系專供要塞築城用者，我工程隊素未習用，而且不便運動，更不宜用作夜襲之用。偉良乃臨時規定將地雷拆開，選擇身高力大的兩人扛抬雷殼，並編成四個組和預備隊一組，使各人分帶炸藥、發電器材、土木工具等，緊隨其後，按照時間由馬群出發。將到城邊，敵即在側防城堞上開槍對我射擊，並拋下炸彈，我隊在猛烈敵火壓迫之下，無法埋設地雷。此時，探知城門部分並無敵人踪跡，我隊即沿著城腳向城門躍進。司務長陳云飞帶領隊伍，分攜炸藥，首先闖進城門洞里，靠著城門堆置炸藥。城上敵人發覺，投下炸彈並開槍俯射，副兵徐上一中彈身死。當即分散隊形，退出火線。其時天將破曉，我軍後方隊伍先已收隊回營，偉良等待全數人員退盡，最後退回。事後派遣隊伍檢查戰果，據報城門確已炸破，系我隊堆積城門之炸藥中敵彈著火而爆炸的，因城門內土囊石塊堵塞甚厚，不能進入云云。

初九日（二十九日），我支隊下令懸賞召集志願兵，進攻天保城。偉良即在工程隊中選派勇敢善戰的官長目兵五十二人參加是役。第一排排長鄭戡與第三排排長朱鍊首先自願應征，各目兵皆爭先恐後，踊躍參加。我支隊全部應征者一百九十二人，分為兩隊。第一隊一百名，由隊長葉仰高帶領；第二隊九十二名，分為兩排，隊長為張兆宸。隊之任務為偷襲天保城之北。當日下午八時出發，由張隊長率領，冒雨由孝陵衛上山，經過紫金山，向天保城北前進。紫金山坡度陡急，山路崎嶇，行進艱難。但官兵奮勇攀登而上，不多時即全隊通過，與天保城相距大約二、三華里之遙。這時，

适与鎮軍相遇，带队官季遇春带兵約百余人，主攻天保城之西，于是分道并进。西北面仅有少数敌人把守飞鶴岭隘口。一经接触，我軍即用排枪射击，火力猛烈，压倒敌人，敌畏惧而退，陣地全被季队和我张队占领。迨月落后，我两队摸索前进，先后接近天保城，隱約間看見前面似有一大岩障，高低适合，于是即利用作为胸墙，开始射击。初則度放，少时找到敌之第一防线，乃变更射击速度，連放，齐放，枪声越来越密，火力越来越强。可是，敌人利用現成壕沟，陣地坚固，火力也不弱。正在勝負未分之际，忽听左側战斗偵察报告，敌人假投降，叶队长誤认为真，带兵数人冒险前进，被敌排枪全数射死。当时左側火力几被敌方压倒，势甚危急。幸我队士气甚旺，同各队联成一綫，猛烈还击，拼死抵抗，情势得以轉危为安。

敌我双方相持約二小时余。我們看見前面地势低矮处有四十多个帳蓬，目标明显，我們认为这是敌人第二道防线。于是我队和季队决定总攻击，集中火力，专以帳蓬为目标。这些帳蓬被我方枪弹击中后燃烧起来，火焰冲天，如同白昼。我們乘机快放排枪，冲锋陷陣，势若怒潮。敌惊惶失措，悉数退入城内，陣地上仅留遺弃的尸体、烧着的帳蓬，以及凌乱的軍需用品而已。天保城至是为我軍攻克。是役我軍队长叶仰高陣亡，步兵排长余宗魯面部受伤，此外士兵死伤为数不少。我工兵队陣亡者，有正目张庆祥、副目何海鳴、副兵錢振兴等五人。

天保城攻取之后，城中敌軍紛紛渡江而逃，南京遂告光复。浙軍本拟由朝阳門进城，但城門为敌人堵塞，不能通行，改从太平門而入。我工程营左队于初十日晚上随同支队进城，駐扎劝业場茶叶会館。

(三)扩編、北伐与回浙

南京攻克之后，张勋北溃，退守徐州。时江浙联军总司令部撤销，我攻宁支队乃扩充编制，出师北伐。于是将各部队缺额先行补充，扩编成师，更改番号。原八十一标改编为第一团，团长徐则恂，八十二标改编为第二团，所有缺额由新任团长来伟良回浙征兵补充。骑兵前在镇江编成两队，先回浙扩编为一营，营长为谢祖康。炮兵扩编成一团，团长以原管带张国威升任。工兵所缺两连，由管带徐康圣回浙扩编成营。原左队改为第二连，留京调遣，连长为朱鍊。辎重连扩编为营。宪兵队改为宪兵连，仍留京调遣，后班师回浙，归宪兵司令王桂林指挥。所缺步兵两团，以驻防宁波之原八十三标与八十四标补充，开拔来南京，改为第三、第四两团，三团团团长王萼，四团团团长叶頌清。以上步兵四个团，炮兵一个团，骑、工、辎重各一营，编成为五兵种完全的师，称为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以原支队长朱瑞升任，师司令部仍暂驻南京，师参谋长为金华林。第一旅旅长吕公望，参谋主任梁韞，旅司令部附设于师司令部内。第二旅旅长暂缺。此是浙军攻宁支队扩编成师的情形。

时张勋退守徐州，军队尚有数千人。我浙军第一旅旅长吕公望坚决主张北伐，出征徐、宿。乃组织出征兵力，以步、骑、炮、工、辎及游击队各兵种共计四千余人编成混成旅，称为浙军北伐军混成旅，旅长吕公望，参谋主任梁韞，副官主任朱尊三，另附宪兵一连。我工兵连由连长朱鍊率领，排长郑戡、赵立、王旦华，司务长龔锦标及士兵伙等一百十余人组成之。辛亥十一月间（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下旬某日正值大雪，随司令部从南京渡江北伐，进驻宿

州。沿途用火車輸送，到离宿州五十余里之西寺坡下車，改為步行，以防不測。迨至第二年春二月，清帝退位，南北議和，奉令開回南京駐紮，出征徐、宿遂告結束。

壬子夏季（一九一二年五月中旬），浙軍駐寧各部隊分為兩次開拔回浙，均用火車運輸。第一次為第一旅司令部率領步、騎、炮各兵種，先從南京回浙。第二次為憲、步、工、輜及游擊隊等，隨從師司令部回浙。我工兵連列車開到良山車站，整隊回營，駐在營部附近之太廟巷，奉令休息一星期。停數日，在杭軍警及機關團體開歡迎會，會場在梅東高橋大操場。

記攻焚浙江撫署之役

趙 得 三

武昌起義後，浙江巡撫增韜把新軍調到城外南星橋、笕橋駐紮，抽調杭州、湖州兩地區的防營進城保護省城，城內僅留新軍工兵一排，負責主管清泰、望江兩處火車城門的啟閉。

重陽節的晚上，羊壩頭中法藥房鄰近失火，各商店都誤會為民黨起事，大家不敢開門，既不鳴鑼，又無水龍到場救火，让它自燒自滅。次日有人說：革命黨是逢九起義的，象廣州是三月廿九日，武昌是八月十九日等，所以這次火起，大家不敢開門。

上海獨立了，增韜把新式武器都運到旗營去。未幾，蘇州又獨立了，省城人心惶惶，謠言四起，竟有人說增韜看湖北提督兼第八鎮統制張彪的樣，已棄城逃走了。增韜乃於九月十四日輕裝簡從，僅有衛隊隊長趙經新與趙振邦二人跟隨，陪了老娘，帶了妻女，步行上街，在清和坊恒豐綢緞莊、舒蓮記扇莊等大店鋪买东西，借以辟謠和安定人心。

同日晚，增韜設法把褚輔成騙到撫台衙門，加以軟禁，因此，上珠寶巷日升棧記匯兌號內（諮議局議員宿舍），空氣突然緊張起來，同寓人走告司令部。司令部為了應付緊急事變，只有倉卒起義。司令部即將上海、杭州兩個敢死隊百餘人，編成一個混合隊，首先解決撫轅的衛隊，特別是頑強的正、副隊長，責成王金發、周琮二人

帶領出發，到了過軍橋鎮東旅館（上海隊有二十多個嵯縣人寓在該處），分為兩小隊。第一小隊由王金發帶領，在鎮東樓外守候。第二小隊由周琮帶隊，繞道督練公所（那時為陸軍測量局），抄到西轅門向東進發。那時撫轅衛隊在附近一帶都派雙崗，東首的步哨即起而內應，自動地開放了鎮東樓下的大門。於是王金發帶的一小隊人一槍未發，就進入撫轅的東便門和周琮會師。那時月已西沉，燈光暗淡，周琮和王金發帶頭率領十多個人衝進了隊長室，把兩個隊長打死。衛隊和我們守在走廊上的兩小隊人，一起向大堂衝進，霎時間槍聲、炸彈聲和吶喊聲大作。

撫署被我們占領後，衛隊官兵和我們滬、杭兩隊，全體集結在大堂等候補成。未幾，兩名隊員陪了他從西首傳宣廳過來。他對我們說：“你們從速把增子固和他的家屬一起找齊，最緊要的東西是印信，想必還在他身邊，如果他隱瞞，一定要他交出。其次是，衛隊官兵們的行李物件，趕快集中移出，這所衙門要全部焚毀。叫今天接我的長班和轎子抬我到城站司令部去，另外雇四乘小轎，準備把增子固和他的家屬送到城站附近的地方去安頓，由你們去設法。”雷鐵生說：“上羊市街我們的福建會館最好，只有大小兩道門，崗哨不要多派，關防可以嚴密。”不多時，隊員們把增韜和他的妻女都找到了，印信也有了，卻不見增的老娘，後來在小廚房的夾弄里找出來，滿身都是污泥。周琮派雷鐵生、林競標和我三人帶一班衛隊先到福建會館去布置，等了好久，四頂轎子也把增韜一家送來了。聽來人說：放火燒撫署，最初想用炸彈爆炸引火，因炸彈好多不發火，後來買了三箱火油，把會客廳里的坑桌拆去堆在暖閣里，又把兩個死尸用棉被卷了送上去，澆上火油燒化，省了棺材，這是王金發打的主意。

东方快亮了，城站方面派来四、五十个陆军小学学生接替我們的崗位，我們和卫队都回到城站旅館（現在紅樓的前身）休息。其时有三二十人围在那里看“紅諭”，并說先貼了一张浙軍都督童的紅諭，只隔廿分钟，又貼了一张浙江軍政府都督湯寿潜的紅諭，这是啥意思？大家在紛紛議論。

那时我們还没吃早飯，只見两位同学赶來說：“庶务員吳文禧有要事对同學們說，他在头发巷財政司里等着大家”，并說：昨晚在火烧撫台衙門后，不到半小时，小东桥附近开了一排枪。天刚亮时，有新軍一連到学堂里来，他們說是笕桥进城的，城外部队进来一团人，有几个兵在学堂門口追一匹馬，追不到，就开枪把馬打死了。我們有十几人去找吳文禧，吳說：“司令部有两件要事叫我传达：（一）学堂今天伙食不开了，同學們的东西限今天上午全部搬出，因为旗营关門不理睬，我們到宝石山上对將軍衙門的旗杆用大炮轰，如果双方开火，我們的学堂正在火线上，所以今天同學們切不可再到西大街去。（二）同學們留在杭州无事做，要多費錢，司令部拟以路程远近为标准，多則五元，少則二元，一律遣送回籍，到补考毕业时另行通知你們。”当时大家听了有些不高兴，領川資的只有六七人。我身边还有六块钱，所以沒有領，东西已于前天搬在同乡会里了。我們走出財政司，我回同乡会，他們都到西大街去了。五点钟后，同学六人到同乡会来看我，并說炮沒有轰，旗营門已开了，在官巷口迎紫門繳了一部分枪支和子弹，新式武器还没有搬，又听說貴林被將軍德济告密；說他叔侄二人阴谋在河里、井里放毒药，已被捕，快要枪毙了。旗营里准备派新軍去駐扎。

到此，光复浙江省城的軍事行动，大致結束，計算時間，农历九月十四日晚十点钟起到十五日下午六点钟，只有二十个钟头。此

次光复杭州，速成科同学们很有功，因为杭州城里的巡警机构，绝大多数是他們所掌握的。

杭州光复之夜的一次官紳紧急會議

許炳堃

一九一一年农历九月十四日中午，撫署電話于午后召集官紳紧急會議。屆時到者寥寥，除巡撫增韞外，出席者仅藩司顏某、督練公所總參議袁思永（巽初）、杭嘉湖分巡道旗人約某、杭州府知府英霖（旗籍）、仁和县知縣沈思齊數人，臬司、提學司、鹽運使、糧道、勸業道、巡警道、交涉員及其他各局所的官員均未露面。所謂紳者，仅有陳漢第（仲恕）及許炳堃兩人而已。延至下午四時，勢難更待。于是增韞開口說：“昨日沈衡山、湯爾和二位先生赴滬，約今日早車回杭，至今未到，形勢緊逼，如何辦法？”四座聞言，皆默然不答。少頃，袁思永夸口說：“城內有巡防營十數營，每營五百人，械彈充足，新軍仅一千七百人，且在城外，每支槍只有三發子彈，不足為患。”袁談畢，仍無人發言。英霖失望之下，痛哭流涕，因謂若不宣布獨立，無法解紛，其言甚多，但听不明白。增韞乃令沈思齊起草浙江獨立布告。沈即席起草畢，先抄送增韞過目，增閱后轉交藩司，依次傳閱，皆无异議。增囑即抄印分貼十城門。英說：刻板（撫署告示向來刻板印刷）已來不及，可着十人分寫，送將軍署會印。增允照辦，即散會。時已夜八時余。至十一時左右，市上發現槍聲，旋見撫署火起，黨人已開始行動矣。

据陳漢第（時在撫署任幕僚）事後說：官紳會議后，獨立布告寫

好，已夜十时，即送旗营会印，但营門已閉，拒不肯开，因此会印不成，布告始終未曾貼出。

湖州光复回忆

邱寿铭

辛亥革命时，我曾参加湖州学生军，尽过一分力量。关于当时湖州军事和政治情况以及与土豪劣绅的斗争情形，虽事隔五十年，还能记得大略，分述如次：

(一)军事方面：湖州光复时，全湖属(包括长兴、泗安等处)的清朝军队只有水军而无陆军。扎在泗安的水军由刘统领管带，扎在城内和近城各镇的由周统领管带，另一部分水军扎在南潯镇，由费君组统领管带(乌镇包括在内)，此外还有警察数十名。浙江省城在农历九月十五日光复后，次日(即九月十六日)，我们湖州府中学堂里的教员余子泉(杭州人，军号教师)、陈振甫(杭州人，体育教员)从杭州来到湖州，与我们校长沈谱琴(名毓麟)和代理校长钱恂(号念劬)联系，协商决定晚上举义。当晚，余、陈两教员和沈校长率领了学生军数十人(包括尚武公学学生)出发，一面说服了吴兴县知事吴继彪及驻城水军周统领，一面包围警察局，缴了他们的械，并到厘卡总局缴了他们的款，同时在要道上布置岗位。次晨，满城插了白旗，成立了临时军政分府，推举沈谱琴做了首长。数日之后，学生参加队伍的增至百余人，成立了一支学生军。又扩充了商界自卫团，共同保卫湖州城。

约半月之后，泗安刘统领奉省令调至拱宸桥改编(编为水上警

察),经过湖州,扎在西門外,与周統領对峙,几乎冲突。沈譜琴密令南潯費君組統領帶了水軍来湖監視,因此刘統領就軟化了,未致肇事。在刘統領离湖之前夕,他部下的兵士在街上商店和当鋪里强买硬当,城中一度紊乱。我們学生軍是日适在南門外道場山野外行軍,城中空虛得很,虽有費統領監視一部,未能全城顾到。軍政府下令飞馬調我們进城。在南郊三里路之张仙亭,两軍相遇。我軍在陆岸,彼軍在河中。我軍首先放枪射击。他們兵士搶了东西,无心抗拒,遂举白旗表示屈服。我們长官乃下令停击,任其航行赴省。

(二)政治方面:湖州光复后,临时軍政分府由沈譜琴主之,民政长由我們中学里的代理校长錢恂担任。財政方面由沈树人(前清官吏)担任。軍政分府內設有軍法官,由陆庆誉(丽宋楼藏书主人陆心源的孙子)担任。当时实行的政治措施,主要有豁免錢粮、整理厘卡、释放囚犯、悬白旗、剪辮子等等,面貌焕然一新。但过不多时,財政紧张,四乡盜賊蜂起,农民不安于室。临时軍政分府維持了三个月之久,后来上海方面派俞凤韶、李次九、严濬宣帶了广东兵两連来湖接替,并与省联系,整頓政治,面貌又是一变。

上海方面委俞凤韶(号寰澄,德清新市人,原籍归安,前清举人)为軍政分府主任,委李次九(归安双林鎮人)为吳兴县知事,委严濬宣(烏程驥村人)为秘书长,委沈敦士(归安竹墩人)为軍法官,其余財政、稅务、教育等等亦均经分別委定人选。学生軍解散,一部分回家,另一部分組織了一个经武学校继续讀書。

(三)与土劣的斗争:光复之初,軍餉开支浩繁,申苏不能給济,一般劣紳殷戶趁火打劫,造成紧张状态。于是政府首先劝令紳商捐助軍餉。当时願认捐者虽多,而不願者亦有之,甚至有頑抗

者。例如宁长巷的沈新祚是一个著名的劣紳，平日放高利貸，拥有現銀巨万，对地方慈善公益費等常常拒絕捐助，这次他还是老一套，一毛不拔。政府遂下令由陆庆誉带了学生軍若干人把他家前后門包围起来，勒令其开发窖銀，結果从窖中取出現銀数万元，一时人心称快。

俞、李来湖执政后，首先由沈敦士带了軍隊下乡緝捕土匪，鎮压了首恶若干人，以靖地方，并对反抗革命的土豪地主进行斗争。例如双林近乡重兆村的陈云軒(綽号陈四皇帝)和石淙乡的陈天有等，均先請其来城，劝令捐助軍餉，如頑抗即加以管押。陈云軒罪恶最大，他以放重利起家，如在冬季里放出銀圓五元，到次年蚕罢即要本息六元；如果五月里不完本利，結成总数六元計算，到十一月底要八元四角了。十多年之間不仅沿村农民的田地大半归其所有，連安吉、梅溪一带都有他的債務了。经传訊之下，他非但不肯悔过认捐，竟出言不逊，强項凶狠。因此把他管押約一、二个月之久，由其孙陈貞伯来城挽出郑康葆等調处，认繳軍餉一万元了事。

辛亥革命时期的硖石商团 和工兵铁道大队

吳 欣 木

浙西海宁硖石鎮，商业繁盛，人烟稠密。清朝末叶，由于政治腐敗，民生倒悬，强悍者挺而走险，附近各鎮，迭受騷扰。硖石既为商业中心，惴惴焉唯恐不保。一九一〇年（清宣統二年）七月，由地方人士徐光溥、我父吳清等仿照上海南市商团成規，拟办硖石商团，用以自卫。各店鋪行厂青壮年职工报名参加者一百三十余人，公举徐、吳两人为团长，聘新軍退役軍官程搖九、陈伯平等为教练，开始訓練。一面向浙撫署請領枪械，其初格于撫署參議袁思永的阻撓，后挽人疏通，始領到旧法国造十三响法得利步枪六十枝，子弹两万发。次年，以人多枪少为詞，二次請求补給，又領到老毛瑟步枪二十支，泰士毛瑟步枪二十支。此时前海宁州知州李瑞年为重来郭級，又牧海宁，与地方父老类多熟识，見硖石商团成績斐然，頗为贊許，特将自有的德国造七九口径套筒快枪十支，附帶子弹数千发，举以相贈。各团员劲头更高，訓練益勤，团员人数也逐有增加。是时浙路已经通車，路局总办为湯寿潜。硖石商团又与沿线邻近嘉兴、王店等处地方武力取得联系，互为声援，因而声势頓壮，地方賴以安定。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首义，十一月四日（旧历九月十四日）上海宣布独立。上海光复后，急待浙江方面响应。当时駐浙新軍为第二十一鎮（統制蕭星垣）第四十一协（协統蔡成助），轄八

十一、八十二两标，駐省垣外围。陶成章等早已与两标中人联络就绪，约定举火为号，开始发难。先是杭州士紳恐怕糜烂地方，劝浙江巡撫增韜以和平安民为怀，宣布独立。但增韜本为滿人，头脑頑固，拒絕杭紳劝告，而且恐怕新軍不稳，将枪弹斲而不发，新軍有枪无弹，不敢貿然发动。褚輔成是嘉兴人，与我父早有联络，知硤石商团部分使用的德造七九口径套筒步枪与新軍所用的步枪完全同型，即派查人伟回硤石与吳清約定，借取七九步弹二千发，約期派人提取。旧历九月初三日，褚派傅孟到硤提取枪弹一箱，秘密运回杭州。当时我父在浙路局当总稽查，沿路都是熟人，为了审慎起见，把一箱枪弹放在旧网籃内，上复杂物作伪装，派人擱着，亲自送至硤石車站作为行李运出。

硤石商团与省方革命組織互通声气，早作准备。杭州于十一月四日夜半发动后，硤石方面立刻得到杭州城站站长江芸亭的电话通知。我父即帶領了全体团员出防，在車站挂上了白旗，警戒铁路一带，監視往来車輛，并与嘉兴等处互通消息。至天明时，硤石車站站长蔣肖初接得嘉兴車站站长电话通知，嘉兴軍政分府已成立，由方于笥为首，但駐嘉水上警察队官(姓名已忘)表示反抗，調炮船集中南湖附近，炮口直对城内，实弹待放，人心异常惊慌，分府已急电杭州告急，并囑通知硤石商团就近派队来嘉协助鎮压。我父即帶了团员八十余人登車出发，八时許到达嘉兴，即在車站对南湖中的炮船布防，候令冲击。十时許，杭州都督府已派炮兵队官帶了新軍一大队赶到嘉兴，而分府已派人說服水警队长投降，一場紧张局势，就此解除。当杭州軍隊来嘉，車过硤石时，硤石文人陈橫齐亦搭車来嘉，通知我父說，反对革命甚烈并曾阻撓硤石商团領枪的撫署參議袁思永由杭逃沪，正在后面車上。我父即帶了团员

上車检查，當場把袁扣住，派了团員四人押解至杭州都督府处理。硤石商团在嘉，見水警队长投順，杭州派来新軍已到，即在傍晚登車回硤。

当天(五日)夜里，我父又率領商团人員四十余人，雇快船前往海宁州城，六日天明到达，在附近春富庵登陆，遙見城上已升白旗。硤石商团队伍軍乐齐鳴地进入城內，直抵州署，市民夹道欢迎。知州秦某已逃，屬下出外迎接，城內士紳周蓮夫(周承蒞之父)、沈冕夫、张信甫、唐銳甫等到行署欢迎，并由士紳出面电告杭州都督府海宁全县光复，一面招待商团团員至北道宮庙內午餐。我父带队在当天下午回到硤石。杭州方面不日派武康人唐鑑为海宁县民事长(当时县官名称尙未定)。硤石在光复的两天內，盜匪乘机窃发，附郊农村一夜間有三处发生盜案，商团团員跟踪緝，捉到了綽号羊皮小毛的积盜沈某，真贓現获，电报杭州临时司令，得复电执行枪决。

十二月三日(旧历十月三日)江浙联軍攻克南京，总督张人駿、將軍铁良逃走。提督张勋退徐州后，收拾残部負隅抵抗。联軍組織北伐軍，准备北上杀敌，扫穴犁庭。浙督湯寿潜命令浙路局总工程师徐策組織工兵铁道大队。徐本鎮人，与我父清又为浙路同事，吳即发动商团团員参加。一語甫出，立时报名参加者一百二十余人。我是时年已十三岁，本为商团軍乐队队員，到此亦随父加入。当地一班文人、小学教师，劳工小販等都願意参加，可見当时革命劲头之高和民气之发揚。徐策又动員浙路員工加入。这样，就組成了一支四百多人的工兵队伍，出发到南京集中，以成賢街大石桥旧两江师范学堂的校舍为大队部。旋奉令統一編制，編为北伐軍第八师(师长陈懋脩)交通团(团长邓质仪)铁道营(营长徐策)。营

部人員为文牍朱起凤，書記柏志夫，軍需尤季良，总务黃詠森，我是营部号兵。营以下分四連，以查人伟、沈倬章、陈孝义、褚起貴为連长；徐揆亮、徐驥良、蔣冠千等十二人为排长；王叔英、宓清华、查济纲等为班长。交通团編制除铁道营外，还有一个电信营，营长方策；另一个飞艇营，拟而未編。此时我父由浙督湯寿潜举荐，任南京卫戍总督徐紹楨的參謀，并帮助徐策办好铁道营的編制事宜。我們編制成軍，每人发了一套灰布白領章的工兵服装，加紧訓練，枕戈待命。

十二月二十九日，各省代表會議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議决中华民国紀元改用阳历，以是年旧历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职。中华民族数千多年来的封建桎梏一旦解除，举国騰欢。我們铁道营全营官兵也参加了南京孝陵卫的庆祝大典。不久，南北議和告成，我們交通团铁道营奉令撤銷，志士們各回原来工作崗位，迤返故乡。我随同我父回浙，路过嘉兴，造訪嘉兴軍政分府方于笥和分府參事陈仲权（陈亦为革命志士、同盟会會員，后来被人鳩死），交談甚欢，方延我父为分府參事。是年五月十八日，各地軍政分府奉省令撤銷，嘉兴分府首先通电撤銷，为各路倡。先是方分府兼任嘉禾县知事（时改嘉兴为嘉禾，旋复旧称），分府撤消后，方荐我父代理嘉禾县知事。我也进了省立第二中学讀書。我写的五十年前辛亥革命的回忆事迹也至此終結。目前硤石商团团员参加辛亥革命的，还有七十八岁的方竹安，七十四岁的王叔英，七十三岁的徐驥良和六十三岁的我四人而已。

宁波光复亲历記

林端輔

一 創辦“墮民”學校

我写辛亥宁波光复，必須先写育德初等农工学堂及我在該校充当教員的经过；育德学堂是“墮民”学校，因此还須先写宁波“墮民”的情况。这都与辛亥革命有密切关系。

宁波“墮民”亦称“墮貧”或“丐戶”，不知始于何时，相传为宋将焦光瓚的遺族，因焦光瓚降金，故被擯于士农工商四民之外。元人名为“怯怜戶”。明太祖定戶籍，區其門曰“丐”。他們沒有田地，也不经商，社会地位低人一等，充当各种賤役，不得納贖为官吏，不得入学讀書，不得参加考試，男女自相配偶，不与平民相婚姻，服飾亦与众不同。《鄞县志》載：“四民居业，彼不得占；四民所籍，彼不得籍；四民所常服，彼不得服，所以辱且別之者也。”

清光緒間，鄞人富商卢洪昶（鴻滄）怜墮民之所受种种苛待，极为不平，乃恳托达官貴人从中設法，力謀拯之，使其享受平等待遇。旋经清帝載灃頒发諭旨，准其捐贖兴建初等农工学堂，收教墮民子弟，并准墮民出籍。于是就在宁波西門內盘結坊設立育德初等农工学堂，商請慈谿陈訓正为校长，林端輔、俞鴻椿、虞菱舫、张世杓（葆灵）等为教师。学生七八十人，分为三班。同时在宁波江东設

立育德小学(当时在绍兴亦有招收墮民子弟入学之同仁小学建立,因宁波及绍兴都有墮民聚居)。墮民出籍得享受平等待遇,可算是一种史无前例的事情。記得当时校中大礼堂曾悬有匾額一块,朱底金字,边飾双龙,上載光緒諭旨全文。开学的日子是清光緒三十年十月初十日,为慈禧太后七十岁万寿节,算是皇帝“恩施”的紀念。

盘結坊在宁波西門城脚下,为墮民聚居之处,里巷陋隘,房屋低矮破旧,平日行人很少,地极僻靜,作为革命活动的掩护极为相宜。

陈訓正,字吧怀,別号天嬰,素負文名,有志于革命事业,平日与其友赵家蕃(躬儼)、赵家艺(林士)兄弟及林端輔(字蓮村,后改黎叔)密謀在甬組織力量,响应革命,又与上海陈其美、张人杰等互通声气。他自任育德学堂校长之后,即以該校为秘密集議之所,策划进行。当时育德学堂的校歌,內容頗具民族意识,茲录于后:

堂堂亚东,泱泱大风,四明佳气横青葱。問越中子弟,誰人不是文明种? 黑消紅灭,何堪父老尙痴聋。撞破自由钟,責任如山压肩重。喚起人間夢,民权挽补天无功。願同胞大家努力,一雪奴才痛。心腸菩薩胆英雄,福我众生众。

二 组织宁波国民尚武分会

宁波国民尚武分会由陈訓正、范賢方(仰高)、邵懋棠(靜山)、林端輔、张世杓(葆灵)、章述浹(許泉)、张寿鏞(詠霓)、张传保(申之)、陈时夏(季衡)等所发起(总会在上海,由沈縵云主持),经过联络当地士紳、各界領袖,于清宣統三年七月成立。宗旨为“提倡武风,挽救文弱,鼓吹革命,网罗人材”。会址在道署右側崇实书院旧址。公推邵靜山为会长,范賢方、林端輔为副会长。名誉董事有

費紹冠(冕卿)、顧元深、陳南琴、屠用錫(康侯)等。干事員有勵延豫(建侯)、叶懋宣(德之)、周駿彥(枕琴)等。兼总干事林端輔主持会內一切事務。文牒兼編輯章閻，庶務周藜光，教練員陳肇英(雄夫)。陳肇英是寧波新軍的排長，為寧波府中學堂校長黃人望(伯洵)所介紹，暗中實有聯絡新軍內下級軍官的作用。

会內主要工作有：(一)發行刊物，定名《武風鼓吹》，每旬出一期，每月三期，逢一出版；(二)成立國民體操團，征求團員，分期操練。

《武風鼓吹》的宗旨是闡明武德，激揚武風，使合郡人士皆有同仇敵愾之心，以合于“軍國民”之資格。內容分論說、學術、紀載、國內外大事紀等。編輯章閻，字叔言，又字巨摩，性豪爽，能文章，師事慈谿馮君木，青年壯志，熱心革命，主編《武風鼓吹》，煞費苦心。出刊之後，數量日增，寧波各界人士、青年學生，莫不爭相訂購，先閱為快，社會風氣為之一變，于革命事業有所貢獻。

寧波國民尚武分會體操團的宗旨是“提倡尚武精神，養成健全軍國民”。學科分普通操、兵式操、國技、軍事學、生理學大要。學生名額為一百名，凡年在十六歲以上，身體健壯，品行端正者皆可報名，但須有各團體或商號保證。以一年半為一期，期滿由會給予證書，遇秋季大操時，仍須到會合操。

教員六人，一兵式，二國技，三普通操，四軍事學兼生理學，五遊戲(陸上、水上各一人)。體操團的操場，本想借用府學操場，已經商得教諭陶某(忘其名)應允，惟因修理尚需時日，暫先借公園隙地操演。

寧波革命運動向由陳訓正主持。上海方面主持者為趙家蕃、趙家藝兄弟。滬甬秘密通訊，都不通過郵局而交由輪船工友傳遞。

几年以来，进行都很順利。但为日既久，不免风声外露。育德学校是革命党人的机关，渐为官厅所注意，但由于主持者事事防范，处处谨慎，应付当地軍政官員，联络各界領袖人物，运筹策划，力求妥善，所以并未发生事故。

三 成立同盟会宁波支部，组织民团、 商团，成立保安会

在宁波光复之前几月，同盟会宁波支部成立。会长赵家艺，副会长陈訓正。會員数十人，大都是尙武会（会址在何处，已忘記）會員。同时在各县也成立支部。我是被派去組織慈谿支部的，就在慈谿参加。慈谿支部会长錢保杭（吟韦），副会长胡良箴（君海），会址在柳山庙側仓屋內。鎮海、奉化是否亦有組織成立，已不复記忆。

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各省望风响应。宁波为通商口岸，商賈辐輳，风声传来，人心惶惶。尙武会會員范賢方、魏炯（伯楨）、陈訓正、章述浚、林端輔等集議于赵家蓀家中，共謀响应。家蓀字芝室，为家蕃之弟，家艺之兄，大家呼为七先生。时家艺正在上海与陈其美等策划革命，常将上海党人活动情况向其兄报道。大家商議結果，决定先組織民团，借以掌握武装。九月一日，民团成立，公举夏启瑞为团董，范賢方副之，魏炯为团长，林端輔为司令。一日之間，报名参加为团員者四百八十余人。分为两部：一部以陸軍編制，朝夕教练；一部巡徼街巷，保卫地方治安。操場在小教場。林端輔任总教练，范賢方亦常全副戎装，到場为团員讲演革命意义。同时又与商会余潤泉、費冕卿、王蔭亭、陈子秀等洽商，請他們成立商团，以便彼此互助，增加武装力量。記得商会方面曾

在招商局內开会，筹划經費，請領枪械，公文由賢方起草，并由王蔭亭、陈子秀二君担任劝导店伙入团。

宁紹台道文溥是一頑固派，极端反对革命。当民团成立时，他据密报，命令前宁波知府摄鄞县知事江畚经逮捕范賢方、魏炯等严加法办。夏启瑞聞此消息，即避居上海。江畚经头脑較新，向来同情革命，章述洩就在他幕府中任职，两人交誼甚厚。述洩与范、魏等的活动，江早已知道，且暗中給予帮助甚多。因此他在文溥前力为范、魏辨白，对逮捕令置之不理。后来风声日紧，文溥再告江畚经时，畚经答以大勢所趋，人心所向，現在滿城都是革命党人，如何逮法，并劝他速自为計，迟恐后悔莫及。文溥聞之大惧，当夜奔印携眷而逃。陆军协統刘洵(潤田)，标統馬志勛，防軍統領常荣清，经賢方、伯楨几次試探、几次說服之后，他們鉴于大勢已去，无可挽救，不得不看风轉舵，傾向革命。

九月十一日，当地軍政官員，地方父老，各界領袖，集合于道署右側府教育会，由范賢方主席。當場成立保安会，公推江畚经为会长，陈訓正为副会长，軍官刘洵、馬志勛、常荣清，警官陈紹舜、刘孔韶，自治会长励延豫，商会总董余承誼(潤泉)、費冕卿，民团团董范賢方、团长魏炯以及赵家蓀、顾釗(元琛)、屠周錫等为干事。凡軍政一切事务悉归保安会决定。当时浮言四起，縉紳富室多有携眷他避者，內外騒然，人心浮动。保安会办公地点亦常有移动，以防不虞。

四 宁波光复经过

保安会举行第一次會議时，范賢方欲先发制人，即日宣告独立。赵家艺适由上海来甬，他在沪临行时，陈其美告以宁波方面要

听上海消息，上海未动，宁波切不可动；上海若有动静，必先有电告。所以家艺力劝贤方不可轻动，训亦正主宜缓不宜急。贤方盛气凌人，竟出恶言，双方相持不决而散。旋接卢成章自江北岸发来通知，谓他已租赁马匹率领多人由东门入城，囑民团和尚武会赶作准备。当时民团司令林端甫以魏团长伯楨适不在家，尚武会会员散居各地，召集不易，即商同民团高级人员率领全部团丁出城相迎。至东门口，即见卢成章领着多人，骑着白马，臂缠白布，手执“保商安民”旗子，一路高呼“光复军到甬”。于是东门街各店纷纷竖白旗欢迎（白旗系卢成章预先做就，沿路发给）。成章旋至电报局伪造“杭州光复”来电一件，持往保安会召集紧急会议。到会的人甚多。会议至深夜，才决定暂设宁波军政分府。当场举出下列名单：

都督 刘洵 副都督 常荣清

参谋总长 馬志勛

民政部长 江畚经(伯训)

副部长 章述浚 馮丙然(子蕃)

财政部长 陈训正(陈辞,改为张传保)

副部长 費紹冠(冕卿)

执法部长 徐家光(秀甫,后改范贤方,范赴省又改方泐生)

副部长 王棻軒

总务部长 魏炯(后改张世杓)

军需科长 叶懋宣

外交兼交通部长 卢成章

副部长 袁礼敦(履登)担任外交方面事务

副部长 陈夏常(謙夫)担任交通方面事务

参议部长 赵家艺(林士)

副部长 余鏡清(民进)

参議員 励延豫 李鏡第(霞城) 孙紹康(莘墅)

廖寿慈(淦亭) 陈滋鎬(傲僧) 林端輔

曹位康(馥山) 鎮海代表

孙振祺(表卿) 奉化代表

馮 群(孟頴) 慈谿代表

虞 晋 定海代表

卢成章字志学，为育德学校创办人卢鴻滄之子，英国留学生，性豪放，善交际，机警过人，向在上海参加革命工作。当时地方有“卢成章单騎克宁波，林蓬村率民团内应”之謠。

宁波軍政分府成立之后，即日布告安民。民团、商团出动維持秩序。下令剪髮辮，官吏学生士兵等限三日內剪去。但頑固之人抗不服从，不肯剪去。后来再经民政部、执法部会銜出示：凡不服命令、不剪辮子者，剝夺其公权及訴訟权。六城門旁站崗巡警各执剪刀，遇見进出之人之拖辮子者，即强迫剪去。又派員在各熱鬧市区及城隍庙等处对众演讲剪辮子的好处，劝导群众服从命令。因此城中居民不論男女大都剪去。乡下风气未开，一般老农都不敢进城。

軍政分府后来得知杭州尚未光复，宁属各县都未发动，宁波一处势孤力薄，恐有变故。乃于十六日在小校場誓师，留民团、商团守御本城，令陆軍出紹兴助攻省城，并分派防营收复各县，但尚未出发而杭州光复电报已到。乃派李鏡第(霞城)去鎮海，周駿彥去奉化，范賢方、张晋(綱伯)去定海。慈谿胡良箴、錢保杭已收繳县印，奉楊敏曾为县长。十七日鎮海光复，十八日奉化光复，十九日定海光复。象山张乃文、王保誠，石浦秦英鑒都来甬集議，两地旋

亦光复。

軍政分府成立后，最感困难的是經費問題，尤其是軍餉更不易应付。究其原因：杭州光复后，浙江軍政府宣布全省豁免田賦一年，并废除厘卡，原有稅局一律撤銷。因此各地前收粮稅，遂皆截留而不上繳。宁波为浙东重地，陸軍协統、防軍統領均在此坐鎮，駐在紹兴、台州、温州的軍隊，都归宁波管轄調派，餉銀亦由宁波发給。省庫空虛，既无法拨付，地方又无稅款可收，軍餉来源几乎断絕，不得不自行筹划，以資应付。经參議部开会討論，决定办法兩項：(一)向人民募捐，劝导地方巨商富戶踊躍輸將。但当时巨商富戶大都迁往上海或避居租界，热心公益、乐于捐輸者为数不多。后来根据总务部报告，共收捐款約为十一万八千多元。(二)标卖官营产业。記得有鄞人袁友仁承买营地，得价銀十万元，友仁又乐捐几万元。軍政分府經費才得維持过年。浙江軍政府因庫幣空虛，曾发行軍用票，有时亦撥給宁波以应急需。但人民对軍用票多不信任，流通极难。经再三設法，乃由中华銀行(光复时財政部接收大清銀行，改名为中华銀行，派赵家蓀为行长)出面与浙海关外人稅务司接洽，請海关方面收用軍用票，并先撥現金一万元，作为兌換軍用票之保证金。有人以軍用票前来海关繳納稅款者，海关收到多少，即在現金內扣除多少，不足之数，再由銀行补撥。軍用票从此稍得在市上流通。

浙江全省光复以后，各地軍政分府已无存在必要，都宣告結束，宁波自不例外，惟結束时詳細情况，今日已不复記憶。只有以下几件事还約略記得：为了解决軍餉困难，将所有軍隊派出参加北伐；軍政分府所有公产公款以及一切未了事务，另組織六邑公会管理，并办理善后事宜。六邑公会是就宁波府属六县(鄞、慈、鎮、奉、

象、定)各派代表一人共同組織的,会长为李鏡第,地址在后乐园府教育会。軍政分府結束,大約在壬子一二月之間。

(本文由作者口述,何雨馨記錄)

彪

温州响应武昌起义的亲身经历

陈 守 庸

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浙江第十中学堂（即现在一中的前身）担任英文主任教员。武昌起义消息传来，人心大为振奋。一天夜里，十中和温州师范（地址在现在道司前一中本部）的教职员一共十二人在十中秘密开会。在这十二个人里面，我仅记得有十中监督刘次饒（紹寬），师范学校监督黄仲荃（式芬），十中监学刘凤仙（項宣）。秘密会议作出了两项决定：一、请现任地方长官主持组织革命政府，并推出刘次饒、黄仲荃、刘凤仙和我四人协助进行一切改革事宜。如地方长官肯如所请，即请他们先行剪去髮辮，以示反正决心。二、俟革命政府成立后，将西郊过单楼厘卡委员年凤臣（滿人）就地正法，以作反清示威。

次日早晨约九时许，我们邀请甌海道道台郭则澐、温州府知府李前泮和防营统领梅占魁来到师范学堂二门开会。当时道、府均屏除仪仗，穿便服，坐小轿，先后到达。郭甚年轻，约三十岁左右，进士出身，他父亲郭曾忻是礼部侍郎。道台系本地最高官长，我们就首先推他主持成立革命政府。他说：北京政府尚未推翻，他如果一投向民国，他父亲的头就保不住了，因此他不敢担任新职位。接着大家改推李前泮，这个人约有五十多岁，是湖南人，他认为自己是李续宾的后代，也表示要全孝于祖宗，不能效忠于民国。最后要

梅占魁表示态度，他就滑头地说：“你们怎样，我也怎样。”

会后，这些清朝官吏如丧家之犬，各自设法秘密逃走。李前洋先匿居邻近东公廨（今人民广场左）伯兰氏医院李筱波家中，嗣即扮成工役模样，混入人群，出城溜走，所有个人细软物件概未带去，被差役人等搬取一空。郭则澐也想逃走，先跑到他的门生孟筱鹤（鸣皋，清优贡）家里。偏偏这个门生胆小如鼠，拒绝收留，后来只得躲到滄河巷贫民习艺所所长劳少麟那里去（后来郭在国务院任职时，保举劳为参事，以报昔日收留之恩）。郭去后多日，我才知道是由刘次饒、黄仲荃两人在夜半护送他乘招商局普济輪船逃往上海的。

两个清朝地方官已经逃之夭夭，梅占魁则拥兵自重，态度暧昧，同时，和我一起参加那两次会议的人也都走避一空，不知去向。温州軍政分府一时未能成立。地方动荡，謠言蜂起。我和我的三哥陈禹門商定，由他去拉姚养吾（雷漁）出来，因为他长于文牍。于是三个人到道台衙門里布置一切，先稳住局面。一面由我去打鑼桥刻一顆“温州軍政分府”的木质印信，就用它来出示安民。一面由禹門赶到大清銀行，向代理行长张益平查明該行尚存有各机关存款十三余万元。当即告知，非有軍政分府印信，任何机关官員不准提取分文。此时一切开支系由我以私人名义向铁井栏林祥記錢庄（永嘉首富）挪借八百元作为开办費用（因当时道台衙門所有用物均被地方搬取一空，必須重新购置）。

当时我們对梅占魁的态度总不放心，不能不有所戒备。于是便发起招募民团，建立自己的武装，以防万一，同时也可响应北伐。我就与姚养吾去找适自外地归里的胡方尧（武举人，湖北武备学堂出身）。商量結果，議定招集四百名民团，由胡担任总团长，下設四

个分队长，各領一百人。分队长系胡方禹、洪杰士、姚志甫以及黃頌英（原名仲英，今犹健在）。此外，还請陈百川（前清武进士）接任甌江水师分統（前分統晋省公干，不在温州）。至于我們十二个人在师范学堂秘密會議的第二項決議，即將西郊厘卡委員年凤臣正法的問題，消息竟传到年凤臣本人耳中，他即亲自来到我家，跪地哀求，留他一命，状极可怜。我即写一信介紹年去見海关稅务司包来灵，請他轉托普济船主（英人）代为保护帶到上海去，同时托余筱泉的侍役阮福（台州人）伴送到沪，以免受人伤害。其厘卡委員遺缺，即請陈筱仙继任。过几天，我的胞弟陈亦侯（譯学館毕业）自湖南回家，我即派其接管电报局。至邮局方面，因当时无熟悉业务的人可派，只得听其照旧維持。其他各机关職員，亦一律照旧，未予更动。

温州自宣布独立后，各县紛紛派人前来探听消息，我与禹門决定向各县人士建議，由每县来温士紳中推出一人，共同保管十三万余元公款，众咸贊成。現在我仅記得永嘉代表为陈禹門，瑞安代表为陈式卿，泰順代表为刘凤仙（未到），其他均已忘記了。財政既有人負責，我与姚养吾专管行政，間或邀集各方人士商酌一切。不久，姚养吾与我时有齟齬，他以为我年少气盛，不肯听他的主张和梅統領合作。我对他解释：梅是一个老粗，毫无政治見解；他虽拥有数百人的軍隊，却多腐化不堪，不能成大事，如我們推他作軍政分府領袖，万一他中途变卦，将公款十三万余元窃取而走，我們將无以对地方人民，我們对梅只有敬而远之。各县代表及胡方尧等人亦不贊成姚的主张，于是姚以赴省观光为名，离开了温州，一切責任只得由我一人負担。

姚去后，梅占魁探知我不贊成他任軍政分府，又听到有人說我办民团是为了对付他，便老羞成怒。有一天，他帶領大队人馬把我

家团团围住，他自己气势汹汹地闖进我家里，一定要找我和我的三哥禹門。幸好我們二人都不在家，否則就会吃他的亏了。次日，我們仍旧到道台衙門办事，惟暗中請胡方尧派人保护。梅亦未敢再来寻事。

那时陈介石先生因杭州民軍杀掉貴林一事，与省里一些人发生齟齬，回到温州。他于抵温的次日下午，即派他的胞侄陈孟聪（怀）和門生章味三（猷猷，瑞安举人，做过广东知县）来到我家，向我商量，肯否将温州軍政分府让給陈先生来担任。陈先生是温州年高德劭的人，况又是提倡新学的前輩，平素我对他非常敬重，此次肯出来担任革命事业，自然万分欢迎，亦可借此减轻我的責任，当时我即表示首肯。是日晚間約七时許，陈孟聪复来邀我同到丁字桥巷余朝紳（介石先生的儿女亲家）家的小楼上会商。記得在座的人，除章味三、陈孟聪和留学生考試得中进士的薛式格外，尚有不认识的多人。会上决定由陈先生为首，成立温州分府，推定章味三为秘书长，陈孟聪为副秘书长，推我担任外交部长，其他如民政、財政、軍政等部应有尽有，現在已不能将当时各部长名字——列举出来了。陈先生拟好布告，在当日晚間十一时左右貼出，不料次早就发觉被人撕掉了，有人說这是梅占魁所指使的。同日下午我們接到杭州来电，也不承认陈先生。因此他感觉沒趣，跑回瑞安老家去了。我仍旧与我三哥禹門等人支撑下去。在这一段时期內，除东門发生一次民間火警，由我和胡方尧率領民团半夜馳往扑救弹压外，一直未出过任何意外事故。

不久，省方政局粗定，浙江軍政分府正式委令永嘉楠溪人徐班侯（定超）来做温州軍政分府。徐原是清朝的进士，山东道御史，时丁忧在籍，被省方聘为省师范学堂校长，此次来温，带来許多人員，

既有省庫十三万余元留待他使用，又有一班士大夫階級的人才相助为理，一切的事自然好办得多。他到后，即从道台衙門搬到温州知府衙門（現改为人民广场）办公。我把经办的事情移交給他，步出知府衙門时，口里私下念了一句英語：“我已尽了我的职责了。”

我这次所叙述的经过事实，与一九五七年市教育局出版的《温州近代史資料》所載辛亥革命时温州光复的回忆一文微有出入。因那年教育局同志来訪問我的时候，匆遽之間，我很难将相隔四十多年的事回忆清楚，且未将笔录原稿交我再加一番修改补充就付印了，以致事实多有缺漏或錯誤。現在是由我慢慢写出来的，比之前稿似觉較為詳尽确实。

乐清辛亥革命史料

周起渭

(一)陈乃新的新山歌案和月空和尚起义

陈乃新一名耐辛，乐清东乡虹桥人。虹桥是温台四大镇之一，人烟稠密，商业繁盛。清咸丰四年十二月（公元一八五五年一月）当地人瞿振汉响应太平天国，称奉东王杨秀清札委为“浙东虹军统帅”，率领群众起义，乃新的上代和亲戚，当时也有参加过，所以，他的革命思想是渊源有自的。他经常出门，奔走沪、杭各地，联络同志，并到过日本、南洋。他创作了一本新山歌小册子，内容是述清政府腐败，外祸日亟，号召群众起来救亡图存，当时旧温、台、处所属各县都有流传。

乃新和红崖碓的和尚月空最为知己，来城的时候，多在月空处膳宿（红崖碓在县城外西山，距城仅三里）。月空和尚俗姓黄，名飞龙，乐清西乡湖头人。他的父亲是一位老秀才，中年因受刺激出家于离城二十华里的狭门禅寺。飞龙幼年跟他父亲在寺里生活，年纪稍长，也剃度为僧，取名月空，字悟西。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父亲亡故，他就离开狭门寺到红崖碓来，独自住在碓内，和陈乃新以及城里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暗中进行革命活动。他们拟从创办学校入手，但办学要有经费，因想到县城外附郭的白鹤寺有寺产田

九十多亩，住持华山也是一个开明的和尚，可能取得他的帮助。因此，大家公推月空去和华山商量。

华山和尚俗姓陈，乐清县城人，幼年出家于东乡的郭路庵，赋性骨鲠，不畏权势，同情革命。

月空去向华山一說，华山就允将寺产半数充作办学经费。他把原来佃种收租的田全数收回，率领全寺僧众二十余人自己来耕种。每年的收入比较收租时增加了两倍，非但办学经费有着落，而且众和尚的生活又得到改善，可谓一举两得。

一九〇六年三月，乃新和月空等创办一所“僧民学校”，以白鹤寺前进和两廊为校舍，招收僧人和平民子弟入学。月空作校长，乃新一班同志当教员。校内除普通功课外，以新山歌为主要课本。至于体育，则授兵式体操。乃新复在东乡杏庄地方办了一所明强女校。当时风气未开，女子读书的很少，只招收女生二十余人，聘一女教员。乃新往来城乡，主持一切。

当年七月间，因清政府筹备立宪，乐清城里开会庆祝，各校学生都前往参加。我那时候在乐清中学读书，在会场上看见月空和乃新带来僧民学校的学生约有一百人，光头的占半数以上，而年龄都比较我们各校的学生大。僧民学校全体师生在会上所唱的都是新山歌，于是引起了乐清县知县杜光祐的怀疑。经过访查，才晓得是乃新作的，月空也受到注意。当时杏庄地方有一个姓胡的老学究，和乃新的上人有隙，想乘机报复，遂在女校内偷去新山歌一本，持向县方告发。乃新听到消息，即把城乡两校内所有新山歌书本焚毁一光。县当局派兵到明强女校内搜检不得，勒令停办，第二年复把僧民学校封闭，并请上司通缉乃新，驱逐月空。

月空和乃新走避县后山中。不久，乃新离开乐清，行前和月空

說：“我有仇人尋衅，在內地不能安身，打算即日外出，如果能脫險，就到南洋去籌一笔款來寄給你。你可在永、樂兩縣交界的峙口、廊下、陡門、赤水壩等地方聯絡群眾，徵求同志，倘聚集有相當的實力就通知我，我馬上回來共同起事。”月空允諾，第二天晚上兩人洒泪而別，此後兩人就沒有再見面。

乃新星夜渡江，到溫州東門外上岸時，天恰黎明，走進東門口，看見城牆上已張貼捉拿他的布告。他邊走邊想，忽然想到“溫處學務總匯處”總理孫詒讓先生是開明人士，並且在溫州有相當的地位，過去也曾相識，遂徑投孫處。孫一見他就把他收留起來，一面探聽普濟輪船開滬的日期，代他買好船票，並厚贈川資。開航那夜，孫用兩頂四名轎夫的官轎，前面打着一對“溫處學務總匯處”的大燈籠，親自送他上船，還在房艙內故意談了一段時間，等到船將啟碇、搖鈴通知送客的上岸時，才和他作別而回。

乃新抵滬，因一時沒有船開南洋，即繞道日本。中國留日學生聞訊，開會歡迎，並聯名電達浙江巡撫張曾敷（我只記得姓張的，是否張曾敷待查），聲辨陳乃新不是革命黨人，請取消通緝。張撫復電說：“既非黨人，何必逃亡，應回來案候審。”乃新即回國到杭州投案。當時一班留日學生都勸他不可回去自投羅網。乃新却說：“既承各位好意電張，張又復電叫我回去，我如果不回去，反于各位有碍，我个人不足惜，况未必就有危險，各位前途無量，不可因我致被當局懷疑。”

乃新投案後，張撫發交巡警道看管，一切還優待。當時樂清同鄉吳万里（澄）在杭州武備學堂內讀書，曾到巡警道衙門里探望過（吳現還在，年約八十歲，是他親口對我說的）。溫處學務總匯處孫詒讓先生趕到杭州見張，力為營救。樂清學界復公推庄松園為代表，赴

省請願(庄于去年十月才逝世,年九十三岁,本篇材料,有一部分是他供給我的)。于是张撫轉交藩司审理,因无确实证据,即予开释。

乃新恢复自由后,复抵上海轉船赴南洋,与同乡张烈(张現还在,年約八十岁)在爪哇华侨学校工作,第一年还筹得一笔款寄給月空。第二年四月間,他不幸在爪哇病故。同邑前輩刘之屏曾写了一对挽联悼念他:万里埋骸爪哇島;一生遺恨新山歌。(原注:光緒末年,乃新与嘉兴敖梦姜等鼓吹革命,传布新山歌,被仇家告发,亡命南洋,病卒爪哇。)

光复后,经浙江第一屆省議會議决,以陈乃新和敖梦姜等五人合祀西湖,称“五烈士祠”。

乃新病故爪哇的噩耗传来,月空悲痛异常。他为了不負亡友監別吩咐的話,又鉴于时局阽危,人民困苦,进行武力革命已刻不容緩。而且年来在山区已经发展到四百多同志,僧民学校的学生也有許多参加。遂和同志朱劍則、滕华欽、方圣浩、薛永南、僧允定、永明、默西、正和等,于清宣統元年十一月(一九一〇年一月)誓师起义,占領了乐清西乡的道士岩。

道士岩是中雁蕩名胜之一,在乐清西乡白石山上,高五四八公尺,上面有座玉甌峰,峰下有个玉虹硯,俗称道士岩硯,很寬敞,可容八九百人。几个和尚架屋其中,不椽不瓦,风景絕佳。这个地方,东北两面通永嘉柘溪、乐清县后山以及虹桥、芙蓉等处,但山路崎嶇难走。西面下山就是烏牛港,直达温州,而形势險隘,有一夫当关万人莫敌之概。独南面一望平原,甌江口进出的船只都看得到。因此月空等把这个地方先占領了作根据地。

乐清知县宗彭年得到消息,飞报温州道、府两衙門(时綠營已裁撤,温州鎮总兵也取消了)。两衙門立刻通知駐温浙江陆师巡防

營統領梅占魁，率了两营兵力，把道士岩西南两面包围起来（清末带兵官多吃空餉，虽说两营，实际上每营不到二百人）。月空叫朱、滕等守西面，自己和一班和尚及王炳法、徐华堂等对付南面。

起义軍四百人只有两百多杆枪，内中有一部分还是前膛，其余的多是林門教单响毛瑟等，有几杆俄造快五、日造九响。而巡防营所有的都是湖北造小口径，相形之下，实力相差甚远。但因地形险要，山下官軍白日不敢上山，夜間偷襲，未到半岭，就被起义軍发觉开枪打退。双方就这样相持有二十多天。最后，月空决定：把队伍先退回内山，暂时解散，由他出外筹款买枪回来，以图再举。

农历十二月初二夜，大雾弥漫，月空叫朱、滕等先把队伍向东北方面轉移，自己带了十多人从南面下岭，到了距山麓还有里余路，就向梅营开了几排枪，立即回到岭上。梅兵从睡梦中惊醒，吹号集合，举枪向岭上乱放，可是也不敢攻上山来。到了第三天，他們才晓得月空等已走，也拔营回到温州。这役就是乐清社会上传說的道士岩案。

按：《乐清县志》卷第十四《寇警門》原有一条，載：“宣統三年十一月，紅崖硯僧月空，改名黃飞龙，与永嘉柘溪匪首滕华欽等，嘯聚四五百人，据道士岩为巢穴，自称革命党，经温州巡防梅統領率队圍剿，匪不支，于十二月初二夜，乘雾遁去。”民国元年，县志重校付印时，重校人高誼、郑解将此条删去。

起义軍退回内山后，虽暂时解散，彼此仍有联系。月空临走时，再三吩咐朱、滕等謹慎将事，不可草率妄动，必須待他得到較优良的武器回来再作計議。說后即和王炳法、徐华堂两人，一路扮作游方和尚，到达了宁波，在普陀山住了一段时间，因一时筹不到款，在外面停留下去。

次年(一九一一年)秋,杭州光复后半个月,各县秩序尚未安定。滕华欽乘机想爭得政权,事先不来城接洽,遽于十月二十一日集合了二三百人,仍由白石下山,径攻乐清县城。上午十一时,到达离城西門約二里路的豹将头地方,駐乐防营管帶謝德胜率兵出城迎战,华欽敗回,損失了一批人。

初,华欽将要起兵,朱树則、方圣浩等曾再三劝阻,华欽都不听。朱、方和众和尚等就各自率一班老同志离开。

当时社会上传說华欽別有企图,說他事前已和庫书某勾結,趁当年上下忙田粮已征未解,有相当数字的現銀,队伍一进城,庫书可以报劫,华欽得到分肥。这話如果属实,完全是土匪行径,所以《乐清县志》載:“宣統三年十月初一,柘溪股匪由白石攻扑县城,防軍民团,守城甚力,适虹桥援兵至,城内兵逐出西門夹击破之。”

武昌起义后,大荆人周李光从杭州返里,邀同旧友中之富有革命思想的同到普陀山,和月空等三人招募一班敢死队潜回省垣,与新軍八十一标統帶朱瑞联系,策划光复杭州。月空率領敢死队随浙軍攻宁支队攻克南京天保城有功,省方委他統帶温州漁团。徐华堂也在团內工作,王炳法在都督府內当卫兵长。时在民国元年三月間,月空仍名黃飞龙。

黃統帶漁团一年余,二次革命事起,又参加作战,失敗后仍作和尚,走避普陀山,向各寺院挂单。他的固定通訊处惟有徐华堂晓得,华堂那时候也已卸职,閑住杭州。后来浙江当局捉拿第二次革命同志,賄买徐华堂,到普陀山把月空騙到杭州杀害,时在民国三年五月間。

华堂和月空都是哥老会會員,月空是会中的小头目。华堂这个人私德不够,月空这条命竟送在他手里!当时社会上有两句口号:

“徐华堂，中山狼。”

月空死后的第二年，华堂返里，借住东城外的紫芝道观，因天良发现，遂生起神经病来，时常发狂。有一天早上，他用煤油浸被褥，自焚而死。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二)光复后的“农会”

“农会”两个字，在光复前，非但农民弟兄没有听到，就是当时所谓读书人也不知道。清宣统二年秋，杭州有一个“农业讲习所”招生（不知是农业讲习所抑是农业教员养成所，名称我记不清了），是公费的，学生不用缴学费，而且可以白吃饭，规定两年毕业。我县有两个人去投考，一个姓蔡，东乡人，一个姓周，县城人，都被录取了。一九一二年上学期，他们毕业回来，当年下学期本县各高级小学照章添设农业一科，他两人受聘当城区和虹桥的高级小学农业教员，每星期授课两小时。当时内地学校的学科，都侧重于经、史、文、算方面，对于农业一科是轻视的。学生们说：“我来读书，不来种田，何必学农业？”他们每星期仅两小时的工资收入，不够零星用费，不但学生看不起，就是他们本人也感觉到兴味毫无。

当年十月间，省方令县组织农会，县方叫他们两人去干，并在县税公益费项下每月提出十元，给他们作办公费。两人奉令之后，即印好通知单，分发县城内各绅、殷户、小学教员和县署内各科室的本地职员，通知定期在明伦堂开会，组织农会，选举会长，请各人来参加。

各殷户接到了通知，以为农会是管农民的衙门，凡欠租、霸佃、交湿谷等案都可由农会处理，对于自己很有利，因此都踊跃参加。

屆時明倫堂到了五六十人，內中一個農民也沒有，除了幾個小學教員外，殷戶就占百分之九十五。結果選舉會長，周正蔡副，這一幕滑稽劇算演畢了。

事後，農會並沒有會址，也沒有會牌，更沒有事做，不過縣署方面，對上級公文有個農會名目而已。兩個會長，把辦公費平分，每人每月多五元的收入。

開會那天，我以小學教員的資格，辱承寵召參加。目觀當日的情況，現在回憶還是嘖飯。但“鹽水浸種”四個字，是當時第一次聽到的。“鹽水浸種”四個字傳出去，給農民兄弟知道了。他們說：“狗紳士，想害我們種田人，谷種被鹽水浸了，還能夠出秧么？不用理他。”農會會長在農民的眼中，就是“狗紳士”。

第二年，兩個會長為生活問題，離開故鄉，出門別干，但把會長名稱仍背在身上。這樣的“農會”，一直繼續到一九二七年。

回忆辛亥革命时期的几件事 和处州光复经过

吕月屏

一 关于大通学堂、徐锡麟和秋瑾

绍兴大通学堂原是徐锡麟所创办，徐到安庆后，学堂交由秋瑾负责。教职员和学生共百余名，大部分是嵊县、新昌、縉云、壶镇等地的革命青年。一九〇六至一九〇八年間，秋瑾在湘、鄂、皖、浙、沪、杭各地往来联系革命工作，对于学堂的事务实际上是交由吕逢樵负责的。赵宏甫在学堂内负司库之责。

除了绍兴大通学堂之外，秋瑾又创办了体育学堂，在新昌、嵊县、縉云等地招收了学生百余名。壶镇一地由吕月屏招收有吕镇中等二十七名青年，应征前往接受革命军事教育。壶镇等地也创办了半日学堂。

一九〇五年春間，竺紹康、王金发、夏超、叶南波、陈子俊、丁醉笙、吕逢樵、赵舒、周振三和吕月屏等齐集壶镇会议，决定分配吕月屏在大通学堂任总务工作。徐锡麟以吕月屏作事还勤慎，所以后来叫他随同秋瑾在沪、杭、紹各地作联系工作。一九〇六至一九〇八年間，吕就随同秋瑾专在湘、鄂、皖等省作联系交通工作。

徐锡麟在大通学堂时期，某次应山阴县令某邀宴，听到隔席胡

鍾声(举人,里溪人,当时輔佐县令办教育)与人低声談話,談及大通学堂情况,他說:“那还不是乱党,想造反。”席散后,徐回到学堂,气憤憤地对大家說:“胡鍾声这家伙竟想破坏我們学堂了。”当夜胡鍾声在寝室內被人用尖刀戳入小腹,不治而死。山阴令和县署上下人等,都不敢声张。

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是张伯岐干的。张伯岐是嵊县人,辛亥革命后曾任鎮海炮台司令,其后又任江阴炮台司令。当他听見徐錫麟說胡鍾声破坏大通学堂的話后,一怒之下就把胡鍾声刺杀了。事后徐錫麟以张伯岐在紹兴恐怕要出乱子,就把他調到杭州西湖管理游艇(这游艇实际上是革命党人在湖上作秘密會議是时用的)。

徐錫麟在安庆刺杀安徽撫台恩銘后,秋瑾随即在大通学堂被捕,多人被指名通緝。呂月屏等即把壶鎮半日学堂解散,和呂公望、赵舒、沈荣卿、周振三等潜往上海,与姚勇忱、褚輔成等党人共同从事革命活动。

二 叛徒刘光汉出卖革命的一桩事件

一九〇四年春間,褚輔成、陶成章等在上海五馬路口開設了天保客棧,以为革命党人住宿和联系、掩护的处所。

一九〇八年冬,清那拉太后与光緒帝先后死去,在上海的浙江革命党人拟召集十一府属党人代表在上海商議乘机起义,每府属代表二人,处州府属代表是呂月屏和呂逢樵。嗣因会內敗类刘光汉(申叔)受清政府收买,进行破坏,因而會議不能开成。金华府属代表张恭是一个举人,很是貧苦,到了上海后,所带川資不多,組織上也不加以照顾。刘光汉看見了张恭这一弱点,又見他忠厚可

欺，所以极力拉攏，向他刺探革命机密。张恭认为刘光汉是同盟会內人，在談話当中不觉露了一点口风。刘光汉于是据以向两江总督端方告密，同时还亲自出馬，想对党人作一网打尽之計。于是他于某日向龙凤舞台包了三层楼正厅座位，請我們这些各府属代表和因事在上海的革命党人赵宏甫、周振三等去看戏。竺紹康(酌仙)在看戏时突然发觉包厢座后的“看客”形迹可疑，因即佯作外出如廁，探明究竟。他正要下楼，“看客”即强加阻止。竺紹康当以金质烟咀留作质物，声明如廁后仍回来看戏。但“看客”仍不放行。竺听到“看客”中有一人低声說了一句“让他出去，就在外面做了好了”的話，才又縮回，不敢冒昧出去。等待了一些時間后，代表还未到齐。竺紹康乘“看客”不备，混在人群中，从廁所側門溜走了。继而王金发也溜走了。“看客”們手忙脚乱，慌慌张张。我們代表即在此間隙時間走出了舞台大門。

第二天早晨，租界包打听头子黃金荣帶領了多人到天保客棧搜捕，計捕了张恭、沈荣卿、蔣叔南、童保暄等多名(蔣叔南是由日本回国来不久，恰在这时来到天保客棧，因而一同被捕)。这些人被捕，据說是因为两江总督端方捏称这些人曾在南京总督衙門犯了窃盜罪，訓令上海道会同租界当局逮捕，并要求引渡。租界当局以为如属政治犯，依照国际通例不能引渡。南京方面保证，如属政治犯，当即送回。我們乃以銀元三千元聘請英籍律师进行辯护。結果获得胜利，被捕諸人于捕后第三天送回上海，经租界当局释放。

呂月屏、赵宏甫、周振三避居在上海西門外呂的姑母開設的毓油行內，风声稍緩和后，才离开上海。

天保客棧在熊成基安庆发动革命失败后，为租界当局封閉。

三 处州光复经过

一九一一一年九月十五日杭州光复后，党人派吕月屏、赵舒等回壶镇集合革命力量向处州进军。壶镇负责人吕逢樵等已在准备响应，吕月屏、赵舒等回来后，进行更加积极。

当时以壶镇半日学堂学生为骨干，连同其他各地半日学堂学生，共计三千六百多人。各地负责人，壶镇为吕逢樵、吕月屏、赵舒、吕顺堂、吕镇中、吕钦西；潘潭为卢敦之；大皿为羊崇仁；黄畲田为杨维清；左库为宋育卿、宋微封；臚膛为李鍊川、田振章；仙岩铺为丁育生；应庄为应开相；雅化路为楼启明。此外还有平时联系的群众以及临时参加的青年一千八百多名。定名为光复军，由吕逢樵为总负责人。所用武器，形形色色，有毛瑟枪（后膛枪，水壳巢枪）、鸟枪、大刀、朴刀、竹叶枪、土炮（土洋炮）、木棍等等。九月二十五日夜，在壶镇集合检阅，声势甚盛。

永康吕公望派王芝培到了壶镇联系后，即由吕月屏带领一支队驰往永康，扎在离城二十里的山上。随由吕月屏约同吕公望往见驻防永康的清军谢哨官。谢哨官原已和吕公望等已有联系，这时自知大势已去，自动缴械。永康城于是宣告顺利光复。

永康光复后，缙云亦已为吕逢樵等大队光复，随即会师向处州进军。驻防处州城内的清军李帮统，一经我军派员策动，略事迟疑，就从小水门窜去。城内民众选派代表谭宪、陈子俊等多人赶到岩泉迎接光复军。城内成千成万的民众欢迎，光复大军进城，盛况空前。接着就组成处州军政分府和北伐军，准备北伐。

辛亥革命在丽水

毛虎侯

辛亥革命那年，我十七岁，还在处州府中学堂读书，丽水光复经过曾所目睹。兹就记忆所及，述之如下。

一九〇四年，丽水有留日学生陈达和闕伊学成回国，与在城的知识分子何子华、閻逊斋、褚焕斋等筹设利用织布公司，名为兴办实业，暗则进行革命。利用公司设在丽城东南城脚边的法海寺，地方偏僻，从此便成为丽水的秘密革命机关。他们与在省作革命活动的光复会会员云和魏兰、碧湖闕麟书时通声气（魏与光复会巨子陶成章，闕与秋瑾，在沪杭一带时相过从，关系颇密）。后魏不时往来丽水，与利用公司诸人筹商如何发展处属革命力量。他们除与当时处州府中学堂教员叶庆崇、吴朝冕、项华黻及丽水崇实两等小学堂（即今囿山小学）教员李平、刘廷煊、周焜、王庆槐（以上诸人除项华黻外都是留日学生）等经常联络外，并于一九〇六年在利用公司旁的关帝庙举办了一个体育会，招收一批青年去学习，一面授以体育技能，一面灌输革命意识。徐锡麟、秋瑾牺牲后，地方政府以这个体育会与光复会有关，勒令解散。

籍云吕东升（耀初）因经商与嵛县王金发交好，后来结成儿女亲家。王金发原是会党中人，他的党羽甚众，在嵛县一带声名颇大，陶成章因此劝他加入了光复会，共同革命。吕东升因王金发的

关系，也加入了光复会。吕自加入光复会后，时常背着留声机，到处宣传革命，后来与丽水利用公司的何子华、陈达及其兄陈逸结成亲密的革命战友。丽水是旧处州府属的首县，他们早就商定在丽水发动武装起义，但苦于弄不到枪支。縉云与曠县交界，就由吕请王金发设法，陆续送来一些枪支，以待时机的到来。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初，浙江宣告独立，成立军政府，接着王金发就在绍兴发动起义，组成绍兴军政分府。于是丽水利用公司的革命党人就昼夜奔忙，与吕东升信使往还，约吕在縉云组成革命武装队伍，定期来丽进取府城。这时丽水原驻有浙江后路陆师巡防队，管带李茂青是个老军官，士兵也经过一定的训练，武器在当时也算是新式的，实力并不很弱。因此，在吕东升的革命队伍未到之前，地方士绅孙寿芝、项际虞、谭午峰等陪同陈逸、陈文豹、叶庆崇、金志振、姚明熾等二十余人，以保全地方为名，向李茂青竭力劝导，不要反抗。李知省城早经独立，大势已去，孤掌难鸣，只得应允交出军装局，约束士兵，一任地方人自行处理。

吕东升与丽水方面约定十一月二十五日（阴历十月初五）光复丽水。在这以前，处州中学堂早经停课，龙泉、庆元、松阳、遂昌等县远道同学大都回家。我们留在校里的同学得到丽水即将光复的秘密消息，就自动地把辫子剪了。光复的日子到了，我们的体育教员项华骥预先指定我和王琼瑤、刘树德、叶庆裕四人到十五里路外的岩泉去接应縉云来的革命军，他自己则带领同学四十余人在虎曠门外列队欢迎。我们四人到了九里地方，就遇上革命队伍。全军分三队，约三百多人，队长吕振中、吕焕光等骑着马各自在队前领队。他们的枪械不全，头一队士兵十有七八肩背步枪，二、三两队只有半数持枪，其余拿的都是鸟枪、尖刀鎗乃至柴刀、棍棒之类

了。呂东升坐着一乘藤轎，轎前后有四人騎馬荷槍保衛。大隊進城，市民空巷往觀。最引人注目的是項華馘的父親項際虞、陳達的哥哥陳逸兩人，他們都頭帶方巾，身穿明代的古裝，腰佩龍泉寶劍，站在街頭歡迎。革命軍入城後，分駐府縣和舊總兵衙門。時處州府知府蕭文昭尚躲在府署，當被金振志打了兩個巴掌，喝令他交出印信簿籍，把他趕走了。知縣范傳衣自知不容於眾，早就逃跑了。偌大一座府城就這樣易如反掌地光復了。

呂东升於進城後即布告安民，第三天宣布成立處州軍政分府，呂為都督，分任孫壽芝為民政部長，項華馘為軍政部長，毛養先為財政部長，葉慶崇為教育部長，陳逸為司法部長，並以朱光奎為處州府民事長。部署既定，第一件事就是向省請械，向各縣籌款。松陽首富黃秋江，龍泉首富李鏡容，便是籌款的大戶頭。黃愛錢如命，呂以他拒不剪辮，反抗革命為由，罰他銀洋五萬元。追軍費有着，槍械領到，又成立了北伐隊一營，準備北伐。但自南北和議告成，孫中山先生辭去臨時大總統，南京臨時政府取消之後，這個北伐隊於一九一二年秋改編了，管帶趙舒則於是年底被選為國會議員。不久，處州軍政分府也與其他各地軍政分府一起撤銷了。呂东升於一九一三年冬因二次革命失敗，為袁政府所通緝，東西奔逃，悒郁而死。利用公司經理何子華也因此被麗水知事郎允麟捕入監獄瘐死。其他有的被捕送省，有的明哲保身，另謀生計，有的竟猶取官位，依附反動統治政權，麗水所有當時參加革命的人就這樣風流雲散了。

辛亥革命后松阳的一次剪辮斗争

江 天 蔚

辛亥武昌首义，各省响应，迫使清廷退位，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当胜利消息传到浙江松阳县时（现该县已并入遂昌县），立即引起这个山城的震动，而最动人心魄者，乃是剪辮一事。

该县大地主黄秋江，鱼肉人民，无恶不作，为人人所痛恨。在革命胜利消息传来之时，他大言不惭，谓辮子乃系头髮，与革命何关，扬言不剪辮，欲以保留辮子为理由而反对革命，誓忠清廷。

松阳山城，每逢一、六，为城关市集，热闹异常。时革命军政府已派出巡防队至各城門隘口，手拿剪刀，见乡人进城尚留辮子者，均不问其意願如何，一律剪去，发生爭吵打架等事，亦复不少。大地主黄秋江脑后尚垂一条大辮子，招搖入市，彼虽早已知道城内正发生剪辮风潮，却存心对抗。而巡防队亦不敢下手，因黄素有黄老虎之称。

时松阳革命军政府主持人为叶宗山、包致周等，与黄秋江素不睦。而此时已轰传黄秋江反对革命，留辮不剪，一传十，十传百，如不对黄秋江实行强迫剪辮，可能发生反革命騒动。于是，革命军政府即命巡防队逮捕黄秋江，罪名为不剪辮子，煽惑群众，反抗革命。黄秋江被捕时正值集市日子，街上人山人海，人人称快。一般守旧人物，认为剪辮固属过激，而惩办黄老虎，则尚称人心。黄秋江押

解县府之后，自有其亲朋出面說情。时革命軍政府坚持将黃秋江解往处州府（即現在的丽水县城）法办，对所有說情納賄人員一律予以訓斥。

黃秋江作为一个反对革命之要犯，解往处州府，更是轰动一时。黃即被处州府革命軍政府处罰五万五千元，剪去辮子，始予释放了事。当辛亥年間，即以大地主黃秋江而論，要一时繳納銀元五万五千元，亦不甚容易；且以一辮之故，罰款五万五，也属罕有。因此“五万五”这一故事，在松阳流传甚广，几至家喻戶曉。

黃秋江被罰五万五，老虎威风已为革命力量所压服。惟黃报复心切，认为一般革命人物均属学堂学生出身，因此，彼在被罰之后，即将其五个儿子均送进新式学校讀書，作为保护封建地主之有力工具，此是后話。

黃秋江老虎威风虽一时被杀，而无时不在思量报复。及至二次革命失敗，袁氏称帝，黃秋江即在各級衙門大告“御状”，而在松阳辛亥革命軍政府中之人，如包致周、叶宗山、叶仙桂等人均被通緝，不得不逃亡在外矣。

記 秋 瑾

徐 双 韵

(一) 少年时期

秋瑾，字璿卿，小字玉姑，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原籍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于一八七五年农历十月十一日生在福建廈門，时祖父嘉禾任廈門知府，父寿南、母单太夫人都随侍廈門。廈門在鴉片战争后，为英帝国主义强辟为商埠，秋瑾童年，眼見英国教士态度恶劣，屡屡持强闖进祖父办公处所，提出无理要求，百般侮辱。老人的憤慨，播下了秋瑾革命的种子，助长了秋瑾革命的根苗。

秋瑾天資聪明，加以努力学习，十一岁已会做詩，常常捧着杜少陵、辛稼軒等詩詞集，吟哦不已。单太夫人雅擅詩文，循循善誘。秋瑾失侍后，为了紀念慈母的辛勤教誨，曾托人繪了一幅《秋灯課詩图》，自己并題了一闕《临江仙》以寄其深刻的怀念（这首詞是秋瑾在成仁前数月写的）：

懿范当年传画获，辛勤慈母兼师。丸熊篝火課儿时，三迂
煥孟氏，折管授羲之。讲肄佳句不辍千遍讀，秋宵真个宜詩。

已邈悔生迟，宣文遺志在，盥手仰遺徽！

秋瑾在学习经史詩詞以外，特別爱讀《芝蔴記》等小說，对秦良玉、沈云英备极推崇。

一八九〇年，当秋瑾十六岁的时候，祖父嘉禾因受不了外国人欺压，带着家眷离开廈門，回到故乡，在紹兴南門租了一所叫和暢堂的房屋。这所房屋，原为明朝神宗时大学士朱賡的別墅，完全是明代建筑形式，三間四进，虽不甚高敞，房間却是不少，后面靠着塔山，环境幽靜。秋瑾就住在第二进左边楼下，少年时代的詩詞，都是在这里写成的，而成仁前秘密革命工作，也是在这里进行的。現在紹兴的“秋瑾革命紀念館”就設在这所有历史意义的房屋里。

秋瑾在廈門时，常常听母亲談起，在蕭山的舅父和表兄弟都习武艺，很有功力。因此，她回紹兴不久，就随母亲到蕭山单家，学会了騎馬击劍，跳高跳远。这时的体格鍛炼，对她后来从事繁重的革命工作，是有不少帮助的。

秋父寿南在廈門以知县升直隶州，因家貧不能厚賄吏部胥吏，签发湖南，初在常德县当厘金局总办，后調湘潭，因此把秋瑾許嫁湘潭富紳王家儿子廷鈞（廷鈞字子芳，在《浙案紀略》及夏衍《秋瑾》劇本中均誤作“延鈞”。秋宗章的《六六私乘》作“德鈞”，而《大通学堂案录秋瑾供詞》和王时澤撰的《秋烈士遺稿序》，以及家姊自华（寄尘）所撰的《鑒湖女俠墓表》、陈去病撰的《鑒湖女俠秋瑾传》等資料，均作“王廷鈞”），于一八九六年农历四月初五結婚，时秋年二十二岁。（《浙案紀略》說：“随父入湘，年十八嫁王延（廷）鈞。”馮自由的《革命逸史》說：“年十八出嫁”。吳芝瑛的《秋女士传》說：“年十九嫁京宦某君。”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秋瑾》也說：“十九岁出嫁。”但《六六私乘》說：“先姊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生，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出嫁。”則应为二十二岁。）王父渾名王二胖子，同會同藩是表兄弟，当过曾家帳房，在屠杀人民的战争中发了橫財，因而廷鈞纨绔习气很深，詭計多端，

与秋瑾的正直热忱性格，自然不能融洽。

一九〇一年农历十月十六日，寿南在湘阳知州任上逝世，家人就移居湘潭，开设和济钱庄，维持生活。不料所用非人，经理陈玉莹利用职权，任意侵吞。一年以后，和济倒闭，秋家经济陷于破产。王氏一家刻薄成性，对秋家十分冷淡。

秋瑾是一位有革命思想的妇女，对王家的铜臭熏天，束缚重重，真感到无限苦痛。加之，帝国主义者积极侵略，清政府江河日下，国势一天天地衰弱，民生一天天地困苦，因此她很想离开家庭，服务社会，和男子们一道担负天下兴亡的责任。

(二) 留学日本和参加革命组织

一九〇三年农历五月，秋瑾的老母以及兄誉章、弟宗章、妹理等因和济钱庄失败，复遭王家白眼，知湘潭不可留，遂回绍兴。不久，王廷钧在清政府捐了一个户部主事的官职，就带秋瑾到北京居住，当时清政府亲贵专政，对外屈服，对内搜刮，又经中日甲午战争及庚子八国联军战争，两次丧师辱国，赔款割地，国势岌岌可危。秋瑾眼见清政府的腐败，耳闻八国联军的劫难，所受刺激，非常深刻，因而革命思想愈趋浓厚。

秋瑾在北京，住南半截胡同，认识了王廷钧的同事无锡人廉泉的夫人吴芝瑛女士，两家又为毗邻，且在文学上有同等的造诣，日夕过从，情同姊妹，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秋瑾在吴家经常阅读当时的新书新报，因而对旧民主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时，留学日本的逐渐增加，秋瑾感于新的知识不够，就毅然立下留学东瀛的志愿。极端顽固的王廷钧遂恃其封建夫权，封锁经济，且竟用下

流手段，窃取秋瑾私蓄首飾，以阻其行。但秋瑾不为困难压倒，托同乡人陶大鈞的日籍夫人荻子变卖余剩飾物，筹得旅資。方欲启程时，前礼部主事王照因維新派嫌被拘下獄，她与王照虽素不识面，一聞此訊，即毅然分出学費一部分托人送去，作运动释放之用，还囑送款人勿告訴何人送来。这种同情爱国青年的侠义行为，在当时社会里确是难得的。

一九〇四年的新秋(青年模范丛书《秋瑾》与《史学季刊》一九五七年七期《秋瑾年譜》，均誤作一九〇四年三月)，秋瑾离国去日，行前吳芝瑛和荻子等曾于北京城南陶然亭为她置酒餞別。

在此要順便談一談秋瑾与王廷鈞的夫妇关系。他們只是志趣不协，意見不同，夫妇关系是仍旧存在的，既不是史学季刊《秋瑾年譜》所說的“分居”，也不是宋元《秋瑾与徐寄尘的革命友誼》所說的“决絕”。請看《六六私乘》里說：“迨光复会組織成立，筹餉购械，难以为继……，先大姊目击心伤……专赴湘潭，子身至王宅，时子芳(廷鈞之号)宦京未返，君舅健在，談次悉姊近况，即畀数千金。”又說：“当时姊婿子芳久已下世，佳城既卜，乃于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农历八月，遣两佣人，将奉櫬还湘合葬。九月中旬，始遣之行。”据此可以证明，秋、王夫妇名义确实还保存的。

秋瑾到东京后，即入駿河台留学生会馆所設的日語讲习所补习日文，进步神速，岁暮卒業，明年考入青山实践女学。当她补习日文的同时，曾与陈擲芬等十人发起共爱会。(《国民党党史史料丛刊》曾写作“重兴光复会”，实誤。考共爱会會員都是妇女，光复会是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实是两个組織，不可混而为一。且秋瑾于共爱会是发起，不是重兴。)共爱会实是近代中国妇女首先成立的爱国組織，宗旨是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主张女子从軍，救护受伤

战士，一面通信国内女学，要求推广。秋瑾同时还与刘道一等九人，组织秘密团体，名十人会，也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旋闻馮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遂偕刘道一等加盟，受封为“白紙扇軍师”，从此她的军事知识就渐渐地充实了。

秋瑾眼見当时留日学生的政治觉悟很低，多数人留学目的，是企图回国后做官吏，当买办。她为了唤醒群众，在东京倡办《白話报》，第一期出版于一九〇四年中秋节。《白話报》是杂志性质，与梁启超保皇党的《新民丛报》对立，鼓吹推翻清政府，月出一册，售大錢五十文，可惜限于条件，仅出六期。編輯兼发行的，是演說练习会，附設于东京神田区駿河台鈴木町十八番地中国留学生会館內。印刷所在东京牛込区神乐町一丁目二番地翔鸞社，印刷者日人野口治安。主要内容：第一期有《中国历史的摄影》一文，指斥金、元、清的封建統治为“胡人”，为“野种”。第二期有《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书》，反对纏足，提倡女子求学，争取男女平权。第三期有《說廉恥》，提出“我国应除去这騷韃子，省得作了双料奴隶”的口号，反映当时人民反对清貴族反动統治的强烈要求。以后，秋瑾又先后认识了陶成章、鲁迅、陈公猛、黃兴等爱国人士，共同宣传革命，协商爱国救亡活动。

一九〇四年农历年底，秋瑾因資助长沙起义失敗东来同志的生活，以致经济告竭，乃回国筹措学費，行前恳陶成章介紹参加光复会。陶就分別写信給主持人上海蔡元培及紹兴徐錫麟。她到上海后，先到虹口爱国女学見蔡，并回紹兴东浦热忱学堂見徐，遂加入了光复会。单太夫人典卖衣物，筹措了几百銀元給她回日讀書。她从紹兴到上海时，陶成章也回上海，曾偕秋瑾訪問龙华会处州負責人呂熊祥等。一九〇五年春初，她便只身二次赴日。她此行毅

然乘三等艙，与当时所称“苦力”为伍，挤在一起，其儉約于此可見。但在校里看到一湖南女同学蔡竞无家可归，生活困难，仍慨然帮助，毫无吝色。

秋瑾在青山实践女学校习教育及工艺等科学，对看护工作更加悉心研究，曾参考日本书籍，譯写了一部《看护学教程》，詳細地介紹了看护的理論与实践，极力批判了当时社会把看护当作賤业的封建观点。

一九〇五年农历七月，孙中山先生因黃兴及蔡元培等的欢迎，从欧洲赴日，組織中国革命同盟会。秋瑾经黃兴介紹，与中山先生見面，傾談之下，对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和方策大为信服，即由馮自由介紹，至黃兴寓所填入会表，不久被推为浙江主盟人。

(三) 回国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〇五年冬，清政府駐日公使楊植，为了破坏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勾結日本文部省頒布所謂“清国留日学生取締規則”，不但禁止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而且侵犯人身自由。八千多留日中国学生向日政府交涉无效，实行罢課，湘人陈天华悲憤投海，遺书同学们坚持爱国主张。全体留日同学，十分憤慨，在浙江同乡会集会。这时，同学们有两种不同意見：一部分主张忍辱力学，一部分主张回国实行革命。秋瑾发言，力主回国，詞意激昂，随手从靴筒取出倭刀，插在讲台上說：“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滿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一九〇六年新春，秋瑾归国，径回紹兴。

秋瑾回紹兴后，先在紹兴明道女学代了几天体育課。农历二

月上旬，以嘉兴褚輔成的介紹，应湖州南潯鎮潯溪女学聘为教习。南潯为浙西富庶巨鎮，她到此地，也希望对革命经济力量有所帮助。潯溪校长为家姊徐自华（寄尘），我与上海市文史館館員吳惠秋老先生（原名明，号希英，后为紀念秋瑾改名），当时均在校肄业。在短短五个月中，我們受到秋瑾的启发不少。秋瑾对我与家姊的爱护与期望，十分深切，从下面的詩句里，足以說明：

贈家姊詩云：

临行贈我有新詩，更为君家进一詞，不唱阳关非忍者，实因无益漫含悲。

莽莽河山破碎时，天涯回首岂堪思；填胸万斛汪洋泪，不到伤心总不垂。

祖国淪亡已若斯，家庭苦恋太情痴；只愁轉眼瓜分惨，百首空成花蕊詞。

贈我詩云：

惺惺相惜两心知，得一知音死不辞；欲为同胞添臂助，只言良友莫言师。

何人慷慨語同仇，誰识当年郭解流？时局如斯危已甚，闔装願尔換吳鉤！

还有和我七律一首云：

素箋一幅持相遺，字字簪花見俊姿；丽句天成謝道韞，史才入目汉班姬。愧无秦轟英雄骨，辜負阳春絕妙辞；我欲期君为女杰，黄龙飲罢共吟詩。（初稿为“莫抛心力苦吟詩”，以后来信改正。）

我們受到秋瑾至誠的感化，就先后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与光复会，经常进行革命活动了。吳惠秋老同学，以乡村女子，家庭又十

分封建，不久也主动随秋瑾至绍兴，不怕危险，掌理机密，直至秋瑾被捕，始化装出走。秋瑾感人之深，可想见了。

这里还要补充秋瑾因何离开潯溪女学的一段史实。《史学月刊》一九五七年六期《秋瑾年谱》只说：“以褚慧僧之荐，任潯溪女学教员。未几即辞去。”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秋瑾》只说：“在潯溪女学的時間甚短。”连秋宗章的《六六私乘》也只说：“家居数日，应吴兴潯溪女学之聘为教员，……暑假辞职。”而青年出版社一九四六年八月再版的《秋瑾》竟杜撰为：“……在潯溪任教不久，因和学生的感情不大融洽，便拂然离去。”其实秋瑾于一九〇六年公历三月到潯溪女学，担任日文、理科、卫生等课程，启发同学，无微不至（家姊所写《秋侠墓表》说：“……主讲潯溪女学，教育弥至”云云，足够说明），而革命的熏陶，精神的感化，更为突出。实因潯溪校董金子羽捏造学生家属意见，示秋瑾辞职，秋瑾遂在暑假时鸿飞而去，同学痛失良师，涕泣数日，家姊也愤而辞职。我也遵照秋瑾指示，转入当时素称革命文化机构的上海爱国女学肄业了。

秋瑾离开潯溪女学后，转到上海，与同志陈伯平、张剑崖、姚勇忱等在虹口祥庆里，以“锐进学社”为名，联系敖嘉熊（号梦蛟）、吕熊祥（号逢樵）等运动长江一带会党，又与蒋乐山、沈鹿珊、张恭、周华昌等运动浙江会党，以利起义。八月间，秋母逝世，她回绍兴料理丧事，事毕仍回上海，和陈伯平在寓所秘制炸药，不慎爆炸，陈伤目，秋伤臂，幸而证据毁灭，未遭逮捕，但从此即被租界当局注意，想将她驱逐出境。

一九〇六年冬初，秋瑾为了唤醒广大妇女，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预定集股一万元，购置印刷机件，准备印报编书，同时并进。无如尽量征求，入股的仅四、五人，款股只筹到数百元，同预期目标

相去甚远。我姊妹两人勉力捐助一千五百元，才在北四川路厚德里开始编印。创刊号于农历十二月初一出版，采取杂志形式，每月一期，售洋二角，总编辑为陈伯平，余任校对，发行及总务由秋瑾一人支持。她并亲写了发刊词，还写了一篇《告姊妹们》在第一期发表。

第二期在一九〇七年农历正月二十日出版，改用道林纸印刷，相当精美，内容更加丰富，刊登了署名黄公的《道德说》，钝夫的《女子教育》，志群的《恭贺新禧》，挽澜女士（陈伯平之妹）的《女革命英雄独立传》，吕碧城的《女子宜急结团体》，秋瑾的《女权歌》，附以简谱，以便大家歌唱。

《中国女报》刊行了两期，因销路与资金关系，便告夭折。

在此我不能已于言的是：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朱耀庭所写的《秋瑾》第十九页一四至一七行说：“袁世凯在天津选娶侍妾……秋瑾决定牺牲自己，参加应选……”云云，不但没有这回事，并且未免侮辱先烈。吴惠秋老同学在《中国女报》停刊后，随侍秋瑾，深知秋瑾当时绝对没有到过天津。为此郑重声明，以正误传。

秋瑾参加光复会后，认识各省同志渐多，特别是浙江人。自从《中国女报》停刊，革命工作已由宣传转入注重军事方面。光复会的前身，是“军国民教育会浙江分会”，对军事计划与教育计划，原是有细致研究的。

其时刘揆一等联合洪江会党，拟在萍乡、醴陵起义，由秋瑾负责联络浙江的龙华会首领吕熊祥（会本部设在金华），平阳党首领竺绍康（号酌先，又字谪仙，党本部设在嵛县），以及浙东会党首领蒋乐山（号鹿珊）及张恭（字同伯）响应萍醴起义。不料湖南失利，秋瑾万分悲愤，又不愿失信于会党，就进一步发动浙江会党及武装同志，计划独立起义。

一九〇七年农历正月，绍兴大通学堂师生一致邀请秋瑾主持校务。大通学堂是徐锡麟等于一九〇五年农历八月创办的，以提倡军式体操为由，请准绍兴官吏，募款购买后膛九响枪五十支，子弹二万发；一面密告龙华平阳首领，选派干部，到大通学习军事，并聘武备学生张健、魏励劲二人为军事教员，以等待发难时机。自从徐锡麟留日以后，堂内继任的余静夫、曹欽熙等不了解会党秘密，致引起风潮。等到秋瑾来校主持后，同学师生间的矛盾渐渐解决，学习情绪也安定下来了。

秋瑾一面尽量维持大通，一面与平阳龙华首领联系。义乌吴谦林、金华徐顺达、武义周华昌等亲受感化，自愿服从领导。同时，她又运动军队、浙江武备学生、陆师学生及弁目学堂师生。于是周凤岐、俞焯、朱瑞、许耀、叶頌清、徐士麟、魏励劲、张健、傅孟、周亚卫、徐光等浙江军队干部参加了光复会，组织逐渐扩大，声势也随之雄厚了。

为了统一浙江的秘密军事组织，秋瑾就编制光复军制，并铸成金指约，上面分刻文字，颁给干部，其文字为一首七绝：

黃河源溯浙江潮，卫我中华汉族豪；莫使满胡留片甲，軒轅神胄是天驕。

金指约上所铸的字，都是干部的代名词，例如“黄”字为首领，推徐锡麟担任；“河”字为协领，推秋瑾担任；“源”字为分统，推王季高（名逸，乳名金发）、竺绍康、张恭、吕熊祥分任；“溯”字为参谋，等等；但分统以下，一职不止一人，就在源字傍加A、B、C、D……符号，因此分统指约，有源A、源B、源C、源D。在秋察章的《秋侠史实考证》里，这首诗第二句第四字为“原”字，第三句第一字为“不”字，第三第四字为“胡”“奴”，第四句第三字为“华”字、其他书籍，更

有不同。我是根据当时参加这个组织而得到“轅”字标记金指約的吳惠秋老同学所回忆而写上的。吳当时掌理机密，是不会錯的。

秋瑾同时編龙华、平阳兄弟为光复軍，并手訂了軍制軍規。

在光复軍制頒布的同时，秋瑾复亲撰了一篇論文。

軍制既定，枪支弹药，大通已儲积一部分，杭州軍界方面，与紹属、金属、温属会党方面，都諸事齐备，秋瑾以万分热情，写了一篇《告同胞檄》，另外还准备了“告示”。这三篇重要革命文件，准备在起义前夕 秘密鉛印，分发张贴，以发动广大群众，推进革命浪潮。

(四) 牺牲前后

光复軍组织既已就緒，积极訓練，战士们反滿情緒高涨，技术进步也很快。秋瑾頻到杭州，有时住过軍桥荣庆堂客棧，有时寓西湖岳坟街“刘果敏公”祠内鏡清楼（光复后，秋社同志改名“秋心楼”，抗日战争时坍塌），邀集同志會議（有时在白云庵、紫阳山頂或将台山頂，有时也在西湖船中，更有时借我家開設在大井巷口的悦济农庄内）。浙江会党首領呂熊祥、王金发、竺紹康等均在座，我家姊妹也有几次参与。决定浙江由金华会党首先 起义，北与安庆 徐錫麟，南与惠州邓存瑜遙相呼应。約期一九〇七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后改二十六日），浙皖同时进军。刚过端午节，秋瑾到我家乡崇德，与家姊商筹軍餉。姊氏傾全部首飾，約值黃金三十多两相助。秋瑾贈翠釧留念（此翠釧家姊保管到一九二七年夏，交还秋瑾女公子王燦芝，并有《返釧記》之作，当时国内各报均有記載，并采入中小学語文課本），同时屬家姊說：“如果不幸牺牲，願埋骨西冷。”临行并贈詩作別：

此別深愁再見難，臨歧握手囑加餐；從今莫把羅衣浣，留取行行別淚看。

珍重香閨莫太痴，留君小影慰君思；不為無定河邊骨，吹聚萍踪總有時。

秋瑾回紹興，轉金華、武義，發布五月二十八日起義命令，通知巡風聶李唐作準備。聶在無意中洩漏機密，傳至武義縣城，知縣錢寶鎔急報浙江巡撫求援，就派兵在聶家搜出會黨名冊，牽連大通學堂。金華、蘭溪的會黨也遭波及，革命計劃完全洩露了。徐錫麟於農曆五月二十六日在安慶刺死巡撫恩銘被捕後，浙江巡撫張曾敳及紹興知府貴福得紹興劣紳而素為秋瑾鄙棄的吳道南等的密報說，秋瑾與徐錫麟、竺紹康同謀。張曾敳就於農曆六月初二密諭浙江新軍第一標標統李益之率領士兵三百多人，向紹興進發。李益之怕新軍與光復軍有聯繫，出發前嚴密檢查士兵，造成營中紛擾。事為武備學堂學生探知，即赴紹密報。秋瑾初三得訊，就指揮大通同志掩藏槍彈，焚毀名冊，疏散學生，然後回家，將和暢堂保存之文卷、信札及書籍盡付一炬。

關於和暢堂的史實，一、秋宗章的《六六私乘》說：“和暢堂東隅，有小樓一角，梯下光綫黝黑，霉氣沖人，姊之秘密文件，皆藏于此。……猶憶是日（指初三）上午，姊冒雨歸來，匆匆入室。時潯溪學生吳惠秋寓余家，兩人耳語良久，為狀甚促，……始知是日先姊與惠秋肩戶，將梯下文件悉付一炬，焦氣觸鼻，不敢問。”後來很少有人知道此室作用，一九五七年在和暢堂安排秋瑾紀念時，也未顧到。幸而吳惠秋老同學在宋元同志訪問她時告知此事，宋同志參加紀念會時遂轉告主持同志，復參考《六六私乘》，才把和暢堂的史迹標明出來。二、和暢堂里西面客廳，與內室隔絕。起義以

前，光复会同志王金发、竺紹康、张恭、呂熊祥等经常乘騎而至，参与會議。秋瑾素来接近群众，复有大通主持人名义的掩护，虽宾客往来如织，邻里也毫不以为怪。

农历六月初四上午，王金发从嵊县来，协商善后。午后知清兵已入紹兴，大通学生劝秋瑾离堂暂避，但秋已决心殉难，即遣散最后一批同志，而程毅等数人坚不肯去，甘同进退。这时内奸蔣紀（又名紀云）忽从兰溪来，糾纏索費。貴福及李益之即率領新軍，包围大通，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闖入学堂。两位同学英勇抵抗，終至牺牲。而秋瑾与程毅（教师）、徐頌揚（学生）、錢应仁（学生，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秋瑾》，誤作应錢仁）、呂松植（学生）、王植槐（学生）、石宝熙（学生）、蔣紀（职员，内奸，后亦判刑一年）都被捆绑，解入紹兴府衙門。秋瑾拘在臥龙山女獄内，未几被貴福提去审問，百問不答。最后訊以朋友姓名，就答：“你也常到大通，并贈我‘竞争世界，雄冠地球’对联，同在大通拍过照相。”貴福遂不敢再問。次日交山阴知县李鍾岳审問，秋只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别无他語。貴福以李鍾岳不肯逼供，势难深文周訥，逮捕党人，乃改派幕友余某严訊。秋瑾只說“革命党人不怕死，欲杀便杀”的豪語，咬牙閉目，忍受酷刑。余某得不到革命秘密，只得用伪造供詞，强捺指印結案。

貴福就令会稽知县李瑞年，在六月初六日（公元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五日）一早，向監獄提人。秋瑾見灯燭輝煌，士兵成群，就向李瑞年說：“我有三个要求：一、写信給家人亲戚朋友；二、临刑不能脫去衣服；三、不要以首級示众。”李答允二、三項要求。秋瑾乃于是日上午四点钟在軒亭口惨遭杀害，壮烈牺牲了，时年三十三岁。（秋瑾成仁日期与年齡，公私記載小有不同。邹魯的《中国国民党党史稿》、黃鴻孝的《清史紀事本末》、中国近代史丛书《辛亥革命》，

均說六月初五；但秋宗章的《六六私乘》說：“当年秋家得报与每年家奠，均为六月初六。”秋社于一九〇八年初春举行追悼会于西湖凤林寺，決議：每年六月初六为秋瑾成仁紀念日。这时秋瑾弟兄均尚健在，决不会錯。又，《浙江秋案全卷》中伪造的口供說：“秋氏年二十九岁”；陶成章的《浙案紀略》說：“瑾死时年三十一”；吳芝瑛的《秋瑾传》說：“死于光緒三十三年，年三十一。”但《六六私乘》說：“伯姊生于光緒元年夏历十月十一日。”那末，秋瑾于光緒元年誕生，光緒三十三年殉国，依那时旧习惯，当为三十三岁无疑。）

我在秋俠殉国前五日，于上海爱国女校中得自会稽发来絕笔云：“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沈誰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誰招志士之魂？不需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魯酒，他年共唱摆命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責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虛，雄心未滿，中原回首腸堪断！”緘中并无別簡。当时深滋疑訝，不意未及两日而恶耗至矣。悲夫！眞迹珍藏到一九五七年七月，連同秋瑾出国前遺象，送绍兴秋瑾紀念館保存。

（五）身后哀榮

两次营葬

秋瑾殉国以后，里保报告秋家。其时，秋誉章等都避居绍兴乡下平水鎮的广孝寺，家中妇女不敢收埋俠骨，遂由善堂成殮，藁葬臥龙山（俗名府山）山脚。当时全国輿論譁然，連外国报纸亦有指摘。清廷于农历九、十月間先后調张曾敷及貴福离浙后，才由誉章运柩至绍兴严家潭丙舍暫停。一九〇八年一月，家姊寄尘为了实

踐秋瑾埋骨西泠的遺言，復商得吳芝瑛女士的同意，遂只身風雪渡江，遷柩至杭，加上木槨。由家姊購地，吳女士慨助葬費二百元，安葬于西泠橋塊。

不料是年（一九〇八年）冬季，清御史常徵奏請削平秋墓，同時參奏吳芝瑛與家姊寄塵為秋瑾余黨。清廷准之，勒令遷墓，並通緝吳女士與家姊。家姊避居滬上日橋丸喬醫院半年。當時我在愛國女學讀書，浙江巡撫增韞以我姊妹事，就近問及仁和县令林孝恂。林曾任石門知縣六年，與我家有好感，以“徐自華婦人之仁，物傷其類（指潯溪同事），徐蘊華（我書名）是女孩子，少不懂事，盲目附從”答之。吳女士又運動兩江總督端方。一場風波，方才平息。增韞鑒于張曾敝及貴福受中外輿論圍攻而離職，所以不敢株連，不了了之。

至于坟墓，因增韞與秋瑾從父青士（時官黑龍江提法司）有舊，貽書促家屬迅遷，并由浙撫派委員士兵督同秋營章從坟墓取出靈柩，運歸紹興，仍厝嚴家潭丙舍。一九一二年元旦，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國事粗定，秋社同志首先要求把秋瑾靈柩還葬西湖。經過調查，知已于一九〇九年農曆九月由湘潭王家從紹興運去。家姊力主還葬，即派秋社社員陳去病到湘，重啟墓穴。湖南都督譚延闓加派委員李某護靈歸杭。以原墓基狹小，經鳳林寺主持僧捐助寬大基地，遂于原墓西首數十丈地方建築新墓，原址建風雨亭，東西遙對。後來風雨亭柱木為白蟻侵蝕，至一九二七年全部坍塌，屢請當時政府修建，迄未實行。一九五九年春間，上海《新聞日報》載，杭州市人民委員會已在原址地方，把風雨亭重加修建。可喜！

當第二次葬秋時，浙省政府命令家姊為營葬事務所主任，并由秋社計劃。原來圖樣莊嚴朴素，頗為壯觀，經浙江都督朱瑞批准執

行。后朱忽忘恩負义，听从袁政府代表指示，連夜命令将原秋墓拆低五尺，并废除中立石象。家姊据理力爭，并发传单，以告民众。朱老羞成怒，另委营葬事务所主任，且有不利之言。中山先生聞之，特专程来杭，力劝家姊不要作軍閥的无謂牺牲品，还是到上海接办紀念秋瑾的学校“竞雄女学”，继续干革命实际工作。

建立紀念组织

在杭州，一九〇八年农历年初葬秋以后，家姊邀集同志陈去病、褚輔成、姚勇忱、楊俠卿等数十人，在西湖凤林寺秘密追悼，我也到会协助。追悼以后，密議組織秋社，并推家姊为社长（吳芝瑛女士病居上海，未参加秋社組織），决定每年农历六月初六为秋瑾成仁紀念日。正在追悼时，杭州駐防旗人貴翰香聞訊参加，发表謬論說，“我大清待汉人不薄。”我當場以“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駁之（这与常徽參奏牽連及我，不无关系）。从此到一九一一年三載之中，每年六月六日，家姊以社长名义召集社員，秘密紀念，主要是联系光复軍旧部与同盟会同志，积极协商起义情事。

武昌起义，浙江响应，主其事的大都是秋瑾生前同志，例如褚輔成主持民政，周凤岐、叶頌清、王金发、朱瑞等分主軍政。浙江新政府允許秋社請求，拨西湖刘典祠堂为秋祠秋社。刘典湖南人，在浙江有屠杀太平軍志士之“功”，清政府为建此祠，取名“刘果敏公祠”。秋瑾生前在杭秘密活动，常借此祠會議，所以秋社同人請求指拨为秋祠秋社。一九一九年齐耀珊长浙，拟把祠址发还刘氏，后经力爭始罢。一九二四年，孙传芳在浙江时，竟指还刘氏。直到一九二七新旧軍閥离浙，才由当时杭州市府令公安局会同我前往接收，但祠宇坍塌不堪。经家姊及社員陈去病捐助二千元，又向社員

借款二千元修建，面貌一新，每岁纪念，始有固定地址了。但刘氏子孙，心未折服，还一再请求国民党政府发还。家姊扶病力争，辗转数年，直至一九三四年她临歿前一个月，刘氏的请求被批驳，才告终结。抗日战争胜利，秋社借作西湖中心小学校舍。

在绍兴：辛亥光复后，经蔡元培、王金发、王子余等在軒亭口建立秋瑾烈士纪念碑，又在当年秋瑾拘押地方臥龙山上建风雨亭。解放以后，绍兴市人民委员会除加意保护并屡为修理外，复于一九五七年秋瑾成仁五十周年纪念前夕，将和暢堂作为秋瑾纪念馆，陈列纪念物中有秋瑾当年所用手枪衣物等，并在七月十四日举行盛大纪念会（因与徐錫麟烈士一道纪念，故日期定十四而不用成仁纪念日——七月十五）。

在上海：一九一二年由王金发、姚勇忱于上海白克路（现为凤阳路）倡办秋瑾纪念学校，名曰“竞雄女学”。一九一三年家姊接办，由小学扩充为师范及中学，直至一九二七年夏季止。在这长时间内，同盟会及光复会同志不少人以竞雄女学教职员名义为掩护，做了许多倒袁、倒军阀工作。最突出的，是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称帝，蔡锷起义，浙江也变相独立，而馮国璋在南京大耍两面派手段的时候，同盟、光复两会留沪会员在竞雄协商抵抗，图占苏州，决議推竞雄教师陈去病与家姊到苏，侨装母子进香，辟室苏台旅馆，指挥一切。事前与苏州警察所长已有联系，后来该所长翻悔，命令军警包围苏台，将加速捕。家姊以急智密藏图记及旗帜于裹腿之内，空手从边門脱险，陈亦侨装遁去。此足够说明竞雄女学在当年的作用了。一九二七年夏，家姊将该校交王燦芝接办，次年，燦芝留学美国，学校遂停办。旋由家姊物色纪国振（纪号侠中，也是秋瑾学生）接办，迁至派克路（现为黄河路）协和里三号。一九五六年，合

并于凤阳路小学。

在长沙：光复后設立了秋女俠祠堂，并出版了紀念刊物。

出版紀念书刊

公私紀念秋瑾的刊物，当年有一九〇七年夏的《新女子世界》、一九〇七年冬的《神州女报》、一九〇九年春的《女报》等等。光复后，有陶成章的《浙案紀略》、馮自由的《革命逸史》第二集、赵而昌的《鉴湖女俠秋瑾》、佛奴的《秋女士被害始末》、秋誉章的《风雨一宵恨滿楼》，以及《秋烈士遺稿》、《革命先烈传记》及《清稗类鈔》等。一九二七年后，有堵申父的《鉴湖秋女俠》、夏衍的《秋瑾》（剧本）、《杭州市各界秋俠殉国二十周年紀念会特刊》、王紹基的《秋俠遺集》、王燦芝的《秋俠遺詩》、罗时暘的青年模范丛书《秋瑾》、邹魯的《国民党党史稿》、秋宗章的《六六私乘》、《续六六私乘》、《秋女俠史实考证》等等。解放后，有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三册，朱耀庭的《秋瑾》、秋高的《秋瑾遺事》、中华书局出版的《秋瑾事迹》及中国历史小丛书《秋瑾》等等。

（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

回 忆 秋 瑾

王时泽遗稿

前清光緒末叶，我与秋瑾在东京相处两年，同在横滨加入三合会。现在回忆起她那种风姿英发的形象，有几件事还是记忆犹新的。

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甲辰)阴历正月十八，我随湖南第二批官費留学生由长沙经上海赴日本。二月初到东京，官費留学生田星六等二十余人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我是自費生，进了弘文学院普通班。弘文学院是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納治五郎专为中国留学生創办的，普通班按地区編班，我編在湖南班。在湖南班的同学，现在記得的有长沙楊昌济、陈朴，湘潭李儻、胡迈、胡彥博等。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中国留学生会館設在东京神田区駿河台。各省留学生都有同乡会的組織，在一省之中，有的还組織了地方同乡会(如湖南的湘西同乡会)。各种同乡会经常举行集会，参加者极为踊跃，并出版了一些刊物，如《浙江潮》、《湖北学生界》以及湖南的《游学譯編》等。湖南同乡会经常每月要开一两次会，大多租賃神田区錦輝館为开会地点。在湖南同乡会开会的时候，我认识了刘道一。道一号炳生，系刘揆一之弟，当时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风度翩翩，口舌敏辯，在同学儕輩中非常活跃。我們年紀相若，一見如故，彼此过从极密。我初到东京时，住在牛込区道德館

(后来迁住神田区矢澤館)，道一每两三天必来一次，来則放言高論，往往废寝忘食。

一九〇四年夏，秋瑾冲破封建樊籠，到日本留学，进了中国留学生会館办的日語补习所补习日語。秋瑾是浙江紹兴人，每遇浙江同乡会开会，她必定参加；又因自幼随父入湘，与湘乡王廷鈞結婚，故每次湖南同乡会开会时，她也都来参加，很快地就和刘道一、仇亮、刘复权等人相結识。我也是在这时候和秋瑾結交的。她虽然比我大九岁，但彼此意气相投，聚談的机会很多。从談話中知道她性情坚强豪爽，幼年时从其父学通经史，工詩文詞，又好劍术，善騎馬，十九岁与王廷鈞結婚。廷鈞之父在湘潭由义街開設义源当鋪，积資巨万。婚姻是她父亲在湖南作州县官时所訂的，迫于父母之命而非她所心願。其咏謝道韞詩中有“可怜謝道韞，不嫁鮑參軍”之句，可見她对于婚姻的不滿。一九〇一年，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簽訂《辛丑条約》以后，大开捐官之例。王廷鈞于一九〇二年进京捐官，秋瑾随他同游北京。当时正值义和团运动失敗之后，她目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猖獗横行，清朝政府的昏庸腐朽，忧憤填膺，决然以救中国为己任。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又加以京师大学堂日籍教授服部博士之妻极力称道日本女学之发达，她就决計突破家庭阻力，东渡留学。

就在和秋瑾认识后的这年秋天某日，刘道一来到我的住所說：現有孙中山所派的馮自由、梁慕光等在橫滨組織革命团体，以推翻清朝、恢复中华为宗旨，秘密邀集同志参加。道一問我是否願意参加，我表示同意。这个团体叫什么名称，此外还邀了哪些人，道一当时沒有对我明說。过了两三天，我們即由东京乘車到橫滨。我住在李植生家里(李系广东博罗人，精工化学，善制各种炸药，在

橫濱教留學生制炸藥時，我曾從其學習)，道一則住在馮自由家。馮自由見我們來了，表示非常歡迎，並約定某日晚飯後在南京街（橫濱一條街道的俗稱，中國人聚居於此）某廣東商店後進舉行入會儀式。到了預定時間，入會的人陸續來到，共計十人。除我以外，還有秋瑾、劉道一、仇亮、劉復權、彭竹陽、曾貞、龔寶銓（其餘兩人，忘其姓名）。馮自由、李植生、梁慕光都在場。首先由馮自由向我們交代宣誓的問答語，叫我們在宣誓時依樣回答。交代完畢，即由梁慕光主持宣誓儀式。他手執鋼刀一把，架在宣誓人頸上，由各人依次宣誓。劉道一是第一個宣誓的。輪到我宣誓時，梁問：“你來做什麼？”我照馮自由囑咐的話回答：“我來當兵吃糧。”問：“你忠心不忠心？”答：“忠心。”問：“如果不忠心，怎麼辦？”答：“上山逢虎咬，出外遇強人。”全體宣誓畢，梁與馮自由橫牽一幅六七尺長的白布，上書斗大的“翻清復明”四字，命各人俯身魚貫從布下穿過，以示忠於主義。又在室內燒一堆火，命各人從火上跳過去，表示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然後分別刺血，殺了一隻大雄雞，共飲雄雞血酒。馮、梁兩人當場宣布這個團體叫做“三合會”（取合天、合地、合人之意），向我們交代了一些規矩，如見面手勢如何擺，如何問話答語，進門要用右腳向前跨，握手時要捏緊對方的無名指，等等，並交了一本書給劉道一，叫我們互相傳抄。我粗略地翻了一下，裡面寫了一些會規，還畫了許多旗幟的樣式。最後，每人交納入會費十元日金，就算了事。這次入會，劉復權被封為“洪棍”，秋瑾被封為“白扇”（俗稱軍師），劉道一被封為“帥鞋”（俗稱將軍），是謂“洪門三及第”。劉復權，湖南人，後來變節投敵，流為江督端方的偵探，辛亥革命時為民軍捕解南京，經黃興下令槍決。仇亮字蘊存，湖南湘陰人，留學日本弘文學院，後入振武學校習軍事，尋升士官學校，一九

一二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部军衡司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在北京被袁世凯逮捕下狱，一九一五年六月九日遇害，年三十七岁。龔宝銓字味蓀，浙江人，章太炎之婿，随太炎研究国学，造詣甚深，辛亥革命后任浙江图书馆长。曾貞字驥才，江西人。彭竹阳，四川人。

按横滨三合会又称三点会，成立于一九〇四年春。第一次入会者为馮自由、梁慕光、廖翼朋、胡毅生、陈攝芬(女)、李自平(馮自由之妻)等人。自平与秋瑾相友善，秋之入会，即自平所邀約。我們这次是三合会的第二次拜盟。据馮自由說：当时革命党尚无統一組織，孙中山在海外結納同志，常利用三合会的形式行之。一九〇五年八月，同盟会成立于东京，我們遂正式加入同盟会。秋瑾是在同盟会成立半月后，由馮自由介紹在黃兴寓所入会的。她加入同盟会后，被推为浙省主盟人。后来浙江志士入会者，多为她所介紹。

自从横滨加盟回到东京后，秋瑾和我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她視我如弟，时加勉励，并介紹我和陶成章見面，約为同志。陶成章当时在江浙一带从事革命活动，与章太炎、蔡元培等組織光复会。秋瑾因其亲戚陈靜斋的关系认识了陶成章，又因陶的介紹而加入了光复会。我和刘光汉认识，也是秋瑾介紹的。刘系江苏仪征县人，字申叔，当时在东京由其妻何殷震出面，創辦《天义报》，并著有《攘书》，鼓吹革命，后来竟变节了。

秋瑾在东京时，喜欢結納革命志士，交游甚广。当时中国留学生很多，流品不齐。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两大陣營，壁垒非常森严。秋瑾站在革命方面，对于志在反清排滿的爱国青年引为同志，滔滔雄辯，无話不談；对于那些浮薄轻佻、专讲吃喝玩乐的執椅子弟，

則深惡痛絕，不相往來，有時還當面呵斥，毫不留情。對於那些頑固透頂、借留學為升官發財的途徑的人，她也最痛恨，自始至終口誅筆伐，面對面地展開鬥爭。如有個浙江留學生胡道南，因談論排滿革命與男女平權問題，彼此意見不合，發生爭執，秋瑾當面罵他是“死人”。胡因此懷恨在心，一九〇七年秋瑾在紹興大通學校被捕，就是他向紹興府知府費福告密的（當時胡任紹興府學務處總辦）。

秋瑾在東京的時候，看到革命形勢一天一天地發展，積極準備着回國從事武裝鬥爭。平時她常穿日本和服，並且買了一把倭刀，經常攜帶在身邊。她常到東京麹町區神樂坂武術會去練習射擊技術，又學習過製造炸藥。我在橫濱李植生處學習制炸藥的筆記，她全部借去抄錄了。

一九〇五年暑假期間，我由東京回國省親。當時我父親在四川打箭爐游幕未回，只有我母親住在長沙。她以我年少閱歷不深，過去在善化學堂鬧事被開除，怕在日本又出問題，因此很不放心。我將在東京的求學情形詳細稟告，並說來往很方便，你老人家不妨親自去看看。得她同意，於是我們母子二人一同到了東京。這時秋瑾已在日語講習所結業，由國內省親歸來，入青山實踐女校附設師範班學習（這個師範班是范源濂與實踐女校校長下田歌子所發起的，修業期限為一年，除國文教員章士釗外，其餘教員均係日本人，用翻譯上課）。秋瑾見我母親來到，熱情接待，態度和善可親。她對我母親多次談到男女平權、女子要受教育的問題，慫恿先母留在日本和她一道求學。恰好其時湖南選送的官費留日女生許黃萱祐等二十人也都進入師範班，同鄉人多，又有秋瑾力勸，我母親就決意留在日本讀書了。她原名譚蓮生，入學後由我代她改名王勳。

在实践女校师范班中，她是第三个年紀大的学生（湘乡人聶某四十九岁，許黃萱祐四十四岁，我母亲四十三岁，同学暱称为“三伯媽”）。我母亲的年紀比較大，身体又不大好，秋瑾对她照料很周到，遇有劳动的事，总是搶先代做，尽力而为，不让我母亲操心費力。我母亲多次談到，秋瑾在校頑强苦学，毅力惊人，每晚做完功課，人家都已熄灯就寝，她仍閱讀、写作到深夜，每每写到沉痛处，捶胸痛哭，憤不欲生，待到我母亲再三劝导，才停笔上床。現在收入《秋瑾集》（一九六〇年中华书局版）中的詩詞文稿，有許多就是这时期写的。

实践女校师范班仅办一期即未续办，湖南派遣的官費留学的二十人，我現在記得起来的有：許黃萱祐（长沙人，曾任湖南第一女学监督，并創辦私立隐珠女校，一九五三年病故，寿九十二岁）、許馥（长沙人，范旭东之妻）、許徽（长沙人，仇亮之妻）、吳珊（湘潭人，胡迈之妻）、张汉英（醴陵人，辛亥前后从事妇女运动）、王昌国（醴陵人，曾任湖南省議員、萍乡务本女校校长）、許壁、黃国厚、黃国巽、黃輝、彭淵恂之妻（忘其姓名）等十一人。此外，自費附学的約十人，秋瑾、湘阴聶某和我母亲等都是，每期須繳学費十六元，加上衣服、书籍、紙笔、零用等費每月需三十日元之譜。据我了解，上述諸人中，現存者有黃国厚（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許馥、吳珊（均居上海）三人；存亡不明者为黃輝与彭淵恂之妻。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日，日本文部省公布《清国留学生取締規則》，留学界异常憤激（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总数达七八千人），无形中分成两派：一派主张立即退学回国，另在上海办学，以洗日人取締留学生之恥辱；一派认为既来求学，即宜忍辱負重，学成然后归国。双方各执一詞，互有辯駁，爭之至烈。我那时傾向于

后者，而秋瑾与陈天华、田桐等人则都是力主迅速回国的。这年十二月八日，陈天华愤而蹈海自杀。自陈天华投海后，秋瑾受了很大的刺激，决计立即回国，自谋出路。在陈天华投海的第二天（十二月九日），她就写了一封信给大哥秋誉章，告以留学界因取缔规则公布，“俱发义愤，全体归国，此后请勿来函，大约十二月须归来也。”同月二十二日，又寄书秋誉章说：“近日留学界全体同盟停课，力争规则之辱，……决议全体归国，故纷纷内渡已及二千余人。妹亦定此月归国，以后再作行止。”在我的记忆中，秋瑾是在一九〇五年年底以前由东京动身回国的。临行前某天，是星期日，她同我母亲一道来到我的住所（当时我在日本私立海軍预备学校海城中学学习，为照顾我母亲起见，特迁至赤坂见附町见晴馆寄宿），问我归国与否，我说：“甲午之耻未雪，又订辛丑和约。我们来到这里，原为忍辱求学。我不赞成在此时回国，并希望大家暂时忍耐，不必愤激于一时。”秋瑾见我这样回答，没有表示反对意见。过了几天，她就束装回国了。

秋瑾回国后，不久就寄了一封信给我，现在抄录如下：

吾与君志相若也，而今则君与予异，何始同而终相背乎？虽然，其异也，适其所以同也。盖君之志则在于忍辱以成其学，而吾则又不受辱以貽我祖国之羞；然诸君诚能忍辱以成其学者，则辱也甚暂，而不辱其常矣。吾素负气，不能如君等所为，然吾甚望诸君之毋忘国耻也。

吾归国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等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且光復之事，不可一日緩，而男子之死于謀光復者，則自唐才常以後，若沈蕙、史堅如、吳樾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則無聞焉，亦吾女界之羞也。願與諸君交勉之。

這封信是由上海寄到東京的，信尾具名是“兄竟雄頓白”（她歸國後給我的信都是這樣具名的）。信中所說：“吾歸國後，亦當盡力籌劃，以期光復舊物，與君相見於中原。”又說：“吾自庚子以來，已置吾生命於不顧，即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這幾句話反映了她經過在東京兩年的鍛煉，深明革命大義，決心以實際行動挽救祖國的危亡，即犧牲生命亦所不惜，憂國憂民的沉痛心情，溢於字里行間。我讀了以後，深受感動。

後來知道，秋瑾回到上海，住在虹口厚德里，結識了許多革命同志，經常秘密商討革命問題，並于一九〇七年一月，在上海創辦中國第一份女報——《中國女報》。她自己撰寫了《中國女報發刊詞》，又用白話體寫了一篇激昂慷慨的書告——《敬告姊妹們》。秋瑾在辦報的同時，並沒有放棄武裝鬥爭。她與徐錫麟保持密切聯繫，積極籌組“光復軍”，定期在皖、浙兩地起義。一九〇七年春天，秋瑾回到紹興，主持大通學堂體育專修科。大通學堂實際是一個軍事學校，名為學習體育，實則借此培養軍事人才。秋瑾常常穿了男子服裝，騎着馬，帶領學生到野外打靶，練習射擊技術。這時，她也不斷有信給我，說了許多勸勉的話，並將所著《精衛石》文稿寄來，托我在東京出版。我正準備交印，她又來信索回，說要修改內容，後來就沒有再寄來了。最近看到《秋瑾集》中刊載的《精衛石》是彈詞，我記得她那時寄來的是曲牌，可能是索回之後修改的。就在這年春天，秋瑾回到湘潭王家視其子女，並告其夫說：“我已以身許國，今後難再聚首，君可另擇佳偶，以為內助。”居住幾天，即行返

浙。她这次去湘潭，往返经过长沙，都住在我家（长沙通泰街忠信园），我的六岁侄女孟明，看见她穿的长袍馬褂，一派男装，称之为“秋伯伯”。其时我母亲已经回国，在周南女校教課。

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五日（阴历六月初四），秋瑾在大通学校被捕，同月十七日，就义于绍兴古軒亭口，年三十一岁。其遺骸由女友吳芝瑛、徐寄尘等收拾，葬于杭州外西湖西泠桥畔，墓碑题为“嗚呼鑒湖女俠秋瑾之墓”。翌年，清御史常徽奏請平毀秋墓，并严拿懲办吳、徐两女士，因社会輿論群起反对，吳、徐幸免株連，烈士遺骨由王廷鈞以其子沅德名义，迁葬于湘潭之昭山。烈士死后之次年，陶成章等密遣同志，誅胡道南于绍兴某寺。胡之告密，事載《秋女俠冤獄彙案》中所收貴福于六月初五致浙撫張曾敷稟，胡被誅经过是陶成章辛亥前在东京亲自告訴我的，但他自己所撰的《秋瑾传》都沒有提到这件事。

一九一一年六月，我母亲在长沙病故，翌年五月，我由上海回湘奔喪。其时湘、浙两省商定，迎送烈士遺骨返浙，复葬西泠桥畔。长沙辜天佑帶領烈士之子沅德来見我，說王家认为烈士子女均在湘潭，不贊成迁葬西湖。经我婉加解释，始无异議。这时又有部分同盟会會員主张改葬岳麓山，我也力持不可，因为烈士出生于浙江，就义于浙江，自以复葬西湖为宜。烈士忠骨复葬西湖后，湖南妇女界及同盟会呈准都督府拨长沙市黄泥堰陈湜祠改建秋女烈士祠，并推我经办这件事，經費則全部由王家負担。我除主持建祠事宜外，并将辛亥前陶成章在东京交給我保存的烈士詩文稿（我当时又寄回长沙，交先母保管），編为一集，以“长沙秋瑾烈士紀念委员会”名义出版，題名为《秋女烈士遺稿》。我在卷首写了一篇《秋女烈士瑾传》，略叙烈士生平及死难经过。这个集子印数不多，現在

已经很难找到了。

秋瑾的儿子王沅德，号重民，一八九七年生，上海正风大学毕业，曾任报社经理、中学教员等职，解放后任湖南文史研究馆秘书，一九五五年在长沙病故，年五十八岁。沅德临危时，嘱家人将所存他母亲的遗照数帧并《秋女烈士遗稿》一本送到我家，以留纪念(我已转送湖南省博物馆保存)。

岁月不居，秋瑾殉国已有五十四周年了。当年横滨三合会同志，大概都已不在人间，回首往事，真是“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鲁迅诗）。

第九鎮秣陵起义和江浙联軍

光复南京亲历記

徐 森 譔乘直

辛亥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南京第九鎮新軍首先响应，由中华門外秣陵关向南京城进攻。其間虽因弹药缺乏，未克奏功，但退到鎮江之后，即重整旗鼓，联合原駐在鎮江的一部新軍为基干，扩大組織江浙联軍，再向南京进攻，終于击败了清軍，光复了南京。当年，我們均为九鎮軍官之一員，亲与其役，爰把我們亲历之境，亲見之事，直率写出，不加点綴渲染，其中是非得失，亦不加以評論。

(一) 第九鎮从成立到調駐秣陵关

江苏陆軍第九鎮，系两江总督周馥奏請編练的新軍，成立于清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按全国所編新軍序列定为第九鎮。当时每鎮轄步兵两协，每协轄步兵两标。第九鎮所属的协和标依照鎮之序列編为十七、十八两协及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四标。此外，尚有馬队一标，炮队一标，工程队一营，輜重队一营，依照鎮的序列編为馬队第九标，炮队第九标，工程队第九营，輜重队第九营。又有宪兵队三营，直轄于鎮。此为当时新軍一个鎮的

編制。該鎮部隊所用的槍支，多半購自外國，有日本三八式、德國毛瑟式，亦間有漢陽造的，但為數不多。所用的大炮，有日本的平射炮和德國的管退炮。那時，第九鎮司令部、第十七協司令部和其所轄的第三十三、三十四標，馬炮各標，工輜各營，均駐在南京。十八協司令部和其所轄的第三十五標駐鎮江，第三十六標駐江陰。

第九鎮統制徐紹楨(固卿)，原為江蘇候補道。第十七協統領孫銘，第十八協統領杜淮川，第三十三標統帶王光照，第三十四標統帶楊言昌，第三十五標統帶敖正邦，第三十六標統帶陶澄孝，馬標統帶劉步青，炮標統帶劉維騃，工程營管帶鄧質儀，輜重營管帶方咸五，憲兵司令陶駿保。上面所列举的這些軍官，均系指在辛亥革命前夕的現職人員而言。他們均系留學國外的學生，除炮隊統帶劉維騃系留學奧國外，其餘都是留學日本的。

第九鎮成立前一年，即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先有督練公所設置，以為江南各路防營之樞紐，內分兵備、參謀、教練三處，由江蘇候補道朱恩綬(湖南人)總辦其事，後改稱總參議，這就是總督的參謀長(端方督兩江時，總參議為舒清阿；張人駿督兩江時，總參議為楊晟)。凡有關第九鎮的器械、服裝、馬匹、餉糈以及教育訓練、衛生各事務，統歸督練公所籌劃，為成立新軍作好準備。據說，一鎮的開辦經費約需紋銀一百四十萬兩。

當清末改練新軍時，清廷通令各省督撫，按照陸軍部擬定的新軍章程，征募新兵編制訓練。這時，閩浙總督李興銳(勉林)就委徐紹楨主辦其事。紹楨本系書生，不知軍事。恰值李督新由南京調去兩位江南陸師學堂畢業生彭汝亮、厲明度，便由他們代為規劃一切。於是紹楨便成為一個知兵的干員，頗為李督倚重。嗣以兩江總督周馥去任，李督調任兩江，江蘇亦正在編練新軍，就把紹楨奏

調前來南京，主辦新軍之事，成立江蘇陸軍第九鎮。李督旋因病告老還鄉，清廷調湖北巡撫端方任兩江總督。宣統元年清廷又調端方任直隸總督，以張人駿繼任兩江，所以在辛亥革命時兩江總督為張人駿。

當江蘇成立第九鎮時，南京本駐有江防軍（即綠營部隊），被稱為舊軍。第九鎮系新編的部隊，被稱為新軍（新軍、舊軍系社會上一時流行的稱謂，並非特定的名稱）。江防軍軍統張勳統轄步馬兵二十三營，其下有統領二員，一為王有宏，一為趙會鵬，各領十營，其餘三營直轄於統部，稱為親兵（即軍統的衛隊）。以上舊軍分駐於南京城關內外各要隘，擔任省防。而新軍則駐城內，專事訓練，不擔任防務。此時新舊兩軍同駐一地，新軍鄙視舊軍，舊軍嫉忌新軍，雙方之間，不無隔閡。於是新舊兩軍，便成冰炭。

新軍成立之時，革命思潮已波及全國各地，同盟會等革命團體的活動亦深入到新軍。特別在初級軍官及士兵之間，反滿愛國的革命思想影響日益擴大。如第九鎮的步兵第三十三標統帶趙聲（字伯先，江蘇鎮江人，系江南陸師學堂第二期畢業生，同盟會會員），當他任統帶時，對他的部屬時常鼓吹革命，后被總督端方聞知，把他撤職查辦，趙即避到香港去和黃興等從事革命活動。他雖去職，而他傳播的革命思想，已由三十三標影響到全鎮初級軍官和士兵。中上級軍官與初級軍官間的矛盾，更促進了革命的傾向，加速了革命的行動。當時新軍編制師法日本，清廷所設的軍諮府（即參謀本部）各廳處長悉為留學日本的士官畢業生。軍諮府正副大臣毓朗、載濤不諳軍事，故各廳處長對於用人行政握有相當的實權。徐紹楨本系舊官僚，和這一班新貴素不相識，在第九鎮初成立時，徐對中級官尚“土洋”并用，及後為鞏固個人地位，對中級官便

重用留学日本士官毕业生，借作桥梁，以便与軍諮府这一班新貴联系，对留学欧美毕业的便不重視。至由內地軍事学校毕业的，除一二旧有人員任中級官外，其余悉为初級官。而这一班士官毕业生，一到了第九鎮，起碼不是教练官，就是管帶，他們也就自高自大起来，对初級官大有羞与为伍的神气。一班初級官都是从第九鎮成立时就服务的，又系直接訓練士兵的，他們在軍隊中经验自然要比士官生为多。起初一班初級官总以为留学外国的，学术当然要比在国内的好，乃日久看出士官生除逐日高車駟馬、酒食征逐外，对于学术并无所长，对事务亦不知处理，由此都輕視之，上下便砌成一道牆，咸欲借革命驅逐留学生出部队。

当武昌革命軍起义之时，江防軍統制张勋便乘机向总督张人駿挑拨，謂新軍全是革命党，无一可靠。张人駿因此不但对九鎮官兵发生怀疑，就連統制徐紹楨也背了嫌疑，对江防軍則益加信任，倚若长城，特奏保张勋为两江軍务帮办。而徐紹楨此时亦恐所部为外力引誘发生叛变，不无惴惴。他即偕同第十七协統領孙銘往各标召集全标正副目訓話，略謂：这次武昌第八鎮叛变，无异以卵投石，自取灭亡，切勿步其后尘等語。接着孙銘又补充一番，大意还是要叫大家效忠清廷，不得乱动。同时，徐又召集各营督队官和各队队官，一一詢問所部士兵是否不至发生叛变，軍官們假意提出保证，僉謂所部无一个革命分子。其实这时革命气氛已籠罩全鎮，正如箭在弦上，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只有那些留洋的中、上級軍官还在梦中。

江督张人駿获悉两湖总督瑞澂逃上外国兵舰，汉口、汉阳都被革命軍占領，对第九鎮更加疑虑，亟想收繳第九鎮的枪械，但又怕因此激成事变，所以輾轉躊躇，下不了决定。徐紹楨因被张人駿怀

疑，亟思表白，便令各标营将平时准备实弹练习的弹药悉数缴还軍械局，以为这样办既可表示自己此心无他，并可减少张人駿的疑慮。那知张人駿的疑慮心終不能去。适遇江宁藩司樊增祥因曾护理两江总督，迄未升迁，对清廷心怀不满，亦想促动第九鎮革命。樊向张人駿說，武昌叛变的是新軍，而由京汉铁路南下平乱的也是新軍，新軍不全是革命党，比如一树果实，其中有一果生虫，不能认为全树果实都生了虫。《庄子》寓言曾說，有一老妇失去柴刀，疑系邻居一青年窃去，便伺察該青年的行动，几乎无处不似做贼的。后来老妇在自己柴堆里寻获了柴刀，再伺察該青年的行动，便看不出一点做贼的样子。現在大帅(称张人駿)对第九鎮有似老妇失刀之疑，在本司的(樊自称)意見，不妨令第九鎮在宁部队暂时移駐郊外，不令入城，俟武昌乱平，再行調回，届时又安知不似老妇获刀，释去前此之疑慮呢。张人駿从之，便令第九鎮駐南京的各部队，克日移駐南郊外距城六十华里的秣陵关附近。

张人駿既听从了樊增祥的建議，樊旋即到了馬标，召集馬、炮两标初級軍官(炮标与馬标相邻近)，告知对张所說的話，囑代轉达其他标营的初級官，并云：你們(第九鎮官兵)移駐郊外，一方面可免大帅猜疑，一方面自己的行动也可自由；至于粮餉，我已代为筹备好了，不必顾虑。于是徐紹楨在樊增祥講話的第二天，就率領各部队(計有步兵第十七协三十三、三十四两标，馬队第九标，炮队第九标，工程第九营，輜重第九营及宪兵营)向秣陵关开拔而去。鎮司令部和协司令部以及步馬的标本部、工輜的营本部都駐在秣陵关鎮內，各部队則在秣陵关鎮外幕营。这就是一九一一年旧历九月初九日南京九鎮部队走向起义征途的一个紀念日。

(二) 张勋江防軍肆虐南京城

陸軍第九鎮部隊開拔出城後，江防軍無異拔去了眼中釘，從此就肆無忌憚，任意橫行，除逐日到民家翻箱倒籠掠奪財物外，復到處搜捕革命黨人。凡是剪去辮發的青年和穿著學生裝的少年都被指為革命黨，一律捉將官里去，不分皂白，加以殺害。當時，譚秉直也是一個無發辮的軍人，在鎮江第九鎮步兵第三十五標充任隊官，奉營長林述慶之命，到寧密取聯繫。不料一到之後，南京情勢突變，四城緊閉，大捕黨人，陷於危城之中，無法飛越。後來幸亏南京陸軍小學堂德籍教官愛格爾先生接到譚的一封求救的信，親自乘馬來家接應，並帶來了一輛馬車送之出城，始得脫險回防。至於居民方面，被張勳的大辮子兵借口檢查革命黨人，實行逼取財物之事，更是不勝枚舉，弄得家家戶戶，日夜不安，走頭無路。這時，逃難的民眾，爭先恐後，途為之塞。下關車站行李堆集如山，輪船碼頭幾無隙可尋，甚至有挨餓佇候三日尚不能成行者。

在此期間，有江防軍秘書長萬繩式出面維持地方秩序的一段插曲。張勳在南京釣魚巷新娶了一個妓女名叫小毛子，寵愛異常，萬繩式是她的寄父。萬是南京本城學界中人，張勳因愛屋及烏，聘萬為秘書長，頗加信任。同時，又有紅卍字會會長陶保晉，亦係南京學界中人，與萬素相友好，由萬的關係，取得張勳的黃色令旗一面，有此令旗，即可通行無阻。陶又聯繫南京學界中人士顧琪、伍崇學、范宸、濮祁等，通過張勳成立一個地方治安會（地址在現在的白下路），協助維持治安，並製成銅質紅卍字會的証章和木質紅卍字會的門牌，凡行人衣襟上帶有証章的可免盤查。大門上懸

有門牌的，可免檢查。又商店門頭漆有紅卍字會徽章的，可免搶劫。地方秩序才賴以稍安。

這時，城內謠言繁興，人心惶恐。適有第九鎮的退役兵士蘇良斌，本是一個無賴子，又有一個流氓名叫崔瑛，他們兩人的家都住在江寧縣署近旁，因此同縣署中的差役都很熟識。蘇良斌知道第九鎮到了秣陵關之後必要舉義，便同崔瑛勾結縣署牢獄，一俟第九鎮向城市進攻時，即釋放獄中囚犯，以為內應，借此向革命軍邀功。忽有謠傳第九鎮訂於九月十六日（舊曆）發動攻城，蘇良斌信以為真，便通知牢獄，是日把獄中囚犯釋放。囚犯出獄，四出搶劫，如倉巷一帶的民家、花牌樓的當舖、北門橋的商店，都被搶劫一空，城內秩序大亂。地方治安會不明真相，誤以為革命軍已攻進城來，遂匆匆忙忙地把預先准备好的一面大白旗高懸在大門外，表示歡迎革命軍。未幾，這几十个囚犯都被江防軍捕獲梟首。這時地方治安會才知道是誤會，又趕忙地把白旗收起，換上黃旗，所幸未被江防軍看見，否則，治安會就不免要發生問題了。後來江浙聯軍光復南京，蘇、崔二人被捕，判處死刑。

（三）第九鎮秣陵關起義和進攻雨花台的失利

陸軍第九鎮開出南京後，如同虎兇出柙，脫去了羈絆。一到了秣陵關，初級軍官們不等待上級命令，即下令所部把刺刀、馬刀一律開口，準備肉搏沖殺，奪取雨花台炮台，以為進攻南京之據點。這時，已是萬籟俱寂，月光照滿了大地，只聽到各隊里發出了一片霍霍磨刀聲和涼風里吹送來陣陣馬嘶聲，這種情景，大大激發了戰士們的殺敵精神，恨不得立即奔赴戰場，一顯身手。

这时，駐鎮江的步兵第三十五标，駐江陰的步兵第三十六标，得知南京的部队准备起义，正如銅山西崩，洛钟东应，只等候命令一到，便可同时发动。

至此，全鎮的上中級軍官（指日本士官毕业的）如梦方醒，才知道所屬部队已不能听其指揮，而本身亦不能为部下所容。于是能逃者逃，不能逃者只好收起他們平日那种夜郎自大的驕傲态度，对部下俯首听命，假意贊同，遇机再图脱逃。徐紹楨在秣陵关見所部革命声势愈来愈大，不能遏止，便据情用书面报告张人駿（当时郊外不通电话），派正軍械官郑为成（江南陆师学堂毕业生）入城投递。郑便借此离开了鎮部前往鎮江，从事革命工作，并未将徐的报告投送督署。徐紹楨不知报告未曾投递，只觉张人駿方面迄无回音，是对他怀疑已深，再回顾各标营革命呼声已响彻云霄，往日所重用的上中級官都无能为力，且多数逃走，大势所趋，只好倒在革命一边，附和起义。徐因先将两个旗籍軍官看守在鎮部內，将鎮部余存枪弹数千发，发给步兵第三十四等标，以表明自己的态度；又派正參謀官沈同午（日本留学士官毕业生）为总指揮官，克日率队进攻南京城。

此时发给步兵三十四标的枪弹每兵只有三粒，初級軍官們以子弹不足，认为不能轻举；由上海运来子弹已在中途，不如稍迟两日再行发动。徐紹楨則声言此不足慮，已和江防軍方面接洽妥协，新軍进城时他們决不抵抗，就是这几粒子弹也并不需用，不必等待沪弹运来。官兵听了这话，以为徐紹楨先和江防軍接洽，也是可能的，遂信其言。翌日（阴历九月十八日）拂晓，就大张旗鼓，向南京聚宝門（今称中华門）前进。此时除步兵第三十四标外，其他部队如步兵第三十三标及工輜等营，馬炮等标（炮标計野炮一营、山炮两

营) 虽无弹药,亦随同前进,以壮声威。但炮标第一营因系野炮,道路不平,难以运动,暂留在宿营地。第二、第三两营均系山炮,仍随同前进。炮队第一营营长范滋澤便将所部士兵和馬匹配合馬枪(有空响,无实弹)編成先遣騎兵队,在最先头前进。沿途不断地由总部传来消息,或說聚宝門已经开放,专候新軍入城;或传雨花台已树立白旗,迎接新軍。便催促各部队迅速前进。

午后四时頃,先遣騎兵队抵花神庙附近,騎兵长范滋澤在高地上用望远鏡了望雨花台方面,一面白旗也看不到,即令士兵用空响发射了五六发,以試探雨花台动静,不料雨花台方面便有数十发实弹飞来。范知前此沿途的传言不确,即令士兵散开,占据陣地,以俟后方步兵到达。四时五十分頃,步兵三十四标到达前方,先遣騎兵队即撤至后方。其他无弹药的各部队亦相繼而至,均停止在花神庙后方一带地区。时已午后六时頃。

到了午后七时頃,总指揮官令步兵第三十四标部队向雨花台攻击前进,并以一部绕攻水西門。八时頃,前綫步兵开始跃进,是时,雨花台方向枪炮弹如雨注一般。所幸地多起伏,又是夜間,加以雨花台的守兵皆系盲目射击,无多大伤亡。至午夜,前綫士兵已进至雨花台的炮台前約一千余公尺,各士兵所带三粒子弹,都已射完,掩蔽在田埂后不能再进。这时,先鋒队长唐有泰中弹陣亡,其余两个先鋒队长张国俊、潘綬丞,俱受重伤,士兵伤亡更重。虽然如此,但是官兵們不但毫无动摇之象,而且更加加强了杀敌决心,至死不退,誓以血肉之躯,夺取雨花台炮台,以偿革命素願。这时,前敌指揮官朱履先,在此弹尽援絕之时,身先士卒,揮着指揮刀,向前跃进,大呼“弟兄們! 冲鋒! 冲鋒!”前綫部队同时发出了冲鋒的尖銳号音,与弟兄們所喊出的“杀! 杀!”声相应,响彻云霄,大家

都以奋勇的精神齐向炮台冲去。卒以炮垒坚固，防御重重，連冲数次，均未奏功。这时，战场已是尸横遍野，无法再攻，总指挥官乃下令向鎮江退却，因鎮江原駐有三十五标，可借以收容。总指挥官沈同午只身向鎮江逃走后，就未露面。至于徐紹楨，他在部队由秣陵关出发后，先把看守在鎮部的两个旗籍军官予以枪决后，便微服沿宁鎮大道东去。駐鎮江的三十五标和駐江阴的三十六标两統带都逃往上海租界。第三十六标的管带林述庆(字頌亭，福建人，系福建武备学堂毕业生)便把第三十六标带至鎮江与第三十五标会合，改称为鎮軍，在鎮江宣布独立，攻占旗营后便組織軍政分府，被推为鎮軍都督。

徐紹楨微服到了鎮江，便往訪林述庆。林先拒而不見，后经左右劝說，方才延見，然未假以詞色。徐此时处境狼狽，住在万全樓旅館內度着苦悶生活，由其左右陶炳南、陈仲福、茅春台等人代为活动，借以緩和对他不滿的空气。因这次进攻雨花台，本属冒险之举，由于徐紹楨的謊言，以致造成部队的重大損失。第九鎮部队在这一战斗中虽然失敗了，然而他們革命的积极行动和勇敢的牺牲精神，在軍事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四) 江浙联軍的組成和攻克南京

第九鎮进攻雨花台失敗后，即向鎮江退却。上海同盟总会获悉这种消息，认为南京是战略上的要地，势所必爭，非攻取南京，不足以完成江苏革命之任务。乃在上海召开紧急會議，一致决議，策动江浙各軍編組联軍，以为再次进攻南京的基本武力，并通电已经光复的各省，速派援軍，共赴事功。當場推定徐紹楨为江浙联軍

总司令，統一指揮。

这时徐紹楨正在鎮江收容由南京退到鎮江的部队，从事整編。即在鎮江成立江浙联軍总司令部，筹划进行。在此期間，上海方面首先派党人洪承点为沪軍司令，率領上海义勇商团和临时編成的学生軍共約千人，开抵鎮江听候調遣。吳淞方面恰有刚从广东开来的粵軍統領黎天才所部六百余人，亦願参加革命，共效馳驅。接着，有苏軍統領刘之洁所部三千人，浙軍司令朱瑞所部三千人，亦先后到达鎮江，連同原来駐鎮江的第九鎮步兵第三十五标林述庆所部三千人，和柏文蔚所領的淮軍两千人，徐宝山所領的揚軍两千人，共一万四千余人，很快地就編成江浙联軍。

江浙联軍总司令徐紹楨在各軍部队編制就緒后，召开各軍參謀团會議，計議进攻南京。当时，在會議席上曾有过不少的爭論：有的主张先夺天保城，居高临下，瞰制全城，然后进攻南京，較为有利；有的主张先攻雨花台，然后再合力进攻南京，比較容易得手。鎮軍參謀长許崇灝主张第一說最力，浙軍參謀长呂公望主見亦同。最后据多数意見決議：以联軍主力攻夺天保城，另以一部进攻雨花台，采用双管齐下的战术。当时，譚秉直以揚軍參謀长的地位出席这一會議，除已知上述情况外，在部署方面，記得是这样的：以林述庆所領的鎮軍、朱瑞所領的浙軍和黎天才所領的粵軍为主力部队，担任进攻天保城；而以洪承点所領的沪軍为总預备队；另以刘之洁所領的苏軍担任进攻雨花台。此外，柏文蔚所領的淮軍，徐宝山所率領的揚軍，則担任江防警戒和維護交通安全的任务。

这时，革命軍方面商定由程德全出任江苏都督。程德全在联軍部署完成后，乃于十月初三日(旧历)在參謀长顾忠琛陪同下，亲赴高資視师，对官兵們慰勉有加，并召集各軍將領訓話，大意为勉

勵和督責之語，并对此举寄予殷切之望。

翌日，总司令徐紹楨发布总攻令，以浙軍向幕府山炮台进攻，粵軍向烏龙山炮台进攻，鎮軍向天保城炮台进攻，另以苏軍向雨花台炮台进攻，而以沪軍为总預备队，位置于尧化門附近。各軍奉令后，即向指定目标前进。浙軍朱瑞首先出陣，向幕府山炮台进攻，激战数日，迄未得手。粵軍把烏龙山炮台攻下后，乃与浙軍并力合攻幕府山炮台，至九日拂晓始攻克之。但进攻天保城的鎮軍，虽自四日起也开始攻击，但以城堡險峻，屢攻不下，伤亡甚重。于是总部乃急調浙軍、粵軍协力助攻，再接再厉，彻夜血战，直至十一月二十日始把該城攻破一角。鎮軍連长季遇春首先冲上該城。接着，浙軍、粵軍亦相繼攻入，而沪軍亦派队增援，天保城遂被联軍占領。在天保城酣战之际，雨花台炮台已被苏軍攻占。至此，南京城郭險要已完全落在联軍之手。

联軍在攻夺天保城一役中，鎮軍营长楊韵珂、浙軍敢死队长叶向高，均先后陣亡。至今天保城上豎有“辛亥革命联軍陣亡軍士紀念碑”，即为崇敬革命先烈而建。清軍巡防营統領王有宏、江防营統領成文，均在天保城战役中为联軍击毙。

联軍攻占天保城、雨花台等据点的胜利，与海軍的协同和江防的合作有密切的关系。我所知道的情况如下：

海軍协同方面：武昌起义时，海軍統領宋文瀾所領的“保民”等舰十余艘，原停泊武汉。当馮国璋統率大軍南下攻打武昌时，想利用宋部海軍为其掩护。宋探悉此种消息，即連夜向下游开駛，到达鎮江时，特向鎮軍都督林述庆表示态度，願为革命事业努力。那时江防正感到空虛，林当然表示欢迎，旋派參謀长許崇灝与宋联系协商布防計劃。随后林即派宋为海軍司令，担任江防警戒任务。

这一措施，不但壮大了鎮軍革命的声势，而且对于联軍作战方面，维护江面治安，运输軍用物資，都起了重要作用。

江防合作方面：江南江防之安全，賴有沿江各路炮台为其屏障。自吳淞口至南京之間，江行六七百里，沿江大小炮位不下數十处之多。按其地理形势來說，如吳淞、江阴、鎮江、南京等处，皆为險要地区。那时就把这些地区划为四路要塞地区：以吳淞的南石塘、獅子林炮台为一路；江阴的南岸东山、北岸天生港炮台为一路；鎮江的象山、焦山、都天庙、鬪山关南北两岸的炮台为一路；南京下关獅子山、幕府山、雨花台为一路。以上四路炮台，在辛亥革命前的編制，每路設有总台官一員統轄之，直隶于江宁四路要塞司令部。所用的大炮，皆系购自外国，一切操炮技术，則聘請外国教官同中国教官担任教练。这些官兵們不但在技术操作上获得了新知识，而且在政治思想上也有所轉变。如在辛亥革命时，江阴要塞总台官刘廷柱为了援助武昌江防工作，特派工程营水雷队一队前往武汉布置江防。又如在江浙联軍进攻南京时，下关獅子山炮台总台官承現为了防止清軍使用大炮攻打革命軍，就預先秘密地把大炮炮門卸下，暗中交与停泊下关的楚泰兵舰收藏，使清軍无法使用，使革命軍免受炮击的威胁。

联軍攻占天保城后，已創造了攻入南京的有利条件。但是张勋仍图負隅頑抗，不肯投降。联軍迫不获已，乃用大炮向城内太平門（清軍了望台）和北极閣（张勋指揮所）两处轰击。两江总督张人駿、江宁將軍铁良等知南京不可守，遂托美籍教士鼓楼医院院长馬林出面向联軍总部接洽，表示清軍願意投降，并以不杀旗人，停止炮击，让他們安全退却为請。徐紹楨为了顾全城內人民生命安全計，就接受了这一要求。于是张人駿、铁良立即避匿下关日本兵舰，逃

往上海。张勋则率其残部卫队数百人出汉西门，由大胜关渡江北退。张勋走后，徐州镇台胡令宣、巡防营统领张联陞、赵荣华等各率残部投降，开太平门欢迎联军进城。联军就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日（旧历十二月初二）这一天胜利地完成了光复南京的任务。

联军进城后，立即从事恢复秩序，安撫人民。一面收编防营残部，收缴旗兵枪械；一面整编部队，准备北伐。这时，苏督程德全已由苏州来宁主持大计，获悉武昌形势非常危急，黎元洪已退到洪山，来电求援，遂派粤军黎天才（湖北人）率部往援，将张联陞、赵荣华两部合编一师，以黎天才为师长，令其星夜驰援。黎到鄂后，武昌形势赖以缓和。从此，宁汉长江流域连成一线，不但巩固了武汉的局势，而且加强了革命力量。因此，江浙联军光复南京一役，在辛亥革命史上来说，实具有重大的意义。

鎮江新軍起義和鎮軍會攻南京紀實

許崇灝遺稿

辛亥革命時，我在鎮江新軍中任營長，奉同盟會的密令，組織武裝起義，在辛亥年夏曆九月間先後參與了鎮江、揚州、徐州、淮安等地的光復之役，又與蘇浙聯軍聯合進攻和光復南京。後與聯軍聯合通電歡迎孫中山先生在南京組織政府，建立中華民國。本文主要記述鎮江光復和鎮軍參加會攻南京的情況。

(一)

我原生長在清朝官員的家庭，我父曾任吏部郎中、山東清吏司、江西撫州知府、洋務局會辦等職。先父去世後，我入湖北槍炮學堂，半工半讀。當時革命浪潮已漸次高漲，武漢已設有如科學補習所等的革命組織，廣泛宣傳革命。我經友人歐陽振聲、劉建藩等介紹，進入該所學習。在學習期間，受同學友人的教育和影響，漸明革命的道理，思想言論都大為改變。後又考入南京武備學堂弁目養成所，畢業後分發江南陸軍第九鎮步兵三十六標代理第一營左隊排長。不久又入江南陸師學堂，畢業後曾被分發北京第一鎮步兵第一標，後發回江南第九鎮，返回南京，奉第九鎮統制徐紹楨令任步兵第十七協第三十四標第一營排長。當時革命黨滲入軍隊的

頗多，当局为防范起見，中級軍官多用旧軍出身人物。但因我是“世家”出身，到差不到十日，即由制台直接札委为第三十六标第一营右队队官。后据江南將軍铁良对我說：因我出身世家，軍中多一世家子弟入营，即可多一重耳目，以防范革命党人混入軍队活动。当时他还不知我早已参加了革命組織。

三十六标第三营駐在南京，标本部及第一、二营均調防江阴。我以前在第一营任左队排长时，旧有人員和士兵与我感情頗好，这次見我重来，更加欢欣。我对待士兵如同子弟，凡是士兵的飢寒疾苦，我都在在悉心体察。久之，全营士兵多与我感情密切。后来当局以我带兵得法，調升管带（营长）。当时革命党在上海組織中部同盟会，黃兴、宋教仁等約我加入，囑我物色軍中优秀分子进行革命工作。我先从士兵入手，选择較优秀而又与我最接近的人介紹入会。自从徐錫麟、熊成基等人在安庆发难失敗后，官厅防范更严，但我的革命工作进行未曾稍懈。駐鎮第十八协第三十五、三十六两标的管带林述庆，刘成、端木璜生、章祖衡、明羽林等人都是我密切联系，尤以林述庆与我相处最善，对革命理想他亦深表同情，因此相交益厚。

三十六标后由江阴移駐鎮江，标房在鎮江南門外，与三十五标相近，官兵过从更密，宣传革命的机会更多。虽然不能公开演讲革命道理，但我在对士兵精神訓話时，经常宣传民族主义思想，士兵更乐于与我接近。当时协統是杜汇川，标統是陶澄孝，虽然都是日本士官生，但都有官僚习气，平时很少下到部队，对队內情况极其隔膜。

辛亥年夏，上海方面因事机迫切，派欧阳振声亲来鎮江与我联系，探詢情况，計議办法。这时謠言益熾，两江总督张人駿檄令第

九鎮統制徐紹楨严防，并令具結担保全鎮士兵不致生变。其实当时軍心已离，层层具保的命令也如同废纸。八月間湖北第八鎮在武昌起义，成立軍政府，江南震动。两江总督张人駿即檄調张勳所統的江防营全軍及其他旧有防軍分防宁、鎮，并下令逼繳第九鎮各营全部子弹。我因見旧軍势力仍大，新軍南京、鎮江的联络尚未成熟，只得力持鎮靜，并設法将本队子弹匿藏，仅将半数交出，以观形势。但是士兵也跃跃欲試，势难遏止。我即与林述庆商定，借探各人意向。遂在我办公室召开秘密會議，宣告革命形势日益扩大，时机迫切，应順革命浪潮，速决办法。各軍官初都相顾无言，不敢表示态度，最后才同声宣称：下級只知服从命令。于是推林述庆赴沪接洽，我則与刘成等暗中布置。

其时风声益急，鎮江城内原有駐防旗兵三千，已严加戒备。张勳的江防营和其他巡防营等不下十余营，都分布鎮江附近，鎮江炮台亦对我軍監視，我軍处于包围之中。士兵見长官毫无动静，頗为怀疑，夜間大多分散郊外，不敢留宿营內。正焦急間，忽奉令将本軍两标士兵全数調离标房，散駐野外，不准团聚。此令下后，我軍反得脱离包围。于是各营分駐鎮江南門外不远的张王庙、竹林寺一带。該处地形起伏，林木森茂，是最好的隐蔽处所。我营駐张王庙，居高临下，可以俯瞰城市，实在是良好的作战陣地。自此，軍心益激，謀变的心情更急。夏历九月十三日，上海光复的消息传来，我急派同学黃祖澄等分率士兵数十人化装工人赴沪接洽，領取子弹，并令分携鋪被箱籃等作收藏子弹之用。黎明出发，次日下午即返回鎮江，在鎮江南門外車站下車，計得子弹二十万发，两标士兵按枪分配，各仅得百余发。

九月十四日晚，一切准备就緒，当晚集合三十五、三十六两标

全体官兵，在离鎮江城五里的峴凉山宣布起义，各官兵推林述庆为总司令，我为参謀长。即下令包围鎮江城，准备进攻，并派人入城劝降。

当时鎮江早已辟为商埠，当地紳商及外国侨商見新軍势盛，旗兵难以抵御，为大势所迫，遂包围駐防都統，逼他与新軍接洽。該都統福某，懦弱无能，聞新軍起义，早已惊惶失措，不得已答应紳商所請，願让鎮江。当日(九月十五日)下午，我乃率队一部入城，收繳旗兵枪械，以道台衙門为总司令部，并分配各营駐守各要隘，同时下令严禁士兵乱杀旗人，如动一草一木，都要軍法从事。林述庆入城就职后，收編駐鎮的巡防营及长江水师。后来得知，都統福某已于当日吞金自尽了。

在鎮起义前，事先曾与駐南京第十七协相約，待我軍将从上海領到的子弹运到南京后，会同起事。但代理十七协协統的沈同午，性情急躁，又轻信人言，在九月十七日晚，見南京城內起火，誤以为已经起事，不待子弹运到，就下令攻打雨花台，卒因子弹不继而遭失败，从秣陵关经溧阳向鎮江潰退。当我軍光复鎮江，布置稍定，就聞十七协进攻南京失败，遂集議派兵駐守高資，一面派人收容潰兵。这时柏文蔚带了炸弹队由上海来鎮，遂派他的部队至前方协防。由南京潰退的軍队陆续抵鎮約数千人，三五成群，不成队伍。为維持秩序計，遂設收容所，派柏文蔚为所长，并将队伍进行改編。

鎮江的焦山、象山、都天庙都是长江要隘，原設有炮台。因我軍与总炮台的炮手早有联系，約定誰首先反正，即任誰为台长。我軍光复鎮江后，总台官粵人譚学夔不服降，被該台士兵捆送司令部。我軍即委王以仁为台官。

当时駐武汉的海軍舰队，因武昌光复，不能在汉駐足，遂駛向

下游，意图逃出长江。該舰队駛近鎮江炮台时，台官飞电报告，我急令发炮制止，并派員前往接洽，并由我亲乘汽艇赴鏡清旗舰，与舰队統带宋文蔚晤面，晓以大义。宋犹豫不决，经舰中学生粵人陈复等数人以手枪胁迫，才表示須取决于各舰管带的意見。我遂令陈复升旗召集管带會議，以大义向彼等劝勉，彼等都表贊同，宋才无异言，只得高挂白旗，表示反正。归附的舰队共有鏡清、保民、楚观、江元、江亨、建成、通济、楚同、楚泰、飞鷹、楚濂、虎威、江平及张字号魚雷艇等十四艘。后委宋为海軍司令，軍舰泊駐鎮江候命。至此，鎮軍声势益大。

距鎮不远的瓜州，是通揚州、鎮江的水陆要区，原設有长江水师总兵，有炮艇百余艘駐守。当时适有該鎮胡某率艇来归，都被收編。又該水师宿将赵鴻喜，說服了揚州緝私統領徐宝山(外号徐老虎)来降。林述庆都以优礼撫待，并委徐为第二师师长，兼揚州軍政使。徐宝山遂如虎添翼，雄踞揚州了。

(二)

原第九鎮統制徐紹楨，由上海陈其美等推为苏浙沪联軍总司令。徐及苏軍刘之洁、浙軍朱瑞、沪軍黎天才、洪承点等人都率所部来鎮集中，准备进攻南京，徐并来鎮組織司令部。

鎮軍既准备出发，后方必須确定留守人員。林述庆将先后来鎮的福建人近百余人一一安置于自己的司令部，并以郑权代理鎮江軍政府，将出发的軍队編成陆軍三个支队，海軍一个支队，水师一个支队。我統陆軍第一支队，刘成統第二支队，柏文蔚統第三支队。第一、二支队为一路，由林述庆亲自指揮，沿铁路西上。柏文

蔚支队会合徐宝山的水师渡江西进，直趋浦口，断张勋北退后路。我軍抵达南京尧化門后，得报苏、浙、沪联军围攻南京三次未克。徐紹楨聞我軍到达，遂召集參謀团會議，经联军參謀报告攻宁情况后，才得悉所定計劃，都着重由雨花台及孝陵卫一带进攻，而最險要的紫金山則未計劃在內。我乃极力主张先占紫金山天保城，如得手就可居高临下，南京唾手可得。徐、林二人均表同意，遂下令各軍分三路进攻紫金山。鎮軍由馬群攻中路，浙軍由孝陵卫攻左側，沪軍沿铁路攻右側，苏軍攻雨花台，牵制敌援。当日薄暮开始运动，次日黎明，战斗激烈，反复冲杀，鎮軍营长楊韵珂率連长季遇春队奋不顾身，英勇作战，终于在数小时内，攻占天保城。楊和排长二人、司务长一人、士兵数十人都英勇牺牲。

天保城攻克后，守龙膊子的张勋部队退入南京城，据城頑抗。我乃急調由上海运来的攻城大炮两門，以尧化門西的簾子树西南方高地为炮兵陣地，与富貴山炮台炮战，連发数炮，都中炮台要害，太平門城楼及北极閣都中炮击毀。总督张人駿、將軍铁良、江防营統領张勋都弃城逃走。残部张連陞、赵荣华率部众由美国传教士馬宁帶領，打开太平門投降。鎮軍首先入城，分兵占領各要隘，收撫残敌，安置旗民，招回逃亡，并派人請林述庆入城，又分赴朝阳門、南門、神策門外报告联军总司令，通报全軍。

林述庆入城后，設鎮軍司令部于制台衙門，并任我为南京临时警备司令兼第一独立混成旅旅长，設司令部于两江师范学堂（即后来中央大学校址）。所有收編的江防营残部、南京旧城守营、巡防营、警察等都归我节制。张勋率残部由汉西門出城向浦口潰退，遭柏文蔚部截击，繳得枪械餉銀甚多，柏就借此扩充了部众。

联军入城后，有苏良弼、崔英部队自称苏軍，在旗营一带搶劫

焚掠。我令部队馳往彈壓，將蘇拘捕繳械。又與各軍商議，挑選軍士組織臨時憲兵隊維持各軍紀律。并由聯軍軍法處極力彈壓，秩序始逐漸恢復。

當時北方敵軍進攻武漢，馮國璋占領漢口，武昌告急，黎元洪退至洪山，聞南京光復，急電求援。聯軍會議公推黎天才赴漢援鄂。黎以所統滬軍兵力單薄，要求將我收編的趙榮華、張聯陞所部撥他統轄。我恐有誤援鄂時機，只得慨然答應。黎遂欣然接受任務，就任鎮軍第三師師長，率兵星夜出發，武漢局勢才安定下來。

南京秩序逐漸恢復，武漢也轉危為安。當時得悉孫中山先生已由國外返抵上海，乃與聯軍會議，由各軍各推代表赴滬歡迎來南京組織政府。孫中山先生來南京後，即就任臨時大總統，並組織臨時政府。

(三)

鎮江、南京光復後，革命軍隊伍中，先後呈現分裂現象。鎮江克服後，柏文蔚即慫恿他在安徽武備練軍的同學趙連升等人，向林述慶說項，要求委柏為鎮軍第一師師長。我以林述慶不應放棄軍權，認為師長應由林自兼。林則認為自己任總司令，不願再兼師長，于是在林的堅持下，我不得已下令委任柏文蔚的師長職務。又有原第九鎮憲兵管帶陶駿保、第九鎮司令署中軍官鄭為成二人，都是林述慶的舊時長官，在十七協盲目進攻南京失敗後，都由南京退到鎮江。林把他們留在司令部，但他們久存野心，陰謀趁此紛亂期間奪取權利。陶駿保欲任鎮江軍政分府，活動當地紳商通電公舉，林未加置理。陶見所謀不成，又慫恿林改稱空無實權的江蘇都督。

我认为此时徐宝山迫在揚州，尚未就范，南京张勋未降，陈其美光复上海，功不在我軍之下，苏州尚有程德全，如邊尔改称江苏省都督，群雄不服，很难处理，不如占领南京后再議。林遂默然无語。

徐紹楨由上海到鎮组织司令部时，陶駿保又从中挑拨。林在福建讲武堂速成班时是徐的学生，经陶的阴谋离間，师生之間遂发生磨擦。林因鎮軍势力較优，又居功自傲，不願接受徐的指揮。我見此情形，頗为革命前途虑，乃力劝林与徐合作，林才回心轉意，同意出师西进，进攻南京，双方隔阂才得稍释。林这种行为深为各軍及各同志所不滿。后陶駿保也阴谋挑拨离間，貽誤戎机，在沪正法。

南京光复后，徐紹楨经各軍推为江宁都督，林述庆也同时改称为宁軍都督，与徐互不相下。后来联軍方面为調和林、徐間的关系，经會議决定推林为北伐軍临淮总司令。林被推总司令后，即赴浦鎮晤柏文蔚，商量就职和北伐的事宜，但毫无結果；又到揚州去晤徐宝山，徐也不加理会，只得回到鎮江与鎮江軍政使郑权商議，郑亦无所表示。至此，林才恍然大悟，对我痛哭，懊悔不已。我当时已將軍队让出，赤手空拳，也爱莫能助了。林不得已，只得宣布下野。柏文蔚趁此机会取消师长名义，改称軍长；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又自称为安徽都督。徐宝山也由师改軍，虎踞揚州。黎天才因援鄂有功，鎮守襄陽。朱瑞也回浙江任都督。鎮軍将士，除柏文蔚和徐宝山別树一帜外，其余都随林下野了。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徐紹楨被任卫戍总督。我被任为总督府监察处处长，負維持南京治安的責任。不久，南北議和告成，政府北迁，以黃兴为南京留守。袁世凱借口南京設有留守府，有碍統一为名，要求撤消。黃兴只得宣告下野，我亦同时去职。

癸丑之役，黃興就任江蘇討袁軍總司令，我被任為司令部主任參謀。當時贛、皖兩督已經動員，在南京的軍隊，首先加入討袁的有第八師陳之驥、第一師章梓、徐州第三師冷遹、鎮江第六師顧忠琛等。但是為時不到一月餘，我軍因互相牽制，軍心不固，情緒渙散，江西李烈鈞、安徽柏文蔚，一經交戰，都節節失利。津浦方面作戰的冷遹師、章梓師、陳之驥師都先後失敗。程德全乘機在蘇州通電反對討袁獨立。黃興見大勢已去，星夜離開南京，留我辦理結束。程德全立即下令捕我。我忙碌終夜，黎明出總司令部時，守衛的憲兵都已改旗換章。幸而官兵多是舊屬，對我尚未留難。我遂藏匿在同學方榮家中，旋設法混至下關，因火車已斷，只得乘德華輪亡命上海。

我因革命失敗後生活困難，曾赴杭州找浙江都督朱瑞。朱原是同學，又是南京光復時的戰友，彼此相助，往來本頗好，但是不料投名刺求見三次，都拒不接見。又往見舊友浙軍師長童保暄及警備司令徐樂堯，亦同樣被拒，我大為不解。當夜同學章祖衡來旅舍找我，告我說：“朱都督以你是革命黨人，不能容你留浙，請即日離去。”我才恍然大悟，這些人奪得權位，拋棄革命，變節之速，真是令人氣憤。

（許錫纘整理）

南京光复見聞瑣忆

馬 涯 民

一九〇九年，我从江西广丰回到家乡定海，遇到了我的表兄李哲濬。他是广东候补道，因熟悉洋务，原在两广总督张人骏幕中办理新政。这一年，张人骏调任两江总督，因要兴办南洋劝业会，便把他调到南京来筹办此事。他顺道回到定海，叫我同去南京在他公馆里帮忙。我就随他到了南京。

到南京后，李先叫我担任江宁官电报局兼电话局稽查，后来又帮助他办理南洋劝业会的事。等到劝业会闭幕，张人骏保举他做南京劝业道，他又叫我到劝业道署办事。南洋劝业会是在一九一〇年阴历四月间开幕的。据说同盟会原来定在这一年起义，后来因为劝业会开幕，各国外宾及各地华侨都要来参观，所以把起义推迟到一九一一年。此说不知是否确实，姑且志之，以供史家参考。

我在南京前后共住了三年，看到当时清朝一班官僚真是腐败到了极点。他们白天在公馆里赌博，晚上跑到秦淮河妓馆里或花船上去嫖妓。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两句话：“日日麻将窝，夜夜秦淮河。”那些候补官员把李宝嘉著的一部《官场现形记》当作做官的秘诀，夤缘贿赂，无所不至。大部分官员都吸鸦片烟，不过只是偷偷地在公馆里吸或者在妓馆里吸，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公开罢了。南京三牌楼一带本来是一片荒地，江北难民都在那里搭了草房子住。

有时涨了水，他们都浸在水里。官僚们对于这种情况，不闻不问。后来因为办南洋劝业会，要盖许多展览馆，那些草房子都被拆掉，难民只好另迁到荒僻的地方去了。

一九一一年阴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的时候，南京带领新军的是徐绍楨（固卿），住在南京城里；带领防军的是铁良，住在旗城内（明故宫）。铁良的八旗子弟兵除了每月领几两餉銀以外，平常只知道吃鴉片烟，坐茶坊，說大話，没有什么用处；实力全在新军和防军手里。张人駿晓得新军是靠不住的，就把徐绍楨的军队调到离南京城一百二十里的秣陵关去，只给每个士兵三顆子弹；同时把张勋的防军调到城内来。张勋住在城北的一枝园，司令部就设在那里。上海革命党方面曾派了许多人到南京来策动起义，已和新军联系，要他们在起义这一夜把新军调进南京城；铁良的旗营没有实力，想胁迫他离开南京；同时对于张勋的部队，则打算运动其开出南京城，回到长江北岸去，估计给他几十万軍餉就可以了。同时争取南京大官僚中思想比较新的人反正，预备推举张人駿做都督，藩司樊增祥（樊山）做民政长，李哲濬等也都担任职务。听说那些司道都答应了，就是张人駿不肯。他是进士出身，已经七十多岁了。他说：“我世代受清朝的厚恩，怎么可以反叛？”经过司道再三劝告，张人駿哭着说：“你们自己去选择吧，让我回到故乡去！”本来司道们定第二日在制台衙门会议，解决这个问题。张勋因有几十万軍餉可以进賬，也有允许之意，但后来听说袁世凱打电报给张勋，叫他固守南京，他就变卦了。

那天会议时，张人駿和一班司道都在座，已经议决推樊增祥做都督，突然张勋跑进来对张人駿说：“别的人可以背叛朝廷，你老师也可以背叛朝廷吗？”把桌子一拍就跑出去了。司道们知道张勋一

反臉，是決不可能和平解決的了，所以都紛紛散去。那時我在中正街王府園電話局里，接到李公館打給我的電話，叫我趕快到他的公館去。我到了那里，他們說：“革命的事情糟了，我們預備到下關去住，如果情形不對，就趁火車到上海，你可以同我們一道去。”我那時想看看情形究竟怎樣變化，便對他們說：“我又沒有家眷在南京，孑然一身，不愁走不脫的，打算看看情形再走。”李哲濬的一位幕友景學鈴（本白）對我說：“你不走也好，我的任務請你替我代辦。”他原來是替革命黨擔任通訊的，這時他把一本電報密碼交給我說：“你得到秘密消息，就打電話給上海《時事新報》汪彭年。你在電話局，我在電報局，可能得到秘密消息的。”我想也好，就把密碼本接過來了。

那時南京旗城裏的一般滿族人，都很恐慌。傳說革命軍一到，就要把滿族人殺盡，以報清兵入關時屠殺漢人之仇。滿族人天天全家哭泣，尤其是婦女，因為既沒有纏足，服裝又和漢人不同，更加發愁，紛紛向估衣鋪購買漢人婦女衣服，打扮成漢人，還硬給十歲左右的女孩子纏足。男子也都改名換姓，充作漢人。

我從李公館回到電話局以後，心想，報告秘密消息，一經洩漏是有生命危險的，便叫當差去找到了一處可以藏身的地方。這地方很好，是大房子里面的一間密室，進去要經過十幾道門戶，原來這是男女幽會之廳，叫做台基場。那時風聲很緊，已沒有人去幽會了，所以房租很便宜，每月不過三元錢，房子陳設和眠床都很華麗。我把一部分重要行李擺在里面，有時候夜里也住在那里。那天司道會議開不成，我沒有把這個情形告訴革命黨。

陰曆九月十八夜里，革命黨突然起義了。有人帶領著一批預先召集來的人，各發給一支手槍，叫他們衝到模范監獄去。在三更

时分，我在电话总机间听到警察向警察局里报告各处起火，警察局总监随即报告给张勋。张勋回答说：“随他去，不要去理他！”不久，模范监狱被革命党攻开了，把里面几百个犯人都放了出来，发给武器，叫他们一道参加起义。革命党冲到一校园张勋司令部附近时，马路两旁突然射出密集的枪弹，把起义的人和犯人都打死了。张勋派出防军把守南京十三道城门，又将储藏在生产局里的枪炮子弹都拨给守城的防军。这些都是我在电话局里听到的。

到了第二天，张勋派了大刀队去搜捕革命党，杀了许多臂缠白布的革命党人，自然也杀了一些老百姓。直到那天晚上，徐绍楨才带领部队开到南京城南雨花台下。张勋防军从城楼上向他们开炮。新军每人只有三颗子弹，子弹放完都溃散了。张勋部队继续任意施放大炮，打毁了許多建筑物。等到半夜后，枪炮声才停止。王府园电话局靠近城南，所以听得很清楚。后来听说原来约定在阴历九月十九日夜里起义，后来临时决定提前一天，在十八日夜里起义，可是徐绍楨并不知道这个变更，到十九日夜里才把部队开到，所以失败了。徐绍楨遭到这次失败，就跑到上海去联合苏、沪、浙的革命军部队来攻打南京。

那时南京城里所有衙门、机关、学校、商店，都已关了门，除了留下几个人看守房屋以外，其余都跑了。大官僚从张人骏、樊增祥以下也都逃跑了。有钱的居民纷纷到上海去避难。电报早已不通，只有我们电话局还照常工作。职员除我以外，只有一个电话领班生，其余都是接线生和工人。这时接线生和工人也不肯放我走了，因为我们电话局本来是藩司管的，要由职员去接洽，方才领得到经费材料；如果我一走，他们连饭都没有吃的了。

过了几天，张勋派了一个军官到电话局里来，问还有几个办事

的人。我說：“就是我一個人，其餘都是接綫生和工人。”這個軍官說：“你們電話局辦得很好，人家都停頓了，你們照常辦事，會辦（指張勛）叫我帶了幾十元錢來賞給你們的接綫生和工人，會辦還叫你們派一個職員去，有一件很緊要的事情同你們商量。”我說：“這個時候，我怎樣到那裏去呢？”他說：“你不要怕，你同我一道坐馬車去。”他給我一面三角形的黃旗，上面寫着“江防營會辦令”字樣，叫我插在馬車上。我心中很恐慌，但是沒有法子，只好跟他一道去。到了一枝園，馬車一直進入司令部裏面。那位軍官帶我到會客室裏，沒多久，張勛派人同我接洽。他說：“軍事要保守秘密，會辦計劃在北極閣裝電話總機，和十三個城門直接通話，以免洩漏消息。”我說：“這時到什麼地方去領經費呢？”他說：“將軍（指鐵良）已答應給三千元錢，這就差不多了。”我強調材料不夠，他叫我到關着的各個衙門、商店裏去借用。我又強調工人不夠。他說，南京城裏有的是閑着的工人，叫我趕快進行。我只好答應了。

回來的路上，我想：在南京已經不能得到秘密消息了，況且長住在這裏，恐怕會有生命危險。那時藩司樊增祥已經逃跑。張勛請來了住在南京城裏的提學使李瑞清（字梅菴，號清道人）代理藩司。李梅菴是有名的“菩薩”，是一個好好先生，我認為可以和他去商量，把這項工程另交別人去辦，這樣我就可以跑走了。於是我去見李梅菴說明我痢疾初愈，老母親又很記挂我，所以想回到家鄉去，請他另委別人擔任這次工程。他說：“現在南京城裏，窮候補官員是很多的，你一定要去，我可以派人代理。”當時他就派一姓朱的人去接這件事。後來聽說此人不但在這項工程上賺了很多錢，並且還做了張勛開辦的造幣廠廠長和南京城裏的小鐵路總辦，發了大財。

第二天中午，我就帶了些錢出城去了。因為到了下關去乘火車，要通過儀鳳門。這時張勳限定十點鐘到十二點開放城門，運送柴草菜蔬，趁此機會才可以出入。沿路我看見許多防軍站崗，逃難的人很多，個個要被搜查，有時還要遭到槍柄敲打。有幾個外國人却在旁邊觀看，看到張勳部隊所背的步槍，都搖搖頭。那時下關有一處我們的電話分局，我出城後就在分局宿了一夜。次日跑到龍潭去乘滬寧火車，因為那時火車只開到龍潭，不到下關了。到了上海，我即去時事新報館把南京的詳細情況告訴汪彭年，第二天《時事新報》上就登載了這方面的部分消息。

過了一個星期，我同《天鐸報》經理沈椿年（任夫）回到南京。我是去取行李和辦交卸的。那時，江浙聯軍已經攻克南京城，我們在下關下火車後，住在大觀樓旅館。當時下關很熱鬧，進進出出都是軍人。他們手臂上纏了白布，寫着“××司令”、“××參謀”、“××師××連”等字樣。大觀樓旅館里有很多官員在賭博。我在大觀樓旅館住了一夜，第二天搭小火車到電話局去。車上有許多軍人，很是擁擠。車行駛不多久，有一軍人在路旁舉手招呼停車，便讓他上了車。鐵路兩旁有許多士兵在開槍射擊路燈電泡。車開到制台衙門口時，有部隊在那裡開槍互射，聽說一邊是江蘇都督程德全的部隊，一邊是黃興的部隊。沿路還看到許多尸首攤在地上，也有已經用白木棺材裝起來的。由於不斷有部隊中途搭車，所以從早上八點鐘動身，一直到下午四點鐘才到王府園。

我進了電話局，看到接線生和工人大多數是舊人，職員倒都是新人。每一種職務都有三副人馬，這是因為江蘇、上海、浙江各個方面都派了自己的人。情況這樣混亂，我也無從辦交代。接線生還告訴我：“你走後，張勳的偵探隊長米占元帶了武裝人員到電話

局来搜查，你住的房間連地板都撬起来了！”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上海《时事新报》登了些南京的消息，他们就怀疑到我身上来了。幸亏我在几天前跑了，总算逃出了一条性命。

（毛翼虎纪录）

鎮江光復回憶

吳次藩

鎮江扼南北冲要，東南有事，為兵家所必爭。清末，所駐軍隊甚為複雜，并有京口駐防旗兵二三千人。辛亥九月，鎮江竟能兵未血刃，乜豎不驚，先在南京前一個月光復，這不能不歸功于李竟成等革命志士的奔走發動。茲根據筆者多年老友、當年參與其事的張芷津先生的面談和李竟成的親筆日記，將當時大概情況分別溯述如下。

一 李竟成來鎮江之初步活動

李竟成，鎮江東鄉人，曾任第九鎮三十三標排長，繼又畢業于南洋陸軍講武堂戰術科，又曾與趙伯先同參加三月二十九廣州之役。伯先嘔血死，竟成誓完成其志，五月由香港回滬，又與陳其美、章木良（梓）、洪承點等同圖蘇浙。迨武漢首義，滬上黨人分別派人到南京、鎮江謀響應，竟成遂擔任鎮江方面事宜。九月初，竟成來鎮，過無錫時，訪趙云芝、許春培商量，招集了退伍士兵四十餘人。因人眾口雜，為商會聞知，告密縣署。竟成幸得信逸免，并設法將所招集諸人運滬，安置于長發棧內，由趙光統轄。趙光為伯先三弟，二弟曰念伯，時皆在滬與諸黨人活動革命。竟成到鎮，住江邊三益客棧，棧主王三麻子名子南，亦鎮江東鄉人，與竟成同里而兼

烟姪，亦有志于革命。因即以三益棧为总机关，分設通訊处于洋浮桥下万益楼客棧，設联络处于万家巷火星庙陆軍警察队分駐所，续有自沪来的同志即駐万益楼。赵光来鎮則匿住分駐所的另一空院中。所长即张芷津老先生，今年正八十岁，本文部分材料即根据张老先生的口述。

二 分別策动各部队的情况

地点安排既定，竟成即着手向駐鎮軍队策动。时駐鎮軍队新旧非一，頗为复杂：(一)有新軍第九鎮三十五、六两标，駐南門外标营，两标属第十八协。新軍多数受革命思想影响，得武昌信息后，情緒格外高涨。协統为杜淮川，标統为敖正邦，第一营管带为明羽林，第二营管带为章祖衡，第三营管带为林述庆。正邦不常在鎮，淮川知軍心趋向，但惧危及己身，不敢抑制，亦不敢倡导，依违两可，意存观望，后乃托病赴宁，未曾回鎮。祖衡、述庆夙倾向革命，述庆尤为激昂，且得軍心。竟成了解个中情况后，即自行出面与祖衡、述庆晤談，一拍而合，与述庆尤为契合。明羽林性迂，有呆子之称，因夙与张芷津接近，即由芷津密說。明初犹詫异，芷津告以群謀已定，遂恍然归附，并由芷津介紹与竟成洽談。(二)有水师营一营，分駐江边及对江六七壕口，营部設在鎮江新河街。管带为徐宝山，即綽号徐老虎者，亦鎮江人，由帮而匪而梟，嗣经招安授职，所部多亡命之徒，泼悍异常。竟成遣三益棧棧主王子南、万益楼棧主温瑞芬說徐，因为他們均帮里弟兄，进言容易。当晚徐即到三益棧与竟成面談成約，所提条件为成功后准許率領所部开駐揚州，以盐款为餉源，竟成允之。(三)有巡防营一营，系原来老湘軍，駐象山附近，保护焦山、象山炮台，管带为湘人张振发，与黄克强先生有关

系，故一經策動，即行來歸。(四)有九月中旬才由南京開來的巡防營二營，即張勳所部之江防營，來鎮保護鐵路者，駐西門外琴園。竟成初慮此部分生疏，恐策動困難。嗣經調查，中有哨官鄂人劉擇英，曾在貴州充標統袁又保部下級官，又保鎮江人，其兩弟耀楣和左良(象保)時正贊助竟成所進行的革命事業。竟成即請兩昆仲與擇英晤叙，擇英大悅。兩昆仲又進一步勸之反正，擇英許諾，以說服兩營自任，並親至三益棧與竟成面約，如革命黨與旗營開火，渠先佯守中立，後當助擊旗營。(五)有陸軍警察隊兩隊，分駐城內城隍廟之紅梅閣與城外萬家巷之火星廟，雖司令官為旗人桂馨，但已被調往秣陵關，留鎮部分張芷津即能左右，不成問題，毋庸策動。(六)有最舊式、最腐敗的綠營官兵，原系七百餘名，經過一再裁撤，僅存二百名零，又散駐各地，對舉事的成敗都不起什麼作用，無須策動，可聽其自然。(七)還有焦山、象山、都天廟、甌山關各要塞炮台方面，竟成囑高騫、唐桂生到象山說王以忠轉向各要塞炮台官兵招降。後高騫至焦山占領炮台，而象山炮台官顧斌尙事倔強，竟成約其部下生縛之，後亦釋放。又由張佩芝、虞蔚如承竟成命，至十二圩說虎威兵輪將領。所有以上部門和單位都一一策動就緒。(八)最後就談到人數較多、問題較大的京口駐防旗營怎樣解決了。京口駐防設自清初，旨在鎮壓漢人，兵額約三千名，分左右兩翼，步騎炮俱備，屯扎城內高橋、斜橋以南，東達大市口，謂之旗營。都是強圈居民房地，至今尙有紅旗口之稱。官則設有將軍、都統統率之，各設一大衙門于旗營中間，今市委會和市人委會即將軍衙門，稍前而又偏東，解放前為反動政府江蘇財政廳所在地，即都統衙門。將軍駐江寧時多(那里也有駐防旗營)，都統則常駐鎮江。在這裡要特別說明的，鎮江駐防的旗人，全屬蒙族，並無滿族，但都統有時由

滿族充任。彼时都統为載穆，滿洲鎮藍旗宗室，剛由山西調任來鎮未久。武昌起義后，載穆即大事戒備，葺繕城垣，令馬步兵防守要隘，添設辦理軍務機關於署中，羅致旗人有聲望者為軍事助手。知標營新兵不穩，架大炮于南城，直對標營，以示威吓。偵知三益棧、火星廟為黨人常聚地，欲從事搜查，又有顧慮，不果。時知鎮江府事承璋、知丹徒縣事文煥，均旗人，曾邀陸軍警察隊所長張芷津談話，漫言：“你們世代書香，庠序科第，受過朝廷厚恩，要思報答，勿為邪說所誘惑。”威吓后继以哄騙，軟硬兼施。他知道大局已非，朝夕難保，所部旗兵，不堪一戰，所以不敢過走極端。但一般市民不知底細，見到城頭架炮，怕戰禍將至，紛紛搬運箱籠，以謀迂避。載穆束手無策，竟成燭其隱微，與述慶等商議，一面作軍事布置，加重威脅，一面仍採取攻心之策，進行說降，并派兵分駐諫壁、丹徒、竹林寺、高資、下蜀等地，對城區旗營形成了包圍形勢，南京方面倘有開來援助旗營的隊伍，兼可資以防堵。攻心之策是倩紳商學界吳淇、楊邦彥、趙小圃、于鼎沅等往說載穆和常鎮道林景賢，曉以利害，并向蒙族紳學界進行說服。所有旗營內協領、助領等職一類人員皆為所動，環請載穆以旗人生命財產為重。載穆迫于內外壓力，知道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亦不允許觀望，乃答應繳械。

三 比預定日期提早一日光復之情況

九月十六日上午，議事會議長楊邦彥、董事會總董吳兆恩、商會業董于鼎沅等在自治公所召開特別大會，文官自道府以下，武官自參將城守以下皆至，載穆亦率旗營僚佐二十餘人到會。先是蘇州都督程德全有傳檄到鎮勸反正，會場官紳協議，一致主張附和程的檄文舉義，免受戰禍。載穆亦無異詞，惟以旗民安全為請。楊邦彥

慨然以項上头作保证，載穆亦再申繳械之約。是晚，竟成与述庆、祖衡商定于十八日正式宣布光复，即晚运过山炮到京岷山，一面防南京未下之故，一面对旗营示威。更令邦彥等持照会往胁載穆早践繳械之約，如再观望，即炮击旗营。入夜，旗兵始一齐納械，計步槍数千枝，炮数十門，馬数百匹，其余弹药杂械若干。翌晨为十七日，竟成、述庆率兵入城点收，人心大安，喜見顏色，一律悬挂白旗欢迎，高呼光复万岁。原道府以下旧官員已潜逃无踪，載穆繳械手续完毕后，亦于夜間自经于都統署而死。因为十七这一天是真正光复，十八日就毋庸再行正式宣布之必要，所以竟成說比預定日期还提早一日。

四 都督府成立后各部負責之人选

都督一职早由新軍公举林述庆担任，入城后述庆即正式視事，以常鎮道署为都督府。李竟成任都督府參謀长，楊邦彥任民政部长。不到二十日，以軍府初立，軍务特繁，另立軍务部，竟成改任軍务部长，述庆另邀在沪之陶璞青为參謀长。璞青名駿保，亦鎮江人，曾任第九鎮馬标标統兼宪兵司令，在先曾任福建武备学堂教員，述庆为該堂毕业生，与璞青有师生淵源。

五 旗营繳械后发生的事故

九月十八日，南京第九鎮士兵攻雨花台敗退，麇集鎮江，初不知鎮軍有保护旗人之約，有少数人闖入旗营，戕杀旗民泄憤。得林都督严令禁止，幸未激生事端。載穆死后，旗人中不免有哀念而迁怒于新都督者，九月二十一日突有人擲炸弹于都督府前。述庆怒欲炮毀旗营，竟成以所伤实多，力止之。因率兵围旗营，命邦彥入

告，限令翌日午前一律迁居城外，毋得逗留。旗众不敢不遵，以后旗汉界限渐化，相处亦渐安谧。有署名三江游客所撰《三江笔记》，谓镇江光复略有战事，殊非事实，所云或即此两事之误传。

六 鎮軍都督及軍政分府之撤銷

鎮江光复后，张勋尚負隅南京，苏、沪、鎮、浙合組联军会攻，鎮軍由林都督亲率前往。入南京后，林都督自改称临时宁軍都督，旋又通电以一省不可有三都督，自行将临时宁軍都督和鎮軍都督名义一并撤銷，推程德全为江苏全省都督。程都督就职后，即将鎮軍都督府撤銷，改組为軍政分府，派郑权来充軍政使。未几軍政使和軍政分府一并撤銷，民政长一职亦由省委张鹏来代楊邦彦，地方轉入正常状态。

七 所有光复时的各部队之改編

南京下后，鎮軍各标营由述庆所擢前三十五标排长、现任标統之臧在新(字与威，阜宁人，后因反对洪宪被害死)率之北伐。沿运河而上，駐清江时，名称仍号鎮軍。达徐州后，隶属冷遯之第三师。水师营由徐宝山带往揚州，后自行扩充成两师。留鎮江者尚有老湘軍、江防营、陸軍警察队及光复后十一月間赵念伯由沪率来之北伐前进队。程都督統握全省軍权后，改編原駐鎮各軍队为陸軍第十六师，派顾忠琛为师长，李竟成为参謀长。改編沪軍北伐队为三十一旅，赵念伯为旅长。老湘軍扩編为三十二旅，以张振发为旅长。江防营刘澤英之一哨則扩編为輜重营，澤英任营长，均隶第十六师。陸軍警察队在軍政分府时期，已改为宪兵司令部，张芷津任司令，后又編为宪兵营。

光复浦口之战

陆小波

一九一一年九月十八日鎮江光复，林述庆为鎮軍都督，李竟成为鎮軍都督府参謀长。时张勋盘据南京，南京陆军管带孙彪密降于徐宝山，宝山等軍攻南京，为勋败于雨花台。秣陵关新軍潰，述庆、竟成联电苏、浙乞援。十月五日，苏、浙、鎮联軍在鎮江議攻南京。先是林述庆就都督后，任陶駿保（字璞青，鎮江人）为参謀长，別立軍务部，竟成为軍务部长。

时新軍第九鎮由南京败退鎮江，述庆、駿保乃招柏文蔚来鎮为統制，收容潰軍。至是，組織联軍再攻南京，举前第九鎮統制徐紹楨（字固卿，广东人）为联軍总司令，駿保兼任参謀长，遂率鎮軍合浙、沪諸軍会师前进，助軍不支北退。十月十二日联軍直入南京，首入南京太平門进驻总督署者，乃鎮軍也。述庆为临时都督，駿保劝其自解都督名义，而迎程德全为江苏都督，述庆从之。德全于十六日到宁，駿保乃通电主张一省不可有三都督。时陈其美为上海都督，以此遭其忌。駿保于二月十二日往沪，为其美所杀。

当述庆将出兵攻南京时，竟成与述庆謀，以浦口位南京之北，必急下之，以絕助后路，搖动其軍心。故述庆攻宁而竟成乃攻浦口，調鎮江統領张振发巡防营步兵一千五百人及揚州徐宝山部步兵八百人，舢板十七艘（共二百人），新軍一标，炮四門；瓜州統領赵春霖部

步兵一队，炮五門，舢板十艘（共五百人）；十二圩管带詹丙炎部步兵两队及揚州敢死队队官董开基部步兵一队，炮一門，号曰鎮軍江北支队。十月六日，竟成和參謀郭叔完等赴揚。七日夜半，率揚州敢死队百人乘招商局輪船启行，并合各軍于八日晨到六合南門外龙津桥东端。六合无守兵，竟成率軍登岸，命參謀曹翼率巡防步兵第二营进驻龙池为前哨，設司令部于南門外曹家油坊。当时偵知助軍在浦口鎮約步兵四千人、炮二十門，葛塘集时有 助軍 騎兵出沒；猪头山、馮家窑、馮家墙根等处有助哨。又据諜报，浦口助軍約四五营，在各高地及城头設山炮四五門。又云，助軍距革軍約二十余里，助軍时派騎兵四出搜索。九日晨八时，竟成拟进攻浦口，以巡防步兵第二营为前卫，经葛塘集向浦口前进，揚州新軍步兵第一营及赵春霖部步兵五百并敢死队一队、山炮二門为左側卫，经水家湾、謝家甸向梅貴营前进；巡防步兵第四营及徐宝山部步兵五百、山炮四門为本队，距前卫五百公尺续进。下午五时，前卫抵高家洼为前哨；左側卫在姜家桥，其前哨在梅貴营；司令部进驻王家油坊，距助軍甚近。十日晨九时，參謀华彦云率巡防步兵第五营为前卫，经盘城集、高垣墙、陆家洼；宝山率步兵五百人、山炮四門由高家洼经姑嫂塘、高垣塘、馮家墙根；春霖率左側卫与宝山軍相联络，三路并向浦口，为分进合击之势。以巡防步兵第四营为本队，依次前进。午后一时，前卫达高垣墙、陆家洼附近；左側卫至高埂头。时助軍在浦口一带防御，沟垒深固，馮家洼、宝塔山、猪头山、鶴家山等处均設有炮兵陣地。竟成与郭叔完、华彦云登龙山庙山巔偵察，会助軍遣人来議和，故未进击。晡时，助軍右翼宝塔山、泰山庙一带突炮击革軍。竟成亦令龙王山、高埂头炮兵 还击之，命前卫占 龙王山，巡防四营由龙王山西端向陆家洼、馮家窑进击，与左側部队取

联络，命徐宝山部步兵五百人由姑嫂塘、高埂头攻浦口，右翼自赵家山咀起，左翼在泰山庙南方止，左右翼设白旗，各令兵士二、三人放枪作势，全军兵力集于中央。当时两军射击极烈，惟助军放炮不准，弹多飞越，而开花者尤少。至夜十时后停战，据报助军死官长六人、士兵二百余人，伤八十余人。革军死二十余人，伤五十余人。

十一日夜半，天雨，赵春霖所率之新军一标退六合；巡防营亦因饥寒难忍，退盘城集。赵春霖急纠集溃兵，重整队伍。竟成急令巡防营集合待命。十二日实行拂晓攻击，相距三百公尺，助军力尚厚，逆袭革军，革军暂退赵家山咀。助军又由宁增兵千余人，围困宝山所部。竟成令各部奋勇死战，适柏文蔚率队会攻浦口，遣步兵一营、机关炮二门由赵家洼来援，革军形势转振，反击助军，至下午六时助军退。是役董开基阵亡，士兵死五十余人。助军死伤甚多，不支北退，留周、李二统领及营务处甘某等率兵殿其后，阳从浦神郭瑜、陆莹、夏季凡、金琴夫及江防军司粮官高心田、稽查官袁省吾等议和之请，而阴实为退兵之计。傍晚叔完甫与瑜等接谈，而助军欲退之形迹更露。革军乘机猛击，助军溃退。

十二日，和议未决，助军仍守浦口，柏文蔚部集结在葛集塘、盘成集一带整理，稍事休息。竟成与宝山谋以其所部为先锋，骤袭助军。助军出不意，仓皇溃逃，死数十人，竟成乘胜入浦口。助军或散四乡，或乘火车北逃。先锋官李桂生等乘马追至火车站，截获银三十三箱，又衣箱数十只。司令部驻提督署，宝山率各营分驻助军老营。巡防营全军陆续到浦口，分布驻扎。十二日出示安民，亦即苏浙镇联军进入南京之日。

溧阳光复記

姜丹书遺稿

一九一一年，我二十七岁，在杭州的浙江兩級师范学堂当教习（教师）。阴历九月間，校中以拥护革命关系暫行停課，組織学生軍在校訓練，我所教的是艺术課，不涉軍事，因而回到家乡溧阳休息。

約近九月二十边，沪、苏、杭相繼光复。溧阳是江苏省的苏屬，苏州省城既光复，溧阳在其旗帜之下自然亦光复了。此时的溧阳县知县是个性恩的旗人，本来是革命的对象，但他頗识相，先机而遁了，遂不成什么问题。

我以从溧至杭一路既皆光复，交通无阻，乃抽身返校省視，遂剪辮子，換戴新式的銅盆帽（用板綾制）而归。

但是，此时溧阳的西北邻如高淳、溧水、句容等县是江苏省的宁屬，因南京方面尚由两江总督张人駿及江南提督张勳很頑固地据守着，所以宁屬各县尚未光复，在形势上是与已光复的溧阳处于相反的地位。

我家在溧阳西乡南渡鎮，与西面的邻境較近。我虽不是革命党，也沒有革命的勇气和才干，但因受了新的教育，头脑較新，且有一股少年銳气，当然站在革命一边，于是在南渡地方发起組織民团，邀集了少年朋友如朱廷鰲、蒋汉清、黃鏡淵、蒋兆福、馬道心以及紳商宋紹先（区董）、戴丽堂（商会）等共同商議。自己和同人捐了

一些錢，并由同人向当地的厘捐局(俗称卡子上，此时原来的司事已逃去)截收了一些貨船通过稅，备办了一批干粮(烧餅、馒头等)。于是号召了各村庄的农民壮丁数百人，在周围十里二十里內放哨，等于現在的武装游行示威。大家所执的武器都是农具，如鋤头、铁耙、犴叉、魚叉、挖鍬、閘刀、扁担、杠子等等，勇气百倍。我自己捐了一把大鋤刀，抄前赶后，参插在队伍內。队伍約有二、三里路长，声势浩大，虽尙不知像現在的高呼口号，而喧嚷声浪，已足震动一方。其目的原在表示革命的民气，使发揚传播，远达边界邻境，小則可以鎮懾盜賊，大則可以树立风声。并訂公約，各村各自守夜，如或遇警，則敲鑼为号，群起声援。如此防卫了多日，卒得平安无事。

同时，城市方面，亦有許多积极分子如史贇夫、彭胜之、狄怀人、张书紳、方伯超、沈叔遼等，组织了临时报社，油印刊物，广泛散发，以灵通消息，唤起群策群力，鼓动一般人民的革命精神，影响亦頗大。

原来的旧政权，溧阳本有七堂官，除知县是正官正印外，还有佐治官員县丞(粮厅，俗称二衙)、典史(捕厅，俗称四衙)、教諭(儒学，教官，俗称老师)、訓导(儒学，教官，俗称副老师)、都司(都閩府，武官，俗称大营)、千总(武官，俗称小营)等，此时皆属于被革命地位，他們的职位自然消灭。这样，在此过渡时期，等于无政府状态，虽以地方热心人士維持有方，然究不可以曠日持久。于是十月某日，由全县十六区董召集地方會議于城內明倫堂，筹商如何組織新政权——县政府問題。出席者除十六区董外，有若干父老，若干青年，大家发表言論，提出主张，我在席上亦讲了話。

此會議上有两派主张：一派是主张向苏州都督府(都督是程德全，他是原任江苏巡撫反正的)請派一个好的人員来为县长，而佐治人員則由地方公举出来。另一派是主张公举本地人士为县长，同

时公举本地若干人士为佐治人员。当时只是广泛讨论，并未作出什么具体的决议。

我记得此时有一个过去曾任溧阳县知县而官声较好的张文瀚（四川人）坐在旁听座的来宾席上，他当然不发一言，亦无发言的资格。这大概是有人先从苏州请他来观察情况，作为预备的。至于拟推本地人谁某为县长，我却未曾听到过。后闻在此会议上亦有激烈分子暗怀手枪，不知将作何用，幸而并未发生什么争论，故得平安过去。等到会散，我就走了，而且归南渡家里去了。

翌日乃知就在此日晚上，由十六区区董公同议决：向苏州都督府请派张文瀚为溧阳县民政长（即县长的新名称），同时投票公举出本地人士五人为佐治员，其名单如下：王嘉曾（字晴轩，秀才，两江优级师范速成科毕业，曾为两江总督府幕僚）为第一课课长，管总务；陈公度（字少璜，廩贡生，曾在直隶省为知县）为第二课课长，管主计（财政）；姜丹书（字敬庐，两江优级师范选科毕业，学部考授师范科举人，当时任浙江两级师范教习）为第三课课长，管学务；史悠颺（字小山，廩贡生）为第四课课长，管实业；葛怀文（字琴轩，廩贡生）为第五课课长，管警务；均由民政长加发委任状。各课各设课员数人，各自开展业务。这样，就算组成了新的县政府，执行新政权。

此次的选举，是最初的民主作法和作风，较为公正，大家都保持谦逊廉洁，尚未开后来运动钻营甚至贿赂的弊风，所以这个名单发表，一致悦服。

但我记得张文瀚自己并未实行到职（即来亦不过几天，已记不清），只派来一个秘书某，亦只住几天就去了，说是他们不来了。

接着，由省委派原来的县丞刘舜先（浙江绍兴人）接任了民政

长。因他在溧阳任职有年，地方对他感情尚好。

这个新的县政府，与过去的县衙門不同，过去的县衙門是十足的封建堡垒，除特殊阶级以外，不能轻易出入。此时的县政府，则与本地人民声气相通，确有一股民主新气息，这就表现了革命以后的社会精神面貌有所改变。

民国元年阳历年初，省里派来二个法官，一个是罗蓬瀛（靖江人），为初级审判厅厅长；另一个是商某（忘其名，亦靖江人），为初级检验厅厅长；在县政府西面创设了厅署，各自办理民、刑案件，这就算是司法独立的新设施。

到了阳历三月底，浙江两级师范学校重行开学，我被召回杭州复课，乃辞去了学务课课长职，由宋葆麒（字羲樵，本是廪生）接任。

后来政制改变，民政长改称县知事。初级司法机关裁撤，在县知事名义和职权下，设置了承审员，承办民、刑两案。承审员对外不独立，而对县知事负责，此称承审制。

民国二年夏，刘舜先染疫暴卒，由省派应祖锡（字翰卿，浙江永康人，进士）接任县知事。

民国三年上半年，王嘉曾考取了县知事资格，分发到浙省候补。

民国元年暑期，溧阳初办选举，我休假由杭回里，在南渡地方帮同调查选民资格，大家颇认真。秋季开学，我返杭任教。后闻下半年实行初选时，办理不善，在投票时弊竇丛生，不成样子，大家失望（他处情况亦多不善）。是年冬，我举家迁杭，长期离开了本乡，一切情况从此隔膜了。

现在我已七十七岁，一直在外为教师五十余年，最后于一九五八年秋，以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名义退休归杭。今追写此文，已隔了半个世纪，虽记忆犹新，却觉惆怅！

吳江光復前後回憶

費 璞 安

辛亥革命前夕，我在南通教書。武昌起義不久，我從南通到上海，遇見史量才（當時名良才，在辦報），他約我參加籌備行將在滬舉行的全國農務聯合大會。他說：“這是張四先生（即張季直）主持的，通知已經發出，不久要在上海開會，你可以留在上海，幫助工作。”我當即答應，南通教務請費邁樞暫代。

全國農務聯合會是南通張季直發起，推清室皇族某某為會長，張任副會長。張季直在當時被稱為實業家，南通的垦殖業和紗廠是他首創的。他進而發起全國農務聯合會，自然是想宣傳和實現他的所謂實業計劃。他的得力助手是史量才，籌備工作大半出自量才之手，留我在滬大概也由史與張季直商量決定的。但適當時武昌起義，會務因而停頓。我與同事田北湖、鄭允恭和徐某四人閑居在會，無所事事，遂發起組織紅十字會。

為什麼我們想到發起組織紅十字會呢？這是由於辛亥革命炮聲一響，我們聞風而起，想集體赴漢，參加革命，無如上海尚未光復，革命運動還在秘密中進行，於是便想到組織紅十字會開赴前綫。當即由田寫簡章，我任宣傳，徐某略有醫學經驗，擔任招致醫師工作，鄭則駐會料理總務。我以簡章廣告持往各報館登載，先至大陸報，主事朱少屏和我素有交往，他說：“太遲了”，即以張竹君女

士所登的同样广告見示。我促其必登，他亦允办。翌日张竹君开会时，我們亦去列席。她开口即宣布紅十字会是女子应任之責，男子一概拒絕。我們不得不退席，正悵悵中，有不相识之某君亦在廊下低首徘徊，我即与之商談，知道他是汪裕泰茶庄老板，名汪惕予。我們商量之后，即写一紅箋揭示廊下，說凡男子有志組織紅十字会者請即晚到泥城桥汪裕泰茶庄楼上开会。届时到者甚众，座为之滿。當場发言者以四川人某某最激烈，建議組成之后首先入川，并慨捐开办費二千元。继由汪惕予发言，除将楼面拨供会用外，捐洋一千元。我是穷汉，亦竭力写捐五十元。散会后即书就“中国紅十字会筹备处”白紙紅字的招牌张于汪裕泰茶庄門外。次早报名者云集，至午已有五百余名之众。于是筹議集款，招集医士和制备担架、药品等等事宜。集款非仗募捐不可。但当时在公共租界募捐，事属創举，須取得捕房批准。经向捕房申請，得准举办后，遂編募捐队，以五人为一队，肩背竹筒，貼上“紅十字会”签条，五百余人一齐出发。一日之間捐得数万元（确数已計不清了），足够制备一切用具。适有留日医师一批聞风归国，皆願参加。至此一切筹备齐全，候船出发。

紅十字会队员众多，要去武汉，非自办輪船不可。斯时适有湖南陆純伯者有輪可供使用，我們随即决定定期开拔赴汉。但届时上海已宣布光复，成立都督府，我們的紅十字会即受都督陈其美之命暫留沪服务，听候派遣（张竹君队已先到汉）。

上海光复后二日，忽聞杭州方面清軍要来反攻，都督府命令我們准备出发前线。我們即整队进駐西門外制造局，沿途民众拍手欢呼，并备有饅头面食逐段供应。

两天后，奉令出发苏州和鎮江，作光复該两城之准备。命令于

农历九月十五日(即公历十一月五日)午后一时下达。我們即組織兩隊，每隊五十人，分赴蘇、鎮。我領導蘇州隊，奉命後即去火車站商開專車。站上英人濮愛德告我說：“蘇州已經光復，可以不必再去。”我們以既奉有命令，自仍應前往，遂於午夜一時率隊攜帶担架、藥品等等登車，黎明時開抵蘇站。斯時城垣上白旗招展，旭日照耀。我隊下車，駐紮閶門外留園，高懸紅十字旗，民眾環觀，拍手歡迎。一日後我們接受盛杏蓀之請(盛想借紅十字會旗幟以保其安全)，分駐一部分隊員於閶門馬路邊的盛氏華步別墅(事後這別墅即撥作設立苦兒院之用)。

蘇州是和平光復的，我們的隊伍無事可做。我在留園涵碧山房前的小樓上宿了三夜，思潮起伏，安定不下。我隨即盪返吳江，作光復吳江的準備。

下面略談吳江光復的經過。

我原來是吳江縣議會議長，我在蘇州既無事可作，遂決然離蘇回到吳江，以縣議會名義召開民眾大會，商議預備光復之事。當時吳江縣、震澤縣兩知縣和武職都司、吳江的知名人士和不少民眾均到會，一致表示贊成光復。散會後，我即趕赴蘇州都督府商定光復吳江日期。農曆九月二十五日(即公历十一月十五日，後蘇州光復十天)，由蘇都督府派光復軍(亦稱革命軍)五十人成一小队，荷槍實彈，沿塘步行到江。我在城隍廟召開民眾大會，宣布光復吳江，迎接光復軍。開會儀式十分隆重，光復軍列隊庭中，號鼓齊鳴，排槍並發，高升白旗，民眾歡呼。吳江、震澤兩知縣各持官印箱，恭恭敬敬放置在主座桌上，站立兩旁。我以縣議會議長名義就主席位，正式宣布光復，並說明今後政權改為民主，議會是人民的代表，一切政事取決於人民，我們要一致擁護共和，等等，並舉行了宣誓儀

式。我随即将两官印箱启开，交众看明，交光复軍司令吳嘉祿执行銷毀。吳司令即拔佩刀，当众截去两印印角，呈繳苏督府备案。最后公推新政府的組織人員，推定原吳江县知县丁若怀为民政长，震澤知县某某(已忘其名)为司法长，其它各科主任人員亦经推定。財政科主任拟推沈临庄担任，而沈却未到会，经派人一再催促始到，到后亦不表示意見，以致引起众怒。我亲自下台，晓以大义，他才觉悟，向众表示就职。沈是吳江大地主，经济盈实，民众要他任財政，原是希望在財政上他能有所帮助，后来实际上他并无絲毫捐助。

事后，光复軍要回苏督府，城防空虛，非补充武装力量不可，于是决定购置枪械。仍由我赴沪向制造局购置，共新式步枪十二枝，子弹皮件均全，装四大箱。当时沪宁火車未通，必須由沪杭路运至嘉兴站下车，换装民船，附輪拖带，途次甚为危險。因船小风大，深夜至平望时纜绳忽中斷，几遭复沒。运到后点交警察局負責保管，所有购价及旅運費，共用去公款一千元。

这时，继任吳江县民政长(即县长)的是常熟县的丁芝蓀。他与县議會联系密切，对于地方上应兴应革之事都能切实进行，与邻近各县亦都互通消息。

在上海、苏州、吳江等地光复以后不久，原来的紅十字会內部发生分裂，一部分人成立了赤十字会。我与双方均是友好，未便偏袒，不願参加任何一方，遂和楊千里、徐怡堂、馮端生几个人商議筹办“民国法律学校”。当由徐捐开办費二千元，設筹备处，登报招生。学校校址是借上海北四川路离外白渡桥不远的一座巨廈，推伍廷芳为校长，聘請当时名法学家如錢崇固、章士釗等为教員，我和楊、馮、徐四人管理校务。學員三百余名，各省籍貫都有，以广东籍为最多。后以校舍不敷，加設函授班。学校只办了两年，毕业了一班

学生，后因政局动荡而停办。

最后，谈谈组织县议会联合会一事。这件事要从吴江县议会说起。吴江县议会是在辛亥革命前半年根据清廷颁布的地方自治章程和县会选举法由县民选举成立的。我当时是在南通任教，并未回江投票，但选举结果我被选为议员，从而又被选为议长。当时议会确非虚设机构，有书记、庶务等办事人员。我当时因南通职务未得辞去，每于开会前向学校请假回江处理会务。记得是每半年正式开会一次，临时会议无定期。凡是县政的预算决算以及地方兴革各事均须由会议决通过。

当时省有諮議局，我家的远房叔父費敏农即是省諮議員，但他是挂名議員，并无实力。而县议会在当时确能根据定章切实办事，我那时也认为是大有可为的。并且我与邻近各县人士时常联系，遇有重大问题往往联名发表意见。因之，民国成立后，各省省议会及国会相继成立，我就想发起组织全江苏省的县议会联合会，以厚实力，并作省议会的助手。吴县议会议长孔昭晋首先赞同，上海县议长莫錫論、副议长李味青亦表示同意，后常熟、如皋两县亦加入。即由五县发起，号召全省各县组织起来，获得全省各县赞同。随即在上海召开大会，宣告成立，会址是上海“也是园”，设立机构，以上述五县为常务会员。每届省议会开会，县联合会都有相当的建議，多得采纳，深能反映当时的民众呼声。至洪宪后，这一组织即陷于停顿。

洪宪失败以后，国会、省议会先后恢复，而县议会独未见恢复，我们先前发起组织联合会的五县又乘时而起，在沪召开会议，倡议联合全国县议会组织全国县联合会，随即登报号召。不十日而函电交驰，各有代表蒞临，仍在沪“也是园”开大会，推代表二人晋京请愿，恢复县议会。时我和海州代表楊靜山二人被推为江苏省请愿总

代表。楊君先行，我随后去，各省代表亦陆续赴京。我到京后，即假賈家胡同吳江同乡会为会所，定期开会。那时王恪老(紹鰲)是国會議員，也在北京。各省代表又推我晋謁段祺瑞，代表全国人民呼吁請願恢复县議會。段說，此案已由內政部提交国会討論，可向国会声請。于是各省县代表即将拟定的請願书各向本省的国會議員痛陈利害，爭取通过內政部所提的恢复县議會案。某日国会議程中列入此案时，我們全体代表入旁听席。当时因議案多，未及討論到本案，只見議場上发言者爭执甚烈，甚至以墨硯互擲。我們三次列席旁听，不料正要議及本案时，政变突起，段祺瑞召开督軍會議，黎元洪出走天津，国会被解散，民主政治頓受摧残，地方自治之議深沉海底。当时我們情緒之沮喪，不言而喻。我目睹軍閥割据，大局混乱，自此以后即一心从事教育，迄今已八十三虛龄矣。解放告成十有二年，欣逢盛世，回忆往事，和儿孙輩纵談所及，約略成篇，尙望当年共同参与的諸老友有以指正之。

淮安光复和周实阮式

两烈士被害经过

蒋象怡

淮阴是苏北重镇，清时漕运总督及江北提督均驻此，光复前除旧绿营兵漕标以外，还驻有新军第十三协。江北提督为段祺瑞，手握重兵，坐镇此间。武昌义师既起，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段祺瑞眼见军心不固，仓皇出走。同时上海独立，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镇江亦由林述庆任镇军都督，于是十三协亦发动起义，推举参议蒋雁行为江北都督。淮安近在咫尺，人心极为浮动。邑人周实丹原在南京两江师范肄业，衡南社之命，回淮组织两淮光复事宜。既到淮安，见淮阴已于先一日独立，遂召集同志，商议淮安大计，学界同人，踊跃参加。时淮安知府刘名誉尚在城未去，府署前仍悬挂龙旗。周乃偕邑人阮梦桃及学界优秀分子百余人，先至城守营驻地夺得枪械百余支，直至府署，发一排枪，将龙旗击毁。刘闻变，从后门逃走。于是周一面安定人心，令商民照常营业；一面派人向江北都督府接洽，组织淮安军政分府，并定名为淮安巡阅部，注重城防，免被溃兵土匪骚扰。周实丹任巡阅部长，阮梦桃为副部长。我亦系两江优级师范毕业生，当时被推为宣传主任。事既大定，遂进行军事部署，加紧训练。当时对淮安绅权，因过于姑息，并未加以触动，但旧绅劣

董感到受了威胁，暗中协商，推举前府经历姚荣泽担任县知事，前捕厅周世昌协同防守事宜，巡邏部亦未加以反对。不料后来祸机，即伏于此。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七日，巡邏部因姚荣泽私自招募小队四十名为卫队，未得巡邏部同意，要求姚交代款项账目。阮梦桃手持双管手枪，指其胸口。姚惶惧变色，允在三日内造册交清，乃纵其逸去。我当姚走后进言，谓旧官吏对革命前途有碍，尽可加以击毙，或逐之出境，今既对彼无意加害，且复假以事权，又令其不自安，此是取祸之道。周颇是予言，阮则漠然视之。果也，姚于当夜在海会庵召集劣绅旧董丁鹤丞、阮钵香（以上二人原系城厢市董）、何柏山（原内閣中书，家居多年）、何子久（柏山之弟）、秦少文（淮安首富大地主）、于一鹏等六人及周世昌、楊回子（原城守营守备）连夜会商，布置一切。八日上午，令人持片请周、阮两部长至府学明倫堂开会。周聞訊即往，到达后当遭楊回子连续迎面枪击，立时中脑倒地。阮在家午餐未竟，稍迟片刻亦往，至则被破腸而死。事既发动，巡邏部人員大半被家长拖回家中，不容外出，因之敌人得以从容部署，未遭抵抗。

十一月十日，鎮軍北伐队支队到淮，支队长臧再兴（原系南京理化学校学生，与周系旧友）得悉此变，当即四处搜索凶手，但已逃匿无踪。姚所请来之江北都督府两营兵士，亦开回淮阴（姚事先秘密函报蔣雁行說，淮安巡邏部将嘩变虏掠全城，請得两营兵来淮鎮懾）。我們乃多方探訪，事后得悉姚已逃匿南通张睿家中（张系前清状元，南通巨绅，后任袁世凱政府农商总长）。于是我們向江苏都督程德全控告，以不得要领，又向临时大总统府控訴，奉批着令张睿交出人犯，张仍不遵命。我們又到上海控訴于沪軍都督陈其美

56

(陈亦系南社社員)，陈乃特电张索姚，电文有“如不交出，則义旗所指，首在南通，粉骨碎身，所不敢辞”之語。张不敢违抗，始将姚送沪，当即由軍事法庭判决姚与同謀八人一律处死刑(同謀八犯皆未到庭，系缺席判决)。时南北已告統一，袁世凱继任总统，曾派陪审員十二人参加审判，事后并由张審轉請袁下令将姚特赦。至同謀八犯始終避匿无踪。迂延至次年七月，由前山西巡撫邑人丁宝銓出任調停，令八犯捐出田产六百亩、現款二万元充作两烈士遺族贍养費及建筑二烈士祠堂之用，不再追究往事。我們因見到两遺族悬釜待炊情况及当时政局变动情形，又因元凶已纵，而两烈士家屬一再要求，几经磋商后，始勉予同意。乃决定以一万元为建筑祠堂費用，二百亩为祭田，其余由两家均分，并規定此八人以后不再过問地方事为条件。双方均同意照办，于是此始案告一段落。現在淮安天妃宮旁有周、阮二烈士祠堂一所，每年春秋两季，均照例設祭，以慰亡灵，惟先烈殉难，凶手未惩(此八人現在早已先后死亡)，耿耿此心，殊觉无以对二烈士于地下耳。

周烈士名实，原名桂生，字实丹，号无尽，江苏淮安人，两江优級师范数理化专修科毕业，工詩古文辞，为南社健将，与柳亚子、高天梅等唱和甚多。殉难时年仅二十七岁，有《无尽庵遺集》行世。

阮烈士名式，字梦桃，江苏淮安人，宁属师范毕业，詩文亦雄渾有力，殉难时年三十岁。

当时奔走宁沪控訴者共七人，周烈士之尊人鸿囊先生及周烈士族弟人菊，阮烈士之胞兄毓麒，邑人张冰、曹堂、楊楚材、蔣象怡。在此期間，楊楚材复被暗杀惨死于邵伯湖中，故至今二烈士祠中有楊烈士配享云。

光复徐州的点滴回忆

徐 森

苏、浙、沪、粤、鎮联军进攻南京，张助的江防营分統王有宏陣亡，天堡城随之攻克。张助偕江督张人駿、將軍铁良由大胜关北走，南京光复。张助所率的江防营残部，亦退至蚌埠附近。同时柏烈武收集第九鎮残余士兵，并添募新兵，成立两个混成旅。第一混成旅旅长为郑为成，第二混成旅旅长为伍崇仁，駐屯浦鎮，称为浦軍，柏烈武任浦軍总司令。旋命第一混成旅的葛应龙团，向蚌埠进攻。此时江防营大部已退至南宿州及徐州等处，仅余一部在蚌，略事抵抗，亦即北退。适有淮軍一旅(步兵)亦由凤阳抵蚌，司令为陈干(字明侯)，与葛会合，暂在蚌埠駐守。

民元二月，浦軍第一混成旅旅长郑为成联合粵軍混成旅旅长林震，各率所部由浦鎮北伐，并由郑令在蚌葛团約同陈旅为前驅。葛、陈两部即先日前进，攻克南宿州。浦軍第一混成旅主力及粵軍旋亦进抵南宿州。同时浙軍亦继续北上，已抵固鎮。各軍司令即在南宿州会商今后之行止。

浙軍司令朱瑞(參謀长潘国纲代表)以清帝已退位，南北停止战争，无再前进之必要。浦軍司令郑为成則謂张助現在徐州，大局未定，不能保其不死灰复燃；且徐州为南北咽喉，臥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我軍須进至徐州，方可停止前进。粵淮两軍或进或止，均

无成見。于是决定浦、粵、淮三軍继续前进，浙軍暫停固鎮以为后援。并决定浦軍为前鋒，以其主力沿津浦綫前进，以葛团由津浦綫东側前进，向徐州东面迂迴。淮軍由津浦路西側前进，向徐州西面迂迴，以围攻徐州。粵軍在浦軍主力后方续进。

浦軍主力沿津浦路前进，在夹沟扫蕩少数敌軍，次日先头部队已达头鋪(距徐州城十华里)。是夜前哨司令方振武于黑夜自动率其警戒部队，潜向徐州城摸索前进，因黑暗中对前方不辨人物，每逢乡民鋸断的矮树或坟前墓碑，疑为敌人，向前发射，以致众犬狂吠，枪声四起。张勋所部认为革命軍进行夜襲，未敢抵抗，即乘黑夜撤退，先退柳泉，继退兗州。天明方部已达徐州城根，徐州城內的江防營即向浦軍投誠，徐州遂告光复。葛团及淮、粵等軍亦在浦軍主力入城后，先后抵达徐州。辛亥革命的北伐，于焉终止。

本人在这次北伐中任浦軍第一混成旅参謀长，一切皆亲身经历，亲手规划，其战斗经过概如篇中所述。但坊間刊物記載此役，每多夸大其詞，实非当时之真象也。

徐州光复前后

韓席筹 韓范山

前 言

徐州位苏、皖、魯、豫四省之交，綑轂南北，控制东西，自昔称为軍事要地。从楚汉六朝以来，南北战争每以徐州之得失为胜败之关键，稽之往史，无役不然。所以南方称徐州为“北門钥鎖”，北方号徐州为“南国重鎮”，盖因其位居南北之冲和其自然的形势所致，因而成为中州的軍事重鎮之一。当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登高一呼，各省响应，在短短的四个月革命过程中，北伐軍即光复了徐州，控制了南北东西的一个咽喉重地。清朝政府鉴于大势已去，全国人民反对帝制，倾向共和，乃宣告退位，于是辛亥革命的軍事斗争就此告一段落。由此可見，徐州在軍事上的得失，殊关系到全国的局势。因此，徐州光复在辛亥革命史上确占了重要的一頁。茲根据当时目睹事实和地方耆老的回忆，把軍事、政治、经济等情况略述如次，以备編纂地方史的参考。

(一) 軍 事

辛亥革命前徐州的軍事情况

自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朝政府鉴于中国陆海軍的腐敗，知非政

革不能立国，乃仿日本陆军制度，拟创立陆军三十六镇(师)，分布于各行省重要地区，以资防卫。但当时仅成立九个镇及十余个混成协(旅)。驻江苏的计有清江的陆军第十三协(混成协)，驻苏州的第二十三混成协和南京的第九镇，当时称为新军。其余各地方维持治安的多系老防营。这些防营先后驻徐州的计有：姜桂题的老毅军，刘铭传的铭军，及花、红旗，袁字营、凤字营等，它们可以随时调动，不限于一个地区。其实质多系有名无实，每营至多也不过二百多人，既无军事教育，缺乏训练，而枪械亦极陈腐，所用的步枪多系“大洋轰”和“单打一”，间亦有用“九响毛瑟”者。及武昌起义后，调徐州防军协防江宁，始发给“六五”和“七九”步枪。因此，这些老防军毫无作战实力，不过徒拥虚名而已。

清江兵变对徐州之影响

清江陆军第十三协，有两个步标(团)，辅以炮、骑、工、辎各种部队，也系准备编成镇者，但由于陆军人才缺乏和经济拮据，且因武昌起义，致仅成一混成协。十三协新军受到新教育，颇具有民族观念，在辛亥年九月，受武汉革命的影响，都跃跃欲试，以推翻清朝为目的。但因无人领导举义，遂于是月全协兵变。

先是，徐州人徐占凤充任该协协统，因事被清朝军事当局撤职，回家闲居。该协将校目兵对此极为不满，也是酿成事变原因之一。而且该协士兵多系徐属人，故于事变后，大部分携带全副武装，投奔前协统徐占凤。徐州军事当局侦知变兵整队北上，惊惶失措，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局面，乃慫恿地方各界公举徐占凤为该军司令，出面收容改编，借以弭息风波。该军到徐后，即改编为“徐防新军”。后来张勋败退徐州，将该军编入他的“江防军”，而徐占凤

又被解职家居。

江防军的哗变和焚掠

自苏、浙、沪联军光复南京后，江防军统帅张勋即率领残部向徐州溃退，复于蚌埠、固镇两地经革命军之追击，损伤益巨，乃于旧历十月十五日退驻徐州。该军素无纪律，蛮横骄傲，经常劫掠。及旧历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以革命军日渐逼近，知大势已去，遂大肆哗变，把徐州四关和近郊坝子街等处抢劫一空，尤其南关的上街（即彭城路）、马市街、笆子街（道平路）、下街（三民街）等商业精华地区，均付之一炬，商民损失，不可数计。及二十五日复大举抢掠，抢劫后仍回营归队，其长官亦视为故常，绝不加以罪责。徐州人自经这两次浩劫，对张勋恨之刻骨。这时清帝已宣布退位，而且粤、浦、淮三路北伐军已逼近徐州，张勋遂率残部北逃兖州。

光复徐州之经过

革命军光复南京后，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十七省的代表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当时革命政府既已成立，但清朝政府的顽固派仍阻和议，致南北和议迁延时日，乃决意北伐，以林述庆任北伐军总司令，统率粤、浦、淮三军北上。计中路为粤军，司令林震（属姚雨平部），沿津浦线北上；右路为浦军、镇军，司令葛应龙，经扬州北进；左路为淮泗讨虏军，司令陈干，自寿州经正阳关、濉溪、萧县至徐州，三路同以徐州为目标，然后会师北上。夏历辛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伐军前锋至三堡车站（距徐州十五公里），地方各界公推韩志正、徐香九、梁懋初三人为代表，前往欢迎。张勋闻之即狼狈北窜兖州，革命军追击至韩

庄(在苏魯交界,距徐州五十公里)而止。适清帝退位,南北統一,革命軍的武装斗争乃告一段落。

光复后军队的整編

自武昌起义后,各省紛紛响应,徐属人民亦聞风兴起,各县农民武装部队,遍地皆是,多者一二千人,少者数十人,但缺乏統一领导,致呈现散漫混乱现象。在反动統治阶级看来,以为这些部队志在推倒官府,所以概名之为土匪。其实分析起来,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富有革命性的;但也有极少数分子乘机而起,借以攫夺权利,从中篡夺革命果实;也有糾集地方坏人,搶劫农民的牲畜、衣物、食粮,因而四乡农村呈混乱状态。徐州光复后,軍事当局即从事收編、招撫、淘汰。計当时最有实力的如王金韬(即王金妮)、褚玉璞、楊相臣、辛传朋、超凡和尚等部,分別編入各軍。王金韬編入淮軍;褚玉璞編为第九师(后改为第三师)巡緝馬营;楊相臣等編入浦軍,此地方部队整編的大概情况。

一九一二年春,粵軍复員,经南京調回广东;淮軍則全体解散;浦軍和鎮軍改編为陸軍第九师,由郑为成任师长,是年秋改为陸軍第三师,由冷遯任师长,分駐徐属各县,維持地方治安。

討袁的失敗

袁世凱久蓄异謀,想完全消灭南方革命軍的势力,以期达成統治全国之迷梦,因而在一九一三年春即密派北軍南下。及宋案发生,其阴谋完全暴露于国人,于是函电紛馳,声罪致討。袁氏的阴谋益亟,除派北軍南下外,并向外国借債二千五百万鎊,充作对付民軍的軍費。当时革命軍的领导人及其根据地是:陈其美在沪,冷

適在徐州，柏文蔚在皖，李烈鈞、李明揚在贛，胡漢民在粵。至于湘督譚延闓、晉督閻錫山雖名為民黨將領，實際却是兩面派，首鼠兩端。

袁世凱進攻民軍的布置是：派李純的第六師入贛，龍濟光入粵，倪嗣沖的安武軍入皖，鄭汝成迫滬，而以馮國璋的第二軍和張勳的定武軍為主，進犯徐州以窺南京。一九一三年七月，民黨方面以袁世凱反動真相半露，逆跡昭著，並且已將贛督李烈鈞、皖督柏文蔚撤換，於是孫中山先生在滬召集首腦會議，決以黃興為討袁軍總司令，宣布袁世凱叛國罪狀，即令駐徐州的第三師師長冷遯率部北進，集中利國驛、韓莊一帶掩護徐州，以便大軍得以陸續集中。不料該師將士激昂，剛到達運河，不待進攻的命令，即與北軍接火，擬進取兗州，攻略濟南。血戰五日，卒以眾寡懸殊，因而不能不向南撤退。南京的衛戍團雖已開到增援，然已不及，於是徐州遂陷於馮、張之手。同時滬、粵、贛的討袁軍亦告失敗。討袁軍總司令黃興以軍事失利，遂即下野。但是南京的一、八兩師憤袁氏摧殘革命，專權橫行，不甘失敗，乃公推何海鳴任總指揮，繼續作戰，隔江與馮軍炮戰，相持十餘日。適張勳部經清江、揚州渡江，自鎮江攻南京，致南京兩面受敵，終以彈盡援絕，孤城難守，遂告陷落。至此，討袁軍全部失敗，而辛亥革命的階段亦至此結束。

先是，張勳到徐州後，即向其部下講話：“我軍如果攻克南京，三天決不点名，任爾等自由行動。”於是辮子兵（張勳忠於清室，雖任民國軍職，但不准其部下剪辮，連他自己也仍梳小辮，時人稱為“辮帥”，稱定武軍為“辮子兵”）人人歡喜，跃跃欲試。及入南京城後，大肆搶劫，奸污婦女，南京被其蹂躪的慘狀，實難罄述。

總觀徐州在辛亥革命時期，備受了炮火、搶劫、焚燒、征發等等

的摧殘，以致商業凋敝，市井蕭條，農村田園荒蕪，十室九空。破壞徐州最厲害的就是張勳的辮子兵。從一九一二年夏至一九一三年夏，由於冷遯所部第三師的紀律嚴明，徐州人民得以蘇息了一年。自癸丑討袁失敗後，張勳再盤踞徐州，人民復被“辮帥”壓迫剝削，肆意踐踏，直至他復辟失敗為止。

(二) 政 治

光復前徐州的假獨立

武昌起義後，各省各地紛紛響應，宣布獨立。這些獨立的省份和大城市，多數是主張民族革命，樹立共和政體；可是也有兩面派陰持兩端，以觀風色，誰勝屬誰，也有表面宣布獨立，免被革命洪流所衝擊，以防失去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內心還是忠於清朝的。如蘇北的蔣雁行雖然獨立，實際是首鼠兩端的所謂“蝙蝠派”。清江十三協兵變後，由徐占夙成立徐防新軍。徐州地方官紳以環境形勢緊張，經過多次會議，居然也宣布成立“軍政府”，公推蕭縣紳士段書云（曾任廣東瓊崖道、津浦鐵路南段督辦等職）為政務總長，徐海道林開謨為民政長，徐占夙為軍政長，地方紳士張佐卿為財政長。未幾，張勳退駐徐州，這個組織就無形消失了。當張勳在南京被蘇、浙、滬聯軍擊垮後，渡江北甯，本由東路之浦、鎮兩軍自揚州經六合趨臨淮關，準備截擊，及到達時，張之大部已經越過。迨經過蚌埠、固鎮兩地，復被革命軍邀擊，張軍已成驚弓之鳥，僅有五列車北逃，張本人在第四列車上。及到徐州車站，張本不準備下車，適地方官紳聞訊往迎，張詢以地方情況，他們對以“安靖”，于地方獨立一事只字未敢提及，張逆因而放心進城駐紮。前三列車已越過徐州，復行追

回。张逆收集残部，蹂躏徐州人民自此开始。当时徐州的官紳如段书云等倘对张逆說徐州各界同意革命，独立政府已经成立，徐防新軍如何坚强，或者不去迎接，径派新軍埋伏邀击，則狼狽之张逆，势必北逃兗州。由此可見，徐州人民遭到几次浩劫，张助之罪固不容道，而推原禍始，实由段书云等忠心清室，虛伪独立，有以酿成之，其罪更浮于张助，徐属各县人民至今犹深恨之。

政治制度的改革

清末的政治制度，省以下設有府和直隶州，府以下轄若干县，专理民政。徐州府轄八县，由知府总其成，县以下設若干乡，乡以下設若干圩寨。此外設有徐州鎮总兵，专管軍政，維持地方治安，又設有河漕盐驛兵备道，两者职权均在知府之上，划分权限，各司其事。光复后，南京临时政府根据临时約法，首先頒布政治制度，废除鎮、道、府制，每县設民政长一人。从前徐州府治是銅山县，府制既已废除，銅山县是行政的基本单位。署內設民政长一人，下为总务課、主計課、教育課、司法課、警备課、实业課，課长各一人，課下設若干科。及司法独立后，警察也另設专局，遂并各課为一、二、三科，而民政长改称县知事，直隶于江苏省政府。县以下划分为六市十二乡，即大彭、馬沟、敬安、柳泉、单集、房村六个市，黃集、毛庄、极桥、大吳、汴塘、保光、棠梨、榆庄、汉王、車村、郝村、佟村十二个乡。

自徐州光复至討袁失敗，仅仅才一年半，无论县和市乡，在政治方面尚有一些共和政体的风格。討袁失敗后，各級政府形成了专制独裁，一如晚清的状态。銅山县的民政长，在革命軍入城后，即由地方各界临时推选韓志正（字元方，清癸卯科举人）充任。他虽系

科举出身，在当时来说，思想却很新颖。清光绪末年停止科举后，他即带同长女鍾英赴日留学，入宏文学院学师范，东洋大学习法政，毕业回国，创办坤成女学，提倡女权，并组织不缠足会。于是徐州的风气大开。他历任徐州中学堂、师范学堂教员，地方的新进人物，大多受到他的教育。讨袁失败，张勋再据徐州，因为他欢迎民军，又充任民政长，欲得而甘心，幸事前闻悉，乃连夜北走京师，越五载，张勋复辟失败，乃归。当时曾有诗记事：“翻倒中华五色旗，冲天妄欲作雄飞；当君弃甲逃胡日，我正花开缓缓归。”他任民政长六月即行辞去，由省委袁良干接任。翌年讨袁失败，袁良干随军南下，地方各界公推民政长公署科員王少华代理民政长职务。张勋部入城，需索物资，威逼打骂，凌辱备至，他始终不屈，墜楼自杀。后来地方各界以其不惜牺牲，爱护徐州人民，将旧县署街改名为“少华街”，以资永久纪念。

光复后采取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立制度。以立法来说，铜山县設有参议会，計参議員五人，县議會議員二十八人，其名額的分配計每市二人，每乡一人，是由各市乡选举的。县議會議決的案件，经参议会通过，交由民政长施行。各市乡亦設有市乡議會，議決案件交由市乡董事会执行。司法方面，于一九一二年三月成立地方检察厅和地方审判厅，专办司法案件。

(三) 经 济

田賦的征收

光复后的田賦征額和经征办法，仍沿清末制度，每年分两忙（上忙、下忙）、一漕（漕米），有时遇着特别急需，就增加亩捐，或称

附加稅。城市和乡間的大地主与官府有勾結，大半不交納田賦，即令有交納的，为數也极少，繳納田賦的只是中小地主和农民。田賦属于国課，照規定应上繳省厅，但是省方補助地方的經費，准許县里照補助額數，于經征的忙漕項下截留。

地 方 經 費

在徐州光復以后，地方經費多承前清之原有制度，杂捐名目，尙不繁多，除省发補助經費外，如地方行政、教育、部队餉項、建設等所需項用，多系征收房鋪捐、学田租、牙稅、厘金等項，不足时，即于田賦項下征亩捐，或向地方紳商劝募。例如建設一項，当时既无此名目，也无此专款，有需要时即向民間摊派。如兴修某一街道或某条小巷的路面，預算需款若干（当时的工程多采用投标制），其經費完全由沿路商店或住戶按照经济情况认捐。每年修治下水道也用这种办法。其他建設事业，可以类推。

在农村方面，由于地方不靖，治安难以維持，各市、乡均組織民团，多者一二百人，少者四五十人，數目不等。除所用枪支由富戶备价向县申請购領，借与民团使用外，其每月经常餉項，則按亩抽捐，以作基本經費。至征收办法，系由市、乡董提交市乡議会討論通过，呈县备案后施行。

人 民 生 活

辛亥革命期間，徐州城市由于张勳所部辮子兵几次焚燒搶掠，商民損失难以數計，因而元氣大傷，人民生活倍覺艱苦。幸而物价尙无甚波动，一般失业者和城市貧民尙易謀生。农村方面，因为萑苻不靖，且以軍隊复杂，四出騷扰，以致閭閻凋敝，十室九空，农业

生产因而降低。自一九一二年夏，由于冷遹接防徐州，整顿地方部队，申明军纪，绥靖地方，无论城乡的社会经济，都大为好转，而生产力也逐渐发展。至翌年夏，讨袁失败，徐州从此陷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社会的黑暗和经济的枯竭，遂不可言状。

币制情况

在清末时期，无论行政、军事、商业等费用收支，多以银本位核算，即不用现银，亦照价折合。民国初元虽仍其旧，但亦逐渐改用洋码。当时所用的银元有北洋、南洋、湖北、广东、四川等处造币厂所造的一元银币和角币，后来亦称它们为龙洋，间亦有用鹰洋、站人、本洋等银币。但市场和社会上交易仍多用钱码。货币流行者除银币外，大多系一文铜质制钱和当十铜元。此外更有所谓纸币者，充满民间和集市，都是私营钱庄所印发，发行最多的如“锦丰庆”、“普同庆”、“树慎成”等数家。他们的票号基金很少，往往发生挤兑风潮，社会称之为“票号抢险”，政府虽派警到场弹压，但也不能维持。等到他们宣布倒闭，政府不得不严令收回，或者提案押追，可是结果变产收回的，也不过十之一二，其余则散存于人民手中，成为废纸。当时的人民都唾骂他们是“片纸生息，坑骗百姓”，这两句话是十分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赵声革命事迹

赵启麟

赵声，字伯先，生于光緒六年庚辰二月十四日（一八八〇年三月二十四日），即“百花生日”之前夕，因号百先，名毓声。后入南洋水师学堂，改名“声”，字伯先。世居鎮江东乡之大港鎮。其尊人鏡美先生，鎮江名儒，为余族兄輩行。余年十三，从之讀，执弟子礼。入鏡美先生門者多毕九经之大学生，以余年为最稚。伯先长余十四岁，呼之为“大师兄”，伯先仍称余为“老叔”。余居鏡美先生家为时甚久，对于伯先革命事迹及其家庭知之亦較詳。因不自揣，輒举若干则，以补各家传记之所未及。

伯先家世寒素。父鏡美先生，博学强記，精古文辞。入洋后，乡試四荐不售，遂无意举业，家居授徒，尝以“为仁不让”，“临难不苟”，“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及“富貴不能淫”諸說灌輸学生。不計束修多寡，貧寒子弟，一律收容，其应童子試者，复为具保（按先生为廩生，故具此資格）。先后及門不下五百余人，有負籍东西洋者，成就頗多。其敦品励学，所予伯先之影响固深且巨。

伯先昆季三人，伯先居长。二弟毓馴，字馭六，后以字行，号念伯，所以紀念伯氏也；先后入南洋陆师学堂（四期生）、南洋陆軍随营学校及广东陆軍速成学校。三弟毓光，字翊三，应征江苏兵役时，改名“光”。

伯先年十余，赴鎮江应童子試。鎮江知府王仁堪、丹徒知县王某，見伯先坐凳上脚尚悬空，以年过小，不准与試。伯先述家世，知为鏡美先生子，令坐己案，观其如何。題既下，伯先振笔直书，深受激賞，通过院試，遂入泮。

伯先母葛夫人患难产，势危殆。时伯先已与严吟凤訂婚，因来視湯药（鎮江风俗謂之“端茶”）。母卒弃养，几无以为殮。鏡美先生将售夫人陪嫁妆奩，启箱視之，累累皆质票。是盖夫人生前，尽典裙釵，以济家用；学生中貧苦无以为食者，亦时補助之；积年以来，所耗至多，用心良苦，先生不知也。本家赵玉汝者，号称乡紳，袖五十金以进，拒不受，其律己之严如此。

伯先服闋，赴南京乡試，荐而未售，因留某太守家授讀。旋考入南洋水师学堂，課程多英文原本，非其所好，屢請退学，主者未之許，迁延三数月，始得离校。悵无所归，暫栖于僧寺。在校月領膏火銀数两，除自用外，犹可寄家。既离校，膏火已无，穷困益甚，寺僧怜其落拓，与共斋飯。寺旁为南洋陆师学堂，重視国文課。学生解朝东，能文，亦鏡美先生弟子，常为同学捉刀。求者紛紛，則取数卷交伯先代笔，大为监督俞明震所欣赏，认为非同学所能作，穷究得真相，要伯先入校。毕业后，复东渡扶桑，考查軍政。

清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借图緩和革命情緒。党人密謀阻撓此举，将于于五大臣就道时狙击之。伯先亦曾參予密謀，与吳樾互爭北上任务。吳問：“舍生一拼与艰难締造，孰为难易？”伯先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吳曰：“然則，我为其易，留其难以待君。”議遂定。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伯先贈詩四章（詩見邹魯著赵声传），以壮其行。樾到京仍与伯先保持联系，約貼紙帖于正阳門洞，暗示会晤地点。伯先

应約来，密談許久。未几，炸五大臣案即爆发。后数年，伯先回乡，有來訪者，体瘦弱，衣破旧，穷无以为生，即吳樾弟也。相与流涕，傾囊以助，并为介紹职业。

江苏試行征兵制，伯先力为贊翊，三弟赵光首先应征入伍。伯先以身为新軍三十三标^①第二营管带，駐南京。每逢星期日，士兵于城南熱鬧地区因細故遭受警察干涉，士兵以属于宪兵管轄范围，警察不应越俎，致起糾紛。警察拟扯其符号，用作罪证，遂至扭打。一鳴警笛，群警毕至，而新軍聞訊，亦麤集于肇事地点，双方相持不下。总督端方得报，电促統制徐紹楨派員彈压。伯先銜徐命，单騎馳往，大呼軍人应严守紀律，孰是孰非，听候裁判，本营弟兄着速归队。伯先于軍中夙孚众望，此言一出，即他营士兵亦相率引去。事原可告一段落。三十三标某标統，端方手下紅人之一，既欲向端方邀功，复想卖好于巡警道，力主严惩滋事士兵，又不敢公然名捕，伪称大帅見新軍精神甚佳，将择优給賞，同时又密告各营队，将平日活动最甚之分子提出，人数不求过多。名单上报，由标統率往督署，揚言領賞，暗以扰乱地方秩序罪，竟行枪决。公布后，三十三标士兵大嘩，一哄而出，遇警即毆。警察亦不甘示弱，互有伤亡，秩序大乱。端方仓皇失措，电徐紹楨处理。伯先复銜命，往劝士兵应先恢复秩序，并謂：“由我負責为亡者伸冤，此冤不伸，余将无顏見諸弟兄。”語极誠恳，士兵为之感动。紹楨告端方曰：“士兵以标統某騙杀无辜，群情憤慨，势不可遏。为今之計，应查办該标統方足以明是非而息众怒。”端方迫不得已，組軍事法庭，委伯先为审判长。某标統以伯先执法如山，殆难幸免，尙未开庭，已畏罪自杀。

^① 按当时新軍編制，每一鎮下有四标。徐紹楨为第九鎮統制，隶属其下应为三十三——三十六标。伯先所隶有作三十二标者实誤。

至是，轰动一时之南京軍警交哄案，遂告解决。伯先以众望所归，擢为标統。

伯先初为管带，即向徐紹楨保举党人冷遯、柏文蔚为队官，及擢标統，复荐二人为管带。

伯先生活朴素，月寄五十金供堂上甘旨，余尽接济諸同志。尝有句云：“願交天下士，罄我怀中藏。”治軍紀律严明，勤加操练，时于后湖“打野外”，复在明孝陵为士兵讲演国际形势、民族危机以及太平天国兴亡经过，灌输革命思想，深入浅出，娓娓动人。聞者感动，遂有捣毁曾国藩神座之事，及有声有色之“哭陵”一幕。事为端方所聞，以伯先深得軍心，恐孳生不測，必欲去之而后已，因改調馬标某营管带。盖以馬标地址在下关石头营，夜間閉城，即与三十三标相隔絕，无从呼应，則杀伯先易于动手。伯先早燭其奸，立即交代标統职务而不往馬队。先是，端方对于調換伯先，虑为士兵反对，又以标部在三牌樓，与鼓楼近在咫尺，地属冲要，一旦有变，为其所据，更为棘手，因而迟疑不决。新委标統俞大洪献計，瓜代文书不必通过徐紹楨，由俞携至标部。伯先見之，传令紧急集合，一时画角大鳴，士兵执枪出，俞为变色。伯先笑曰：“无他，君来履新，特举行‘布达式’耳。”全标士兵聞之，哭不可仰。伯先勉以遵守紀律，始未生变。

伯先寄居城内約二三月，适萍、浏、醴之役发动，端方令徐紹楨率部前往，期必速平。徐乘机提出“借赵伯先”之要求，端方同意，因借往。事平，伯先径回鎮江。端方聞之，大为不安，认为不应纵之使去，然已无及矣。伯先旋赴广东，总督张人駿爱其才，予以督练公所提調，旋升新軍第二标标統，派剿廉州革命軍。防軍統領郭人漳向张人駿告密，謂伯先在軍中传播革命思想，不可重用，复改

調陸軍小學堂監督。

是年春夏之交，伯先曾回鎮江省親，同時與江、浙、皖、贛諸地區同志有所聯繫，又赴杭作六橋三竺之遊。既歸，余請書扇，為臨岳墳碑刻武穆所書“墨莊”二大字，并綴以短跋云：“游西湖岳墳歸，次驂叔索書，為臨此二字，愧難得其神耳。”伯先素極崇拜武穆，廉州之役，曾口占七絕二首，有“八百健兒齊踊躍，自慚不是岳家軍”之句。此次伯先回里，余以赴粵入陸軍小學為請。伯先告以明春江蘇陸軍小學亦招生，可以考入。適張人駿改調兩江，伯先赴寧往晤，意欲留寧。徐紹楨又力為推轂曰：“方今能扎硬寨、打死仗者，唯伯先一人耳。”人駿意為之動。第九鎮士兵聞伯先來，熱烈表示歡迎，情況頗為緊張。人駿不無顧忌，未敢延攬，婉言勸其回粵。伯先返家，與余暢談革命發展形勢，曰：“四川天府之國，攻守兩宜，惟向外推動作用遲緩。武漢地點適中，一旦發動，足以震撼全國，惟敗則難於久守。廣東地方富庶，民氣開通，交通便利，易與海外取得聯繫，優點特多。將來首先發難，其在百粵間乎。”遂毅然赴香港，與胡漢民、黃興諸同志連袂轉道檳榔嶼，參加孫中山先生所召開之重要會議。余亦於是時考入江蘇陸軍小學。

此後，伯先即在香港從事革命工作，曾赴南洋募款，並策劃軍事之進行與戰士之培養，其地位之重要，與黃克強相埒。黃克強于（宣統二年）舊曆四月初五日會上孫中山先生《革命計劃書》一件，文長二千七八百言，關於革命策略策劃多有重要論列。首云：“弟與伯先意，以為廣東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須由軍隊下手。”又云：“新軍一營駐廉州者為伯先舊部，今正聞廣州之事，已跃跃欲試。”又云：“至三江之陸軍，其將校半多同志，今歲聞伯先在粵舉事，皆有握拳透爪之勢，若事前與之聯絡，擇其縝密者為之樞紐，勢不難與

两粤并。”已可見伯先之声望及其所予新軍之影响。对于伯先个人，书中更特別提及：“赵伯先兄于軍事甚踊跃担任，此次款項若成，可委广东发难之軍事于伊，命弟为之参謀，以补其短，庶于事有济。伯先刻虽不能入內地，以軍界多属望于伊，为之自易易，若能得一次大会議上担責任，各尽其才，事无不成矣。”最后更着重說：“以上所述意見，弟与伯先相同，可作两人函視之。”此书既非揄揚伯先，亦非夸大自己，更非互相标榜，而是据实际言，直抒胸臆，并通过庇能統籌会議，其后广州黄花崗之役，其进行計劃略如书中所言，由伯先为总指揮，克强副之。則伯先对于革命所系之重轻，已无待多述。

孙中山先生自南洋来，以香港悬有禁令，不得入口，則促伯先前往澳門，与議革命进行計劃，将国内軍事重任畀諸伯先，而已則在南洋一带募款并为鼓吹，相与配合，其倚重又如此。

宣統二年岁杪，学校放假，余在伯先家，突有人自間道来，出一紙見示，上书：“見字全家速来港。”其人言夜間仍徒步回城，防为人見，且一再叮嚀，由沪开港之船，阴历年內只有一次，务須速行，以免脫班。奈鏡芙先生不肯行，伯先夫人更不能自作主张。经余反复敦促，始治行装，备旅費，举家偕行，星夜就道。抵香港后，得悉拟于辛亥正月起义于广东，公举伯先任总指揮，后因餉械未办理妥善，故迟迟未发。直至三月二十九日始爆发黄花崗之役，七十二烈士俱殉。其中如宋玉琳(建侯)、石德寬(经武)、徐国泰(胜西)阮德山、封冠卿等，皆伯先之乡人也。

伯先既惜此役之挫敗，复痛战友之牺牲，抑郁悲伤，一时并集。胡汉民邀往痛飲，而同盟会中异己分子嫉之甚，乘隙下毒，归腹痛如絞，入院診斷为盲腸炎，須施手术。伯先性至刚烈，拒施麻药，一

任医生奏刀，神态自若。惜手术欠佳，縫后化膿，再度开刀，流血过多，病勢危殆。同志哭之甚，伯先张目曰：“吾負死难諸友矣，雪恥唯君等。”囑夫人善待老父，三呼岳武穆而歿，时辛亥四月二十日（一九一一年五月十八日），年三十有二。此伯先家人及参加黃花崗战役之巴澤宪为余言如此，盖实况也。香港茄菲园山巔附近有碑曰“天香閣主人之墓”，为伯先埋骨处；天香閣者，鏡美先生书斋名也。民元复移葬于鎮江南郊竹林寺。

武昌起义，举国响应，港粵諸同志在沪組織北伐挺进军，伯先夫人及弟妹等皆踊跃参加。开至南京，宣告共和，停止前进，北伐挺进军編为陆军第十六师，調駐鎮江，师长顧忠琛。二弟念伯长三十二旅，三弟光长六十三团。鏡美先生及伯先夫人等先后重返故园。伯先无子，以念伯长子俊庠为嗣。

江西光复和光复后的政局

彭程万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是有它伟大历史意义的。我当时参加了江西光复之役，并一度掌握全省兵柄。今就个人经历，撮要记述于下。

清朝末年，曾有分期编练新军三十六镇的规划。江西先编练一个混成协，辖步兵五十三、五十四两标，骑兵、炮兵各一营和工兵、辎重兵各一连，分驻南昌、九江、萍乡等地。吴介璋任新军混成协协统，马毓宝任五十三标标统，齐宝善任五十四标标统。李烈鈞、欧阳武、胡谦、方先亮等江西武备学堂出身的军官，先后任各营管带。吴介璋曾任江西武备学堂总教习，江西新军各级军官多系吴的学生，官兵中有不少富有革命思想的优秀青年。因此，武昌起义后，江西新军先后在九江、南昌、萍乡等地起义，光复了江西。其次，夏之麒领导的江西陆军小学、俞应麓领导的测绘学堂（当时我也在该校执教）和我领导的测量司学员，共有四、五百人，都受过军事操练。江西兵备处给他们发了枪支子弹，他们也经过实弹射击。这些武装力量，同新军结合在一起，便成了革命的主导力量。当然，其他各学校师生、知识分子和商民等也有许多人是同情革命的。尤其是《江西民报》，对于武汉光复情形宣传得很好，把江西各界人民都激动起来了。

武昌光复后，李烈鈞潜回九江，策动駐九江的五十三标，联合炮兵营官兵，首先宣布独立，光复了九江，推标統馬毓宝为九江都督，李烈鈞任都督府参謀长。李烈鈞亲自指揮金鸡坡炮台封鎖长江，截留由长江上溯的許多軍艦，更震动了全国，壮大了革命軍的声威。这在江西來說，是九江軍政府立下的头一次大功。

九江光复后，全省人心震动，南昌混成协新軍，酝酿响应，陸軍小学学生、測繪学堂学生和測量司學員也跃跃欲动。清朝江西巡撫馮汝驥、兵备处总办张季煜以及藩、臬台等大員，日夜筹商应变之策，企图鎮压和扼杀革命。他們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一、特令臬台张检督师赴九江，“剿办”独立的官兵；二、調上饒防营統領刘懋政迅率所部兼程限期赶到南昌，監視城外新軍和城内学生等；三、軟禁混成协协統吳介璋于巡撫衙內；四、由张季煜調陸軍小学学生出城野操，趁機亲率職員卫队赴陆小收繳子弹；五、对新軍和学生等进行“安撫”，企图收攬人心。清朝官府的这些反动措施，更加激起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緒，加速了起义日期。十月三十日夜晚，新軍爬城牆入城。陸軍小学学生、測繪学堂学生和測量司學員一致武装响应，驅逐守城士兵，打开城門。起义部队拥进城內，占領了巡撫衙門和藩署、臬署等政府机关。巡撫以下大官，都已事先聞风逃跑。城内五十五标新軍宪兵和武装警察队，仅在营房內戒备，都未反抗。江西省会南昌就这样兵不血刃地光复了。南昌市民未遭兵燹，这是很大幸事。

南昌光复后，我和新軍各部队負責官长及起义各校負責人，在陸軍小学會議，商量善后，并通电省內外报告江西光复情况。在會議时接到报告，五十五标标統离开了部队，下落不明，当即推定五十五标教练官馮嗣鴻为五十五标标統。为維持省会治安起見，派

陆小学生和測繪学堂学生、測量司學員在洗馬池大街一带巡查。当时市面安定，市民欢乐。第二天开会推选江西省都督，到会軍民一致推选吳介璋担任。接着，萍乡光复，推选五十四标二营管带胡謙为都督。鄱阳光复后，推防营黄金台为都督。瑞、临一带光复后，推蔡銳霆为都督。吉安撫州防营統領当时未表明态度，但旋亦順从。上饒刘懋政在南昌光复的当日晚間，率队赶到南昌。我和俞应麓同往联系，刘率队向革命軍投誠。江西光复問題，就此告一段落。

光复后的江西政局，很不稳定，在短短的时间內，就四易都督。

吳介璋在江西軍界中資望很高，所部实力也很雄厚，惟因光复前曾被軟禁，与张季煜意見很深。馮嗣鴻任标統后，与张很接近，与吳則疏远。有一次，馮邀我一同帶了十几个人同去张季煜家，請张出来到軍政府任事，张一再婉辞。馮同去的十余人見张不允，乃群起怒吼，說要抓他出去，张母从后院跑出来哭阻。最后，张不得已，才同我們去軍政府。及到軍政府，馮和他的十余人已离开了，只有我同着张季煜去見吳介璋。吳看了张一眼，并未起身，只顧自看公文，不加理睬。张坐了一会，即不辭而去。当初我以为馮嗣鴻邀张出来任事是同吳說好了的，同时我对願意参加革命的人，都表示欢迎，因此才应馮之邀同去請张，沒料到結果却是如此。从这以后，吳张之間的关系更加恶化了。馮之拥张出来，其用意是利用张制吳，分割吳的权力，計劃不成，于是反吳更积极了。馮此种企图，张是理解的，但馮以后积极反吳，张是否同意或是否在背后策动，我均不知道。

反吳势力日趋扩大，初时只有五十五标反吳，以后，刘懋政的

防营部队、洪江会和邹恩灏都参加在里面。其时，武昌革命军正在汉口的北面与馮国璋部北洋军激战，张季煜在那时是不敢担任江西省都督的，但张反吴是积极的。邹恩灏任江西混成协骑兵营排长，武汉光复消息传到南昌后，他即离职去武昌参加革命，不久又回到南昌，参加馮嗣鸿等反吴活动，并坚持拥我继任江西省都督。馮等因张季煜不敢担任江西都督，乃属意于我。邹、馮等意见一致后，更加紧行动。有一天，军政府有几个要人集合在一起谈话，都说馮嗣鸿在大捣乱。我说：“把馮的部队派去援助武昌作战不好吗？”吴说：“你真老实，他还肯去武昌吗？”这次谈话，没有谈出什么道理来。之后，我病了，在家休息。一天，忽来了十几个人，请我到军政府去开会。我一到会，看到有很多军官在场，而政界和社会方面的人士却不多。宣布开会后，邹恩灏报告，略谓：“吴都督已离职，不知去向，本会急须决定继任人选。我在武昌时曾遇见黄克强先生，谈到江西光复后都督人选问题。我提出彭程万为适当人选，黄克强先生同意，并发给了印信，交我带回江西。”到会各人，均无异议。我乃起而发言，略谓：“吴都督既已离职，不知去向，地方秩序不可无人负责，大家如同意我，我便出来维持几天秩序。我一面打听吴都督在什么地方，请他出来复职。至于黄克强先生发给的印信，我暂时不能接受。本会可以去电黄克强先生，说明今天开会情形。”会议到此结束。

我就任后，关于请吴复职一事因格于形势，未能办到，同时我也知道了反吴拥我经过的许多复杂情形。我因此不直邹之所为，未加任用。邹后来九江，为马毓宝所杀。论罪邹有应得，但反吴拥我，却不是邹一人所能为，中间还夹杂着许多复杂原因。此次易督，我未能事先察觉，弥患未然，及至事变突来，我身当其冲，虽幸未酿

成兵乱，然亦甚为危险。我任事后，汉口的战事紧张，黎元洪每天来电报催江西迅速出兵增援。我商之馮嗣鴻，把五十五标补充成旅，开赴汉口增援。馮不願去，并說：“五十五标如去援鄂，你的地位就不稳固。”我說：“武昌如果失守，江西就会跟着失败；现在是援助武昌要紧，你不要顾虑我个人的地位。”結果，终于把五十五标派出去援鄂了。馮到武昌后，頗受黎元洪欢迎。接着，张勋反攻南京，徐固卿新軍一师败退，南京軍政府迭电江西速派援兵。我又把刘懋政防营补充后，派去增援南京。

其时，江西有四个軍政分府，四个分都督，都是光复地方有功的，尤其是馬毓宝的功最大。江西因有这样多的軍政府，全省的政权便不統一了。为此，我建議取消四个軍政分府，請馬毓宝为江西全省都督。我首先通电省内外辞职，同时电請贛州、鄱阳两分都督也自动辞职。至此，江西算是統一了。萍乡分都督胡謙接我去电后，即复电，略云：“你如果因兵力不足而辞职，我即刻把五十四标官兵兼程赶来南昌支援你，望你千万不要辞职。”我又去电婉为解释，重申前意，当被接受。

馬毓宝继任江西都督后，据說因为身体多病，政务废弛，而許多对光复有功之人，驕纵豪奢，馬也不加約束，以致民怨沸腾。九江、南昌各界人民推出代表，赴南京政府向孙大总统請願，要求撤換馬毓宝。孙大总统初以馬光复九江有功，不願更換，后来鉴于控告文电如雪片飞来，民情太大，乃免了馬的职务，任命李烈鈞为江西都督。

李烈鈞，江西省武宁县人，是九江光复的策动者，曾任九江軍政分府參謀长，以支援安徽光复，帶兵出省，安庆軍民推李为安徽省都督。安徽奠定后，他帶領一部海陸軍轉入武汉，任五省联軍总

司令，率部抗击清軍。一九一二年夏，李烈鈞奉孙大总统任命后，取得黎元洪的同意，率领海陆軍一部回江西，接任了江西都督。经过一年多的整理，社会秩序渐趋安定。他还采取开源节流的方法，設立銀行，开办公典，稳定了江西的財政金融。李对孙中山先生拥护极力，深为袁世凱所忌。汪瑞闈原是李烈鈞在武备学堂时的老师，李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也是汪为他介紹工作的，可是，当袁世凱利用汪到江西攫取政权，任汪为江西民政长时，李能不顾情誼，坚决予以拒絕。袁以对李威胁利誘均无所施其伎，乃于一九一三年六月九日下令撤李都督职，不久，又撤了安徽柏文蔚的都督职。袁世凱派人刺杀宋教仁后，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召集各省都督开会，我同李烈鈞一道参加。当时会上一致通过开展反袁斗争，但当孙中山先生征詢誰来领导首先发难时，全場鴉雀无声，結果还是已经丢掉了都督职位的李烈鈞出来表示担任这一工作，會議才完滿結束。散会出来时，与会各省都督跟在李烈鈞后面，口里連說：“只有协和先生，只有协和先生！”这件事給了我很深的印象。

李烈鈞于七月七日回到湖口，即就江西討袁軍总司令，并兼正面軍司令，发出討袁通电，领导了历史上有名的湖口起义。当时江西和湖南、广东、安徽、福建虽然結成五省联盟，但在前綫作战的只有江西一省的軍队。湖南的譚延闈最先通电退出反袁，后来袁世凱称帝，公布以譚任內务部大臣，譚曾未就，但已露出了尾巴。可是，李烈鈞湖口失敗后，譚却設法用裝煤炭的日本貨船暗中把他送出，并給李旅費五万元。这就是素以圓滑著称的譚延闈的两面派的手法。至于广东、安徽，均未起到作用，福建則被袁收买后，大杀革命党人，不仅可恥，实在可恨。

江西光复和二次革命的亲身经历

欧阳武

(一) 江西光复前后

一九一一年秋，前清政府軍諮府陸軍部在永平舉辦秋操，電召各省派軍官赴京看操，我是江西派去看操軍官之一。秋操尚未開始，武昌已于農曆八月十九日起義了。當時我在北京親眼看見清朝政府驚惶失措、手忙腳亂的種種現象。陸軍部大臣蔭昌奉命統率大軍南下，遲遲其行，聞用火車裝運罐頭洋酒食品等物就有一、二輛車，可見蔭昌的洋派十足，不像一個軍人。

我與李烈鈞同是留日本學陸軍的，當時又同北來看秋操，秋操既停止舉行，李烈鈞坐海船先幾天到九江。我坐津浦車南下，因當時津浦路北段只修到濟南，南段只修到韓莊，我到濟南後，改坐民船沿運河到韓莊搭火車，再由南京下關搭洋船。經過安慶這一天，正是安慶光復之日，在船頭上看見安慶城樓懸掛白旗，始知光復了的城市都掛白旗，光復軍上衣左袖都套一塊白布。我到九江，知道九江已經光復了幾天，馬毓寶當都督（馬原來是九江五十三標標統），李烈鈞當參謀長，劉世鈞當團長，余鶴松當獨立營營長，都是我的老朋友。我當日進城會見馬毓寶、李烈鈞等，知道江西省城也已在前几天光復了，吳統領介璋為都督。吳是一個老實人，才器不

大，馬、李等都怕他難負此艱巨之責，特派一只小洋船送我回南昌去幫助他。我到了南昌，走進江西都督府（前清藩台衙門），探問吳都督的辦公室，就有人向我耳語，吳都督昨晚逃走了，不知下落，現在是彭程萬當都督。我即找到彭都督的辦公室，看見好多軍官包圍彭都督寫條子，這個要洋錢，那個要官職，鬧得不得開交。彭都督看見我來了，借這個機會擺脫了包圍，與我談了幾分鐘的話。我看他好像很苦惱的樣子。

江西光復後，除在南昌的稱為全省都督外，在九江的稱為九江分府都督，在萍鄉的稱為萍鄉分府都督，廣信、贛州兩地也是這樣，各截留所轄縣份的錢糧厘卡款項，作為軍餉，不足的還要向省城的都督府要。光復前南昌只有陸軍步兵一標，馬炮兵各一營，工輜兵名一隊。光復後，南昌新增步兵四團，還有一些義勇軍或獨立營等，名目很多，其中有些只有三、五支槍，有些僅是背馬刀的隊伍。服裝也是五花八門，有的帽子上扎英雄結，扮成黃天霸的模樣，滿街可見。軍紀之壞，則更使市民頭痛。彭都督在這種混亂局面下，無法維持地方治安。因我從前所帶的炮兵營已經由左隊長劉稜升任營長，乃由吉安府旅省同鄉賀贊元等公推我回吉安招募民團兩團，加以訓練，準備作為整頓江西軍隊的基礎。我同意這個辦法，密與彭都督商量，他亦表同意。我即回吉安招募了一團兵，因籌款困難，又因與當時的吉安府知事易順豫意見不合，我乃辭職回到南昌。此時彭都督因干不下去，特派賀贊元去九江請馬毓寶來省城當都督。豈知馬毓寶接任都督後，也是一籌莫展，既管不了軍隊，也管不了幫會在街上的胡作非為。於是江西臨時省議會開秘密會議，請我去湖北前綫找李烈鈞回省當都督。我乃以江西都督府顧問的名義前往湖北前綫慰勞江西派去北伐的隊伍。我到湖北黃

波县祁家湾李烈鈞驻地后，密与李商量回赣计划。适值当时南北正在停战议和，李烈鈞乃予我以该军参谋名义，到他所辖的各军营中去作联系工作。等到南北和议成功，李烈鈞即申请撤销北伐第二军总司令的组织，以江西派去北伐这一部分队伍改组为南雷支队，以我为支队司令，其队伍约三千人，归北伐第一军总司令指挥。因为南雷支队的兵力，除江西派去的北伐军队外，尚有湖北北伐军（即北伐第一军的炮兵一营在内，当时在前线的北伐军只有三军，第二第三两军总司令组织都已撤消，只保留第一军），故我这个支队就归第一军，总司令为杜式鈞。此时江西临时省议会已经电请南京临时政府任命李烈鈞为江西都督，我率南雷支队为前驱，于某月某日（日子记不清楚）行抵九江。翌日清晨，刘世均、余鹤松等就利用我军的声威，把当时的九江警备司令朱汉涛梟首示众。朱汉涛原是马毓宝当五十三标统时的马弁，以九江光复时推举马当都督有功，马任都督后，朱即要求继任马的九江分府都督，嗣因取消分府都督，乃改为九江警备司令，在九江纵兵殃民，九江人民恨入骨髓，经由刘世均等呈请南京留守府批准法办。所以我的军队一入九江，刘世均等就把朱汉涛杀头，一以消九江人民之愤，一以寒南昌马毓宝之胆，使马毓宝部下不敢抗不交卸。果然，马毓宝一闻朱的死讯，即日离开南昌，江西临时省议会乃派代表来九江欢迎李烈鈞即日回省。我率队伍护送李烈鈞回南昌就江西都督职。李都督与我商量，先把那些原来的坏队伍解散几营，经过整编，建成两个师一个旅。

辛亥革命前，江西的军队有混成协的步兵五十三、五十四两标，马队一营，炮队一营，工程辎重各一队。此外有巡防队五路（前、后、左、右、中），分驻全省各府县。第五十三标驻九江，第五

十四标原駐南昌，宣統三年移駐萍鄉。駐南昌的队伍，除混成協的馬炮兵各一营、工輜隊兵各一隊外，还有中路巡防隊，后改編为步兵第五十五标。九江光复后，江西巡撫馮汝駉派五十五标去攻打九江。五十五标行至中途，即与五十三标取得联系，举起白旗，响应九江，标統庄守忠聞風而逃。

自五十五标开出省城后，南昌各界人士即积极进行光复运动。初本想推举巡撫馮汝駉为都督，馮不肯，但表示对此事也不反对。于是改推江西陸軍第二十七混成協統領吳介璋为江西都督。吳是江苏阳湖县人，南京陸師学堂毕业生，当过江西武备学堂和陸軍小学的教員，清朝候补道，江西的軍官多是他的学生，故大家都叫他吳老师。

十月三十一日夜南昌光复时，是由馬隊营的排长蔡森帶領几个兵从順化門外爬城墙入城，打开城門，放进部队，在巡撫衙門放了几枪，烧了巡撫衙門口的吹鼓亭和一根旗杆。随即宣告江西光复，成立江西都督府。

(二) 回忆二次革命

癸丑討袁之役，一名曰“湖口起义”，一名曰“二次革命”。它的远因可以說是由于辛亥革命果实被袁世凱所窃据，而国民党不甘心这种失败，加以袁暗杀宋教仁案发生，更激起党人的愤怒，因而促成了討袁的决心。至于它的近因則有很多，其中以爭夺湖口炮台总台官一事为最突出。

江西的炮台，分布在馬当、金鸡坡和湖口三个地区，每个地区炮位三台。这三个地区各有一个总台官，总管这三个地区的則称江

西要塞司令官。一九一三年袁世凱任命陈廷訓为江西要塞司令官，陈即派一个姓成（是否姓成，現在記不清了）的安徽人去接任湖口总台官。当时湖口总台官李明揚，是李烈鈞和我的旧部，他平日忠于李烈鈞，也听我的话。那时，李明揚是駐湖口江西陸軍第十团团长兼任湖口炮台总台官，他认为这个总台官是奉李烈鈞命令兼任的，非有李的命令，他不能交卸。陈廷訓曾当过湖口炮台的水兵，也当过湖口炮台的总台官，知道湖口炮台三个台官中有一个台官很得兵心，有些威望，乃改派这个台官去接任湖口总台官。李明揚仍不肯交卸，因他除深得湖口三个炮台全体官兵拥护外，尚有他駐湖口陸軍第十团兵力为他壮威。陈廷訓这个詭計行不通，乃电求我拍电李明揚劝他交卸。当时我是以江西护軍使兼代江西都督，駐节南昌，深慮李明揚不肯交卸湖口炮台总台官，必定会出事故，乃以誠懇的語言，电劝他交卸。果然，李明揚宣布即日交卸。而湖口那个台官正兴高彩烈准备接任总台官之时，陈廷訓第一次派去湖口接任湖口炮台总台官而并未接受到手的那个姓成的安徽人，又請求陈廷訓再派他去湖口接任。因为陈廷訓是由这个成某到北京走孙少侯的路子巴結袁世凱而背叛李烈鈞的，所以他竟听成某之話通知湖口，取銷某台官接任湖口炮台总台官之命令，再派成某去湖口接任。陈廷訓原系湖口炮台水兵出身，他当江西要塞司令，就已经为湖口炮台官兵看不起，今又出尔反尔，一再变更湖口总台官的人选，所以当时湖口炮台的官长头目，約集几十人，到九江陈廷訓的公館，辱罵了他一頓，甚至有叫打的。陈廷訓迫不得已，乃取消任成某为总台官的命令，仍叫湖口某台官去接任。成某不甘心，乃心生一計，赶赴武昌，說有机密事，要見黎元洪。黎問他有何机密事，成某乃詭說：“九江、湖口两地，有‘乱党’想暴动，湖口炮台

官兵已经受了‘乱党’的鼓动，請副总统即派兵去镇压。”当时黎元洪不問明真假，即以副总统兼江西都督的名义，命令驻扎武穴的北軍陆军第六师移駐九江。第六师师长李純即先派兵一旅进驻九江、沙河等地。黎元洪派李純之兵进入九江时，一面报告北京袁世凱，一面于七月四日打电报通知我說，接九江密报，九江、湖口两地有“乱党”想暴动，所以不及先与我电商。我接电后，即复电黎元洪說明九江、湖口两地安宁，并无“乱党”。当时九江县議会和九江商会也都去电武昌，請黎元洪切莫轻信謠言，并請黎元洪即日把李純的兵調回武穴去。九江商会且派了代表去武昌見到黎元洪，当面提出此項要求。黎元洪复电給我說，据南昌、九江、湖口等地各公法团体来电，证明各地都安靖，并无“乱党”滋事，他即去电北京报告袁大总统，并电令李純之兵退回武穴，請我通知江西全省人民释念云云。我接到此电，正庆幸这场风波可以平息下来，忽然又接到黎元洪来电說：頃有张宗杰来見，說他来武昌时，经过湖口，看見炮台旗杆上悬挂“討袁軍总司令”的旗帜，并听說是李烈鈞回到湖口起义。来电又說：前电所說調回李純之兵的話，应待查明湖口无事，然后再来商量。张宗杰是江西武备学堂毕业生，是个吃鴉片烟、沒有品德的人，我等自不信他的話，怀疑他是在黎元洪那里造謠。我乃即召集南昌重要人士商討这件事情，結果主张先派人去湖口調查，如果真是李烈鈞回到湖口，也要請李不必在湖口轻启战端，撤退李純之兵的事，还是应当用文电向黎元洪协商解决。我派去湖口見李烈鈞的三个人中，俞应麓、何文斌两人是李的同学，温学嶠是李的副官，他們都与李烈鈞有感情，可以商談一切。

当俞应麓等三人去湖口尚未回到南昌的时候，江西陆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林虎由沙河来电說：李純的兵进驻九江，咄咄逼人，

并說已将李純派在沙河附近測繪地形的人扣留了两个，請示处理。我复电林虎說：正在向黎元洪說明九江、湖口两地都安靖，并无派李純之兵进驻九江的必要，請黎元洪撤退李純之兵的事，可望以文电解决，囑林虎务須忍耐，切不可开第一枪；并囑林虎說，如李純有电报請释放那两个測繪員时，可即释放。林虎又来电說：李純之兵进驻九江，实已忍无可忍，請下令开火。我又复电林虎說：战端不可轻启，第一枪不可轻放，忍无可忍，亦当暂时忍之。及至七月十一日天亮的时候，林虎由沙河来电报說：今晨拂晓，前綫发生冲突，第一枪是发自李純方面，我方乃决然加以拂晓攻击，幸获大捷，死伤敌人若干，繳获枪弹若干。我复电林虎，大意說：我軍在忍无可忍之下，在让敌人放第一枪之后，勇敢反攻，这就說明了此次战事，是起于袁軍，我們可以告无罪于天下，可以得天下人的同情，并电示林虎，奖給士兵銀元一万元。

七月十一日早晨得到林虎的电报后，俞应麓等三人也由湖口見过了李烈鈞之后回到南昌。俞即通知江西省議會正副議長，請他們召集省議會議員开会。俞出席报告了李烈鈞在湖口起义的情况和林虎的軍队在沙河开战得胜的消息。會議选举我为江西都督(原任江西护軍使)，賀国昌为江西省长(原任江西民政长)，并决定于十二日宣布江西独立^①。七月十二日，我和賀国昌分別就职，誓师并通电討伐袁逆世凱。討袁的通电发出后，震动了全国，各大报都登載了。

此外，还有一些事情与这次战事的发生有密切关系的，我也略述于后。

^① 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曾頒布此日为“湖口起义紀念日”，其实湖口起义是在七月十日。

自宋案发生后，国民党員为都督者，如江西李烈鈞，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湖南譚延闓，福建孙道仁，乃联电攻击袁世凱，要袁解职，听候审判。因为李、胡、柏攻击袁世凱最激烈，故袁先免去此三人都督职，以懾服譚延闓和孙道仁。李烈鈞在江西都督任內，曾与胡汉民、譚延闓、柏文蔚、孙道仁組織五省攻守同盟。这件事虽很秘密，終不免被袁世凱偵知。当时尚有云南都督蔡鍔、貴州都督唐继尧、四川都督尹昌衡也曾以电报攻击过袁世凱，但措詞还不算激烈，所以袁暂时对他們也不計較。我常婉劝李烈鈞，凡攻击袁世凱的电报不宜过分激烈，应学蔡鍔、唐继尧的作风，留有余地。李烈鈞对我說：“国民党常有人來說，現在許多人都不肯說硬話，只有望我李某來說話，所以我不能不說話。”此外，下列几人对二次革命的促成，也或多或少有些影响。

徐秀鈞，江西人，西洋留学生，在国会当議員。他曾在江西当过民国銀行行长，宣統年間在奉天当过徐世昌总督的幕僚。民国初年，一般年轻人多数是穿綢緞制的小袖口长袍，而徐秀鈞則独穿布制的大袖口长袍，很像一个老先生的样子。李烈鈞认为徐秀鈞既富有新知识，又有政治经验，是一个可敬的人。民国元年，李烈鈞在江西被推为同盟会江西支部名誉会长，嗣聞南京来的人說，在南京的同盟会會員常有辱罵黃兴者，李烈鈞认为同盟会的會員品质太杂，正想脫离同盟会。适黎元洪派郭同来江西組織共和党，推李烈鈞当江西支部部长。郭同每在报纸上說同盟会的坏話，徐秀鈞也在报纸上說共和党的坏話。李烈鈞始則同情郭同，嗣因郭同的私德比不上徐秀鈞，乃疏远郭同，听徐秀鈞之言，脫离共和党。徐秀鈞在北京当国会議員时，发給李烈鈞的电报說，他調查了北洋陆軍六个师，軍隊腐败，不足一击，这些电报虽系密碼，但都被袁政府

譯出來了，因此袁世凱甚恨徐秀鈞。而李烈鈞也受了徐秀鈞的影響，以為北洋六個師真是不足一擊。討袁軍失敗後，徐秀鈞被袁所害。

李國珍，武寧人，與李烈鈞同宗同鄉，在日本留學時，兩人感情甚好。但李國珍是共和黨黨員，李烈鈞不願他在武寧當選國會議員，乃使都督府的監印官黃懋鑫回武寧去競選，當選了國會議員。豈知李國珍早就料到了李烈鈞不許他在武寧當選，乃秘密在九江競選，也當選了國會議員。因此，李國珍痛恨李烈鈞，竟以國會議員的名義寫信給袁世凱，說李烈鈞在江西無惡不作，儼然是個江西王，應請下令討伐。這也成為袁世凱免李烈鈞職的一個借口。

戈克安，安徽人，本系九江炮台一士兵，因辛亥光復有功，幾個月內由士兵升台官、总台官、要塞司令官和九江警備司令官。一九一二年，安徽都督更換人，李烈鈞向中央政府保薦戈克安為安徽都督，但結果為柏文蔚所得，而戈克安竟反怨李烈鈞不是真心保薦他，乃是想把他排擠出去，遂對李有惡感。李烈鈞想化除戈克安的惡感，乃請中央政府任命戈為九江鎮守使，並晉授陸軍中將。當時江西的軍官，都說李烈鈞對戈克安特別優厚。豈知戈克安沒有良心，竟與段祺瑞、段芝貴勾結，甘心做袁世凱在江西的內奸。一九一二年下半年，李烈鈞在上海買到了一批槍械，戈克安密報北京陸軍部，陸軍部總長段祺瑞就電令九江海關扣留，由戈克安派兵看守這批軍火。李烈鈞派江西第一師師長俞應龍去北京交涉，北京也派總統府顧問王芝祥來江西查辦，經過二、三個月的交涉，才把這批軍火放行，運進南昌。因此，戈克安反李烈鈞的陰謀全部暴露。李烈鈞乃命令我代理第一師師長，率領第一師全部隊伍進駐德安、沙河、星子、姑塘等地，把九江包圍起來。我駐德安，深慮九江有租

界，一旦开火，难保戈克安不向租界放一把火，招致北京派兵入赣。此时北京陆军第六师李純之兵駐在汉口刘家庙一带，早已想覓机进入江西。戈克安的兵力，除炮台外，只有江西陆军第九团一营和九江炮台护台兵一营。我知道戈克安兵力不多，又知道戈在士兵中沒有好感，乃采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围而不剿。第一师之兵每夜在沙河蓮花洞等处俘到戈克安第九团的兵，都对他們說，我們是討伐戈克安背叛李都督，第九团同是李都督部下，不是戈克安的兵，可以释放他們回去。当时在九江第九团营地和炮台附近卖花生瓜子香烟的小販，都是我派去的在第一师当下級軍官和头目的九江人扮的，他們日日与戈克安的兵閑談，說聞欧阳武只打戈克安不打第九团，因为第九团也是李都督的兵。我这个办法施行了二、三个星期，果然，有一日，第九团的兵与炮台的兵联合鼓噪起来，說欧阳武与我們並沒有仇恨，而戈克安日日夜夜派我們去对付欧阳武的兵，幸而欧阳武不杀我們，否則，我們真死得冤枉，今日我們非把戈克安赶走不可。戈克安見势不妙，乃帶几个心腹随从乘洋船逃出九江。我得到消息，即由德安进驻九江，安撫九江軍民。討伐戈克安的任务遂告結束。

王芝祥，北京通县人，前清候补道，在江西当过常备軍統領，在广西署过臬台，光复时做过广西副都督。他因受陆荣廷排挤，乃請求帶兵北伐，广西給他一营兵。他在广西出发后，黎元洪即任命他为北伐第三軍总司令。他到武汉时，南北和議已经告成。他就赶往北京，当了总統府顧問。王芝祥在汉口时与李烈鈞和我会見过多次。一九一二年冬天九江海关扣留江西軍火一案发生后，王芝祥向袁世凱說：他与李烈鈞感情好，可以說服李烈鈞傾向中央政府，袁世凱就派他来江西查办此案。及軍火发还江西后，王芝祥向

李烈鈞辭行，說要回北京復命，並密向李烈鈞說：“袁世凱是一個帝制自為的人，全靠你老弟來對付他。”及王芝祥回到北京見了袁世凱、段祺瑞，又說：“李烈鈞是一個狼子野心的人，中央對待這種人，只有派兵討伐。”袁世凱知道王芝祥是個滑頭，並沒有理睬他。王芝祥沒有得到袁世凱的重視，又來江西向李烈鈞說：“若你老弟將來向袁世凱用兵，我王芝祥許多地方可以效勞。”北洋五鎮的軍官，許許多多與王芝祥有同鄉同寅的關係。李烈鈞是一個年青好勝而又愛聽恭維話的人，所以對王芝祥以優禮相待。當時戈克安在九江不服從李烈鈞的命令時，王芝祥對李烈鈞說他可以去九江說服戈克安。豈知王芝祥到了九江，又幫助戈克安策劃如何反抗李烈鈞。迨我把戈克安趕走后移駐九江，與王芝祥會晤，王芝祥又對我說：“九江是第九團駐防地，你的兵與第九團對壘一個多月，你來九江可以，但為避免衝突，請你切莫帶兵來。”我回答說：“我只帶來馬弁六名、副官兩員而已。”我明白了王芝祥的用意，是想奪取第九團的兵力而繼戈克安為九江鎮守使。當時我辭別王芝祥，即帶馬弁六名前往第九團團部會見該團團長，對他說：“你們如果信得我過，就請你通知連長以上的軍官，明日下午一時到南潯鐵路局來開個會，大家商量目前九江治安問題和第九團前途問題。如若你們信我不過，你們就在这个時節把我打死，或今夜派兵往我的寓所南潯鐵路局殺掉我也行。”我自第九團出來后，又到一、二、三營營部與各營長見面，把上述的話重說了一遍，然後回到寓所，以電話通知機關槍營，派了十幾個便衣兵用鋪蓋卷了兩支機關槍來九江。是夜安靜無事，第二日下午一時，第九團團長、三個營長和十二個連長都到南潯鐵路局開會。我誠懇告訴他們：“你我都是李都督的部下，本來是一家人，只因戈克安想利用你們反叛李都督，今戈克安已

走，我保证李都督今后仍把你们看作是自己的子弟兵，并保证第一师的人，仍旧对你们看作是自己的兄弟兵。”这一席话，感动了第九团全体军官，他们齐声说：“第九团从此服从欧阳师长，请欧阳师长放心。”过了两星期，第九团团长因目不识丁，恐怕干不下去，呈请长假，由李都督改派周壁阶为团长。周壁阶是云南讲武堂学生，讨袁战争中英勇作战阵亡。原来的老团长在湖口起义后，潜来湖口，想诱惑第九团士兵，经士兵举发，捕获正法了。第九团后归黄旭带领。

汪瑞闿，安徽人，前清候补道，在江西当过武备学堂总办、大学堂总办、常备军统领和署江西臬台，此后又当过上海警察局总办和湖南盐道。郭同是江西大学堂学生，李烈鈞是江西武备学堂学生，郭、李二人都认汪瑞闿为老师。一九一二年，各省军民分治，郭同建议李烈鈞请汪瑞闿为江西省长，李烈鈞同意，派郭同去上海征求汪瑞闿的同意后，即电请北京任命汪为江西省长。汪瑞闿自见到郭同后，喜出望外，电知李烈鈞即日来赣作客。李烈鈞得九江电报说汪瑞闿已到达九江，很高兴地对我说：“汪老师要来江西看看我们，现在已到九江，明后日就可到南昌来，你我都是他的学生，应当热热闹闹欢迎他，一则表示我们尊重老师，二则表示我们当学生的今天也不错。”岂知汪瑞闿在九江耽擱五、六天没有动身，直到北京发表了他为江西省长，才来电动身来省。李烈鈞接到汪瑞闿这个电报，气得跳起来说：“这种甘心做袁世凯走狗的人，何能使他在江西做省长？”李烈鈞又对我说：“我们前几天商量欢迎汪瑞闿的一些事情一概取消。我们原想欢迎他来江西作贵客，他却迟迟不来，昨日袁世凯发表他为江西省长，他今日就动身来省，这样的人，尚够得上受我们欢迎吗？”汪瑞闿到南昌没有受到一点欢迎，反而不得不先到都督府拜会都督。李烈鈞对我说：“请你先到客厅去见他，说

我有事，要等一会才能出来。”我劝李烈鈞不要过分生气，說：“我們沒有去欢迎他，就足够使他难看，今他来拜会你，也就算了，何必再生气。”李烈鈞說：“今日我們不給他一点官架看，将来不容易使他就范。”李烈鈞不高兴汪瑞闈的話传出后，就有两个人出面反对汪瑞闈，一个是全省警察局局长陈廷訓，一个是水上警察局局长蔡銳霆。陈廷訓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人，恐怕警察局归省长管辖，必定难以保全地位；蔡銳霆是汪瑞闈在江西当武备学堂总办时开除的学生，也恐怕水上警察局归省长管辖，难以保全地位。于是这两人結合起来，大事宣传李都督反对汪瑞闈为江西省长，并揚言如果汪瑞闈不即日离开江西，他的性命就难保全。蔡銳霆的粗暴和杀人不眨眼，是南昌人所共知的。汪瑞闈見事不妙，乃即日离开南昌，直往北京，向袁世凱哭訴李烈鈞如何侮辱他。袁世凱說：“你是李烈鈞电保的人，何至于此？”乃派王芝祥来贛查办。王芝祥抵贛后，知道汪瑞闈此时不适宜在江西当省长，乃借俞应麓同伴入京，把这些情况报告袁世凱。袁世凱始允在汪瑞闈未到任以前先派一人代汪为江西省长。俞应麓在北京与江西同乡商量，保荐赵从蕃（赵是江西南丰县人），如李烈鈞同意，即請复电。李烈鈞一面复电北京同意，一面把此事告知江西省議會正副議長，并請轉告全体議員。这晚正副議長出了都督府之門，即往妓院吃酒打牌，不及召集全体議員談話。第二天早上报纸上登出了北京任命赵从蕃代理江西省长的新聞，省議會各議員譁然，大罵袁世凱独裁，即日开会，反对赵从蕃代理江西省长。当时正副議長既不敢說明李都督已于昨夜告訴他們，只因他們吃酒打牌，沒有对大家說話。我对李烈鈞說：“此事既先得了你的同意，你又請了两位議長轉达各位議員，今日之錯，是两位議長吃酒打牌，把事情耽誤了，你应当向各位議員說明一

声，赵从蕃出长江西是先得了你的同意才发表的。”李烈鈞对我說：这件事不好說明，說明了，两位議长要受攻击，只好讓他們去鬧吧。”李烈鈞又說：“光复后，正是民意伸张的时节，我們不应当抑制民意。”因此，袁世凱果然信王芝祥的坏話，說：“李烈鈞这个人是不可以理喻的，只有派兵討伐。”

当李純的兵进入九江之后，李烈鈞尚未到达湖口之前，我深慮李都督进入江西后与江西軍隊发生冲突。先是李烈鈞在江西时，曾与广东、湖南、福建和安徽結成五省同盟，这时除安徽孙多森是北京派的新人外，陈炯明、譚延闓、孙道仁均系国民党黨員，可与商量。于是我乃将黎元洪擅調李純之兵入贛，必定要酿成战争的事，电告陈炯明、譚延闓、孙道仁，問他們如一旦发生了战争，李都督在任时所締結的攻守同盟，仍然有效否？这个电报发出后，首先得到陈炯明的复电，說：“广东与李都督所締結的同盟，仍然有效，如果李純之兵敢向貴省发动战争，决不使貴省独受其难。”我乃将陈炯明来电轉告譚延闓、孙道仁，問他們的意見究竟如何？那个时节，湖南是程潛当軍务厅厅长，福建是許崇智当第一师师长，可以分別左右譚、孙的行动，故譚、孙都复电給我說，同意陈炯明的話，如果一旦开火，一定派軍隊来贛支援。战争开始后，我乃电請广东、湖南、福建即速派兵来贛支援。陈炯明复电說：“即日派駐韶关的軍隊一旅出发援贛。”譚延闓复电說：“正准备派唐蟒率兵一团来贛，但湖南沒有枪械，請貴省发給枪弹。”翌日譚延闓又来电报說：“自貴省战事发生后，袁世凱派奸細把湖南的火药庫爆炸了，現在岳州吃紧，請貴省协助湖南步枪子弹一百二十万发，現派某某前来貴省具領。”我为顾全五省同盟之誼，即先給予九十万发子弹，交来使領去。而唐蟒的徒手兵一团，等到江西战事完結的时候才到。

福建援兵，始終沒有出發。廣東援兵，行到粵贛邊境又折回去了。這次戰爭，名曰有五省同盟，其實只有江西一省獨立作戰。

當黎元洪派李純之兵入贛的支電傳出後，國民黨重要成員都聚集上海孫中山先生寓邸開會，有主張對袁世凱開戰的，有反對的，議論紛紛。其時有人對李烈鈞說：“今日之事，非協和先生領先不可。”李烈鈞毅然回答道：“當仁不讓。”於是大家推舉李烈鈞為討袁軍總司令，即日赴湖口起義。當時江西第一旅旅長林虎、第五旅旅長方聲濤也在滬，遂隨李回贛。李被推舉為討袁軍總司令後，以為這個名義可以指揮全國討袁軍的隊伍，豈知嗣後又推舉了黃克強先生為南京方面的討袁軍總司令，胡漢民為廣東討袁軍總司令，譚延闓為湖南討袁軍總司令。李烈鈞對黃克強先生是相當尊重的，不好以命令指揮他，因此也就不好以命令指揮胡漢民、譚延闓了。結果，李烈鈞討袁軍總司令的職權，只能指揮江西一省的軍隊。這個消息傳到南昌後，我以為各省都有一個討袁軍總司令，職權相等，沒有一個高於這些總司令的人出來領導，豈不開成群龍無首嗎？這種情形是很危險的。我一面電湖口與李烈鈞商量，一面電上海請孫中山先生出任全國討袁軍大元帥，以總其成。孫中山先生復電不允。我又通電征求廣東、福建、湖南三省都督的意見。大家認為孫中山先生不肯擔任討袁軍大元帥，而黃克強只能擔任南京一方面，李烈鈞只能擔任江西一方面，無可奈何，只有電請岑春煊出來擔任討袁軍大元帥。岑春煊是前清做過督撫的人，與袁世凱不睦，同情國民黨，有意出來擔任這個職務，但是此人舊官僚的作風十足，不肯痛痛快快接受，却要故示謙讓，及聞戰事不利，自然就不肯出來了。

七月十一日開戰後，因李純第六師的兵未全部到達江西，且以

入地生疏，作战上有些困难，而江西的兵，一因地形熟悉，二因以逸待劳，三因出于不得已而战，人人激愤，所以战争的初期屡战屡胜，使李純心惊胆寒，夜夜退到停泊九江的軍艦上去睡觉。江西的軍隊，除第一、第二两师八个步兵团外，尚有第五旅的两个步兵团，不但老兵个个奋勇，即新兵刚学会托枪，亦个个申請派上火线。但是，由于以下种种原因，战争终于失败。

第一，李純之兵初入九江时，江西尚有伍毓瑞所率第三团一营兵和李定魁所率第五团两营兵在九江，沒有調回南昌。沙河开火后，伍、李两团长所率的兵共有三营，本可以在敌人的后方发动一个攻势，伍毓瑞与李定魁商量，一个攻打陈廷訓九江炮台，一个担任进攻李純的后方，杀出一条路，通往沙河，与林虎的軍隊取联系。李定魁屡約屡爽。迨伍毓瑞偵知李定魁已经变节投降了李純，乃找一小漁船，化装逃到湖口。李烈鈞即派伍上火线，指揮第三团在前线作战的队伍。当时，第二师师长刘世鈞在九江，既不敢与伍毓瑞同伴去湖口，又不願与李定魁同流合污，几乎为李定魁所拘留，幸而有人帶他逃往江北，才脱离虎口。伍毓瑞第三团駐在九江的一营兵，营长郑鳴澍不肯投降李純，宁願繳枪。有些士兵激于义愤，把所繳去的枪的枪机投諸长江水中，然后三三五五，经过汉口、长沙、萍乡回到南昌，往都督府見我。凡持有第三团某营布条证章者，均经我另发证章，命往伍毓瑞处收編，重上火线。其遗失证章者，只要经有证章者证明，亦即照样收編。这一营兵归队的人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可見伍毓瑞平日和士兵是有感情的。李定魁第五团的兵，是前清江西駐九江第五十三标（团）的底子。前清第五十三标标統（团长）刘槐森是安徽人，经段祺瑞派到九江。李定魁当过刘槐森部的队官（連长），所以容易受刘槐森的勾結，这是李

定魁背叛刘世均投向刘槐森的原因。李定魁第五团三营兵，有两营随同团部驻九江，为李带同叛变；另一营在德安随同林虎、伍毓瑞作战，营长郭懋修是郭懋仁的哥哥。这营兵是前清第五十四标的老底子，原系郭懋仁当营长。郭懋仁是江西武备学堂学生出身，曾当过团长，由他保荐郭懋修继任该营营长。李定魁叛变后，派人秘密送信给郭懋修，叫他叛变。有一日正是我军打胜仗的时候，郭懋修忽然叫他的队伍向后转放枪。我军发觉后，即把这一营包围起来，问他们何以向后放枪？士兵回答不出，郭懋修即乘隙逃走。于是这营兵始知被郭懋修所愚弄，不再跟郭懋修叛变，仍愿归郭懋仁指挥，继续作战。因郭懋仁这时也在前线工作，所以仍叫郭懋仁兼任这营的营长。假使这一营兵不是第五十四标的老底子，而是第五十三标的底子，则为害更大。我军经过这一变故，军心已遭到很大的震动。相反，李纯那方面的军心，则因此兴奋起来了。我方从此节节转胜为败，敌方则从此节节转败为胜。

第二，姑塘方面，我军第九团团长周壁阶，青年勇敢，穿有肩章领章的黄色呢军服，戴有金边的新军帽，站在火线上，测看对方敌情，以致暴露了目标，为敌人的炮弹击中而阵亡。因此，军心也遭到了很大的挫折。加之北京派了第九团的老团长前来勾结，虽经一部分士兵举发，把那个老团长在湖口捕获正法，然而总有一部分军心不安。方声涛旅长乃不得不将第九团全团队伍调回南昌整编，以致使全战线动摇，与德安方面一样，开始转胜为败了。

第三，湖口方面，得上海孙中山先生电报，告以在上海收买了海军某某军舰九艘，前来湖口助战，并以此事通知马当炮台，说明这几艘军舰经过马当时，切勿拦阻。这几艘舰只，经过马当和驶近湖口时，都没有受到拦阻。当湖口炮台鸣号欢迎他们的时候，他们

竟向炮台开炮射击，并向总司令部开炮。这时李烈鈞已经离开湖口，迁往吳城去了，留在湖口的何子奇、方声涛终于不得不放弃这个障地。

我軍节节失败的时候，甚盼各省援軍早来。但天下人都想锦上添花，哪肯雪里送炭。因为我們的軍事一經現出敗象，广东、湖南、福建都不敢履行同盟义务。所以直到战局快要終結，也沒有見到一个援兵。

到了最后，我看見这种兵敗如山倒的形势，又得不到邻省的援助，乃电告李烈鈞不以南昌为障地，以免南昌毀于兵火。于是我先退到吉安，后入青原山为僧，改名止戈和尚。李烈鈞退到长沙，由譚延闓发些川資，将李带入湖南的队伍全部繳枪遣散。李烈鈞与林虎則由长沙逃往上海。

以上所述，就是癸丑討袁之役中我的亲身经历。

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

龔 师 會

一九一一年，江西随着武昌起义之后而宣告克复，师會亦曾参与其事，謹以个人回忆，反映一鳞半爪。

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想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倡导君主立宪运动。这一运动在江西颇为活跃，为首的有陈三立、文廷式等人。戊戌维新失败，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要想挽救国家危亡，只有推翻清朝。

一九〇四年，由张惟圣、邓文馨等发动，组织了易知社。这个社表面上是研究学术，交换知识，实际则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清朝的革命组织。社址设在皇殿侧，社员发展到六十余人，每人每月缴会费官钱四百文，购备各种书报杂志，供社员阅读。社长张惟圣，副社长虞惟煦。社员有张惟和、曾堪宇、刘天择、孙作肃、蔡锐霆、龔师會等。它与同盟会的黄兴取得联系。当时黄兴主张要推翻清廷，须从军队着手，因而该社社员多数学习陆军。一九〇六年，该社抓住法国神父王安之杀死江召棠的案件，进行宣传活动，掀起了一场反帝斗争（即所谓南昌教案），影响颇巨。后来大多数社员都参加了同盟会。

孙中山先生曾派黄格鹑、魏会英等回江西建立同盟会支部，黄格鹑被任为同盟会江西支部长。他是清江县人，回到南昌便在

福巷成立了江西支部，展开了工作，积极办理会员登记和入会申请等手续。当时江西人民革命意志昂扬，参加同盟会的人很多，因此组织发展很快。一九〇六年，江西组织新军，同盟会派了不少会员投入新军，因而辛亥革命时，江西的新军几乎全操在革命党人的手里。同盟会会员李烈鈞，在新军里也有过一定的贡献。

魏会英是赣州人，他回赣州后，即同张周垣、魏苻丹等成立了同盟会赣州的组织，创办了印刷工厂、报纸、学校等，进行革命活动。魏苻丹精练拳术，辛亥革命前夕，官厅屠杀剪髮者的时候，他拿着一把大剪刀，冲进官衙，把道台、府台的辮子都剪掉，使官厅不敢再乱杀人了。

同盟会会员张世膺、彭素民、邓文翬、蔡锐霆、丁笏堂等，对于辛亥革命也都各有不同的贡献。张世膺在江西高等学堂时，就在同学中鼓吹革命，被清廷命令捉拿，逃往日本，改名张华飞，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返国，被聘为北洋第六镇参谋长。辛亥革命时，清廷下令第六镇开赴武汉，镇压革命，他联络镇统吴祿贞，在石家庄按兵不动，因而与吴祿贞一道，被袁世凯所杀，墓在石家庄铁路旁。

彭俭，清江人，为革命参加新军，在新军中做士兵工作，被清廷侦悉，下令缉拿正法。他得李烈鈞帮助，离开新军，改名彭素民，同黄介民等考入闕江师范去了。当时江西巡撫遍查新军花名册，没有彭俭之名，只有一个叫彭克俭的（李烈鈞营的队长），于是，就胡里胡塗地把那个彭克俭拿去杀了销案，而且，向清廷申报时，还说彭克俭就是彭俭哩！

邓文翬是日本东斌学校学生，一九〇六年东渡日本，与黄兴派革命党人时相过从。同盟会准备是年冬在浏阳起义，他即回国，与

蔡銳霖組織了萍鄉革命軍，參加了瀏陽起義。失敗後，再度亡命日本。

此外，在江西各地也都有同盟會黨人的活動，惜以時日過久，已經記不起來了。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爆發辛亥革命後，代表雲南去參觀河南秋操的李烈鈞，乘機潛回九江。因當時駐九江的馬毓寶統率的新軍五十三標中的官兵，多屬李烈鈞的同事同學，李利用這種關係進行策反，九江即於十月二十三日正式宣布獨立。馬毓寶被推為九江都督，李烈鈞為參謀長，蔣群為參謀處長。

南昌方面，在武昌起義後，張難先、孫武等派了丁笏堂攜帶文件回南昌，策動黨人鼓動新軍起義，聲援武漢。丁回南昌後，即與黨人秘密聯繫，進行策劃，並邀周兆麟草擬文電，準備起義。九江獨立後，同盟會即於農曆九月初七日在工兵隊召開秘密會議，商討起義計劃，到二十餘人，當決定準備於十月三十日晚起義。推定騎兵營排長蔡森（工兵隊長蔡杰的胞兄）為爬城隊隊長，要他挑選勇敢精壯士兵，組織爬城隊，進占南昌城，舉行起義，一面與巡撫衛隊中的黨人聯繫，要他們把撫台衙門守衛的聯珠炮炮門及軍裝庫各庫的鎖匙繳來；又推周兆麟向警察方面接洽，要李柏年率騎兵一部進城占領軍裝庫。這時，官方所掌握的武力，只有炮兵營及綠營各營隊而已。

當然，封建王朝的反動統治階級，它是不会甘心退出政治舞台的。江西巡撫馮汝駸於武昌起義後，即調河口駐防的綠營來省，防制新軍，還將過去用來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聯珠炮擺在撫衙大堂兩傍，恐嚇人民，並招募外地籍新兵一百名，擴充衛隊。九江獨立後，更令吳介璋召集駐省新軍全部集合於大校場（即今八一禮堂地

方)讲话,采用欺騙收买的怀柔政策,说什么藩庫現存紋銀二百余万两,粮盐仓儲丰富,可以支持三年两載沒有問題;并宣称从农历九月起,对在省的官兵一律发双餉,企图借此收买心人。可是,他扩充的卫队,同盟会即暗派童玉山、王有才、薛洪保等混了进去,举事前即先夺取了联珠炮炮門及軍装庫的鎖匙。他的欺騙、收买的怀柔政策,完全破产。在同盟会党人积极策动下,新軍遂于十月三十日夜間起义。蔡森率領爬城队于夜晚十一时三十分鐘爬进南昌城,打响了第一枪。警察和撫台卫队先有联络,即行內应,把城門全部打开。十二时,方先亮率領新軍騎兵营,蔡杰率領新軍工兵队,宋炳焱率領新軍輜重队,李柏年率領騎兵营士兵一部分,蜂拥进城。警察用石油纵火焚烧了皇殿和撫台衙門兩側的鼓楼、旗杆。这时,反动王朝的走狗馮汝駉,听到滿城枪声,卫队也已起义,吓得心惊胆落,赶快从后門逃走。南昌遂全部为起义軍所占領。

次日,同盟会党人召集各界負責人在合同巷万寿宮商会开会,决定通电宣告江西独立,并推举吳介璋为江西都督,刘凤起为民政部长,雷恒为財政部长,李瑞清为文事部长。后因李瑞清由上海复电,不允就职,即以副部长熊育錫代理。

十一月一日,吳介璋正式宣布就都督职,派吳宗慈为都督府秘书长,夏之麒为參謀厅厅长,朱寿同为軍务厅厅长,王祿之为总务厅厅长等。于是,清朝在江西的統治,遂完全被推翻。并以铁血十八星旗代替国旗,改紀元为四千六百〇九年。規定以青蓝布衣为礼服。废除了作揖、跪拜的封建礼节,剪掉了男子拖在身背的长辮子。

十一月二日,吳介璋召集軍界各負責人到都督府开軍事會議,决定成立义勇队,赴鄂增援革命軍,当委蔡森为标統,筹备率队北

伐，同时按照新軍組織，着手整頓和改編軍隊。根据党人計劃，下令查抄部分最反动的貪官污吏石守謙等的財物。但对于社会经济制度，却没有什么变革，而且扩軍购械，还加重了人民的負担。

吳介璋就都督职后，专注意扩充軍隊，对于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制度的改革等漠不关心，不久即改由彭程万继任。

这时，武昌起义已有月余，清廷犹作垂死掙扎，派袁世凱統軍反攻武汉、南京，企图扑灭革命火焰。彭程万接任都督后，有鉴于此，乃派巡防統領馮嗣鴻部开赴武汉援鄂，派巡防統領刘懋政部开赴南京援宁，因該两巡防統領所属部队，原是綠营改編的，紀律废弛，彭程万恐酿成兵变，糜烂地方，乃設法乘机調开。出发前，彭召集两部官兵訓話，晓以大义，囑努力作战，灭清复汉，并发給薪餉、弹药和装备及开拔費等。不料因此引起起义新軍的不滿，因为他们們原已决定了組織义勇队，由蔡森率領援鄂。于是，他們秘密开会，酝酿倒彭迎馬，还推定方先亮、蔡杰、蔡定波三人去潯，迎馬毓宝来省做都督，蔡森則留省管理部队。

当时江西全省虽已独立，但五个都督分立，各不統属。彭程万都督在南昌，馬毓宝都督在九江，胡謙都督在袁州，蔡銳霆都督在瑞临，黃金台都督在鄱阳，各占一方，形成割据。当彭程万聞悉方、蔡去潯迎馬的消息后，他即自动取消都督，并电劝胡、蔡、黃三都督一同取消，让馬毓宝做江西都督，以謀江西省政的統一。因彭程万以身作則，三氏一致复电，表示贊同。于是，馬毓宝即在彭程万的通电和各方的迎接下，同方先亮、刘麒等来省，就了江西省都督的职位。

馬毓宝就职后，即行改組都督府，調夏之麒为高等軍事顧問，派刘麒为參謀厅长，免軍务厅长朱寿同职，派方先亮接充，只总务

厅长王祿之不动，各厅的科、司长亦多更动。馬毓宝更召集同盟會員、起义人員及各机关团体負責人开会，商討改組各机构。当推定賀贊之为民政部长，邹树声为财政部长，楊綸为文事部长，罗家衡为外交部长，蔡公时为交通部长，邱冠芬为內政部长，胡繹为司法部长，并委吳照軒为警察厅长。又将全省学生軍改編成一标，派蔣群为标統。蔡森則由于其兄在九江被刘麒玩枪走火打死，方先亮、李柏年两人原統率的部队都归他統率，掌握了兵权。刘麒做了參謀长后，多拨了些款項和枪支子弹給他，充实了他的兵力。

都督府改組就緒后，馬毓宝即电袁州胡謙，囑抽調軍隊編成一支队援鄂，由周維綱率領开赴武汉；蔣群則率領学生軍(志願軍)一标，开赴南京援宁。这时，全国宣告独立的已有十余省，上海都督陈其美来电請派代表赴沪，商組中央政府。馬乃派林森、赵士壮、王有兰、俞应麓、湯漪五人为代表赴沪。

孙中山在南京就任大总统后，接到江西人民对都督馬毓宝的控訴，于是下令罢免了馬毓宝，任命武汉第二軍軍长李烈鈞继任江西省都督。馬毓宝原掌握有相当实力，做都督后，又与洪門会联成一气，实力更厚。他自得到易督的消息后，即密謀抗命拒李。同盟会党人发觉了馬毓宝的阴謀，便提出了“杀猪宰馬”的口号，积极在其軍隊中进行倒馬活动，并于三月某日，由刘世均帶領队伍，把九江卫戍司令部包围繳械，将馬毓宝的心腹九江卫戍司令朱汉涛打死，解决了馬毓宝的基本武力。李烈鈞在武汉奉到命令，乃与黎元洪、孙武等协商，抽調欧阳武、龔少甫、李明揚、吳懋松、郭寿山、卓仁机等的部队和楚同、楚豫等兵舰，統率海陸軍回江西接任。这时，馬毓宝因受同盟会党人的倒馬活动的影响，已无抗拒力量，于是他遂潜逃了。

李烈鈞在武昌起义后、出任江西都督前的一些作为是值得记述的。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李策动九江独立后，接收了九江金鸡坡炮台和馬当炮台。清朝調派海軍閩江艦隊开往汉口协助扑灭起义軍而进至九江时，他指揮炮台发出信号，禁止閩江艦隊上駛，使閩江艦隊在金鸡坡和馬当炮台的夹击威胁下，进退維谷，而不得不接受李烈鈞所派林森的劝說，全部起义，壮大了革命力量。李烈鈞在九江部署就緒后，即与馬毓宝协商，請馬分拨兵力給他統率援皖，把參謀长职务交由蔣群代理。馬当即同意，抽調两队人馬交李烈鈞带去，一队为黃煥章部，另一队即将閩江艦隊的陆战队和机关枪部队編成，派龔少甫为队长。李烈鈞亲自指揮，开赴安庆。在他出发之前，事先秘密派了党人与安徽同盟会党人联系，他率領部队一到达安庆，即召开秘密會議，布置一切，于十月二十七日起义。安徽巡撫朱家宝見全城已悬挂起义白旗，他亦不得不表示贊同。因此，同盟会革命党人召开各界代表會議，宣布独立，并公推朱家宝为安徽都督。朱家宝出示安民，竟公然以安徽巡撫兼安徽都督落款。群情大嘩，迫使他把安徽巡撫头衔取消。不数日，黃煥章部兵变，即乘机逃走。

安徽省于黃煥章部兵变时，即調胡万泰部开抵安庆，維持秩序。李烈鈞与胡万泰是同学，亲自出城迎接，并表示对不起皖人。胡万泰被推为安徽省都督后，李烈鈞商請胡拨部队归他指揮，开赴汉口援鄂。胡当允拨出吳懋松、李明揚、郭寿山等部。于是，李烈鈞即率領贛皖联軍援鄂。

李烈鈞一到武汉，黎元洪即委他为第二軍軍长，率部助战。李为壮声势，又派湖北人藍軍恒招募民兵，开赴前綫助战。段祺瑞以与李有师生关系，欲謀誘降，为李严詞拒絕。

一九一二年夏，李烈鈞奉命任江西都督，率領海陸軍隊，浩浩蕩蕩，回到南昌就職。遂改組都督府，進行廢部設司的大改革。以陳澤沛為參謀長，劉世均為軍務廳長，龔少甫為稽勛局長，龔延渤為銓叙局長，士初為印鑄局長，歐陽武為都督府警衛軍司令，魏斯旻為財政司長，鍾震川為內政司長（鍾死后由羅家衡繼任），王侃為司法司長，宋育德為教育司長，胡澤為交通司長，李國樑為工商司長，胡蕙為外交特派員（不再設司）。江西政權，從此遂完全為同盟會人所掌握。

江西在一個短時期內五易都督，變動頻繁，而其中最使李烈鈞感到棘手的，就是省庫空虛，財政支絀萬狀，一籌莫展。光復後江西省查抄沒收封建官僚的貪污贓物，早被朱壽同等飽了私囊，藩庫庫銀，鹽局鹽封，牙厘局厘封，又被馬毓寶搞罄，官銀錢號早已被劫一空，加之匪禍不寧，各縣情況複雜，解款不至。李烈鈞曾向省內著名的資本家危子垣、陳德懋等商借不得結果，遂採用硬逼手段，危子垣竟被逼自殺。後來李烈鈞改變辦法，邀徐秀鈞幫助整理財政，開辦了民國銀行，發行了地方紙幣，活躍了金融；開設公典，並派黃緝熙為西岸權運局局長，大抓鹽運鹽稅，克服了財政上的困難。於是，李烈鈞有了擴充軍備同袁世凱作鬥爭的經濟基礎。

洪門會原是反清復明的一種秘密組織，但品類不齊，李烈鈞為了統一政權，開展了同洪門會的鬥爭。清朝末年，洪門會首腦彭木香、洪寶琳、陳細鬼、梅福祥等，都因案關押在監獄里。光復後他們釋放出來，秘密進行組織活動，遍及全省。吳介璋的民政部長劉鳳起，原是保皇黨人，他的個人野心很大，企圖掌握兵力，作為政治資本，因在全省各地組織民團。洪門會通過民團的組織，大肆發展。因此，洪門會與民團，幾乎成為一而二、二而一的組織。民團

薪餉，不从省庫开支，概由各地自筹，自然不免要騷扰，也因而引起了人民的怨言。滿脑袋封建思想的馬毓宝当然不可能合理解决这一問題，乃用所謂“調虎离山”之計，派彭木香統領民团，駐扎鉛山河口鎮。黃吉人、楊祖时前后被派整頓民团，均无結果。李烈鈞借詞召彭木香來省會議，當場將彭木香拘押审讯，判处死刑，又接受人民控訴，將南昌洪門會首腦洪宝琳交軍法捕审，执行枪决；同时，下令將民团解散，当然也株連了不少无辜的人民。当时輿論认为这是李烈鈞的一大功績，特别是博得上层人士的称許。

李烈鈞为了扩充軍隊，提高軍隊素质，接收陸軍速成学校，开办了讲武堂，聘請夏之麒为讲武堂堂长，訓練軍事干部，积极扩充軍隊。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孙中山先生辞临时大總統职后，李烈鈞便将原大總統府警卫軍的林虎部队，請准調來江西，改編为江西第一旅，林虎为旅长。袁世凱就任临时大總統后，通令各省縮編軍隊，李烈鈞不接受，坚持江西省要保存軍力，結果，江西仍編成两师一混成旅，任欧阳武为第一师师长，龔师曾为參謀长，林虎为第一旅旅长，余維濂为第二旅旅长；任刘世均为第二师师长，徐定青为參謀长，赵复祥为第三旅旅长，蔡森为第四旅旅长。

这年八月，同盟会改組为国民党。是年十月，孙中山先生以大總統特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的名义，來江西視察。記得孙先生当时在群众欢迎大会上演說指出，他現不担任政治之事，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并說計劃于十年內建筑二十万里铁路，願国人努力贊襄，俾底于成。当时沒有国歌，群众欢迎时唱的是“二十万里路走龙蛇”的歌子。孙中山先生路经九江，看到帝国主义者利用九江城牆，大悬广告，便問九江警察厅长周兆麟：“城牆上各国遍竖广告牌，是否已向我国租用？”孙先生听周兆麟回答說各国并未投租，

当即指示：“按照外国法律，在某处竖立广告，既要得主人同意，还须缴纳一定的租金。”周会意，回厅即向各国领事发出通告，限三日內把各种广告牌撤销。各国领事和洋行皆置之不理，周到期即派警将全部广告牌拆掉，同时收回了租界口铁门的启闭权。各国领事提出交涉。可是，周兆麟赴省去见李烈鈞都督报告经过时，李都督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嘉奖他说：“外国人控告你，你的处理是很好的。”

李烈鈞向孙中山先生表示，坚决反对袁世凯的阴谋。同时，他暗中派了徐秀鈞到各省联系，并赴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等各处活动。徐秀鈞经常有密电向李烈鈞彙报，因而，李得知袁世凯的种种阴谋，由此，更加增强了李烈鈞反袁的决心。

袁世凯企图镇压国民党的反抗，继任命戈克安为九江镇守使之后，又派了汪瑞闓为江西民政长，并暗使余鹤松携款来江西运动军队，造成内部矛盾。袁世凯的这些阴谋，是很毒辣的。余鹤松原是马毓宝的混成旅旅长，被李烈鈞编遣后，没有给予适当位置，遂愤而去北京，由陈宦、蒋作宾介绍谒见了袁世凯。余鹤松自诩与李烈鈞资格相等，江西新军的官兵都是他的同学或部属，并列举了李烈鈞反抗袁世凯的事实。袁即欲利用他来倒李。有一天，袁世凯约余鹤松到总统府谈话，在客厅谈话未了时，袁如厕，走至窗外遇一幕僚，袁大声对幕僚说：“我现在才知道余鹤松是江西的一个特别人才”。故意使余鹤松亲耳听到。后又邀余到府，商谈如何倒李，并赠送金钱若干，作为活动费用。临别时，又拍他的肩头说道：“老弟，江西的事，我就交托你了。”余鹤松携款潜回南昌，在孙中山先生离开江西不数日，他就策动了南昌兵变。李烈鈞派欧阳武部镇压叛乱，余鹤松逃往北京，袁世凯派为陆军部参议。

汪瑞闈原是李烈鈞在武备学堂时的老师，清时会署过江西臬台，李烈鈞在日本士官毕业回国后，因汪函荐之力，得充新军营长，后李因贪污撤职，汪又为李说项解脱。汪凭借这一段历史关系，向袁氏谋求江西民政长，并曾先函李示意，李亦复函同意，并请速来，拟先聘为政治顾问，然后再就民政长。汪却到了九江仍不来省，迨袁世凯发表任命后，次日即到南昌。因此种种，李烈鈞在汪去拜会时，故示冷淡，派欧阳武代见。而汪此时交往全是清朝遗老，引起国民党人不满意。江西当时各报，对汪大肆谩骂。

汪瑞闈到赣的第三天，江西省警察厅长周希颐 and 江西省水上警察厅长蔡锐霆同到汪的寓所，对汪说：“请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赣境，否则我们不能负保护你的生命安全之责。”汪见此情形，当夜即潜回北京。袁世凯得到汪的报告，更加痛恨李烈鈞了。在京的江西同乡蔡金台、李盛鐸等，为了调和李、袁的关系，曾出面转圜，先后提出赵惟熙、赵从蕃，电李征求意见，均遭拒绝。李烈鈞派彭程万为民政长，袁世凯亦不任命。李、袁的矛盾，更趋尖锐。

一九一二年冬，袁世凯为了“讨伐”江西，调北洋第六师李纯部开入湖北。李烈鈞接徐秀鈞密电报告后，立即调兵遣将，以资对付。当调原驻赣南的第四旅蔡森部、驻萍乡的第六团李定魁部、驻九江的第九团周燮阶部、驻湖口的第十团李明扬部及第一旅林虎部，开驻瑞昌，第三团伍毓瑞部开驻德安，炮兵第一团刘稜部开驻永修，准备作战。仅第四团和第五团留驻省会南昌。

李烈鈞于是年十二月值知袁世凯以善后为名，向英、法、德、日本、帝俄五国银行借款二千五百万镑，作为发动内战之用的情况后，通电各省，揭穿袁世凯的黑幕，极力反对“善后”借款。

一九一三年一月，李烈鈞为了准备对袁作战，决心肃清内部，

乃派第一师师长欧阳武、混成旅旅长方声涛准备解决九江鎮守使戈克安部。戈克安在九江亦宣布戒严，准备抵抗。正当剑拔弩张之时，袁世凱派了王芝祥来贛調解，商談結果，戈克安自动离职，以王芝祥继任九江鎮守使，耿毅为参謀长。王芝祥接任不久，即回北京，由参謀长耿毅代行鎮守使职务。一場风波，就这样結束。

但是，袁世凱所派的李純部，这时已全部开到了湖北。李烈鈞乃令第一师师长欧阳武和混成旅旅长方声涛，均設司令部于九江，积极准备对袁世凱作战。一九一三年二月，欧阳武派参謀长龔师曾会同第二旅旅长余維濂由长江沿江直上，达到瑞昌，踏看地形，繪画略图，部署作战。三月，又派参謀长龔师曾化装潜入湖北、安徽，偵察敌情。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宋案发生，群情憤慨，全国倒袁的声浪，也随着日益高涨起来。这时，李烈鈞即向广东都督胡汉民、湖南都督譚延闓、安徽都督柏文蔚、福建都督孙道仁、云南都督蔡鍔、貴州都督唐继尧、四川都督尹昌衡等发出通电，呼吁共謀倒袁。各省都督一致表示同情，积极进行倒袁的准备。一九一三年六月九日，袁世凱免去李江西省都督的职务，派黎元洪兼任江西都督，欧阳武为江西护軍使。于是，李烈鈞乘小輪到湖口，轉乘日清公司凤阳丸离职去沪。

李离职后，欧阳武即将第一师司令部迁回南昌，就了护軍使职务；后更奉黎兼都督电令，代行江西都督职权，第一师师长則由参謀长龔师曾代行。因夏之麒随李去沪，陆军讲武堂遂停办了。

李烈鈞到达上海后，即与孙中山先生积极商議討袁計劃，动员各省兴师倒袁，发动第二次革命。当时，国民党内部意見分歧，黄兴、陈其美等对武装斗争无信心，主张听法律解决。国会議員舍不

得离开北京的議席，只想根据法律来进行倒袁，拥护孙中山先生主张的，只有李烈鈞最为坚决。李烈鈞为了策划倒袁，不断派人四出联络。但这时的国民党，已不像清末从事革命的同盟会了，党员大多数都留在北京迷恋“合法斗争”。袁世凯在六月九日免去李烈鈞江西都督后，三十日又免去安徽柏文蔚都督职。孙中山先生因而更为愤怒，即于七月上旬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人会议，决定兴师讨袁。当即派黄兴赴南京，陈其美在沪，李烈鈞返江西，谭人凤回湖南，朱执信去广东，龔振鹏回安徽，一起发动第二次革命。李烈鈞当即回江西，于七月七日到达湖口，即着手编配部队，拟定作战计划，召集各部队首长开军事会议，面授机宜。李烈鈞就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并兼正面军司令。派江西混成旅旅长方声涛为左翼军司令，江西第一旅旅长林虎为右翼司令，原江西讲武堂堂长夏之麒为参谋长。

李烈鈞回到湖口的消息传到南昌后，欧阳武即派军务厅长俞应麓赴湖口向李请示。俞回南昌后，欧阳武即召集全省机关首长、省议会全体议员以及各党派各团体的负责人，在天后宫省商会举行讨袁大会，当场决定一致签名通电讨伐袁世凯，推定李烈鈞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欧阳武为江西都督，俞应麓为军务厅长兼兵站总监，宣布江西独立。通电于七月十二日发出。共和党人未出席会议，亦未公开反对。

江西通电发到各省后，黄兴便在南京强迫江苏程德全于七月十五日宣布讨袁，响应李烈鈞的讨袁军。谭人凤在湖南策动谭延闿于七月十七日通电宣布独立。接着，广东、福建、四川等省相继独立。七月二十二日，袁逆世凯即下“讨伐”令，以馮国璋、张勋两部进攻南京，派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率李纯、馬继增等部进攻江

西。并令郑汝成、湯壽銘率領海軍向江苏、江西两省协助作战。討袁之战,于是即在湖口,九江、蕪湖、南京以及长江下游一带发动起来。

欧阳武这时也調了駐省会的第四团吳安伯部 馳赴前线增援。原駐宜春、萍乡一带的第六团李定魁部,早在李烈鈞督贛时調去九江。蔡森的第四旅,向駐贛南各县,奉令集中开拔,迟迟不动,稽延时日;第七团夏尙声部,則表示要八月初旬才能开抵南昌,再赴前方;而邻省援軍,如湖南、广东两省援軍,亦复如此,迟迟沒有开到,致使李烈鈞鏖战湖口多日,死亡枕藉,得不到援軍換防接战。因而前线不支,頗有动搖之势,遂下令撤退。黃兴亦于八月初旬,在危急中自南京出走了。

九江、湖口失守后,前方作战部队退抵德安、永修、星子、都昌、鄱阳等地。这时,安徽、湖南相繼取消独立,形势变化,士气不振。李烈鈞乃于八月下旬下令作战部队,退抵永修山下渡南岸及新建吳城鎮、都昌姑塘、南昌王家渡等处。此时,南昌当局即召开秘密會議,欧阳武认为此次战争,国民党沒有統一的指揮,独立各省仅以空电声援,按兵不动,单靠我一省的兵力,决难抵抗拥有强大兵力的袁世凱;固守南昌,凭城作战,徒使地方糜烂,人民遭殃,遂决定将第一师司令部撤退到吉安。軍次樟树鎮,欧阳武又宣布:“我是吉安人,既不願在南昌作战,破坏地方,使人民痛苦;我更不願以桑梓作战場,使我留千古罵名。”遂决定从此不再参加作战,并贈送參謀长龔师曾五百元,給資解散幕僚,伴同幕友中的乡亲回吉安去了。

李定魁的第六团,清末时原是刘槐森的旧部,民元属余鶴松混成第一旅,李烈鈞縮編为第六团,交李定魁統带,駐扎萍乡安源煤

矿,名为护矿队。一九一三年春,李烈鈞准备与袁世凯对抗,调该部赴九江;湖口反袁起义,李定魁在九江被袁世凯利诱,投降于段芝贵。李烈鈞作战失败,率步兵第三团到达南昌,这时欧阳武已去吉安,南昌秩序仅由宪兵司令廖伯琅维持。于是,李烈鈞即委第三团团团长伍毓瑞为南昌卫戍司令,数日后又派伍毓瑞代理江西都督;而李本人则由湖南乘日本轮船,亡命到日本去了。

林虎当时有“飞将军”之称号;他在前线作战失利后,带领部队径由德安、永修、奉新、修水方面撤退,开入湖南,将军械、弹药及一切装备,概行缴交湖南省政府。湖南都督谭延闿给他银元十万元,用作解散部队之用。他即乘日本军舰直到日本去了。

伍毓瑞高举着反袁的义旗,一直支持到袁世凯任命李纯做江西护军使行将到达南昌前夕,他才离开南昌,由浙江逃往日本。第四旅旅长蔡森,则在李纯占领南昌就了江西护军使后,即无耻地率领全旅向李纯投降了。支队司令黄旭、宪兵司令廖伯琅、步兵第四团团团长吴安伯等,均不幸被俘。吴安伯被押在陆军监狱,到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时,下令特赦,才得到释放。支队司令黄旭、宪兵司令廖伯琅,则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在南昌光荣殉难了。

李纯占领南昌、就了护军使后,即大肆搜捕革命党人,苛征暴斂,压榨人民,猖獗已极。赣州魏会英逃沪,躲在普育学堂任教的李国平处,后被捕遇害。包在吉安青原山削髮为僧的欧阳武,亦被下令緝拿。欧阳武见刘世均的父亲已被捕,因恐累及父兄,乃投案自首,解赴北京,囚禁于陆军监狱,被判徒刑八年,不久又被释放。徐秀鈞则早在湖口起义后,即被袁世凯指为“乱党”而逮捕于天津,押解九江,杀害于九江南門口火帝庙側空場。徐秀鈞烈士生前,曾为北京众议院議員、众议院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員,对袁世凯违法贖

职，擅借外債，反对最力，且经常将搜得袁世凱禍国殃民的种种罪行材料，密电李烈鈞，策动討袁。他被押回九江，禁錮在九江鎮江楼上。李純派軍法处长将他严刑拷打，审問他：“你們乱党还有那些人？”徐秀鈞回答道：“除国賊袁世凱及其狗腿子外，都是我們的党人。”偽軍法处命令他跪下，徐秀鈞态度强硬的回答說：“我是国事犯，可杀而不可辱。”袁世凱死后，黎元洪就大总统，指令九江县拨款銀元一千元，将徐秀鈞烈士迁葬于九江大南門外之山川岭，碑題“烈士徐子鴻墓”。

湖口起义討袁軍总參謀长夏之麒，苦战月余，軍事失利，逃至浙江，由浙至沪，东渡日本，与李烈鈞共謀再举。李烈鈞以袁世凱势焰方张，須暫忍耐，以待时机。夏之麒頗不以为然，返回上海，变卖衣物，并历年貯蓄共数千金，于一九一四年四月，赴杭州謀发动革命，不幸事泄失敗，同志四人被捕就义。因此，夏之麒革命决心益坚，再赴日本，趋謁孙中山先生，商謀继续革命。孙先生极力贊同，并允資助，促仍返沪，派为浙江軍事主任，进行活动。他到杭州策动軍隊，已经就緒，定于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起义。詎知机关被破，同志数人被杀，二十余人被囚禁。不得已复走日本亡命。次年，孙中山先生命夏为江西軍事主任，夏回到上海，派其同志刘平等数十人回贛，設立机关，发展中华革命党組織，策动軍隊倒袁。四月間，贛省机关相繼被破，刘平牺牲，胡陞等同志被捕，被囚监于江西軍事执法处。胡陞因受酷刑而成残废。北洋軍閥使用的酷刑，除軍棍、皮鞭、鉛鞭、铁杠、夹棍等外，还有烧紅铁鍊，令人跪于其上，或鋪烧紅炭于地，令人裸体輾轉于其上，或用长铁針刺入人的下身，或用钢針刺入人的指甲，或用大铁釘釘人指，悬于木柱，惨无人道。七月，夏之麒再派欧阳豪潜回江西，进行革命。他

对同志說道：“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矣，吾輩以身許國。忍令燦爛中華，任袁賊帝制自為乎？”不幸于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七日，被刺死于上海，时年仅三十八岁。烈士骸骨，葬于杭州西湖玉皇山麓。

江西易知社与共进会简介

蔡 惠

一九〇四年四月，江西几个学校，如武备、测繪、客籍、陆军小学等校师生倡議結集一部分人士組成易知社，明則以詩文結社，暗則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当时加入易知社的人士，据我所能记忆的、有武备学堂、測繪学堂的虞維煦、汪紫閣、汪建綱、龔师曾、徐复初、周作孚、丁立中、李儒修、胡飞、熊慕奇、熊公福、蔡复灵、蔡銳靈，陆军小学的潘的恒、項武，及南京两江师范属于江西籍的裘德煌、蕭輝景、邹继龙等。并共推虞維煦、李儒修、丁立中等主持社务。社址起初設在南昌皇殿側汪建綱的家中，后来迁到洪恩桥席公祠內。到一九〇五年，南昌义务女校成立，該校校长蔡敬襄，教員蔡觉美、蔡惠、洪熏琴等也陆续加入易知社。

其时，除一班官僚及脑筋糊涂的资产阶级表现惧外外，全国人民都非常仇恨侵略中国的外国人。当一九〇六年法国天主教总神父王安之刺杀南昌县令江召棠的案件发生后，易知社社員立即就此事件，印发传单，到处讲演宣传，因而激起广大人民的义愤，要为江召棠报仇，到处捉洋鬼子，打洋鬼子，使得在南昌的英、法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皆行逃匿，而刺杀江召棠的凶手法国神父王安之也在此时为群众所打死。

至一九〇九年江西共进会成立，易知社社員全体加入，易知社

才自动取消。

共进会是一九〇七年由湖南的焦达峰、刘揆一，四川的熊克武，江西的邓文翬、曾真等在日本东京发起组织的。其时焦达峰担任同盟会的调查部长，主要任务是联络各省的秘密会党。当时以争取长江各省会党头目，非另设小团体并委用熟悉会党情形的人分途招纳，不易收效。故另约一部分同盟会会员组织共进会，专司此项联络任务；并将“平均地权”改作“平均人权”，以免收揽会员时多费口舌。此事进行很秘密，其组织编制大致与同盟会同，并以同盟会的总理为总理。故共进会实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

大约在一九〇九年农历八月底，邓文翬奉同盟会命令由日本回国，到达南昌后，首先联络了易知社社员及邹继龙、陈培之、丁立中（别号笏堂）等进行商谈，要在江西组织共进会。同时得到安徽的虞维煦和本地蔡复灵、蔡锐霆兄弟等的赞助，一致认为学生与教员大多数人富于爱国热忱，易于进行宣传鼓动，故决定先在各学校着手吸收会员。

活动开始，即有南昌义务女校全体教职员报名申请入会。其中有义务女校校长蔡敬襄，教员蔡风波、洪熏琴，监学周速波、蔡仲兰（即蔡惠）、熊公福、漆艾新等。当时即以义务女校为临时会址。此外，还有峡江曾堪宇、陈小真，安徽汪建纲，宜丰蔡觉隔、漆士武、熊景奇，铅山潘的恒，南昌徐超、徐作喆，鄱阳胡飞、李儒修，抚州周作恭，吉安欧阳宣、陈荣恪等二十余人也先后申请加入。当于农历十月三日晚上在义务女校召开成立会，仪式非常严肃隆重。会场中布置一张桌子，桌上放一大碗米酒和二三十个汤瓢。参加的会员团团围绕在桌子的周围，然后先由邓文翬宣读入会志愿书及会员名单，继由虞维煦、蔡复灵阐述入会宗旨。即将各人填写的志愿

书展在桌上，由入会会员盖了指印后，大家即举手宣誓。宣誓完毕，各人手中拿好一根穿好线的针，用线将左手的中指扎紧，以针刺破指头，挤出鲜血，滴入酒中，再用汤瓢将血酒搅匀后，即互相握手，各饮血酒一汤瓢。这就是“歃血为盟”。仪式进行后，次日即发给会证，会证封面上盖了一颗方印，里面还有十一条会员应遵守的规则，也可说是训条。其中我所能记忆的有如下几条：（一）会员证不得遗失或毁坏涂改；（二）本证不可随便给非本会会员观看；（三）会员应遵守本会规章；（四）会员应服从本会宗旨，拥护本会政策，响应本会号召，忠于本会各种事业；（五）会员应有坚毅的意志，不为利诱，不为威屈；（六）会员不应想做官，即使有机会做官也要不忘本会宗旨，公平治政，不要以权势压迫人民，不图个人享受，应当亲民爱民；（七）会员不应想发财，即使有机会发财，也要公正理财，不能榨取他人利益，据为己有。应多做好事，或办大小实业，或出资兴办学校；（八）会员对全国人民，除当政权贵外，应一律平等，年长者作父母看，壮年或青年作兄弟姊妹看。其余几条记不清楚了。至于条文次序，可能还有出入。

江西共进会成立后，即推选邓文耀为会长，虞稚煦、丁立中为副会长，蔡敬襄、洪惠琴、汪建纲、蔡锐霆、周速波、丁立中等为理事。后因周速波有病不肯担任理事，乃改选蔡仲兰为理事。并互推虞稚煦、丁立中兼任总务；陈荣格、熊公福担任文牍；欧阳宣、蔡复灵担任宣传；李儒修、蔡仲兰担任联络；徐超、蔡锐霆担任机密。那时的会费，是由会员分别量力负担的。

组织就绪后，即向外开展各项革命活动。首先向各学校进行秘密宣传，次则利用农闲时间，派会员到农村向农民宣传。并由邓文耀亲自担任同洪江会和青帮等会党联络。宣传主要内容，是根

据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宗旨，阐明种族革命、推翻清朝的意义。同时，又分派同志应征新军，投考武备学堂及陆军小学，为推动新军、掌握军队、发动武装革命准备条件。当时被派到武备学堂的有蔡复灵、蔡锐霆、黄再生等；派到陆军小学的有项某、陈某等。应征新军的，在南京有陈培之、蔡匡、邓九思等，在南昌有熊公福、熊骥奇、漆艾新等。并与新军队官、哨官如董福开、卢左、蔡杰、蔡森、刘麒等取得联络，他们都在新军中运动军队，准备起义。我记得有一次想发动宜丰、万载、高安、峡江、新淦、新喻等县的学生和农民，劫夺官府钱粮餉銀，派了不少的农民在袁河、瑞河一带布置。蔡复灵时在永新教书，得知此讯，赶到南昌，要会内派人往各路制止。因彼时力量薄弱，恐其闖出禍来，要牵连不少的人，而且会破坏共进会的组织。这一行动遂即中止。

以后，邓文耀离开江西前往日本去了，共进会的会务由虞维煦、蔡敬襄等负责维持。不久，我也往日本去了，虞维煦也死了，共进会遂形成瘫痪状态。直到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很快影响到九江和南昌，这时共进会的会员才又活跃起来。如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晚，蔡森率领爬城队首先进入南昌城，接着工兵队长蔡杰率领工兵队协同骑兵营管带方先亮、辎重队长宋炳炎很快地光复了南昌城。

共进会负责人之一蔡锐霆在九江起义时赶到九江，后又返回南昌鼓动起义，因受吴介璋的排挤，遂又逃返宜丰，发动绿营起义，被推为袁、瑞、临三路都督。到了马毓宝接任江西都督时，蔡才接受了彭程万的电劝，自动取消了三路都督名义。

在这一时期，会员熊公福曾担任江西都督府的机要科长，蔡复灵担任文牍，陈培之担任过团长，蔡匡、周璧阶担任过营长，邓九思

担任过连长。他们在辛亥革命时，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在江西光复以后，由于会员分散，联系松弛，共进会的组织又趋于涣散。其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于是有的会员自动登记加入了国民党，有的则没有登记，而江西的共进会就无形瓦解了。前此的会员，有的继续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如熊公福曾到广东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陈培之在保定军校毕业后，曾担任程潜部下的参谋长；邓文耀在民国九年护法之役，曾代理李烈鈞担任滇赣两军的总司令，准备北伐，后因陈炯明叛变而告失败。此外还有些会员堕落到反革命的泥坑。这是共进会会员在辛亥革命以后的情况。

湖口起义的回忆

伍毓瑞

自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案发生后，孙中山先生忍无可忍，认为非去袁不可，乃由日本回到上海，策划讨袁。首先密令闽、粤两省先行发难，而闽、粤两省以内部有困难，未敢发动。又命湖南发动，湖南亦借口不敢动。孙中山先生乃派张继、邵元冲、白逾桓、馬君武四人来赣，授意李烈鈞讨袁。李烈鈞当时顾虑即时发动讨袁，有为权位而战之嫌，世人或不見諒，遂先行辞职赴沪，与孙中山先生商讨对袁方略。到了上海，孙中山先生召集在沪国民党人开会商議讨袁問題。会上孙中山先生談到由那省先行发动的問題，大家都默不作声，独李烈鈞起立发言，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讨袁主张，并自告奋勇，願由江西首先发难。于是大家公推李烈鈞为讨袁軍总司令。会后，李即遄赴湖口发动起义。

李烈鈞于七月十日左右回到江西的湖口县，当即召集在湖口及其随行的高级官吏开会。与会者有水巡总监何子奇，旅长何文斌，团长周璧阶、吳安伯，机关炮营营长卓仁机，省参議員楊慶笙等。會議决定成立讨袁軍总司令部，宣布江西独立，并推楊慶笙撰拟讨袁檄文。

七月十二日江西省議會开会，通电全国一致声讨袁世凱，并公举李烈鈞为江西讨袁軍总司令，欧阳武为江西都督，賀国昌为江西

民政长，俞应麓为兵站总监。欧阳武、贺国昌于是日在南昌就职。并由欧阳武通电讨袁，布告人民。江西民气为之大振。

当时江西的兵力及其驻地与军队部署如下：

江西有陆军两个师、一个混成旅，兵力共十团。第一师所属第一、二旅，各辖一、二及三、四各团。第二师所属第三、四旅，各辖五、六及七、八各团。第一师师长欧阳武，驻省城。其所属第一旅旅长林虎，第一团团长苏世安，第二团(新兵)团长杨祖时，驻德安、瑞昌；第二旅旅长余维谦，第三团团长伍毓瑞，率二、三两营驻九江，第四团(新兵)团长吴安伯，原驻南昌训练，后调赴吴障岭布防。第二师师长刘世钧，驻九江。其所属第三旅旅长赵复祥，第五团团长王国华，驻德安；第六团团长李定魁，有两营(原五十三标的老兵)驻九江，郭懋修一营驻德安；第四旅旅长蔡森，驻赣州，该旅由于集中开拔，稽迟时日，加之当时交通工具缺乏，其所属第七团夏尚声部到八月初旬才开抵南昌，再开赴前方。混成旅旅长方声涛，第九团(原九江镇守使戈克安的兵改编)团长周璧阶，独立营营长金其昌，驻姑塘。独立营虽是新成立的营，但营内军官多是优秀的保定军校及云南讲武堂毕业生担任，如蒋光鼐、吴艺五、谢英伯、张廷辅、吴集甫、林享佳、杨益谦等均在该营任下级军官，因此战斗力颇强。第十团团长李明扬，驻湖口，其兵系湖口的炮台兵改编。李兼湖口炮台总台长。

李烈钧就江西讨袁军总司令后，即拟定作战计划，区分作战军为正面军、右翼军、左翼军，并自兼正面军司令，派江西混成旅旅长方声涛为右翼军司令，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林虎为左翼军司令，并以江西讲武堂堂长夏之麒为总司令部参谋长。

军队部署尚未完毕，战斗即陆续在德安、沙河方面展开。先是

七月六、七日間，袁世凱即派了駐武穴的李純第六師進攻江西。李純先派一旅進駐九江、德安、沙河等地，並派軍官在沙河測繪地形。林虎忍無可忍，將其測繪地形的人員扣留，並於七月十一日拂曉向李純部隊進攻獲勝，以後屢戰屢勝，先占領瓜子嶺，再占領沙河，敵人傷亡很大。林部蘇世安團系廣西的老兵，士氣旺盛，戰鬥力較強，所以有此大勝。

九江方面，在湖口起義之前，李純派了兩個營駐在九江。當時我方在九江的部隊，有第二師師長劉世鈞及第六團團長李定魁的兩個營，何儀炮隊（四門舊式過山炮），第三團團長伍毓瑞的兩個營（第一營早已開赴南昌護衛都督府）。湖口起義後，贛軍與袁軍就成了敵對形勢。兩軍共處一城，勢必引起衝突。欲求避免這一危險，只有趁李純增援部隊未到達之前，迅速將其在九江的兩營予以殲滅；否則，我方部隊即速離開九江，以保全隊伍。當時我看到這個局勢不能長久，即約在九江的師長劉世鈞、參謀劉士毅、團長李定魁、都督府顧問張文通，秘密商談應付當前形勢的問題。我提出湖口已起義，德安林虎旅向敵人作戰已獲大勝，我們不能在此作壁上觀，應當以第三團的兩營加以第六團的一營，去解決李純之兩營，以一營為預備隊監視陳廷訓的護台營。李純部隊解決之後，即率部隊沿廬山開赴德安，協同林虎部隊攻擊李純部隊的側後背，使李純部隊腹背遭受夾擊，可以一鼓而殲滅之。大家認為這個計劃很好，並約次日拂曉前，李團將所選派之一營開赴第三團集合。次日李團違約，未將隊伍開動，我知李有變，即向鄭、萬兩營長授意，迅速覓好船隻，將軍隊開赴湖口。萬一船隻不敷，即以一部沿廬山開赴德安待命。我即同顧問張文通、副官萬毅，到大元洋行（日人開的）暫避，並由大元洋行經理為我雇到一小汽艇赴湖口，見到李

总司令，报告九江情况。李总司令深为嘉许，命我即赴姑塘作战，听方声涛旅长指挥。

李定魁所率两营驻扎九江，早已被袁派其前五十三标标统刘槐森到九江勾引(李定魁系前五十三标连长，所部士兵多系五十三标老兵)，被其运动去了。李定魁又派人前往德安勾引他驻在德安的郭懋修营叛变。幸我方发觉尚早，郭懋修逃逸，派郭懋仁接替，致未造成大乱，然而兵心已受影响矣。

我在九江的三营营长万助，是九江人，保定军校毕业生，颇精干，有才能，所以能够完成任务，率全营士兵乘船到达湖口。第二营营长郑鸣澍，河南人，因人地生疏，动作迟缓，致被李纯缴械。我幸隐避大元洋行，乘汽轮赴湖口，否则亦遭拘捕矣。

我奉李总司令命，到达姑塘，即面謁方声涛旅长。方旅长指示了敌情和作战方略后，即赴姑山前线。同时我团第三营万助营长也奉李总司令命率所部到达郑塘。第一营营长吴懋松奉欧阳武都督命，率所部三连到达姑塘参加作战(其第一连仍驻省城守卫都督府)。方旅长又命其独立营归我指挥。姑山在朱桥之后，路通九江，在军事上颇形重要。先是周璧阶团长率其第九团在我左翼作战。周是云南人，云南讲武堂毕业生，最为勇敢。他率部进攻九江，正在以望远镜观察敌情之际，中弹阵亡，至堪痛惜。第九团因团长周璧阶阵亡，士气大受影响，又加以袁世凯命戈克安派其前团长前来勾引运动，致令该团军心更为不稳。方旅长遂命其开赴南昌整编。

我团担任防线很长，以不满一团之兵，而御敌一旅之众，自感吃力。但我构筑了坚固工事，又加以士气旺盛，虽经敌人屡次冲击，企图夺占我阵地，均被我团击退。尤其是吴懋松营长沉着应

战，頗称得力。我团在姑塘作战，約有十余日，本拟俟机轉取攻势，向前推进，嗣因湖口淪陷，奉命向吳城撤退，又因吳城失守，遂未入城，而退守山下渡。

先是，七月二十二日袁世凱下“討伐”令，进攻江西，命湯蕙銘率海軍协助作战。湯蕙銘率楚字軍艦四艘抵达馬当时，詭称孙中山先生派来助战，馬当守軍遂未加阻止。抵达湖口时，李烈鈞又因与湯蕙銘有旧誼，亦未加防备。迨海軍发炮轰击，李烈鈞自知难于防守，遂放弃湖口，向吳城撤退。

李烈鈞到达吳城，命炮兵营长刘稜扼守望夫亭，复命旅长方声涛指揮一切。一日，敌以百数十人伪装难民模样，乘民船数艘，乞求入鎮。刘稜被其欺騙，未发炮阻止。敌軍俟船接近望夫亭时，即一跃登岸，发枪攻击，致令我方措手不及。方旅长虽发令抵抗，但士兵惊惶失措，已无斗志，只得仓卒登船退却，吳城遂告失守。

我团撤退到山下渡防守，将防务布置完毕。李总司令烈鈞召我談話，告以南昌紧急，宪兵司令廖伯琅和警察总监閻恩荣有叛变企图，他要先回南昌鎮守，命我团第一营营长吳懋松率該营随行，并命我兼程赶回南昌。李总司令抵达南昌时，城門关闭，不得进城，乃命士兵越城而上，进城开門，才得入城。李总司令入城后，人心大为安定，先駐都督府，后移駐德胜門外銅元厂。次日，我率所部亦赶到，駐都督府，略事布置，即赴銅元厂面謁李总司令，請示机宜。李命我为江西陆軍独立旅旅长兼南昌卫戍司令，命吳懋松为江西陆軍独立旅第一团团长，万勛为江西陆軍独立旅第二团团长，并将南昌所有軍队重新整編。整編完毕，李总司令命开赴順化門外大校場誓师，并檢閱訓話，勸勉全軍努力杀敌，固守南昌。誓师毕，軍心复振。李总司令旋即命軍队开赴樵石、乐化防守，并在

牛行附近选择据点，布置第二道防线，同时令架設浮桥，以便交通。

江西都督欧阳武早已赴吉安，某日江西省商会召集各界士紳，公推我代理江西都督，并送来都督印信，我一再坚辞不获，始就职。

我退到山下渡防守时，未见到一个高級将领，亦未见到其它部队。詢問林虎旅駐地，据說林旅长已率部向湖南退却矣。又問方旅长声涛退到何处，据說方旅长亦率独立营向广信方面退却矣。赵复祥、余維謙旅长更不知其去向。我抵南昌时，各机关高級官員多已散去。宪兵司令廖伯琅、警察总监閻恩荣亦已逃避。兵站总监俞应麓早已离开南昌。幸有江西省商会会长曾秉钰，會員傅子清、龔仕材等协助軍隊維持市面。将近两旬，全城沒有发生搶劫及其它不幸事故，軍民相安，頗得地方人民好感。

其时在南昌附近有欧阳武都督临时編組的夏、黃两个支队。夏支队系夏琛(九江人，江西武备学堂毕业生)帶領的，黃支队系黃煊(新建县人，江西武备学堂及日本海軍学校毕业生)帶領的。这两个支队各有五、六百人，其士兵都是从流落在南昌的散兵游勇收編的，紀律极坏。我命夏、黃将所部开赴前线参加作战，否則将其解散，以免貽害地方。夏支队长即将部队解散，黃支队长則受宪兵司令廖伯琅的慫恿，并命廖为该支队參謀长，开赴撫州、贛州一带，沿途不免騷扰。后经蔡森(时已叛投袁軍)将其拘捕，押解南昌，被李純将其枪决。

約九月上旬，樵舍告急。我以四、五营之兵，当李純一师之众，众寡悬殊，弹尽援絕，因此经过激战后，即退守牛行防线。我得到樵舍情况，即赴銅元厂謁見李总司令，告以前方败退情形，請李总司令先行撤退。李总司令遂同何子奇、李明揚、卓仁机、邓祖禹等

乘小輪經樟樹向袁州赴湘。我命吳、萬兩團于當日夜晚撤退到高等學堂(現八一公園)集合，向進賢方向退却。是日敵人開始向南昌城發炮射擊，午後尤甚。我在高等學堂約於晚八時同副官胡銓、萬毅、鍾鼎軒等率部出永和門向進賢撤退。後經萬毅將部隊解散，我遂由浙赴滬，轉赴日本亡命。

湖口起義失敗後，我被通緝。其他同志被通緝者，有楊慶笙、顏丙臨、胡廷鑾、陳承志、涂澍霖、黃用中、王鎮寰、李儒修等。被捕犧牲者有徐秀鈞、蔡銳霆。被捕入獄者有吳安伯、熊公福、姜伯彰、何猶興、楊翹新、胡銓等同志。

辛亥革命的几个片断回忆

卓仁机

(一)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的消息，传到上海精武体育会时，立即有许多会员集会讨论，有人倡议到武汉去参加革命，许多人当场签了名，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三月后，我便和好几十个青年动身前往。船过南京时，有十几位第四陆军中学的学生上船。沿途经过安庆、湖口、蕪湖时，也有很多学生上船。那时，九江金鸡坡炮台已经独立，炮台司令王金标带着随从人员到武昌去献印报喜。船到九江，靠近码头，看见岸上的人大多数已剪掉辮子，身穿短衫，头上戴有象京戏中短打武生戴的扎巾，額上插有一个三尖牌，耳边挂有一个絨线球，这些人也是当时响应革命的青紅帮人物。

当时武昌設有一間集賢館，是专为接待各方来参加革命的人住的，我們这一組十多人到了武昌，就住在这个館里。在报到后的第二天，听到消息說，有大批北兵到了孝感。許多来参加革命的人都自动地到汉阳兵工厂領取枪支子弹，編好队伍，到汉口刘家庙前綫去。我們这一組人也編成一个班，推出一个姓周的当班长，因为他曾学过兵式操。我們到了汉阳兵工厂，看见仓库大門已经打开，

滿地都是枪支。各人选了枪，打开了一箱七九子弹，把子弹配足，就往刘家庙前线，到达后，那里的防御工事还没做好，敌人已向我們开火了。前几天武汉的革命军队和当地反动军队在汉口北部打了好几天，无甚进展。这次新到的北兵是段祺瑞和馮国璋的两鎮，是袁世凱督练出来的精銳部队。革命軍和他們打了一个下午和一夜，第二天拂晓敌人又来攻击，我方抵抗不住，陆续退却。我們这一班位置在江边，和敌人騎兵的尖兵仅距离七八百米，那时我們左边的友軍的枪声已寂然无聞，但看見右边大江边上有我們一艘小火輪，載着卫生队和接济前线的干粮，正在靠岸，如果我們也退走了，船上的人和物資就有被俘获的危險。我們班里有一个同志就冒险跑到江边，将这种情况告訴船上的人，叫他們立即开回武昌，跟着我們也退却了。北兵进了汉口，就把后花楼一带房子烧掉。

在汉口革命軍撤退后几天，黄兴領兵守汉阳，一个月后又为馮国璋所破，此时汉口、汉阳相繼轉入北兵手里，江面一带交通已经断絕。我到了后花楼渡口，已无船过江，只好进入汉口租界，乘輪船回到九江，去找金鸡坡炮台司令王金标。到了九江，等了好几天沒有見到王司令，却見到南昌都督馬毓宝派来的都督府參謀长李烈鈞。他帶着一批南京第四陸軍中学学生和隨行人員在司令部办公。我去見李烈鈞报告我的情况，他对我說：“王司令坐鎮金鸡坡炮台，任务很紧，不回这里来了。”并叫我安心在他部下参加工作，組織敢死队，派我当副队长，队长是南京陸軍中学学生江苏徐州人李明揚。

有一天我同參謀彭学澂在江边碼头上閑游，看見碼头上靠着一艘有楼的大型小火輪船，船上有几十名挂着駁壳枪的士兵上上下下。我問碼头上戴英雄帽的人，才知道是江西巡撫馮汝霖乘这

小火輪由南昌來到這裡，掛駁殼的士兵是他的衛隊，他們是要到安慶去的。我覺得奇怪，就向彭學澹說，南昌光復不到幾天，卻把巡撫放走，並帶去了許多佩駁殼槍的衛隊，這件事不妙。彭學澹也以為放走了巡撫，任他到安慶於我們不利。當下我們就決定不讓他走，上船去勸他留在九江。我們上了船，在餐廳里見了馮汝驤，他是一個大胖子，年約五十多歲，我們請他留在这里同我們一起革命。他說倘若不讓他走，他只有死而已，態度很堅決。我們向他勸說一個多鐘頭，他還是表示“有死而已”，不願留下來。他的衛隊也沒有什麼動靜。我們回岸站在一個高地上，用大嗓子向群眾報告：“馮汝驤撫台在這個船上，他要逃到安慶去，再帶兵回來打我們，我們兩個人上船勸了他半天，請他留在我們這裡，他始終不答應。我們現在向大家報告，請贊成革命的人都上船一同勸他不要走，要他和我們一塊革命，如果他仍然不肯，我們就把他抬下船來。”話說完後，立刻就有一百多人同聲響應，一窩蜂似地涌上船去，把大胖子馮汝驤抬下來，用黃包車送到司令部，由司令部找了一座九江最好的花園招待他住下來。住了一個星期，他要求吸鴉片煙，招待他的人給他找到了，還以為這是官僚習慣，不算什麼，不料那天晚上他竟吞下鴉片煙膏，第二天就死了。

江西都督府參謀長李烈鈞到了九江後，革命精神為之一振，他對一切事情都有了新的組織、計劃和布置。許多回國留學生都來訪問參觀，其中最多的是在日本學軍事的留學生。當時李烈鈞和金雞坡炮台聯繫得很緊密，因為這座炮台是控制長江交通的樞紐。有一天停在武漢江面的海防和江防船艦突然都往長江下游開駛，原來這些艦只是清廷派在武漢鎮壓革命的，他們因為知道九江爆發了革命，金雞坡炮台已被革命軍占領，就連忙開往上海，避免在

武汉被困。他們开到九江时，金鸡坡炮台打出信号，要他們停止前进。李烈鈞接到炮台的报告，就派参謀龔小甫和我去发动清廷舰只起义。龔小甫是福建人，在青島念书，德文甚好，当时海軍人員多数是他的同乡，談起話来，比較便利。我們二人赶到江边，看見海筹、海容、海琛三艘大舰停在那里，此外还停有“四江”、“六楚”等四五艘小型江防舰。当时在中国巡洋舰中除了比較大的海圻开往英国观礼未回外，全部大舰都集結在这里。当我们二人乘坐小艇划到旗舰海筹号旁边时，船上的人立刻接待我們上船，他們都說福州話，龔参謀用家乡話与他們談得較亲切。会談結果，全部海軍在九江起义。我們要求他們每艘大舰拨出馬克沁机关枪二挺，小舰則拨出机关枪一挺，沒有机关枪的拨出六支至十支步枪，他們都答应了，就帶同士兵配件登陆，以充实陆上軍力。这样，中国全部海軍便在九江起义参加革命，并通电全国要清朝皇帝退位。

先是安庆还未光复，李烈鈞派黃煥章領一支队往攻，兵到而安庆已独立，黃煥章領队入城，因紀律不好，引起地方人士的不滿。李烈鈞下令調他回九江，可是黃煥章迟迟不动。

李烈鈞編了一个七人参謀团乘海筹兵舰到安庆，目的是整顿地方秩序，并把黃煥章率領的支队調回九江。他們到了安庆，在撫台衙門办公，因为商店还没有开市，只好自己找木头刻了一颗大印，文曰“安徽都督之印”，同时张贴报告，安定人心，并找到商会人員协助工作，搞了三天，才把市面恢复，街上的散兵，也已收容整編起来。此时南京城仍然被张勋盘据着，沒有光复。李烈鈞就指揮海陆軍开往南京协助攻城，并派我到鎮江見攻城司令林述庆和鎮統徐紹楨，他們都表示欢迎我們去帮他們进攻南京城。我便赶回安庆报告情况。不料这时武昌黎元洪派了代表來說，武昌被馮国璋

的北兵攻得很急，請李烈鈞趕快派海陸軍前往增援，因而原定計劃就改變了。

這時安慶有三千多巡防營士兵散在各處，他們都是拖着一条辮子，樂意則來，不樂意則走，不易管理。李烈鈞指定了一個地方，把他們集中起來，將他們的辮子剪掉，加以整編；另外在九江也集結了幾千人，配合海軍，開往湖北。另調駐防合肥的一個團開到安慶維持地方秩序，團長是胡萬泰，留日士官學生。我們到了湖北，海陸軍集中在黃州、黃陂一帶，別動隊則在孝感以北游擊，威脅北兵的后方。部隊到了黃州，李烈鈞派我會同黎元洪派來請援的代表，（姓陳，是日本士官生）去見黎元洪。我們二人在下午坐小艇划過長江，在武昌縣上岸。陳代表對我說：“馮國璋的北兵在漢陽龜山上面架有野戰炮，已經多次炮轟武昌城裏。現在城外已戒嚴，江邊都布置了防禦工事，黎元洪搬到武昌城後面洪山寺辦公。我們要从武昌縣城後面翻過洪山，山峰南面才是洪山寺，現在天將入黑，夜間要看着洪山的尖峰做目標，爬過了二十多華里的深草山才能到達。”我們爬到半夜，才到達洪山寺後院，走進黎元洪臥室，叫醒了，和他商定了作戰計劃後，我便單人走回黃州向李烈鈞回報。李派海軍日夜在江面上巡弋，給北兵以很大的威脅，使他們不敢渡江，武昌得保安全。另外，李又派陸軍在孝感威脅北兵的后方，避免同他們正面接觸，側面襲擊他們的給養火車，而當時北兵最怕的正是被人截斷了後路。未到一個月，溥儀退位，南北議和成功，北兵也退走了。

中華民國成立後，孫大總統命令李烈鈞任江西省都督，李烈鈞就率領部隊到江西去，大約是民國元年一月。李烈鈞以江防兵艦楚同號做他的坐駕，把在湖北的部隊編成護衛軍，派日本士官學

生欧阳武当司令官。因欧阳武别号南雷，这个支队就叫南雷支队，从黃州回到九江。由李明揚当机关炮大队长，我当队副，归南雷支队指揮。同时龔少甫也集結了許多南京老兵，編成一个支队，从黃州回到九江。当时江西的軍隊多数入了紅帮，他們不願意服从命令。九江要塞司令朱煥涛曾向外国买了一批軍械，准备反抗，但这批軍械已被截获，計有步枪二千支，法国式旱机关枪八挺，全部用来拨給护卫軍。不久广西新練的陆軍，有一旅人由王芝祥率領，从广西出发到南京，经过九江（这一部分就是后来二次革命时林虎所帶的一部分）。于是又向王芝祥借来四挺奥国式水筒机关枪。这样，护卫軍的实力就加强了。

李烈鈞在九江停留了十多天，把部队整理充实后，就向南昌行进。恰好这时起大北风，把許多运兵的帆船吹送得比火輪船还要快（后来第二次革命失敗退守吳城时，也是这样的一场北风把北兵送来了），李烈鈞坐着楚同兵舰直到滕王閣前（这个地方在水浅时，連中等的木艇也不能駛入）。李烈鈞进入撫台衙門接任都督后，从新整編軍隊，把护卫軍編为一个师，称为贛軍第一师，欧阳武当师长；把江西原有部队編成一个师，称为贛軍第二师，刘世鈞当师长。但不到两三个月，南京孙总统让位給北京袁世凱，南京成立留守府，黃兴当留守，有卫队一团，林虎当团长，因为經費无法筹措，就調到江西来，改为混成旅，归江西供給，因此，孙中山先生的武装力量几乎都集中江西了。

当时江西都督府軍务司司长为俞应麓，他是日本測繪学生，曾追隨过孙中山先生，江西都督府成立，他当了軍务司司长，独攬軍事补充給养大权。他在上海向帝国主义洋行訂购了不少軍械，其中有一批德国馬克沁水筒式机关枪，鋼质很劣，发下到机关炮大队

使用的有三十六挺，头一次試射就坏了好几架，有的枪管打不到几十发，子弹就不灵，馱架和馱鞍也不合式。本来机关炮大队是李烈鈞力量的中坚，作战能力很强，由于买到的机关炮不好，而从北方购来的騾馬又訓練未馴，因此不能发生好的作用，反而变成累贅，减弱了战斗力量。

那时紅帮会在江西力量很大，有个叫余鳴皋的，是日本士官学生，他在表面上是李烈鈞对外交际的一个好帮手，暗中却操纵紅帮会的人来倒李烈鈞。第二师师长刘世鈞与余鳴皋勾結一起，图謀推翻李烈鈞。在那年冬天一个晚上，他們发出一个通知，叫大家都到大东門外大較場开会，連未入紅帮会的也要帶着枪去，又不說出开会的目的。各营士兵便騷动起来，弄得滿城风雨，有些人放冷枪，有一部分人則向都督府进攻，因为那里有加入紅帮会的士兵响应，所以沒有经过战斗被他們攻进了都督府。第一师官兵（旧日从湖北回来的护卫軍）当时駐在城东南角百花洲，沒有参加倒李，曾由机关炮大队派了一排人出去查街，却被乱兵包围住趕到大較場去开会，走动不得。有些士兵逃回来报告情况，大队长李明揚就派我率領一連人到都督府鎮压叛乱，由我任連长。我在路上遇見許多人围上来老哥老弟地拉交情和通知口号。我們向天开一排机关枪冲散他們，趕到都督府，立刻把卫兵集队点名，許多混进来的人都溜跑了。此时李烈鈞已躲到宪兵司令部去，我和他通了电话之后，他就回到都督府。但外面还有很多乱兵，意图冲进来。第二师师长刘世鈞看見搗乱不成，就想来見李烈鈞說說好話，做做假面子，有人提議乘着这个混乱時間，把他乱枪打死，結果未有实行。到了第二年，九江第二次革命，刘又引北兵进来，使我們失却了九江的根据地。

(二)

袁世凱任临时总統后，立刻暴露他的独裁野心。他觉得江西国民党力量比較团结，李烈鈞难于收服，乃选派汪瑞闈到江西去进行阴谋分化工作，因为汪和李烈鈞有过一段交情。当李烈鈞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时，清政府派他到南昌当练新軍的营长，他因在軍营宣传革命，被清政府探悉，要来抓他。汪瑞闈当时正在南昌当大官，知到这个消息，即通知李烈鈞逃走。李烈鈞沒有路費，他还送給李九百元。李到了上海不几天把錢花光了，再电汪請款，汪又送了几百元給他，他才有路費到云南去。袁世凱利用这一点，以为派汪瑞闈来当江西民政长，可以联络李烈鈞。那时候反袁世凱的声浪已经很高，有人打电话給汪瑞闈，叫他三日內离开南昌，这样，他不得不走。袁世凱就說李烈鈞不接受軍民分治，反抗临时政府，下令免职。黎元洪为虎作倀，想以利害来誘李，但李不为他所动。

袁、黎勾引李烈鈞不动，乃想法勾引李烈鈞的亲信部下来做拆台工作。他們找到了第一师师长欧阳武的哥哥参議員欧阳詢，派他回到江西住在欧阳武家里，操纵欧阳武做反动工作。第一师的部队大部分是在湖北经过作战的部队，对李烈鈞很有信仰，虽然有欧阳詢在旁做分化工作，但一直到袁世凱下令免李烈鈞职，改委欧阳武为护軍使以前，欧阳武还不敢有什么异动。在討袁失敗后，若果他和我們一起逃亡出国，他是仍然可以保存令誉的。但是他被他的哥哥軟化了，絲毫沒有一点反袁的表現。他逃回吉安去，自称为止戈和尚，因为两面不討好，袁世凱也不去理他了。

民国元年，九江鎮守使是戈克安，因为屡次与都督李烈鈞对抗，直接为袁世凱做了鎮压革命的反动工作，彼此不能相容，江西

部队把他赶跑了。那时袁世凯的爪牙和兵力尚未深入江西，就由黎元洪推荐王芝祥暂代九江镇守使。王答应兼代，并派他的参谋长耿毅办理其事。耿毅的思想是进步的，他在潯阳旅馆开了两个房办公，这个地方就变了进步人士叙会的地方，江西新编旅旅长方声涛就住在里面。从此耿毅成了李烈鈞的好帮手。

江西第九团驻九江，原隶属于九江镇守使，官兵北方人多。戈克安被赶走之后，王芝祥派他的副官长周璧阶当团长。周是云南讲武堂第一期学生，和李烈鈞、方声涛都有师生的感情。周接任团长后，团内官兵一概未动，他们很能服从命令。

炮台司令陈廷训是一个最有力量的敌人，当驱逐戈克安的时候没有一起把他赶掉，是一个极端的错着。他当了袁世凯、黎元洪的得力间谍，把江西的军事布置和动态随时电报黎元洪。陈廷训又于夜间常常进入第九团团内做勾引的活动。有人建议周璧阶派人晚间在街上把他杀掉，以除大害。但周迟疑不决。后来周璧阶阵亡，陈廷训勾走了两营。足见与毒蛇猛虎在一起，是不能够讲仁慈的。

早在湖口起义前两三个月间，袁、黎互相勾结，就把湖北的讨袁起义镇压下去了。当江西九江正在酝酿讨伐袁世凯的时候，袁、黎就把李纯所带的兵调到武穴和九江来镇压江西的革命。李纯一到武穴，就想使用阴谋收买手段来拆散江西革命力量。他写了一封信给周璧阶、李明扬和卓仁机三个人说，只要能够服从袁世凯的调度，不去反抗他们，就给三人六十万大洋，愿意出国留学也可，留在原职做事也可。这封信是由陈廷训托人转交的。他们三人接到信后，对着方声涛和耿毅公开宣布李纯的丑态，更加积极地进行反袁运动。

但是江西方面的革命活动，这时已经被大部北兵镇压下去，兼之内部奸细太多，到处散布“人心厌乱，谁要武装反抗，谁就是罪魁祸首”的假舆论。南昌第一师师长欧阳武被他哥哥整天在身旁烧冷灶，已软化下去了。第二师师长刘世鈞，在九江已和陈廷训勾结在一起，受黎元洪的指挥。确实能受李烈鈞领导的只有林虎的一个旅、李明扬的第十团（新编成的）、周璧阶的第九团（新由敌方接收过来）、卓仁机的机关枪大队（分散在南昌、九江两地）、方声涛的新编旅（只成立了两个连，营长陈铭樞，连长蒋光鼐），第一师在南昌的两个团已被欧阳武紧紧抓在手里，维持当地秩序。我们的兵力既如此分散，不能主动地进攻敌人，处处成为被动。

袁世凯对江西方面的各种渗入的工作都做够了，就在一九一三年六月九日下令撤免李烈鈞的江西都督职务。此时南昌的空气消沉，所有积极的革命分子都在九江、湖口、沙河等地。南昌的绅士利用商会的名义送给李烈鈞几万元大洋作为生活费，迫使李烈鈞下台，离开南昌到上海去了。

李烈鈞下台以后，袁世凯派特使余大鸿送护军使印信到南昌交欧阳武接管江西军事。余大鸿在九江逗留了十几天，把所有在九江调来的部队都调回南昌去。卓仁机的两个机关枪连也调走了。于是方声涛、耿毅等也不得不离开九江。就是这样，九江的根据地便完全放弃了，所有革命积极分子只得都到湖口去集中。

李烈鈞于七月九日回到湖口，七月十二日即在湖口树起讨袁旗帜。那天适逢余大鸿把袁世凯委任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的印信带到南昌去，乘船经过湖口。大家因为他是袁世凯派来镇压江西革命的代表，一时情绪激昂，就把他的脑壳砍下来作为祭旗礼物。湖口起义后，立即向九江反攻。湖口要塞守备司令是何子奇。担任

从湖口到下游的馬当炮台一带防御的是李明揚第十团。反攻九江城的部队是周璧阶第九团，附带卓仁机的机关枪两连，方声涛的新编旅(两个连)。这一路的战斗指挥官是方声涛。第一线的攻击指挥官是周璧阶，后备队指挥官是卓仁机，这是从姑塘进攻九江城东面的兵力。进攻九江城西面的是林虎的一个混成旅，由德安进攻驻在沙河的北兵。两路的进攻计划是在十二日拂晓同时开火。从姑塘方面进攻的部队，因为水路木船运输困难，行动阻滞，赶不上十二日拂晓攻击，十三日夜間才进入了阵地。当攻击前进时，士气激昂，一个个磨拳擦掌，打算入九江城吃早饭。当时我们晓得敌人是两个连，侧面都已包围了他们，如开火猛扑，是可以攻进城的。但指挥官方声涛听听沙河方面枪炮声已经停止，以为是攻不上去的象征，他突然下命令退回原地。大家接到退回原位命令后，士气沮丧，官兵躺在路上都睡着了，连我本人也是这样。隔了一天(十四日)，又来一个拂晓攻击，指定早五点开始。担任第一线的营长耽误了，七点钟才开始进攻，天大亮了，被敌人看得清清楚楚。敌人已增加了兵力，延长了战线。周团长璧阶因为他带的兵新编成不久，不大认识他。他带着金边军帽，金领章，挂着参谋带，手拿着雪亮反光的战刀，带着人在阵地上猛冲。他这样打扮，是为了带动自己官兵跟着他上前的，不料被敌人所注意，集中火力向着他打。当他站立起来，手拿军刀指向敌人叫前进的时候，飞来一弹，打掉了他的军刀，穿过了他的心脏。士兵把他抬下来，便停止了呼吸。因周团长阵亡，军心有些动摇，跟着，队伍内部就有被陈廷训收买的奸细带领了一大部分人绕侧路走到金鸡坡炮台投降敌人去了。这一场战斗就此完结。我在第二线布置收容，等了两天也退回湖口去了。

在德安、沙河方面，林虎帶領部隊于十二日晨向敵人陣地猛撲。向北洋有訓練的部隊陣地正面進攻，本是不容易的，攻了一天，傷亡太大，子彈亦不能接濟，就退下來了。林虎部隊欽廉人多，沖起鋒來把衣服脫光，只掛子彈帶，十分勇猛。當時有兩名日本士官學校教官在那里參觀，回來在報上發表，深贊他們勇敢善戰，給林虎以一個飛將軍的稱號。這個混成旅里面有好幾百名欽廉官兵，他們有很豐富的游擊經驗，在江西二次革命失敗後，他們就帶着武器徒步回欽廉去了。

湖口方面，守備司令官何子奇指揮炮台作戰。西炮台由于姑塘的攻擊失敗，被敵人水陸夾攻，已先失守。湖口這一面的東炮台是何子奇自己在那里指揮開炮和敵人的兵艦作戰，連續打了好幾天。那第一門炮因年久鏽壞，開了幾炮，炮身歪側，不能裝填，再打不得，其他兩門炮也不過打六七千米達遠。這幾門炮是德國十九世紀的克魯伯廠所造的后膛炮，口徑十二生的，火藥量六角式，有蜂窩眼，像大號棋子那麼大，年齡總有六、七十年，雖然爆炸力減弱，但未受潮，還能發射。敵艦的炮火射程是一萬多米達，打了三天，他們摸准了我們的射程，有兩艘敵艦就拋錨在我們的射程之外整天對戰。但是敵艦炮彈破壞力也不很大，打了幾天，城里和炮台損失傷亡也不很大。李明揚也在那里幫同炮台的炮手們裝彈開炮。炮戰了五、六天，敵人的步兵就在下游十多里的地方“扎基”登陸。我們雖有兩連機關槍在那里防禦，但機關槍大半是新買來的，上了帝國主義奸商的當，大多數是壞貨，打不響，而且江面很長，可以登陸的地方太多，守了一天就被敵人登了陸。馬當炮台同時也起了內變，士兵把營長趕走了。這樣，湖口不能守了，士兵們各找船艇往鄱陽縣退却，秩序混亂，有些人沿着水邊退到了饒州。方聲

涛、何子奇等都在吳城收容散兵，共收容了一二千人。那时德安方面林虎都已退到新建县，与吳城相隔不远，接成一綫防御。防守吳城的时候，我們官兵都拿着步枪在水边堤岸上露宿。住了四五天，某天半夜忽然刮起大北风，有一艘帆船乘着猛风直冲过来，哨兵开枪制止，但轉瞬間船已冲到岸边，船上敌人拿着枪冲上岸来，我們官兵猝不及防，这样便打了一场乱仗，匆匆向南昌方面退却。李烈鈞在离南昌七里的七里鋪收容了潰兵，整頓了队伍，指示他們坚守这一綫。安排好了，李烈鈞自己就帶了一排卫兵和几个參謀副官走回南昌去。我因为发高热，也跟着回去。我們到了南昌北門，城門緊閉，說是城防司令廖伯琅命令不让开城。经过半日的交涉，他們才开了城。我們进入都督府后，廖伯琅来見，被卫兵剝下衣服押着进来。李烈鈞見了他，便叫人把軍刀軍服交回他，叫他穿好，并說不要怪別人，只怪自己无用，打了敗仗。后来北兵入城，李純把廖伯琅杀了。李烈鈞在南昌住了三几天，湖南譚延闓派人来叫李赶快去长沙轉往上海。李随即赴长沙，与几个高級軍官上了日本船到上海去了。我离开部队的时候，身上的錢已全部交給士兵們做路費，幸而路上遇着李明揚，晚上一同到了小客店，他在油灯光綫下，把褲腰带解下来，倒出黃金四块，每块二两，江西鈔票八百元。他說他本来同我一样，遣散士兵后，一文錢沒有了，幸而他的軍需郭某是吉安人，在南昌日久，熟悉情况，想办法为他准备了盘費，在大路上等着把錢交給他。李明揚把这些錢分做两半，順手拨了一份給我說，这是你的。我得了这一笔錢，从上海到东京的旅費和在东京短期的学費都有了。李明揚待我真有临危分金之义。我和李明揚到了长沙，也乘外国商船到上海去了。那时上海鎮守使是郑汝成，他和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勾結起来，到处搜捕革命党人。袁世凱

根据黎元洪报告，认为在湖口作乱的罪魁有七个人，即林虎、方声涛、何子奇、李明揚、蔡起鰲、卓仁机、周璧阶，着北京大理院起訴緝办。此时，蔡起鰲已经被郑汝成抓去枪毙了。李烈鈞把南昌商会送給他的八万元大洋拿出来作为旅費，帶領了江西积极参加革命的一班人到日本东京去了。

(三)

黃兴、李烈鈞与好些日本士官学校教官組成了一个会，叫“攘白堂”，宗旨是驅逐白人出亚洲。他們合办了一个学校叫“浩然声”来收容这一次革命失敗逃亡来日本的青年軍官，課程是下級軍官的学术科。我和李明揚入了学，約有七、八十个学生，校址在东京大森区。入了学三个月，中山先生以当时国民党的分子复杂，必須加以整頓，挑选其中的純洁积极分子改組为“中华革命党”。但有許多資格較老的黨員，如吳稚暉、黃兴、李烈鈞、馬素、张继、鈕永建等都提出反对，因而离开东京走到欧洲去了。黃兴到紐約，吳稚暉到倫敦，李烈鈞帶着李明揚、吳錫九和我乘法国邮船到星加坡，在星加坡約住了一个月，又搭第二水原船到馬賽轉往巴黎。同去的还有张继和馬素。到了巴黎，李烈鈞派我到倫敦去学无线电和飞机，派李明揚到柏林，他自己和吳錫九留在巴黎。他所帶去的几万块钱都存放在张靜江所办的通运公司里。不到几个月，欧洲帝国主义第一次大战打起来了，德国兵接近巴黎，情况混乱到极点，张靜江的通运公司也倒閉了。李烈鈞想逃离巴黎，但拿不出盘費来，好不容易才筹到一笔錢回到日本。

我和馬素到了倫敦不久，遇見了从广东来的陈炯明部下黃强和陆孟飞二人。我同他們到倫敦东区中国街，去訪問华侨。該地

华侨大都是航行大海洋的水手。有錢的水手开“鉢館”(英文是“BOARDHOUSE”),专收留失业的海員暫住宿,暫不收錢,由“鉢館”替他們找事做,有了工作再还錢。水手們都很有信义,有了錢是一定还的。“鉢館”老板放高利貸与水手,帶鴉片烟运往各处私卖,又就地开私賭。“鉢館”老板里面有一位“姜寿”者,为人很慷慨,他很热心帮助我們。他召集了許多人听我們讲中国革命情形,表示贊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帮助办成了国民党支部,很快就替我們捐了一万七千多块大洋,办起飞行学校,买了一架单翼飞机,另外买了一架发动机,共价一千七百多元,又在伯明罕地方租了一个牧场来做飞机場。我們請了一位飞机师名叫“心馬非尔”和一位机械士,領着我們十余个学生把馬达装配好,并进行試飞。試飞結果尚好,但因馬力太小,装备过于簡單,飞行場草地不够平整,沒有合用的跑道,缺点甚多,危险性大。飞行师要求改善的地方太多,一时未能做到。我們学飞行的人,只好另購一架二十五匹馬力的飞机,作平地直飞的练习,飞得好的也可以飞离地面百余尺。这样拖延了几个多月,經費不能继续,又发现了心馬非尔貪污浮报,大家对他都失了信仰。學員里有陈庆云者,是中山先生派他来学习的。他把情形写信报告了先生,先生汇給他一万块錢,到美国去学成了飞行员。这个时候正是欧洲第一次大战最紧张的时候,德国潜艇几乎完全封鎖了地中海,德国四十二公分的大口径远射程炮从欧洲大陆打到英国太晤士河口来了。跟着我們中国又兴起了“护国运动”,蔡鍔和李烈鈞从云南起兵,討伐袁世凱,来电召集我們回国。我們得到英国利物浦的华侨捐款資助,才经美国太平洋回到香港,再从香港轉入广西北江,回到李烈鈞滇軍部队,向广州进发攻打龙济光。

辛亥南昌起义之夕

周光麟

武昌起义前夕，丁笏堂受孙武之命，前来南昌活动，和我同住于侯子巷西头罗少师大屋内，即以此处为通讯地点，负责联络一切。当时革命浪潮席卷中南各省，鄂、赣唇齿相依，影响更为巨大，有志之士，大都热情奋发，愿为革命献出自己的力量。因此，活动过程也就极为顺利。他指派余藕书与方先亮接洽，刘曜昕与馮嗣鸿接洽，要方先亮和馮嗣鸿负责发动军队，并担任联络，编集城厢内外洪江会事宜，规定举事时以白布袖章为信号。新闻界由《自治日报》编辑吴宗慈负责接洽。省会警察武器比较完整，为运动革命的重要对象之一，由我和余藕书、刘曜昕三人负责联系。当日的布置是：总局巡逻队由该队教练九江人张瑞瑚及第一分队长张瑞祺负责，偵緝队由队长九江人罗元超负责，消防队由队长都昌人徐虎明和分队长余千人、朱景涛负责，各科室由平江人曹瑞植、宝庆人吕鹏运以及南昌人胡聘三等负责。至于城内东西南北四区和城外上下两区则由南昌人汤伯楹、馬維麟和武宁人刘振瑛、赣县人刘名珊、兴国人区易涵以及回族馬步陞、哈占魁等负责。这些人都是警界现职人员，关系密切，易资臂助。起义时间是预定农历九月九日夜晚十二时，在撫台衙材官厅和皇殿内两处举火为号。届时火起，方先亮和馮嗣鸿首先率队进城，街上警察当即撤去守望，集中巡逻，以資

响应。刁斗不惊，閭閻安堵，革命气氛霎时间弥漫于江城内外矣。省諮議局議長謝远涵縋城而逸，巡撫馮汝驤当时亦告失踪。兵不血刃，而名城在一夜之間遂告光复。第二天群情兴奋万分，当在南昌总商会开联席會議，計到軍界方先亮、馮嗣鴻，紳界刘凤起、雷恒，商界曾平斋、龔梅生，新聞界吳宗慈等。我与丁笏堂、余藹书、刘曜昕也参加了这次會議。其他参加會議的尙有軍界、学界、紳界、报界、商界等五、六十个骨干分子。当即公推清協統吳介璋为都督，刘凤起为政事部长，雷恒为財政部长，分組办事。部以下設局，李国珍为內务局长，蔡公时为交通局长，李瑞清为文事局长。李交卸江苏提学使未久，旅居上海，电促履新，辞不就职，有“汶上之志不可夺”之語，即改由熊育錫任文事局长。其他各局人选已不复記憶。

辛亥贛南光复始末紀略

陈 銳 欧阳勛

辛亥革命前，贛州有贛学社之組織，为贛人刘景熙、刘运襄、陈任中、陈培元、刘树堂、孔尧紹、蕭勛予、张周垣、陈翊忠、蕭敷勇、卢达、湯祚賢諸先进和青年学生陈銳、欧阳勛、陈荣广、卢尚同、陈仲击、刘仲威等所发起，內分設五部：一、教育会(附报館)，二、体育会，三、农业試驗場，四、工业实习厂，五、商业联合会。贛学社以教育事业为主导，从事各項新政的改革，并暗中鼓吹革命，密謀推翻清朝，贛南各属知识分子参加者日众，所有学堂监督(校长)和教員多半加入該社为社員。无形之中，贛学社成为革命运动的基地。同时，贛报社也由贛学社創辦成立，宣传运动得以展开。

武昌首义爆发后，在贛服务之贛学社社員法政学堂监督张周垣、教員湯祚賢、卢尚同、陈荣广、欧阳莘、卢达，中小学教員黃邦直、尹考齡，贛报社经理魏会荀、商会经理蕭文循諸人，乃与在外社員刘景熙、陈任中、刘树堂、陈翊忠、孔尧紹及青年学生陈銳、欧阳勛、刘景烈等密切联系，暗通消息，积极筹划响应；并以体育会为基础，借保卫地方治安为名，向警察局借得步枪八十枝，筹办民警商团，日夜訓練，充实武力。

当时，贛南兵备道吳庆燾，除兼領巡防軍三营外，又直轄巡防軍卫队一营，实力尚厚，且性极頑固。他与地方先进人士，表面上

虽互相往来，而暗中实处于敌对地位。

未久，南昌、九江先后起义，赣学社同志认为赣南应从速响应，因为赣南毗连湘、粤、闽三省，如响应过迟，万一发生变故，不但对援鄂北伐有损，还会增长江西内顾之忧，对于光复前途将造成困难。在汉、沪工作的社员及青年学生陈锐、欧阳勋、刘景烈同志等，想方设法，将各项革命文告秘密输入赣州，由赣学社暗中散发，以鼓舞同志士气，加强人民信心，增强革命斗志。

农历九月十四日（即十一月四日），赣学社同志发动召开赣州各界代表会议，为民请命，要求赣南兵备道吴庆燾反正。吴固执不悟，并声言如有革命暴动者，当格杀勿论。同志们虽在淫威之下，仍然不顾一切，与之抗争甚烈。十五日，法政学堂监督张周垣集合赣学社社员汤祚贤、卢尚同、陈荣广、黄邦直、欧阳莘、刘濬源、魏会荀、萧文循等，密议决定改变目标，径往运动直接统兵的巡防军统领刘槐森，劝告他从速起义，并代表赣南各界推举刘统领为赣南分都督。刘初迟疑不决，继经详陈利害，刘也知清运将终，大势所趋，不能抵抗，慨允所请。随后又往徒拥带兵虚名的赣南宁镇总兵署赵午凯处，进行运动，劝他反正，并许以宪兵司令要职。赵表示保证严守中立，惟自顾毫无实力，情愿回籍。最后又往运动银钱票券管理所总办林祖忻，林允将税收银钱款项全数交还赣州地方，而自愿退休。同时，萧文循、刘佐尧、刘士彬、吴金铭等又分赴各工商团体进行运动，亦皆愿通力合作。

当时，吴庆燾尚握有巡防军卫队一营，驻扎城内，偵悉革命运动将近成熟，密令卫队营派兵搜捕赣学社革命同志，就地枪决。卫队营长施仁彪稍明大势，不敢妄动。吴庆燾始觉势孤，乃将眷属潜避署外，自己投奔光孝寺削发为僧，随即离赣。农历九月十六日

(十一月六日)，各界人士齐集体育会，举行大会，刘槐森也亲自出席。全场一致公推刘槐森为赣南分都督，张周垣为军国民分会会长，萧文循、高昌燦为副会长，湯祚賢为赣南行政长官，卢尚同为法院院长。宣告独立，张贴光复文告，并通电省、潯、汉、沪和赣南各属，以資联络。旋得各属复电响应，拥护光复。十八日，通令军政人员一律断发剪辮，各界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皆聞信景从，一时风靡全城，面目焕然一新。二十一日晨，在南門外大教場举行授旗与各机关首长就职典礼。首先由军国民分会会长张周垣代表各界人士致勸詞，并亲授旗帜与赣南分都督刘槐森，刘分都督即当众誓师北伐。

二十二日，在赣南行政公署召开特别会议，军国民分会会长张周垣、分都督刘槐森、赣南行政长官湯祚賢等共同提議，出兵支援武汉，决議添募新兵三营駐守赣南，而以久经訓練之巡防军队增援武汉，合力北伐。后因餉械不易筹措，而巡防军队又受到少数反动分子的挑拨鼓动，忽然发生鬧餉譁变风潮，虽经处理得宜，并未釀成大禍，然为安定地方秩序起見，出兵支援北伐一事只得暫緩举行。

光复后，赣学社諸先进和青年学生等，均紛紛离赣，分赴南昌、武汉、宁、沪、湘、粵等地参加革命军队，或担任光复政府工作，或回到东西洋及京沪继续升学。留赣同志，所余无几。又经一九一三年宁赣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派兵南下，李純窃踞江西，任意屠杀革命同志，封禁革命组织的学社团体，鎮压革命的言論，赣州的革命力量被摧毀殆尽，仍旧回复了軍閥官僚和土劣的統治，变成了封建的黑暗地獄。

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

政协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

辛亥革命初期，安徽参加这个革命运动的，是一群有进步思想和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本身是知识分子，而又懂得宣传教育在开展革命运动中的巨大作用，因而多以讲究新学、开通民智为务，分别在省内各重要城市举办各种文化教育事业，主要是创办学校，并以此为据点，秘密进行革命宣传，散播革命种子，糾結志士，发展组织，培养骨干，发动群众，为武装起义准备条件。其中声名最著、影响最大的，有李光炯主办的蕪湖安徽公学，时人视为安徽革命的温床。其次，如安庆的《通俗报》、尚志学堂、寿州的蒙养学堂、芍西学堂、桐城的崇实学堂、合肥的城西学堂以及蕪湖的《俗話报》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辛亥革命运动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茲根据我們調查訪問所得的資料，分述如次：

一 蕪 湖

安徽的辛亥革命运动策源地是蕪湖，而在蕪的活动中心，則为安徽公学。

蕪湖安徽公学的前身是“安徽旅湘公学”，由李光炯創設于湖南长沙，卢仲农为之助。嗣以环境困难，于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二年）迁来蕪湖。

李光燭名德膏，桐城舉人，曾從同鄉吳汝綸（字摯甫，時人推崇為海內文宗）遊學，並隨他東渡日本，考察教育。他感於日本的強盛和清政的日益腐敗，回國以後，銳意從事教育事業，借以培育後進，開展革命運動。一九〇三年（清光緒二十九年），任教湖南高等學堂，結識無為盧仲友（名光誥），兩人志同道合，就共同創辦了安徽旅湘公學。

安徽公學遷來蕪湖，在二街留春園米捐局巷內租賃民房為校舍，招生開學，李光燭與鄧繩侯（名芝蓀，懷寧人）先後擔任監督。次年增設速成師範班，適房秩五（名宗嶽，桐城人）自日本留學回國，師範班就由他主持。公學沒有固定經費，但規模不小，開支很大，李光燭奔走籌措，把學校辦得蒸蒸日上，耗費了不少心血。他以吳汝綸及門弟子的資望，並利用桐城文派聲譽，與皖省當道往來周旋，又與皖籍官員中思想比較開明的，如道台蒯光典等人，深相結納，取得他們的支持。公學經費來源，除酌收學費以外，主要就是通過這些人事關係，接受各方的捐助和津貼（例如米厘津貼和鹽務部門的津貼）。他為了對外活動，終日官衣官帽與官紳交接酬應，起初不免有“竊竊私議”者，及後明了個中情況，對於他的苦心孤詣無不表示欽佩。

先是李光燭在長沙已與革命黨人黃興、劉揆一、張繼、周震麟等發生關係，黃興、趙聲等都曾在公學教過書。及公學遷來蕪湖，他暗中推動革命工作的開展，更趨積極。為了办好學校教育和開展革命運動，李先後禮聘了不少知名之士來校任教或講學，其中大人都名列黨籍，有同盟會員，也有光復會員，一時各地方的革命領袖人物薈萃于蕪湖，以此吸引着不少青年，震動了蕪湖社會，安徽公學成了當時中江流域革命運動的中心，也成了中江流域文化

运动的总汇。最著名的有刘申叔（名师培，江苏人，化名金少甫），陈仲甫（即陈独秀，怀宁人），柏烈武（名文蔚，寿州人，曾任安徽都督），陶焕卿（名成章，浙人，光复会领袖），张伯纯（名通典，湘人），苏曼殊（名子谷，粤人），还有谢无量、周震鳞、江彤侯、俞子夷等。公学经费不足，延致名师不免有些困难，李光燭則設法保举张伯纯任官立赭山中学监督，彼此合作，如苏曼殊等即由赭山中学厚致俸金，延揽来蕪；还有一个日本著名的科学家来蕪教授理化，他的俸金和译员费用，也是由赭山中学负担。安徽公学请他们带课，只需致送少许酬金就行了。

当此时，我省其他地方也有不少爱国志士创设学校，以掩护革命活动。如安庆的尚志，桐城的崇实，寿州的蒙养、芍西，怀远的养正、萃华，合肥的城西等学堂，都与安徽公学密切联系，互相支援。蕪湖地当水陆要冲，交通便利，当时又已辟为商埠，市面亦比较繁荣。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以后，安徽公学即与同盟会本部和上海、南京、安庆、寿州以及省内其他地方革命组织结上了关系，潜通消息。因此革命党人经由蕪湖往来大江南北的，络绎不绝，安徽公学无形中成了他们通讯联络的中心。

安徽公学系以培养革命骨干，散播革命种子为教育主旨，在学校内部，除由教师经常讲说革命道理外，并指导学生传阅革命书籍刊物。一九〇五年冬，吴暘谷从日本回国，带来同盟会规章、报刊及其他宣传品，在学生中传播以后，校内革命情绪更形高涨，学生和教师加入同盟会的，有常恒芳、刘文典、孙万乘、金维繁等八十多人。他们中间还有一些人，如陈仲甫、柏文蔚、常恒芳等经常利用寒暑假，分往皖北各地，进行联系和策动。

同盟会初成立时，张伯纯担任长江下游支部长，发展会员，获

得很大的成績。南京將各學堂畢業學生分發安徽新軍任職的，大多數人在蕪湖時加入同盟會。如熊成基、倪映典、薛哲諸烈士，都是由張伯純主盟參加的。

安徽公學遷蕪以後，數年之間，是長江中下游革命運動急劇發展階段，孫毓筠、權道涵在南京謀炸端方，徐錫麟、熊成基先後起義於安慶，驚人事件，相繼發生。革命勢力，潛滋暗長，有一發不可遏止之勢。

安徽公學革命黨人的活動，對當時社會影響最深、作用最大的，還有兩件事：一為《俗話報》的刊行，一為岳王會的組織。

《俗話報》系房秩五、陳仲甫於一九〇四年一月創办的，原設於安慶，不久遷來蕪湖，由長街科學圖書社發行。這個報以口語式的文字，作革命的宣傳，內容又能結合實際，激發人心。它於鼓吹倒清革命以外，還揭露資本主義列強掠奪安徽礦山土地的罪行，反映了中國人民初期反帝的鬥爭意識，比單純倒清進了一步。一九〇五年秋，這個報以觸怒了帝國主義，被迫令停刊。科學圖書社，系汪孟鄒（績溪人）所創設，與安徽公學革命黨人多有密切關係。陳仲甫在蕪時就經常住宿該社，《俗話報》的發行，也曾得到汪孟鄒的積極支持。

安徽公學遷蕪不久，陳仲甫、柏文蔚、常恆芳等就有岳王會的組織。這個會的取義，是要大家效法岳武穆的精忠報國，實際上是一個專搞軍事運動的機關。會員入會，採取江湖上習用的燒香宣誓方式，絕對保守秘密，不作對外宣傳。聯絡對象，主要是安徽武備練軍學生、新軍中下級軍官以及警察學堂學生。岳王會會員為了運動軍隊，有不少的人投入新軍中充當士兵或下級軍官。當時國內志士從事革命活動，大都從創辦學校和發動新軍兩方面入手，岳

王会在发动安徽新軍武装起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很大效果。如一九〇八年安穴新軍起义，为首的熊成基，死难的范传甲、张劲夫、薛哲；一九一〇年广州新軍之役，死难的倪映典；一九一一年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的宋玉琳，都是安徽岳王会的軍事骨干。这个会发起于蕪湖，会长是陈仲甫。南京、安庆設有分部，南京分部由柏文蔚主持，安庆分部由常恒芳主持。同盟会在安徽成立了組織以后，岳王会的會員同时参加了同盟会为會員。

安徽公學員生在学校內外积极地进行革命活动，风声很大，特别是刘申叔等在校內公开宣传倒清，更为露骨，引起了清廷东南疆吏的注意。据說，两江总督端方曾告知蒯光典，他打算拿办安徽公学革命党人，经蒯婉言解释，端才沒有下令实行。由于发生了这种情况，学校不免受到了影响，刘申叔等許多革命党人都呆不下去了，先后离开了蕪湖，分往他处活动。因此，辛亥蕪湖光复，安徽公学的員生参加实际工作的并不多，但是散播革命种子，准备革命条件，至今談我省辛亥革命者，仍不能不推崇安徽公学。

在辛亥革命前夕，蕪湖一部分进步人士潘春山、齐月溪、馬春霖、李小池等曾經組織了一个話剧团，名为“迪智群”，与同盟会結上了关系，宣传革命倒清，也起了些影响。辛亥蕪湖光复，迪智群的成員大多成了蕪湖軍政分府的骨干，如潘春山任宪兵司令、齐月溪任秘书长等等。

蕪湖《皖江日报》，系一九一〇年冬季发刊的，同盟会會員陈子范担任这个报的主笔，发表了不少宣传革命的文章。他能詩，如“可怜牛馬无猜恨，槽檻相安二百年”，“已无淨土容歌哭，只合浮槎犯斗牛”，“伤心劳燕分飞后，击筑孤吟易水头”等句，在知识分子中传誦一时。

二 安 庆

清朝末叶，安徽的革命运动，发端于安庆藏书楼演说，时为一九〇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先是，在省的有志青年潘晋华、葛温仲、陈仲甫、何春台等为了传播新知，开启民智，曾集款购置一些图书，创设了一所藏书楼（类似现在的图书馆）。楼址在现在安庆的孝肃路，即北正街小学校校址。上海《苏报》案发生后，爱国学社被封，邹容、章炳麟被捕，在沪革命党人分散逃亡。陈仲甫返抵安庆，结合同志，进行革命宣传，在藏书楼公开演说数次，听讲的以安徽大学堂（后改为高等学堂）学生为最多。参加演说会的人，均签名于簿册，藏书楼实质上成了一个革命秘密结社的机关。事为安庆府知府桂英（旗人）所闻，到楼搜查，取去签名册，报告藩司于蔭霖，于不欲因此遽兴大狱，仅开除大学堂学生十余人，封闭藏书楼了事。不久陈仲甫被通缉，逃亡日本。

一九〇八年以后，韩衍等在安庆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地点在近圣街五号涂公馆，利用两湖总督涂朗轩的孙子涂卓庭的关系，借为掩护，名为读书会，实系他们来往联络和宣传革命的场所。韩经常在读书会上演讲亡明痛史、太平天国革命史以及明末清初黄黎洲、王船山、顾亭林诸遗老的学说和事迹，以启发听众的民族意识和革命思想。

韩衍等在组织读书会的同时又创刊了《通俗报》。韩原在安徽督练公所任文案，这时已辞职，住在安庆城北百花亭附近，约了陈白虚、孙养廉、高超等几个同志担任编辑，出了这个报。报社经费很困难，完全由同情革命的人士资助。如諮议局議員王龙亭、皖北教育会负责人吴性元、杨云麟等都曾有经济上的支援。在社工作

人員，只管伙食，沒有報酬，但是大家同心協力，情緒都很高。這個報勇于堅持正義，同坏人坏事作斗争，以是为社会恶势力所深忌。因为該报揭露英帝国主义买办与清廷大吏勾結出賣銅官山矿权，反对該矿筹办人方履中，并支援銅陵人民驅逐英帝工程师麦奎的斗争，得罪于买办走狗和地方封建势力，韓衍竟被歹徒行刺，受五刀未死。这个报的出刊，正当熊成基举义安庆失敗，党人星散的时候，对于继续革命宣传，促进革命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經費困难，出刊不久就停办了。辛亥安庆独立以后，韓衍等还发行了《安徽船日报》和《青年軍报》，指斥坏人坏事不遺余力，文字精辟痛快，受到进步人士的欢迎。

安庆尚志学堂，成立于一九〇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創始人为老孝廉馮翰卿。馮不应光緒甲辰年礼部試，而为兴学尽力奔走，亦当时有志之士。这个学校开办时，先以邓繩侯为校长，继之者为馮翰卿，其后为葛曼生。校址在榮陞街，后来迁到拐角头（今孝肃路）。邓繩侯之婿葛温仲是同盟会會員，又与馮翰卿、葛曼生为道义交，所以葛温仲实际上参預尚志校务筹划。他介紹一些革命党人到校任职，如訓导主任常恒芳、教員湯葆明均系同盟会會員。常并負責全省同盟会組織工作。葛温仲自己和陈仲甫也曾到校演讲，作革命的宣传。因此，尚志学堂就成了安庆革命党人的活动基地。学监李孟平经常帶領学生到北門外將軍冲练习兵式体操，借为武装革命的准备，少数腐旧的学生家庭虽有惊疑，但也无法反对。又革命党人秘密集会，经常在西門外地藏庵后面，来往尚志学堂的并不多，因而避免了社会对学堂的注意。尚志学堂虽系一个小学，但当时风气初开，有些学生年龄很大，他們由于受到了革命的熏陶，后来参加革命工作的很多。安庆光复时，韓衍领导的青年軍，就是

以尙志学堂的学生和陆军小学、測繪学堂等校学生为核心力量組成的。

此外，安庆革命党人的外围組織，还有岳王会支部和維新会。

三 寿 州

寿州(今寿县)革命党人在文教方面的活动基地，主要为蒙养学堂。这个学堂是孙毓筠所創辦，教員有孙养廉、湯葆明等，他們后来都参加了同盟会。孙毓筠系清朝太傅孙家鼐的侄孙，精內典，风流任俠，曾破私产十多万金，充革命事业经费，在党人中頗著声誉(后来墮落为洪宪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潦倒以死)。他們以蒙养学堂为革命据点，在皖北一带联络同志，进行革命活动。某学期，他們忽倡导学生剪髮以为反清的表现，引起了学生家庭的反感，孙养廉、湯葆明乃率领学生数十人离开寿州，徒步走五百余里至安庆，大部分学生送入尙志学堂肄业，其余由孙带往南京，設法安置，蒙养学堂遂宣告結束。

还有一个芍西学堂，也在寿州，由李兰斋主持，吳暘谷曾在該校教过书，性质与蒙养学堂相同，开办則較迟。

此外，张汇温等还組織了一个信义会，也是革命党人的外围組織。

四 桐 城

桐城的崇实学堂，系革命党人潘晋华独力捐資創辦的。先是由于吳汝綸的倡导，当地創辦了一所桐城中学，有不少进步人士在这个中学任教或助理教务，如房秩五、吳守一、史恕卿等。他們为了桐城中学的发展，经常与地方頑固势力进行斗争，其中不少人有

革命傾向。潘晋华感到以学校为据点来进行革命工作，在桐城具有优越条件，因結合同志，創立崇实学堂，名为兴办教育，实际上是一个秘密結社。这个学校的教員，很多外籍人士，如寿州裴书田、阜阳楊希說、怀宁葛温仲、浙江夏次岩等。学生也不限本县，如寿州、凤台等县都有人来校学习。后来他們很多人参加了辛亥革命运动，有所建树，一部分人則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

五 合 肥

早在清廷下詔废科举兴学校以前，合肥的一班进步青年王彛之、胡渭清、黃祐三、黃健六、吳性元、吳阳初、吳暘谷等为了开通民智，改变风气，曾在文昌宮（今江淮大戏院院址）开办了识字义塾和藏书楼。不久科举废止，兴学之风一时称盛。胡渭清等开办了城东小学堂，蔡蓬山等开办了城西小学堂。后来蔡病死，城西学堂由高有谷、陈香岩接办。这时合肥还没有同盟会組織，一班进步青年的活动，只是与地方腐旧势力对立而已。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吳暘谷从日本东京回到合肥，首先介紹李誠安、张踐初、胡渭清加入同盟会，从文化教育入手进行革命运动。吳暘谷首先联合一班同志撵掉恶霸胥吏閻文昭，打垮劣紳蒯二跛子（名翰卿，光典之兄），爭得了大书院（过去的考場，在現在的总工会附近），办了一个模范小学和一个速成师范班（大約从一九〇七年到一九〇八年），又組織了一个学会，名为“我們的学会”，后来又在学会內附設一个閱报館。城西小学高有谷去职，也改由吳暘谷继任校长。

由于吳暘谷领导新进青年打垮了蒯翰卿，地方官吏心存顾虑，就对吳等多所迁就。吳乃放手大干，以城西小学、模范小学和速成师范班为活动根据地，宣传革命，介紹會員，一时工作大有进展。

合肥巨紳李國松感受到威脅，陰謀排擠吳錫谷，常在知府穆特恩面前說吳的壞話。當時吳的身份，地方官吏還不大清楚，不過吳既是从日本回國，自不免被他們懷疑，一般革命同志乃勸吳辭職離肥，以保安全，學校另推其他同志負責，並照舊進行革命活動。

我皖其他地方也還有一些人借文教事業從事革命運動，如懷遠的養正學堂、萃華學堂、六安南鄉的講學會都是，但因無具體資料，茲姑從略。

辛亥革命在安徽

李公案

辛亥前，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的安徽留学生纷纷回国，参加革命活动。吴春阳（暘谷）、丁象谦（六皆）、管鹏（鯤南）、管曙东、方諝言、王元甫（天培）、凌毅（焦厂）、郑赞成（养源）、常恒芳（藩侯）、高蔭藻（季堂）、汪建刚（叔潜）、陈策（勤宣）等皆到安庆，筹谋光复安庆。

先是，一九〇七年，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徐锡麟乘巡警学堂学生举行毕业典礼之机，当场击毙巡撫恩銘，举行起义。次年，熊成基乘太湖秋操的时候，率馬炮兵起义。这两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革命思潮在安徽群众中影响极大。革命志士纷纷来皖，在安庆城内蕭家桥萃萃楼旅館秘密成立了机关部，分头联络同志继续发动革命。方諝言同志当时在旅館慷慨題詩，句云：“国破誰能补，空余泪不干；劍长临敌少，家近欲归难。夜雨敲窗急，江涛入梦寒。壮心何所寄？客路独盘桓！”革命热情溢于言表。方同志面黑，我們送他一个綽号，叫方铁匠，可惜不久他就牺牲了。

当时安徽巡撫朱家宝在高涨的革命形势之下，惊惶失措，既欲与革命党人联络，宣布独立，又与清政府暗中勾結，首鼠两端，投机取巧。諮議局局长童挹芳（茂軒）怕地方“糜烂”，奔走于朱家宝与革命党之間，斡旋宣布独立。革命同志等一面联络新軍，准备发动

起事，一面也对朱家宝进行说服，晓以民族大义，希望他倾向革命。諮議局于九月十二日宣布安徽独立，朱家宝虽有联络，但为时势所迫，心中不免存观望之念，故不为革命同志所信任。朱家宝不能自安，突然下令逮捕“和尚头”（革命党人都是剪去髮辮的和尚头，故朱以逮捕和尚头为目标），于是一夜之間，革命同志紛紛逃出安庆，混乱情形持续两日。惟皖省軍民革命风声更为紧张，朱家宝心慌，亦于夜間潜逃。革命同志一部分人在安庆者当即公推王元甫为皖省都督。但王元甫非人望，为大多数皖人所不同意，因而他应付安庆局面只有五天，旋即离去。安庆遂成群龙无首之局，吳暘谷同志因赴长江上游請示。这时又有江西潯軍黃煥章率烏合之众数百人来安庆，大肆搶劫，全城糜烂，秩序大乱。吳暘谷同志自武昌赶回安庆，見此状，不胜憤慨，只身入黃煥章軍中，当面責問黃煥章及其參謀长王澤（一說是副司令）殃民之罪。黃、王老羞成怒，竟當場枪杀吳暘谷。革命同志对黃、王匪軍一致攻击，黃自知获罪于皖人，不能在安庆立足，悄然他窜。直至南京独立后，孙毓筠出獄，经皖人公推为皖省都督。孙到安庆主持軍政事务后，安庆秩序始渐趋稳定。

数月后，南京临时政府派駐浦口的革命第一軍柏文蔚到皖接充安徽都督，并兼民政长。柏文蔚率部到皖，安庆秩序才完全恢复。全体同志为吳暘谷复仇，要求柏文蔚电江西都督李烈鈞逮捕黃煥章解皖，在安庆御碑亭挖心祭吳暘谷烈士，皖省軍民全体称快。

安庆发动革命的时候，同盟会同志在庐州（合肥）、蕪湖两地也同时分头举事。現在先說庐州部分。合肥是庐州府首邑，一般青年士子、学者名流，思想都比較进步，武昌革命起义后，同盟会同志

孙万乘(品之)、王善德(兼之)、方朴言、李次宋、吴阳初、李誠安、吴杏园、沈气含、戴管吾、余立奎、胡渭清、殷季樵、吴伯夔、周浣青等自沪、宁各地紛紛到合肥，組設秘密机关部，聯絡革命同志，組織民軍，一面与地方駐軍聯絡，准备起义。当时合肥駐軍旗下綠營管帶名季光恩，合肥知县名李維源，他們看到清廷大势已去，几度曲折之后，终于贊成革命，表示願意服从民意，宣布庐州独立。

孙万乘等于九月十九日在合肥大书院召开地方群众大会，季光恩、李維源都到会。由李次宋代表机关部宣布庐州独立，組設庐州軍政分府。當場公推孙万乘为总司令。群众欢声雷动，鞭炮齐鳴，全城悬旗庆祝軍政分府成立。

合肥軍政分府下設民政部，暫推李維源担任；財政部推邓鶴仙、李馨斋担任；軍政部推刘亮章(文明)担任；巡警部推张踐初担任；執法部推許拙云、李次宋担任；秘书处由徐曦(炎东)、夏邱龙担任；王兼之办理总务。此时民众革命热情虽高，但軍政分府初創，財政頗觉拮据。未宣布独立之先，曾公推刘铁岩等三同志秘向合肥首富、李鴻章之侄孙李国松(健甫)筹款十万元。刘等三同志以錫皮包香椽，上裹手帕，佯作炸弹，携带前去。李某接待入客厅坐定，态度恭謹，問明来意，滿口应承，但不言数字。刘等即将“炸弹”置于方桌中間，李很惶恐。侍者敬烟时客人們假意囑其动作小心，以免引起爆炸。李国松这才答应由合肥新老两当鋪以及同泰錢庄陆续支援应用。

此时組織初創，需款孔殷。王兼之和我协商赴运漕筹划經費。运漕是安庆三十六个釐金局中稅收較丰者，我刚由江西到肥，觉着担任此事义不容辞。但运漕尚有李家仓房及运隆錢庄各一处，均有款項可筹，乃請加派黃海平同志負对錢庄筹款責任，李佩伯同志

負对仓房筹款責任。三人同到运漕，不料当时蕪湖軍政分府已先派熊子嘉率兵一营，駐在厘局。我等去时，彼磨刀霍霍，气势汹汹。经我与他細談之后，始知其为熊成基之兄，乃是革命同志，事可相商。熊当时表示要我赴蕪湖与蕪湖軍政分府吳振黃总司令协商。次日，我到达蕪湖，因我与軍政部长刘醒吾、警察厅长李伯度、革命軍第一团团长郑西平皆系旧友，故他們招待殷勤，相聚甚欢。在宴会上决定运漕稅款由庐州、蕪湖两軍政分府共同派人征收，共同分配支用。我即回运漕，当提現款一万元，与熊子嘉偕赴合肥軍政分府复命。王兼之欲派我主持运漕稅局，因我不願担任，遂改派許世欽(用午)前往。据聞許以后貪污了七、八万元。

这时正是安庆革命遭遇挫折的时候，同志們紛紛来到合肥。在张公祠召开皖民大会，推章挹芳为主席，大家決議公推同盟会會員孙毓筠(少侯)为安庆都督(孙新由南京出獄来肥)，又决定在蕪湖創辦軍事机关报，并定名为《安庆日报》，推我为总经理，我慨然接受。合肥、蕪湖两軍政分府共拨銀二千两，赴上海购办印刷机器、鉛字。那时我年事尚轻，办报少经验，首先到南京見范鴻仙(铁血軍总司令，在沪办《民立报》多年)，向他求教。范介紹我到上海民立报館参观，并介紹鉛字老手(忘其姓名)負主持排印事务，为我之助。

蕪湖《安庆日报》聘夏印农为总編輯，鲍际唐、焦龙元为編輯，日出两大张，根据同盟会“驅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进行革命宣传。

下面再略談蕪湖革命的经过情形：

蕪湖是安庆南北交通樞紐，辛亥时革命同志在安庆、合肥、蕪湖三地分头进行革命活动。蕪湖海关道李宝林和蕪湖县朱綉封虽

属清朝官僚，但因大势所趋，亦同情革命。由于海关尚有相当武装，经革命同志与其联系后，革命工作的进行，比安庆、合肥两地较为顺利。

蕪湖于同年九月十九日和合肥同日宣布独立。在蕪湖大花园成立軍政分府，公推吳振黃同志为总司令，李宝林仍为蕪湖关监督，朱綉封仍为蕪湖县长，刘醒吾为軍政部长，李伯良为警察厅长，郑西平为革命軍第一团团长，胡泳澄(季方)为革命軍第六十团团长。未几，李宝林辞职，由潘贊化、李幼卿为蕪湖海关正副监督，管理海关、常关，共有五关、十三卡，分布皖南北各处。

南京光复，临时政府成立之后，蕪湖和庐州两个軍政分府同时撤销，民政統一归省府管轄，軍事上成立革命軍陸軍第十五师，以孙万乘为师长，师部駐蕪湖。同盟会在蕪湖設立支部，以殷之恪主持其事。

以上是辛亥革命时我在安庆亲見亲聞的一些史实，提供参考，并希熟知情况的老同志予以补充訂正。

徐錫麟安庆起义紀实

凌 孔 彰

徐錫麟烈士于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任安徽省巡警学堂会办,我是这个学堂的学生,与他有师生关系。我自从入学堂学习,后来又追随烈士发难,直到起义失败同时被执为止,经常追随烈士左右,对于他平日言行比較了解,回想当年情景,历历如在目前。这篇短稿,只能說是烈士一生为了推翻清朝、光复中华的革命事迹中局部的局部,是本着如实反映情况的目的,根据当时事实经过加以叙述的。但是,事情毕竟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当时又失于記載,現在仅凭思索回忆,挂漏舛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采集烈士革命史料的同志以及革命前辈和旧日同學們予以补充修正。

徐錫麟烈士,字伯蓀,浙江绍兴人,一九〇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东渡日本留学,最初拟进日本陸軍联队学习,未得許可,继又投考振武学校,因眼患近視不及格,最后乃改投警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即积极从事推翻清廷的革命活动。为了从統治阶级内部取得政权以加速革命进程,烈士于一九〇六年向清廷出資捐得道員,分发安徽試用。同时,并利用人事关系請他的表叔俞廉三写信給安徽巡撫恩銘,托他加以照顾(俞廉三曾做过山西巡撫,恩銘当时在山西任知府,和俞廉三有师生关系)。烈士来到安徽后,一方面由于有俞廉三介紹的关系,另一方面也由于他精明干练,因而深得恩

銘信任。

烈士分发到安庆之初，恩銘委任为陸軍小学堂会办的职务。但是，这个学堂的学生絕大多数是十几岁的青年，一时不易策动，因此，烈士考虑如果要在安徽建立革命活动基地，必須設法掌握安徽巡警学堂。因为这个学堂已经有少数思想进步的学生在內进行革命活动，他們配备的武器也比較好，每个学生都发有九响毛瑟枪一支，这些条件对于将来进行武装起义是极为有利的。因此烈士就极力与恩銘周旋，并从其它方面积极活动。他表叔俞廉三这时又写了一封信給恩銘，囑托他对烈士“务加重用”。不久，烈士就被任命为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并兼任安徽巡警处会办，因而他的由清廷統治者內部掌握武装力量的計劃，取得初步成功。

烈士就任巡警学堂会办后，就积极向学生开展宣传革命工作，同时联系和培养傾向革命的进步学生，经常利用課余時間找学生談話，采取三五人談心或个别交談方式，向学生讲解国内外形势和国家民族的危机和前途等等問題，启发学生，使他們认识到推倒清朝統治的必要。他的救国热情使学生们深受感动，师生之間的关系也就日漸亲切了。

烈士在巡警学堂期間，最厌恶臬台世善(旗人)。世善兼任巡警学堂总办和巡警处总办，为人阴险恶毒，对烈士非常歧視，遇事掣肘刁难，是他在安庆进行革命工作的一个大障碍。不久，世善得暴病死了，烈士积极活动，企图取得臬台职务，掌握更大的权力来扩大革命运动；但是，恩銘沒有同意，而奏調另一个旗人首道毓秀升任了臬台。

烈士对于在安庆地区进行革命起义有周密的考虑和筹划。当时安徽巡警学堂的学生分为甲、乙两班，每班招收学生二百人，訓

练三个月为一期，甲班毕业后又开始训练乙班。烈士原计划在甲班学生训练期满后，把这批毕业学生分发到各军警机关工作，从事秘密活动，联系和发展革命力量，准备待机起义；等到乙班学生训练期满时，再利用举行毕业典礼的机会发难。不料当甲班学生尚未训练期满时，清政府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捕获了一个革命党人，这个党人被端方利诱后变节，并受命来安徽秘密刺探革命活动。他向端方报告说：安庆有个革命党首领，姓徐，是浙江人，但没有说明所担任的职务。端方得到这个情报后，就电告恩铭注意防拿。当时恩铭并不怀疑端方电报中所指的徐某就是烈士，还把端方的电报交给他，要他注意。烈士见到电报后，怀疑自己进行革命活动的秘密已被泄露，感到处境危险，回到学堂后就决定提前起义，先发制人，同时秘密写信给在日本的革命机关，请求速派熟练的炮科人员和政治宣传人员来安徽协助。大约在一个月后，就由日本派来陈伯平、马子畦两人，他们到安庆后都住在烈士家里，共同策划起义工作。除此以外，烈士还考虑到一旦起义，如果仅仅依靠巡警学堂二百多师生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争取驻在安庆由汉人领导的军队起来参加，才能摧毁清政府抚、道各级统治机构并镇压少数军队反抗。当时驻在安庆的军队计有陆军第六十一标，标统为汉人；第六十二标，标统为旗人。六十一标经过烈士的宣传、联络，标统已同意参加革命起义，所有管带也都愿意接受烈士的领导。我还记得有一天晚间，烈士邀请这个标的许多军官到安庆对江大渡口芦苇滩里秘密集会，歃血为盟，齐喝雄鸡血酒，誓愿同心同德推翻清朝，参加起义，永不背叛。

与此同时，安徽大吏对于革命党人的活动已严加防范，事机急迫，不容迟疑等待。烈士就在与六十一标订盟后几天，报告安徽巡

撫恩銘，訂于陰曆五月二十八日舉行巡警學堂甲班學生畢業典禮，並秘密布置，準備在這個時候實行起義。恰好五月二十八日這一天是恩銘總文案張次山的母親八十壽辰，恩銘和張次山是結盟兄弟，這一天要到張家去拜壽，不能主持巡警學堂甲班學生的畢業典禮，經改期于五月二十六日舉行。五月二十五日，起義的前一天，烈士召集了少數學生講話，我還記得他講話的大意是：“明天是本會辦帶領全體同學起義救國之日，師生都要同心協力，患難與共，……同學有難，本會辦當披髮纓冠而救；本會辦有難，諸同學也應當披髮纓冠而救……”。因為烈士說的是浙江土話，許多學生都沒有全部聽懂。二十六日上午五點鐘，烈士吹哨子召集全體學生在雨操場集合（雨操場是用瓦在操場上蓋的一個棚子，陰雨天可以出操），並向學生們作了簡單訓話。上午八點鐘左右，清政府大員如撫、藩、臬、道以及陸軍第六十一標、第六十二標標統和其他機關的觀禮來賓陸續來到，烈士身穿黑羽紗警官制服，在學堂大門口迎接。當恩銘到達時，還含笑向烈士說：“徐道台今日戎裝，頗有氣概。”烈士當即回答說：“今天是甲班學生畢業大典，大帥又親自蒞臨閱操，應該這樣穿著，以示隆重。”一面他就陪着恩銘等人進入學堂內休息。

烈士發難的步驟，原來準備先請恩銘吃酒，然後閱操，即乘間起義，將反動官吏一網打盡。不料巡警處的收支員顧松（旗人）暗地里報告臬台毓秀說：“徐道台不是好人，請轉稟大帥不要在這裡吃酒。”毓秀就立即密報了恩銘，恩銘聽了不敢在學堂內久留，就對烈士說：“我今天身體不舒服，酒不吃了。”烈士當即機警地意識到起義機密可能被洩漏，但仍然不動聲色地向恩銘說：“大帥既然不吃酒，那就請到禮堂行過畢業典禮再走吧！”恩銘當時也就答

应了。

这时学生已经齐集在雨操场，烈士引导着恩铭和藩、臬、道等官员来到雨操场礼堂，按阶级顺序站在上面东边。操场上教员发出口令，学生队伍向前走，准备进入礼堂向抚台行礼。正当队伍开步走的时候，我看见陈伯平忽然从礼堂窗内抛出一个东西，当时没有看清是什么。紧接着烈士一低头在靴统内取出手枪，左右手各拿一支，对准恩铭射击。恩铭身上中弹很多，倒在地上，但还没有死，由他的侍从文武巡捕把他抢救出来，抬上轿子走了。藩台冯煦没有行动，还呆呆地站在礼堂上不知所措，烈士当即把他推开说：“冯大人你快走，不关你的事。”冯煦这才若有所思地急急忙忙地跑出了礼堂。烈士提着手枪又去追寻臬台毓秀，不想毓秀已乘礼堂混乱时逃走了。这时烈士已经知道旗人顾松破坏了起义，气愤已极，就对学生说：“既没有捉到毓秀，必须杀死顾松！”正好顾松还在学堂前厅没有逃脱，被烈士抓住，问他：“是怎样探听得革命党人的秘密的？”顾松这时已吓得面如土色，回答说：“日本方面平日给会办来的信都是用胶水封口的，有几次来信因胶水受潮退性，封口裂开了，我就偷偷地看了，因而知道会办是革命党，但我并没有报告过抚台和臬台。今天因为我看到会办气势严肃，有些不对，为了防备出事，才向臬台报告会办不是好人，请抚台注意。”烈士听了，长叹一声，随即举枪打死了顾松，同时吹哨子集合学生，发给子弹后，亲自率领前往军械所，并向学生们指示说：“军械所里面有弹药，首先要占领它。”

大家到达军械所不久，安庆巡防营统领刘利贞来了，但他没有带军队。烈士对刘说：“你是汉人，我们推翻满清是民族革命，你应当协助，现在请你到电报局去监视电报机，不准人向外发电报，起

又成功之后，你自然有大官做。”刘答应着走了。同时，烈士并派学生蓝昆林送信給六十一标标統，請他把队伍帶进城来領子弹，共同起义。当刘利貞走后不久，駐在城內的第六十一标管帶丁忽清率領一个营部队到了軍械所，因为清政府怕新軍傾向革命，士兵背的都是空枪，沒有配发子弹。烈士当即指示丁忽清說：“你們稍等一下，馬上发給子弹。”但是向軍械所取子弹却遇到了困难，原来軍械所的总办看見烈士帶着队伍来到，就悄悄地把庫房钥匙帶着从后門溜走了。由于弹药庫都是地下室，进口的上面盖着很厚的钢板，并且用大洋鎖鎖着，异常坚固，仓卒間无法打开，只有西边的庫房还没有鎖，里面放有大炮六門，炮弹若干箱。当由陈伯平和几个学生拉出一門大炮架在軍械所后厅。因为这个后厅地势比較高，可以观察到撫台衙門和北門城楼。陈伯平随手取了一发炮弹裝进炮膛，向烈士說：“現在形势危急，我們要用炮弹先把撫台衙門打掉，摧毁了敌人发号施令的机关，然后再轰击北門城楼，把城墙打开缺口，使我們的軍隊可以进出。”烈士馬上加以制止，并說，“这样做就会玉石俱焚，与革命宗旨不合，我們纵能成功，老百姓必然要糜烂不堪。”因而坚决不准开炮。这时外面已枪声大作，巡防营統領刘利貞这个坏蛋背叛了自己的諾言，出卖了革命，帶領着部队包围了軍械所，向烈士率領的学生队伍猛烈进攻。烈士当即指揮学生向外还击，坚持了五个小时，子弹已经打光，陈伯平又在奋勇击敌中首先中弹牺牲。原先派往六十一标联络的蓝昆林由于反动统治者紧閉各城門，并断絕交通，禁止行人往来，以致无法把信送出去。所外敌人刘利貞所率領的巡防营发觉了起义軍已经弹尽援絕，就乘机上刺刀发起冲锋，冲进了軍械所。烈士和馬子畦以及参加起义的学生都被反动軍隊俘虏，并立即押送到督練公所审讯。

震动大江南北的安庆第一次起义就这样被反动统治者镇压下去了！

烈士等被押送到督练公所后，安徽反动大员立即组织军法会审，主持审讯的是馮煦（恩銘被杀后，由馮煦代理巡撫职务）。烈士受审时侃侃而谈，供词很长，其中有很多为当时安徽各界人士所传诵，例如馮煦問烈士說：“恩撫台待你很好，你为什么要謀害他？”烈士說：“恩銘待我很好，这只是个人私恩，而我杀恩銘是排滿公理”；又說：“我自从参加革命以来，即視死如归，今天之死，只是我徐錫麟一个人，以后还有千百个徐錫麟起来革命。”供毕，即趋赴撫台衙門东轅門（即現在安庆新光电影院大門前坡子下面）从容就义。烈士被害前，恩銘的儿子曾要求馮煦援张文祥刺馬新貽例子，先将烈士剜心而后斬首。馮煦内心感激烈士把他放走沒有杀他，同时也感到革命势力日益扩大，有所顾忌，因此，他暗示监斬者先将烈士杀死，以后才剜心。与烈士同时被害的，还有馬子畦烈士。

烈士的遗体当时葬于安庆城北馬山，到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才改葬于杭州西湖。当年烈士所领导的安庆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清朝的寿命也只維持了短短的四年，烈士的凛然大节，永垂不朽！

熊成基安庆起义的回忆

楊士道

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公元一九〇八年）阴历十月二十六日，熊成基烈士在安庆领导新軍馬炮两营起义，到现在已经五十三年了。那时熊任新軍炮营右队队官，我是炮队中一个班长，跟着他参加了起义。因为時間过久，起义经过，已記憶不清，現在只就想得起来的談一談。

熊成基，字味根，系江苏揚州府甘泉县人，寄居我省蕪湖。他在少年时候就有大志，喜兵事，曾对人說：“大丈夫不能为国家出力，是很可恥的，于今国势衰弱，受列强欺侮，只有从軍学武，才能强国雪恥。”那个时候，清政府正在編练新軍，改革軍政，在各省設立各种軍事学堂，培养新軍干部，熊就投入安徽练軍武备学堂学习。不久，武备学堂停办，他又去到南京，考入炮兵速成学堂，在炮兵学堂毕业后，来皖投效，被任为炮营队官。他起先在省城武备学堂学习的时候，結识了一些革命志士，如同学柏文蔚、郑芳蓀等，陆軍常备营范传甲、张劲夫等，共同組織了一个秘密革命团体，名为“岳王会”，与蕪湖、南京的“岳王会”互通声气，从事軍运，在新軍士兵和各軍事学堂中散发《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讀物，并利用各种机会，不断鼓吹兴汉排滿，新軍中多数下級官佐和士兵都受了他們的影响，倾向革命。

丁未(一九〇七年),徐錫麟在安庆起义,枪杀安徽撫台恩銘,事前与新軍中革命党人本有联系,因为临时改期,新軍来不及响应,以致失敗。熊与范传甲等非常憤慨,决心要继承死难烈士遺志,在安庆再次起义。这时革命党人倪映典正从南京調来安庆担任騎兵营管帶,由于他掌握了一个营兵力,并在群众中有較高的声望,大家就公推他为首領,策划于是年阴历除夕发难,占領安庆。不料机事不密,为安徽撫台朱家宝所偵知,倪以嫌疑被撤职,起义計劃沒有实现。

次年秋,清政府下令南洋各鎮新軍于十月間在安徽太湖举行会操,預定两江总督端方为检閱大臣,朱家宝亦率領安徽新軍三十一混成协前往参加。安庆新軍中的革命党人得知这一情况后,遂集議于三祖寺楊氏試館(党人設秘密机关于試館內,由范传甲主持),决定在太湖秋操时,发动起义。当即推定熊成基为总指揮,又推六十一标三营管帶(姓名已忘)指揮全协,六十二标二营管帶薛哲为副指揮,工程营以范传甲任指揮,炮营則由熊負責。他們議定在太湖起义后,即将端方、朱家宝等拘禁起来,然后全軍攻打安庆,夺取火药庫,再进兵皖北各县,与当地的革命党人配合,这样便有較大的力量直搗清廷巢穴北京。他們事先对太湖秋操的軍隊也作了估計,认为人数虽有数万,但大都有枪无弹,只要革命党人枪声一响,就会紛紛归順。因此,他們一方面派范传甲往南京,与第九鎮官兵預先联络,一方面指定人員与参加会操的新軍中革命党人取得联系,策动起义。但是,这时安庆新軍不穩情况,清政府陸軍部已有所聞,遂电知皖撫說,新軍三十一混成协新近成立,訓練沒有純熟,不必开赴太湖会操,并一律禁发枪械。这样,安庆新軍中的革命党人就未能前去太湖,秋操起义的計劃,也就被破坏了。

虽然如此，革命党人起义决心并未消失，因即改变计划，以熊成基等所掌握的馬炮营为主力，在安庆首先发难，俟攻下安庆后，再协助在太湖的同志策动参加会操的新軍响应。正当此时，清光緒皇帝和西太后那拉氏先后逝世，人心惶惶，熊成基、范传甲等认为时机很好，分头与新軍中的同志联系，告以起义打算，大家都表示贊成。于是就于十月二十六日邀集起义部队代表在楊氏試館举行會議，制定起义計劃。参加这次會議的，有熊成基、范传甲、张劲夫、薛哲、薛子祥、田激揚、廖盘貞、洪承点、程芸萱、李朝栋等十余人，会上公推熊为起义軍总司令，并决定于是日晚間由馬炮营千余人在城外起事，薛哲等在城內率队接应。熊根据会上決議，发布了作战密令十三条。散会后，大家即分別回营，按照計劃进行布置。晚間九时，駐在玉虹門外和北門外的馬营（騎兵营）举火为号，同时发动。馬营的革命党人张烈、田激揚、周正鋒等將馬营管帶李玉青包围于楼上，劝其投降，李不从，张烈等冲到楼上，用馬刀砍去，李因善于拳术，虽然受伤，仍在张烈的刀下越窗逃走。张烈等遂率領馬营全体人馬离营，开往城北。与此同时，炮营在熊成基的直接发动下，正目张鴻尧、士兵黃节等，用炮門击毙管帶陈昌鏞，也率領全营官兵开赴城北。馬营和炮营会师后，即馳赴菱湖嘴（离北門五里）子弹庫。守庫正目范传国系范传甲的胞弟，見起义軍来到，开门迎入。起义軍取得子弹后，遂折回北門，放火烧了北門外測繪学堂的步兵营房，該营士兵平时已接受了革命宣传，也就参加了起义軍的行列。至此，城外已无敌軍，熊便督率所有兵力攻城。炮兵据原有炮兵营陣地及迎江寺高地发炮轰击撫署和督練公所，步兵攻击城东北角，騎兵与輜重队則攻击城西北角，預备爬城而入。

安徽撫台朱家宝本已前去太湖，得到光緒帝和那拉氏死訊后，立即返回省城，加强对革命党人的防范。熊成基等在炮营开始行动的时候，該营左队队官徐召伯秘密逃入城内报告，朱就严令紧闭各城門，調兵防守。新軍二标二营管带薛哲所部駐在北城脚下百花亭，按照发难計劃，他是負責開門迎接城外起義軍的。不意薛哲臨陣畏縮，动作迟緩，未能按时发动，执行任务。等到他听见城外枪声密集，才帶領部下百余人冲至北門时，朱家宝已派巡防营加强防守。薛为了个人的生命安全，更躊躇不前。这时朱家宝又率队来到，薛就率部回营，不敢向朱开火。范传甲的任务系率領工程队在城内接应，因为該队官长監視极严，营房关帝庙的大門被封鎖，他們又有枪无彈，冲不出来。范无奈，准备在营房放火，以便乘机冲出，但是点火多次，均为反动的队官发觉扑灭。直到次日下午二时，他才乘隙逃出营外，赶到楊氏試館机关部，向同志黃如波探听消息。黃告以起義軍伤亡很重，难以攻入城内，劝他易服出走，免生意外。范悲憤交集，坚不同意，他对黃說：“我已准备牺牲，要革命就不怕流血。”随即轉回关帝庙营房，打算发动部分同志接应起義軍攻城。清軍协統余大鴻此时已偵知范传甲系革命党首腦之一，密謀內应，但以起義軍攻城甚急，不敢轻易杀害。为了便于監視范的行动，立即下令調他到协本部充任卫队。范在此孤掌难鳴的形势下，仍未稍退縮，当天下午跟随余大鴻出巡，行至飲馬塘附近时，他认为机会不可錯過，举枪向余襲击，不幸被余的卫队发觉，枪声未响，即被拘捕。此外，讲武堂內的革命党人张劲夫当起義軍攻城时，准备率領一批同志冲出接应，由于沒有武器，在軍官的監視下，也未能冲出来。

城内接应失败，城外起義軍虽奋勇攻城，終以彈药不足，炮弹

又无引火线，不能充分发挥战斗力，屡次猛扑，均被击退。碇泊江心的清军兵舰又发炮袭击，起义军阵地被摧毁，伤亡很重，并且朱家宝所调援军已迫城郊。起义军内外受敌，难以支持，迫不得已，于次日下午十时分兵两路，突围出走。一路由熊成基率领，经集贤关向北，准备进抵合肥一带，联合淮颍之间同志，再图大举。途中他们与清军姜桂题所部打了几仗，部队颇有死伤，冲到合肥城时，检点人数已不足一百人。这时，起义军中不断出现叛徒，难以维持，成基乃潜离队伍，辗转逃往日本。他走后，部队也就自行解散了。另一路由程芸萱率领，也是由安庆直奔合肥，与清军江防营混战结果，所剩不足四十人，几天后也星散了。

我省连续两次举义，清政府受到很大震动，这时就指使皖省疆吏进行了大搜捕、大屠杀，革命党人范传甲、张劲夫、田激扬、李朝栋、周正举、胡文彬、张星五、张志功、刘志贤、易桂安等均遭杀戮；即临阵畏缩、没有参加实际战斗的薛哲，也被枭首示众。此外，被牵连受害的党人、士兵以及进步学生等，全省达三百人之多，我是当时侥幸漏网者之一。

过了三年，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光复，皖人搜集范传甲、张劲夫、李朝栋、薛哲、张星五、胡文彬、周正举、刘志贤等八人遗骸与暗杀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的吴樾烈士灵柩，同葬于安庆西门外平山头，孙中山先生亲题“皖江九烈士墓碑”，张云屏为作墓表，柏文蔚书石，纪其事。九烈士的英名永垂不朽。

安徽光复經過与都督的爭夺

王 一 民

安徽之有新軍，始于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当时只有一个第三十一混成协，协統顾忠琛，下轄第六十一、二两标，六十一标标統胡永奎，六十二标标統顾筱軒。及一九〇八年十月，熊成基拟趁太湖秋操起义，失敗后，安徽巡撫朱家宝撤換了顾忠琛，先后以余大鴻、赵立泰继任协統。赵是日本士官学校学生，不为朱所信任，有什么重要事情，他总是找胡永奎和顾筱軒商量。

武昌起义，安徽震动。朱家宝抽調两标官兵編成一个战时混成营，約有八百余人，派管带朱基（朱家宝的干儿子）率領，以另一管带桂丹墀为营参謀长，开往皖、鄂两省交界的英山县駐防，企图截堵由湖北到安徽的革命軍。这样一来，安徽的兵力就更薄弱了。于是朱家宝一面电請两江总督张人駿派张勋所部江防营两营到安庆駐防，同时又想利用新軍，特意提前五天发餉，并每人发給七九步枪弹五十粒。但是朱对新軍总不放心，随着又将新发子弹悉数收回。在安庆的革命同志得知这个消息，立即在城内萍萃楼召开紧急會議，商量起义。主持會議的是吳春阳、管鵬、韓衍、高語罕、毕少山、孙仲礼、高介、姚愚等，六十一标代表柏玉田、张保德、馬雄飞，六十二标代表闕鼎泰、李乾玉、葛瑞芝，陆軍測繪学堂代表胡万泰、刘松齡，陆軍小学代表夏斌、王逸亭，馬炮营、工程营亦均派有

代表參加。當推胡萬泰為總指揮，約定九月初九日晚八時先由六十二標舉火為號，六十一標和馬炮營、工程營繼起響應，大家先攻標本部，奪取子彈，再合力進攻省城。那時六十二標駐在集賢關，離省城十八里，六十一標駐在五里廟，馬炮營和工程營又分駐在西、東北城外，彼此的駐地相去甚遠。

新軍決定起義後，不知是何人竟向六十二標標統顧筱軒告密，顧即將闕鼎泰、李乾玉兩人扣留，使其與外界失却聯絡。六十一標起義軍如期進攻該標標本部，被標統胡永奎率領弁兵居高臨下開槍射擊，有不少人當場犧牲。因至當晚十一時仍不見六十二標舉火為號，大家都有了顧慮，各自溜回營房。此時總指揮胡萬泰不知去向，有人說已經被扣。這次起義就這樣失敗了。

第二天清早，胡永奎調來江防營數百人荷槍實彈在標本部牆外四周作好警戒後，再召集全標官兵在操場上訓話，用架槍向前開步走的方法收繳了他們的槍械，並當場宣布將全軍解散，限令所有官兵一律在當日下午四時以前將所領被服全數交回，聽候分批遣送回籍，並規定無令不准出營，否則槍殺不論。

這天下午四時左右，六十二標起義軍由陸國榮、史明家率領，救出了闕鼎泰、李乾玉，趕走了標統顧筱軒，取得子彈，向省城進攻。江防營聞訊，立即集合全部兵力與六十二標革命軍展開戰鬥。六十一標官兵乘機衝出本標，徒手向省垣出發，擬進攻菱湖嘴彈藥庫。適六十二標也有一部分士兵前來奪取子彈，因一時不慎，引起了彈藥庫的爆炸。實則庫內所存多系舊式槍彈，並不合用。江防營和巡防營均系新發快槍，而且守城容易攻城難，革命軍被其擊敗，退往桐城。這次起義又失敗了。

江防營是朱家寶請來的客軍，紀律很壞，隨便搶劫居民財物，

城內两家當舖被其搶劫一空，还想打搶藩庫。安徽諮議局开会，逼着朱家宝把江防营調离出境，同时将潰散的一部分新軍招回，編为商团，来維持省垣治安，商团团长由王道济充任（王原是六十二标的教练官，相当于团附）。朱鉴于省垣已两次起义，大有朝不保夕之势，只得一一承认。于是安徽在九月中旬宣布独立，由諮議局推举朱家宝为都督，并要他交出藩庫庫銀，作为地方經費。这时藩司連甲早已逃走，各县交来的錢粮还存在藩庫，未解往北京。

九月下旬，有自称从武昌奉命前来接任安徽都督的王天培，携带炸弹四枚，到了安庆，要朱家宝立刻交印，否則武力对待。这是爭夺安徽都督的一个开头。朱原想借故离皖，随即将印交給諮議局轉交王天培。王只做了半天的都督，因为他带来的随行人員强剪老百姓的髮辮，触犯众怒，即被諮議局赶走，朱家宝又再次做了都督。但朱并无实力，全靠巡警道方耿环所带的一部分警察維持安庆地方秩序，因此朱把一切事情都推給方耿环，实际上是方在做安徽都督。

有刘国栋者，原是六十二标的教练官，认为有机可乘，竟率領一部分招收回来的新軍包围巡警道衙門，赶走了方耿环，自称都督。还有胡万泰帶領測繪学堂学生百余人，包围巡撫衙門，要朱家宝交出信印。胡的队长陈子誠对外宣称，胡是同盟会派来的安徽都督，并在督练公所自刻木印，以皖軍总司令名义布告安民。这时安徽竟有三个都督。

吳春阳（同盟会會員）眼見省城局面混乱，无法收拾，乃私自与九江軍政分府都督馬毓宝接洽，請其派兵援皖。馬毓宝派旅长黃煥章帶領了二千多人，臂纏白布，于九月中旬开抵安庆。他們到巡撫衙門鳴枪示威，朱家宝慌忙从东围墙挖洞逃走。黃出布告說，安徽

一切軍政由他負責，于是他又儼然成為安徽都督。黃的部下紀律最壞，到處搶劫，他們還搶劫了藩庫，焚燒藩司衙門，並殺死吳春陽。地方人士大嘩，立電駐在英山的新軍開回安慶，管帶朱基拒不奉命，由後隊隊官王盈實將他趕走，推桂丹墀為管帶，帶兵回省，擬用武力驅逐黃煥章。適馬毓寶的參謀長李烈鈞來到安慶，從中調解，使黃安然飽載而歸。李烈鈞被推為安徽都督，為時甚短，即離職而去。地方人士又再推桂丹墀為臨時都督，而胡萬泰仍以總司令自居，這時安徽事實上還有兩個都督。

先是管鵬、韓衍、高語罕等在九月初組織了一支青年軍，共四個隊，由韓衍任該軍總監，並電滬請派孫毓筠為安徽都督。十月初孫被派為安徽都督，不料行至大通，為該地軍政分府都督黎宗岳所阻。黎的目的是想自己做安徽都督。孫不得已退返蕪湖，由吳振黃派隊護送，始於十一月初到達安慶。孫接任都督後，以桂丹墀為軍務部長兼總司令，韓衍為青年軍總監兼代參謀長，管鵬為內務部長，財政則暫由諮議局管理。韓衍將青年軍擴充為四個大隊（即四個營），自兼第一大隊長，其他三個大隊長為韓凱科、劉松全、夏斌，分隊長為曹亞民、李橫一、王人、司照清等。這支隊伍上自總監，下至兵夫，每人每月一律發給銀洋八元，積極從事操練，成為孫毓筠一支可靠的武裝力量。

韓衍系同盟會會員，曾打進袁世凱的幕府充任文案，頗為袁所賞識。袁曾令其教公館里的使女們讀書寫字。韓暗中拉攏為袁所寵愛的一名使女，代她取名紅葉，結以恩義，囑其注意偷聽袁的機密，特別是對革命黨人不利的消息。紅葉果不負所托，時有消息給韓，韓即據以轉告有關方面。後來孫毓筠在南京活動革命被捕，牽涉及韓，兩江總督密電袁查詢。紅葉與韓知事已敗露，相偕逃往日

本，袁會懸賞偵緝，以无結果而罢。韓与紅葉在日本結为夫妇，韓比紅葉大十八岁，辛亥那年韓是四十二岁，紅葉才二十四岁。

辛亥革命前夕，韓衍化名来到安庆，在萃萃楼摆設书摊，以掩护革命活动。他经常在书箱内夹帶武器，由上海运到安徽，分給革命同志。辛亥后，他們夫妇住在安庆城里同安岑街的一所平房里，紅漆大門，自題門額为“紅葉詩館”，大門上的一付对联是“盘古第二，乞丐无双”。韓衍除担任青年軍总监兼代參謀长外，还出版一份报纸，叫做《安徽船》。紅葉做了韓的私人秘书，白天一同出外办公，晚上又一同回家替报纸写稿，韓的文笔鋒利，这份报纸曾风行一时。

駐軍在南京浦口的柏文蔚，也很想做安徽都督。当孙毓筠回皖在大通被阻，除折返蕪湖由吳振黃派队护送外，黃兴會囑柏文蔚派先鋒軍一营赶往协助。以此，柏认为孙之得任安徽都督是他成全的，并对外揚言孙吸食鴉片，白天不办公，不見客，实权握于韓衍之手，韓系江苏人，为了爱护桑梓，必須实行“皖人治皖”。柏會要求黃兴轉請孙中山先生派他为安徽都督。孙先生回答說，柏文蔚、孙毓筠都是革命同志，又是安徽同乡，讓他們自己商量，如孙不願相让，以后再談。

此事为孙、韓所聞，乃密商对策。一面由高語罕、梅佛航、高亚东、曹正明、范圍、刘铁生、李橫一、姚愚、管鵬、孙仲礼、程恩普、丁象謙等联名邀請韓衍加入安徽太和县籍，并在安庆北門內醒民戏院召开欢迎入籍大会。同时韓在《安徽船》上写稿大罵柏文蔚，罵他不是为了推翻清室而参加革命，而是借此搶夺地盘，升官发财。柏文蔚有兵权在手，自亦不肯示弱，因此双方电报往还，互相攻击謾罵。韓把孙、柏两人往来的电报編成《五日交涉記》，向外散发。柏

老羞成怒，认为孙是阿斗，韓是諸葛亮，要赶走孙毓筠，就必须杀掉韓衍，唆使他的本家侄子柏若浩（陆军小学毕业，在先锋军做队长）潜住安庆，在“红叶诗馆”附近伺韓出入，乘机下手。韓平日出入不带护卫随从，于民国元年二月被刺殒命，刺客得以从容而去。孙毓筠失去了韓衍，不久便把安徽都督让给了柏文蔚。

柏文蔚做了都督，首先就是解散青年军。由于柏的势力大，谁也不敢再谈韓衍被刺的事，韓就这样白白地牺牲了。刺客柏若浩少不更事，经常在外夸耀他刺杀韓衍是如何如何的勇敢，旋由柏文蔚暗地给他一笔钱，令他离开了安徽。

发动安徽起义的主要是一些同盟会会员，可是因为他们争权夺利，竟分化为八个党派：（1）社会党，负责人吕大任，阜阳人；（2）统一党，负责人姚愚，寿州人；（3）工党，负责人洪梦揆，皖南人；（4）平民党，负责人韓衍，江苏人；（5）保安会（原系青红帮），负责人叶松山，怀宁人；（6）进化党，负责人范围，太和人；（7）自由党，负责人高介，太和人；（8）国民党，负责人管鹏，寿州人。后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除保安会改为保安自治联合会外，其他七个党派均合并为国民党。

在柏文蔚争夺安徽都督时，还有一个淮上军总司令张孟杰也应该提到。张孟杰，安徽寿县人，原在安徽陆军骑兵第十六营任职，熊成基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于辛亥革命前夕回到上海。武昌起义后，他回到寿县，收集民枪组成淮上北伐军，编为十个大队，进驻阜阳。他和程恩普请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程的父亲）约定两军会师后，再向京汉铁路漯河、郑州进攻。清政府派倪嗣冲由河南周家口向阜阳进兵，与淮上军展开了一场战斗。

倪嗣冲是安徽阜阳倪家寨人，当时是河南藩台，钦命行营左翼

翼长，常穿黄马褂，巴图鲁銜，兼带第五十八协统领。他带着左翼军和一部分新军共二万余人攻打阜阳，连战三日三夜，淮上军以寡不敌众，被其击败。张孟杰和他的副司令扁秀章跳城逃走，全部官兵被俘。倪嗣冲入城后，大肆杀戮，凡是带有寿县口音的人无一幸免，杀了五千多人，才布告安民，嗣后又继续搜杀革命党人，柏文蔚的一些亲友也被倪杀害。寿县人与阜阳人因此结下了不解的深仇。

柏文蔚做了安徽都督，为了驱逐倪嗣冲，遂极力支持张孟杰重新建立淮上军，又派郭季成（清镇台郭保昌的儿子）在怀远、蚌埠一带收编杂牌军队万余人。还有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的几个毕业生在正阳关成立了一支革命北伐的皖军，以卢慈甫为总司令，王晋为参谋长。柏文蔚派人和他们联络，同时又在倪军内部做了一些分化工作，自以为很有把握，于是密令张、郭、卢三部分军队向驻在阜阳的倪军进攻。但是这三部分军队分驻三处，未能统一行动。郭季成的参谋长张保德系阜阳人，他不愿攻进阜阳后，眼看家乡人遭杀戮，于是怂恿郭季成以所部尚须整训为词一再拖延。及到定期出兵，张、卢两部已攻抵阜阳东面三十里铺，郭军才开始出动，以致被倪嗣冲分别击破，直追到颍上为止。淮上北伐军也就又一次地失败了。

一九一三年第二次革命爆发，柏文蔚宣布独立，在安徽组织讨袁军，他的对手又是一直驻在阜阳招兵买马与革命党为敌到底的倪嗣冲。袁世凯还增派了李辅助、王明臣两部翼军归倪调遣，倪的弟弟倪香圃也收编了一些地方军队前来助战，又密派王晋之兄王品阶前往说服王晋（王晋原是倪嗣冲的侄女婿，后来做过皖南镇守使，军长，安徽省长）作为内应。俟布置就绪后，倪嗣冲所部由颍上

出动，很快地就打垮卢慈甫的军队，占领了正阳关，随即攻占寿县、六安，并进逼安庆。柏文蔚逃走，由袁世凯任命倪嗣冲为安徽督军。

倪嗣冲把他的军队改编为安武军，倪香圃做了皖北镇守使，驻扎寿县，又搜杀了大批革命党人。以此寿县人更恨倪刻骨，但以他的实力雄厚，敢怒而不敢动。张孟杰、管鹏、袁子金、岳相如、郭季成等都逃往上海，起初还在一起商议如何复仇，并进行暗杀，可是日子一久，便掩旗息鼓，烟消云散了。

辛亥前后合肥的革命活动 与軍政分府的成立

龔 嘯 云

一九〇五年七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合肥籍的留日学生吳春阳(号暘谷)、吳春生(号阳初)、高蔭藻(号季堂)、蒯寿樞(号若木)、殷葆田(号季樵)、王善达(号兼之)、王天培(号元輔)等人都参加了这个革命組織。是年吳春阳由日本回国，在合肥建立了同盟会的分支机构。首先参加的就有胡渭清、张踐初、李誠安、沈斌、殷羲樵、龔石云、龔嘯云、楊完貞、张仰民、刘煥文、黃健六、黃梅村、許世欽、范质夫等人。其后陆续参加的人很多，声势也一天比一天壮大了。

由吳春阳等人首先倡議組織“合肥学会”，王兼之、吳阳初、殷季樵、殷羲樵、王和甫、范肃甫等人皆紛起响应。“合肥学会”正式成立后，外表上虽然用的是“学会”的名义，实际上則是組織群众、宣传革命运动的总樞紐。革命党人通过这个学会的运用，得以占有了地方教育方面的重要位置。如吳春阳当上了城西学堂堂长，所請的教师楊完貞、刘煥文、黃梅村等人，都是同盟会会员。学堂里的两百多师生中，也有許多优秀的积极分子分別担任了联络工作，使得革命思想能够开始传播。此外，吳阳初任劝学所所长，殷

季樵任教育会会长，殷羲樵任模范小学堂堂长兼师范讲习所所长，龔嘯云、张仰民等人担任小学堂教员，許世欽任天王寺小学堂堂长，胡渭清任文昌宫小学堂堂长。接着，沈气寒、范章甫又聘请了孙品驂、周世平、吳伯奎等人联合创办了城南小学堂。王兼之不仅担任自治研究所的坐办，而且又兼了商会的坐办。这许多同盟会会员的有利工作环境，给他们带来了可以接触各方面社会人士的大好机会。

另外，他们又组织了暑期学术研究所，负责联络各地有志于革命的青年学生。这个研究所与合肥学会同为辛亥时期革命党人在合肥地区策划革命的两条有力的臂膀。此后，经过他们的积年累月的努力，革命势力在广大的青年学生以及社会人士中日益扩展起来。例如戴生昌轮船公司曾在内河行驶的小轮上悬挂了日本国旗，当时许多青年人认为非常有辱国体，纷纷起来反对，终于迫使小轮扯下“太阳旗”。

当时合肥反革命的势力十分强大和嚣张，其中以巨绅李国松（号健甫，又号木公）势力最大。他是四品京卿，父亲是当时的云南总督。不仅地方官吏都仰其鼻息，听其差遣，就是当时本省的一些上层官吏，也大都对之言听计从。同盟会会员王兼之认为这一恶势力必须首先推倒，但又感到这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若是和他正面对抗，必将更增阻碍，使革命活动无法开展，遂决定由王兼之去和李国松及其喽啰们故意表示亲近和合作。此后，李国松集团对于革命党人不但不加怀疑，相反地却把革命党人当作心腹；因之，那些一贯听李摆布的府县官吏，亦以上宾礼节款待革命党人，遇有疑难问题，还经常和王兼之商量解决的办法。这便为辛亥革命时期合肥革命活动创造了另一个有利条件。

湖北革命党人武昌起义的消息传遍安徽以后，李国松终日徬徨，吓得走投无路，当时在合肥的革命党人根据这一有利的情势，首先由王兼之力劝李国松赶赴上海避难。李一走后，马上人心动摇，谣言四起，府县官吏也惶惶不可终日。接着，由于情势发展迅速，同盟会国内总部便派干员孙品驂赶到合肥，和王兼之、胡渭清、殷羲樵、王和甫等秘密进行策划和指挥，并派人到西乡各圩户商借枪支，运动自卫队归顺，号召在南京、蕪湖、安庆等地读书的合肥学生赶紧回到合肥。当时革命党人已大批进城，携来大量猛烈炸弹，扬言将先炸某地某人，知府穆特恩和都司常某（都是旗人）吓得连夜逃走了。

当时駐肥江防营管带季光恩（綽号三狗子）所掌握反动武装力量（有套筒毛瑟枪二百枝），本来是因李国松为了保护他私人安全，商請巡撫朱家宝調駐合肥的。李既然远避上海，季光恩也就成了丧家之犬。这时候革命党人又利用了季光恩与季五狗子（季九仙，三狗的五弟）之間的矛盾，編造了季九仙将要杀掉他的哥哥取而代之的传言，季光恩信以为真，求救于王兼之。王对季故意表示十分关切，并說：“你們兄弟感情平日很坏，令弟出此恶意，自非无因，而且目前軍心涣散，你如回营，恐有不利。”因而婉劝季留住下来。季見王的态度很真挚，也就当面答应了。王兼之为了使季对自己更信任，把自己在日本购买的一把倭刀交与季带在身旁，并表示保证季的安全。后来王又晓以大义，劝他把管带交出，季也接受了。这样一来，江防营这个反动武装力量就被解除了。

此后，孙品驂又派宋惠霖与民团团长金貽堂取得联系。民团有一百二十人，套筒毛瑟枪一百支，枪支原系李国松私人购置，存放在庐州中学堂内，辛亥前一年取出交与金貽堂創辦民团。此时金

貽堂感到大势已去，而且与王兼之又系亲戚关系，平日常有往来，因而也就接受了宋的劝告，自动交出全部人枪，听候改编。后来决定仍由金担任团长。接着又由西乡圩户运来一些杂色枪支，又派徐茂和（县府的馬快）联系了府卫队閻紅臉，陆华庭也集結了一百一十人作为基本敢死队。这时候不仅形势发展得更为有利，而且兵力亦大为充实，当即决定定期宣布成立革命政府，并作了如下布署：（一）民团維持城内秩序；（二）江防营担任城防工作；（三）敢死队集合在天后宫广场，准备专门担负警备责任。

等到一切都安排停当，即由王兼之約同地方人士与知县李維源（号松圃）进行談判，当时李維源表示接受任何条件。王兼之等人离开之后，李突然变卦，并調动人馬，准备抵抗。閻紅臉見事不妙，連忙急报孙品驤。孙等本想用武力解决，后恐地方上遭到无謂的损失，仍由王兼之再到县府进行劝說。李維源因見衙内人心已变，自己已处于不利地位，只得接受以下三項協議：（一）将县府改为軍政分府的民政部，部长一职仍由李維源担任；（二）衙内人事不予变更；（三）改換原来的旗帜，交出县府庫存枪弹。

当天（九月十九日）下午，同盟会召集了全体人員到天后宫广场举行大会，会上公推孙品驤为总司令，更換了清廷規定的龙旗。会后又到合肥大书院成立了軍政分府。軍政分府内自总司令以下分为五部：民政部由李維源任部长，后李要求离职，改由周履平担任；巡警部設立在博济医院内，由张踐初任部长；財政部設立在文昌宫内，由邓鶴仙任部长；參謀部設立在軍政分府内，由刘亮章任部长。执法部也設立在軍政分府内，由許拙云任部长。此外还設有经理处，由李馨斋任处长，秘书处由徐炎东任处长，顧問处无处长。对于軍队的編制及人选也都作了适当的安排。軍队各部負

責人為：協統袁斗樞，標統季光恩，第一營營長季九仙，衛隊營營長夏永倫（即夏叙堂），模範營營長余立奎，學生隊隊長萬晏南，先兵隊隊長熊楚伯，炸彈大隊隊長周虎青，中隊長鮑哲文、范章甫。另外又組織了敢死隊一百名，由范章甫交由朱介葆率領赴南京參加鐵血軍。後又成立第二、第三營及炮營，分別由李海波、郭子清、黃魯珍三人擔任營長。

淮上軍革命实录

政协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

淮上軍崛起寿州，对于辛亥革命时期江淮地区的革命斗争，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兹经实际调查访问，并参合部分征集来的资料，写成实录如次：

一 辛亥革命前党人在寿县的活动

二十世纪初寿县人民的反清斗争，是在同盟会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一九〇五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寿县留日学生参加的有十三人之多，著名的有孙毓筠、张汇滔等。一九〇六年春，孙毓筠、张汇滔、程恩普（阜阳人）奉东京同盟会总部之命，回国策动江淮革命运动。孙毓筠过南京时因谋刺两江总督端方未遂被捕，张汇滔、程恩普等即分赴寿县、阜阳开展革命活动，因为同盟会为清廷所深忌，张汇滔回寿县后，即组织了信义会，但仍用同盟会入会誓词。因此，这一革命组织实质上是同盟会的分支。信义会成立后，淮颍之间有志之士入会的很多。一九〇八年农历三月二十五日，为寿县城北四顶山香会期，信义会打算乘是日城门大开、清吏防范较疏的机会，发动起义，后因机密泄漏，改变了计划。旋安庆熊成基起义失败，信义会的组织被暴露。其时清政府迫于大势所趋，下预备立宪之诏，赋予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以期

緩和清王朝與人民之間的矛盾。張匯滔等見信義會的名義已不能繼續存在，遂聯合王慶雲、張綸、袁家聲等在城內成立農會，以這一“合法”組織為掩護，大力進行革命活動。他們時常召開城鄉會員大會公開或秘密地講述國內革命形勢，抨擊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號召大家團結起來，以爭取生存的權利。這樣，農會就成為壽縣革命活動的總樞紐。

一九〇九年，全國各地反清浪潮風起雲湧，清政府為了苟延殘喘，不得不縮短所謂預備立憲期間，各省提前成立諮議局。安徽諮議局成立時，壽縣推選王慶雲為議員。王素性爽朗，善於辭令，在會議中，每有論列，娓娓動聽，深得安徽巡撫朱家寶的重視。王在朱前進言：“皖北匪勢甚熾，人心浮動，似宜組織地方武力，以資鎮懾。”朱從其言，撥步槍七百支（是帝國主義供給清政府用來打太平軍的）給他成立團防局，並派他為局長。王喜出望外，回縣後告同志們說：“當朱答應撥槍時，有一劉姓統領曾諫阻說：‘王恐將為苗沛霖（按苗在晚清時以舉辦團練起家，曾一度投靠太平軍）。’朱說：‘安見王不為曾國藩？’”大家聽了大笑。張匯滔說：“我們既不做苗沛霖，也不做曾國藩，我們要做革命黨。”

王慶雲取得了七百支槍後，即和張匯滔、張綸、袁家聲等一起，着手建立團練。他們一面收集民間槍支，以充實武器裝備；一面通過農會組織聯莊會，將各莊成年人每十人編為一班，每三班為一小隊，每三小隊為一大隊，大隊歸團防局領導。於是反清的武裝力量開始組成。

二 壽州獨立的經過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首舉義旗，各地紛紛獨立響應，壽縣

人民亦极为振奋。十一月初，张汇滔、王庆云、袁家声等召集邻近各县同志会议，筹划响应。到会的有凤台廖海粟、廖梓英；寿县张綸、王占一、权道涵；定远方紹舟、张范侯；凤阳田亚豪、刘安武、刘敬成；怀远楊筱哉、楊筱南等。这些人大多是参加新军的同盟会员。会上袁家声首先发言：“黎元洪已在武昌起义，我淮上同志应马上发动响应，以壮大革命声势。”张汇滔接着说：“武昌居长江上游，寿县是长淮重镇，军事上必须彼此呼应。况武汉系京汉路终点，长淮当津浦要冲，直捣北京，朝发夕至，我党驱逐鞑虏，建立民国，在此一举。谚曰：‘宁为鸡口，不为牛后’，我们应该马上干起来。”大家一致表示赞同。

当时驻在寿城的清军共有七营，二千余人，革命的武装力量和清军不相上下，而士气高涨，则远胜清军，光复寿县有十分把握。会上经过反复研究，确定十一月十五日为起义日期，城内城外同时发难。当即作了以下部署：

- (1) 王庆云、王体乾率队进驻东南城郊，以备攻打东、南门；
- (2) 岳相如率队进抵北门城郊，以备攻打北门，快枪不足，辅之以板刀片斧；
- (3) 袁家声、郑养元率领三百人扮作商人，携带武器进城至秘密处集合，以备攻打总兵署；
- (4) 萧良朴、李家锐率领三百人扮作农民，携带武器进城至农会集合，以备攻打州署；
- (5) 郭行健、孙仿轩率领一部分人组成预备队，以备起义时打开城门；
- (6) 程华亭率领一部分人看管清官吏家属；
- (7) 张綸、李筱然等出入官府，为革命虚张声势；

(8)密发“围城”口令,以免誤会;

(9)以上布置限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夜半以前完成。

十一月十四日,起义人員携带武器紛紛伪装入城,风声很大,地方官吏已有所聞。担任出入官府虛张声势的李筱然,这时被知县孙紹英扣住,說他图謀“造反”。李筱然知道事机泄露,不能后退一步,就把县大堂公案掀翻,大罵知县,并說:“你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长在头上。”孙知县竟被他这一鬧吓跑了。这时清朝官吏逃的逃,躲的躲,都觉得大势已去,只好靜候事态发展。是日夜九点,城外放起焰火,城内革命党得知城外革命軍已兵临城下,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开城門,占領总兵署、州署;清軍因懾于声势,不敢出而抵抗。当革命軍冲进州署时,清兵仓皇不知所措,紛紛鼠窜。接印才三天的总兵李某已逃跑,经派代表交涉,所有清軍均願繳械投降。知县孙紹英避匿在某状元家,也答应交出大印、档案。革命党人通知各商店照常营业,公买公卖,門前悬灯,百姓不要乱跑,城内一时混乱情况也就归于平息。第二天(十一月十五日)全城悬挂白旗,市民臂纏白布,寿县遂告光复了。

三 淮上軍的組成

寿县光复后,根据众議成立淮上革命軍司令部,推王庆云为总司令,张汇滔、张綸、袁家声为副总司令,张兼参謀长,下設民政处、审判处,孙仲羽、孙建侯分別担任处长;又委派王庆云、张汇滔、张綸、袁家声、廖海粟、段云、权道涵、毕鏡波、岳相如、李子久、楊穗久、李筱然、王占一等十三人为軍統;軍統下設支队(团)、营。

淮上軍司令部成立后,即着手改編清軍,清軍原有官兵三千二百多人,除少数被責遣回籍外,其余均参加了革命軍。并張貼布告,

劝募义务兵，布告旁贴着标语：“愿当义务兵的快把辮子剪掉”。一时大街小巷，辮髮满地，四乡农民也割掉“辮子”前来从軍，一时报名申請的竟达到二万多人。经过挑选，編成步兵十八营，馬队一营，炮队二营。

四 淮上軍光复皖北各州县

淮上軍经过改編扩充，除留一部分担任寿城警卫外，其余分兵三路向皖北各州县推进。

第一路由袁家声、楊穗九、岳相如率領，出征怀远、定远、凤阳、蚌埠等地。怀远在寿县起义后，土匪蜂起，地方秩序混乱，因此怀远人民都希望淮上軍能早日到来。当淮上軍行至怀远附近的常家坟村，怀远的地方代表刘楚南等即前来欢迎，駐在怀远的清軍便撤至城西。各乡土匪乘此空隙紛紛聚攏，包围怀远。清知县宋南生欲逃不得，只得关起門来和攻城的土匪作战。当淮上軍兵临城下时，宋开門迎入，土匪也紛紛逃窜。淮上軍向凤阳、蚌埠进发，駐在凤阳、蚌埠的清兵負責人杜清元見大势所趋，不敢为敌，率部投誠。凤阳、蚌埠就为淮上軍光复。蚌埠光复后，駐防南京的清軍张勋所部見退路被切断，仓皇弃城搭津浦車北窜徐州。淮上軍获悉这一消息后，于十二月二日在蚌埠小南山架設大炮准备截击。不料狡猾的张勋已估計到这种情况，当車至蚌埠以东八公里时，即派出兵二营向車站搜索推进。淮上軍不够沉着，开枪射击。张勋部随即全部下車，沿铁道两旁护車行駛，并用数倍于淮上軍的兵力包围蚌埠。混战一夜，淮上軍始終保持了小南山陣地。张勋所部虽得通过，北窜徐州，但已尸橫遍野，潰不成軍。是役淮上軍亦陣亡一百六十余人。

第二路由权道涵、段云、洪振九等率領，出征合肥、六安、霍丘

等地。这一路进军很顺利，他们行至合肥附近，合肥已宣布独立；行至六安、霍丘，清军逃跑。淮上军未发一弹，未折一兵，就光复了这些地区。

第三路由张汇滔、孙多蔭率领，经正阳关沿颍河北上，向颍上、阜阳推进。淮上军未抵颍上时，曾派代表张拱宸和知县孙世楷谈判，争取和平解决。孙起初同意退走，后又变计，实行抵抗，并率队搜查张拱宸住所，张越墙脱逃。于是淮上军先头部队一百余人向颍上进攻，在新河口和清巡防营交战，未能取胜，损失过半。及大队援军赶到，分攻颍城东、南二门，城破，直扑县署，孙世楷缒城逃走，颍上遂告光复。颍上光复后，淮上军挥兵进取阜阳。阜阳旧为颍州府治，毗连豫东，地处冲要，向有“中州右臂”之称。同盟会会员程恩普于一九〇六年春由东京回至阜阳，建立了由孙中山先生命名的“安仁会”，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当淮上军向阜阳进逼时，颍州知府长绍派驻军张士元部迎战。程恩普就召集安仁会员一百余人在城内发动起义，宣布阜阳独立。阜阳知县胡汝霖投降，知府长绍借丁忧为名，逃离颍州，阜阳训导江调鼎除投降外，又劝巡防营管带胡焜鹏把部队拉跑，于是阜阳便在程恩普的领导下光复了。这时淮上军已击败张士元，张汇滔就率所部进驻阜阳城内。张士元率残部一营逃至城西龙王庙，阴谋反扑，部下不听命，把他杀了，所有官兵均跑回城内投降。至此阜阳境内，已无敌踪。这一路淮上军经过整顿、扩充，已增加至五千余人（比从寿县出发时增加了一倍），乃由张汇滔率一部下蒙城，没有遇到抵抗。程恩普率一部经渦阳、亳县，渦阳士绅王善德率众出城欢迎，渦阳光复。亳县驻军统领李辅助见淮上军来攻，不敢迎击，派出代表和程恩普谈判投降。适在此时，清提督姜桂题（皖人）有密电给他，唆令抵抗，李就变计，一面欢迎

程部进驻亳县，約程于亳南溜子集会晤，一面暗中調动部队，打算乘程不备，对他突然襲击。程如約而往，李輔助伏兵突起，短兵相接，肉搏数小时，程部終因寡不敌众撤退。这次战斗，淮上軍陣亡官兵五十四人，伤一百人。

五 淮上軍拒倪的战斗

穎州府所属各地光复后，张汇滔等正拟乘胜西征豫东沈丘、淮阳等地，并进窥京汉路中段地区以牵制河南、湖北反动势力，支援武汉革命軍。議定未发，清政府已起用袁世凱，形势发生了变化。袁世凱阴谋夺取政权，一面派段祺瑞、馮国璋率队南下攻陷了汉阳；一面派倪嗣冲率队向阜阳反扑，威胁江淮。倪系河南布政使兼武卫軍左翼长，阜阳人。阜阳光复后，倪的胞弟倪毓棻，和阜阳大地主宁继泰均逃往河南，促倪出兵。倪就分兵两路进攻太和，一路以步兵二营、炮兵一队由穎水南岸进攻，一路以馬队二棚、步兵一哨由穎水北岸进攻，自己則亲領一队作为后应。淮上軍駐太和的負責人宁治元見来犯清軍数倍于己，遂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日夜半撤离。倪进抵太和，接到清內閣停战議和的电报，秘而不宣，革命軍派代表宁隽元与之交涉，他也不理，并积极布置向阜阳进攻。张汇滔感于力量分散，不易制敌，只派一小部分兵力在距离阜阳三十五里的刘家集和倪賊接战，其余部队均留在城内，构筑工事，准备給来犯之敌以坚决的打击。十二月十一日早晨，倪部进犯阜阳，十二日合围，淮上軍凭城坚守，杀伤敌人很多。倪部攻打二日，均未得手，乃更糾集阜阳境内以周家凱为首的反动地主武装二万人投入战斗，继续攻城。淮軍以一当百，再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倪嗣冲見屢攻不下，就改变攻城計劃，一面准备大量云梯，作

再攻之用；一面指使反动士紳吳峰恩、趙安潤策動已投降淮上軍的巡防營管帶朱啟勛、團防練勇管帶徐金城倒戈，在城內接應。由於淮上軍缺乏革命警惕性，把投降的清軍看作心腹；又由於只注意防守南門和東門，配備在西門和北門的兵力過於單薄，因此，當十二月十四日倪部猛攻西門和北門，城內已投誠的清兵二營倒戈相向時，淮上軍就內外受敵，處於不利的作戰地位。雖然如此，淮上軍仍然與清軍展開激烈的巷戰，使清軍死傷枕籍。直到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七時，清軍攻開四門，大批涌進，張匯滔才率隊分頭突圍。這次戰役，淮上軍光榮犧牲五百八十四人，被俘三百人，僅張匯滔族人犧牲的即有五十七人。倪嗣沖這個殺人魔王在攻陷阜陽以後，曾進行了駭人聽聞的大屠殺。他除把三百個被俘人員全部槍殺外，還把阜陽城內的外地人集中到城皇廟，叫他們報數，只要聽出不是阜陽口音，就一律當“亂黨”殺戮。一時城皇廟前尸積如山，血流成河。而他則因鎮壓革命“有功”，獲得了額爾德穆巴圖魯勇號。

六 北伐軍驅倪的戰爭

阜陽失陷後，程恩普親赴安慶、南京請兵。安慶革命黨人對於倪嗣沖違約進攻及其暴行極為憤慨，遂組織北伐軍，以段志超為司令，管鵬為參謀長，率步、騎兵七營出發討倪。途經合肥，合肥軍政分府派出步兵一團，由劉文明率領會同北伐。到了正陽關，與南京第一軍盧慈甫部會師，沿潁河北上。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北伐軍進抵阜陽城東四十里鋪，倪嗣沖聞訊率部至十八里鋪駐紮。二十八日夜，北伐軍開炮轟擊，二十九日早晨與倪部開始激戰，北伐軍以機槍猛烈掃射，沖鋒數次，倪不支，退至十五里鋪。北伐軍乘勝由

河路上岸向敌猛攻，敌抱头鼠窜，一直退至城内。这次战斗，敌军被打死及自相践踏而死的不计其数，倪嗣冲也差点儿做了俘虏。倪退至城内，于一月三十日悬重赏，开城分三路杀出，与北伐军决战，战况至为激烈。由于倪部炮营管带于九峰、队官段其滨倾向革命，故所发炮弹多落北伐军阵后。又由于北伐军英勇善战，倪虽倾巢出犯，终未能转败为胜，不得不仍旧龟缩城内。倪以战事不利，不断向清廷和袁世凯求援，谓“颍州不保，豫东必随之动摇，影响大局非浅”。可惜北伐军指挥不统一，又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轻敌，当着倪毓棻率队过颍河袭击北伐军左侧，而倪嗣冲又从城内反扑时，北伐军两面受敌，节节败退。以后虽经革命党人王金滔率队驰援，也未能扭转败局。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南北和议告成，北伐军奉命班师，从此皖北人民就生活在倪嗣冲的反动魔掌之下长达十三年之久。

倪嗣冲进入皖北以后，首先扩充反动军队，组成五个混成旅六十个营，军餉则由地方摊派。他以此为资本，不久就做了安徽督军。所有县长及税局局长，均派遣他的爪牙充任，甚至学校校长也多数任用他的私人。在皖数年，敲榨勒索，吸尽人民骨髓，仅他私人财产即达银洋八千万元，并护有七、八万亩土地，对革命青年及社会进步人士，任意加以“乱党”、“帮匪”等罪名大肆杀戮。又派遣刺客在上海刺杀了淮上军领袖张汇滔。

辛亥淮上起义，给皖北人民带来了一线光明希望，因而淮南北健儿踊跃参军，建立了淮上革命军的人民武装，三路出师，光复了二十一州县，在皖省辛亥革命史上写下了轰轰烈烈的一页。但是，后来反动军阀又代替了专制王朝，通过倪嗣冲的魔手，把安徽人民重新投入黑暗的深渊，辗转呻吟于罪恶统治下者，将及四十年之

久。依靠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安徽人民才得和全国人民一道拨云雾而见天日。

辛亥宿州光复杂忆

张从五 丁洁尘

辛亥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宿州(今宿县)以后，地方文武官吏大起恐慌。他们深怕“改朝换代”，地位不保，因此与撤职还家的雷震春(原系清政府江北提督)秘密计议，设法应付革命潮流，保持自身权位。

雷震春等商定办法后，于九月十二日(阴历，下同)召集官绅商学各界开会，宣布宿州独立，组织保安军。雷自任总司令，以驻宿陆军管带王宏钰为左翼统领，驻宿巡防营营官李亨为右翼统领，另招新兵一营，以杨棣华为管带。知州李铭楚(他讯问偷盗的案子，要将嫌疑犯先打两千皮鞭再问话，宿人给他起了个诨号叫做“胡处”)改任保安军执法官。司令部设于自治局内，分总务、军事、财政、交涉等科，就绅商学界中选了一些人分任各科工作。这些人对于雷震春等的素行和独立意图，心怀疑虑，大多回避不干。

宿州位居津浦铁路线上，这时常有过境的溃兵骚扰地方。清江十三协溃兵尤多，百十成群，全付武装。雷震春以旧上司资格派员往符离集树旗收容，溃兵不颀而去。我宿四境本有股匪出没，这时遍地皆匪，城关亦不时发生抢劫案件。李铭楚出入衙署，仍旧翎顶朝靴，他认为这样才可以镇定人心，维持秩序。宿城典当钱庄被抢以后，商店不敢开门，街面上无人行走，形成死城。雷震春因

斥責保安統領說：“这样鬧是不让我戴大孝帽子！”（他家正在准备出殯，所以这样說。）統領李享受了雷的斥責，竟将一个姓卢的百姓割去一只耳朵，說他不該拍店家的門，又捉了一个跛足乞丐，当街吼叫說：“有我在此，你們能造反嗎？推出斬首示众。”其实，城关搶劫案件，大都是軍隊所为。这时地方武装，除保安軍以外，还有李銘楚的卫队二十人，馬祥斌的警察十五人，商团三十人，居民守望会三十人，都有枪支。带商团的张佩麟，八字眉，头上裹紅巾，怪模怪样，口头上对公益十分热心，但据說錢业公所的被劫就是他手下人干的。

十一月二十日下午，张勋从南京北逃，过宿州車站，雷震春往車上相見，相抱大哭，不知他們談些什么。二十四日晚間，雷也悄悄地登上北行的火車走了。街头巷尾，老百姓都把雷震春导演的这一幕假独立戏当作談笑資料。有的說他两个月的做作，把持地方，趁火打劫；有的說，他为了装璜丧事，人馬刀枪拥护他媽出殯，棺入了土，就滾蛋了。其不得人心如此。原来雷震春是北洋軍閥头子袁世凱的心腹爪牙，这时已知道清廷起用了袁世凱，所以急急忙忙地跑往北京，继续干他那反革命的老行当去了。后来他跟着袁世凱做了几年的軍政执法处长，成了双手沾滿辛亥革命党人鮮血的劊子手。溥仪复辟的时候，他又跟着张勋，做了短命的陸軍总长。

雷震春走后不久，山东陸軍方营和泰安巡防营李統領所部，都开到了宿城，声称堵御南軍（时人称革命队伍为南軍）。于是四門的白旗（系独立时悬挂的）收起来了，所謂独立就无形中取消了。人心惶惶，怕南北两軍在当地打仗。一部分向往革命的人，則希望北伐革命軍快些来。到了十二月十六日，北伐軍开到了，北軍以东

关房屋为掩护，进行阻击，北伐軍則沿铁路向北軍冲鋒，战斗三小时，北軍不支。方营早已將軍需品搬运上車，准备退却，此时就全部登車北逃。泰安巡防营想退守城内，地方人民不肯帮助，不得已乃集合繳械。于是战事結束，北伐軍入城，我宿才真正光复了。

到宿北伐軍系由粵軍、鎮軍和淮上軍三部分联合組成的。粵軍司令为刘逸俠，鎮軍司令为郑为城，淮上軍司令为陈干。他們进城在自治局接見紳商学界代表，并出告示安民。各界首腦人物多剪去辮髮，表示傾向革命。第二天，三个司令又在商会召开會議，推定前知州李銘楚为民政长(县行政首长的名称)。沒有几天，因为他隱瞞枪支，被鎮軍赶走。继任的先为宋城，后为方刚，都是由省里派来的。

这三部分軍隊，粵、鎮兩軍紀律都很好，进城后不暇休息，即出发巡邏，并阻止淮上軍士兵的搶劫，直到今天老年人談及旧事，还贊叹不已。淮上軍陈干所部原是宿州的股匪，陈用匪首胡继同兄弟为团长，进城以后公然搶劫。由于粵、鎮兩軍的制止，商民損失不大，但淮上軍給宿人留下的印象是很坏的。陈干又用諸曇和尚为軍师，敬礼备至，坐臥不离。諸曇是凤阳龙兴寺住持，說是要学他的祖师朱元璋(明太祖)，因为朱是龙兴寺和尚，后来作了皇帝。陈干还自以为是本省軍隊，夺取了地方枪支八十杆，又逼繳軍隊給养六百吊(一吊为錢一千文)，声称如不即日交齐，他对部下的行动就不負責。自治局主事人怕生事端，每日設筵款待他和他的士兵，直到他們离去为止。他們行为橫暴，一点也不像革命軍，宿人傾向革命的热忱因而大大低落。

宿州光复后改为县，知州改称民政长，后又改称县知事，还成立了县議會。由于参加活动的只是紳商学界少数代表人物，而且

鬧假独立的雷震春虽走了，但是地方政权仍然为旧官僚、小军阀和封建土劣所把持，广大劳动人民依旧无权过问。所以“革命”的结果，就社会的形式上说似乎改变了一些，但就政权的实质上说仍是换汤不换药。个别热心的知识分子，也想做点革新工作，可是除了男子剪辮、女子放足以外，什么事也做不了。到了十二月間，南北和議告成，北伐軍撤退，北洋軍南下，連一点点革命的气氛也跟着消失了。不久革命党人討袁失敗，倪嗣冲从颍州来宿，公然叫嚷“要杀尽匪类(指革命党人)”，从此我宿人民随着辛亥革命的失敗而墮入了軍閥黑暗統治的深淵，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得到解放。

辛亥革命前后安徽青年学生 思想转变的概况

高一涵

辛亥革命前后是我国各阶级、各阶层、各派系的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也是我国政治思想变化最复杂的时期。在本文中我想叙述一点关于安徽小资产阶级青年学生思想转变的概况。

那时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固然对青年学生都有一定的影响，但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清廷废科举设学堂这一重大改革。今天所说的青年学生，就是那时所说的“童生”、“秀才”。在那时，凡属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多借科举为进身之阶。他们都是为应科考而学习，考八股则学八股，考策论则学策论。自废科举设学堂之后，他们进身的道路由科举转到学堂，在学堂中所学的课程则是西学重于中学，科学重于经史。他们看到清廷腐败，国势危急，瓜分惨祸，迫在眉睫，非变法不能图存，非科学不能救国，因而都迫不及待地走出私塾，进入学堂，弃八股，废策论而学西方科学，想从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找到富国强兵之道。当时凡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学生，民族大义耿耿在心，无论他们的政治理想如何，而对丧权辱国、腐朽无能的清廷统治则深恶痛绝，因而他们的思想都从四面八方汇合成为推翻清廷、

恢复中华的革命主流。

安徽青年学生接受革命思想也不是偶然的，据我回忆，至少他们都受到了下述三方面的影响：

一、受革命烈士英勇壮烈牺牲的影响：

过去安徽青年学生处在风气闭塞的农村中，新事物接触得不多。这时他们到了城市，进入学堂，看到报纸。他们听到了皖籍革命青年万福华刺王之春，吴樾炸五大臣，倪映典参加广州起义，宋玉琳、石竞武在黄花冈一役中牺牲等等轰轰烈烈的革命义举，所受的教育极为深刻。尤其是一九〇七年他们亲眼见到徐锡麟因枪杀恩铭，被清廷用剖腹剜心的惨刑处死，及一九〇八年熊成基率马炮兵起义，株连到许多青年军官如薛哲等被清廷就地正法，枭首示众的惨事，感受更深。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安庆。我同一些青年学生都见到有人捧着徐锡麟的血心在恩铭灵前致祭；看到了薛哲的头颅被砍在撫台衙门的门前。可是清政府这样的血腥镇压革命，不但没有吓倒青年学生，反而激起了人民对清廷刻骨的仇恨。就是亲自监刑的继恩铭而为撫台的馮煦（号梦华，金坛人），接到端方要把徐锡麟剖腹剜心的电令，也感难以下手，故先把徐的睾丸击碎，使他失掉知觉后行刑。馮煦后来在安庆大观亭上写出一付对联：

“来日大难，对此茫茫百端集；英灵不昧，鉴兹蹇蹇匪躬愚。”上联是暗中说明革命形势发展，觉得前途茫茫，百感丛生；下联是暗中乞求徐锡麟的阴魂原谅，原谅他是为清室尽了愚忠，不是为了自己。这付对联，名义上是追吊埋骨在大观亭畔的元代死难忠臣余闕，实际上却是对徐锡麟的灵魂表示懺悔。

一九〇八年，西太后与光緒帝同时死去。那年秋季正值新军在安徽太湖秋操，军队云集，士兵都携带武器，军队里革命党人很多，

声势浩大，謠言更多，人心为之激动。这些消息传到学堂中去，多少青年学生都摩拳擦掌以待新軍起义。有一天安徽提学使吳同甲和安徽高等学堂监督洪思亮在高等学堂內为“两宫晏駕”举哀，大礼堂的前排是与祭的官吏，后排皆是学生。司仪人叫“跪”时，官吏一一跪下，学生則弯腰而不屈膝；司仪人叫“举哀”时，官吏号啕大哭，学生中有許多人却哈哈大笑。因此，吳同甲为之色变，怕受“大不敬”的处分，又无法制止，只得假装沒有听见，草草了事。可見那时青年学生对清廷統治阶级是如何痛恨。

以上所举的几件事实，促使安徽青年学生在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对清朝統治十分仇恨，对革命則表示同情。

二、受革命志士宣传教育的影响：

那时安徽青年学生，不管是进入中学，或者是进入高等专门学堂；不管是进入文学堂，或者是进入武学堂；不管是在文化界中参加报館、学会、图书馆、教育会或其它社会团体；不管是在军队方面到新軍中应征入伍，或者是进陆军小学，进陆军測繪学堂等等，沒有一个不受革命潮流的冲击。当时所有的文武学堂以及各种社会团体，几乎都有革命志士在其中进行革命宣传工作。

例如怀宁人葛襄在安庆办了一个尙志学堂，实际上成了革命人才的培养所，后来許多学生都同陆军小学、陆军測繪学堂的学生一道，参加了安徽的青年軍。桐城人李德膏(号光燭)于一九〇四年把他在长沙所办的安徽旅湘公学迁到蕪湖，改名安徽公学，聘請了刘师培、陈独秀、张之屏(号树侯)、謝无量、苏曼殊、柏文蔚等做教員，皆成为革命的宣传者。該校一时成了革命的策源地。炸五大臣的桐城人吳樾，就是安徽公学的学生。

再如通俗报社、图书馆、教育会等团体，过去均不大被人重視，

但是李辛自主办的《白話报》、陈干生主办的通俗报社、楊轡龙(号云林)主办的皖北教育会等，都起了組織革命和宣传革命的作用，有的报纸被禁止发行，有的团体被解散查封。

对青年学生刺激尤深的书籍，如明末的遺民著作以及对清軍入关残暴行为的记录，私立藏书楼中都有暗藏的。青年学生一讀到《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书，民族意识得到激发，就容易把他們卷到革命狂潮中去。这类书籍对安徽青年学生的思想转变都起了极其显著的作用。

一九〇五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民报》，更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沒有象《民报》这样膾炙人口、激动人心的。我个人关于《民报》有一段小故事。我在考取安徽高等学堂以前，曾在六安县中学肄业。这个中学监督喻康侯是一位“道学先生”，他在学校中兼任国文教員，对我的作文大加赏识。当六安县政府选送我投考安徽高等学堂时，他在临別贈言中說：“你的前途很有希望，但千万不要同革命党往来，千万不要看《民报》！”他把《民报》說得那样可怕，反而引起我的好奇心，一到安庆就設法寻找《民报》，但是沒有找到。嗣后与霍邱革命前輩徐迂亭談起想寻找《民报》事，他教我不要声张。一天他把藏在旅館房間內地板下的一册《民报》拿出給我看。我在先是喜欢讀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和《中国魂》之类刊物的，看到《民报》后，才认识到国家不强是“政府恶劣”，而不是“国民恶劣”，应该建立共和，不应该維持专制，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必須同时进行，种族革命絕不会妨害政治革命。由此可見，《民报》对宣传革命思想，是有显著成績的。

安徽青年学生受到了革命志士的宣传教育，不独在思想上有很大进步，并且在行动上也有許多表现。当辛亥革命在武昌发动

后,各省紛紛响应,皖撫朱家宝临事逃亡,省城陷入无政府状态,秩序大乱。江西黃煥章的軍隊到处搶劫,并且杀害了安徽革命志士吳春阳(号暘谷)。这时进步人士韓衍(号著伯,江苏海門人,入安徽太和籍)、易白沙(号月村,长沙人)出来組織学生軍,名为青年軍,分为三大队,韓衍自任青年軍总监,易白沙、廖少斋等分任队长。青年軍主持正义,保卫地方治安,枪决了清政府偵探,鎮压了一批反动分子。一般认为皖省光复,青年軍之功不可抹煞。

从上述一些具体情况中,可以看出那时的学校、新軍、报刊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等,对安徽青年学生的宣传教育影响十分重大,因而使一般青年学生在政治思想上都起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三、受西方資產階級学术思想的影响:

那时极大多数安徽青年学生对推翻清朝封建統治没有什么不同意見,但是革命后究竟要建立怎样的政治制度,心中还没有底。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他們所知道的西方政治制度不多。恰好,这时留学生中負有盛誉的严复任安徽高等学堂的監督,他用中国古文笔法翻譯了資產階級学者的名著,計有斯密亞丹的《原富》、孟德斯鳩的《法意》、甄克斯的《社会通詮》、約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論》以及赫胥黎的《天演論》等。这一类著作都是資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学术著作,引起了全国学者的重視。安徽青年学生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产生羡慕的心情。他們看見西方国家自产业革命后,工业进步,生产力大大提高,比我国落后的农业生产相差很远。同时,又看到自一六四〇年到一六八八年的英国革命,自一七八九年到一七九四年的法国革命和一八四八年的德国革命,推翻了封建階級專政,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宪法上規定人生而平等,公民有选举权利,有言論、出版、集会、結社的自由。因而对

封建的隶属关系、等级制度、王公贵族的无上特权更加反对，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是代替我国封建政治制度的最符合理想的好制度。

那时安徽青年学生羡慕西方文明成了风气，大家认为要想学西方科学，必须先学西方文字，因而把学习英文看作压倒一切的功课，别的功课考试不及格不要紧，千万不要使英文不及格。于是安徽高等学堂内从讲堂、自修室、寝室、饭堂一直到操场上，处处都听到朗诵英文之声。后来代替严复执行监督职权的教务长周鼎观（福建人，因严复不常到校，他就在实际上做了监督），对学习英文的进度操之过急，非那时学生能力所能担负。他在讲堂上公开地说：“我们教学生，只计程度，不计人数，能教出一个英文专家也对得起国家，不及格的都可一律开除。”学生人人自危，因而激起赶走周鼎观的风潮，严复也因而辞职。严复辞职后，由一位老翰林洪思亮来继任监督，校内风气因此大变，只听到朗诵中文之声，不再听到朗诵英文之声了。这时，热心学习西方科学的学生，如果得到政府派遣，或自己经济能力许可者，都先后到英、法、德、意、日本等国留学。如王星拱、刘貽燕、邵逸周、程振钧、程振基、俞希禹等，都先后出国求学。到了此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已经落后，很多青年学生甚至主张“全盘欧化”了。这就是安徽青年学生在进行新学与旧学之争和西学与中学之争后所保持的以新学和西学来代替旧学和中学的学习态度。这种态度不独安徽高等学堂一个学堂如此，其他学堂也大概如此。

在辛亥革命以前，安徽青年学生由于受了上述三方面的影响，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总的趋向是由落后转变为进步。

自一九一三年（癸丑）讨袁之役失败后，安徽省军政大权落到

北洋軍閥倪嗣冲之手，一面捕杀革命党人，防止革命在安徽再起，一面培养爪牙鹰犬，霸占机关学校。他就用县长、厘金、校长为餌，来拉攏教育界中趋炎赴势的人。进步的知识分子不是被杀害就是被赶走，落后的知识分子多半变成軍閥走狗而身敗名裂。资产阶级軟弱性彻底暴露，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又复抬头。直到五四运动而后，安徽新一代革命的青年学生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才以新的思想，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队伍中去，与全国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一道，走上了新的方向。

記 安 庆 岳 王 会

常 恒 芳

一九〇三年，桐城李光燊在湖南創辦旅湘公学，借以掩护革命工作；后来因环境恶劣，在湘呆不下去，乃于一九〇四年搬回蕪湖，改称安徽公学。当时所聘教員都是主张革命的，最有名的要算刘师培，他是在上海因革命事泄，化名跑到蕪湖来的。还有陈独秀等也在里面任教。因为里面一般人都主张革命，于是就由柏烈武、陈独秀等发起組織“岳王会”，意思是崇拜岳王精忠报国的精神。柏烈武原为秀才，后学于武学堂，这时在里面教体操。陈独秀原留学日本，回来后除教书外，还办有一种旬刊名叫《俗話报》，用語体文鼓吹革命运动。

我那时是该校师范班学生，而且年龄比較大，因此也参加了这个組織。当时参加組織的还有武备学堂的部分軍人。整个組織大概共有三十多人。所訂章則，主要内容不外为反清。我們將章則拟好后，字句中还夹杂許多不相干的話进去，使人家看不出，以防泄漏。第一次开会蕪湖，用烧香宣讀誓約的形式，并在蕪湖租了两間房子，作为联络据点。我們在通信的时候，都用假名字，例如当时有个姓孙的叫孙天一，刘光汉改名叫金少甫。刘当时不过二十岁左右，他在学校教历史和倫理学，还参加《国粹学报》。到了寒假，大家都要回家了，推举我留在蕪湖負責。后来邓绳侯在安庆

办了一个尚志学校，要我到那里去担任训导主任，我也就去了。我到安庆去是负有发展革命组织使命的。这时第一期武备学校训练已结束，第二期又在乡里招了一批兵，各县也有许多读书人都参加了，其中还有许多熟人。他们的革命热情都很高，教职员中有些都是从日本学师范学体育回来的，也在我们那里教书。于是我们成立了岳王会安庆分部。这时柏烈武在南京也联络了一些人成立了岳王会南京分部。岳王会总会仍设在蕪湖，由陈独秀当会长，南京柏烈武为分部长，安庆分部长就是我。安庆仅有二三十人，我们感到人数太少，力量不够，因此又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叫“维新会”，老三营的人大概都参加了。这年秋天，清政府决定在总督所在地成立一镇，由于干部不够，乃在安庆举办干部训练班，人员由绿营里挑选，好的可以当头目，作为新军的干部。我感到要革命非有武力不行，看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想进去。但是我不是绿营里的人，没有被挑选资格，因此找了督练公所中有两个从南京柏烈武那里来的教练员，请他们把我保送到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分五个队，每个队里都有我们的同志。我入训练班后，虽然是学员，但因为我是岳王会的安庆分部长，仍然可以对岳王会的同志起领导作用。那时象迎江寺宝塔里和大观亭后面松树林，都是我们开会的地方。

丁未年下学期，我们毕业了。我考第二，按规定前三名都可以当排长，我也就当上了排长。我们成立的是骑兵营。当时骑兵比步兵要难，因为要负前线偵探等责任，所以我们里面的骑兵，都是从步兵里挑选好的来充任的。那时军队不准住民房，所以我们只得住在安庆东门外殷公祠。

当时有浙江人徐锡麟任警察训练所所长，岳王会里有个石人

俊，和徐相识，被徐請去任教。石人俊的武术很好，听说他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日本有个大力士，在日本国内几乎是沒有敌手的，有一次与石比武，居然为石所败，石的声誉因此益高。那时我們的军队，共有步、炮、騎三营，徐常請我們这些营长們吃飯，意思是在联络感情，到必要时可以帮助他。有一个星期日，警察学校行毕业典礼。我刚走到街上，就听说警察学校放了炸弹，撫台受了伤。我知道这事发生以后，政府一定要搜查的，我赶快跑到尙志去打招呼，要那里的同志好作准备。这样一来，耽誤了时间，城門閉了，不能出城。这时徐带了学生到軍械局去搶子弹，但因为不能开锁，弄了多半天，被巡防队包围上了。他的两个学生，一个当时被打死，另一个和徐一齐被捕了。徐被挖心惨死。这天大雨，我因沒有便衣，不能出城。后来借到了布鞋便衣，才由北門溜出去，回到本队。

我們队里有位孙师武，与我曾在訓練班同学。他因不滿杜春林，想偷枪杀他，但沒有成功。后来他想个点子，說是恩銘托梦給他，要是替他复仇，非杀杜春林不可。他又造了一封假信，扮着卖鸡蛋的样子，混进了撫台衙門，因为举止慌张被捕，假辮子也弄掉了。他見了恩銘的夫人，恩銘夫人听说他想为恩銘复仇，便說这是好人，要优待，只把他关起来，未杀他。这样一来，我队里的人都害怕要受牽連。因此我便辞了职，因为我走了，要是出了任何事，大家便可以向我头上推，不会再連累別人。这时是暑天，我就跑到怀远去，在粹华学校当教員。下半年薛哲被派到炮兵营当管帶，写信要我回省会，我未答应。

第二年沿江一带新軍在太湖会操，同志們认为机会到了，又計劃要干。但是新軍中我們的同志职务都很低，最大的也只是个营长。薛哲也是个营长，而且同志們认为他胆子小，不能够领导，乃

推熊成基为总司令。起义发动以后，沒有子弹。原商議好举火为号，可是城防队先把守了城門，薛哲到时不能打开城門。城內的同志都被捕了。熊成基跑到怀远。在这期間，安庆方面并无其它組織，其主力全为岳王会的人。我也得到一个亲戚的帮助，赴日本留学。自从我离开了安庆以后，岳王会也就关了門，只有維新会还活动。陈独秀在恩銘被刺事件发生后，也跑到日本去了。

安徽辛亥革命鱗爪記

郑 青 士

楊宏胜烈士在安徽

辛亥武昌起义前夕，被清政府两湖总督瑞澂杀害的三烈士之一的楊宏胜烈士，曾在安庆进行过革命活动，对于安徽新軍起义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

楊宏胜，南京人，他的父亲于清同治年間游宦湖北，做过荆州江陵县典史，后来就在湖北落了籍。宏胜兄弟五人，四个哥哥都早死，他是“碩果仅存”的一个。清朝末造，建立新軍，他应征入伍，以一普通兵累升为副目、正目（班长）。余大鴻由湖北新軍标統升任安徽新軍协統时，他随从来皖，仍充正目。他在軍隊中广泛地联系士兵，宣传革命思想，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痛亡国史实，娓娓而談，往往声泪俱下，感人最深，收效最大。宏胜是我祖母的内侄，与我为表亲，每逢节日或例假，他总要来我家，和我在一起談論清朝对汉族人民的残暴統治以及太平天国革命的兴起和失敗，曾國藩、李鴻章如何认贼作父，残害同胞，清朝政府如何腐敗无能，丧权辱国，把大好河山拱手让列强宰割，等等。我那时还是十七八岁的少年，受了他的熏陶，热血沸腾，也慨然有献身革命的思想。我祖母知道了我們的言論，大起恐慌，把宏胜叫到面前，訓戒

一番，叫他不要惹灭門之禍，不要害了自己，还害了郑家一家。不久，余大鴻調回湖北，宏胜仍随余同去。武昌首义，他是革命党重要人物之一，不幸事机泄漏，先一日牺牲了。宏胜沒有結婚，湖北地方又无亲族，故其身世经历很少人道及，茲就回忆所及，略述如上。

萍 萃 楼

清朝宣統年間，安庆有一家客棧，牌号萍萃楼。店房坐北朝南，大門遙对着姚家口十字街上的斜坡。安庆地方原是个魚米之乡，生活費用很低，住一天客棧，一宿三餐，只要两角錢。說也奇怪，这家客棧，迎来送往，生意十分兴旺，可是開設沒有很久，本錢竟亏蝕精光。原来这个客棧的主人姓毕，名少斋，寿县人，和革命党人柏烈武是同乡，而且还有些瓜葛。他開設这家客棧的作用，与其說是为了便利淮上各府州县来省城的旅客，不如說是为了便利淮上各府州县来省城的革命同志。我那时常到萍萃楼走动，探望住在里面的一些老主顾。这些老主顾一住就是好几个月，挂帳而去，回来再住，再住再挂帳，习以为常。店主人不仅不向他們伸手索欠，摆面孔給他們看，有时候还要資助他們路費。他这个客棧的資本，就这样一天天亏耗下去，終至伙食开不出来了。他坚持不閉歇，沒飯吃就干賠房間給客人住。到了宣統末年安庆光复前夕，萍萃楼特別熱鬧，餓着肚皮来就宿的客人川流不息。有时，革命党人的秘密會議也在里面开。这时是客棧主人特別艰苦的时候，也是客棧主人特別兴奋的时候，因为革命的烈火已在武昌燃烧起来了。

龙圣祠巡警分校

清末，安徽革命熊熊之火旋扑旋起，特别是徐錫麟安庆举义，枪杀恩铭，更是轰轰烈烈，鼓舞人心。辛亥前夕，有英山人段瑞兰者，亦忧时有志之士，他师法徐錫麟，在安庆龙圣祠办起一个高等巡警分校，对革命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

段瑞兰先在北京与段祺瑞认了同宗，由段祺瑞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以皖紳的資格来到安庆，见了安徽撫台朱家宝。这时段祺瑞已是清室掌兵大員，“一言九鼎”，因此朱家宝大为信任。段瑞兰对朱并不要求高官厚祿，只建議开办一个高等巡警分校。这个分校专設紳班簡易科，一年毕业，毕业后，充实各府州县警务长之人选。投考資格，限于士紳，如无功名，捐上一个监生头銜，也可報名投考。当时，安徽省正奉部札，各府州县均应設置一个警正級的警务长，乡鎮也要設立警察派出所。安徽高等巡警学堂，三年毕业，不能适应急切需要。朱家宝正为此事躊躇，得着段的建議，非常高兴，立即采納施行。这个分校設于北門外龙圣祠內，专办紳班簡易科，段被委为提調，主持一切。

段受任后，即召集在安庆的革命同志，商討聘請教員、招考學員等等具体問題，决定教員完全由自己同志担任，同时增設夜班，教員一律加入夜班肄业，取得学籍，以加强力量，凡是不担任教員的同志，則一律報名投考，充当學員（原有学历，好多人不便拿出来，就捐上一个监生头銜报考）。投考的一般學員，除筆試國文和算術外，特別着重口試，以考察其政治思想情况，决定去取。計共录取日班學員一百二十名，夜班不考試，亦无定額。开学后，对于术科非常重視，每日上下午进行两次軍事操练。教員是靳少斋、孙繩武

等，我也帮助教练军操。这个分校只办了一期，辛亥革命爆发，就停办了。

与龙圣祠分校有关系的一些人物，对辛亥革命出了不少力量，作出了一定贡献。靳少斋在孙少侯任皖军都督时，充都督府卫队营营长，不久调任水上警察厅厅长；孙品驂在合肥组织军政分府，担任司令，旋改任师长；金幼舟任孙品驂的参谋长；李辛白则在蕪湖军政分府任职。我于光复凤台县后，回到安庆，在参谋本部任谍报参谋。

癸丑讨袁失败，倪嗣冲以近水楼台，做了安徽督军，革命党人受到他的残酷镇压，死的死，逃的逃。段瑞兰在此危难关头，意志不馁，仍思设法打入倪嗣冲内部相机行动。复经段祺瑞具函向倪推荐，倪委派他为督军公署军法科科长。他并引荐龙圣祠巡警分校学员杨允中为军法科科员，对于发交审判的政治犯多所迴护，设法开脱，以是渐为倪所怀疑。不久，被叛徒告密，段、杨两人就同时在蚌埠牺牲了。

記韓衍

政协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資料工作組

安庆昔为安徽省会，扼大江中流，形势重要。自一九〇七和一九〇八年徐錫麟、熊成基先后举义不成，清朝主皖大吏对革命运动的镇压和防范日益严紧，一时革命党人无法容身，紛紛散往各处活动。其继续在省城坚持工作、秘密奔走策划者，只吳陽谷等数人；而激于义憤，投袂奋起，始“殊途”而終“同归”的，則有韓著伯。

韓著伯，名衍，又名重，江苏丹徒县人，民元改入安徽太和县籍。衍家道貧困，幼年生活极艰苦。曾应科考，入学为附生。青年时期，进过江南高等学堂，不久，因鬧風潮被开除学籍。他才气橫溢，志行卓越，为南通张季直所賞识，收之門下。以此因緣，得交北洋关系人物吳君遂，遂入北洋幕府任督练处文案。他熟悉小站练兵内幕，不滿袁世凱为人。清光緒末年，沪杭甬铁路風潮起，袁奏派心腹将领夏辛酉率兵二十营南下，任长江水师提督，駐浦口，以压制东南民气。衍以“丹徒附生韓重”名义上书清廷，攻击袁，說他“植势力于东南，居心叵測”。书上知必不为袁所容，就出走天津，得直隶总督楊士驤的庇护，轉荐于安徽巡撫馮煦，調来安徽，任督练公所文案。馮去，朱家宝接任皖撫，对衍虽也推重，但“敬而远之”，信任之意漸衰。衍乃辞督练公所文案职，专心致力于革命救国事业。

戊申熊成基举义失败以后，是皖省革命最艰苦阶段，阴暗的空气笼罩着整个安庆省城。衍既已辞去督练公所文案职务，就以糾合同志，继续开展革命工作为己任。他首先创办了《通俗报》，以口語式的文字，作革命的宣传。同时，又在近圣街涂公館组织了一个讀書会（利用两湖总督涂朗軒之孙涂卓庭为掩护），作为結納同志、秘密集会的机关，过去分散的党人以及陸軍小学、巡警学堂的一些进步学生重新又有了联系。《通俗报》除韓衍以外，还有陈白虛、孙养廉、高超等担任編輯。經費沒有固定来源，全靠少数同情革命人士資助，如諮議局議員王龙庭和皖北教育会吳性元、楊云麟等都曾有過帮助。经过衍等艰苦经营，革命青年散而复合，革命力量蹶而复振，对辛亥皖省光复起了先鋒作用。《通俗报》以主持正义、揭发丑恶，特别是反对出卖銅官山矿权，为官僚买办和社会其他恶势力所深忌。衍被奸人行刺，中五刀，沒有死。他益发憤，对恶势力的抨击仍不遺余力。但是，《通俗报》終以經費困难，不久就宣告停刊。

辛亥春，韓衍与党人吳陽谷等已联为一体，設秘密机关于安庆桃家口萍萃楼客棧（棧主毕捷三也是革命党人），积极活动。武昌举义后，他們議定发动巡防营与新軍联合起义，为安徽巡撫朱家宝所压制，失敗，响应革命的新軍亦被解散。朱家宝本系一頑固官僚，一貫仇視革命，这时得到了袁世凱从彰德給他的密电，希望他“順应时势，靜候变化，不可胶执成見，貽誤大局”，又因长江上下游各处紛紛起事，大势已去，朱就幡然改变态度，接受了皖紳童摺芳和諮議局議長竇以珪等的意見，表示退让，皖省遂宣告独立。继而他又賤使破坏分子轰走了临时都督王天培，自任为都督。在皖党人既无軍事实力，又无群众基础，安徽政权就不得不落入封建官僚地主之手，形成了伪独立的滑稽局面。吳陽谷等痛心于革命的变质和官僚地

主階級的陰謀，議引客軍來皖對付朱家寶所指揮的江防營，以改變安徽偽獨立的形勢，於是乃有吳暘谷赴武漢請兵、黃煥章率潯軍入皖事件。

來皖潯軍是舊巡防營改編，分子複雜，毫無紀律，到省數日，就以索餉為名發生變亂，全城幾至糜爛，吳暘谷亦慘遭殺害。潯軍參謀總長李烈鈞鑒於眾怒難犯，促令黃煥章督率所部離皖。這時，朱家寶已出走，省政無主持的機關，人心惶懼，不知所措。韓衍乃挺身而出，聯絡革命同志李德膏、史推恩等發起組織“維持皖省統一機關處”，臨時主持省政，內設軍政、民政、財政三處和參事會，衍被選為秘書長，綜理日常一切工作。關於統一機關處的組織、計劃和重要文告，都出自他的手筆。他在發起文中闡述組織這個機構的意旨說：“一錢共和，萌芽於此。至以吾皖三千萬人之生命財產為個人督的代價，同人等不忍為也。虛此一席，以待完全會議成立，再行推舉賢能，適合共和性質，如淪此盟及其他之絲毫圖利者，我四萬萬人共誅殛之。”衍的苦心擘劃，對於息紛爭，奠皖局，起了良好的作用。

與此同時，韓衍又發起刊行《安徽船日報》，以為革命政權的言論機關。他于所作發刊詞中說：“堂堂世界撐將去，無限風波自在行”。又有詩贈報社同志說：“懷寧驛口浪滔滔，萬馬聲中第一篙，寄語諸君須坐穩，前途月黑正風高。”《安徽船》的旨趣和他對於黑暗勢力的戰鬥意志，字里行間，灼然可見。

韓衍的抱負和他對於革命事業的熱情，特別表現在青年軍的組織上。他認為皖省革命的挫折、朱家寶的假獨立以及潯軍的變亂，都是由於革命黨人沒有掌握真正革命武裝的緣故。因集合以陸軍小學、測繪學堂和尚志學堂學生為中心的有志青年，成立了青年軍，

借以保卫省城治安，并为组织北伐军培养基层骨干。他在《军中吟》诗里有“誓当共饮长城下，夜渡黄河百丈水”之句，可见他组织青年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北伐。青年军组织分为三个大队，约有七、八百人，每大队设大队长、军监各一人（军监为易白沙等）。三大队之上，设总队长和总军监各一人，总队长由廖少斋担任，衍自任总军监。还设有秘书长一人，由高超担任。办事处设于法政学堂内。大队长主管军事教练，军监则系仿照中国历史上监军制度设立的，掌理军中政令和文化教育事宜，类似后来北伐军中的党代表制度。青年军还创建了人字形的军旗，表示奉行人道主义。衍每星期向全体队员讲话两次，著有青年军讲义十四讲。又订立临时戒约二十一条，与队员共同遵守。大多数队员为革命潮流所鼓舞，又受了衍的精神教育，朝气蓬勃，军容严整，纪律也很好。青年军成立以后，镇压了倪嗣冲的偵探翟其铭，并制裁了一些反动破坏分子，省城秩序逐渐安定。是年十月间（旧历）孙毓筠被省参事会推举为都督，衍为了省政统一和革命的利益，同他紧密合作，并将青年军直隶于都督府，受孙的指挥。孙对衍也很信任，计划将青年军组织扩大，作为北伐的基干部队。

衍以不羁之才，献身革命，正义所在，惟力是视，从不计及个人利害。民元阴历三月某日他路过同安岭，又一次受到歹徒的狙击，伤重不救身死。不久，孙毓筠解职，柏文蔚继任安徽都督，青年军亦被解散。当溥军变乱之后，皖省扰攘无主，青年军主持正义，保卫地方，著有劳绩。衍竟以被刺死，青年军又被解散，社会舆论多为之不平。

衍死后，皖督孙毓筠曾严令緝凶，并电由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捕获嫌疑犯欧阳某等数人到省归案讯办。先是青年军队员白如灝

(原是陸軍小學學生)冒充青年軍全體代表，經南京第一軍軍長柏文蔚的參謀長李德瑚(原是陸軍小學監督)介紹見柏，請領槍械。柏答應了他，並委為青年軍大隊長。省中得知此事，非常驚愕，孫毓筠因柏越權干涉，嚴電質問，並下令開除白如瀾軍籍。歐陽某也是陸軍小學學生，與白同謀，同時被青年軍斥革。衍的被刺，他們有重大嫌疑。後以孫去職，柏文蔚繼任，這件公案就以不了了之。

韓衍是一個資產階級急進民主主義者，他的被刺，正反映了當時急進派同妥協派之間矛盾的尖銳化。衍以出身貧寒，青年時期便為物質生活所苦，他的思想學問，完全是在極艱苦的生活中和極炎涼的人事中奮鬥和磨礪出來的，所以養成一種極不妥協的精神，對社會上、政治上的黑暗勢力都採取一種嚴厲的攻擊態度。他堅決地要從根本上摧毀腐敗政治，既要推翻清朝政府，也要打倒代表封建勢力的北洋軍閥。他認定袁世凱狼子野心，必禍民國，因而極力反對孫中山先生讓總統位於袁世凱。他在《安徽船日報》上和在对青年軍的講話中，抨擊袁氏，反對同北洋派妥協，非常露骨。他說：“袁世凱以例王莽無其學，以例曹操無其才，北京城頭月已昏，借你肚臍作燈盞，其董卓乎！其董卓乎！”“參議院舉袁世凱為大總統，國人在位者贊成反對各居其半，在野則純然反對之人，記者即其一也。”“三萬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都承認，我孤云(衍的筆名)一個人也不承認袁世凱做大總統。”“辛亥革命為議和所誤，留下帝王余毒，必為後患。”他又抨擊官僚地主分子篡竊革命果實，奪取革命政權，說：“清廷而在，則搖尾為奴；虜社既顛，則塗面革命。”對於其他一切社會惡勢力，也是深惡痛絕，口誅筆伐，不稍假借。以是反动派恨之刺骨。加以他所領導的青年軍正謀擴充，更為爭奪皖省政權的野心家所深忌，怨毒匯集，拘為陰謀，衍就不免以“非命”死了。

韓衍系独行传中人物，虽然要求彻底革命，反对妥协，反对改良主义，但是限于时代，不可能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也不知道深入发动群众。他思想里存在着浓厚的虚无主义，曾在诗里说：“中山一去中原暗，快组虚无一党行”。他又鼓吹“弹丸政治”，要以弹丸扫除黑暗。他说：“蠢贼在前，我一粒弹丸出得枪膛，轰然一风响，实合万众啼饥号寒冤苦不平声，以作此一声响也。”以是有人指为过激党。其实，他所憧憬的政治并没有脱离欧美式民主主义的范畴。他心目中的模范人物，仍然是华盛顿。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辛亥革命的失败，已为历史条件所决定，那么，衍的牺牲，就成为必然的归宿，绝非偶然的了。

韓衍鼓吹所谓“弹丸政治”，在他所著青年军讲义里面很明显地反映出来。这种政治思想，有极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青年军讲义一开始就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今日但有弹丸政治。”他崇拜铁弹丸，把它看成解决世界一切矛盾的最有作用的武器。他说：“我铁弹丸之是非，乃万古不磨之是非也”；“世界尽风波，熄之以铁弹丸”；“须以一粒铁弹丸，使万众不苦饥”；“一个铁弹丸，要取消多少人的国民资格”；“弹丸溅蠢贼之血，胜孔子四方奔走”。他甚至要铁弹丸“替天行道”，并代表人民的意志。他说：“敌在眼中，枪在手上，如天与我语，地与我言，如后有百千万年之无限万万未来之同胞一齐拥出，而此铁弹丸腾腾复腾腾，以至于无可腾腾，然后机一动，功已成，直行所无事耳。”当然，我们从他这些话里，也可以看出，他鼓吹“弹丸政治”是基于他的人道主义精神，旨在救世。他在讲义里说：“杀机沸天地，仁爱在其中。”正因为他以仁爱为出发点，所以敌我界限和这个铁弹丸武器掌握在谁的手里，看得很重

要。他說：“誤認姦賊為同胞，是欲祧黃帝而祀管蔡”；又說：“鉄彈丸最仁愛，亦最殘暴，自救世人用之則最仁愛，自利己人用之則最殘暴”；又說：“我一槍一彈以至仁殺至不仁。”由上面這些話看來，他傾心武裝革命，敵我界限分明，言論和行動都充滿着不妥協的精神，可以稱為二十世紀初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急進民主主義者。此外，他還對死的意義和無我的境界有透辟的闡述。讲义里面說：“青年軍只須辨得一個死字，無分百年，無分頃刻，凡公理所在，頸血濺之矣”；“彼以一死赴將軍之命令，我以一死爭世界之是非”。又說：“志士未嘗不用錢，但是志士的錢要大家用；志士未嘗不吃飯，但是志士的飯要大家吃”；“以四万万人的精神為精神，無論何時何地，我之前後左右有四万万人之祖若宗在，有四万万人之子若孫在”；“置自家一身于身外，即世界主義之起點。”這些，對於當時青年軍的精神教育，都曾起了積極的作用。

韓衍又富有文學才華，筆鋒精悍銳利，充滿着革命感情。尤其所作的詩，在當時詩壇上異軍突起，別具風格，足以俯仰當世，睥睨前人，所謂“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長”，衍之詩文，可以當之無愧。茲錄其《緣云樓詩存》（衍的詩集名）七絕二首，以見一斑。

袖翻海水入羊城，千里東濠夜有聲。所欠故人惟一死，頭顱墮地作雷鳴。（吊宋玉琳烈士）

自將血酒尉佗宮，慷慨田橫有此風。七十二人同日死，夕陽芳草古今紅。（吊黃花崗烈士）

辛亥福建光复回忆*

刘 通

余从清甲辰(一九〇四年)即作革命运动,辛亥时在福州桥南社主《建言报》编辑,同盟会总机关部亦设在社内,因推余坐镇,故于福建革命活动及光复情况,知之最全面。余在广州任大本营建设部主任秘书时,即欲撰写福建光复史,以征集材料未齐,迄未着手。迨抗战上海失守,政府移重庆,立法委员疏散,余挈眷避居汉皋。翌春立法院在重庆复会,余因船挤先行,及武汉事急,爱人匆匆赴重庆,以材料笨重,寄存法租界同乡商铺。及武汉失守,不可复觅。十余年积聚,付诸一叹。现余八十一岁矣,记忆力日衰,仅有轮廓存于脑际,及今不图,过此以往,恐仅此轮廓亦将消失模糊。因凭记忆力所及,写之作为国庆献礼,供后之编福建革命史者参考。

(一) 光复的前景

一 曙光出现

甲午中日战争失败,日人索割辽东。清廷以辽东为其发祥地,

* 本文原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经征得作者同意转载。

——编者

且逼近北京，難之，遂有割閩換遼之議，引起閩人極大震驚。後雖改割閩為割台，然台故閩屬，台人多閩籍，地理上、經濟上關係極為密切，閩人固不能忘懷。而日人得寸進尺，蠶糠及米，閩亦終將不保。又以清廷腐朽貪暴觀之，非僅失台已也，又將亡國。於是開明人士、血氣青年，竟起而談國事，既憤外人之侵侮，尤憤清廷之無能與壓迫，救國目標遂由對外而對內。于時活動可分三派：一、革命派，二、進步派，三、君憲派。進步派人數最多，只有零星結合，設閱書社，辦小學，組織講演會等，目的在於開通風氣，培養後進。君憲派發動最晚。革命派中有下渡文明社、侯官小學校、莆田勵菁學校、連江光復會及高等學校、師範學校中學生。文明社由鄭權、鄭祖蔭、林斯琛等創設，在下渡十境祠，以閱書社面目出現，內容則為革命機構，借開通風氣之名，與社會上及學校師生具有革命思想者聯絡往來，而下渡小嶺益閩小學校亦為其活動之地，並與省外通聲氣，尤其上海及留學日本同志。又以哥老會有反清宗旨，且在軍隊中具有勢力，謀與結合，先由鄒燕庭設法加入福州復明山堂。復明山堂為福建哥老會最大組織，燕庭加入後，吸引林斯琛、劉元棟、黃光弼、嚴漢民等相繼加入。其中頭目尹蘭亭等因時時往來，文明社漸引謠諑。燕庭又自設共和山堂，散賣票布。林斯琛等以過於招搖，而哥老會宗旨久失，僅成為江湖上秘密組織，不能起政治上作用，殊失所望，因漸停活動。然已為清大吏周蓮所注目，緹騎四出，將興禍獄，文明社遂解散。林斯琛數人避往莆田，事靜乃回，秘密組織漢族獨立會，機關設在下渡古榕書院。及中山先生在日本東京組織中華同盟會，委鄭祖蔭為福建支部長，林斯琛為總幹事，于丙午夏季成立支部，漢族獨立會并入同盟會。

二 桥南公益社成立

古榕书院地虽稍僻，耳目较少，然为时久，往来繁杂，乡人疑为图谋造反，始而窃议，终而反对，因又不能不舍弃此据点，采取按区各自关联办法，但过于分散，不便活动。林斯琛因与热心公益负有多乡望人士陈能光、郑季明、刘翰侯、林泽人、陈秀榕、王鸿慈商在梅塢設立桥南公益社，推郑季明为社长，社内附設去毒社、救火会，时清戊申年也。林斯琛坐鎮其中，一面进行公益，一面筹划革命活动，社員对于公益特有兴趣，成績斐然，去毒救火，尤受称道。桥北各境受鼓动，亦相继設立公益社，又以事业关联，設立联系机构于桥南社内，名为“社会办事处”。

桥南公益社虽仅为掩护革命工作，然公益事业范围广泛，在在与腐败政治发生抵触，一方面则借以伸张民气，激动民愤，造成厌恶清廷心理，一方面则暴露清廷罪恶和无能，挫削清吏威望，尤其在外交方面，如力争收回三府矿权之类，无形中为革命創造很多条件。次则便于注意有为之人，吸引其向于革命，或介绍为会员，就中最起作用者，为与君宪派合办之《建言报》。

君宪派势力单薄，以桥南公益社乡望甚隆，可为声援，由张海珊、赵桐友为中介，渐相接近。庚戌冬，林长民（宗孟）、刘崇佑（松生）等向桥南公益社建議，合办《建言报》，社址設在社内，館务亦由桥南公益社主持，推举张海珊主笔。涉春，海珊离职赴厦，刘通接充报政，言論趋于革命方面。辛亥三月廿九日广州失败，《建言报》以側面法表揚举义，表揚烈士。君宪派本欲利用《建言报》为宣传君宪工具，却变为宣传革命工具，认为上当，大起責言，然无可如何矣。

三 辛亥三月廿九日之慘痛

中国同盟会总部設在日本东京，辛亥二月間，决定攻取广州，福建同志遣林觉民回閩，征會員前往助战。觉民三月初至福建支部，則召开會議，决定兩項：一、推刘元栋、馮超驥、刘六符、吳适及元栋所屬郭維亮、林友基，吳适所屬光复会會員前往；二、广州下后，林斯琛在廈門設法阻止福建軍隊援粵，刘通担任在福州响应。議既定，吳适回連江部署。觉民在家，广宴亲友，隱示永訣之意。三月十一日，觉民出发赴香港，同行者刘元栋、馮超驥、刘六符及元栋所屬郭維亮、林友基数人。吳适因會員散处，召集需时，定次期继往。斯琛以各同志均未到过广州，且不諳粵語，介紹方应团、李长順加入本会，随往带路。斯琛旋亦赴港接洽。及三月廿九日失敗，福建死者三十余人；由日本东京往死事者林时壘、林觉民、林尹民、陈与燊、陈可鈞、方声洞；由閩往死事者馮超驥、刘六符、刘元栋及連江光复会會員，仅郭維亮、林友基、黃以通生还，吳适被逮；由广西往死事者陈更新，而严汉民避入同乡鴉片烟鋪获免。吳适率所部二十余人三月廿九早始抵香港，即趁港粵早渡入广州参加，全数牺牲。吳适逃出小北門，以迷途越两日被获，判处斬監候，寄押番禺县監，夏中遣李质文赴广州探視营救。是役，福建中坚分子多死难，精华殆尽，人之云亡，有余痛矣。

四 重整旗鼓

在閩革命同志既痛亡友，益伤国事，决以再接再厉精神，继承遺志。林斯琛赴沪，溯江訪譚人凤等計議。时彭寿松鋒芒稍露，聞于布政司尙其亨，欲以利祿誘之，召与温語，并为介于端方。端方

在汉口，寿松商于同志，均主应行，且武汉同志甚多，可以有为。寿松至汉口，与张振武等取得联系，旋向端方托词回闽接眷，既归，即从事运动军队。以同盟会吸收会员甚严，难于发展，乃别设军警特别同盟会，使其侄蔭祥主其事，张祖汉、李煥、黄震白等辅之，先树立中坚，然后逐渐广泛收罗，由下而上，由士兵而及官长，由僚佐而及实力人员。另一方面，寿松又运动哥老会各山堂，联合为一，秘语为收通铺，就其中苦水多者组织联络员。苦水亦秘语，谓敢做敢为敢杀人也。

桥南公益社借公益名义，设体育机构，培植武力，吸收仓前山教会学校如英华书院、福音斋等处学生，学校青年亦有加入，使馮金荣兼任教练。

徐錫麟、吳樾、温生才革命案件迭出，清吏尤其大员岌岌惴惴，草木皆兵。黄花崗战役，閩人壮烈牺牲，且多縉紳子弟、优秀学生。革命惊涛駭浪，并弥漫福建政界中。总督松寿思以温和手段，设计缓化；将军朴寿则厉兵秣马，汲汲备战，旗人中文楷等并组织杀汉团。

（二）光复之情况

一 酝 釀

光复福建者，湘軍之力；运动湘軍举义者，彭寿松之力。

清光緒甲申，法軍寇閩，清廷派左宗棠率师入閩，所带皆旧部湘軍孙开华等。左宗棠病歿，湘軍仍留閩，以原有綠营不可用也。湘軍遂成福建唯一有力之军队。清廷改革軍制，福建军队編为第十鎮，时孙开华已故，湘軍由其子道仁統帅，因升任为統制。下设协

統，許崇智任之（其他尚有直轄于總督如中協、城守協等，其兵力皆微不足道）。福建武備學堂第一期保送日本士官學校學生畢業回國後，添設炮兵、工程兩營，以蕭奇斌任炮兵營管帶官，林文瑛任工程營管帶官。軍隊情況概略如是。

彭壽松，湖南長沙人，父某以武弁隨左宗棠來閩，曾任台灣某武職，病歿福州，因家焉。壽松捐貲充福建佐雜，倜儻不羈，好用意氣。某年元旦，在湖南會館團拜，毆打同鄉某，為布政司參劾，革職失業，快快仇恨清吏，並及清廷，因傾向孫中山革命主張，然無由自進。適福州人士陳不浮留學日本，畢業回國，在船上失足墮海，革命派利用為鼓吹，指為痛憤國事、蹈海而死，發起追悼大會，一般人附之，在泛船浦廣東會館舉行，傾動城內外人。彭壽松撰輓聯，將髮辮剪附于聯，懸挂台柱，并于會上致悼詞。劉通、高鴻昇之，相約造訪，晤談數次，見其革命意志堅決，遂成密友。劉通為介于林斯琛諸同志，斯琛等以壽松曾與福州惡少游，及任保甲局，惡少均被惩治，疑之，然亦予留意觀察，頗有往來。後壽松移居下渡小嶺，過從更多。辛亥三月，乃請其加入同盟會。壽松以革命須靠武力，爭取武力必須從軍警下手，而同盟會難于吸收會員，乃設軍警特別同盟會，運動湘軍。壽松既湘人，又湘軍將門後人，有更深淵源，且系哥老會中人，故游說較易。光復義旗照耀後，進展尤易。至九月初，軍警全部加入矣。武昌舉義，全國震動，壽松偕李質文赴上海有所商，質文并學制手擲炸彈。九月初同歸，質文就孤兒院開制，而炸藥須鉀氯氧配合，鉀氯氧為新譯的名詞，福州西藥房無識者。劉通知舊譯氯氣，乃得購。財力奇絀，工作几不能展開，斯琛電囑李恢向總部借十萬元，亦于九月初匯到。至是革命已進入發動階段。孫道仁初甚猶豫，惟軍隊已全部加入革命，不得不順從，先由洋行

买办蔡展庞向林斯琛示意，并要款項后，乃与彭寿松、林斯琛等在甲板船上会商手续及部署日期等。議既定，却发现軍士每人只有四五发子弹，不能发动，时守屏山軍械庫員兵亦皆加入軍警特別同盟会，乃偷凿墙垣，于十六、十七两晚将子弹秘密輸送。于是十九日拂晓炮声作。

二 作战部署和兵力

十八日，統制孙道仁发出部署密令如下：

(一)令二十协协統許崇智为前敌总指揮。

(二)旗界除东門开放以外，湯門以南，环绕旗汛口、大王府、庆城寺、鰲峰坊、观巷等处与旗界交接各街道地带，都分布进攻和堵截部队，以于山为总攻陣地，前敌总指揮部設在于山观音閣。

(三)由桥南总机关部密报各社团联甲等，于本晚紧密巡防，严守柵門，九时以后，无口令不得犯夜过柵，口令另发(本晚口令为女子两字)。

陸軍第十鎮駐省垣之兵力如下：

(一)步兵第三十八标第三营兵力有四队，前左右后各队由管带官胡季高指揮。

(二)騎兵未成营只有一队，馬四十余匹，由队官黃安源指揮。

(三)炮兵营只有两队。在战线上有德国造最新式克虏伯过山炮四尊。左队队官陈桂生，中队队官楊国政，由管带官蕭奇斌指揮。

(四)工兵营只有两队，由管带官林文瑛指揮。

(五)輜重营原有一队，由队官郑坦指揮。

(六)宪兵营两队分駐城台两区，保卫治安，由管带官俞紹瀛指揮。

(七)二十协两标新征兵有五营，新兵皆未入伍，各营官长临时混合編成作战，軍官队有孙葆谔、沈觀恩、王琛、林肇民、沈国瑛等，归总指揮部調遣。

(八)二十协两标征兵营尉級官长，有讲武堂初毕业学生孙本戎、朱震、张祖汉、方毅、郑庆奇等四十余人，临时編入总指揮部作战卫队，称为学生軍官队，归总指揮部調遣。

(九)延建邵統領徐鏡清奉孙統制电召，率两营部队于十九日早到达省垣，加入作战。

(十)二十协三十九标第一征兵营駐长門划鰲港，管带官陈錚，又駐馬江管带官吳景震召率全部队伍于十九日下午四时到达省垣。

此外，尚有非正式队伍协同作战，如下：

(一)先鋒队及差遣队：由各山堂兄弟中退伍及閑散官兵編成，归彭寿松指揮。

(二)炸弹队、洋枪队：由桥南总机关部将体育会會員分編炸弹队，于是晚随彭寿松上于山作战；洋枪队分为一大队三小队，大队保护仓前山領事館及外侨，三小队分占大清銀行分行、中洲水亭稅厘局、泛船浦电报局。

(三)民团义勇队由各社团练勇抽調及自願参加战线工作者編成，由楊琦、方应团率領参加作战。

敌人之兵力如下：

敌軍按八旗編制，上級为参領、协領，次为旗領，共二千五百名。清光緒末，抽选精銳編为捷胜营，兵額二千名。預备作战时，又組織杀汉团，約五百名，分两队，一为大刀冲锋队，一为汽龙洋油放火队。合計有五千名整。

三 开 战

許崇智奉到作战命令后，严密布置，是晚（即十八晚），率队上于山。于山俯瞰旗界，为必爭之地，敌人失此先着，已成为困守一隅之局。彭寿松亦率其組成之先鋒队、差遣队上于山作战。寿松并于于山观音閣內設立軍警同盟会办事处，管理临时事务。桥南总机关部，由刘通召集将訓練之体育会會員（多数为学生）告以今晚起义，勸以奋勇，分为炸弹队、洋枪队。編成，适寿松赴于山经桥南社，即将炸弹队交其带往。洋枪队分为一大队、三小队，大队巡防仓前山，保护領事館及外侨；三小队分別占領大清銀行分行、电报局、水亭稅厘局。另一面通知各社团加紧戒备，发送白布臂章（上书公权二字，盖同盟会印）以为符号，并密传口令。敌方亦积极巡守，占据水部城楼，并将工艺传习所職員吳和軒抓去斬首，剖腹悬尸以示威。

十九日拂晓，我軍开始进攻。我軍炮兵陣地設在于山，炮弹威力甚大，曾命中將軍署。敌人惊慌，企图占領于山，夺取大炮，于山成为勝負樞紐。敌人潜据公立法政学堂宿舍，射击我炮兵陣地，我伤亡十余人，炮营中队官陈桂生面部受伤。后为我軍发现，命炮击毀宿舍，同时高节里叶姓花厅为炮弹所中，发火燃烧。敌人又由杀汉团文楷率冲鋒队，从呂祖宮冲至八十一阶，集中安奶庙，另一队从太平街山麓白塔寺爬山而上，协合图跃攻，为我軍痛击，狼狽逃回。自是計穷力竭，惟有出于投降一策矣。

午后零时，敌豎立白布降旗于水部城上，文曰“將軍出走，停战議和”。我軍认为非誠意，仍继续炮击。敌人乃豎第二面降旗，挂于于山天君殿前面榕树上，文曰“請求停火，全部献械乞降”。許总

指揮巡察陣地，見白布飄揚，以遠鏡視之，下令暫停炮擊。旋來降使一員，手持白旗，文曰“獻械乞降”，后隨挑夫數人扛步槍機柄數担，求見許總指揮。其人系武備第一期正科畢業生吳振翔，與孫、許為師生，由前哨引押至總指揮部。許允所請，派排長陳金魁同往河東街蒙古營前副都統明玉家招撫。去久未回，又派工兵營隊官王家凱赴旗界探查。少頃，金魁、嘉凱督押敵方官兵出水部門至南較場呈繳無機柄槍杆及子彈。我軍則于于山大士殿前面安置機槍監視。敵人繳械后，在較場橫列縱隊，向南盤坐地上，每人發給銀洋一元遣回。

四 維持治安

方五六月間，時有革命謠傳，人心風鶴，商界及各人士公呈閩浙總督松壽請派團隊防范治安，准批由地方自籌辦理。于是商團首先成立，約有一大隊，請馮金榮任訓練教官。繼者有勞工民團義勇隊，楊琦任訓練教官。而各公益社亦組織團練隊，由各社救火會中撥丁抽練。各鄉保則組織聯甲，設立柵門，按戶抽丁或雇丁輪流防守。林雨時、王鴻慈抽調各救火大會撥丁組織救火大隊，集中一處，以防不測。戰時，彭壽松更遣倉前名營營者率其徒黨協助維持。故敵人無法施其突襲，而宵小亦無從生心。

次日，總指揮部派學生軍官隊方毅、孫本戎、張乃誠等全隊入旗界挨戶搜查槍械，各校學生帶有臂章符號者數十人，自動隨往。聞朴壽避在明玉家，詭稱奉孫統制命請到于山面商善后。朴壽辭以不能行步，眾為雇小轎，并由八旗統領德潤陪往，禁于大士殿客堂，旋由軍警同盟會辦理處接收。后彭壽松命其他往，至于山第四炮台邊，押送者從后以刀砍之，死于觀音閣亭下。

十九日于山之役，炸弹队王清銓、王耀西因深入脱队，为敌人擄杀，王杰功口唇受伤。排长江道森守栅中弹，死在医院。炮兵营雷长蓝某，在于山中弹阵亡。炮兵营管带萧奇斌戴假髮穿长衣上阵，作战未久，托称嘔血回家，遣其弟其煊到桥南总机关部向刘通报。工兵营管带林文英临阵逃回六桥乡，船至半江，为邏队緝获，拘送司令部。

十九日早战事作后，閩浙总督松寿吞叶子金自杀于盐道前（在督署后門）高开榜画象店。旗都統胜恩夫妇十九日午后自投花巷司令部請罪，孙統制予以温慰，事定后，資送其全家回籍。鑲黃旗协領兼营务处定煊，十九日晚在室內自縊死。正藍旗参領兼捷胜营管带长志投井，被救，后数日，在馬江海潮寺出家为僧。捷胜营队官郎乐額三个兄弟及全家男女十余人，以煤油浸湿棉被扎盖身上，放火自焚。繙譯官何芝田全家投于蒙古营宅內紗帽井，被救者仅男女小孩各一人。滿校教員杀汉团組織者文楷，于八十一阶冲锋时被获，拘数日，释放。

战事既定，当晚由桥南总机关部以軍政府名义发出安民布告。杉木公会擄葬队清理战区未埋尸体，葬于西山公墓。大吉陞劇班武三花徐春浦掠取皮衣一件，彭寿松立斬以徇，悬首南街郎官巷柵門。

（三）組織軍政机构

二十一日，彭寿松到桥南社集合同志，整队入总督衙。寿松乘馬領先，同志步从。寿松手执紅旗，馬为旗惊，翻寿松于地，幸无伤。进衙开会，議定組織軍政府，推举孙道仁为都督。都督府內并

設參事員會，掌理民政，推舉彭壽松、鄭祖蔭、林斯琛、劉通、黃光弼、林曉等十人為參事員，壽松為會長，陳承澤為秘書。設民政、財政、外交、軍務、司法各部，後改為司。鄭祖蔭提出名單：民政長、次為高登鯉、劉松生，財長為陳之麟，外長為林長民，皆諮議局中人。鄭祖蔭亦諮議局議員。壽松反對，謂革命政權應操於革命黨人。其時同志不敏初次發生意見，亦慮壽松夾袋中人多粗獷不諳政治，乃為疏解。壽松亦不堅持，乃照祖蔭主張。祖蔭本福建同盟會支部長，慮與軍警特別同盟會發生問題，力求擺脫，將支部長讓於壽松。會議時鄭烈、李倬適由日本趕回。鄭烈願任司法，李倬習警察，即將法長畀鄭烈，任李倬以警察事務。二十三日在督署大堂舉行都督就職典禮，陳設輝煌，衣冠整肅，鳴炮奏樂。孫道仁於樂聲中步上禮台，其餘參加者依次就位。鄭祖蔭代表同盟會授予都督印，文曰“中華軍政府閩都督之印”。孫道仁接受後，即印貼就職紅告示。參事員會亦同時成立。二十五日，在南較場開追悼陣亡將士大會，並慰問烈士家屬及受傷將士。

參事員會本非善制，其後會員更有私自委託他人代理者，組織流於複雜渙散；入春改為政務院，舉壽松為院長，鄭祖蔭、林斯琛副之。院內設叙官等四局，劉通任局長兼院秘書長，黃光弼任副局長。後林斯琛任鹽政監督，又推劉通任副院長。未幾，袁世凱國務院以與制度不合，命令取消，省乃特設警察總監一職，位置壽松。

（四）初政與失敗

一 初 政

革命黨人多只知犧牲與破壞，未注意建設，以為距成功尚遠，

将留待后之人也。故既无新建設計划，亦无旧政治经验，其所措施，多凭願望，不切实际，且有应措施而不知措施者，然犹从爱国利民出发。迨后政权全入寿松之手，則日离軌道矣。茲举初政数事于下：

一、废除人民詬病已久之厘金。

二、免旧欠錢粮。

三、盐归官办，废除紳包。清制售盐各限地段，始由商包，后为紳搶。仕宦回家，宦囊充裕，恒企图接当鋪、办盐館，以其潤厚且稳也。新政开始，即将盐館收为公有，原有股本加以审核，发給盐票，按期支还。

四、不发紙币，維持金融稳定。

五、恤偿高节里被焚房屋。

六、选賢与能，重要政务多畀于党外人士，如君宪派高登鯉、刘崇佑、林长民，华侨陈之麟，紳士刘鴻寿，旧官吏裴汝欽等，刘鴻寿且畀以盐务专責，虽多人反对，不顾也。

七、考試官吏。

二 失 敗

彭孙之矛盾：道仁拥有都督名义，寿松則以福建光复系其一手所造，轻視道仁。道仁心弗能善，漸生嫌隙。第十鎮軍隊虽参加軍警特別同盟会，然皆道仁部属，且乐道仁寬厚，畏寿松生辣。許崇智为孙部实力要人，战争时藩庫存銀为許所取，寿松爭之不得，大起責言，亦构成重大意見。寿松无法制孙，乃自設亲卫两营，由哥老会重要分子张煊、刘輔廷分任管帶，使其子彭厚庵統之。又使其侄彭蔭祥任延建邵道尹，李煥任延平知府，张祖汉任邵武知府，黃

震白任建宁知府，更造成对抗形势。益以失意分子挑拨，政客谗构其间，表面虽未至决裂，内心则仇结愈深，不可调和。

内部之解体：寿松与刘通有深交，且由其介绍入同盟会；郑祖蔭、林斯琛以同盟会首要，均为寿松所尊敬。政权初立，寿松对三人恒能虚心接纳。后寿松受馬絳生挑拨，而寿松左右又多眼短胸窄，以扼于三人，不能逞志，复造謠兴谤，逐渐疏远，独揽政权，一意孤行，如野馬脱羈，奔逸无軌，外失人心，内亦解体。

蔣黃暗杀案：黃家宸，福清人，仓前山福音斋学生，参加桥南社体育运动，能作激烈言論，頗为寿松所喜。光复前旬日假回福清，光复后旬日始来，謂集有数百人，請寿松編营給餉。寿松以事前未奉命令，中間亦无报告，却之。家宸屡求不遂，乃散布仇恨之言。寿松妻李氏从仓前山妇女界获知家宸图暗杀寿松，盖家宸語其女友者。同时偵探队亦有嫌疑密报。寿松忿甚，命人先杀之。家宸自知危險，求黃乃裳帶其往見寿松，力自辨白，乃裳复从中疏解。寿松意已释，尙未及收回命令，而家宸于归途适遇执行者，为所刺杀。蔣筠字子尊，同盟会會員，不知其由何处加入，曾一度在福州作政治运动，組織爱国社，組織拔丁会，得社会上重視。后公立法政学堂成立，入任要职，遂停鑼煞鼓，不再作政治运动。及光复后，畀以县长，不滿所欲，自負才力，憤怨不平。知政权掌于寿松，而寿松粗暴，不为人所附，而孙、彭交恶，易于推翻，于是到处演讲，肆意攻击，且挑拨閩湘感情，含有排外意旨。寿松左右湘人尽憤，慫恿暗杀之，蔣遂为陈西瓜刺杀于玉山瀾河干。

苏眇公案：某报蓄意攻击寿松，冷嘲热諷，吹毛求疵，甚至无风起浪，塗脂抹粉。及苏眇公主笔政，尤其凌厉猛烈。寿松憤不能堪，乃封閉該报，并逮眇公审讯，責打屁股。

蔣、黃暗杀案发生，激起京沪同乡憤慨，非驅逐寿松不可。苏事发生，并引起京沪报界不平。

任馬絳生之錯誤：寿松錯誤由引用馬絳生在幕后始。馬絳生者，安徽人，奸佞巧詐，清时以道員在閩候补，夤緣任铸币厂长，以舞弊被劾。清廷派陈璧来閩查办，置之于獄。光复释出。寿松以为能，引置左右，一切规划均出其手。寿松虽参加革命，而其本质固驕恣貪戾，得絳生逢迎，专横益甚。及政运将末，寿松知为众所不容，聞中山先生在沪，亲往迎迓来閩，冀轉移一般人观念，并得广东及各省同志声援，維持其命运，然而噬臍无及矣。

岑春煊来閩：京沪同乡非去寿松不可，北京同乡集会討論时，陈衍稍为寿松辯护数語，几遭毆打。遂由刘冠雄轉陈袁世凱派岑春煊以鎮撫名义来閩，迫逐寿松。寿松曾为春煊屬員，春煊至，駐馬江，不进城，遣人諭寿松离閩。寿松虽欲抵抗，而能为效力者无几，同志均劝其暫行息肩。陈子范知孙道仁不可靠，寿松一去，福建革命势力随失，即由沪赶回，劝抵拒，后知势不可，乃太息而去。福州各界有力人士慮寿松蛮干，糜烂地方，且計寿松生活尚薄，难以成行，建議商会筹十万元贖之，寿松乃往香港。行之日，身自披彩，各界組織仪仗，欢送至馬江。岑春煊旋亦离閩。不久，袁世凱任命张元奇为福建民政长，革命政权遂移于官僚与后来軍閥之手。

鎮撫之余波：蔣、黃案在上海喧闐时，林斯琛謂蔣、黃有取死之道。在沪乡人忿斯琛为彭寿松辯解，乃故为变易斯琛原語，謂斯琛认为蔣、黃“死有余辜”，用以激怒一般乡人，且指斯琛为参加暗杀者。寿松去后，遣郑得元等代表蔣、黃家屬向法院告訴。首席檢察官丘某(似名得士)极力罗织，提起公訴，逮押斯琛于看守所。林森主张請上海律師許作屏来閩辯护，法院以現行法未有律師制度，拒

其請，乃推刘通、黃光弼为辯护人。承辦审判官亦从各方面了解其非实，予以无罪判決。丘殊不滿，提起上訴，以逾上訴法定期間被駁，案得結束。

尾 声

翌年(即公元一九一三年)七月，方声涛、林虎在湖口獨立，通電各省。刘通、黃光弼等与許崇智謀胁迫孙道仁通電响应。許崇智部署甫就，将取道上游入江西，而湖口已失敗。許遁去，孙道仁電袁世凱請罪，袁復電温慰。越两月余，国务院電令密逮郑祖蔭、刘通、黃展云、严汉民数人，各附以罪名，刘則被指为著匪。时郑祖蔭任都督府軍法課課員，即就逮。刘通任都督府民政秘書，是日适未进府，及晚回家，聞孙派人請，即进府，晤祖蔭，得知国务院電令。刘通径出府，拟分告展云、汉民。比到家，展云已逮捕。急赴丙午俱樂部遣告汉民，汉民已不在閩。林前銘邀刘通至其家。林炳璋及軍法課課長沈珂为祖蔭辯白，孙为疏解，并及刘通。孙因据電国务院，得无事。涉冬，刘冠雄率李厚基一旅入閩，孙道仁旋調赴京。革命遺烬，至是亦熄。

廈門的辛亥革命

丘廬竟

(一)同盟会在廈門的活动

同盟会在廈門的革命工作，均由海外华侨机关派人或會員自动回廈組織进行的。从海外先后回到廈門秘密活动的，有馬尼拉、新加坡、泗水（現印尼属）这几个地方的华侨。从新加坡来的是施銘。施回廈后患病，在鼓浪屿外人所办的救世医院就医时，取得該院医生协助，利用外国医院作为掩护，进行活动。周明輝当时在該院学医，亦系参加者之一。从泗水派来的是王振邦（晋江人）。王时已剪髮，怕引起清官吏嫌疑，少外出，先寄宿鼓浪屿黄金安处，不久迁廈門，寓挂外国籍招牌的万成客棧，以資掩护。

据个人回忆及調查所及，当时参加同盟会的，晋江方面有許卓然、叶青眼、王泉笙等；漳州方面有陈彬侯、白植滋、朱潤卿、陈清福（白于漳州光复后，因地方別派爭夺权利，被陈炸死）、王兆培、张第三、陈智君（亮）等；灌口方面有庄育才、庄佑南、庄文泉、楊浩然等；海汀方面有丘廬竟、許秀峰、苏眇公、顏长春、顏衍园、林斯民、陈腕瀾、丘夏民、丘魁迎等；廈門方面有陈德暉、陈金芳（在馬尼拉加入的）、黃約瑟、黃金安、林振寿、王金印、黃炳輝、林幸福、曾森林、許春草、陈兆麟、周駿烈、庄恩典、刘成沛、刘烏記、张家信、曾滄

华、黃蘊珊、李博用、楊山光、蔡世兴、张揚波、林万山、吳益、陈宝珊、李弯声、呂天宝、曾滄齡、王云青(在新加坡参加的)、张海珊等。漳州主盟人是陈彬侯，泉州主盟人是許卓然，廈門主盟人有施銘、王振邦、陈德暉、黃蘊珊。

当时宣传品极缺乏，经济也很困难，除了以种种方法进行口头宣传外，曾将邹容所著的《革命軍》改名为“图存編”，密向革命群众黃廷元募捐白銀一百两，由刘成沛向萃经堂接洽，承印一千册，部分由邮局寄出，部分于深夜自各商店門隙投入。这本小册子起了很大作用，收到不少的效果。

周明輝、丘盧竞、王金印等租賃鼓浪屿仔墘(現泉州路)設立鼓浪屿閱报所，由王金印主持。翌年，丘、王联袂出国，閱报所停办。黃約瑟、黃金安、张揚波等人继起，在鼓浪屿大河墘(現龙头大街)創辦“閩南閱报社”。不少群众自动将閱过的报纸、杂志贈給該社。該社得群众的支持，逐渐充实，并且通过閱覽所吸收了若干对象。

不少群众对革命工作都积极支持和参加。如在鼓浪屿救世医学院学医的周明輝将其宿舍作为联系同志的机关，收存部分宣传品，并把宣传品轉托医院中一位女工友代收(这位女工友的儿子后来也参加同盟会)。李博用任大北电报局(丹麦人办的)的高级职员，自願为革命党人任义务情报員，遇有关于妨碍革命的密电，立即密报党人。許某任美国駐廈領事館秘书，負責从美国人方面探听有关情报。蔡宾涵是三五公司(日人开的)职员，以鼓浪屿洋墓口自己的住宅为党人临时集会地点。他如张海珊等利用美利时洋行为通訊地点和联络机关，黃約瑟、王振邦等則以三达洋行为秘密联系的机关，振昌洋行則由丘魁迎主持关于联系漳州方面同志的工作。萃经堂印刷工友出工协助印刷宣传品，并保守秘密。这許多

人都对革命事业作出一定贡献。

廈門同盟会会员在进行秘密革命活动的同时，还作了一些改革社会陋习、破除迷信和去毒的社会活动。

(二) 具有反帝意識的同文书院学潮

同文书院是美帝国主义者对廈門人民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英帝国主义者亦比美帝早几年在鼓浪屿設英华书院。前者以美国駐廈門領事任董事长，廈門海关稅务司任副董事长，勾結一些地方豪紳和資本家叶青池、傅孚伯、林菽臧、黃秀琅、錢三、丘振祥等任董事，称为华董，书院一切权力操之美国人韦茶霽(譯音)。英华书院由英国教会創辦，开始沒有設董事会，董事多以該院校友充任，經費来源，多募自菲律宾华侨。两书院为了互相竞争，勾心斗角，都竭力把它們的毕业生介紹到廈門海关、邮政、电报局、洋行和外国銀行任职。

同文书院陈大弼、徐屏山两位教师和学生楊山光，皆具有革命思想。陈系該院毕业生，留在該院任教，经常向上海和海外訂购进步报刊，经英国駐廈領事館邮政递寄，以避免廈門当局检查，閱后介紹給进步学生传閱。徐屏山原台湾籍，因日本占領台湾，不願做日本的順民，迁住廈門，任同文书院汉文教員。徐博学多文，富有民族思想，并受他哥哥徐明山(同盟会员)的影响和鼓励，在編写讲議、讲课和与学生接触时，向学生灌輸革命思想。楊山光原是秀才出身，为进修外文，入同文书院肄业，就在这时期参加了同盟会。該校第七班学生因課程大部分为英文，每日仅有汉文課二节，极为不滿。陈、徐、楊三人即分头鼓动全班学生向当局提出增加汉文課

钟点要求。韦棻霖悍然拒绝，并把全班学生开除。社会进步人士对学生行动表示同情和支持，但韦棻霖仍不理睬。于是，第七班学生反抗到底，坚决离开同文。事先由杨山光向其岳父陈子挺接洽，请他出面创办公立中学。子挺开设建兴钱庄，秀才出身，平时颇注重教育。他激于义愤，并得到吴蔭庭、黄廷元、杨子暉等大力支持，乃毅然出巨资，并成立校董会进行募捐，很快地办起厦门公立中学，陈子挺任监督（即校长）。陈大弼、徐屏山联袂脱离同文，来公立中学任教，并设正、备斋两班，正斋是同文书院第七班学生，备斋是公立小学一班程度较高的学生。公立中学开办后，由于陈、徐二教师的主持，和杨山光、马大庆等在学生中当骨干，生气勃勃，除根据当时学制施教外，特别注重灌输革命思想及加强体育，进行军事体操。到一九一一年，该校因经费困难停办。

（三）廈門光復的經過

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廈門後，同盟會會員張海珊等認為在廈門非有自己的報紙鼓吹革命，喚起人民行動不可，即創辦《南興報》，張自任總編輯，以蘇君藻、黃幼恒任付主筆，於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出版。這家報紙出版後，光復廈門的呼聲更響徹遐邇。

廈門道台慶蕃在十一月八日夜化裝逃下海關巡船并征號，越日搭廣西號英輪往上海潛匿租界。同盟會中人如王振邦、黃約瑟、張海珊等乃積極準備採取行動。十一月十日，福州宣告光復。廈門同盟會中心人物王振邦聯同王汝明、孫印川等六人往見廈門自治會會長陳子挺（廈門自治會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成立，實權由各

保保长操纵，代表大多由各保董充任)商討光复廈門問題。陈子挺认为廈門无須武装起义，只須等待福州派員前来接收。前往商討的六人中的非同盟會員，也贊成陈的主张，但同盟會員王振邦、丘汝明等坚决反对，认为省会福州虽已光复，但光复伊始，应兴应革，千头万緒，短期間內恐不能顾到廈門，何况廈門市民迫切要求早日光复，不应等待。陈等不同意，因而沒有取得協議。

同盟会骨干乃秘密會議，决定于十一月十五日起义。

十五日午后，一群群一陣陣的人向寮仔后(現晨光路)行进，頃刻間，天仙茶园(西班牙籍民黃瑞曲经营的戏园)挤滿了人，大多数赤手空掌，只极少数人携带手枪，还有香烟罐伪装的假炸弹。在人声嘈杂中，张海珊走到主席台，向到会群众揭发清朝政府的腐败，說明革命的意义，号召大家向道台衙門进攻。他还宣布，凡参加起义的人，左臂上均須扎盖有“革命軍”三字的白布条，到光复胜利后凭白布条領大洋五块。哨笛一鳴，同盟会會員領先，几千个群众列成长蛇队，浩浩蕩蕩地向目的地挺进。沿途参加的人肩摩踵接，陣容更壮。队伍到达道台衙門时，仅有几个衙役在传达室里站着发抖，其他吏胥也逃走一空，沒有遇到任何抵抗，便占領了整个衙門。翌日，軍政分府成立，少数人推张海珊任統制，邱汝明(綽号大目)任警察局长，邵貞茂、林万山任巡官。是日，楊山光携带一把斑剝的指揮刀，率領几十个群众去接收湖里山炮台，并派陈宝瑚先去說服。不久，陈复命說，炮台管带和全体士兵表示服从。队伍到达时，炮台管带偕同十几个士兵列队欢迎，繳出大炮炮弹和若干步枪，湖里山炮台宣告順利接收。

为防止盜匪乘机搗乱，黃廷元、楊子暉、洪晓春、黃世金等組織保安会，責令各保自筹經費，日夜派壯丁就地巡邏，地方因此得以

安然无事。

同盟会内部分为福州、廈門两派，福州派以张海珊为首，廈門派以王振邦带头。张任統制，王不服，想取而代之。双方各糾集流氓打手，于光复后的第四日以手枪刀棍进行格斗，計死二人，伤二十八人。廈門派人多占优势，死的是福州人，伤的也是福州人較多。陈德暉迅速邀請蔡世兴等医生为受伤者进行搶救治疗。同盟会中大多数正派人士，对此事深感痛心。第二天，同盟会和保安会中人在道台衙内开紧急會議，进行調解。詎王振邦的支持者召集几十个打手到道台衙附近示威，张自觉不敌，知难而退，辞去統制。但王也有所顾忌，不敢就职。地方人士以軍政府无人負責，恐发生变故，要求保安会据情电省。福州都督孙道仁即委派原鴻遠任廈門道尹，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来廈視事，成立廈門參事会，延聘同盟会、教育会和商会中有代表性人物为參議員。被延聘的有黃廷元、楊子暉、黃幼垣、洪晓春、黃約瑟、曾滄齡、陈天恩、蔡德远、楊硯农、傅孚伯、錢三、陈子挺、周墨史等，以李禧、孙印川任秘书。參事会成立后，保安会便无形中取消。黃約瑟本在美国人办的三达洋行(即美孚行)任职，任參事員后，該行经理竟指責他不該参加政治活动，将其撤职。黃因此被迫离乡，到菲律賓謀生活。

廈門光复的捷报传到海外，南洋各属华侨团体自动組織募捐队，向各阶层华侨进行募捐支援。緬甸先推庄銀安(又名谷甫)携款来廈門主持临时筹餉局，协助办理地方財政。接着，丘應竟离开《緬甸公报》经理职务，返廈助庄处理内部事宜。檳城吳世荣、陈新政、黃金庆、丘明昶等也筹款汇廈。泗水(印尼属)派庄以卿、庄少谷、王少文带二万元到廈支援。各属华侨除支援廈門外，直接汇到南京政府和广东方面的捐款为数更多。

泉州光复史事拾零

泉州市文史資料整理小組

一 光复前的革命活动

泉州为八閩名郡之一，府治旧制轄有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五县，首邑晋江为府治所在地，人文鼎盛，与海外交通亦甚发达，在南洋各埠的侨众极多。当孙中山先生在海外鼓吹革命之际，旅居南洋各島的进步人士起而参加革命者日多。泗水之杜承章、蔣极料等，檳城之吳世荣、吳文楚、陈新政等，时派人密至家乡联系，吸收同志。廈門廈禾中小学堂教师、学生及基督教会中的部分人士被吸收参加的頗有其人。泉州許卓然在廈某学堂当小教，叶青眼在鼓浪屿当教員，先后加入同盟会，負責在泉州一带工作。于是泉州各界人士如陈仲瑾、陈伯清、吳堃、庄周生、傅維彬、柳鴻鳴、賀祝尧、黃中流、柳忠烈等先后参加。此外还有在南洋加入的蔣以麟、盛九昌、庄汉民等，亦皆潜回故乡从事革命工作。其中以許卓然参加最早，泉中同志称他为許大哥，頗有号召作用。

辛亥春間，有热心人士发起組織泉州体育会，以练习体育，提倡尚武精神为名，暗中組織革命力量。参加练习的有陈仲瑾、吳堃、賀祝尧、庄周生、傅維彬等，不下五、六十人，并延請帶領湘勇的統帶唐万胜为教官，借此与彼建立关系，冀爭取他对革命有所帮

助。

福州光复后，許卓然、叶青眼等先期由廈返泉，不久蔣极策、蔣极料等亦由南洋回乡，在省垣的同志大部分是留省学生，亦紛紛回籍。許、叶等即在泉州西隅学校（即現在政协俱乐部地址）召集同志計劃行动，以謀光复。进步人士参加活动者日多，同时又有同盟会某部派郭治齐来泉在奎章巷設立机关，联络同志，准备光复泉城。

二 泉州保安会的组织

清末泉州原有的綠营，仅虛存其名，实皆腐朽不可用。当时在泉駐防的唐万胜所帶領的湘勇，虽仅几百人，但武器全部为毛瑟后膛枪，为当时比較新式的部队。唐的本部設在提督署的旧箭道，另一部分則駐扎在东教場。如何应付唐的軍隊，在当时是必須首先解决的問題。

省城光复，成立福建軍政府，推举孙道仁为都督，消息传来，泉城震动。唐万胜态度未明，泉州知府管元善已先行离泉，除右营莫开亮外，举城文武官吏，大都心存观望，謠言四起，人心惶惶。地方紳士林翀鶴、吳增、吳巨川、傅維彬、归侨陈光純、蔣极策等于是出而組織泉州保安会。

保安会的組織虽系紳士倡議，革命党人亦表贊同，会址設在打錫巷內旧考棚，公选林翀鶴、吳增为正副会长，以陈籛負責軍事，陈祖烈負責宣传，吳堃为教练，还有民政、財政、庶务等科，亦由李唐、王孝翰等分別負責。紳士吳增向南安、黃龙等处募集子弟兵二百名，各自携带鳥枪，来城訓練，另在本地募集六十名，先行編队。在黃龙一帶应募的仅百人左右，各自携鳥枪进城，而在城应募的六

十名亦筹凑有旧式毛瑟及牛腿药枪。

三 军装庫爆炸事件

保安会招募的保安队甫告成队，火药武器有待充实。有人提議接收軍装庫，因而于某日黃昏由陈鏡、吳堃帶領保安队前至花棚下城守营軍装庫点收軍装，用保安队封条点存加封，派人看守。越日上午，看守人来会报告謂有人欲搬取火药。保安会聞报，立即集合队兵准备前往处理。正在整队点名之际，突然一声巨响，漫天黑烟，随即传来消息，謂軍装庫的火药爆炸。事后得知，是日早間亦有人到西隅学校向同盟会設立的机关报告有人搬取火药事，是时适有同盟会南部分会首領施雨蒼抵城，拟会同在城同志叶青眼、张賜福、洪冬茶、賀祝尧等同志于小开元寺（即同盟会机关）准备武器队伍，往惠安安撫土匪陈烏泡，所需火药武器計議前至軍装庫取給，而报者适来，施雨蒼戎装佩劍而往，张賜福、洪冬茶、賀祝尧三人随之，未久即聞爆炸巨响。在机关內諸同志大驚，馳至开元寺大庭，則見施焦头烂額，渾身赤裸，狼狽而来，急将其送入惠世医院救治。洪冬茶、賀祝尧皆葬身火中，张賜福送入惠世医院后亦于是晚不治毕命。是役也，除施雨蒼获救医愈外，死的还有前夜临时被派遣看守該庫保安队员吳姓一人（南安岩浦乡人），陈仲瑾工友林乾坤，管理軍装庫之綠营武官张某。

軍装庫的爆炸，有人认为是因张某反对革命，誓与軍装庫同存亡，暗中布置火药线所致。但有人則以为是吸紙烟不慎而起火者。也有人云，系因有人脚穿皮鞋，摩擦而引起发火者，传说紛紜，莫衷一是，真象如何，不得而知。

四 保安队哗变

保安队全部悉驻营于保安会所在地的考棚内。某天夜间，突然发生哗变。缘该队编制以棚为单位，编就之后，有人在队里倡议“祀棚神”，借此聚饮消遣。事闻于主持军事的陈箴，以事属迷信，谕令禁止。然饌肴已备，当晚各棚仍聚集欢饮。适陈箴巡视营地，见状大怒，严加斥责，引起少数队员反感。将近午夜，遂有聚众谋毆陈箴之举。幸陈有人护卫，从后门脱险得免。居民闻枪声，大为惊惶。肇事的仅二十四人，哗变后避匿某破祠。翌日叶青眼商诸市内富商黄河请出白银三百元前往收抚，分别给以安家费，重编一队，由叶亲自带往南安。

五 土匪混入事件

当时泉州城防空虚，招募的保安队又有一部分哗变。南安惯匪杨居，晋江青阳惯匪大小二庄武，惠安著匪陈乌泡夫妇，皆率其党羽入城，企图趁火打劫。某日保安会开会讨论治安问题，杨居、庄武竟高视阔步，进入会场。陈乌泡夫妇且在保安会所在地考棚口表演武艺，男的将头巾擲于照墙，纵身随巾一跃而登墙颠，女的以双手开枪，准确中的。出席会议的百数十人，始而见杨居、庄武进入会场，继而突闻枪声，会场秩序大乱，虽是一场虚惊，而影响所及，人心又复浮动了。

六 剪辮爭执

保安会成立，在泉之文武官吏，虽明知大势已去，然犹徘徊观望。统带唐万胜、知县黄逢年迄未交出其兵权印信，且不肯剪

辮。无何，同安灌口义勇队来泉，泉人楊仲觀(名山光)随軍前来，駐扎考棚內，从中排解，为唐、黃保证三月內履行剪辮条件，并願以自己首級作保。三个月既过，唐、黃仍不剪辮。某日，楊仲觀正在保安会會議室与陈仲瑾、蔣极料等議事，許卓然、叶青眼帶領同志多人突来向楊索取首級，情势非常紧张。許、叶经陈劝阻，对楊之迫迫始稍和緩，楊亦离席而去。唐、黃最后延至繳交印信的那天始行剪辮。

七 革命军来泉安撫

泉州光复后，经革命同志向各方联络，革命軍先后开到泉州。首先是同安陈育才帶領的灌口义勇队，继而有华侨戴金标，泉人陈銘、賴乾等或帶領部队来泉，或亲率队伍过境，最后则有永春宋淵源奉福建省临时都督孙道仁之命与称为刘統带者从福州来泉，其名义为安撫下游，于抵泉后在旧提督署設參議會。

八 泉州学生军

泉州青年学生于光复后即組織学生軍，进行革命宣传。首先发起的是泉州府府立(亦称官立)中学堂学生。該学堂創辦于清末科举未废之时，革命思想輸入甚早。光緒末年，有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名江大疆者，在該学堂担任数学教习。江早参加革命組織，在学生中作秘密宣传，暗中介紹革命刊物于与他接近的学生吳堃、庄周生等。嗣后当局以江有革命党嫌疑，迫之离职他去，但他在学生中已散播了不少革命种子。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失敗，黄花岡七十二烈士壮烈牺牲，革命惊涛駭浪弥漫全国，尤以青年学生感动最深。該学堂学生楊仲儒、黃永亮、赵祖建等出而組織学生

队，并由楊到培元中学联系，通过培元中学学生周駿烈的关系，介绍培中学生二十余人参加。泉州府中学学生参加的三十余人编为一队，举楊仲儒为队长。培元中学二十余人另编一队，举周駿烈为队长。泉州光复之后，各地革命軍先后来泉，泉州学生队正式改名为泉州学生軍，此时已有一部分枪械，配合革命活动，分向各乡进行宣传。

当学生軍出发宣传时，适唐万胜的部队在南門外某乡办械斗，搶掠乡民东西。学生軍向其盘詰，唐部不服，发生口角。学生軍乃将肇事的兵士带来泉城，唐部亦尾随前来，列队在提督署前，欲与学生軍一拼，学生軍亦严陣以待，双方劍拔弩张，有一触即发之势。经唐万胜下令解散部队，双方始免冲突。未几，革命軍出发到南安、安溪、永春，学生軍亦聘請傅維彬为顧問，随軍到各地宣传，受到各地百姓父老的欢迎。

九 保安会解散

泉州光复之际，各地革命軍陆续开来，也陆续他往，最后宋淵源奉省方命，以安撫名义来泉，不久又开赴南安、安溪、永春等处。先是叶青眼于宋未抵泉之时，带其所招撫的保安队二十四名，約为同盟兄弟，前往南安县治的丰州（时南安县設在丰州），制止黄姓与什姓的械斗，适传宋带兵南下，遂至城郊与之会見，后仍率領其二十四名的武装随宋赴安溪光复安邑，旋轉入永春。至于維持治安的泉州保安会，仍存在一段時間，負責地方事务，中間正副会长曾因事辞职，另举施淑橋为正会长，李唐为副会长，后于无形中自行解散。

（本篇由叶青眼、陈仲瑾、盛九昌、吳大璋、楊仲儒等提供資料，吳楚整理。）

辛亥革命上杭民軍被陷記

吳 梅 林

一 革命前地方概況

辛亥革命后，各省政权为豪紳地主所篡夺。而上杭民軍进城不滿一月，卒为地方封建武装所陷，慘遭焚戮，更可哀已；揆厥緣由，盖地方特殊情况使之然也。

上杭县属福建西南之汀州，南連百粵，北近贛南。汀江经杭城东南，流入县属峰市鎮（后改隶永定县），下注韓江。贛南米豆、汀属各县之紙木烟絲，经汀江运至峰市，再经韓江运至潮州、汕头出口；盐、布、百貨从汕头、潮州经韓江运至峰市，再经汀江运至汀属各县，由长汀轉入贛南，峰市鎮盖为閩、粵、贛货运之吐納口。杭城自东至西有大街，其两端延至东西两城門外，长约五里，有店鋪七百餘間，左右相对，鳞次櫛比，市况极为繁荣。《福建通志》云：“上杭比屋裕如，士勤学业，彬彬文物，有类大邦；僕隶下人，各治生产。”《新郡志》云：“上杭文物类于大邦，科名甲于諸邑，家家建追远之庙，戶戶置时祭之資。”城中多故家大族，祠堂庙宇以及富貴人家之巨宅广廈，建制多类宮殿。居民分十三鋪（另附郭四鋪，共十七鋪）。各鋪街巷設柵門，夜上柵，更夫敲梆巡夜，有如古之所謂“重門击柝，以御暴客”也。城池坚固，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以数十

万之众，攻城未下，因有“铁上杭”之称。杭城虽僻处山隅，实一商业城市，亦有名之封建堡垒也。

清末，政府无能，屈辱在帝国主义淫威之下，外来侵略，与日俱深。上杭有志之士，蒿目时艰，极为忧愤。是时，中国同盟会成立，章炳麟主编《民报》，鼓吹革命，宣传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之宗旨，而保皇会梁启超出版《新民丛报》，反对革命，反对民主，主张“开明专制”。上述两种刊物，同时在上杭知识界传播两种不同思想。同盟会革命宗旨为爱国青年所欢迎，吸引部分先进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保皇会主张则符合一般地主绅士与部分大商人之愿望。然绅士中亦有进步分子，如兰溪丘复（荷公，举人）与镇平丘逢甲（滄海）有旧，广州起义时，任两广方言学堂教员，前在县城丘总祠创办师范传习所（时称民主师范），又在兰溪倡设立本小学堂，以教育后进、传播新知为己任。复本南社社员，与吴江柳亚子为文字交，尝重编明遗民刘爨石《天潮阁集》，并请柳亚子为之序，以寄国家民族之思。当时民立师范及立本小学堂学生，多受其影响。同时，城中开办琴岡高等小学堂及崇正小学堂，由城中绅士陈紫垣（举人）、丘昱丞（拔贡）、雷熙春（拔贡）等董其事。革命思潮日益在各学堂中迅速传播，革命书刊日益为青年学生所爱读。崇正小学堂学生郭筱川（中共烈士郭百筹之父）家，所藏新书至富，在同学中辗转传阅，咸以阅读禁书为快事。此足见当年知识界倾向革命之情，甚为殷切，然仅形诸思想而已，尚无实际行动也。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上杭在此时局激荡之下，人心极不安定。时在城清朝官吏有知县龔时富、游击张鹏飞，军队则有福徽营一哨，四十人，毛瑟枪四十枝。此外有地方封建武装团防局团

勇、民团及商团。团防局局长郭月航(武秀才)与巨绅丘显丞、郭集泮、林镜涵等共主持局务。驻局团勇仅十数人,其余民团、商团,自住户及商店中调集壮丁编队,无事在家在店,各从其业,有事则临时召集,听候调遣。所用武器,土銃、大刀、长矛之外,别无枪械。团防局名为捍卫地方,实则为殷商富户守护家业。时局急剧转变,地方官绅皆首鼠两端,态度暧昧。至一般城市居民,则数千年封建落后之积习已深,又憎于清朝专制淫威,不唯不敢接近进步人士,甚至仇视者有之。唯县之东南各乡,地近粤东,得风气之先,趋向革命,尤以兰稔诸乡为著。嗣后,民军来自大埔,兰稔诸乡革命党人与之合,卒以客军不谙地方情况,不一月而被封建武力所摧陷,非无因也。

二 上杭独立与民军活动

革命思潮在各学堂中传播,具如上述,然只是思想,尚无行动。有之,则自民立师范与立本小学堂始。山东人李宗尧在稔溪开体育社,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暗中与大埔、永定、峰市党人联系,组织民军。民立师范学生多兰稔乡人,立本小学堂设在兰溪,学生多系乡中子弟,既接受革命思潮于前,又与宗尧体育社接触于后,遂由思想而行动,而加入民军。此外,县城设工艺(纺织)传习所,亦为传播革命思想与进行革命活动之所。教员蔡梅生(梅县人)在学徒中宣传革命宗旨。又城内人丁凤洲(生员)在永定汤湖赖屋教书,与革命党人来往,旋回县城活动,与其结盟兄弟郭贡廷、陈笏臣、李虎侯共事,机关设丁瑞菴公祠。大埔党人涂演凡(廩生)与峰市党人曹东旭先后来县,与凤洲联系,设民军报名处,由凤洲主持。在城人丁履仁、张文雄、张茂棠、卢德荣、谢文秀、谢福生、郭老七、兰金芳及

工艺传习所部分学徒，报名参加民軍。演凡在瑞菴公祠放映电影，作宣传，并秘密制造炸弹。党人相約，以剪辮、着蓝色卫生衣为号，准备起义。九月下旬，时局紧张，李宗尧往大埔、永定、峰市一带，策划起事。涂演凡在杭公开宣传革命。九月二十八日，曹东旭到县衙，促知县龔时富宣布独立，邀集城中紳士在自治会开会商議。九月二十九夜十时，宣布上杭独立，县衙門首树白旗，上书“恭祝中华民国独立”八大字。各行店舖，亦俱树“新汉万年”四字白旗，全城店舖住戶燃放爆竹，以示庆祝。然地方官紳阳順阴违，政权武装，仍旧不动。民軍方面仅有六輪手枪及自制炸弹，实力不厚，无可作为。在此大局动蕩之际，桀黠者乃乘机窃发，肆行掠夺。十月初一日，樊彪进城，张贴告示，自称新汉民軍，兼理粮餉。夜八时，派队伍巡查，并到县衙及釐金局鬧借餉款。知县龔时富不得已以龙边二百元与之。樊彪本旧营游勇，湖南人，流落汀杭各地娼館中。至是，乃以其同乡关系，誘致福徽营人枪十二，擅作威福，誑騙官民。其党有丘长元、邹寿哩，皆洪会中人，与樊彪仍旧出入娼館。杭人以其出身不正，必为盜匪，人心惊惶，团勇、民团及商团彻夜巡守，以为戒备。初二日樊彪率队赴武平，人心稍安。

李宗尧在大埔联络华侨林铁汉等举事，宗尧任惠潮嘉民軍軍政部分部总司令。杭城民軍，以无实力，难以安定地方，乃馳书大埔民軍，請其派队来杭，維持治安。宗尧乃派梅县人童国珍率民軍四十余人来杭。十月初四日上午十时进城，通街鳴炮迎接。童国珍与在城民軍中人同至团防局召开會議，知县龔时富、游击张鹏飞及地方紳士皆与会，选举童国珍为軍政长，詹鸿達（杭城人，举人）为民政长，李逢甲（本县院日乡人）为財政长。会同知县、游击及地方紳士到福徽营晓諭軍士，将枪械弹药繳交民軍，計毛瑟枪二十八

支，其余十二支为樊彪取去。民軍軍政部設百获堂，一部民軍駐阳明祠。民軍取得政权、武装，乃宣布革命紀律：“一、违背宗旨者，二、泄漏机关者，三、毀坏学堂者，四、焚烧教堂者，五、杀害洋人者，六、搶劫商店者，七、强买强卖者，八、奸淫妇女者，九、扰乱地方者，有一如此，杀无赦。”

是日夜十二时，又到民軍一队，欲进城。城門已閉，城中紳士不允开城。翌日巳刻始入城。首領楊伯震（大埔三河坝人，学生，二十余岁）、温开元（峰市人，洪会头子，五十多岁）、李云卿（籍貫、出身不明），部众有七十余人，仅有枪数支，余持大刀。楊等进城，径至县衙，要知县剪辮交印，其部属又将上杭县牌及团防局灯笼搗毀。一时人心慌乱，商店閉門。在城民軍，出街安民，商店始复开市。楊温部駐福霽营营房（原自新所，在县衙左近）。夜十二时，楊伯震于团防局传集全城紳士，审問杭城情况，并勒令剪髮。内有巨紳陈紫垣（举人）被其斥罵，謂陈吞食县款，欲杀之。适知县在旁，謂陈老成练达，并非坏人，到会在城人士僉同担保，始罢。初六日上午，楊伯震要知县龔时富清算財賦，索餉款二千元。时富以五百元与之。温开元与县吏陈佐邦朋比为奸，一榻橫陈，共吸鴉片。楊、温如此，童国珍等心恶之，但不相統属，不听約束，亦无如之何。

李宗尧于大埔独立之后，令林铁汉留守，自率拳师及民軍八十余人，向汀属发展。十月初六日下午四时到杭城，駐阳明祠。童国珍以楊、温等不听約束，告諸宗尧。宗尧决意除之，深夜二时许，派十余人径至县衙，击杀楊伯震、温开元、李云卿及其党五人，又于阳明祠內杀四人。余党就捕者四十余人，经审問后，每人发給龙边一元，押出城外遣散。初七日，人心惊惶，通街閉市。初八日，軍政部出示安民，始开市。初九日，宗尧以杭局已定，囑国珍留守，自率民

軍六十余人向长汀进发。是日上午七时，送信人从峰市回杭报信，謂有温开元匪部二百余人来杭报仇。附郭居民及东关外店舖聞訊，紛紛迁入城内，城門紧閉，人心惊恐。旋探得匪部已散，不曾来杭，至初十日人心稍定。駐城民軍为保地方安全，派出哨兵分守四大城門。每日上午八时始开城，出入人等，严加盘詰。附郭农民入城卖菜，往往在城外久待，荒时废业，深感不便，心銜之。軍政部又以鴉片賭博，最为害人，而烟館賭場，人至庞杂，且易滋事，乃厉行新政，严禁烟賭，而烟鬼賭徒，流氓土棍，失其生計，更恨之刺骨。

省中独立文告至县，令时富仍旧供职。民軍屢促时富清算財賦，銷毀旧印，时富迟迟不果，只允以义仓儲谷拨充民軍軍餉。当时城中紳士、团防局諸人之与民軍，本虛与委蛇，而阴为掣肘。至是以义仓儲谷本杭城居民所以备荒者，以为軍食，皆不悅；然又不欲公开反对，得罪民軍，乃阴使人于居民中散布危言，謂义仓儲谷拨充軍餉，明年春荒，何以接济。居民聞訊，咸起反对，敌視民軍。是固时富金蟬脫壳之計，以义仓儲谷啗民軍，以緩財賦之清算，又借此以离間軍民，使成敌国，計亦毒矣。

三 民軍被陷

李宗尧率民軍进驻汀城，时樊彪已由武平到汀州，嘯聚旧营、福鑑营兵勇与地方恶棍，勾結协台刘某，計陷民軍。十月十四日夜八时，襲击民軍駐所永定会馆崇德堂，并包围之。民軍涂演凡与党人賴某向樊軍演說，晓以大义，仓卒为樊軍开枪击毙。民軍乃擲出炸彈，毙樊軍二十余人。樊軍纵火焚烧崇德堂，民軍死难者四十余人。宗尧出走，十七日回杭，分向大埔、永定等处調集民軍，以图克复汀郡。惟自汀城败警至县，杭人益輕視民軍。财政长李逢甲与丁凤

洲、郭賁廷等，向知县龔时富及团防局当事者索取公款，要求将各商餉銀及坐賈鋪捐归民軍收入，以应軍需，又将义仓儲谷拨充軍食。时富与团防局当事者当面允許，而阴为阻难，更以义仓儲谷，事关民食，激动公憤。流氓、土棍更欲乘机倡乱，散布謠言，捏造民軍将包围团防局消息，以是人心惶恐，不可終日。駐城民軍軍政部以情势急剧轉变，馳书大埔民軍，請求增援。十月二十七日夜，民軍张善紀(我武，太拔乡人，日本留学生)等三人进城，取去东城城門鎖匙，意欲开城以接来援之客軍，旋为团防局第二鋪分团取回。二十八日巳刻，从大埔而来之林铁汉，率民軍十余人到县。城内民軍出城迎接，进城后，駐百获堂。先是在城人謝希尧(蔚卿，同盟會員)在大埔为敢死队副队长，与铁汉共隶軍籍，其父召之回县。铁汉到县，即到謝家訪希尧，邀与共事。是日上午希尧至县衙及游击处，索取旧印，繳交軍政部。团防局当事者，以民軍增援部队到杭，疑有变，乃先发制人，阴使团勇分赴水西渡、潭头等处，将渡船泊右岸，断絕交通，以截民軍后路。下午四时，团防局条諭各鋪民团及商团，各持軍器，到总局門首集中待命，以防变乱。部署毕，乃邀民軍童国珍等到局議事。迨童等到局，各鋪民团及商团二十余人已拥至总局門前，流氓、土棍杂在民团队中，大声喊杀。国珍聞变，欲出。郭集泮阻之，劝防不測。国珍不听，从后門出至中街，欲回百获堂。民团分两路奔百获堂，欲夺回县印，并收繳民軍枪械。国珍走不十数武，被两路民团夹攻，为自卫計，擲炸弹，弹着地未伤人。追者趋前，乱刀砍斫，国珍倒毙于郭家門側之字紙炉边。众奔百获堂，民軍閉門拒守，开枪击毙团勇謝佳文。众益憤，舁巨炮至琴岡书院左巷，轰击百获堂。烂匪郑传书矯健有力，身背煤油一罐，跃登琴岡书院屋頂，纵火焚烧。琴岡小学图书仪器及一切枝具，为众搬搶

一空。百获堂在琴岡书院后面，近北城，民軍突圍出。无如团防局早将四城紧閉，飭众分路截杀，以首級报功給賞。城内杀死二十余人，其从北門跳城逃走者二十余人，又被北門外民团截杀十五人。众将民軍头顱擲放萃英书院門首，累累者为状至惨。郭集泮恐杀戮过大，乃宣告生擒者賞加倍。駐杭民軍不及百人，事后統計，除生擒者外，被杀害者四十二人，重伤回家死者四人。城籍民軍謝希尧、丁凤洲、郭貢廷走匿亲友家，得脫險。林铁汉本华侨，以重金賂其宗人某，易服逃出，未遇害。是日全城罢市。二十九日，时富出街安民，又喝捕民立师范毕业生丘子溪。子溪本非民軍，因民軍促时富算交财政，子溪适自漳州归，参与其間，致触其怒。十一月初一日巳刻，时富提审在囚民軍，縛子溪与先一日被拘之立本高等小学毕业生丘景福、丘凤鏞三人杀之。余由各乡具保释放。謝希尧之父介圭，本在城富戶，希尧出走，介圭亦逃奔在外。时富令将介圭家业充公，以其儲谷七十石拨入义仓。陣亡团勇謝佳文，由团防局备衣衾棺槨为之殮殮埋葬，立“义勇堪嘉”牌坊，以示追悼，以龙边二百元給佳文母，作生养死葬費。

民軍被陷，死者除大埔、永定籍外，多本县兰稔乡人。城中恐民軍及兰稔乡人报复，严为戒备。日間有人进城，严加盘詰。入夜城門紧閉，十三鋪民团及商团，登城戍守，紳士巡城。每夜由殷富人家煮粥以餽守城者，如是者一月有奇。

樊彪于汀郡击败民軍后，聞杭变，乃率众分乘四船，順流而下，欲取上杭。舟至杭境官庄乡，为当地民团截击。樊彪率众登岸对抗，以众寡不敌，遁去。其船在混乱中，过滩直下，十一月初六日下午到杭。内有賴佳哩（武平高梧乡人）出来問話，謂有汀州府刘中协书札，派樊彪来杭鎮守云云。城中人以樊彪行为舛謬，疑为盜匪，

欲开炮轰击。官紳阻之，派团勇至船查看，起获軍器火药，其人則囑留船候令发落。夜十时，船中人逃窜。城楼戍守者发觉，擂鼓发警报。民团开城出，分路截捕，拿获十余人。内有洪某，湖南人，原福鏘营軍勇，置獄中，余经知县审問后释放。初八日知县提审在獄洪某，用刑后，始吐实云，樊党乘乱，冀有所掠夺。时富据供，乃悬赏二百元，通緝樊彪到案。樊彪被官庄民团击败后，逃至千家村轉武平中堡乡，初九日为当地民团捕获，来杭报知。杭城团防局派团勇十余人，前往中堡，十二日将樊彪拿回杭城。杭人欲杀之，适汀郡来文，要将其送回汀州，未果杀。十三日下午，时富备文将樊彪解回汀郡。至西門外，为众击杀。郑传书更剖其胸，取其心而烹食之。

郑传书本剧盜，有膂力，行动矯捷，騰踔飞跃如猿猴。尝入夜行窃，跃登某店屋頂，摘去瓦桷而下，有店伙臥睡柜側，而传书則臥柜上，扭去鎖，取其銀錢，复登屋頂，置其瓦桷如故而去，而店中人犹不知也。自摧陷民軍以后，传书自伐其功，益驕纵，人皆側目。城中官紳惧民軍及乡人报复，倚为护符，不敢撻其鋒，惴惴終日，可怜亦复可笑也。

四 城乡和解，追悼民軍遇难烈士

民軍被陷，兰溪丘复在沪，請于南京孙大总统，電閩孙都督昭雪。孙都督派管带王挺至县处理。十五日知县龔时富接孙都督来文，派兵来杭鎮守。然交通不便，省軍迟迟不至。謠言不輟，人心惶惶，而杭城戒备仍不敢或懈也。十一月三十日申刻，管带王挺率部四百余人从永定到杭。城中惊传兰稔报仇者至，閉城拒之。王軍乃暫駐东关外夫人宮。县衙中人，入报时富。适永定知县罗嘯泉赴任过杭，拜訪时富。嘯泉湖南人，与王有旧，时富乃邀嘯泉与

在城紳士丘显丞三人縋城下，至管帶王挺營中，各述城中惊恐及惧兰稔复仇情状，請大軍明日进城。王初不悅，旋以時已夜分，慮百姓惊扰，乃允如所請。十二月初一日，王挺及其部队进城，在城官紳以鼓乐欢迎，通街悬挂“欢迎大汉义軍”旗帜，鳴炮焚香，极为隆重。王軍进城，分駐县衙、釐金局及警务局三处。王挺詢問官紳，各悉事变经过，以城乡冲突，应为和解。初二日分函四乡紳士，各举代表到城，协商解决。初三日管帶范庆升率部百余人，从汀州至县；十八日又有管帶刘茂生率部三十余人，亦从汀城至县。四乡代表到城后，由王挺主持，会同范、刘二管帶及地方官紳，商議和平解决城乡糾紛。二十八日決議，判由城內賠修县立小学銀元八千圓，烈士祠墓撫卹等費銀元七千圓。四乡代表要求惩办禍首，兪以郑传书为肇事罪魁，决以抵罪，以泄公憤。然郑桀黠，又孔武有力，不易捕。初五日，乃設計由王营哨官二三人，邀郑至釐局駐所飲酒，酒酣，哨官某約郑騎馬通衢。哨官騎徑入县衙，郑亦随之入。时衙內已設伏，迨郑入內，两旁伏兵驟前，遂就捕，即日申刻正法。王挺恐郑党劫法場，故派一队至西郊刑場，轉移目标，众尾随队伍往观，而刀斧手則縛郑至南門碼頭杀之。樊彪亲人某在軍中，亦将郑剖取其心烹食之，为彪报仇。初八日四乡紳士为死难民軍烈士开追悼大会于阳關祠，大門設“崇拜英雄”匾額。指定东門外清惠书院旧址，建烈士祠，曰“昭愍”。二十八日遇难烈士丘师柳等四十一人合葬西門外演武亭側，十一月初一日遇害烈士丘子溪等三人，亦合葬諸烈士墓前。当日遗体纵横，共埋黃土，至是始为筑墓。其伤重死于家者四人，姓名今无可考矣。

民軍革命之对象，本为清朝专制政权，上杭民軍之革命，竟一变而为城乡敌对，其故何哉？无他，县城乃封建堡垒，又为商人麇

集之处，豪紳地主，巨賈殷商，既懼于专制帝王之淫威，又憚革命之于己不利，乃对革命阳示順从而阴为破坏。而民軍領袖来自邻县大埔、嘉应等地，不諳地方情况；其所施为，亦有不得人心者，以致脱离群众，陷于孤立。知县龔时富，更以义仓儲谷，允作軍食，造成民軍与在城居民之利害冲突，遂酿巨变。事后，省方派王挺来杭处理，不責封建势力之摧陷革命，而目为城乡糾紛，膺愆禍首，又非其人，卒以城乡和解寢事，如此顛預，识者哂之。固然，辛亥革命之果实，为立宪派所攘夺，全国如斯，上杭岂能例外；乃革命党人不死于战場，而惨遭地方封建势力之屠杀，不亦大可哀乎！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初稿

附記 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范启龙先生，来杭采訪辛亥革命史資料，請政协上杭县委员会协助。政协前曾发动社会民主人士，响应周恩来总理号召，編写辛亥革命史料。十二月一日午后三时，在政协二楼召开回忆辛亥革命座談会。到会者有馮蘊玉（政协委員）、謝希尧（同盟会會員，政协常委）、兰金芳（辛亥参加民軍，現为上杭紡織厂技师）、郭星楼（現为旅棧业从业人員）、刘子仁（政协委員）、郭淦堂（現为烟酒业从业人員）、李步青（辛亥琴岡小学学生）。馮老先生七十九岁，希尧、星楼、步青三先生七十以上，余悉六十以上，其于上杭辛亥革命之事，或身历其境，或目覩耳聞，各凭回忆讲述，虽不完整，然片言只字，亦足資印証。郭桂林，七十一岁，辛亥曾在团防局供职，現在城关公社柴炭供銷社工作，因事未出席座談会，特往訪問，讲述甚詳。又于族兄雷胜家，借得其父双发伯父手录《辛亥上杭兴汉灭滿紀事》，极为翔实。根据以上資料及《上杭县志》，经一再分析研究，斟酌編写，历时半月始脫稿。采訪及拍摄革命遗迹照片，子仁致力特多。夫历史事实，笔之予书，质

以存真，文以致远。自揣学识肤浅，謬陋不文，所有資料，既不忍轻易割弃，行文自不免枝蔓。舛誤之处，更所难免，希识者正之！

辛亥革命后罗福星领导的 台湾人民抗日斗争

苏子衡 苏 新

自从一八九五年日本侵占台湾以后，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在祖国人民的支持下，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更给予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以极大的影响和鼓舞。仅仅在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五年的四年中，较大规模的抗日革命运动就有八次。这八次是：一九一二年三月，以刘乾为首的林杞埔起义（台中竹山）；一九一二年六月，以黄朝为首的土库起义（嘉义）；一九一二年九月，以陈阿荣为首的抗日活动（台中南投）；一九一二年十月到一九一四年三月，以罗福星为首的大规模的抗日斗争（所谓“罗福星事件”或“苗栗事件”）；一九一三年四月，以张火炉为首的抗日活动（新竹）；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以赖来为首的起义（台中东势角）；一九一四年五月，以罗阿头为首的六甲起义（嘉义六甲）；一九一五年三月，以余清芳为首的大规模抗日武装斗争（所谓“噍吧哖事件”或“西来庵起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仅在一九一二年一年中就发生了四起抗日斗争事件。而这八次抗日斗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斗争的目标都是“驱逐日寇，收复台湾”，并且每次斗争都是直接或间接受辛亥革命有联系的。

其中，以罗福星为首的抗日运动是在同盟会的直接领导下进

行的。罗福星是广东省鎮平县高恩乡人，少时随祖父迁居台湾，在苗栗牛桐湖庄居住。罗曾在苗栗公学校讀过书，因不堪日人的歧視和压迫，于一九〇六年回到祖国大陆，在廈門加入同盟会，之后被派去爪哇、巴达維亚、新加坡等地，組織华侨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在他的日記中有如下的記載：

吾家本居台湾，因憤慨日本官吏橫暴不仁，故抛弃家产，內渡故乡。乙巳年（一九〇五年）秋，任村校教員。在职二年后，受广东学务部丘逢甲君命，視学于爪哇，归国后，至丁未年（一九〇七年）春，再赴新加坡任中华学校校长。因风土不适，辞职。再往巴达維亚就該地中华学校校长。辛亥年（一九一一年）春，与胡汉民、赵声君、林时爽游历各島。三月二十日（阴历，下同）到西印度机关部。于前一日（三月十九日）温生才炸毙孚琦將軍。同志四人接电报，遂从西印度归国。三月二十六日至香港，三月二十七日至广州省城。于二十九日，广东起事，攻击都督衙門。是役黃兴左手指被銃所伤。四月三日，我与胡汉民等避难于香港。閏三十日林时爽被清廷在都督衙門銃杀。我与胡汉民君再避难于暹罗。五月杪，往巴达維亚会見黃兴。黃兴于七月二十日由巴达維亚归国。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二十二日在巴达維亚接电报通知，我等二人往召集民軍。至二十八日，募集民軍已二千余人，遂率民軍由巴达維亚归国。至香港时，已九月二日，已禁港，仅胡汉民君得上陆。二十四日往广东。我等民軍二十五日到省城，受領軍器。十月四日受胡都督諭示，搭战艦往上海，直入苏州。至十二月六日，解散民軍。壬子年（一九一二年）春，再任村学校校长。

在此同时，福建都督曾派刘士明到台湾视察，目的在于了解情况，然后在台湾筹划起事。一九一二年七月二日，罗福星接到刘士明来信，要他去台湾。同年十一月九日，罗乘船到台，十二志士彭云轩、丘维藩、林达荣、刘金申、槐中兴、江亮能、黄光樞、黄负敬、福德春、傅清风等也先后到台。他们于十一月十六日在台北召开会议，讨论革命任务、组织方针等，并决议在苗栗设总部，由十二志士分赴南北发展组织，宣传国内革命形势，鼓动抗日斗争。黄兴还先后两次派人到台湾了解革命活动的进行情况。这些经过，在罗福星的日记中也有如下的记载：

七月二日（一九一二年）接刘士明君书云：“视察台湾后，欲在台湾谋起事，此举君必赞成，……。”我接信后，甚喜，于七月三日由家出发来闽。得都督公文云：“十二志士从南京而上海、天津、武昌、湖北一带游行，十一月二日可到汕头。”九日乘船来台，十三日到大稻埕互议。十六日，十二志士分路南北，始着手募集会员。我至苗栗窥察民意，均非常热心。至二月（一九一三年末），募集会员五百余名。三月二日，余北上，接罗庆庚电云：“有人密告，当遁走避难。”我思人生必一死，何足恐哉。

他们还议定这样一些电报暗号，例如，母氏——孙中山，孀姆——黄兴，娘——黎元洪，夫妇——参众两院，家掌——福建都督，副家掌——台湾华民会馆，正字——华民秘密会馆，代定茶——北京，代买日本布——南京，代寄来靴——上海，代寄来鸡酒——广东。

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五日，罗福星在苗栗召开各地抗日志士大会，发表《大革命宣言》。他在宣言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暴政，号召台湾人民团结起来，配合辛亥革命，举行全省大起义，赶

走日寇，收復台灣。宣言傳布以後，受到台灣人民的擁護和響應，據說參加革命組織的達到九萬五千多人。由於各地積極展開活動，引起了敵人極大的注意。同年九月間，日本警察和憲兵在苗栗地方挨戶大搜查，許多志士遭到逮捕，全省起義的計劃受到很大的破壞。羅福星也於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在淡水被捕。日本統治者知道了這次革命鬥爭計劃規模甚大，極為震驚，因此，從北到南，在全省範圍內進行大逮捕，被捕者達四千多人。一九一四年三月三日，羅福星等革命領袖二十人在台北監獄英勇就義。

羅福星領導這次台灣人民的抗日鬥爭，態度非常堅決。當各地組織被破壞、各地同志陸續被捕的時候，他絲毫沒有動搖，仍繼續進行活動。在這期間，他寫了一本《手記》。這本《手記》，在他被捕時為敵人搜去。《手記》的內容充分表達了他當時慷慨激昂的愛國情緒。《手記》裡面的一段寫道：“殺頭相似風吹帽，敢在世中逞英雄”；“人生豈有二度死哉！死者或流芳百世，或遺臭萬年”；“為國家雪恥，為同胞報仇”；“今我為革命而死，何妨殺身碎骨，我一人雖死，尚有十二志士為我報仇，可斷言，今後日人月無寧日也！”

在就義那一天，他神色不變，從容高歌《祝我民國詞》和《絕命詞》。據說，這兩篇詞是他在就義的幾天前寫的。

祝我民國詞

中土如斯更富強，華封共祝著邊疆；
民情四海皆兄弟，國體苞桑氣運昌。
孫真國手著光唐，逸樂丰神久既章；
仙客早傳靈妙藥，救人于病身相當！

此詞每句的第一個字連起來讀，即為“中華民國，孫逸仙救”。

絕命詞

獨立彩色漢旗黃，十萬橫磨劍吐光，
齊唱從軍新樂府，戰雲開處陣堂堂。
海外煙氛突一島，吾民今日賦同仇，
犧牲血肉尋常事，莫怕生平愛自由。
槍在右肩刀在腰，軍書傳檄不崇朝，
爹娘妻子走相送，笑把兵事行解嘲。
背鄉離井赴瀛山，掃空東庭指頤間，
世界腥羶應滌盡，男兒不誤大刀還。
彈丸如雨炮如雷，喇叭聲聲戰鼓催，
大好頭顱誰取去，何須馬革裹尸回！
勇士飛揚唱大風，黔首皆厭我獨雄，
三百万民齊努力，投鞭短吐氣如虹。
青年尚武奮精神，睥睨東天肯讓人，
三州區區原小弱，莫怕日本大和魂。
軍樂悠揚裂喚鵝，天風情長感慨多，
男兒開口從軍樂，何唱台疆報我仇！
東來客族雷我原，驅逐夷蠻我國尊，
白種更傳黃禍身，何難今日此事爭！

羅福星在《大革命宣言》中說：

我大中華民國面積占五大洲、六大洋三分之一，為世界冠，人口最多。我台民來自中華，于十數年前，有志維新（指一八九五年反對割台一事），冀發揚光大吾民族，詎知禍生肘腋，因異族之無能，……飽受鄰國苛政之凌虐。此固吾台民所引以為深痛者也；……

日本灭我台湾，于兹十有九年，而人民受害已非浅。今日剝我皮肤，四五年后削我骨肉，八九年后必吸我骨髓矣！哀哉！吾台民！慨自日本亡我台湾以来，夺我财产，絕我生命，日本苛政，无所不用其极，岂有諸君甘心长受此苛政之下乎？

接着，宣言詳述了台湾人民在日本苛政之下的惨状，揭露日寇在台湾暴政的十一条罪状：

一、凡人民产业，日本政府悉課以极重之稅。人民在社会，生活困难，入不敷出，終复陷于破产，……。日本政府……視台民如盜賊土匪，……以此手段，灭我台民也。

二、凡有利之事业，悉为日本政府官营之，专卖之。台民仅有薄利之事业而已，且征之以极重之苛稅。……此外更課以极重之地方稅、营业稅、家屋稅……等等。日本政府对于殖民地如斯之苛稅，实为吾人憤慨难堪也！

三、我台民之轎夫，彼以非常努力，流汗滿身，日仅得二三十錢，每年不过数十元，而轎夫之营业稅，每年課以数元，且重于家屋稅、地方稅。……一轎夫除去如此稅金尚存几何？岂足以养妻子乎？吾思世界上之殖民地未有如台湾之苛稅者。

四、最受荼毒者，莫如驅逐路上之行商人。彼之資本不过三四元，每日得利二三十錢，彼尚須納营业稅，領“鑑札”，納“鑑札料”。……嗚呼！生活困难之呼声，充滿耳鼓。我台行商人受日警虐待，实欲哭而无从也！

五、(对)营豚业者，(日本政府)亦征豚稅金。(由于)……种种苛稅，入不敷出，惨状难堪也。

六、最可痛者，莫如地方日警，彼常借保甲費、警察費、壮丁費……等等名义，对人民征收，飽其私囊，且濫用职权，如狼

似虎，自为村中“国王”。……日警优富而虐贫。……富者对于栽植路树、修理道路等义务人夫全免。事之不平，莫甚于此。日警每借言调查户口，视察鸦片……等，侵入人家，……若是横行，实为他国所未有。唯日警始敢如此逞威贪财，故我三百余万台民抱不平不服之心实多。……

七、……日本政府讨伐生蕃，……征役人夫。对于我台民不论其家有无，一家决要一人之义务人夫。如是惨酷政策，受其害者，贫民及寡妇。若彼既不能出役，则卖妻子，以雇佣人夫。至于被佣之人，仅取四五十元，往往而卖自己之生命。日本如此惨酷法律，非欲保护人民而设，实欲灭杀我台民而设也。

八、刑事特务侦探横行之事，实不忍闻。彼常借口公职，威胁平民，以搜查之名，行贿赂之实，不论罪之有无，动遭拘禁，欲诉冤枉，亦无可由。

九、我中华民国人民东渡台者，备受日政府虐待，何堪言状。我华民常受日警殴打、暗杀。……

十、华民渡台者，要向日本政府提出“寄留届”（报户口之意），要缴纳日本之学校费，有服役人夫……等义务。……

十一、我华民在台者被日警毒杀，不逞枚举。……

宣言又叙述了筹划起义的经过：

中华民国元年十月六日，我福建都督命率十二志士来台视察，并为华民联络会馆募集会员。而主盟者刘士明君，台北财务局长林达荣君，台中财务局长刘金申君，台南财务局长槐中兴君，台南副主盟者丘维藩君……等。我十二志士募集会员至今已达九万五千六百三十一名之多，而我民国募集华

民會員，假为卖人参药材而来台者亦有二万人也。

余于三月十九日致书吳頌賢托轉奉广东都督，該都督承諾同志光复台湾。吳頌賢募集職員，組織共和聯絡會館，而台湾亦派人赴华民聯絡會館募集會員，謀大舉。

八月一日，广东都督更派吳覺民君調查共和聯絡會館。會員当其时已达五六千名。八月十六日，余于台北大瀛旅館与吳覺民、吳頌賢两君相会，所議十九日遣派金星桥君叩意閩都督，得該都督同意，已于九月十六日接都督公文。今也，閩粵两省亦已联合矣。

余欲再告諸君：本年六月黃兴先生特派潘君来台湾运动募集革命黨員。至七月，黃兴先生更派陈士、王淵两君来台調查黨員，二十七日会于基隆承洋館，开秘密會議，革命趣旨已提出該會議討論。余于二月往台南一带視察會員，見林季商，知有會員二万，今也四万，再聯絡华民聯絡會館，宜可以大有为矣。

罗福星领导的这次抗日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台湾人民并没有屈服。在这次起义以后，台湾又連續不断地爆发了以张火炉、李阿齐、賴来、罗阿头、余清芳等为首的各次起义，继续給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記台湾余清芳的反日武装起义

陈 文 彬

自从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馬关条約》，将祖国神圣領土台湾割让給日本以后，台湾人民在祖国人民的支援下，坚持抗日斗争，始終不屈不挠，充分发揚了中华民族热爱祖国、勇于革命的优良传统。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台湾以后，更使台湾人民感到莫大的欢欣鼓舞，增强了反抗日寇的勇气和信心。无数革命先烈一次又一次地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武装斗争，为我们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现在根据回忆，将我幼年的亲身经历和一些見聞写在下面。

我八岁的时候，也就是武昌起义的第二年，孙中山先生新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不久，有一天，在我父亲臥室的牆壁上，发现了一张彩色的肖像图，图中上方有两面交叉的五色旗子，中間有一个較大的肖像，四角上有四个較小的肖像。当时，我还不认识图上的字，就問我母亲說：“这些是誰？”母亲是个不识字的乡村家庭妇女，但是，大概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她一一告訴我說：“中間那一位穿西装剪头髮的是孙逸仙，右边的那一位叫黃兴，左边的那一位叫宋教仁。”下面两位，她可能是記不清了，沒有讲下去。我又問她說：“这些都是一些甚么样的人？”她說：“去年‘唐山’（即大陆）起革命了，清朝已经倒了，咱祖国沒皇帝了，是个共和国了，国旗也不是龙

旗了，图上交叉的那两面国旗叫五色旗，就是‘五族共和’的意思。孙逸仙就是大总统，那四角上的四个人就是他的部下。”我又问她說：“甚么叫‘五族共和’？”她說：“沒皇帝了，五个民族共同来和平地管国家的意思。”我問她說：“五个民族是那些？”她屈指数了汉、滿、蒙三族，其余两族数不出来了。不过，她添一句說：“你以后大起来要回咱祖国做事，四脚的（指日本人）在台湾，咱台湾人沒路行（走）。”

一张肖像图和一个台湾普通乡村妇女口中說出的几句话，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直到半世紀后的今天还能鮮明地回忆起来。据我后来的了解，当时台湾許多商人从上海等地大量輸入了有关辛亥革命的宣传品，包括上述肖像图、新三字经、通俗小說之类。在台湾各地的书店，也自己編印或翻印了不少这一类的图片、书刊，銷路都很好。台湾的“讲古”（說书）先生們也讲孙逸仙的革命故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感到兴奋，增强了回到祖国怀抱里来的信心。从这些情况中可以看出，辛亥革命不仅对于台湾一般人民鼓舞很大，而且对于台湾此后几次較有組織的反日武装起义更有着深远的影响。

辛亥革命后，袁世凱在北京窃居大总统之位，并阴谋恢复帝制。同时，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凱秘密勾結，无理提出二十一条侵略条約，妄想乘机进一步吞并中国。于是全国輿論沸騰，反日、排日、抵制日貨运动，如火如荼。就在这样的局势下，由于辛亥革命和当地許多革命先烈的影响，一九一五年台湾南部发生了余清芳的反日武装起义。因为日本殖民主义对台湾的控制非常严密，这次起义运动不能不利用宗教的形式，蒙上了一层佛教的面紗。

在我十来岁的时候，父亲有一个亲密朋友，叫苏登科，年龄四十五岁左右。他家住在打狗（即现在的高雄）大崗山前的大社，离我家（燕巢乡——以前叫援巢中）不过二十来里地，彼此经常往来。他那时以组织戏班为业，到处给人家包办演戏。遇有“普渡”、“做醮”等祭神或办喜事时，他常带戏班到我们村里来演，一来就住在我家。他特别喜爱我，常和我聊天讲故事。他讲得最多的是孙逸仙和辛亥革命的故事。这些故事母亲已经给我说过一些，现在苏登科又用“说书”的形式更详细生动地讲给我听，使我对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打倒清政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为不同于历来常听到的“说岳”、“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之类的故事，又是当代人物的故事，所以感到很新鲜，很有兴趣。

一九一五年夏季——那年我十二岁，有一天早晨我刚从睡梦中醒来，看见有许多警察押着我父亲在房间里翻箱倒柜，到处搜查，我母亲、姐姐等家里的人都不见了。我起床后跑到外面问了邻人，才知道她们都被警察抓到村里的警察派出所去了。我赶快跑到派出所去看，果然一家人除了父亲外，共有二十来口人都被拘留在那里，或站着或蹲着，都默不作声，连小孩子也没有哭声。母亲见我跑来便瞪了我一眼，表情很不高兴，我知道她是在责备我跑来干么。我想这一遭全家都完了，因为联想到父亲卧室中的肖像图，又联想到苏登科给我讲的孙逸仙和辛亥革命的故事，估计这一定是反对日本鬼子的案件。我又想，既然全家有被杀光的危险，必须留着种子，将来好为全家报仇。于是，拿定主意，拔开腿朝警察派出所后院飞快地跑去，爬过了一米来高的竹栅栏。这时只听见日本警察在后面一面追一面喊：“打死，打死。”我爬出竹栅栏以后，无处可逃，只好跑到邻村我外祖母家去。我一见到外祖母，大哭了一场。

第二天，传来这样的消息：除了父亲和大哥被带走外，家里其余的人都已释放回来。我怀着悲喜交集的心情，立即跑回家去看望母亲等人。母亲看到我，出乎意料，她并不哭，反而很严肃地对我说：“你要认真读汉文！”从此以后，我每天把在村塾里念过的《四书》、《诗经》、《礼记》之类的书拿出来反复诵读。同时，每天把汉文报上有关余清芳起义案件的消息读给母亲听。我从报上也了解到余清芳反日起义的大概情况。余清芳原是阿緱（即现在的屏东）人，家道清贫，少年时代就当学徒挣钱奉养母亲。后来曾一度当过日本的巡查补（即下级警员），因为受到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的影响，又亲身体会到日本殖民主义对台湾人民的野蛮统治和残酷奴役，于是愤然辞职，把家搬到阿公店（即现在的岡山）后乡，也就是苏登科的家乡大社的邻村居住，和一些同志们密谋驱逐日寇，光复台湾。他的主要同志有台南竹头崎庄江定、由祖国回台的罗俊、台南苏有志、大潭庄郑利记、阿公店程庄张重三，还有上述的苏登科和他的儿子苏东海等人。经过长期的酝酿，于一九一五年二月，余清芳和江定才正式拟定了起义计划，除由罗俊、苏有志、郑利记出面，以修建台南市的“西来庵”为名，向台湾各地的“菜堂”（即斋堂）募捐，作为起义军费外，并发动台湾人民群众，准备和日寇斗争。余清芳被同志们推为大元帅，以“大明慈悲国”的大元帅名义，并暗中以孙中山先生为最高领袖，秘密发表文告。这个文告并没有在报上登出，后来我由别的地方得到。文告如下：

大明慈悲国奉旨本台征伐大元帅余 示諭三台（即台北、台中、台南）万民知悉：万民篤生圣主为民父母，所以保毓乾元，統馭万邦，坐鎮中央，古今中华主国，四夷臣卿，边界来朝，年年进貢。

岂意日本小邦倭贼，北主欺君，拒献贡礼，不遵王法，藐视中原，侵犯疆土，实由满清气运衰颓，刀兵四起，干戈振动，可惜中原大国，变为夷狄之邦！嗟乎！狂澜既倒，孰能挽回？彼时也，天运未至，虽有英雄，无用武之地，忠良无操身之处，豪杰义士，屈守彼时，忍观颠倒，吾辈抱恨。倭贼猖狂，造罪弥天，怙恶不悛，乙未五月，侵犯台疆，苦害生灵，刻剥膏脂，荒淫无道，绝灭纲纪，强制治民，贪婪无厌，禽面兽心，豺狼成性，民不聊生，言之痛切，台民何辜，遭此毒害！今我中国南陵，天生明圣之君^①，英贤之臣，文有经天济地之才，武能安邦定国之志。股肱栋梁，贤臣辅佐，三教助法，圣神仙佛，下凡传道，门徒万千，变化无穷。今年乙卯五月，倭贼到台二十有年已满，气运已终，天地不容，神人共怒。我朝大明国运初兴，本帅奉旨举义讨贼，兴兵伐罪，大会四海英雄，攻灭倭奴，安良除暴，解万民之倒悬，救群生之性命。天兵到处，望风归顺，倒戈投降。本帅仁慈待人，怜恤性命，准人归顺。倘若抗拒，沉迷不悟，王师降临，不分玉石，勿贻后悔！……

但愿尔等万民细想，有犯前过者，切速著鞭，回头猛省，革面洗心，改悔前愆，去恶从善，勿假倭奴之势。本帅慈悲施仁，为世深怀，渡众行善，谅人改悛。望尔等良民，听从训示，遵守王法，早引归顺，勿生异心。尔等有志，愿意投军建功立业者，本帅收录军中效用，但愿奋勇争先，尽忠报国，恢复吾台，论功封赏。本帅言出法随，为国荐贤，执法如山，决无偏私。尔等万民，各宜凛遵而行，毋违！特示。

① “南陵”大概指岭南，即广东，“明圣之君”指孙中山先生。

文告秘密发表后，台湾各地，特别是台南、阿緞交界的山地人民，紛紛参加起义組織。据后来的了解，苏登科父子是負責宣传联络的；苏登科经常帶領戏班到处演戏，也是負有这种政治任务的。

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阳历)，苏东海和两位祖国的革命同志将从基隆乘日本輪船“大仁丸”到廈門联络工作的时候，因被日本秘密警察查出有关起义活动的信件而遭逮捕。日本殖民当局随即在台湾各地进行大规模的搜查，逮捕“嫌疑犯”。上述我家突然被搜查、我父亲和大哥被捕正是这个时候的事。余清芳的最主要的干部之一罗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在嘉义的山中被捕。余清芳本人在台南厅下盐水港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帶領同志們到台南的东北部山中噍吧哖(即現在的玉井)，提前发动起义。以余清芳、江定为首的起义軍，虽然有一千多人，且士气很旺，但都系临时組成，既未经过足够的訓練，武器又十分破旧簡陋，加以時間紧迫，人民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敌人方面，除了警察队外，还有一个中队的炮兵、两个中队的步兵和台南守备步兵第二联队，武器精良，士兵也经常操练。在这种軍事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起义軍仍然英勇打击日寇，进襲日警支厅和派出所，毙日寇近百人，声势日盛。起义軍由于远近农民們的紛紛加入，而壮大起来，攻克了噍吧哖市街，使日寇大为震惊。起义軍占領了噍吧哖附近的虎头山高地后，日寇慌忙調兵、調大炮来进攻。对陣的头两天，起义軍还获得胜利。但是敌人来势凶，人数、装备都超过起义軍。在这种情况下，打陣地战对于起义軍是不利的。起义軍终于因沒有能持久而暂时遭到了失敗。起义失敗后，根据日本殖民主义者自己发表的材料，余清芳、苏有志、张重三、郑利記、罗俊、江定、苏登科等革命首領和有关同志被处死刑的就有八百六十六人之多。但实际

上不只此数。日寇竟然惨无人道地把噍吧侗附近的二十几个村、三千多个居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加以屠杀。

但是，野蛮残酷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只能消灭余清芳以及其他革命先烈的肉体，决不能消灭他们热爱祖国的革命精神。余清芳在他的一些革命诗句里写道：“奉旨討賊复三台，悬壘軍兵得胜开”；“奉旨平台在此时，赤胆忠心扶国为”；“嗟呼何时見明天，遙扶社稷賴圣贤，而今尝胆臥薪日，誓灭万国（指帝国主义）靜坤乾。”这些诗句反映了台湾爱国抗日的革命志士的赤胆忠心。几十年来，许多革命先烈接受了祖国辛亥革命的影响，接受了苏联十月革命、祖国五四运动的熏陶，特别是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更加发扬光大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热爱祖国的革命精神。现在，台湾人民继承了台湾革命先烈的这种崇高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道，坚持着解放台湾的斗争。我们的决心是：不把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彻底、干净、全部地从台湾赶走，决不罢休！

辛亥革命前后台湾的一鳞半爪

王文德

辛亥革命那一年，我虽只九岁，却也在幼小的心灵上多少受到了一些影响。现在，根据我儿时的记忆和成年后的了解，把辛亥革命前后台湾的一些情况写在下面。

孙中山先生到台湾

一九二五年春，在台北市举行的孙中山逝世追悼大会上，蒋渭水曾谈到：孙中山先生在惠州起义之前，曾经到过台湾，逗留了好几天。孙先生一登岸，就被日警包围，不让他和当地人民接近。孙先生到了台北，便被送进了日人经营的旅社兼妓院“梅屋敷”去住宿，实际上等于软禁。因此，孙先生不得不通过中国厨司同住在台湾的同志进行联系。那时，台北医学校有些学生到“梅屋敷”去要求谒见孙中山先生，都被驻在那里的警戒的日本警察所拒绝了。日本当局还封锁了这次孙中山先生到台湾来的消息，因此绝少有人知道这件事。

兴中会老会员杨心如

兴中会老会员杨心如，是孙中山先生早年的革命同志。他原籍广东省香山县（现中山县），和孙中山先生是同乡。他在壮年时

代就到了台湾，一向居住在台北市。他的公开职务是美时茶行的賬房，七七事变后退休，一九四六年間病故。他死后，国民党政府也曾去电吊唁，表彰他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的功績。据楊心如的儿子楊东华說，他的故乡中山县，曾把該县的一条街改称为“心如街”，以紀念他。

楊心如在壮年时把元配程氏和长女秀兰留在家乡，单身到了台湾。他在台湾，絕對隱蔽自己的来历和政治身份，因此，在台湾极少有人知道他的底細。一九二八年冬，孙中山先生誕辰紀念日前后，广州各报刊都介紹了孙先生的革命历史，有些文章中提到了楊心如的名字。那时我正在广州，就把这件事告訴了楊心如的元配程氏（楊心如的第二个妻子是我父亲的族妹，所以我也叫程氏为姑母）。她就給我介紹了楊心如年青的时候在家乡跟随孙中山干革命的故事。孙中山先生最初与楊鶴齡、楊心如和另外一些同志在家乡密謀革命。有一次，他們正在开秘密會議，听說清朝官府已经派人来逮捕他們，并且很快就要来到，大家都非常着急。幸好孙先生会駕駛电船，他就带着同志們駕上一只电船一同逃往香港，得免于难。

“漩桶”退位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了台湾，台湾社会各阶层人們都一传十、十传百地奔走相告，紛紛談論起来，連一般家庭妇女和儿童都知道这么一回事了。人們把这个重大事件概括成三句話，“唐山发生了革命，‘漩桶’已经退位，孙逸仙做了大总统”。台湾从来称呼大陆为“唐山”。“漩桶”和“宣統”二字諧音，是“尿桶”的土語。台湾人故意把“宣統”讀成“漩桶”，以表示对清朝統治者的痛恨和蔑視。

“断髮”維新

台湾的社会风俗本来和閩粵相同。辛亥革命之后，大陆的社会风气逐渐改变，台湾的社会风气也随之而改变了。最显著的例子是“断髮”。台湾男人本来都留着辮子，以为这是祖宗世代相传的习俗，不可改易，否則就是“背祖”。而在辛亥革命以后，他們从画片上看見了孙中山先生以及其他辛亥革命的領袖人物都剪了头髮，知道大陆已经在易俗。最先由居住在台湾城市的广东原籍的一些人領头，把辮子剪掉，以表示自己是在中华民国的公民，而不是清朝遺民，更不是“日本国民”。他們在剪辮子时，像办喜事一样，鳴放爆竹，以誌吉庆；有的甚至备办酒宴，請亲戚朋友喝喜酒。这样，就影响了附近的居民，我就是受了影响而在一九一二年春天剪掉辮子的。由是，剪髮的风气开始在台湾各城市流行起来，而终于遍及到广大农村。記得那时候，在台北市一般理髮費是大人五分錢，小孩三分錢，而“断髮”費，无论大人小孩，都是四角。日本侵略者在辛亥革命以前早就强迫台湾人民剪辮子。因为他們认为台湾人留着辮子，是不馴从日本的統治的表现。他們首先迫使受过日寇的学校教育的人們剪髮；但是，除了在日寇机关、企业、学校当职员、教員的那些人被迫剪了头髮以外，誰也不肯剪髮。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日寇侵略者看到“断髮”的风气在台湾各城市开始流行，就利用这个机会，加紧进行“理髮会”（成立于一九一一年二月）的活动，通过警察和学校施加压力，进一步强迫台湾人民剪髮。后来，台湾人民普遍剪掉了辮子，但是，很明显，这并不是表示他們对日本殖民統治的屈服，而是出于他們对祖国革命事业的衷心拥护和热烈响应。

“五色旗上了天”

自从日本侵略者占据了台湾以后，台湾人民被禁止悬挂祖国的国旗。辛亥革命以后，台湾人民知道在祖国，清朝的黄龙旗已经改换为民国的五色旗了。他们自然很高兴，然而由于日本统治者的严禁，不能悬挂五色旗来庆祝辛亥革命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台北市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有许多青壮年似乎确有其事地互相传说：“中国的新国旗已经上天啦！……”有许多儿童——包括我在内——就依照他们指点的方法去观看上了天的祖国的新国旗。其方法是在中午的时候，把一盆清水放在露天地上，盆里放一块玻璃，让阳光照射而形成虹采。观看了这种虹采，孩子们都相信：“这就是祖国的新国旗，祖国的新国旗确实升上了天。”孩子们成群地站在盆的周围，拍手欢呼。这个带着几分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充分反映出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民渴望回到祖国怀抱、重见天日的心情。

对辛亥革命领袖们的敬仰

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在上海发行的对开和四开大小的孙中山、黄兴、黎元洪等人的画像和武昌起义的图片，在台湾无论城市和乡村都很畅销。人们买了这些图片带回去贴在厅堂上或房间里，并给家属和来访的亲友介绍这些领袖人物领导革命的事迹。

台湾人民对祖国辛亥革命的领袖是如此的崇敬，对日本侵略强盗的魁首却处处表现出极度的憎恨。他们常常把印有日本天皇照片的报纸当作擦屁股的手纸使用，而不怕犯“不敬罪”。

那时候，台湾有些走江湖卖艺的人用和大陆“拉洋片”一类的

方式，让大家观看孙中山先生等人的画像和武昌起义的图片，并加以讲解。城乡的男女老少都很爱看，所以影响很普遍。

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台湾城市一些说书场的“讲古”（即说书，台湾方言）先生，公开给听众讲上海刚出版的《孙逸仙演义》（或是《辛亥革命演义》，已记不清楚）。有些木偶戏团，如台北的“亦解颐”，也给观众表演辛亥革命的戏文。人们都很喜欢听，很喜欢看，每场都满座。散场以后，大家就津津有味地谈论起来，并且给邻居和亲朋介绍所听所看的这些故事和戏文。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其影响也就愈来愈广，而且日益深入人心了。

那时候，有些说书先生还借题发挥，诅咒日本强盗。例如台北市有一个名叫福先的说书先生，在说书休息时，以“拆字数”为名，说日本天皇的年号“大正”这两个字拆开来是“一人一止”，那就是说：日本的国运，到“大正”的下一代就将绝亡了。听众（包括我和其他一些儿童）听了都很高兴。

“我中华，民主国，黄龙旗，变五色”

辛亥革命后，台湾城市一些中文私塾的小学生们，很喜欢念上海新出版的《新三字经》。这书开头四句是：“我中华，民主国，黄龙旗，变五色。”我现在已年近六十，这四句还能记得很清楚。

那时在台北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流行着这样的童谣：“红兮乌兮二十八，警察被我踢”，意思是日本殖民统治的不能长久。我们在游戏时常常唱着这两句童谣，甚至警察从旁边经过，也还是照样大声唱，丝毫不害怕。

青年学生的动态

台北医学校的一些台籍学生如蒋渭水等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统治怀有深刻的仇恨。他们从辛亥革命，从医生出身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迹，得到了鼓舞，就以该校为中心，展开学生活动。当时主要是联系同仁，结交朋友，互相勉励，提高民族自觉，反对日本师生歧视台籍学生，反对把台湾人民叫做“清国奴”。这些人毕业后，虽然散居在各地做“开业医”（私人经营的诊疗所），但还是继续保持联系，进行活动。那时，他们听说孙中山先生不屈不挠地在广东进行革命活动，就暗中的同仁间和朋友中进行募款，而且派人携带捐款去援助孙先生。派出去的人从大陆回台，又带回来了辛亥革命的影响。这些人后来曾受过寓居在台湾的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又受过五四运动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到一九二一年，他们为了在台湾鼓吹民主自由思想，进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日的改良主义的活动，其中有些人组织了“台湾文化协会”。

× × ×

我今天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家庭中，回想当年辛亥革命对台湾的影响，眼看伟大祖国正如旭日东升那样一天一天兴盛起来，使我感到无限的安慰和万分的鼓舞。我完全相信，处在美帝国主义控制和掠夺下、处在蒋介石集团的黑暗统治下的台湾同胞，和我同样满怀着这样的信心：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台湾人民一定要和全国同胞团结一致，坚决反对美国霸占台湾，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各种阴谋。六亿五千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台湾，使我们的可爱的家乡台湾回到伟大的祖国的怀抱里来。